華夏知青文集選

第一輯《知青情结》

青春寻迹

华夏知青网

一、雾锁京津塘

今天是2001年的元旦。上午八点半离开在北京的住处。车走三环一路通畅，半小时就到了京津塘高速公路入口。路口到大洋坊收费站的这一段是“准高速路”，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刚开一会，车就停下来，前面得不动，后面的跟上，我被夹在了当中。

车窗一个个打开，脑袋一次次伸出来。原以为发生了车祸，忽然前面传过话来，“雾大，路封了！”“啥时候能开？”有人问，“不知道，没准。”有人答。我看看升起老高的太阳，再看看前后左右的车，我心里有数，只有横下一条心等到底。男人们下车三五成群的抽烟，女人们靠着车窗闭目养神，孩子们高兴地在车缝间追逐。我拿笔写下：

“人生有多少次等待呀，有期望的等待，无目标的等待；主动的等待，被动的等待；等待之后有结果，等待之后复等待。等待看似静止，实际是在蓄势。成熟的人善于等待时机，而大多数人都是在烦躁中，首先失去理智，然后失去机会。”

我一生已有过两次长时间的等待，我知道还会有第三次，那人生最后的等待。

“回乡”，在过去三十年中虽然计划了多次，总是缺少最后的动力，一次次没能成行。这次京沪路开通和三天新年假，促成了我的“回乡”行动。

记得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四，天气和社会一样，正是料峭春寒。我登上南下的火车，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期望什么。总之离开北大这块是非之地，就有一种“活了”的感觉。“偌大世界，无遮无盖，要走就走，岂不爽快。”没想到这一走，又开始了我再返城的奋斗和等待。

泊头镇车站昏暗的灯光下，寒风索索中“拉二等”的人走上来搭讪，当他们用一种动物园里特有的觅食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们时，我一下子就知道了，如无变化这就是我今后的生活了。

当晚河东招待所那冰冷的被褥更使我清醒了许多。天还没大亮，我们就雇了两辆大车去交河县城报到，谁也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工作。十个学生的行李分装在两辆车当中，人就坐在车沿上。我见赶车的把式把一条围巾系在单帽外面，紧紧地遮住耳朵，就也

把大衣领子立起，棉帽子放下，做好了挨冻的准备。架辕的马不紧不慢地走着，拉套的小驴一蹿蹿的犯着撅。我们时而跳下车跑两步，暖和一下脚。车把式点上一袋烟，吧哒吧哒地抽着，想找我们说几句，但又无从张口。我们的心很乱也不愿搭理他。

没想到交河县人事干部的脸色比天气起还坏。

“你们来时，学校说得怎么安排？”，他的眼从上到下的打量着我们。

“没说，就说由地方安排。”我们对着椅子上那个叫局长的科长说。

“档案里写得很清楚，怎么说不知道。”

“真的没给我们看。”

“好吧，你们是插队锻炼.，五个人一组，你们自己选吧。”他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力。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民主，让你在无可选择的范围内选择。

我插队劳动的农村地势低，盐碱地，一尺下去就能冒水，天气特别潮湿。冬天的早晨，田地里、河面上一层霜雪，河两岸的柳枝上满是树挂（冰霜），未冻的湖面腾起一缕缕白气，这时的景色美极了。但太阳一出来霜雪就化了，露出一块块贫瘠的土地。

冬天的时候大运河才有水，我们要日夜抢水浇白地（没种小麦的地）。农民把夜里的苦活都派给我们大学生。我们冻得不行了，就在地里挖个洞，用火烧热了，然后跳下去。

我插队的公社。当时粮食不够吃，一到冬天村里的年轻人就到天津要饭，他们把稀的喝了，把干的在火上考好后装在袋子里，运回家给老人吃。这就是当时党给他们的“幸福”生活。当时我们一天几个只有菜团子，根本吃不饱。也饿得跑到地里，希望能找人家已经刨完后剩的白薯和胡萝卜。那时世界已被我分为可吃和不可吃两种。

＊＊＊＊＊＊＊＊＊＊＊＊＊＊＊＊＊＊＊＊＊＊＊

九点四十分，忽然人群一阵骚动。大人忙着招呼孩子上车。我放下手中的笔，系好安全带，打着车准备上路。十分钟的激动后，没人来通知，也没人能询问，只见每个车门复开，人们不分男女都走下车来，“他妈的，就知道收过路费，一句话都不说，连个屁都

不放”。十点五十八分，路终于通了。我知道几个小时后，我又要回我选择的那个村：张庄子公社赵庄大队。

二、迷路通途

从北京到天津的路我已经熟悉了，大洋坊一过不久就进入了河北。今天积了两小时，上百辆车，一下子开进只有两条线的高速路，速度可想而知。

进入天津地界后，我注意找京沪路入口。七十五公里杨村道口刚过就是休息站，我赶忙下来打听。

“京沪路，啊，刚才的杨村口下去，过了。你看那些车都是和你一样，下个口沿二环往回找紫牙河入口。”

“下个口有多远？”

“三十七公里”。还说什么，走吧。

宜兴阜道口下了高速，进入天津二环。

正象高速路在各国都带动了新产业一样，路边上站了许多人，手里拿着“引路”的小牌。我的车刚停下来，一群人涌上来“服务”，吓的我不敢开窗。十块钱买了一句话，“大哥，且二环走，不下道，压着铁路就有一公里了，静海上京沪！”。

从静海进入京沪高速路后，第一个出口是大邱庄，改革开放的典型。几年前大邱庄的书记已经进了牢房最近死在牢里，但大邱庄比大寨强，人民的生活好多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英雄，大都进了牢房。

以后车就很少了，大多数时间就是我一辆车，路面也越来越好，速度一不小心就上了150公里。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荒原，老槐树上的乌鸦还不熟悉高速路的概念，慢悠悠的在路间觅食。一座座新建的大桥跨过干枯的河床，没有人，没有房子，没有树，这就是离北京百十公里的地方。

到青州的三十多公里，我走得很放松。下一站沧州标得很清楚，我不用看路牌，一心驾车就是了。青州是水浒中霹雳火秦明镇守的地方，看来“土匪”故事大都发生在这一块贫贱的土地上。

沧州离天津一百零六公里。越临近沧州我就越着急，看不到下一个出口的标记，如果泊镇没有出口，我就只有从沧州下道了。真到了沧州口，我又不甘心，再向前开，还是没有标记。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忍不住了，从一个小村下到了出口。就在这时另一辆河北车在我前方停下来，我忙跑上去打听，才知还有两个口才到泊镇。我看见后面没车，就高速把车倒回了高速路，然后一踩油门插进了主道。

一路有惊无险，下午一点四十我顺利到达泊镇。本来是一条通途，却变成了迷路。

人生的路有时也是没有标记，打听得着还好，打听不着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这时我才想起要有个人商量一下该多好呀，高速路可以回头走，人生路是不能重走的。

三、梦断齐桥

从南皮泊镇道口下高速，向右十分钟就见都了大运河，我开始有了方向感。泊镇有了宽宽的马路，有了象样的楼房，“二等”也变成了“面的”，只有乡音未改。

泊镇已经有了三条东西大路，老车站就在最南面的一条，三十年前我就是从那里走进交河的。这次我从最北路向西，第二个口向右，走两里就到了张庄子，然后向左两三里就是赵庄了。

我把车停在村外，我想找那夏天游泳的湾坑，坑边的柳树，那一排小学校舍，那片猪场，那每晚开会的大队部，那三十年前的记忆。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清亮的水没有了，干净的街道没有了。一排排拥挤单调的平房，房后是成山的垃圾。我顺中间的小路进了村，路边蹲着几个五六十岁的人。

“我想找金长友”我能记住了书记的名字。

“没了，早就没了。”

“赵金贵呢？”当时的民兵连长，

“不在家”，

“我是三十年前在这劳动的学生，我回来看看。”我试探着说。

“你小钢吧？”一个半身不遂的中年人问。

我惊呆了，三十年，我从一个青年，变成了这样，他们怎么认得我呀。

我在这里站在冰水中挖过渠，我在这里顶着烈日收过麦，我为村里的老人泥过房，我教村里的娃娃认过字，我把汗水，我把青春留在了这里。

一群人围上来，他们记起了我，记起了每一个在这插队的学生。兆琨、立中、老孙、老范、安福燕、傅力水、杨子，一个个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好像是昨天，我们才走。

三十年，他们的生活是单调的，我们的来到给他们带来了他们一生都未曾再有的记忆。

“你想象中的赵庄是这样吗？”年轻人说话了，

“不，要比这好”我说了实话，

“那时，我们是全县最好的。”老人说。

我还能说什么，我为他们照了像，为那棵柳树照了像。我走了，我不会再回来了。

这已经不是我的赵庄。

从来时的路向西北走，我穿过清凉江大桥，在河叉拐弯处，我看见了齐桥。大街移到了村南，河叉的形象我还深深的记着。卫生院已经变成了两层小楼，一群大夫站在门外，围着辆娶亲的花车看热闹，从这点看，卫生院真是三十年不变。

齐桥中学的门移到了路边，院里又加了几排房。最南的两间教室还是原样，我从窗户向里看，黑板、桌子、方凳、砖垒的讲台，除了不再有我的身影，我的声音，一切一切和原来一样。门紧锁着，我进不去，我真想进去，再说一句“同学们，你们今天穷，但是你们有机会，有时间，因为你们年轻”。

“您找谁？”，我一下子被唤醒，“我找这里的老教师，谁都行”。

“齐雅杰，你认识吗？”

“当然，我就找他。”

站在这个腰弯、耳聋的老人面前，他愣愣地看着我。

“我是阿钢，齐老师还记得我吗？”我大声的喊，

“认得了，小钢，不，老钢呀！”

我不知说了些什么，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破烂家具，煤饼子，旧电视，一件件唤起我的记忆。

“八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高级教师一个月八百九十五元”，

“孙子就要有小孩了”……

我仅在饭桌上，真正看到了三十年的进步。这是人民最需要的，所以他们满足。我这吃过小“捧子”、喝过葱汤的人，懂得他们今天的幸福。

上次离开齐桥时，梨树已经开始挂果了。

这次离开齐桥时，我没有再回头。

四、回京路

一天的奔波，车窗已经看不清路了，我找了一个洗车点洗车。

近五点了，我已不能当日返京，就决定先去沧州，第二天从沧州回京。我没有再上高速路，沿老国道向北，八十公里就到沧州。国道的两边是连成线的村镇，一家家小店，门前堆着大包小包，上面插着招子，招子在风中摇动发出扑啦啦的响声。“无核小枣，水晶鸭梨”，“货真价实，零售批发”，“保铃球”，“美容美发，保健桑拿”，“汽车加油，洗车打蜡”， “电脑培训”，“真正东北大菜”，“四川妹子麻辣面”，现代与过去并存，文明与愚昧同辉。

我跟上了一辆去沧州的大巴，不用问路，顺利到达沧州。

此时沧州已在夜色中，出摊的小贩把街堵得就剩下一条线，我在人群间走，我在吆喝中行。好容易看见一家酒店，我赶快钻了进去，我饿了，今天我只吃了早饭。一个金针肥牛火锅，一盘清炒荷兰豆，一盘红油耳丝，一盘凉拌贡菜，一瓶沧州啤酒，一碗米饭。结帐才四十元，我真的饱了。

我上街走了一阵子，消消食，又买了十斤小枣。然后回到酒店，又打开电脑，写下这一段回京路。

七零年三月下乡，心中不久就萌生了“回京路”的计划。先是一些同学调回了老家，后是一些同学去了东炼，再后是一些同学进了北京。一次次打击，也是一次次激励，这三百公里的回京路，我竟然走了五年。

北京要有单位接受，接收单位要有进京指标，有进京指标单位要同意主动向北京市人事局提出申请，北京市人事局的一周例会要能够通过；交河县人事局要同意放人，齐校中学要同意放人；北京接受单位要交河县先发函同意放人，交河县要北京接受单位先发商调函。

齐桥中学要赵校长、王主任同意，交河县人事局要张局长、吉干事同意，北京市教育局要李局长、白干事同意，北京市人事局要X局长，Y干事同意，还要各个环节没有不同意。

要把这些“要”都搞通，二锅头喝了，好茶叶送上去醒酒；牡丹烟抽了，西洋参送上去补养；大酒大肉吃，脉通片送上去降压。就这样仍然是：当儿子，嫌你不够孝顺；当女儿，嫌你不够妩媚；直着恳求，说你俗；绕弯陈述，说你酸；你说一次，说你要求不迫切；你说多次，说你对他不信任；那年头，撅起屁股让人打，人家都懒得打；说好话给人听，人家都懒得听。

我懂得了什么是失望，什么是无望，什么是绝望。我不怕肩上的担子重，我不怕手中的推车沉，我不怕冰凉泥水，我不怕烈日骄阳，我只怕心灰，我只怕意懒，我知道只要心不死，就有事成的一天。有泪往心里流。

那天沧州的天亮得晚，我早上七点半离开酒店，天还没有大亮，我不敢上高速，还顺着国道继续向前。国道上的车不多，我跟着一辆长途客运车一村一店的走。到青州时太阳升起来了，我从道口进入高速路。

我小心驾车，我知道一次车祸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曾记否，一架飞机在蒙古的上空掉下来了，几个人摔死了，一场浩劫便结束了。这时我的回进京路也终于走到了头。

在石家庄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

“交河的书记来了没有？”省人大主任问，

“来了。”交河书记恭敬的回答，

“你回去把齐桥中学的阿钢放了，让他回京。”

“好，好，我亲自办。”张书记连声承诺。

第二天我接到县里通知，“情况属实，同意调动”。

第三天我去县里办手续，

“省人大赵主任是你什么人？”大家忙着问我，

“我是他老师，我教过他。”我说，

“别瞎说，赵主任是老干部，人家六十了！”

“我教他不要相信永动机。”我说了真话，但没人信。

我把几年来读过的书一本本包好，我要回京了。想起每年春节，我作为外地人进入北京车站被人盘查的情景，想起每年返乡，我背着挂面、带着固体酱油挤在车厢过道里的情景，我坐在回京的马车上时，我流泪了。

我回头看着送我的同学，我知道我不是因为能力，我是因为机会才回来的。我不再是我，我是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我是他们理想的实现者。我默默的发誓，一旦有幸从事科学工作，决不轻视农民，他们和我一样，他们并不缺少智慧和才干，只是他们把机会让给了我。

多少年过去了，我从不和农贸市场上的农民讨价还价，我从不耻笑农民愚昧。我知道我帮不了他们，但我永远感激他们把机会让给了我。

回京路我不用问也走不错，一下京沪高速路，直插杨村道口，然后上京津高速路，分钟寺口进南三环，方庄桥进二环，再走就进城了。

五、了却心愿

三十年中我不知有过多少次回乡的念头，这次总算如愿以偿了。我常常想，我为什么想回去，我想回去看什么，我在那里得到了什么，我在那里失去了什么。

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住了一生的地方，一句也说不出；去了一次的地方，一辈子也说不完。

初去交河时，我认为是一种解脱，在北大天天生活在精神桎梏之下，一下子投入广阔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夏天是绿野蓝天，冬天是白雪黄沙，周围是质朴的百姓，我的精神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

接下来是肉体的磨练，超负荷的劳动强度，长达十几小时的工作，满手老茧以至于攥不上拳。每日粗茶淡饭不怕，每日饥肠辘辘

就坚持不了几天了，当时世界在我眼里，就分为了可吃和不可吃的两类。这种苦难只要有一天的休息，只要有一饨饱饭，就能制止。

而无法制止心灵苦难就来了。

文化革命没完没了，我心中萌生了“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绝望。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表现是没有用的。关系没有，权势没有，年迈的家长还身陷在囚禁之中。那些红五类的同学已经在生产电脑了（穿磁芯，我好羡慕呀），我腰上插着两把镰，手上伤痕累累，还是跟不上趟。那些红五类的同学在搞教改了（推广优选法，我好羡慕呀），我站在渠里，白天黑夜的挖河泥。我已经听不懂他们讨论的寄存器了，我已经看不懂他们研究的数学公式了，我的心灵的承受力到达了极限。

我也想平静，无法平静这不平之心；我也想宣泄，无处宣泄这压抑之情。

后来我离开了交河，生活一天天好了，我去了美国留学又回到了科技领域中。我开始由羡慕别人，变成被人羡慕。以前的目标已经达到，我并没感觉，我又有了新的追求。

回交河看看，实际上是想看到自己，看到过去的自己，看到现在的自己，也朦胧地看到将来的自己。但是，我没能如愿，交河已不是交河，自己已不是自己。

2001年3月22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回家乡（1）

老知青们大都生活在城市，当年下乡之地就成了他们在农村的唯一家乡。能回家乡看看也就成了他们的愿望。很多大城市的知青往往分配到较远的东北、西北、西南。而承德市的知青很幸运，被分配到二百里外的丰宁、围场坝上地区。虽然近，但当年坐汽车起早贪黑也要在燕山山脉爬上两天，冬天往往封坝也回不了家。虽然近，但地处塞寒坝头也是人烟稀少，白毛风、黄毛风比内蒙古还大，冬季也时常有零下40度的低温，艰苦的生活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也有成群的牛羊，一到夏秋清新广阔的天空、绿油油无边的草地，也能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我们青春年华，凝结了不尽乡情，并刻上了永久印痕。当我们抽调回城，走向新的生活工作，时时没有忘却着段情结。刚刚回城，忙于事业，娶妻、生子创建家庭，有时也有意回避那场噩梦...。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到中年，对那段经历、那段乡情的思恋与日俱增，回家看看就成了这群人强烈愿望。我是26年后的1994年第一次回乡，1995年第二次集体回乡，1998年为解决打井，2000年建“重绿碑”，今年为村里办点事。每次回乡的感觉都不一样，甜酸苦辣,使久久不能忘怀。

回家乡（带玲玲入籍）

今年初秋成找宝成和我联系了一车旧路灯，还有宝田我们四个给村小学买的队鼓，准备5.1放长假送上去。5月6号早上我们顶着雨装上车，宝成先押车走了，这才知道玲玲（夏雨）要入孤山子（我们村）籍非要跟着。现在的路越来越好走，车越来越高级，当年两天的路程现在回趟家乡快点当天可以打来回。坐在现代化的“尼桑王”车里，听着全新的音响，我特地点了“回故乡之路”。回想当年为了一两元钱搭便宜车、爬货车的日子，深深的感到时代脚步太快了。路边开发了许多境点，以“窟窿山”、“喇嘛山”、也就是去年总理视察过的小坝子村沟口景点最多。玲玲特别有兴致，哪是当年防“苏修”坦克建的巨石阵，哪是天公、地母，不停的讯问，还时常让车停下来。

快到村子时我们用手机联系知道车已经卸完了，就直接领着玲玲去看当年住的知青房。房子虽然旧了但基本没变，就是去年上了新瓦，由于风沙房子被土院子高了许多，原来的台阶都没了。几个在家的老乡，争着往家里请，走了几家都要留我们，这时村书记和宝成来了这才解了围。但是走不成了，安排到村口“碧风洲”，坝上最大的旅游宾馆。晚上和村民小聚，了解村里最近的情况和变化。由于天旱到现在还没能种地；已经全面进行“一退双改”，正在抓紧种树。副镇长正好在村子督办植树也过来了，席间又为“玲

玲”正名为“孤山子”正式村民，并答应批准了落户宅基地；谈话间白酒就已经喝多了，争争吵吵的又到外面喝啤酒吃烤羊，热热闹闹已经很晚。可是还得哄“玲玲”打五十开，直到连着打了三把独，当上了“歹徒”，已经凌晨两点。大滩镇的朋友不知怎么知道我们回村，早上7点秋成的战友就打来电话让我们过去。起来一看，村长、书记、镇长和老乡已经等着我们，秋成决定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吃饭，到镇里吃顿饭也算安慰吧。

到了镇里虽然是吃早餐，还是喝了不少酒，秋成为了表示诚意一连喝了几大杯，“玲玲”几次想替秋成喝点，结果适得其反到让秋成多喝了不少；虽说“南来北往喝不过丰宁、围场的”但秋成的表现到底把大滩镇的镇住了；按秋成的话说，不这样还走不了。快10点了我们赶快往回开，到坝头看着我们的“重绿碑”还是那么秀美耸立着，又认真的规划测量了保护方式，这才马不停蹄的回程。

回来的路上，秋成、宝成还是喝多点睡了一会，可能玲玲入了“孤山子村籍”来了精神，写了一道，我看第二天就登在我们网站上了，收获不小。这次回乡我们的感觉和94年第一次回乡完全不同，那次全村还是低矮的土房，村民生活还很贫苦，走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现在村子的变化很大，度假村建起来了，还是京北草原最大的两坐；村头盖起了一片片漂亮的瓦房；今年进行“一退双改”村民的生活有了保障，绿化工程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的家乡将要腾飞。

玲玲网名夏雨是围场县牌楼下乡的天津知青，为人热情很有才气，我们是通过“重绿碑”认识的。同“小草”加入铁中一样，我们成了好朋友。天下知青心心相印，愿友谊天长地久。

回家乡(第一次回村）

习惯讲知青下乡地为第二故乡，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们在农村的唯一故乡。回家乡看看、为家乡做点事是大多数知青心愿。虽然回城多年大家商量几次，但直到26年后的1994年秋，秋成、宝成和我才第一次成行。当时改革已经十多年了，城市、社会进步变化都很大。我跟秋成先到了丰宁县城，宝成第二天也从北京赶来。北方人爱喝酒我们特地带了四箱96瓶67度的“衡水老白干”拿了十来条烟，在县城买了菜和生熟肉食兴致勃勃的，天没亮就往坝上赶。沿途好多风景根本无心顾及，一路风尘扑扑不到中午就到了我们孤山子村。

孤山子是大滩镇一个自然村，依一座小山而命名，有百户人家分三个队（还有界牌石、羊家地房子两个自然村队），当年有严重的克山病，是当年的老书记特地到公社要来了我们12个知青，九男三女分别分在了二三两个小队。这次来我们没去大队（村队部）直接到了原邻居扬万忠家，大多数村民都下地了，听说我们回村，村民又陆续赶回来。一个个拉着我们的手，有说不完的话。来了这么

多人，简单安排了一下饭局，村民拉着赶快各家走走。先看我们的老房子，当时给我们盖的两处九间土房，分田到户时已经给了村民，也算有人保养，还是老样子；我们刚来时住的老房东家的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大爷们壮劳力；当年同龄的伙伴都以娶妻生子成了一家之主；分田到户后各家都养了牲畜，牛、羊、马多了，各家都有了不同改善。我们拿着摄象机录下了不少，又给村民照了几卷胶卷，已经成了永久纪念。

回到万忠家摆了四五桌，当年的老书记没在家，现任的书记、村长都来了，炕上、地上、院子里站着坐着都是人。大家畅谈当年友谊趣事，叙说这些年的变化；也探讨了借助京北草原开发村子的发展，对现任干部的希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村民纷纷和我们碰杯已经有些多，还是千杯少，说不完的话喝不尽的情。兴致头上我把秋成、宝成四个知青当年因为邻居的猪偷吃我们莜麦误伤后，晚上给我们送猪肉的事给通出来，20多年的事大家兴奋不已；闹的他们俩偷偷跑到邻居家放了200元钱。白酒啤酒喝了不少，从中午喝到晚上6点多还有说不完的话，终究没有不散的席，我们要走了，大家恋恋不舍送到村口。

回来的时候，想起村民还是那么豪爽热情，看到全村没变样的土房，由于沙化村中大水泡子没了，吃水都很困难的情况；心情沉重从未动情的我痛苦的哭了。回到丰宁我们久久不能入睡，谈起当年我们村是坝上地区有名的富村，一天给15个工分，每10个工分合一块多钱，村里从来没亏待过我们；我们一定为家乡办点实事。当年宝成代课的小学已经破烂不堪，一定找找扶贫办；打井找找水利部门；大滩镇里已经办了度假村孤山子也要办；张勤是独生子现在有病，两个70岁老人生活艰苦，困难户一定想办法救济救济；一定让更多知青了解家乡（这促成了1995年6.29集体回乡），大家共同努力。孤山子村一定能行，我们的家乡一定回好起来。

回家乡(重绿碑轶事）

去年春天正直京津沙尘暴之时，一天秋成把我和宝成、宝田找到一块，说去年单位美化仓库建假山，剩下一块重八吨的“太湖石”，好象个宝葫芦，想以孤山子知青的名义立在咱们村口，刻几个字“保护自然”“重视环境”警示后人，也给咱们村办件事，大家一听很高兴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他参加知青文集“归忆青春”首发式，有的老知青听说这件事认为很有意义，就参加进来，并决定起名为“重绿碑”。记得有一次碰到著名木版画家老知青滕雨峰，侃侃而谈“着肯定是义举，功在千秋，...”并表示“要钱出钱，要力出力，不管多忙随叫随到”代表了当时每一个知青碑友的心声。

本来工作很顺利，由于人多了，又要刻碑记就必须再找一块石头。我说弄块花岗岩好刻字，秋成说不行，非要找一块自然形成的石头。这样几个休息日没干别的，好几个人跑了承德市郊几坐山，马家庄、双峰寺、牛圈子沟，最后在阎营子梁看中了一块两吨重的石头，当地人叫“马牙子石”。好容易拉回来，找了几个石匠拿着合金头钢凿一试验，凿子坏了说刻不了，后来国权总算找来两个石匠说行。石头就放在电力三产仓库，他们书记刘奎一天去视察工作，也是围场下乡知青，就过去看看，提提意见，不巧崩眼睛一块铁

壳，赶快送医院后转北京同人医院，总算保住了眼睛，但几个月下来视力所剩无几，损失惨重。虽然是工伤，但我们在人家仓库干活出了事，当时压力太大了。石头刻完字一看不行，真是雪上加霜。

石头需要重新处理，刻字的不会用电动工具，有电动工具的不会处理这样大的石头，跑遍大小石才厂都没办法。事赶到一块，还的快点弄完，大伙一商量自己干。凭着一股真诚，凭着当年知青没有学不会办不成事的精神，说干就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吧。我和宝成是主力，宝田、国权、秋成当小工，买来了切割机，打磨机，宝田从承钢借来了三项电的砂轮机，真是“摸着石头过河”，每天叮、叮、咚，沙、沙、沙的开始了切割打磨工作。那几天正赶上承德历史最高温那几天（40多度），头一天就把我们晒坏了，大腿、肩膀火寥寥的不敢碰，第二天我赶快买了“小护士防晒霜”。石头太硬了，每个现场干活的同志都崩有伤，因为有了前车之鉴，虽然大家都戴着眼镜，秋成脸上还是崩出了血，实在太没水准。前后用了六块大砂轮，十多把钢钎，二十多片金刚石切磨片。就这样通过我们知青自己的手，硬是把比“花岗岩”还硬的“马牙子石”磨下去十多公分，打磨出一平方米的面。完工后，我带着宝成、国权去“康乐园”洗了一次药浴、冲浪浴，由于宝成伤重，萨拿浴、按摩搓澡全免，钱可花了。后来碑友们还说：小护士陪着干活，小姐（婷婷、玲玲、杰洁）陪着喝酒，老婆陪着上坝也算高级三陪了。

后来碑友中的文人仇承轩，秦 彪亲自为重绿碑提字描漆。宝田带着老婆（也是知青）开着摩托上坝，亲自监工“重绿碑”基坐建设也非常辛苦。“重绿碑”终于完成了。7月15日早上在鞭炮声中秋成带着先遣队出发，由于承德至丰宁修路汽车绕道北京，由怀柔进入丰宁，我们驾车跟随十吨大柴爬行在燕山山脉，由于太重中途换了一次轮胎。下午五点半终于到达“京北草原度假村”口，也是当年我们下乡的坝头，在董云峰、扬宝田、张国权、仇承轩和我多人不算太乱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多小时努力终于把两块碑石稳稳的安放在基坐上。7月22日10时举行了重绿碑落成仪式，县、镇领导发了言，我们村(距离坝头20多里路）乡亲也骑马跑来参加了仪式。期间“重绿碑”友及孩子们共同揭开了“重绿碑”鲜红的盖头，在蓝天白云绿色大地上分外鲜艳。老知青于文龙带领当年知青重绿碑友高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飘荡在田野上空。

以后我又几次到了坝上，看到游人争着在此留影，探索“重绿碑”的内容时我心中也其乐熔融；看到“重绿碑”熔于大自然的美丽身影，屹立在塞寒坝风口中，仿佛继续叮、叮、咚，沙、沙、沙的刻凿着我们的心声。“重绿碑”将永远竖立在我们生活过的地方，向人们诉说我们的过去、诉说我们的思想；“重绿碑”将永远表达当年知青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祈望！

重绿碑是承德知青2000年做的一件事，承德知青网有相关报道(cdzhiqing.com).

回家乡(寻梦6.29集体回乡）

第一次回乡后，我们同一起插队的知青讲了，大家非常有兴趣，当提议组织一次集体回乡大家一拍即合，定在1995年夏天。因为知青回城后这些年，大多数人忙于事业，娶妻、生子创建家庭，等种种情况没有再回过这个家乡，那段历史只能时常环绕在梦中。随着年龄步入中年，反乡思乡的心愿与日俱增，虽然个别回去过，但大多数知青没有条件，大家更愿意结伴而行。为了顺利回乡，我们找到当年在几个公社当过书记，现任承德黄金宾馆经理的董有财（我们同乡同龄的老大哥，爱人也是知青，）得到非常热情的支持，他当即联系了坝上地区领导，5月初公社书记亲自带队赴承德共同商量决定了6月29日的上坝日期，并以大滩镇的名义向知青发出了邀请函。承德知青奔走相告，原个学校知青纷纷聚会购买礼品，小城的知青沸腾了。经过大家商意决定以秋成为总负责，有才负责联系协调，魏建华负责宣传采访，以原学校和下乡地为基础，宝成负责铁中大滩、孤山子村，付铭瑞负责民中老羊圈、扎勒营村，董云峰负责狮子沟中学北梁公社，三佟负责营子地区骆驼沟公社，又连续开了预备会，报名预计近300人，根据情况最后锁定200人，安排锁定大小汽车24辆，营子地区提前一天到承德。每一组都安排了大哥大、bb机、对讲机，并做了应急准备。承德知青多年梦想就要实现了。

6月29日终于到来了，凌晨四点多钟，近200名知青准时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承德大桥头；承德知青第一次聚集这么多人，甚至有的同志一起下乡，回城后2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面。一声出发命令，在一面雪白的访问团旗的引导下，20多辆车簇拥着踏上了回乡之路。虽然没有人欢送，但比27年前任何一次下乡时的车队都要长。在汽车上大家回忆述说着当年友谊、生活和不寻常的经历，更多第一次回乡的知青都抱着忐忑的心理；家乡还是那么贫困？当年知青房子还在吗？老房东、老队长、伙伴们怎么样了？曾闹过不少坏事的“笑天”，更是笑着说“可别把我撵回来”。但是大家更多是激动兴奋，不时唱起当年的歌曲。

我是领头车，到丰宁县我先走了。车上坐着当地老乡、也有来过坝上的老知青，可车到了九龙松走岔了路，向左直奔赤城（张家口地区），当我起疑心时，身上带的大哥大、bp机、对讲机全部失灵，大家还争论着跑了20多里才往回返，可汽又可笑成为大家的笑料。等我们跑到大滩镇，欢迎会已经开了一半。

到处是欢迎知青回乡探亲的标语，彩旗猎猎，格外亲切。欢迎会安排在渡假村，会场上正表演节目，载歌载舞，镇领导和乡亲代表发言，但一切已经表达了故乡人民对老知青深切的情意。小学生又手捧“干支梅”和一包家乡的泥土，送到每一位回乡探亲的老知青手中，更深深的感动了我们，我们不会忘记曾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曾留下我们青春汗水的土地。秋成代表知青发言，字字句句代表了知青的心声，当时犹然使我想起列宁的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感激之情，秋成代表回乡知青把写着“养育之恩，永志不忘”的横匾和回乡知青签名的“知青回乡团旗”送给大滩镇，并为大滩中学送上第一笔六千元捐款。

会议刚刚结束，各村的乡亲们就迫不及待的跑进知青队伍，拉起他们的手，询问、热泪、情感交织在一起。因此准备给知青安排好的蒙古包只能饭后再分配了。20年后，老知青们第一次又吃到了地道的攸面窝子、攸面渔子、手扒羊肉。到了傍晚，已经有个别知青被老乡拉回自己的村子，剩下的老知青生起冲天的篝火，在这片当年留下青春年华，留下辛勤汗水的土地上载歌载舞。第二天分头

回各村活动，探亲访友，赠送礼品。我们铁中老知青，分别给孤山子村小学、大滩小学送去了收录机、书籍、书包、文具盒等物品。董云峰、魏建华还领着记者拜访了当年下乡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两名老知青，原狮子沟中学的李志杰现在生活很好家庭年纯收入万余元，科学种田很有成绩，真是大有作为。老知青大多数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返程，至此承德知青最大的一次回乡探亲活动一切按计划顺利完成。

这次活动电台、报纸都进行了报道，电视台也以“寻梦”为题在丰宁电视台、承德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做了连续报道。确实这次回乡探亲圆了老知青多年的梦，我们又看到淳朴的乡亲，看到了当年住的土房，当年田园、草地，看到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发展（尤其是大滩渡假村的开发）；我们也看到坝上农村还很贫困，大多数乡亲还很贫穷。这增强了我们为家乡办点实事的信念。大家相约3年后再次回乡，虽然没能集体成行，但各村、各学校的老知青又多次回乡，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家乡的挚爱。

2001年6月06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那一片遥远的土地

——献给曾在西里村生活过的知青朋友

难忘的地方－难忘的朋友－难忘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西里村，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土地。二十多年的岁月让她离我很远，二十多年的思念又让她离我很近。

一九九八年的金秋时节，我从德州的一个小镇专程飞到旧金山观看了一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大型文艺演出“难忘春秋三十年”后，一直无法平息起伏的心潮。于是就从达拉斯出发，远渡重洋，飞越崇山峻岭，回到了我曾经度过了三年知青生涯的西里村。整整二十年未到过这里，西里村有了很大的变化。

村里盖起了一座座漂亮的新房，几乎家家都装上了电话。只是当年最气派，最引入注目的青年队大院却因久无人烟，呈现出一片衰败。这种强烈的反差深深击中了我。不知那往日的喧闹和今天的凋零各自分别代表了什么，也不知它们又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我又一次走过了那些留下了记忆的地方，我提笔写下了留在那里的故事。这都是些平平凡凡的故事。每一个平凡的故事里都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特立独行的灵魂。每一个生命都不应被岁月遗忘，每一个灵魂都不应被历史忽略。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我这些平凡的故事。不知道你会不会记住这些故事发生的地方。只希望有一天你偶然碰到了我故事里的知青伙伴时，能对他们说一声：噢，我知道你，我读到过你的故事。

大 院 春 秋

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往事随风逝去……

照片上这个长满野草荒芜一片的院子，曾经是木楼五个青年队中最气派的大院，乍看上去，颇有北京大四合院的风范，只是更大些而已。当年的院子中间还经常停着队里的东方红拖拉机，显得生气勃勃。我高中毕业下乡前，曾和几个同学到木楼考察，试图选一个好一点的青年队。一来到西里，马上就被院中的拖拉机以及当时是整整齐齐的大院吸引住了。二话没说，回学校就在志愿书上填了西里。那曾想到了西里才知道，这是全公社最落后的一个青年队，不过好在还有个拖拉机作安慰。一年后，当我成了队里的女拖拉机手和车长，几度下决心要改变西里的落后面貌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甜酸苦辣。然而我从未后悔过选择了西里，也从未后悔过我在这里度过的一段知青生涯。

____井台其实故事多____照片前方这排房子，我们下乡时并没有。那里原有一排排的钻天白杨和院里唯一的水井。沁阳水浅，挖开地皮一米多深就能见水。所谓水井，也就是一个深点的坑加上砖砌的井沿而已。井在男生宿舍前面，而男生宿舍离厕所较远，所以大家都觉得井水不太干净，尽管掏了很多次井，吃的水仍要从村里的吃水井挑来。

井水冬暖夏凉，女生们常在井边洗头洗衣服。这时，男生们就会过来帮着从井里往外提水，然后顺手递件衣服给女生让帮着洗洗。慢慢的这种随机帮忙逐渐演变成了固定的互助。谁帮谁打水，谁帮谁洗衣服都有了一定之规，颇有点一帮一，一对红的味道，并由此衍生出许多故事。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我在西里的三年里，几乎从来没有帮任何一个男生洗过衣服。因为当时我特别讨厌洗衣服洗碗这种事情，宁愿从井里往外提水。所以我经常和同宿舍的女生合作，和她们一起洗衣服。只是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井台洗衣服时，一个刚刚摔坏手的男生端着衣服走过来洗，我看看井边没有其他女生，又无法逃走，只好硬着头皮向这个男生伸出援手，帮他把衣服洗了。记得那件衣服下水后又厚又硬，非常难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院里原来还有另一口井在大门附近，那是一个真正的深水坑。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突然从井边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大家跑出来找了半天，才发现队里最胖的女知青奎娥正在那深水坑里挣扎，真不知她是怎么进去的。大家

忍着笑好不容易把她弄了出来，后来就把这口井给填了。

____**哪些才是“玉米棒”**____秋天时院子里总是堆满了各种各样收获来的果实，其中最多的是挂满墙上和树上的一串串金黄的玉米穗。等到玉米干透后，劳动一天后的知青们又多了一件事：剥玉米。于是晚饭后大家围成一圈，中间堆着待剥的玉米，随着剥出来的玉米越来越多，圈子越来越小，什么时候剥完了，大家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剥玉米一般是用已剥去了玉米粒的玉米芯在另一个玉米上搓，开始时大家总是兴致勃勃，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然而时间一长，一天的劳累悄悄袭来，说笑声渐渐低沉，个个变得昏昏欲睡。

一天晚上，正当大家似睡非睡，仍机械地向最后一点玉米进攻时，突然听到“老头”余龙智的一声大叫“我的脚！”所有的人都睁开了眼睛望着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老头”的脚在月光下看上去和玉米棒差不多，不知谁睡眼朦胧抓起来就使劲搓了几把。给“老头”一搅和，大家的瞌睡全没了，剩下的一点玉米也就很快剥完了。

____**谁是西里“球星”**____大院中间有一个篮球场，照片上那个破损的篮球架还依稀可见当年的风光。晚饭时分，往往是球场上最热闹的地方。爱打球和会打球的男生在球场上龙腾虎跃，女生们则端着饭碗坐在场外，一边吃饭一边指指点点。每逢这时，球打得好的男生就会格外卖劲，从而赢来场外一片喝采声和闪烁的目光，这让不会打球的男生颇觉得英雄气短。记得球打得最好的是二李，李海清和李亚军；二流水平的好象有阎保成，孙宏庆，任怀庆，张二元等。球打得好的人可以时不时地到公社篮球队集训，即有好伙食又不用下地干活，让不会打球的男生很是羡慕不已。女生中会打球的人不多，印象中也就果齐鸣和我能投个篮或跑个三步什么的，其他人似乎连球都拿不稳。

我比较爱好的运动是用网把双方人马隔开的运动，象排球和乒乓球，后来又添了个网球。据其他女生评论在这几项球类里我能算是男子组的中上水平，有些男生为此很不服气。不过大家还是承认，我和阎保成组成的乒乓球双打在西里几乎是所向无敌。保成罹患癌症已经去世，我也就再没有机会和他一起“重铸辉煌” 了。

____**他们依然很年轻**____篮球场东边的草地上，印象中还有一些单杠双杠以及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一天傍晚，大家被院中的阵阵嘈杂声和口号声惊动，纷纷跑了出来。只见院子里有七个男生排成一行，高举着拳头，新剃的光头正热腾腾的冒着气，嘴里还阵阵有词地念着什么。原来哥儿几个正在进行剃头宣誓，誓言内容大致为：为了将来能更好得完成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任，从现在起，他们要坚持早上锻炼身体，决不再睡懒觉。最后以一段节奏激昂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作为结束。看着“七兄弟”严肃的模样，我们几个女生强忍着没敢笑出声，有人不小心“嗤”了一声，也被旁人愤怒的目光吓得咽回去了后面的声音。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七兄弟”不知上哪儿跑了一圈儿回来，然后就在单双杠上腾飞翻滚起来，七个汗水淋淋的青皮光头在阳光下上下飞舞，烁烁闪光，煞是好看。这一动人的景色持续了两三天，晨练的队伍便销声匿迹

了。球场边的青草也越长越高，萋萋野草最后把那些单杠双杠都淹没了，只剩下不知谁的破袜子依然搭在上面隐约可见。这几个男生当时住在同一宿舍，记得有李亚军，阎伶俐，阎保成，任胜利，段建成，张勇和魏茂林。正当他们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一次几乎把他们送入死神怀抱的“煤气中毒”让他们再也无法坚持剃头时的“宣言”。“小孬”段建成还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终因无钱医治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七兄弟”如今只剩下五人了。

当我用平淡的口气谈论我那些早逝的知青伙伴时，我其实心里很难过，我常常会看到朋友们笑着向我走来，依然是那样年轻，依然是那样充满活力。

____人人都有一首歌____虽然是下乡，但由于是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同学同在一个青年队，感觉上和仍在学校差别并不大。只是同学变成了同伴，上课变成了上工，下课后各自回家变成了收工后一起回大院。原来是好朋友的仍是好朋友；原来不熟悉的，在这里变得熟悉；原来就熟悉的，在这里变得更熟悉。既然是年轻人在一起，文娱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吹吹弹弹，拉拉唱唱。当时院子里最流行的乐器是口琴，几乎人手一个。我就是那时学会了吹口琴，开始吹一些象“北风吹”、“东方红”一类简单的曲子，后来就可以熟练地吹出一些较复杂的曲子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是很多人的口琴练习曲。只要每首新歌一出来，马上就会有人找来歌词和歌谱。如是好听的歌，院子里就会听到处有人哼唱。豫剧《朝阳沟》中有很多知青们喜欢的段子，记得队里有个傻小子一天到晚扯着嗓子唱“我的心比那冰棍还凉”，据说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可到了我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一首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我和几个女生常常聚在一起轻声唱她。每次唱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时，心中总会涌起一阵冲动，很希望自己也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象刘胡兰、卓娅和古丽娅一样表现一下自己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记得李亚军最爱唱的一首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还有一个和这首歌有关的故事。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哼这首歌的第二段，当他唱道“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时，坐在他边上的一个青年女子瞪了他一眼。他又接着唱道“悄悄望着我不声响”，那女子气得拂袖而去。亚军爱侃，这故事当时我们听着也就是半信半疑。我那时特别相信报纸上的话，曾犹犹豫豫地问过他这首歌是不是批判歌曲。他对我不屑一顾地嗤了一下鼻子，说了一句粗话，大意是说我小学生一个啥也不懂。

“老头”余龙智最拿手的是样板戏，八个样板戏背得滚瓜烂熟，每一出都能从头唱到尾，饰演各种角色且不用看稿子。“老头”特沉醉于这种表演艺术，逮着个人三句话一投机他就会唱起来。可惜的是嗓子不太好，刚听时还有点新鲜感，时间一长就有点受折磨的感觉。后来一发现他有表演的欲望，就连忙找个借口溜掉，实在不行也只好闭着眼睛受一会儿罪。有一次公社开知青代表大会，代表们发完言后主持会议的公社李书记让大伙儿出个节目娱乐一下，东里青年队的一个代表就建议让余龙智唱一段样板戏。我们西里的代表赶紧向他呲牙咧嘴使眼色，不过已来

不及了。“老头”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台，可逮着一个好机会！这家伙把他最心爱的《杜鹃山》从“家住安源”开始唱起，一会儿是“柯湘”一会儿又是“雷刚”大有不过把瘾决不下台之势。后来其他几个青年队的代表也看出苗头不对，趁他换气间歇时一起使劲鼓起掌来，希望他就此打住我们好散会。谁知“老头”越发兴起，掌声一停，他深吸了两口气说了声：“还有”，接着又唱了起来，真让大家哭笑不得。那天为听“老头”的《杜鹃山》，我们差点儿连公社的会餐都没赶上。没办法，推广样板戏的积极性还是要鼓励的嘛。

____**你是否还记得**____逢年过节，知青们还会排练一些节目，大院就成了排练场。记得一年公社汇演，我们一心想拿上个名次，很卖力地排练了一台节目，希望公社汇演完能参加县里的汇演。节目里有三句半，大意是批林批孔的；有口琴合奏、样板戏清唱等，最后是一个压轴节目，即大型表演唱。结果到底还是被东里青年队的节目给比了下去。东里有个张兰琴，读书时就颇有节目编导才能，我们也只好甘拜下风，破灭了进城的梦。当时表演唱所选的歌名我已不记得，好像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歌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首歌：

“塞北的狂风，吹硬了我们的筋骨；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 膀；我们的一生，要写下新时代的春秋；我们的奋斗，让世界改变了模 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五七道路多么宽广。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在 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为了表现这首歌的意境，我们曾绞尽脑汁地为其设计表演动作。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动作是唱第一句时，要挺直腰并把胳膊举在眼睛前，作出狂风再大也不怕的姿势。现在想想，很觉得幼稚可笑又可爱。当年唱这首歌时，颇有点荡气回肠，壮士断腕的感觉。现在唱起它，仍觉得很亲切。不知道我的知青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它？

____**无言的“朋友”**____院子的最东北角，是队里的牲口棚，有时我们也叫它马房。队里的几头牛和一匹从部队退役下来的马都放在这里喂养。晚上时分，棚内的灯光和牲口有节奏的咀嚼声会把知青们带到这里聚在一起聊天。马是一匹战马，干活不怎么样，却是很多男生的心爱之物，他们喜欢骑在马背上奔跑在田间小道上，一过驰骋疆场之瘾。一天下午，这马风驰电掣般地冲进了院门，没等大家看清楚怎么回事，它已经冲进了马房。再仔细一看，只见贺水平在门框上吊着。原来贺水平正在和战马练习骑马钻马肚和捡牛粪等高等骑术，忽然听到附近驻地部队的一阵军号声，这马大概以为是集合或吃饭之类的召唤，顾不得背上末流骑手惊慌的叫喊，扬起四蹄迅速奔回了“营房”，军令如山倒吗。若不是贺水平急中生智伸手抓住了门框，他今天也当不了焦作市“亿万大饭店”的副总裁了。

棚里还有几头耕牛，春种夏收样样离不了它们。牛不仅干活任劳任怨，还是有感情的动物。记得有一次一头牛得了“牛瘟”，无奈之中只好找人把它杀掉，当这头牛中刀倒下时，我们都看到旁边牛的眼睛中也流出了眼泪。这让平时满不在乎的男生们也心软起来，赶快找来毛巾把它们的眼睛蒙住。从此之后，我对这些不会说话的生命就有了一份尊重。说起牛，西里知青个个都忘不了一头金黄色的老犍牛。它力气很大，脾气又很温顺，每逢找不到男生

帮我们推车发动拖拉机时，这头牛就成了我们最好的帮手。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趣事。我和燕琴成了青年队的拖拉机手之后，队里的几个男生很有些“酸葡萄”情结，经常讽刺我们的拖拉机是“推拉机”，要人推牛拉才能发动。不如卖了多买几头牛，大家驾着牛车一起走社会主义阳关道。我那时爱车如命，虽明知这些话不能当真，还是一听就炸。男生人多嘴杂，吵来吵去我总是处在下风，恼羞成怒之余，只好拿出杀手锏，让“牛哥儿们”从此别坐我们的“推拉机”。过了几天，我在我的桌子上看到一篇署名“赶牛车的人”的短文。文中写到：

关于“牛车好还是拖拉机好”的问题，说起来也没什么好争的。不过看着神气十足的“车长”气得要哭，倒让我们暗自窃喜。你想你是队里的拖拉机手，酷爱你的“铁牛”，我们没有那个福分，难道就不能让我们“酷爱”一下憨厚老牛拉的车吗？其实牛车的好处你没有体验过，你也就没有那种赶牛的快乐感，给你讲一个老牛的故事，希望你也加入“牛车好”的队伍。

茂林和我常常赶着我们的老犍牛到三十里外的西万乡给队里换面，一路上要爬坡、过河、穿过城区。说来有趣，我们的这头牛有一个特点，回家的路记得特别清楚，一路上不管拐了多少弯，走过多少叉路口，它总是能按原路返回。它不但认路，而且还会躲避。走在路上，不管是前面有车或者是后边有车，只要喇叭一响，它就会自行将车拉到路边行走，如果遇到大车或者是其它车辆离我们的车太近而比较危险的话，它还会靠边停下来，等别的车过后再走。所以，每次回归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上车便倒头就睡或者尽情地胡吹神侃，从来不管路怎么走或者走到什么地方，任由老牛把我们拉回家。许多次都到家了我们还不知道，直到别人把我们叫醒，爬起来一看，老牛已把车安全地拉到牛屋门口。

咱们这头老犍牛还有一个秘密。在它的尾巴上方有一个穴位，只要用手按着这个穴位，老牛就会快跑起来，跑起来的速度绝不比咱们青年队那匹退役“战马”差。而且只要你不松手，即使它已累得口吐白沫，也会一直不停地跑下去，颇有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只是我 们很心疼这头牛，很少动用这个秘密武器。

怎么样，“牛车”不比“铁牛”差吧？最起码有你享受不到那种轻松，你有的只是瞪大双眼、凝视前方，随时随地去处理险情的危机感。下次你的“铁牛”消极怠工时，欢迎你来乘坐我们可爱的“牛车”。

看了这篇短文，我虽然没有投降到“牛车好”一边，倒也没再坚持原来的禁令。

____**悠悠岁月说当年**____二十多年后，当我又一次来到这个大院时，我第一个想看的地方其实是当年我们亲手建立的一个小图书室，但我又很怕写它，怕写得不好破坏了它留给我的一份美好。图书室是位于大院最西北角的一间小房子，和队里的伙房成直角相邻，看上去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我曾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了我大学时代，撰写了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我曾到过亚洲之最的北京图书馆，在期间流连忘返；我也曾在斯坦福大学的迈耶图书馆和胡佛图书馆内，惊叹其藏书之丰富以及计算机查询系统之完善。然而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能忘怀的

却是西里青年队这个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小小图书室，是在那里点着油灯读书的日子。

我们的图书室很简陋，墙上挂着木制的报夹，夹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书架是由木板、砖头和窗格拼凑成的，上面堆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床板和长凳支成了读书桌，桌子四周放着长短不一的凳子，记得有一条凳子只有一条腿，还要靠在另外的凳子上才站得住。图书室的书不算多，找到本好书大家还得排队轮着看。尽管如此，这个小小的房间却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块绿地，它给我和朋友们在西里村的知青生活带来了一抹春色。每天开饭时及收工后，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年轻的歌声和笑声带走了一天的疲劳，也冲淡了对前途对未来的惆怅。读书看报的乐趣，填补了不少空虚的日子，同时带给了我们星星点点的希望。最令我们得意的是，这个小小的图书室还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农民和其它大队的知青，让我们这个几乎处处落后的青年队总算有一点光彩耀人之处。

图书室是当时青年队队委兼保管秦勇的杰作，他一直对此津津乐道，引以为豪，也让队里的其他知青和带队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说起这事儿，我还真有点不服气。本来吗，我是大家公认的书迷，就连在我们大院驻过的解放军某部干部战士都知道西里青年队的“车长”最喜欢看书，岗哨交接班的记录上我们宿舍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的。那时我每次出车路过公社和县城时都要到新华书店去租几本书看。记得一本书一天要一分钱，但由于我把书拿回来后，其他伙伴们也想看，所以一本书要在院子里转上一个月才能拿去还掉，租金就成了三毛钱了。要知道，队里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才一毛钱，看书却消耗掉了我的大部分工分。图书室建好后，县知青办为了表示支持，不禁捐赠了很多书给我们，还让公社和县里的新华书店免费向我们借书。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当秦勇告诉我他的想法时，我心中很有点沮丧，白白花了那么多冤枉钱，还把一个出风头的机会让给了这个小保管。不过想到有了图书室可以免费看到很多书，拨了一下小算盘，我也就没和他计较这个荣誉该归谁的问题，还是高高兴兴地利用职务之便帮着他拉东西、找书、布置房间、跑知青办，忙得不亦乐乎，只是从此再也没有从“门缝里”看过他了。这小保管倒也通情达理，有了什么好书总能记得先给我留着，让我省去不少排队等书看的烦恼。

青年队的院子现在变了很多，图书室的那排房子已找不到，不知是被拆了还是划到了院外。我站在可能是当年图书室的地方，一首《往事随风》的曲子在我心里久久地回响着。往事如烟，如烟的往事。看着眼前残旧的房子，仿佛还能听到有人在喊：今天轮到我看这本书了。不知我那些当年争书看的朋友，现在是否已拥有了自由的空间去读自己想读的书？不知我热爱的这块国土上是否从此不会再有任何一片文化沙漠？

____祝愿人人都平安____在将结束这篇关于青年队大院的故事时，我突然想起了这里发生过的一件最悲惨的事，那就是拖拉机手王永的葬礼。王永因驾驶事故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这个大院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他把青春和生命都留在了西里，他就埋葬在木楼的土地上。出事的当天，他刚刚和东里的一个姑娘定了亲，怀着满心喜悦登上了驾驶座；出事的前一天，他还对我说要和我谈谈青年队的工作。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拖拉机手，一个普普通通的西里知青，但他却是他年迈父亲唯一的儿子。至今我都还能看到那天满目的白花和满目的黑纱，能听到满院子凄凄惨惨的哭声。每逢此时，我都想祝愿人人能一生平安。

女生宿舍

不管知青生活是苦是甜，留下的都是难忘的回忆……

下乡的第一天，队里的老知青就把我们女生迎进了照片上的这排房子。当时房子刚刚盖好，屋内还散发着石灰的味道。这排房子当时中间没有隔开，全队二十多个女生都住在这间大房子里，一张床挨着一张床，床前放着个人的箱子。我因为当时还带了很多数理化和文学的书，又没桌子，只好把这些书堆在我的木箱上，拿起东西来很是麻烦。晚上只要有一人做恶梦，全体女生都会惊醒，关心地跑过去问怎么了。女知青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积极分子

刚下乡时正赶上抢种棉花，每天都要拼命地挑水，生怕误了季节，累得晚上自然是睡不安稳。一天早上醒来时，睡在我旁边的沁阳老知青任万琴告诉我，半夜我在梦里拼命地喊换大桶。从此万琴认为我是真心热爱劳动，连做梦都要用大桶挑水。种完棉花正好碰上推选县知青积极分子代表，万琴极力推选了我，我就糊里糊涂成了一个说梦话说出来的积极分子，进县城参加了代表大会。会上推选新乡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时，原本推荐的是一个似乎货真价实的积极分子，我仅是个候补的，没想到真家伙临时不知有什么事不能去，我又糊里糊涂地变成了地区的代表去新乡市参加了地区大会。从此之后为了对得起这“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只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拼命的干活，也就经常光顾各种代表大会，什么妇女代表大会，共青团代表大会等。开会有一个很实际的好处，就是每次都可以领一些奖品，有时是一个写着纪念字样的茶缸，有时是一条毛巾。最令我高兴的是有一次发了一套厚厚的小说，名为《征途》，是一本描写中苏边境知青生活的书，非常好看，让我整整一个月都兴奋不已，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有一次会实在开不过来，就让一个更糊涂的家伙到地区参加了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去之前还用奖品对其物资刺激了一通，其实心中颇为这次不能领到奖品有点懊恼。过了几天，开会的家伙哼哧哼哧扛了一把大大的铁锹回到了青年队，一问之下才知道这年开会提倡新事物，奖品便成了这把大铁锹，还是由地区领导亲自颁发鼓励代表们

扎根农村挖地不止的。光荣是光荣，就是太沉了点。这家伙气急败坏地说：“我这还得把它从地区给扛回来。”我一听赶快逃回了宿舍，关上门大乐了一通，很是庆幸。地区离西里足足有一百多公里，要坐火车，乘汽车，徒步十多里，再扛上把大铁锹……

儒法之争

下乡那年正时兴评法批儒，干完活吃完晚饭点上油灯，带队老农王月兰领着我们二十多个女生就在这个大宿舍里练习着把《水浒》里的一百单八将往儒家法家里排队。排着排着就七嘴八舌地吵了起来，有人说宋江是法家，有人说宋江是儒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闹明白，按定义宋江到底应该是法家还是儒家？

那时儒法之争有点走火入魔，干件事情总要弄清楚是法是儒才行。记得当时女生们政治学习时争论最多的是上山下乡和儒法的关系。大家一致同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定是属于法家，只是招工招干及征兵等应排在哪里实在让人困惑。说是儒家吧，每年都是政府搞的，还要挑选各方面都好的知青；说是法家吧，那大家都是法家，谁的“法”大点呢？要是大家的“法”一样大，谁还愿意上山下乡呢？

这个问题可让女生们绞尽了脑汁，吵来吵去吵成了一锅粥。眼看着各持己见，争不出个答案，大家就推举我作代表给焦作二中的政治课靳老师写了封信，让专家来论个公道。大家都知道读书时靳老师对我不错，一次政治考试不仅给了我一百分，而且把我的答卷贴在二中校园门口，让我很是出了阵风头。所以估计由我 执笔靳老师怎么着也得给回封信。

果然过了一些日子，靳老师的回信就来了，大家围着我等看答案。我把那封信从头看到尾，又从后面往前看，就是看不明白靳老师的观点，到底知青下乡和招工招干征兵是法是儒，法大法小，信上也是含糊不清，只是鼓励我们更加努力的看书学习，进一步深入开展评法批儒。看来这还真是个不好解决的是非问题。不过，靳老师信上的其他话让我们这群黄毛丫头欢呼雀跃颇为得意了好一阵，倒把个儒法之争忘到了脑后。靳老师告诉我们，他在全校教工大会上念了我们的信，全体教师深深地为我们对政治学习的认真态度所感动，校领导还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向西里青年队的女知青们学习。

倒栽杨柳

这个宿舍门前原来有一条用煤渣铺成的路，隔着路是一条半尺多深的沟，女生们可以把洗脸和洗脚水倒在里面，以免泥泞了道路。沟里常常湿润着，沟边就成了种树的地方。春天一到，女生们就在沟边挖坑种上易栽易长的树，让绿色的生命点缀一下我们宿舍门前，也点缀一下青年队大院。当时的主要树种是白杨，这种树长得很快，一年过去就能砍下来用于盖房子了。我从小就喜欢种树，不是因为有什么环保观念，只是喜欢那种小树长大的感觉。所有易栽易长的树中，我最喜欢柳树，因为我小时候住过的焦作一中家属院里有一颗大柳树在洗衣服的水管旁，给

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春天时把嫩嫩的柳条皮剥下来，可以做成清脆的柳哨，软软的柳枝可以编成花环带在头上和脖子上。所有的柳树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垂柳，柔柔的柳枝弯下来垂到地上，给人一种很美的感觉。

下乡第一年时我一心想种一棵垂柳，不幸的是跑遍全村也未找到一棵合适的柳树，见到的只是树枝直直向上的那种。后来想起垂柳的另一个名字是“倒插柳”，突然异想天开，找人从一棵大柳树上砍下了一根枝条，然后在沟边挖好坑，浇上水，把柳枝头下脚上地栽了进去。埋好土后，这棵“树”看上去有点古怪，但我想象着等树长大以后，弯弯的柳枝垂到地上，我就可以坐在树下看书，觉得非常心满意足。第二天收工后，我看到带队干部老王和一个老农（好像是老丁）正对着我那头重脚轻的“倒插柳”指指点点，旁边还有几个男生在窃窃私语。见我过来老王就问我在出什么洋相弄了这么个怪物，我赶忙解释垂柳的好处以及垂柳和柳枝倒栽的关系。没等我说完，旁边的人就大笑起来，只有老王板着脸说简直是胡闹，没听说过这么种树的，说着就让一男生把“倒插柳”拔了出来。我很想挺身而出，保护我的劳动果实，无奈当时刚刚下乡，正出于夹着尾巴做人的阶段，只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了。从此，我再也不知道倒栽的柳枝是否能长成垂柳，再也没想过在垂柳下看书的事了。

七六年的春天，我在粮店的墙角边看到了一棵小枣树，就兴高采烈地把它挖出来栽到了这个宿舍前的沟边。那时我已成为“老知青”，再也没人敢拔这棵树了。小枣树长得很快，也很争气，当年就结了三颗枣子。每天上工和收工时我都会去看看它们，看着一点点长大，一点点由青变红，心里非常欣喜。一天收工时，我又去看那几颗已开始变红的枣子，却突然发现它们不见了。这时有几个男生从旁走过，看着我对着枣树发呆，有一个家伙就笑嘻嘻地说他刚才从枣树下过的时候一抬头，三颗枣子就赶紧掉进了他的嘴里，砸得他牙疼。我明知他在胡说，可也无可奈何。这次重回西里，心里很希望能看到那棵已经长大的枣树，说不定还能看到满树的枣子。然而在这个宿舍门前，除了杂草和灌木外，当年的树全无踪影。想想也是，已经二十多年了，即使枣树能够长大，也早已被砍倒用于盖房子做家具了。这世上又有什么东西能是永恒的呢？

似水年华

都说三个女子一台戏，二十多个女生住在一起那个热闹劲儿就可想而知。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是不用上工的时候，这屋里就没断过笑声，尖叫声，吵闹声。其实也不是因为什么事特别好笑，特别令人惊奇，只是因为我们太年轻，太无忧无虑，青春的躯体里有太多的能量要向外迸发。

罗素云，也就是小风，嗓子很好又喜欢唱，屋里常常被她的歌声装的满满的。小风就是“田间演唱”照片里那个在最前面作表演动作的女生，她那时最爱在脖子上搭条毛巾唱豫剧《朝阳沟》里的选段。《朝阳沟》是文革前上演得一出描写回乡知青的戏，河南人男女老少都喜欢看和听。但不知为什么文革时却受了批判，照说知青回乡下乡应该是法家的才对。我下乡时在队里年纪最小，常常和果齐鸣俩人闹些恶作剧出来。早上我起得早，梳洗完毕后看到有人还没起床，就忍不住摘根毛毛草往没睡醒的人的鼻子和耳朵里捅。惊醒的懒家伙自然要追打，我就赶快朝门

外跑，所以一般也吃不了什么亏。晚上熄灯后，齐鸣和我常常用手电筒照在脸上作怪样，吓得胆小的女生直往被子里钻，半夜上厕所时仍心有余悸，于是便把我们俩揪起来陪着。我那时胆子大，半夜常被人叫醒陪上厕所（那时倒还没有人让我陪着吃饭），有时一晚上要起来五六次，天冷时就有点受罪。于是挖空心思想了一招，只要有人叫我陪上厕所，我就把所有可能的“嫌疑分子”通通揪起来，所以后来就经常有半夜集体上厕所的事情。尽管由于位子有限会出现在外面排队聊天的情形，倒也解决了我睡不好觉的问题。

韩燕丽爱讲故事也会讲故事，她身边常常会围着一小群人听她绘声绘色地讲笑话，时不时的有人抱着肚子，哎哟哎哟的倒在床上。我就是从她那儿第一次知道了那个“见了牛粪大吃一斤”的故事的。她的丈夫王杰山最初就是被她的故事和笑话吸引，进而爱上了她的，我至今还记得杰山听完燕丽的故事在厨房门口笑得流出眼泪的样子。燕丽燕琴两姐妹是从福建樟州到西里插队的，这里面还有一个伤感的故事。她俩的父亲是木楼土培村人，参加革命前由父母作主娶了亲。南下后解除了这个包办婚姻，与姐妹俩的母亲自由恋爱又结了婚。离婚后前妻坚决不离家，从本家兄弟那儿过继了一个儿子，从此侍奉公婆抚养儿子打发着清苦的日子，一直到把公婆养老送终。姐妹俩的爷爷奶奶去世时他们的父亲带着妻子和六个子女前来送丧，并拜见了这位独守了一生的前妻。同时让燕丽燕琴姐妹俩来到木楼插队，有机会可以在“大妈”那儿尽一点孝心。“大妈”对她“丈夫”，也就是前夫的女儿视同己出，姐妹俩每次去看她回来时都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带回来，有时我们也能顺便一饱口福。

每次听燕丽讲这个故事，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对她的“大妈”既有敬意又有同情，毕竟那是一个女人长长的一生呵。

楚河汉界

在我的记忆里男生很少到这个大宿舍来串门，最多也就是在门口喊个人名，找着人就走。大概是这厢人实在太多了。四十只眼睛一盯，再厚的脸皮也能把它给盯薄了。那时男生三五人分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所以女生有时就三三俩俩的去串门聊天。沁阳老知青的年纪较大，很多女生据说已名花有主，所以她们各自去找的男生基本上是固定的。焦作知青那时年纪较小，开始时串门主要是以原来读书时的班级为单位，找同班的男生们聊天，一起截车回家等，冬天时到男生宿舍的火炉上烤火打毛衣烧热水，炒玉米豆或分享从家里带来的炸酱咸菜等物，主要目的也就是凑个热闹，而有女生串门的宿舍男生也会越聚越多，个个表现的或彬彬有礼，或侃侃而谈。

我那时爱下象棋，女生中鲜有对手，个别能走两步的我就是让她们卒子当车用也可以赢个底朝天，下起来没啥意思。所以就只好常常到男生那里找对手下棋，有时在院子里，有时在男生宿舍。我下棋从不按棋谱，也不懂棋谱，走到哪儿想到哪儿，比较常用得招数是当头炮。开局时我总嫌双方的棋子儿太多，只要能占一个小卒的便宜，就要和对方拼子，这样一来就显得比较幼稚。所以对手对我就有点轻视，往往是漫不经心地一边支招，一边往他们的竹根烟袋里装那些廉价烟叶，要不就是满不在乎地和旁边的什么人聊天。没料到我在中场才开始暗下杀手，等他

们醒过神儿时己方的主帅已束手待毙。不过赖小子们爱悔棋，我的胜利喜悦也就持续不了多久。这时旁观者也会聚集过来，一面起哄一面七嘴八舌地给我递招，所以一般来说我也没什么损失，几乎所有和我交过手的人都有败过给我的记录，只是这帮家伙从来不愿在公共场合承认而已。不怎么悔棋而又不怕认输的有一个沁阳老知青，大家都叫他“糖馍”。据传“糖馍”从小就爱吃放糖的馒头，一顿没有就大哭大闹坚决抵制吃饭，所以“糖馍”这个名字就传了下来，而其真正的姓名倒很少为人所知。

除了下棋，我和果齐鸣还有朱崇立几个女生有时还会到当时队里的司务长朱光元的宿舍里去玩。光元也是沁阳知青，很是多才多艺，最特别的是他会用泥巴捏出各种活灵活现的造型，如松年鹤寿等，用玻璃框罩起来后很是精美好看，让我非常羡慕。我还曾经起意想向他拜师学艺，只是后来见到光元要把一块巴掌大的泥巴翻来覆去地揉上四五天才考虑用不用它，想到如果成了他的徒弟这苦差事一定是我的，顿时打消了学艺的念头。尽管师傅没拜成，经不住我死缠烂磨，光元还是答应有空时送我一个他的作品，记得我想要得是一只可爱的小毛驴站在葡萄架下面。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光元有没有找到时间完成这个作品？

难忘的歌

夏天或秋季的傍晚，如果晚上不用加班，女生们也会三五成群，走出这燥热的大宿舍，到田间小道或河边散步。最常见的是去队里的打麦场上乘凉聊天，那里也是男生常去的地方。麦场上高高耸立着刚刚堆起来的麦秸垛，散发着新鲜的粮食和麦杆的香味。知青们三三两两围坐在清扫得干干净净得场地上，一边让田野上的清风吹着，一边天南地北的聊着。聊天的话题总是跳来跳去，我现在已记不得都聊过什么，只记得有一次讨论过迷路时如何找北极星定位。那时大家都爱唱歌，太阳落山后天色暗淡，即使唱得不好别人也发现不了，只管大声唱就是。所以只要一人起头，麦场上就一片和声。记得那时爱唱的歌有“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荡起双浆”，“我的祖国”等，但在麦场上大家经常唱得是一首题为“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记得其中的歌词为：

月亮在白棉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其实大家并不特别介意歌曲的内容，只是在自然，原野和自己的歌声中陶醉着，胸中充满了温情和感动。那时我们真年轻！

意犹未尽

二十多年后，当我和当年一起下乡的同伴们又一次相聚时，不少人还提到了我当年种的那棵“倒插柳”，他们告诉我由于那棵树的样子实在古怪，每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拨它一下。大家都还记得那首我们常在麦场上唱的歌。

而且这次倒是有男生承认了我的象棋水平在西里青年队还是数得着的，许多人只能甘拜下风， 这让我心里平衡了不少。

大宿舍虽然热闹，但毕竟人多不大方便。下乡后的第二年，新的房子盖好后，大家就分开搬到了新的地方。我和另外四个女生也高高兴兴住进了我们的新宿舍。从此，结束了老的故事，又开始了新的故事。

西里的“河”

不管知青生活是苦是甜，留下的都是难忘的回忆……

这个“野”味十足的壕沟当年是一条用于灌溉的水渠。叫它水渠有点拗口，我们就跟着村里的社员称它为“河”。到水渠上浇地被称为“上河”，修整水渠则叫做“挑河”。那时的河看上去要秀气的多，河面约有三四米宽，比现在开阔。两边的堤坝高出平地一米多，坝上被我们修理的平平整整，河两岸杨柳青青。大家也都知道，从县城回村，见到这条河就算到了家；从村子往城里走，过了河就出了西里。如果你问起任何一个西里知青，他们都会记得这条河，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条河的故事。

榜样在身边

我不知道这条河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只知道它载着水远远地走过来，流经很多村落才赶到西里，为村里的三个生产队和我们青年队浇灌土地。青年队没有机井，庄稼有没有收成就指望这条河了。

轮到我们浇地的时候，我们就在照片上那个石桥的附近筑一道堰，堵住流向下游的水头，使我们这里河段的水位提高，然后再用柴油机把水抽到地里。筑堰一般是先在河底打上木桩，然后用装满了砂石的麻袋一层层叠起来，再用麦草和泥土把缝隙填上就算好了。我们那时没什么钱，舍不得买麻袋装沙子，就想了一个折衷的方法，找些树枝架在木桩上，然后一层层堆上麦秸杆和泥土。这样筑好的堰虽然省钱，却极不牢靠，随时都有泄漏和坍塌的可能。

有一次浇地时我和另外几个知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堰修好，河里的水也一点点涨了起来，马上就可以抽水

浇地了。谁知这时土堰却突然开始漏水，水把漏洞冲得越来越大。我们拼命往漏水处扔树枝、丢麦草、铲泥土都无济于事，眼看着这道小“水坝”就要塌方，而且马上要轮到下游的自然村浇水了。正当我们急得团团转时，张二元和韩燕琴跳进了水里，他们俩用身体挡住缺口，让我们继续往里填树枝、麦草和泥土，这才好不容易堵住了漏洞。当时还未入夏，跳进冰冷的水中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事后我曾怀着崇敬的心情问二元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哪一段语录激励了他？二元斜着眼睛，象看一个怪物似的瞅了我一会儿，转身就走了。我虽然有点失望，但还是恭恭敬敬地把这件事记到了日记上，做为对自己的鞭策。天天在报纸和广播里寻找学习榜样，没想到原来他们就在我身旁。

知识的实践

提起这条河，西里知青还真干了一件让村里社员惊讶不已的事。

青年队只有一台柴油机，偏偏在一次浇地时坏了，水在我们这里只停留两天，等修好它再浇地无论如何也不赶趟了。正当大家看着脚边流过的水束手无策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虹吸泉。一句话提醒了这群高中毕业生，大伙儿都记得理化课上老师讲过的虹吸现象，于是大家急忙加高挡水的土堰，把水位抬到高出地面，又找来碗口粗的水管，准备让水绕过堤坝流进我们的地里。

课堂上看老师用嘴一吸，水就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但这么粗的管子可怎么吸呀。后来还是贺水平和魏茂林一人端着水管的一头，把它们举得一样高，其他人就往管子里灌水。灌满后赶紧用化肥袋把两头扎住，一头放进河里，一头放进流向地里的水沟里，然后喊声“一、二、三”一起解开两头的封口。后面这个动作折腾了很久，快了慢了都不行。当水终于顺着我们的“虹吸管”流向地里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这书总算是没白读。

高兴之余，突然想起还没有欢呼胜利呢，又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地闹了一阵。喊声惊动了附近浇水的农民，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知青们会变戏法，不用抽水机也能让水流到地里”，于是就来了很多人围着看热闹。我们站在河岸上，听着周围的社员们交头接耳称赞到底是有文化好之类的话时，顿时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光辉起来，只遗憾公社领导和其他青年队的人不在场，看不到我们此时的风光。

说实在话，在西里村待了三年，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件让我觉得“大有作为”这句话还有点道理的事。记得七七年首次恢复高考时我在焦作市获得了总分第一名，我的母校焦作二中请我回去介绍经验，主题似乎是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都需要知识文化。我就兴致勃勃地讲了这个“虹吸泉”的故事，满以为至少能赚来一圈经久不息的掌声，说不定还会有人喊喊口号。谁知那些学弟学妹们听了后居然无动于衷，还不如西里村的社员能引起共鸣，让我觉得非常扫兴。

一切为了水

水是农民的命根子。

农作物从种到收要浇很多次水，小麦需要水，玉米需要水，棉花也需要水。光是一个小麦就要浇过冬水、返青水、分蘖水、拔节水、扬花水以及灌浆水等，偏偏需要浇水的时节又都落在所谓“滴雨贵如油”的春季。这样一来，争水就成了年年必定上演的节目。轮到浇水的村民见到水还没下来，就会到上游去扒堰放水，没浇完地的村子自然舍不得让水马上流走，争持不下之时，难免就要发生械斗。这种时候，有青年队的村子腰杆儿就特别硬，大家都知道知青们打起架来敢拼命，天不怕地不怕。一次上游的官庄大队没有按时把水放下来，村里的农民就跑来对男生们进行鼓动，说什么官庄人不把咱青年队放在眼里，咱们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云云。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听这话就来气，抄起锄头铁锹就往上游跑，女生们胆小怕出事，赶忙叫上带队也跟过去。好在上游村落的知青没有出马，这几个愣头青总算是毫发无损大胜而归（回来后还有人直念叨没过上瘾）。

除了打架外，知青们还是“挑河”的主力。北方农村的冬天是兴修水利之时，知青就被派去“挑河”。“挑河”要把河道疏通，把两边的堤坝修整好。其中最苦的是跳进齐大腿深的泥水里清除河底的淤泥。抛开粘乎乎的淤泥难铲难甩不说，寒冬腊月，冰水刺骨，个中滋味不说也罢。记得每次从水里出来上岸时，凛冽的北风吹来，浸过水的皮肤就会绽开一道道血口，发出一阵“叭，叭”的裂响声。那年月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轻伤不下火线”，倒也很少有人为此打退堂鼓。只是有的女生疼得偷偷地掉过泪，也有人因此得了关节炎，每逢天阴下雨，腿部就会酸痛僵硬。我也从此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听不得娇生惯养的男男女女为一点小事叫苦连天。

眼前的这条河已经千疮百孔，往日的风光不再，不知有多少年没有“挑河”了。也许现在的西里村有了更好的水利设施，也许这条“河”将和“知青”一样成为历史。

大河波浪宽

除了用于浇地之外，这条“河”还是夏秋时节知青们嬉戏玩耍的好去处。有的朋友记得在河里游过泳，有的朋友记得沿河堤跑过步，有的朋友记得坐在河边说过悄悄话。

游泳是我一项爱好，我在九岁时就参加过焦作市游泳比赛的儿童表演赛，中学时又参加过市游泳队的集训。看着男生们傻呵呵地在河里练“狗刨”，我还真有点“不屑一顾”。但这是西里唯一一处有水的地方，也只好将就着游了。只是任何优美的泳姿在这小河里看上去都与“狗刨”差别不大，让我一直心有不甘。女生中其他人会游泳的不多，只有从福建来的燕丽还能扒拉两下。然而即使不游泳，炎炎夏日里泡在树荫下的水里也是一件惬意的事。所以一到中午休息时间，大伙儿就换上裙子，拿着脸盆兴冲冲的跑到河边。这时，队里管牲口的老农老庭利就会嘟嘟囔囔地说：“女生们又穿着面口袋去洗澡了”。

除了游泳外，我们还喜欢在河边散步。一天傍晚，我和同屋的蔡雪萍拿着口琴沿着机耕道向河堤走去，路上听到远远地传来一阵歌声。走到河边时才发现是队里的一群男生在东边桥头的柳树旁，散散乱乱地站着、坐着、依着

柳树，正在合唱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梢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

当时夕阳西下，满天红云，河水在落日余晖的映射下波光粼粼。远处的桥、远处的柳树和远处的人群在彤红晚霞中、在渐渐变暗的暮色中象一幅动人的剪影。浑厚的歌声里，这条河也变得壮阔起来。我心里很震动。感觉中这条河成了一条真正的河，不知从哪里来，不知到哪里去，养育着我们，陪伴着我们。那天傍晚我们在河边坐了很久，没有吹口琴，只是静静地坐着。那天的景色，那天的歌，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让我永远记住了这条河，西里的“河”，我们的“河”。那天我告诉雪萍，如果有一天我要写西里，写我们西里的知青，我一定要写这条河，西里的“河”，我们的“河”。

田野上的那座坟茔

土堆下面埋着的是一个死于车祸的知青，他就是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王永。在一个炎热的盛夏中午，我和海清、万琴、黑妞，由西里青年队第一任老农老庭保带路，找到了当年王永下葬的地方，来到了他的墓前。坟上长满了青草，坟旁那株当年随手插下的小柳枝已长成了一棵大柳树。四周的田野里生长着茂盛的秋庄稼，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海清和老庭保扒开了乱草和树枝，露出了这块写着“王勇之墓”的碑石。看着这块墓碑，回首往事，仍能感到土堆下面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这种感觉促使我提起笔来，为他单独写上一节，祭奠这个早逝的生命。

王永是西里青年队第一个走完人生之路的人，那时他刚刚二十二岁，而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有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来，除了参加他葬礼的那天，我们都是头一回再次来到他的墓前。不知道其他几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我只觉得有些伤感。

我们在墓前站了很久，海清还为他这位当年的好朋友点上了一支烟。海清是西里的第一任拖拉机手和车长，和王永有着兄弟一样的友谊。他告诉我，逢年过节他和当年的知青朋友聚会时，第一杯酒总是要洒在地上，让已经长眠于九泉的王永依然能感受到他仍在朋友们中间，也让活着的人不要忘了他。

王永是一个很普通的西里知青，普通的让人几乎想不起他做过什么，有什么特别让人纪念的事情。他的优点是心肠热、人缘很好，几乎队里所有的男生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的缺点是懒散，人称“王老慢”。为了图省事他甚至常常是把自己的名字“王勇”写成“王永”，结果很多西里知青直到参加葬礼时才知道了他的正式名字。他曾爱上过队里的一位女生，但终因对方恨铁不成钢而无声无息的终止了。在短暂的一生中，王永作过的唯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用他自己年轻的生命讲述了一个让人叹息不已的故事。

王永死于一个很小很小的疏忽，是每个拖拉机手都会有的疏忽。那时几乎队里所有的知青都干过这样或那样危险的事，大家年轻不在乎。谁也没想到这种小小疏忽竟然会以生命作为代价，让人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每个人的命运。王永出事那几天，所有的西里知青都被巨大的恐惧和害怕震慑住了，几乎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又不敢说出来的一个荒唐念头是：下一个人是谁，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王永死后不久，我曾给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写过一封信，描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以及当时西里青年队里知青们的恐惧心里。这位朋友一直保存着这封信，让我在二十多年后又一次读到了它，又一次感受了当年的震憾：

今天告诉你一件你无法相信的事。

……

王永死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的，无论如何我也不敢相信这血淋淋的事实。事情虽然过去一个多月了，可现在想起来，我都会浑身发抖，连笔都拿不稳。那天我刚从城里回到青年队，已经下午五点多了，杨福海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顿时把我惊呆了。我在屋里一直转圈，也不敢去现场上看，听大家说王永的头都轧扁了，歪三扭四、根本认不出是谁，怎么能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倾刻之间就会丧命呢。我们下乡后，出了那么多乱七八糟 的事，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叫人惊心的呢？

过了几天，我到现场看了，又听了别人的介绍，大概情况是这样的：29日下午，五门（西里附近的一个村庄——自注）一个司机要用大队拖拉机拉石灰，让王永开车，开始他不想去，经支书老福点头后他才去了。当时他心里特别高兴，因为他刚定过婚，女方是东里支书的闺女，开车也特别快，拖车在你们偷西瓜的那条路上，五门的司机跳下来去端拖把，王永就挂上高速档往后倒。路很窄，路边有条沟坡很陡，他倒车太快，左轮上到了拖把上，右轮掉进沟里，车身一歪四轮朝天翻到沟里。王永的头被翼子板砸到了河帮上，连哼一声都没顾上就命归九泉了。当村里人闻迅赶来时，从车轮下拖出来只是一具无生命的躯体，五门那个司机当时连滚带爬过了沟才保住命，事后也吓瘫了。

第二天，魏茂林收到任胜利的信，那上面还让向王永问好呢。你不是给王永写了一封信吗？他收到后可高兴了，整天说要给你回信，后来在他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给你写了一半的信。

当天晚上，公社、民政局、公安局、鉴定所都来了人，王永的爸爸当时出差在外也赶快通知他速回。青年队的人都集中在两间屋子里，谁都不敢出来，好象黑暗中有吃人的魔鬼，王永宿舍里的人和燕丽她们屋的人吓得都搬了出来。你可以想象青年队那几天的混乱状况，饭没人做，活没人干，每天只是呆呆的坐在一起。这种打击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恐怖了，太叫人受不了了。我的心情比任何人都要沉重：我们是如此的年轻，死亡却又如此的靠近。我一贯不信命运，那几天却突然变得迷信起来，光瑞说：黄鼠狼单咬病鸡，王永偏偏是 个独生子；王海

生说：祸不单行，不定还要出什么事；王永也说过：今年是一个 灾年。

刚出事时，全部青年都被这突然变故搅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说真的，那几天我神经紧张的都快到荒唐的程度了。不光是我，整个青年队都是这样，出事的第二天，全村“戒严”，都不准进城，怕走漏消息，我和朱崇立从后边小路偷偷溜了出去。我骑车带着她，一路上提心吊胆，一听到车的声音，特别是拖拉机马上就跳下车，好几次回头一看，车子离我们最少也有一里多远。开追悼会那天，我们焦作知青要集体送一个花圈，因为沁阳知青合伙送了一个，让谁去买谁都不敢去，觉得花圈就象一个死亡的幽灵。后来，我和贺水平两人去了，他骑车带着我，我拿着花圈，他骑着车哆哆嗦嗦，我拿着花圈觉得胆颤心惊。第三天余龙智从家里回来了，知道这件事后在城里买了一卷纸，要烧纸祭亡人，经我们劝阻方罢，只是到灵前痛哭了一场。王永住过的屋无人敢住，连隔壁燕丽她们都搬了出来；王永用过的东西无人敢用，王海生把烟扔了，贺水平把梳子也扔上了屋顶。现在想起来是很可悲可笑可怜，在当时却都觉得合情合理。

…… 王永就这样走了。 ……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九日于西里

站在王永的墓前，我想起了另一个西里知青“小孬”段建成。“小孬”和王永一样，都是家里唯一的男孩、都是普通的西里知青、都死于上山下乡，不同的是，“小孬”死后没有留下一个可以让他朋友们凭吊的墓碑，只留下了无法言说的伤痛。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由于煤气中毒，“小孬”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来就常常在干活时昏倒在田里。每逢此时，总是我又掐人中、又橇牙关把他救醒。“小孬”是一个很爱整洁干净的男生，平时很注意自己的穿着和举止，然而每次发病昏倒时，总会弄得满脸污浊、一身泥土，醒来后在他看大家（特别是女生）的目光中就带上了深深的悲哀。队里没有钱给他看病，我们就只好帮他办病退；病退办成了，可是他的家里也没钱，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是依然无力支付他的治疗。队里的知青们都很同情他，但也没办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每年免费供应他全年的口粮。我和一些知青伙伴们还到公社和民政局为他跑救济，希望政府能帮帮他。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在公社和民政局之间来回奔跑了几个四十里路，经历了数次声泪俱下的诉说，终于为小孬争取到了三十元救济款之后，心中充满了悲哀：那时，咱们的政府、咱们的国家也很穷！

八四年我们家搬离河南时，当年在西里村下乡的几个知青朋友一起拍了一张照片，“小孬”也在其中。过了几年，就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小孬终因无钱医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死于那个折磨了他多年的煤气中毒后遗症，也死于贫穷。临死前，他在昏迷中还一直喊着：“没钱呀，没钱看病呀”。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曾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了很久，强忍了半天，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站在王永的墓前，我还想起了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一个数字：在长达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大约有三万人长眠在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三万人！这个冷冰冰数字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一个年轻的、活泼的生命的流失，代表了静寂的田野上多出了一座孤零零的坟茔。记得王永下葬的那天，本来晴晴朗朗的天空在追悼会刚开始时却突然乌云密布、风沙骤起，刮得人们无法睁眼。很多年以后，我曾在美国一个小镇的教堂里听牧师以景仰的语调向信徒们讲解圣经。当听到世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是他老人家计划的一部分时，不禁又想起了王永的死、“小孬”的死，想起了那天无端的狂风。假如这世上真有上帝，不知道上帝挑选王永、“小孬”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知青，让他们那样毫无意义的死去，是想向人们昭示什么？

是不是希望人们能对生命，特别是普通的生命给予足够的重视？是不是希望人们能格外地热爱生活，珍惜每一个日子？

如果海清再次把酒祭奠亡灵，希望他也能替我敬上一杯，为所有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死去的知青，为所有早逝的知青，献上一曲生命的挽歌。

永恒的土地

再次来到西里村，故地重游，很多地方都已面目全非，只有这片我们曾经耕耘过的良田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翻花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在阳光下闪烁着黑红的光芒。岁月更替，人去物移，只有它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仍然静静地等待着，……

木楼公社人少地多，知青与农民之间就没了争地的矛盾。西里青年队拥有二百亩耕地。这二百亩土地连成一片，南接青年队的大院，北临西里的河边，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队里的“二百亩良田”。在我们的感觉里，这块地很大，从南头到北头要走很久。有时一片乌云过去，北边哗哗下起了雨，南边还是一片阳光灿烂。让我总忍不住想篡改一个什么人的诗句：北边下雨南边晴，道是无情还有情。记得每年种麦子时，队里的老农总是要我们从南头开始拉耧播种，一晌时间也就能拉个一两趟，所以麦苗也是从南至北陆续拱出地面。有时最南边的麦苗已长出了老高，最北边的地里还没动静，也算是当年有趣的田间小景之一。麦子成熟时，无论是从东往西看，还是从南往北看，都有金黄色的麦穗在轻风中翩翩起舞，就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麦浪滚滚闪金光”。秋庄稼起来后，站在河岸上望过去，一个个大方块五颜六色：白的是棉花，黄的是谷子，绿的是玉米，红的是高粱。想到这无边无际的庄稼是我们一滴滴汗水换来的，也是这片不知疲倦的土地对我们的奉献，心里总是充满了感动。

____植棉真忙____下乡后不久，我就被分到了棉田管理小组，当了一名棉花技术员。大家都知道“棉田一片白茫茫”说的是秋天棉花收获时的情景，却很少有人知道棉苗在结棉桃前也会开出自然界最美丽的花。棉花的花有中等酒杯那么大，最初是洁白色的；而后颜色慢慢加深，变成了嫩黄色；再由黄色逐渐演变为鲜艳的大红色；红花落下，棉桃就长出来了。开花季节，棉田里红红黄黄白白的花朵开满枝头，有的鲜艳，有的安静，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

棉花虽然好看，棉苗却非常娇嫩，很难伺候。种棉花首先要用营养土和塑料薄膜育苗，出苗后再一株株栽到地里。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无休无止的浇水，施肥，松土，喷洒农药、捉虫子、打花杈。那时棉田小组有五个知青：燕琴、翠琴、王杰山、“老头”余龙智和我。不记得是杰山当组长还是我当组长，还是我俩一正一副集体负责，只记得我们五人负责几十亩棉田的管理，那些活儿总也干不完，经常要加班加点。有一个知青朋友曾经告诉过我，他在西里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到大田干活时，都能看到我们棉花组的几个人背着大大的药筒，戴着口罩，在晨曦的照耀下穿梭于棉田之中。

有一次棉田里起了棉铃虫，刚好又赶上打花杈的时候，我们几个只好早上起得更早，晚上收工更晚。常常是人到了地里，眼睛却还没有睁开，药水喷了自己一身都没发现。唯一的好处就是“老头”那曲不离口的《沙家浜》暂时偃旗息鼓了一阵，让我们耳根清净了不少。

过了两天，我的好朋友果齐鸣（那时她是队里的副队长）找我谈了一次话。齐鸣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虽然可嘉，但有困难还是要发动群众一起解决，如果长时间单干就会脱离群众。这话可让我吓了一跳：“脱离群众”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错误，咱可得赶快把它改正了。于是第二天我们起来上工时，就把同宿舍的十多个女生全都揪起来赶到了棉田里帮我们“改正错误”。这发动群众果然效果显著，一天下来打花杈的活儿就完成了一多半。只是第二次又去“发动群众”时，“群众”们一个个哼哼唧唧赖在床上不想起来。我们只好揉着自己睁不开的眼睛再次“脱离群众”了。

____**杂交玉米**____从学校毕业时知青们都装了一脑袋课堂里学到的农业基础知识，有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恨不得马上就把什么“染色体”、“基因”等学问用上，好好“大有作为”一番。结果还没把农活学会，就忙着进行科学实验了。第一年小麦扬花时，我和几个女生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跑到地里去采集花粉，然后照着书本上的描述对麦子进行人工授粉。满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比较纯正的小麦品种，不用年年到种子站去买种子了。兴冲冲地忙活了几天，不料队里的几个老农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他们告诉我们小麦的花粉实际上是满天乱飞的，尽管我们给小麦作了自花授粉，但附近地里其它品种的小麦花粉还会随风飘来，我们实际上是在瞎忙。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们顿时就泄了气，无精打采地把那些小纸袋和小毛刷收了起来。

秋天玉米抽穗时，想起书上说的“杂交优势”，就忍不住又想试试。这次也不敢惊动别人，就一个人到各块地里把不同品种的玉米花粉采集到一起，集中撒在了几颗玉米穗上，然后用纸袋子把这几个玉米穗罩上，心想这次可再也不怕花粉乱飞，可以好好地“优势”一通了。玉米成熟时我把这几株作了记号的玉米穗单独掰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次实验的结果到底如何。谁知外皮剥开后我一下就傻了眼，穗上的玉米粒紫紫黄黄红红白白五颜六色不说，还稀稀拉拉没把穗子长满，这算那门子"优势"呀？拿着这几穗不伦不类的玉米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把它们放到锅里煮煮吃了，好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____**引进春麦**____两次败走麦城，让我从此再也不好意思侈谈“培育良种”的话题了。七四年底，我到新乡市参加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遇到了博爱县的一位劳模赵澄太。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培育出了春种夏收的小麦品种。这个消息又让我有点心动。要知道冬小麦的生长期很长，每年十月份播种，第二年六月才能收获。只有大麦（也就是荞麦）能春种夏收，但大麦是当粗粮用来喂牲口的。那时还没人知道荞麦实际上营养价值很高，只知道它不好吃，要是能用春小麦代替大麦可就太棒了。再说了，这次也不用我们自己育种，只要引种就行了，这事儿看上去要简单的多。加上博爱和沁阳是邻县，地理气候相差不远，估计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这么一想，第二年一开春，我就骑车四十里，跑到赵劳模的村里向他要了一包春小麦种子。回来后向队里管生产的老农老孔和老丁一说，他俩还挺支持，这让我信心更足了。那时候社员们都知道：只要不是打架偷西瓜，知青们提点什么建议都算是新生事物，一般不能乱反对。不过老孔不光是嘴上支持，还手把手地教我在队里的菜地旁边平出了三分地，又亲自摇耧帮我把种子播到了地里。之后只要一有空，我就到这试验田里去转悠，还一本正经地记了一些观察笔记。

春小麦果然名不虚传，三月初播种，六月就成熟了。老孔帮我收回来扬干净又过了下磅，折合一亩地打六七百斤呢，还真不赖！不过我到底也没敢在第二年大张旗鼓地倡议种春小麦，因为大家反映用这春小麦磨面蒸出的馒头味道实在也不怎么样。这不知算成功还是失败的春小麦实验只好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____试种水稻____看着我忙忙乱乱地种春小麦实验田，当时在菜地干活的两个男生贺水平和秦勇也有点按捺不住想过一把科学试验的瘾。他们让我帮着找点稻种，想试试能否在西里种大米。

我其实对这种大米的事很是怀疑，觉得即使能成功也没法推广。不过想到这俩男生用菜地的抽水机给我浇过春小麦，我也不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再说这科学实验不就是干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吗，谁知道呢？于是我就又一次骑车去了赵劳模的村子，用一书包麦子换了一书包的稻种。在老农老丁的指导下，俩人在菜地很细致地整理出一小块水浇地，还用手指把所有的小土块都捏得粉碎。地虽然只有巴掌大，他们育秧插秧施肥浇水仍然忙活得似模似样。那些稻子从嫩嫩的秧苗到长出弯弯的稻穗倒是和电影里看到的一个模样，很象回事，就是不知为什么有些穗子的稻壳中没有米粒。

一天，贺水平把我叫到他们宿舍，说是要分析分析原因。正好我也想告诉他们根据我玉米杂交的经验，可能是实验田的面积太小，稻穗受粉不足。房间里秦勇正在沉思，见到我就严肃地说他们分析很可能是有阶级敌人想破坏知青的科学实验。阶级敌人？我听了有点发愣：为什么阶级敌人不干脆把稻子一股脑割下来拿走，而是费那么大劲儿把米粒从稻壳里剥出来？他俩大大嘲笑了一通我的幼稚，而后很认真地告诉我：这恰恰就是敌人狡猾的地方。如果他们把稻子割下来，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是有人搞破坏；但如果只把米粒剥走，我们就会以为在西里不能种水稻，从而停止试验。这分析可是太深刻了！如醍醐灌顶，让我不由得心悦诚服，那“花粉论”也就没再好意思出笼了。想到能抓上个把阶级敌人会给我们平淡的日子增添不少刺激，我也有点兴奋，就和这俩男生一起把村里上了名册的地富反坏一个个拿出来分析谁最有可能作案。讨论了半天也没折腾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就决定在地里埋伏几天，看看这个隐藏很深的坏蛋究竟是谁。

潜伏侦察了一天一夜，两男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这个狡猾的“阶级敌人”原来是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嗨，真让人失望！阶级敌人虽然没抓到，小鸟还算口下留情，一书包的稻种收获了一海碗大米，我就把它们蒸了蒸让每人都尝了点。还行，比那“杂交玉米”和“春小麦”味道要好得多。

____**土壤改良**____记得下乡后干的第一件农活是“打坷垃”。西里的土质很奇怪，村里人戏称之为“三蛋土”：干了是铁蛋、湿了是泥蛋、不干不湿是肉蛋。每次犁完地后一边耙地一边还要人用小撅头把仍然偏大的土块敲碎。打坷垃时大家站成一排，一遍又一遍的从南头打到北头，再从北边往南边打。

打坷拉这活并不重，却非常枯燥烦人。有时对着一块小坷拉敲了半天，把它敲得钻进了土里，却依然纹丝不碎，让人恨得牙齿痒痒的。每次派活时，大家宁可干一些出大力、流大汗的活，也不愿去打坷拉。实在没办法被派了去，无精打采地敲上一阵，有的男生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竹根烟袋，蹲到地头去吞云吐雾，有的男生就争着抢着跳到耙地的耙上当坠子，让牲口拉着满地飞跑。剩下无法可想的女生们，一边抡着撅头，一边咬牙切齿地看着钉在半空一动不动的太阳。

为了少干这吃力不讨好的打坷拉、为了能多打粮食，知青们想了很多办法去改善西里的土质。听说炉灰能疏松土壤，我们就把伙房烧出来的煤渣一车车拉到地里；听说多施农家肥能改良土质，冬天农闲时就把牲口吃不完的麦秸、玉米杆和豆杆铡碎，与猪粪、牛粪、马粪沤在一起，春天犁地时就把它们撒到地里翻到土下；听说雨水在地里积得过多土地容易板结，每逢雨季我们就在地里挑出一条一米多深，横贯东西的大水沟，让地里的积水能及时渗出来；……。人仰马翻地折腾了两三年，让人泄气的是"三蛋土"仍然是"三蛋土"，到了播种季节，我们还得去打坷拉。

最后一次在西里打坷拉是一九七六年秋天。为了抢时间把地平整好，早日播种麦子，除了必须要干的农活和出差的人以外，所有的剩余劳力都得去打坷拉。九月的一个下午，知青们正在地里说说笑笑、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坷拉，突然村里的高音喇叭传来了沉重的哀乐：毛泽东主席逝世了！这个消息惊呆了所有的人，大家不相信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时都傻了。后来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把路上的汽车和拖拉机截住。"大家这才清醒过来，纷纷扔下撅头，发了疯似的往公路上跑，不顾一切地拦截着过往的车辆。司机们停下车，伸出头来咒骂："你们不要命了！""主席都去世了，你们还有心思开车！"知青们愤怒地喊着。司机们跳下车，听到村里的广播后，一个个抱着头蹲在路边失声痛哭，知青们也围在一起泪流满面。那天，谁也没心思再去打坷拉了。

我把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写在"永恒的土地"这一节，是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号令，知青们才和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因为对七十年代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主席就是"神"，就意味着"永恒"。不管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不管现在的青年能否理解，这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这是一段历史。

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西里的土质是否得到了改善，也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打坷拉？但我相信从此之后，任何一个人的离去都不会再引起类似的震动，也许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吧！

____**学干农活**____要在这么大一块土地上种庄稼养活自己，自然要干各种各样的农活。耕地、浇水、播种、除草、施肥、打药，每样农活都不轻松。一年下来，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各样农活都品尝了一遍，手掌上也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最苦的农活是喷洒六六六粉，有一年春天小麦得了吸浆虫，全公社要在一天内统一灭虫，我一个人整整干了十几个小时才给一百五十亩的麦田喷完药，回去时全身上下都成了黄白色，眼睛被药粉蛰得直流泪，头晕恶心、不吃不喝整整躺了一天；最臭的农活是挑粪，一不小心粪桶里的汤汤水水就会"咕咚"一声溅到身上，收工后无论怎么刷、怎么洗，仍然觉得厕所就在附近；最难的农活是摇耧播麦种，这活到底也没几个知青能干，全让队里的几个老农包圆了；然而最累最累的农活还是三夏大忙时割麦子。

老农们常说："麦黄一日"。夏收时节，麦子让热风一吹，转眼就变黄了。稍有延迟，麦粒或者炸裂落地、或者被风雨摧残，一年的血汗就付诸东流。每到割麦时，知青们早上不到四点钟就被喊了起来，每人带上几把替换的镰刀，顶着星星就出工了。地里黑黝黝的，不知道左边是谁，也不知道右边是谁，只听到"唰！唰！"的割麦声此

起彼伏。除了吃饭时间，我们从早到晚都泡在地里，直到日落星稀，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走，割了十几个小时的麦子，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的。张勇曾经告诉过我，他原以为割麦子会胳膊疼腰疼，没想到最难受的却是两胯，弯腰扭着走了一天，胯部的肌肉和筋腱过分使用，站起来后连路都走不成了。

割麦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那时的中学生要把学工、学农、学军当成课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每年都要到郊区农村帮着收麦子，时不时的还要搞一些割麦子友谊赛，虽然不如当知青时劳动强度大，也受了不少的锻炼。那时我争强好胜，为了在比赛中拿第一，就挖空心思琢磨出割麦“优选法”，什么时候迈脚、什么时候伸手、什么地方下镰、一把抓几行麦子都算计得丝丝入扣，所以每次比赛总是遥遥领先。一次班主任老师不服气，组织了五个男生和我一个人进行接力赛，没想到中间传“接力棒”时衔接不好，反而让我占了便宜。不过在西里时我的这种风光很少有显示的机会，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朱崇立，崇立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她父亲下乡前郑重其事地把她托付给我（其实我比她年纪还小）。割麦子一般是两个人割一畦，我和崇立就常常凑在一起。一畦有十二行麦子，一人六行，我的“优选法”正好有用武之地，不过每次冲到前面后回头看时，崇立都在费劲的扭着细腰，手忙脚乱地挥着镰刀，远远地落在后面。心里虽然有点埋怨她简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林黛玉，但想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伸手揽过属于她职责范围的两行麦子。这样一来，“优选法”乱了套，我们俩就双双落在了后面。然而每次我们快到地头时，都发现有两个男生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田”后，又在回头接应我们。大概他们看我们总是落后，就发扬起雷锋“对待同志象春天般温暖”的风格。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麦收，我和崇立也一直很感激两个男生的“雷锋精神”，直到我离开西里后才知道，这俩男生（至少有一个）并不仅仅是在“学雷锋”，只是我和

崇立那时都比较糊涂，体会不出其中更深层的含义。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我的这篇短文，知道我还记得这件二十多年前的小事，不知心里是否会有些许安慰？

____**集体抗粮**____西里的农业科学试验算是花开无果，但由于地多，每年粮食倒还是收获不少。队里在编的知青有四十余人，经常在队里劳动的却只有二、三十人，平均一人要种近十亩地，还真有些干不了。所以通常一季最多只种上三分之二的地，让剩余的土地闲着，称之为“养地”。就这样每年也能收获七、八万斤粮食。记得我刚上大学时就常常自豪地对班里同学说我当知青时生产的粮食已够我吃一辈子了。

青年队实行的是典型的“大锅饭”制度，由队里的伙房统一做饭，不定量随便吃，而且以细粮为主，玉米、高粱和小米纯粹是为了调剂。一年下来，纤纤弱弱的学生模样就不见了，个个体重看着见长，让村里人戏称我们是“养膘队”。只是每年交售“爱国粮”的任务太重，除了口粮和种子，其余都作为公、余粮上缴给国家，而那少得可怜的粮款又被农业信用社扣下冲抵购买化肥农药贷款的利息了。虽然粮食生产了不少，吃饭不用发愁，队里依然很穷。木楼公社各个大队对知青多多少少都是欢迎的，一则是知青有安置费，二来闲置的土地有人耕种。更实际

的是各大队“爱国粮”的任务是固定的，而知青都集中在各个青年队里，要独自承担交售公余粮的任务，也就相对减轻了农民这方面的负担。西里村大队每年都分派给我们青年队很多交售“爱国粮”的任务，有时一季就有两三万斤。那时提倡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倒也从未想过这种分配原则是否合理的问题，每年还都把最好的粮食首先交给国家。

七六年麦季的收成不好，夏收征购时除了应交的公粮外，仍规定我们要交售两万五千斤的余粮。由于完不成任务，就要我们把预留的口粮上交一部分。这件事终于引起了知青们的强烈不满，爆发了一次拒售余粮的抗争。说是“抗争”，其实这两个字只是知青们心里的一种强烈感觉，表面上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对抗，唯一的抵触行动就是不干活，消极怠工。

那天傍晚天空乌云密布，天气非常闷热，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已经罢了一下午工的知青们三三两两坐在摊晒着麦子的粮店里，任凭带队老翟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动手收麦子。大家的心里都很矛盾，看着辛辛苦苦收获来的粮食要被雨淋都于心不忍，但又不甘心把自己的口粮当余粮上交。所以即没有人动手干活，也没有人离开，只盼望领导能体量知青们的难处，免了这不堪负担的余粮任务，我们好把麦子收回队里的仓库。胶着之际不知谁把大队支书叫了来，在他义正词严的爱国主义教育下，我们最后只好委委屈屈地把那些并没有认真处理干净的麦子交到了粮店里。粮店的负责人老张平时对粮食的质量把关很严，当时因为同情我们，对麦子里的石子，土块，麦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我们去了。大伙儿一直干到晚上半夜才收工，心理和体力上的疲劳都已到了极限。我回宿舍后正洗着脸时就累得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毛巾还在脸上捂着呢。

很多年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减轻农民负担的消息时，还想到了当年西里知青那次无法载入史册的“抗争”。“抗争”之后，各级领导更加肯定了西里青年队的落后。唯一幸运的是，后来知青招工征兵离开青年队时，并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倒是反映了村里人厚道的一面。

……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会唱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着人们心弦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我站在地边，望着这二百亩良田，一种熟悉的久违的感觉从眼睛流进了心里。仿佛我一直在这里，仿佛我从未离开过。这是我们的土地，这里曾是我们的土地。然而我又深切地感到：我并不属于这快土地，我和我的知青伙伴们仅仅是这里的匆匆过客。这二百亩良田虽大，仍然是一个小世界。西里村将有新的故事，那些故事里不会再有我们。所有的人最终都将离去，只有蓬勃的生命会延绵不断，多彩的土地将亘古不变……

我要走了，我将又一次离开西里，去继续我的生活，去开拓我的世界。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不知什么时候

我会再来到西里，不知下次再来时还能否看到那些留下我青春岁月的地方。

昨天所有的一切，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不知道究竟得到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去评价上山下乡的功过是非。我和我朋友们在西里的生活，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我们的所作所为，影响不了这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也无足轻重。然而我的知青生涯永远是我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永远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将伴随我一生，伴随我走遍全世界。千千万万象我们一样的知青会聚为整整一代人，但愿岁月不要淹没了这段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

再见了，西里村！再见了，这片永恒的土地！

请多保重！我的父老乡亲，我的知青朋友，我的兄弟姐妹。

西 里 遗 梦

《西里遗梦》原本是一首爱情的歌。

很多看过我西里网页和看过我写的西里知青故事的朋友都建议我写写在西里发生过的爱情故事。这个建议让我心动、也让我很犹豫。和所有的知青点一样，年年岁岁的朝夕相处、耳鬓厮磨自然会产生心灵的碰撞，留下一段铭心刻骨的初恋。有的美好、有的凄婉、有的令人心醉心碎、有的令人感慨万千。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值得写下来，也不知道我的知青朋友们是不是有勇气再次重温那段难忘的经历。所以我写了这个网页，也在此留下了空白。

如果你能听到这个网页的背景音乐，那么请你记住这段音乐的题目是：“谢谢你的爱”。不管我的朋友们在西里有过什么样的爱情故事，他们或者爱过、或者被爱；也不管这些爱情故事的结局如何，都说一声谢谢吧！

也许有一天，你会在书店的架子上看到一本题为“西里遗梦”的书，它将为你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

有一种感情，比爱情更美丽。

记得看到过一首小诗：

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

只要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

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

若不得不分离，

也要好好地说声再见，

也要在心里存着感激，

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

2008/4/10 14:41:41发布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的父亲可能属于中国最传统的父亲之一，他那望子成龙的理想几乎每天都刻在脸上。这个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期盼子女们都能上大学。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理想，他会心甘情愿付出任何牺牲。作为长子，我首当其冲地肩负起父亲的梦。196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级重点高中，父亲脸上的笑容，如此灿烂，绝对胜过任何一种名花。

但很快我就感觉到某种危机：考入重点高中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在强手如林的竞争面前，我就成了第二流的货色。物理是我的长项，依旧拔尖；平面几何原来也是强项，但高中就没有这门课了，立体几何、平面三角，我怎么努力也拼不上95分；代数更是只有80分上下；化学便更惨，总在75分附近晃悠；俄语也在这个水平上。这样的成绩或许只能进入广西的大学，我们的学长们如果考上这些大学是不敢出门的。

不过也有意外，初中时勉强及格的政治、中等水平的语文，到了高中莫名其妙地开了窍，成了成绩最优秀的课程。我甚至开始考虑是否改换门庭去报考文科。而文科既不合我的胃口，那时又叫做第二类院校，被看成为照顾某种残疾（例如色盲）而开设的。似乎只有理工科才是建设祖国的行当。

到文革一来，一切都颠倒了。那时一句时髦的口号叫：“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北京一家中学首先倡议取消高考制度，接着就是山呼海啸般的拥护之声。其实也不奇怪，那时只要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的，没有不被“热烈拥护”的。前几天伊拉克“大选”，那场面我们在文革中都见过。

但拥护和拥护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们那些特等优秀生，拥护的神态简直有点哭笑不得；我们这些二流货，拥护得活像老毛在《反对自由主义》里的精彩描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反正考也罢，不考也罢，对我们的伤害远不如特优生；最高兴的莫过于那些早就对高考丧失信心的差生了，手舞足蹈、欢呼雀跃不亚于爬上地主少奶奶牙床上乱蹦的无赖。我们班就有一个留过两次级的同学对我说：“看他们还神气什么？大学不用考了，怎么样，成绩好有什么用？”

于是可以安心闹革命了。都必须积极些，你出格我会比你更出格，讨得毛主席欢心绝对没有亏吃。即使大学开课，也必定是革命派占便宜。工农商学兵，大家一条心。都来“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谁也没料到的是，革命小将威风八面之后，全都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且“很有必要”。似乎“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已经无效。而我到农村去，其实属于发配，更没有任何悬念。连我那位望子成龙的父亲，也只好改变主意，捡起“宁做街上狗，不当乡下人”的旧训，千方百计为我寻找一份哪怕是扫大街的职业。大学，看来永远只是水中月、梦中花。好在虽寡却无不均，谁都没有大学上，个个心态也都平和。

唯独“旁观者清”。杨振宁博士跑出来发了一通议论：“中国停止高等教育的严重后果将在十年内显示出来。”这可不是吹的，无论我们的文革取得多么伟大的胜利，人家美国佬都跑到月亮上撒尿去了！实况转播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都在看。就连打着仗的埃及和以色列也停战几天，让士兵们观看这个人类壮举。我们的悲哀是毫无疑问的，那里本来只住着两个中国人，嫦娥与吴刚。这下子桂花酒变成威士忌，无论是杨花还是柳絮，心情都不会爽。该死的美国佬，确实侵略成性。在地球上打不赢我们，就跑到月亮上捣乱！

要想在月亮上也打败美帝国主义，靠“万寿无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虽然1968年7月21日就发了“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那是“七二一大学”，其实就是职工培训班，成不了气候。无奈，1970年6月27日，中央终于批准职工培训班放进传统大学里去，而且“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一有不平均，马上就乱套，何况大学蜕化成出路。如同杭州灵隐寺里的一副上联：“苦海驾慈航，看出没众生，有登彼岸，有溺深渊。百千万劫凭缘法。”为了登彼岸而不溺深渊，有人情关系的投“缘”，有权力的用“法”，什么乌烟瘴气的“缘法”都涌现出来了。归结之后精简为三个字：“走后门”！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政审这关我就过不了，因而从来没有奢望。只是“冷眼向洋看世界”似乎更清楚。本来大学考试天经地义，没有谁会想到“后门”在哪儿。开始搞阶级路线之后，天平开始倾斜，到我们上一届学长，家长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无论你多么优秀，落榜下乡是惟一出路。再经历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潘朵拉之盒便敞开了，更何况还有“前门进来也有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的最高指示撑腰呢！

1977年被称之为第一个春天，虽然本人坚持了几年自学，大学的课已经读完几科了，因为政审，别说我，就连我老爹也不敢问津。接着就是78年的高考，几位原来的插友招呼我帮助补习，引得我自己也心痒痒。奔波一阵便死了心，依旧政审问题过不了关。这次彻底绝了望，年岁不饶人也！大学不再招我这个年龄段的老朽了。那么还是自学吧，老毛不是介绍说恩格斯也没有读过大学的么？

说实在话，人只有在彻底绝望时才会有最平和的心态。我在农村坚持自学的惟一动力只是提高我自己做人的质量。没有其他任何期盼。入党、升官、招工都没我考虑的份儿，甚至连结婚也没指望过。只能靠书本来麻木自己，逃避世俗的一切。

这年年底终于有了平反，在大学已经招生之后。况且这“迟来的爱”并不真诚，俺还被留了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于是分在一个远离城市的水泥厂。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祖训还灵，好在有下乡时自学的功底撑腰，这个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鬼地方使我成了失去老虎的猴子。本人便是全厂文化水平最高的角儿。上边拨款扩建，工艺、土建、电力、设备、施工，我真正成了“五门齐”，兼之必须自己出图，又练出直接在描图纸上格墨的“绝活”。书本成了老师，林彪那个“带着问题学”确实是个好方法，只要别学到政治问题上去。

天确实真无绝人之路，1982年，华南理工大学来招函授生，年龄恰好限制到本人为止。而且80年我那个“尾巴”又被彻底切掉了，于是报名参考。没想到三百多考生居然被我拿了第一，华工也算滑稽，录取通知书竟然也注

明“你考第一名”的字样上去。一共录取24名，要读六年才拿本科，每学期到广州校内一个月面授、考试。而且这也是以承诺放弃“电大”、留在厂里为条件的。不用说，到班上我又成了“老大”，最老的一个。在我看来，本人只是把知识系统化、专业化，建筑这个行业也是我喜欢的，那就学吧。其实只是混，繁忙的业务使我无法花更多时间去学，每天夜晚挑灯读课本、做作业，好在以前就习惯了。

但这六年至少给我两个好处：第一，每学期一个月的学生生活使我的心态年轻，似乎找回一点什么；第二，我那儿子受到熏染，几乎根本没用我操心。他自己说：我睁开眼睛就看见你在看书、做作业，一想起老爸就是在灯下看书写字的形象。

1988年毕业时，我已经40岁了，而且恰好是领毕业证那天。同学们坚决推举我代表他们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并给我做了个生日。记得那个简短的讲话是这样的：“今天是我四十岁生日。到了当教授的年龄，刚拿到本科文凭，而且还是函授。我们这代人，也算是够艰辛坎坷的了。不过我们毕竟还是幸运的。我衷心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她圆了我的一个梦，大学之梦。我也代表我们班毕业的23名同学，向华工表示真诚的感谢！我同时也真诚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学不再是梦，而是所有人的权利。”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回乡散记

风尘仆仆

临时决定抽个空子，于是“打起背包就出发”，回到二十多年没见过的故乡去，那里也消磨了我的插队时光。前后九个多年头，人生最可贵的年华，整定不是可以轻易就忘记的。火车从南到北，曾经都熟悉的城市从窗外掠过，仔细想一想，翻开地图查一遍，自越南边境直到郑州，沿着铁路的每一个县城我都到过，也算一种阅历吧。只是这二十年却从未涉足，面貌全非，已经不可以再吹嘘说到过的了。次日上午九时许，火车爬上了大别山的山坡，武胜关大隧道就在眼前了。其实从湖北广水火车站开始，我至今还记得每一个小站的名字：孝子店、子午店、武胜关、鸡公山、李家寨、东双河、平桥然后到信阳。无他，当初在固始插队的知青里，那批招工到信阳铁路的哥们，差不多这些小站都有人在，我和宙宙也就逐次地到过这些地方。那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随即他们也都陆续调离，到如今，宙宙已经驾鹤西归，这些地方也就成为记忆。穿过武胜关隧道，便进入信阳的地界。毕竟有二十年没回来了，不觉有点归心似箭的心情涌了上来。

自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听父亲念叨故乡的美丽与富饶，到了1958年，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于当时的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那份得意就没法说了。所谓乐极生悲，接着就是举世震惊的“信阳事件”，一百多万人饿死的惨状，尽管所有文字档案至今还严密地封锁着，但信阳这两个字就如同阴曹地府般阴森可怕。可那毕竟是我的故乡，也是我青春年华消耗掉的地方，与别人不同的一份潜情总不可磨灭，各种渠道得来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信息，是真是假犹不可判断。多少次打算要亲身返回这里，总是因为忙，因为这个万事皆灵的理由，不能成行。今天终于咬紧牙关回来了，很难说这辈子是否还会有下一次。

信阳到了，老虞到站台上接我，二十多年没见了，上次还是他跑到广西的时候。他告诉我，当初招工到信阳的固始知青，现在继续呆在这里的还剩下老马一个，其他的，或调回郑州，或已经退休。再仔细念叨一下，其实不止，懋西偏瘫在床已经十几年了，连话都不能说；华林应该也在，失去联系了；大老郭几年前就厌倦了人世，选择了死亡，这使我大吃一惊。以他那份开朗性格以及知足长乐的心态，怎么会选择死亡？老虞说，所有熟悉他的人都

想不通，只能是个谜。人啊，怎么说呢？岁月像条河，逝者斯夫；岁月像首歌，越是唱到最后就越悲凉。伤感无可避免，伤感也无法久留，人总不能只为过去而生活。《论语》曰：“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断寻些事情来认真做，茅屋就不至于为秋风所破了。出了火车站，这个城市街道宽敞了，楼宇更高了，现代化的气息也浓烈得多，唯独脏乱差这条，堪称河南特色，想抹也抹不掉。河南其实也堪称中国的缩影，谁让它占据了这个文明的中心呢？

随即转上开往固始的班车，出城的道路宽广多了，秋天降临的原野，金黄已经收割，墨绿很快就会成为枯黄。沿途的几个县城，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可无论怎么看，都像是穿着西装的赵本山。交通无疑已经改善许多，而且还在继续施工改造。西安到南京的铁路已经通车，罗山通叶集的高速公路也正紧张施工，国家在大规模地改变模样，这里应该不会例外。固始的县城已经彻底认不出来了，可是打算充填一下辘辘饥肠却遇到麻烦，车站前那几家小饭馆，看上去还不如我们那儿的公厕，原本饿着的肚子却没了食欲，干脆租下一辆小面的直奔乡下。公路边的景色已经大变，从前路边那些泥坯砌筑的草屋，全都没了踪影，各式各样的小楼房则星罗棋布。田野里的树木，显然比过去多了许多许多，看上去更像是无边的树林。我离开这儿的时候，田野里只许种粮食，只有路边村头才是长树的地方，这条312国道两边，杨树叶总是黄的，汽车不断地通过，没完没了的灰尘就遮蔽了它的绿，只有大雨才能为它沐浴，短暂地洗掉泥土的沾染。可如今它们确实恢复了本色，绿得好像浸透了油。柏油路果真直通大队，唯有转入大队部那一段还没有铺路面，谁也不能否认这里的进步。大队部还在老地方，但所有的房屋都变成砖瓦砌筑，但与路边所见农舍相比，灰头土脸的显然打不起精神。当村委会的房子远不如大多数农舍时，应该说是农民的福音。进到队部里，迎面过来的自我介绍说是村长。我不认识他也不奇怪，但他却清楚地记得我：“你走那时候，可年轻哩！咋就老得这狠？”

我原来插队的姜家老庙生产队就在大队部北边，那张曾经熟悉的大塘，塘边原是一片光溜溜的土。草儿刚长出来，不是被牛吃掉了就会被老社员割掉，烧锅的稻草极缺，于是野草便横遭割刈，轮不到它们长成的机会。塘北边就是生产队的稻场，如今，稻场、队屋、牛棚、仓库、学习室都成为记忆，这里也成老社员的住宅区，似乎按照同一个设计图纸建起来的小楼房，连同小院，一排排又一列列向北延伸过去。这些小楼丝毫也不比沿海地区差到哪里去，看来电话里得到的信息并未失真。

在大队学校的大门外，我原来所居住的房子对面，挺显眼地保留着两间经过修缮的旧草房。它与我原来住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门口外墙经过糊弄，墙角也用火砖补砌过，房门换成了带气窗的新款房门。老汪说：“俺巴巴（特地）叫留下的，全大队唯一的旧草房了。你可知道，这屋是1964年建的，不留两间以后孩子们不知道啥叫草房了。也没闲着，里边安着打米机，不时还打点米。”我奇怪地问：“这做打米机房，不吵得慌？”老汪愣了，回过神来笑道：“你肯定想到那时柴油机碾子去了，现在都是电动的，不吵。”我也笑了，因为我脑子里的打米机都

跟大八匹柴油机连在一起的。

瓦坊小学就在旁边，砖围墙里圈着一栋两层的教学楼，还有两栋红砖平房。篮球场据说是标准尺寸的。汪泽学退休在家，俩儿子都在北京，照看两个孙子，便成为爷爷的任务。他似乎也很理解，告诉我："回头你去瞧瞧，俺村里头尽剩下些爷孙辈了，年轻人都跑外边打工去了。"我跟着他去他的家，老汪把里间房子准备好了，卧具全都新洗干净的。大队小学已经开学，孩子们正在上课。老师们听说我回来了，四位当初就在学校的老师赶紧过来看望。叙说了一会重逢之后欢乐话，老师们又要上课去了。询问之后得知，如今大队学校教师全部实行工资制，13名教师工资最高的1200，最低的也有700多。而且老师们的工资由县财政直接给付到各人的信用卡上，从来没有拖欠的事情发生，但过去由乡里支付则常拿不到。

汪泽学告诉我，他没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休之前，乡里欠教师总额达八个月的工资，"拿不到了，噎熊！"汪叹息说。全村适龄学生该有350人，其中一百多孩子跟着父母到南京、北京等地，留在村里就学的还有二百多人。学校的经费全靠学生交的学费，每学期每人交80多元，除去书本，剩余20多不到30元就是学校的经费。不过细算一下，全年教师工资近15万元，如果都由乡村承担，这学校肯定倒闭了。因为孩子越来越少，正在实施中心乡村小学计划，瓦坊属于中心小学，邻近的村小学面临裁撤。"缺钱，一下子难办。"马振学老师告诉我。他是老教师了，领着1200元工资，很有些"此间乐，不思蜀"的心态。实行中心小学是有条件了，孩子们上学，稍远些的都骑自行车。我在的时候，整个大队就只有代销点有一部破旧的"红旗牌"，看着校园里摆放着上百辆各式自行车，时代的进步也算一斑吧！更别说孩子们的穿着了，五颜六色的，并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到哪里。

久别重逢之喜悦

大队部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正看病的中年农妇带着笑意解嘲："俺那时还是小学生哩，你肯定认不到俺。俺认得你，就住俺学校那屋。"最后一位也是中年男医生，他直接招呼我以后就让我猜他是谁，我估计他是老季医生的儿子，猜对了，于是他有许多激动。但问及他爹，脸色顿时变得沉闷，只说是在郑州，胃癌晚期，享受着离休老干部的免费治疗。"许是不行了，两天俺还得过去瞧瞧。"他说。于是，我这次回来的主要探访对象之一，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跟小季简单谈了几句，知道大队医务室平均一天也轮不到两个病号，果真应了老季当年的说道："吃饱肚子了，哪还有那些病呢？"当初大队医务室，是必须从早忙到晚的。又问道："你叔季永庆呢？""他在县医院上班了。"我又问："汪医生呢？""他在南京跟人家合伙开诊所，混得还不错。"

我抓起相机，往姜家老庙去。还在围子外边，已经看见围子里的一片凋零：当初宽阔的围沟已经被各种植物布满，当年拥挤热闹的围子里，如今已是杂草和作物的世界，只有围子进口附近那一座旧草房的断垣残壁，还显示出它过去的风貌，可我知道那间房子的辉煌，当初是石佛高中汪校长的住宅，是围子里最好的房子。老伴感觉出那里的阴森，极力阻止我走过那荒草覆盖的旧塘坝，于是我只好拍下照片，沿着围沟外的小路向新住宅区走过去。小路是在深及肩头的草类中踏出来的，从水里伸出来的蒲草长得比人还高。当初，这种蒲草是编织的材料，还没等它长成就会被人砍去编织蒲包或蒲草草席了，看着它一片一片地点缀在围沟边，可知已经没有谁再打它的主意了。

走过第一间小楼，院门开着，看见小楼大屋里有人在玩麻将，我径直走了进去，根本不需要问主人家是谁。果然，临近屋门口，里边玩的看的全都站了起来，他们认出我来了，接着就是一片热情的寒暄。谈话中我知道，这是汪泽耀的房子，刘世宴、刘华宴、刘国宴等刘家兄弟连同汪泽耀、汪泽田等都是种田大户，汪泽耀说："俺们这些四十岁往上的，给谁打工都不得要俺们，没本事出去混只好留搁家里种田呗！那些个出去的，田也没法种，都转给俺们种了，一亩地给一百斤稻，啥提留都不管俺们事。种他二三十亩地，一年也斗两三万，不比外出打工差。"七嘴八舌之中我知道，如今种田也很闲，插秧已经淘汰了，采取抛秧方式；薅秧也不需要了，除草剂一撒就完事；有虫了就撒药；犁田、抽水、收割、脱粒都用机械，一年也就两三个月稍微忙些。老队长刘明宴说："你在的时候队里九头牛还不够使唤，现今一头牛也没得了，都是机械化。你在这儿那会，俺们老社员见天累得跟啥似的，还混不到一个饱字。如今种田，只忙乎两个多月，其他时间都闲得慌。"

走过其他几户，小楼的院门都锁着。老乡说了就知道他们全家都在北京、南京、上海这些地方，这里的房子都空着。像这样空着的小楼，有十几户，还有二十户上下是爷孙两辈住着。转到后排，看见胡生经开的修车铺，老队长刘明宴、老会计汪承德以及两个中年妇女正坐着等修车。看见我们，他们全都站起来，高兴地拉手直摇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圣人到底是圣人，说的话几千年后还能那么恰如其分。正寒暄着，孙日新摇晃着走了过来："大蛮子！你个熊货咋就一去不回来瞧瞧？这二十多年了，跑回来一趟也不赞助俺们队里一点家什，你要那些钱干熊啊？弄点钱回来，队里还有几户住平房的，在那西边个，都给建上楼房，俺队里不也排场些么？"这家伙始终如此，见面就是一通连珠炮。还没等说几句，刘文富恰好骑车经过，看见我就慌忙急刹车，下车时几乎跌倒。接连不断有老社员赶过来，叙谈也在欢笑声中起伏，老伴在一边难得地也答腔一两句。过后她感叹道："特别是那个人跳下单车差点跌跤的样子，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了。那些农民真的好淳朴。"

居住在乡下，从东方欲晓到夕阳西下，斑鸠的"咕咕咕"叫声便不绝于耳，不时还夹杂着白头翁、灰喜鹊等鸟儿的喳喳声，如同生活在树林里，这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感觉到除了学校之外，整个大队都冷冷清清，树木和荒草都明显比以前多得多了，那时路边的杂草都难找，没被砍去烧锅的小草，也不够牛吃。如今这荒草很多都齐肩深，老社员都使用煤气与蜂窝煤做燃料了，非但没人再稀罕这些荒草，就连田里的稻草也就地烧了还田。不过也有遗憾，当初不绝于耳的蛙鸣，如今一声也无，辛弃疾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也无从说起。还

不止如此，当初满围沟随处可见的乌龟、老鳖、黄鳝，都找不到了。老社员们说，下化肥、农药、除草剂，都流到围沟里，这些东西都绝迹了，只有那文革时期引进的水花生，到处疯长，把围沟都长满了。

随后，不断有老社员闻讯来住地探望，大家都叹息说老了老了。原来的大队书记说："俺那孙子回家说，学校里来了两个外国人。一打听原来是你，就过来瞧瞧看，二十多年了，俺们都老个逑的了。"村长不容商量地要在集上饭店请客，我正打算到集上看看，招待老朋友一次然后离开，却不料遭了众人的反对："你这不是损俺们么？要指以前，俺们真还请不起你，现如今请你一餐不算啥事，谁知你这一去啥时候还能回来瞧瞧呢？"上集之前却出了些变故，乡党委曾书记闻讯，派了车过来接。午宴中曾书记接了在县里开会的乡长电话，说既然午宴是村里请的，晚上他赶回来乡里一定要招待一餐。书记喝了几杯后被电话催着走了，那边还有一个业务午宴是他原来已经答应过的，致歉之后他便告辞。于是这伙大队、公社时的老朋友便如释重负，来了个一醉方休。五瓶"四特酒"搞掂，我也就"方休"了，公社那部桑塔纳怎么送我回来的已经不记得了，一觉睡到半夜才醒过来。

我是不知情的了，老伴和汪校长都告诉我，下午四点多钟，公社的汽车又派来了。他们告诉随车来的余副书记我醉了他还不信，亲自到床头看过再打电话报告，于是改定次日上午一定请到公社叙谈。次日一早，村委会里热闹起来。村道东西干线敷设完成后，经过大队部门口这条南北向干道做完基础尚未铺柏油路面就停工了，原因是乡里无钱支付给公路段。已经停下来三四个月了，昨天下午曾书记让乡里安排支付所欠的17万元，并要求公路段今天开工敷设柏油，两天内完成。于是村里今早安排劳力，铲除有碍敷设的杂草、清扫基础表面的灰沙以配合柏油表面的敷设。我注意到这些配合工作的劳力是有偿的，村长等正与公路段来的几位干部讲价钱，似乎没费太多口舌就达成了共识，几十位愿意做工的劳力随即出现在道路上开始干活。询问村会计后知道，去年开始已经一律取消了义务工规定，即使像今天这样为村里道路干活都得支付工钱。会计补充道："公路段回去拿钱了，今个就交给村里，村里再给他们。"说话间公路段的施工运材料的车辆开了进来。我忽然发现今天本是星期日，这些账款怎么支付？会计说："明个付账，工钱公路段今个先垫付。昨个本来公路段说星期一开工的，曾书记不干，一定让他们今个开工。"我拍了几张照片后，曾书记亲自跟车过来了，是来接我的。他说："顺便瞧瞧他们开始干了没有，再拖天气凉了就没法铺了。怎么样？俺不想给你留下个坏印象，你要多呆一天，就可以走新柏油路了。欠人家钱迟早得给的，昨天你们村长一跟我说这个事，我就说坏了，不管咋样，你们从大老远回来，这就是一份情意。就剩这么一点路面没做完，留下一个坏印象，那多遗憾。马上就叫他们给办了。还请多多包涵，俺们还是穷啊，乡财政一年才几十万，要做的事又多，那边漂桥扩建今天也开工了。"

跟着书记的车去到乡政府，杨乡长正等着。昨晚的接待没办成，今天他一定要补上。我们则打算从乡里直接租车到县城，然后乘长途班车到信阳。乡政府与原来公社大院相比，无疑属"鸟枪换炮"，整齐多了。在乡政府的小会议室，曾书记主持了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他毫不讳言地说："俺在这当书记九年多了，也查问了一下，当年插

队在俺们公社的知识青年有七八百人，据俺知道的，这九年多里回来瞧瞧的只有你一个。这不是怨啥，人人都忙，抽不出时间，俺们热情欢迎你们回来给俺们指导指导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乡长接着也表了态，他说有点巧，今天正好是他到乡里工作两个月整。我表示这样正式的场面有点受宠若惊，也不习惯。接下去便开始漫谈，探讨起农民减负和乡村改革的出路问题来了，很热闹。然后书记介绍了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教育，设施根本无法满足适龄孩子的教育，仅今年乡高中就拒收了500多孩子，上了学的也挤成七八十人一个班。乡长表态说：“你们在外边，门道开阔，俺们只希望还能惦记着这一方水土，万一有个什么机会，给俺们引荐引荐。”

午餐也很隆重，只是有夫人管着，没有过分地饮酒。然后又继续探讨了乡村农民的出路问题，他们显然都对我认为的“农村唯一的出路在于土地市场化”很感兴趣，不知不觉又过去两个多钟头，我开口告辞。谁知乡长要求再等一会，他派出去弄县里南大山茶场取“信阳毛尖”的就快回到了，还告诉我，他已经安排好一部轿车，直接送我们到信阳，不必担心。我坚辞不掉，唯有从命。直至三点五十分，“红旗”轿车载着我们还带着六件“信阳毛尖”离开了乡政府。我知道，此后这份人情总会压在心头，得努力办点“引荐引荐”的事了。

忆苦思甜

村里的干部定编八人，实际上只有六个。大队支部书记自己不愿干了，妇女主任为了自己超生也辞职了，没人愿意顶，于是丢空在那儿。每位大队干部每月补助200元，任务完不成这个补助就拿不到，所有的吃喝开销已经完全不存在。至于村民公开直选，纯粹是“逗把戏”。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比民主更乌龙的，各村民小组长过来，把全队人的名字填上，就算选举了。不过这村官选举，却又有特殊的地方，倘若乡里不来指定，没人愿意当“候选人”。原因在于，如今的村干部，处于“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的境地。什么特权也没有，具体工作就只剩下计划生育与追督上缴这两项。每年大队上缴任务大约十来万元，只收现金，不再有粮食征购和卖余粮之类任务，乡里的粮管所已经撤销，人员也都遣散了。粮食基本上处于买卖均衡的状态，由两三家私营粮商收购。汪泽学告诉我：“这两项具体工作，没一项好惹。交任务现在非常低，今年俺姜庙收稻有30多万斤，交足了也不过两万斤。只是几户种粮大户操作，也有十来户自己种自己的。其他户基本不种粮了，特别是小麦，产量太低，已经没人种了，老社员想吃馍就去买它一袋面粉回来。”

瓦坊村占地5.3平方公里。人口约3200人，其中约1400人在外打工或经营小生意。姜庙队约220口，约有2/5长年在外；最多的是桥头队，250多口人，留在队里的不过70来口。也难怪，那个队人均耕地不过八分。留下的都是40岁以上的和小孩，年轻人一个也没得了。大队首先开始跑外边的，是余大塘小队。他们这个队原来最穷，一包产到户了就立马开始干旁的，一是干建筑队，还有就是跑出去打工。这一干他们倒反先富起来了，接着就是清河

队，跑小生意跑出点名堂来，跟着其他队也外出跑，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从拾破烂、收废旧到清洗油烟机、建筑外墙等行业，作为配套或另辟蹊径，不少人便开始了小生意。期间就有不少事业有成者，例如张老埠的张某某，在深圳以运输信息服务开始，做得很大。前两年固始高中改建，他一个人就掏了70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投资固高旧址拆迁改建的项目。如今，许多农民在上海、南京、深圳、北京购买商品房，全家迁走了。更多的农民却是外边挣钱，家乡建房。我们村就是一个范例。像许祥发，当年常跟在我脚前脚后转悠的半大小伙，去年回来把房子卖掉，全家都迁到上海去了。

孙日新，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搞了一个实体专门干清洗油烟机和大楼外墙。汪泽学说："他俩儿不时寄钱回来，他带着孙子，没事就蹬一辆三轮车，上集到小吃店，喝一碗豆浆，吃两根油条，再买回些肉菜，乐得很。"孙本人说："奶奶，毛老头要是早死一二十年，俺咋作也不止跟现在这样。如今没法子喽，老喽，混一天算一天呗。"我乘机接上话头，咨询一下农民如今究竟怎样看待那个时代。于是说："外边有些人说，广大农民都怀念毛主席那时候，说现在还不如那时。"话还没落音，胡生金就骂开了："他娘的毛XX，整得俺们老社员连白开水都喝不上。日妈的，他要是还不死，那就该俺们老社员死逑了。"老队长刘明宴说话比较有分寸："俺是个党员，让俺说的话，他是三分正确，七分罪过。"老汪德说："怀念他回来再过'食堂关'不成？"刘文富说："说那话的人太没良心，怎么说现在比那时候还是强上天了。那时候咋宣传来着？到了共产主义就住楼房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妈，现在比那还强些，不光电灯电话，电视机哪家没有？那时想还没敢想电视机哩！"所有人都笑开了，这笑声是一种明显的嘲笑。他继续告诉我："俺家里今年收一万二三千斤稻，搁那时候，姜庙全队十股俺这都快够一股了！就俺老两口吃饭，吃不完的咋作也得卖七八千块钱回来。"想想又有点意犹未尽："乖乖，不算算真还不知道，加上其他的，跟那时候比，二三十倍都不止！"于是大伙七嘴八舌核计起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以货币面值计算，姜庙人均收入，不算在外人口及其收入，只算乡下产出与在乡人口，大约为生产队时期的一百多倍！如果把物价考虑进去也应在十倍以上。

在菜园边，我邂逅正在劳作当年的贫协组长杨丙法。他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三步并作两步迎过来握手。一阵欢乐的寒暄过后，他叹气说："俺们在队里只能算穷的，没办法，老了。"我知道他的儿子媳妇连同孙子都在外做小生意，他一个孤寡老人自己在家耕作菜园，全家分的责任田都包给种田大户了，承包费就收近千斤稻子，吃饭早就不成问题。看见他在菜园子里劳作，就问："你只管坐着吃不就结了，还忙这些干啥？"他笑了："俺一个庄稼人，不在地里摆伺，种点家什，咋过？你瞧瞧，俺今年七十三了，咋样？还硬朗吧？"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看见我要给他拍照，立即摆了个架势。听我说外边有人大吹广大农民怀念毛时代，这位老人有些气愤了："奶奶赫来的，这些人良心叫狗吃了不是？让他们来问问村里，俺敢说，问全公社全县，没有一个会怀念那时候！还想叫俺们都饿死啊？他要敢回来跟老社员说，嘴都给他掌歪了！"瓦坊学校的马老师是最老的教师，说起那年的"食堂

关”，他告诉我：“就俺自己的经历就足够写一本书。那年俺才不到十岁，几天没吃的饿得只剩一口气，跑柳沟大队寻亲戚找吃的，柳沟大队干部说俺流窜要把俺吊起来，俺给他们求情，说俺都饿成这样了，一吊就死了大叔大伯们你们行行好手下留情留俺一条命吧……”他说不下去了，直在抹眼泪。我也无法再说什么话。过了一会，他的心情平静下来，说：“就这样吧。俺也曾经想写写，可还是怕。怎么说俺现在一个月拿1200块钱，‘食堂关’以后的事你那时在这，都知道，咋能跟现在比？说毛主席那时候好那是说瞎话。这样吧，俺说不了，以后想起一点就给它记下来，下次你回来俺一定给你。”

在农民负担方面，村会计翻出账本报数：1995-1997年，全村每人头分摊提留款达到320多块。那几年平均稻谷价格为0.55元/斤。以此数据计算，姜庙队那三年需卖稻谷约13.5万斤完成上缴，占全队稻谷总产量的一半左右。这导致农民不时打着招牌游行示威，有的一直跑到信阳。而我在插队日记里记载了1975年本生产队的稻谷收成15万斤，完成交公粮卖余粮纳战备粮、捐救灾粮等只有6万多斤，包括种子在内。那年全队人口253口，每口日均稻谷0.65斤。几个老队干证实那些年确实都在这个比例上下。与今年留在队里132口人分近30万斤稻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97年以后上缴逐步下降，今年人均大约只有70块，包括30元/亩的用水费在内。鉴于如今各家产量不会精确上报，只能估计。所有老农都估算全姜庙总产量在30万斤以上。即使缴纳完成姜庙全队也仅需2.2万斤稻谷，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我在农村时鸡蛋是老社员主要现金来源之一，当年称为“鸡屁股银行”；另一个来源是种黄麻收入，但这是以社员减少自留地种菜为代价的。当初，生产队必须摊派生猪任务，如果完不成交售则需买“任务条子”，相当多的社员就要卖掉本来便不够吃的口粮来交“任务条子”的摊派。如今所有禽畜类都早已不存在国家收购，固始的笨鸡蛋倘若煎或炒那色香味都堪称一绝，早在毛时代它就是香港市场的品牌。如今鸡蛋老社员全部留自己吃，收购鸡蛋极为困难。市场上笨鸡也要卖到9块钱一斤，粮食贵了，猪肉也贵了，市场猪肉卖9-11元/斤，精肉最贵。这与当初肥肉最好卖正好倒了个。

公社所在的石佛店镇已经扩大了好几倍，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富起来的农民买地盖起来的。一般事例不好调查，恰好胡洼大队一个堂侄女两口子也在镇上盖了三层楼，我就咨询了这两口子。他们经营着日用百货，一楼大店租给别人卖摩托车，除了租金收入之外，自己卖杂货收入每月平均有几千元。我询问他们时，恰好他们上安徽梅山采购板栗回来批发，这两天批发板栗净赚一千多。他俩认识在南京，拾破烂积攒了原始资本，可外边的艰辛又加剧了思乡之情，于是回到石佛镇，在镇中心国道边买地建房，转入固定的经营。说起在南京被四次驱赶的迁徙故事，那份艰辛也确实令人感动，这也是促使他们回归的原因。可侄女婿告诉我：“像俺们这样回来的，没几个。他们被赶得无所谓了，还在坚持干。”城市需要农民，但城市藐视农民，尽管不乏农民自己的原因。

返乡思考

在信阳，已经在外贸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华林，也有着对农村问题的思考。由于在固始插过队，又因工作原因多次返回之经历，告诉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乃至于干脆留在宾馆我的房间里过夜。不仅固始，信阳地区其他县份也有类似的状况，农民流向城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华林说：但固始有特殊之处。泉州人寻根寻到固始，如今泉州与固始结成对子，搞过好几次联谊活动。现在说郑成功的老根就是固始，他收复台湾的军队，固始人就非常多。如此，台湾的所谓原住民，相当数量的先人即是固始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前两年台湾来寻根的原住民捐给固始高中新建1100万元，这个新建的校园就命名为“慈济高中”。中央电视台报道过，现在在国家歌剧院施工的队伍中，就有几支固始农民组成的施工队。而且，施工质量还很不错。信阳地区大约有1/5以上外出，固始县官方统计约50万人外出打工。我曾经在媒体上看见过固始是中国第一人口大县的报道，那里介绍说这个县有256万人口。但此次了解到，官方曾经统计人口数是156万，估计实际人口应在170万以内，仍旧是第一人口大县。

应该说，农村的实际产出是非常低的，固始全县分为33个乡镇，601个行政村，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无可争议的是，这个县外出农民挣回来的钱，县里的GDP没有反映，而这个数字据测算约为县GDP的三倍。而且，农民对于缴纳是抵触的，仅以瓦坊村为例，就欠税费超过100万元。若以今年的应纳额度计算，欠4.5年的税费。在与乡干部的讨论中，我认为应该彻底取消农业税，他们也赞同这个观点。即使彻底取消，以瓦坊村为例，约3200亩耕地亩产平均1200斤计算，总产稻谷不过384万斤，以目前的售价0.685元/斤计算，也只有263万元，人均822元。除掉农业直接投入，净收入不到600元。以此计算，根本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倘若按4口之家考虑，即使全家不吃不喝，要建造如今的房屋也得20年左右的全部收入。那么目前的小康或富足是靠人口减少和外出收入创造的！

如此，我们不由得思考几个问题：减轻农民负担是否解决得了农村问题？其实，减轻农民负担其实只是缓和农民与政府矛盾的麻醉剂。根本解决农民负担的途径仅仅在于减少农村人口，而真实和永恒地减少农村人口，惟一的途径在于土地市场化，如果我们不说土地私有化的话。持续至今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一种为维护毛式农业体制的面子而设置的权宜之计，它其实是以近乎原始的小农经济来摆脱毛式体制造成的桎梏。当桎梏刚刚崩溃之时，是有其效果的，但这种短期的效果并非康庄大道。妙就妙在，当初因维护“祖制”却又要使农民放心而制定的“三十年不变”，恰恰使农村的改革走到了尽头。危机体现的一个事实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不能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无法形成；又一个事实是，农村基本建设非但不能进行，原有的设施还在荒废或破坏；第三个事实是，农村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国家很快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三个话题都可以独立成章，此处不赘。

如今的村民小组、村委会、乡，完全是过去生产队、大队、公社的翻版。无论地域、人口、组织机构，完全没有变化，只是换了个称呼而已。当农村经济已经变化的时候，这些换了招牌的机构依旧原封不动地延续着，说农村改革走到尽头，是指这些组织机构已经妨碍农村的发展。这些组织机构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只是负担，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它们沿自列宁的苏维埃制度，可那个制度还在创立之初就遭到有识之士的置疑。例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就指出：苏维埃制度“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被称为“世纪智者”的伯特兰.罗素指出：“社会主义形式多种多样。以国家作为雇主，所有人都从它那儿领工资的这种社会主义，包含着暴政和阻碍进步的危险”。历史已经证明了此类预言并非危言耸听，可至今农村还延续着这些组织机构，危机便不断地显现出来。仅仅靠“减负”这类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其实已经揭露了这些组织机构与农民尖锐对立的极端情况，至于尚未激化成如此剧烈冲突的事例，农村已经遍地都是。而此书之遭遇却可以借用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一段话来说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复杂，把它们都撤掉，让广大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天不但不会塌陷，阳光还会更灿烂。当一个村民小组长无所谓地把全体村民的姓名填到选票上的时候，那些被填上姓名的农民们其实是在藐视和嘲弄这个体制。如果继续探究这个体制的本质，它根本不是农民利益的需要，而是统治农民的手段。当列宁同志把向广大工农灌输革命理念视作根本，而且借助专政手段来实现这种灌输时，利益的根本对立就已经存在了。以后的一切政策和策略，都只不过是在调和这种对立、往墙上的裂缝表面涂抹稀泥以掩饰它罢了。事实上，如今的村委会已经如强弩之末，一位村支书戏说：“俺现在只有两件事：左手抢钱，右手杀人。”所谓“抢钱”，指征收税费；所谓“杀人”，指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就在我到乡下的那几天，全乡都在抓超生的，没交完罚款的便扣在余庆学校的旧校园里。24日夜里，镇上所有的运营微型车都被征用去运抓到的人了，有个参加此次运送的微型车车主告诉我们：“关了有一二百人哩！”

可叹的是目前农民自己选择了这条根本之路，外出打工和做小生意，如此已经实际减少了农村人口。但有虚假性：这些人并没有彻底离开农村，他们基本上继续拥有责任田，三十年不变。在没有真正市场化之前，这个虚假性不能消除。农民在城市里尚无合法的永久生存地位，城市以及权力在拒绝农民离开土地，农民仍旧没有把根移至城市的可行性，于是，不得不把根继续留在农村，以防万一“政策变了”的时候还有生存下去的立锥之地。土地资源市场化，目前农民们已经实施。（是否合乎规定？）他们实施的办法是：不打算或不可能做农活的把自己的责任田包给愿意做的，约定俗成的承包支付为：100斤稻谷/亩。一种以物（稻谷）易物（责任田）的市场经营方式，他们还打破了旧框框，跨越村民小组甚至村的界限经营。

几天的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只能算是一些粗浅的印象。更何况那么多农民的中坚都在外漂泊，他们会“叶落归根”吗？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暂且抛出来，仅供老知青们参考。

2005.12.1

小毛是我东北插队时的同学，他本不该去的，因为他患有智障，虽轻微但终属免下对象，可他还是和我们一起下到科尔沁草原，在乡下闹出了许多笑话和故事，这些笔者在《插队记事》和《护送小毛》中多有叙述。

这么多年过去了，小毛怎样了呢？

有人说小毛回沪进了一家工厂，送送货，很自在的；

也有人说小毛智障愈发地利害了，蓬头垢面在街上被孩子追逐；

还有人说小毛早就没了，自他父母死后，没有人照顾的小毛突发脑梗死在医院了。

年前，突然有了小毛的消息！而且是十分确切的消息——他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老年痴呆康复医院——精神病院。

农历戊子年，正月初四的下午，我冒着暴雪之后的严寒，找了近两个小时。路旁、屋顶上的积雪尚未融化，有那么一点时隐时显的阳光，天还是那么冷。我走进一条十分静僻的小路，小路尽头是条不宽的小河，河上一座小石桥，桥的彼端就是康复医院的大门，门前晃动着几个身穿制服的保安，我从保安身旁走过，他们并未阻拦或发问。

眼前是一大片还泛着绿的草坪，委蛇的甬道掩映在绿树之下，四周种着茂密的花草树木，如果是夏天，一定鸟语花香，沁人心脾。这是医院？是老年痴呆康复医院？我真是有点疑惑了。几幢别致的小楼矗立在绿荫中，我走进离大门最近的一幢，里面静悄悄的，可能因过年，并不见忙碌的医生护士。好容易找着人，问及小毛，居然无人知道，细想这儿应该是门诊，小毛应当是在住院部。住院部大楼与门诊大楼有过道相通，走过去并不费事，可到了住院部，除了紧闭的扇扇大门，竟找不见一个人。我一扇扇地拉那大门，都紧紧地、严丝合缝地没有一点余地。我见到玻璃门里有人活动，就咚咚地敲，朝里大声喊：“小毛…小毛…我找小毛…”。里面的人凑了过来，一个个穿着蓝条子的病号服（在我看来与囚服没有两样），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一脸的茫然。

我的喊声终于有了作用，里面走来一个女护士，她拿一张磁卡在门里的墙边刷了一下，门开了[微软用户1][微软用户2]。

“我找小毛，他是在这住院的。”

“小毛？女的小毛在楼下，男的小毛在后面的楼上。”随后门就关上了。居然有两个小毛！

到了后楼，从一层敲到三层，终于被放进了一扇大门里。

“我是小毛的朋友，我能见见他吗？”我十分感激地对开门的女护士请求道。她转身对一旁穿着蓝条子“囚服”的汉子：“去，叫小毛！”汉子朝深深的筒子楼走廊里喊道：“叫小毛……”只听里面 “叫小毛……叫小毛……小毛……”一声声传递着。随着叫声的消失，几个蓝“囚服”蹒跚走了过来，他们打量着我，我也在打量他们：哪个是小毛？这么多年，我还能认得出来吗？

一个身影朝我走来，稍稍弯曲的脊背和僵直的步履，我断定他就是小毛，我对这个踱过来的人问：“小毛，你认识我吗？”我以为，他可能已经不具有识人的神智了，再说分别三十多年，自己的音容笑貌都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会认出的。没想到他脱口而出：“怎么不认识，你是河水！”闻此，我十分高兴，他并没有痴呆！

我们在过道尽头宽敞明亮的客厅兼饭堂坐下，再看小毛，他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深凹的眼睛和瘪瘪的嘴，才57岁的他竟然尤如77岁一般的面容，除了欧洲人般的眼睛外，我已经找不着他当年的模样。

“还好吗？”我问。

“好？……还行……这儿……”他似乎在反问我，接着苦笑道：“你看看……这些窗子……”他用手指了指四周。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见四周的窗上都焊着铁栅，再见小毛和其他病人身上的蓝条“囚服”，觉得自己好似在监狱里。

我又问：“吃得好吗？”

“可以，还可以。”他回答着我，又意犹未尽地接着说：“好的，年夜饭吃得很好，菜不错！”

“喝酒了么？”我问。

“喝了，不，酒不能喝，是饮料。”他说。

我接着问：“可以看报纸、电视吗？”

“报纸有的，电视也可以看的……喏……”他指了之墙角悬挂着的电视机。

这时，一个蓝“囚服”悄悄过来，紧挨着小毛坐下，嘻嘻地对我说：“领导，我…我…跟你说…说…点事。”我说可以，心想这精神病人能跟我说什么呢？兴许是发病了。他说：“我告诉你…你噢…小毛欠了我们一些钱，你能…不能把这钱还了……”

他的话音未落，小毛怒道：“你不要搞好吧，人家又不是我单位来的，人家是我插队的同学！”只见蓝“囚服”赶忙站起来，说：“噢？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是你单位的呢……”边说边走开了。

一旁小毛自我解嘲地对我说：“这个人神经病！”

哈哈，小毛骂蓝“囚服”神经病！

自一见到小毛，我怎么也看不出他哪儿痴呆了，他慢条斯理地问我母亲好，弟弟妹妹们好，还问我家动迁后搬哪儿了。

他告诉我，从东北回到上海后，被安排进了一家冰箱厂，混了几年，后来突发脑梗，住院一年半，其时母亲已经过世，全凭老父亲照料。那时真是痛苦，躺在床上，四肢不能自主，连吞咽都有困难，父亲硬是一把屎一把尿地护理他，直到他恢复健康，而父亲却撒手人寰。病好后的小毛无法再上班，长期病休在家，由于无人照料，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完全一副精神病人的模样了。

他还告诉我，住进这家医院已经八年了，这儿条件很不错，六个人一间房，有报纸、电视可以看，只是没有自由，窗上的铁栅栏已经说明问题。我不知道春暖花开时，医院会让他们到草坪去散步吗，会让他们去享用温暖的阳光吗？如果不能，那么实在是资源的极大浪费，那么好的周边环境，就白白地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么？

我要走了，我对小毛说我还会来看他的，并表示还会和更多的同学一起来。小毛没有什么反应，我将带来的糕点、酱鸭给他，说“如果觉得好吃，下次来我再给你带”，他依旧没有兴奋，只是用手无目的地翻看我带给他的东西。我突然感觉到，我买的食品不一定适合他，因为我还是以几十年前他的爱好买的，也许酱鸭并不一定嚼得动，看他瘪下的嘴巴里估计已经没有几个颗牙齿了，幸好我买了好多的面食点心，这些他是能够吃的。

在门口，小毛以他特有的习惯动作即用手腕将手向外摆动与我告别，我们来不及说更多的告别语言，厚重的大门就自动关上了，隔着玻璃，我作了一个再见的动作，见他已经返身回去了。望着他的蓝条子“囚服”和那蹒跚的步履，我觉得他是在走回监房。

我一定会再去看他的。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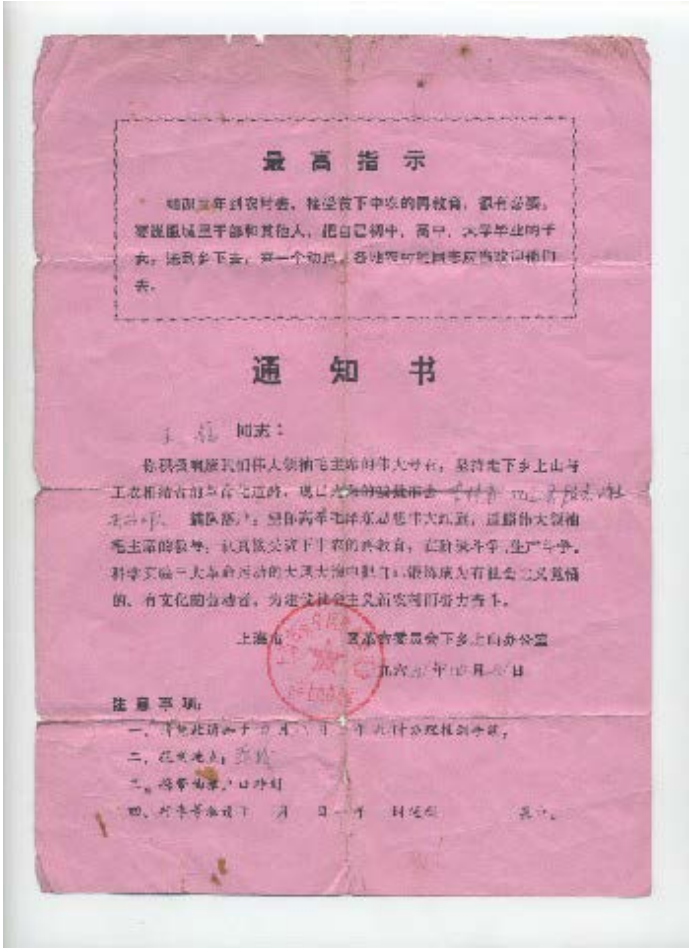
下乡五十一年纪

1969年，春天来的特别早，4月初，人们已经脱下了棉衣棉裤，年轻人甚至穿上了衬衣。然而，在4月15日这天，寒流不期而至，人们齐刷刷又裹上了厚厚的冬装，这天，正是我们下乡出发的日子。

今天，2020年4月15日，五十一年前的今天，我与上千名来自上海各校的学生一起，从彭浦车站乘火车出发，就此别过上海，前往东北边陲，开始了人生最为坎坷的旅途 —— 知青生涯。

这些知青，在此后十几年中，有抽调工厂的，有推荐读书的，有当兵的，有辗转回到上海的，也有似我这样，直把他乡作故乡，客居至今的，而最为不幸的是那些一去再不复返，身骸永留异乡的知青们！

这张上山下乡通知书原件，保存了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最高指示

通知书

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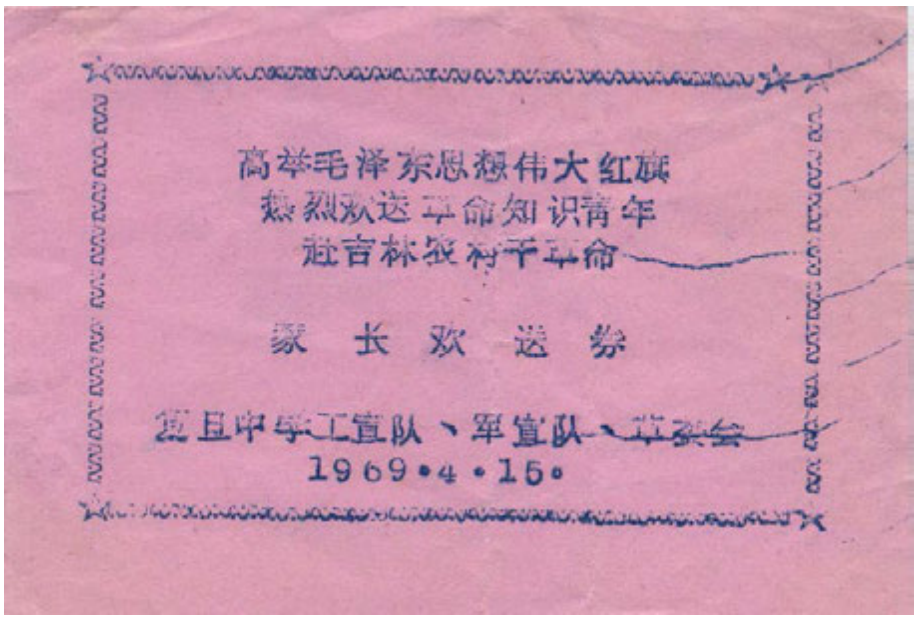
注意事项：

请注意下图，这张“家长欢送券”的日期：1969年4月15日，多少老知青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

同列火车出发的有长宁、静安、卢湾、黄埔、徐汇等区各校的学生，分别前往四平地区的怀德、梨树和双辽三个县。

其中，梨树就在四平市郊区，怀德则介于四平市与长春市中间，交通十分方便，而双辽县则与内蒙古交界，濒临科尔沁大草原，是退化的草原与沙漠相交之处。

本“美篇”第一张照片就是当年双辽的草原风光。



4月17日，知青专列车经沈阳，不满十六周岁的女知青王玲，给家里发了一张明信片，这是下乡伊始的第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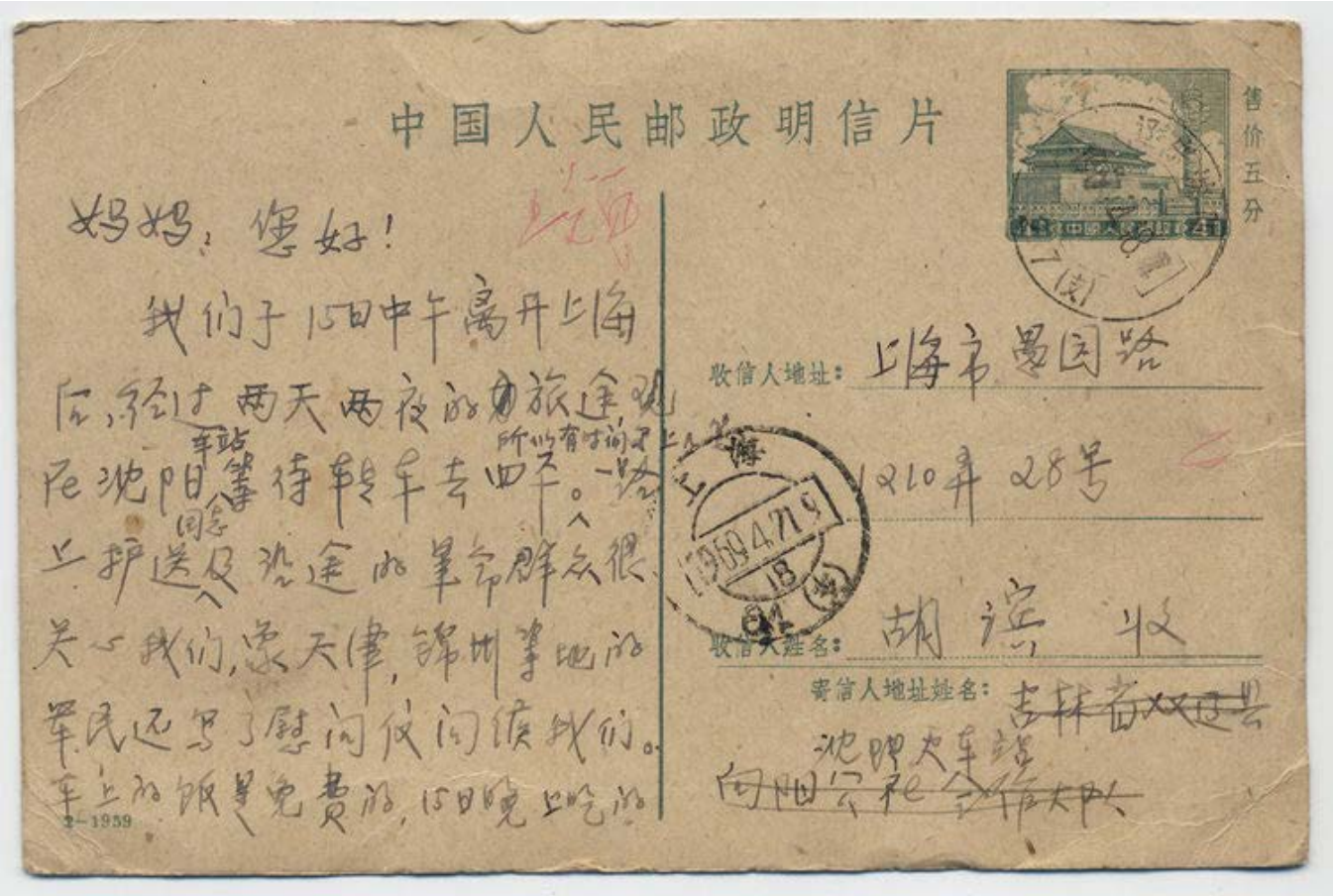
我们的目的地是：吉林省双辽县向阳公社合作八队，而这个地点，却是一路几番周折才最后确定的。

王玲的下乡通知书是去“双辽县服先公社天兴大队”，而我的则是“双辽县桂花公社先进大队”，直到沈阳，才正式通知我们去“双辽县向阳公社合作大队”。

估计分配组合是带队负责人在列车上进行的。

我们分在一个生产队的有18名知青，9男9女，分别来自上海市长宁区的7所中学：武夷中学3名、长宁中学3名、娄山中学2名、天原中学2名、泸定中学3名、天山二中2名、天山中学2名，另有一名系社会青年。这些学生中最高文化程度仅初三，其中两名有轻微智障，生活勉强自理。

下图是王玲在途中写给妈妈的明信片。



一路上青年学生并没有表现得多么忧愁和悲伤，相反，大多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没有一个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也无从知道会天天没日没夜地与土地、庄稼、粪肥打交道，他们心目中的农村，是阳光、绿野、牛羊和新鲜甜美的空气，如下图。

当大家经过三天三夜车马劳顿，看到草原上几排低矮土屋就是自己归宿的时候，个个心里五味杂陈，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下图是2018年拍的照片，土房虽然依旧是土房，但这房子已经比当年讲究多了。

此时家家有了不错的院子，有的院子还很大。

秋日的场院，散乱堆放的秫秸和茬子，说明农民现在已经丰衣足食：否则对这些宝贝不会如此漫不经心。

看看当年知青住过的房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样破烂不堪，但可以想像：能好到哪儿去？

我就曾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在炕梢蜷缩一夜，因为被褥全被房顶渗漏的雨水浸透了。

如今，偶尔吃到大饼子（玉米粉贴在铁锅上蒸出来的饼子），觉得很好吃，这是日日大米、白面吃腻了，换换口味而已，当年一日三餐顿顿吃它，且下饭的是没有一点油水的咸萝卜条，直吃得烧心，见到的大饼子就反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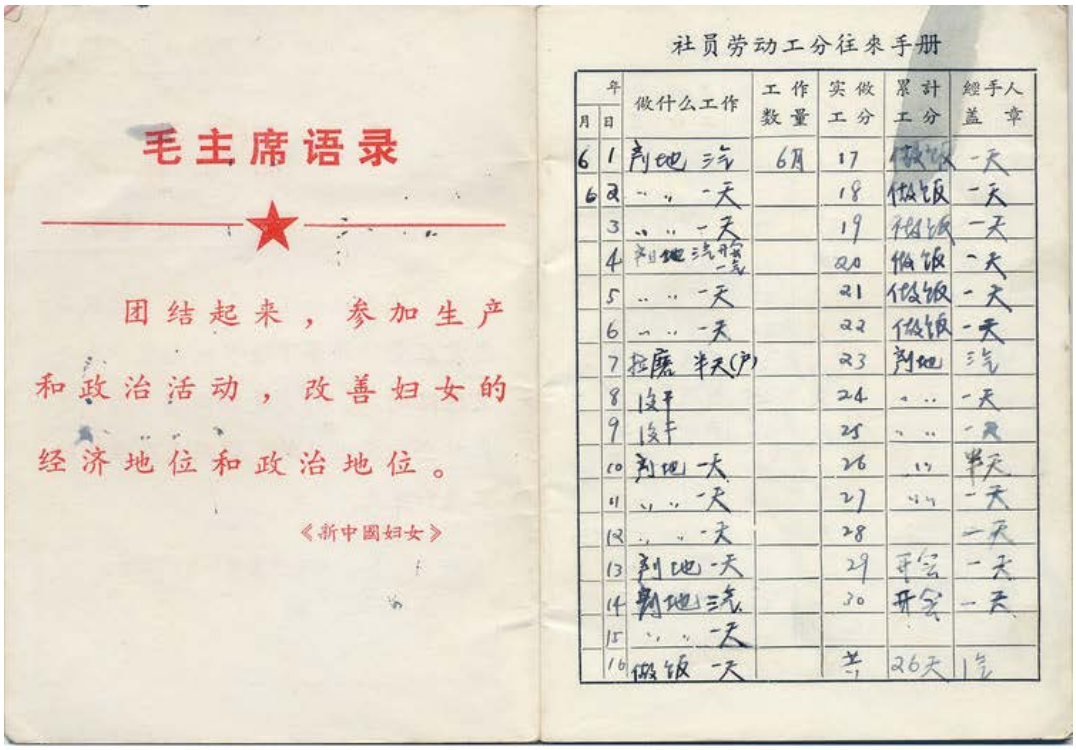
下图是2016年老乡特意为我们做的大饼子，他们说已经难得吃这个了，有时孩子馋了才做那么一两回。

吃的就不提了，实在馋极了可以吃家里带来的糖果、饼干、罐头，也可以用带来的毛像章或日用品跟老乡换点鸡蛋，而每天农活的劳累是躲不过去的。

最累的时候，队长凌晨三点半就吹哨了，晚上要九点左右才回到屯子，中午都是队里派人把各家各户的饭用毛驴车送来，在田头就着风沙吃的。

晚上，我们常常回到集体户，还没有来得及吃饭，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下图是知青王玲的工分卡。



毛主席语录

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新中國妇女》

社员劳动工分往来手册

年 月	日	做什么工作	工作数量	实做工分	累計工分	經手人盖章
6	1	剂地 三气	6月	17	做饭	一天
6	2	〃 〃 一天		18	做饭	一天
	3	〃 〃 一天		19	做饭	一天
	4	剂地 三气开会一气		20	做饭	一天
	5	〃 〃 一天		21	做饭	一天
	6	〃 〃 一天		22	做饭	一天
	7	拉磨 半天(户)		23	剂地	三气
	8	没干		24	〃 〃	一天
	9	没干		25	〃 〃	一天
	10	剂地 一天		26	〃	半天
	11	〃 〃 一天		27	〃 〃	一天
	12	〃 〃 一天		28		一天
	13	剂地 一天		29	开会	一天
	14	剂地 三气		30	开会	一天
	15	〃 〃 一天				
	16	做饭 一天		共	26天	1气

社员劳动工分往来手册

年 月	日	做什么工作	工作数量	实做工分	累計工分	經手人盖章
7	1	剂地	一天	16	种台	一天
	2	剂园地(户)		17	剂地	一天
	3	剂地	三气	18	〃	半天
	4	栽茄子	一气	19	剂地	一气
	5	民兵训练	半天	20		
	6	〃	一天	21	拔麦	三气
	7	〃	一天	22	拔麦	三气
	8	〃	一天	23	拔草	一天
	9	〃	一天	24	剂地	一天
	10	〃	一天	25		三气
	11	开会	三气	26		一天
	12	开会	一天	27	队户	一天(各半)
	13	没干		28	零活	一天
	14	没干		29	零活	一天
	15	没干		30	剂地	三气(一气同)
				31	学习	

社员劳动工分往来手册

年 月	日	做什么工作	工作数量	实做工分	累計工分	經手人盖章
8	1	剂地和填圈	一天	16	半天(户)	
	2	倒垢放秋垅	一天	17	打麦剂草	一天
	3	病假		18	挂草剂草	三气
	4	〃 〃		19	没干	
	5	拉磨三气	一气	20	没干	
	6	做饭	一天	21		一天
	7	做饭	一天	22		三气
	8	做饭	一天	23	扒麻	一天
	9	做饭	三气	24		一天
	10	开会	半天	25	推草	一天
	11	做饭	一天	26		一天
	12	〃 〃	一天	27		一天
	13	起土豆	一天	28		一天
	14	〃 〃	一天	29	腰部	一天
	15	剥麻	一天	30	介公路	一天
				31	做饭修路	三气

劳作的辛苦，食物的粗粝不算，知青的精神生活极端空虚，没有书读，没有报刊，因而没有知识的汲取和信息的获得，硬生生将正在求知年龄的青年学生熬成追求低下，认知浅薄，目光短浅的群体。一个个并意识不到自己是井底之蛙，还认真地向农民介绍什么“上海是一月革命风暴的策源地……”之类。

下图是上海发给全国各地知青的“精神食粮”。

2001年夏，全家第一次回到下乡的公社，那时叫向阳乡，受到乡里的热情款待，饭桌上，主人一声“感谢知青”，惹得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己。

在乡政府前，一起拍照的是乡长和书记。

五十一年过去，时过境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青阅历有人把它当作历练，有人把它当作磨难，有人说青春无悔，似乎天降大任于斯人。而我认为，无所谓“悔”与“不悔”，因为当年懵懂的我，并没有自愿下乡，是被那股洪水裹挟而已，没有资格“悔”与“不悔”！

这是2009年与集体户同学重返下乡的屯子，在村口拍照留念。

约四十年后，一起下乡的部分女同学，在苏州家中相聚。

后记

吉林省双辽县向阳公社合作八队集体户上海知青名单：

女知青名单

王月瑜、王 玲、永雯燕、严根花、严慰卿、

连慧斌、戴素华、姚璀晞、潘金玲

男知青名单

倪小毛、汪国方、刘建国、张正坤、陆优生、

胡存良、吴文虎、马守正、何国良

后并户过来两名女知青

陈广妹、孙洪英

近五十年来，失联的有严慰卿、汪国方、张正坤；先后故去的有刘建国、王 玲、吴文虎。

特别要纪念的是知青刘建国，下乡半年余，便急病不治，殁年仅仅18周岁：乡关既出不复回，荒野枯冢今难寻！

留言：

千里马

河水你是68届吗？我是双辽桂花公社知青。看了你的作品感慨万千

河水:谢谢你的转发，如果有与我集体户的是同学，我可以帮他们恢复联系。

千里马:回复 千里马：我转发了你的微博，反响强烈，我老单位有个叫顾复娣的看后说，有位是同学。

草根岩

看到你的美篇，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非常欣赏你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真实的记录了我们知青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河水:谢谢你的认可，知青命运与共，你的感受也是我的感受。

leini

很喜欢看知青回忆录。 我也用美篇写了《北大荒回忆录》 我是68年9月15日离开上海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北大荒是我第二故乡。 你们知青宿舍虽然很破旧，但还在，我们连队知青大宿舍已经倒塌。 知青经历将永久留在我的记忆中。

河水:你的美篇呢？想拜读。

河水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夙愿不再

夜深，网罢下来，到阳台上呼吸一下清新空气。正月刚过，半夜的寒气甚是逼人，只穿着毛衣毛裤的我很快就被冻透，这感觉使我想起几年前去东北的情景。

2009年8月与几个朋友突发奇想，打算到当年插队的乡下住几天，回味一下过去的感觉。于是几个人挤上一辆东风思域，一早从长春出发，前往与科尔泌草原接壤的松辽平原——吉林省双辽市向阳乡的沈家屯。

一路和风徐徐，尽阅东北大地美丽景色，大家十分愉快。时值中午，开出两百公里左右，阔别多年的沈家屯已经在眼前了。

车子顺着木栅栏开进老乡——当年的好友老严家，只见一辆大大的四轮拖拉机停在门口，想必老严的日子好过了，否则何以置得起这家伙？

果然，老严见到我们，一副喜气洋洋，待他一一介绍后，我们才知老严这些年岂止置了一台拖拉机，还有冰箱、彩电、摩托车、淋浴房等等。再看看老严的儿媳和两个孙子的打扮，和城里人毫无二致。这是一个偏远的农村，当年我们在时穷得吃不饱的地方，变化如此之大，实在让人欣慰。

看着老严家的条件，我们思量住几天的愿望不成问题。老严说隔壁有间空屋，可以让男士们住，女士则可和他家里的住在大屋。想起能回到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重新睡睡热炕，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心头一阵激动。

晚上一阵酒肉一阵絮叨过后，加之路途劳顿，大家都有了倦意。老严吩咐家里的给我们烧热水洗漱，我觉得这热天大可不必烧水，在家里我们还用凉水冲澡呢。于是谢了老严，就在门前的压井取水洗脸刷牙。等我们把水压上来，开始刷牙时，才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水如冰镇竟无法入口。既然已经斩钉截铁谢绝了热水，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用冰水洗漱了。想当年是怎么过来的，难道当年不洗脸刷牙？

好容易收拾完毕，我们与老严一起躺在西屋的热炕上，开着灯继续各自的话题。屋里有点热，我们开着门窗，这地方很安全，绝不会有流窜的小偷之类，过去唯一提防的狼，现在早已经销声匿迹。

“啪”地一声，一个大虫子落到我的脸上，用手一抓，是个“蜊蜊蛄”，硕大脑袋，两只前爪在舞动，我赶紧

扔了出去。只听“哧”一声，胳膊上又飞落一只碧绿的蝈蝈。同行的Z sir也是翻身爬起，说脚上有动静，估计是有蚂蚱或蟋蟀什么的。老严说关了灯就好了，果然，关灯之后只听见外面虫儿的合唱，再不进屋“骚扰”了。

然而，这炕却越来越热了，几十年没有睡过热炕，我想象着当年那美好的热炕头的感觉，可要适应还真不容易，我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到下半夜，炕不那么热了，才迷迷糊糊入梦。由于晚上喝了不少茶水，睡不一会便憋不住要起夜。

披衣出门，外面却黑得什么也看不着，城里待惯了，已经不知道农村的夜晚是什么样。我只好回到屋里，取出箱包里自带的电筒，朝屋后的茅房走去。走到房后，冷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这么冷！呵，这哪是夏天，简直就是冬天啊。等我方便完，只觉得已经冻个透彻，只后悔没有多穿些衣服出来。一早起来，我喷嚏连连，看同行的几位，大致和我一样，Zsir更是开始发烧，感冒了。

早饭后，我们几个商量在乡下的活动日程，因为我们本来是打算在此住两三天的，可现在大家一致提出不再过夜，才在乡下住了一宿，怎么原先那种寻旧的愿望都一下子消失了呢？

城市住久了，才发现当年熟悉的农村其实是很陌生的。我们用不惯满是污渍的茶杯，吃不了咸得发齁的菜肴，受不住烟草大蒜的混合“香味”，还有屋内的飞虫、露天的茅厕以及烫人的火炕，一时都难以适应。既然“来去自由”，大家便意见一致地决定走了。

说走，多少有点遗憾，毕竟几千里之外的故地重游不那么容易，而且还有想见的老乡没有见到，想体验的生活还没有体验。可是，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们，安逸的日子，已经消磨了我们的激情，曾经梦寐多年的夙愿，到此也浅尝辄止了。

2012-02-27

河水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青年队大门

不管知青生活是苦是甜，留下的都是难忘的回忆……

这扇大门在每个西里知青的记忆中都会占有一席之地。二十四年前，当我们背着背包，唱着歌走进这个大门时，每个人都开始了他或她生命中的一个新的篇章。这一篇也许平平淡淡，也许轰轰烈烈，也许留下了温馨的回忆，也许往事不堪回首，也许成为生命中向上的一个台阶，也许要用生命去谱写……。相识或不相识的年轻人在这里相遇，相伴，从这里开始了生活，又从这里各奔东西，走向了另外的生活。门里门外，曾经演绎着人生的美好，人生的无奈，人生的遗憾……?

这扇大门就象一个时间隧道。走进去，就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门里站着十六，十七岁的我你他，站着我年轻的知青朋友们；走出来又回到了今天，你我已有了各自的世界。

二十多年前的每个清晨，在太阳升起之前，总能看到一群朝气勃勃的年轻人背着锄头，或唱或跳，或打或闹地走出大门，走向田野，开始一天的劳作；一头被鞭子胁迫着的老牛，拉着永远都不能自己启动的拖拉机，走出这个大门，直到轰鸣声响起。每个傍晚，太阳落山后，从这个大门望进去，能看到一盏盏油灯在一间间宿舍点燃。有人

在下棋，有人在看书，有人在写日记，也有人在自以为是地谈论国家大事。冬天的夜晚，还能看到一个个温暖的炉火以及围着火炉一张张年轻的脸。？

我在这儿度过的三年乡村生涯里，也曾驾驶着队里的拖拉机，一次次从这扇大门出出进进。出去时怀着对新一天的希望，回来时看到这扇门，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大门内我们可以看到同伴们期待的目光，盼望的眼神；温暖的炉火旁我们可以诉说长途远行的辛劳，谈论路上的见闻。？

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从地球的另一端远渡重洋，飞越崇山峻岭，又一次站在这个大门前，看着门上生锈的大锁，满目荒芜的院子，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只觉得泪水往眼睛里涌。不是痛苦，不是欢乐，只是一种感伤和无奈，不知不觉已过了二十四年。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呼伦贝尔情

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是内蒙东北部一个盟，面积25万平方公里。东与黑龙江省相连，西北与西南分别与俄罗斯、蒙古交界。被浩瀚森林覆盖的大兴安岭由北向南，纵贯中部，东部是黑土平原--松嫩平原，西部是世界著名草原--呼伦贝尔草原。

我曾在呼伦贝尔盟插队下乡九年，在黑土地的阿荣旗辛勤耕耘，在加各达奇、牙克石、博克图、海拉尔、黑山头、额尔古纳、莫尔道嘎都留下我青春的足迹。因此，对三江平原的黑土地、对大兴安岭、对美丽的呼仑贝尔大草原，都有难以割舍的深情。

我返城后多次回呼伦贝尔草原，最应该感激的当是纪志国、吕淑芳夫妇了。现任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纪志国，他是1968年与我一起到阿荣旗下乡的北京知青。我在图布新公社，他在龙门口公社。纪志国下乡期间与一位农村老中医的女儿相爱，他们在阿荣旗成家，后来有了一对有出息的儿女。纪志国忠厚、干练，曾先后任阿荣旗旗长（县长）、呼盟水利局局长，为一方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的夫人吕淑芳率直、热情，现已退休。每次我到呼盟都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和许多在呼盟下过乡的北京知青一样，都关爱着我们为之贡献过青春的地方。1998年7月、8月，这个位于北纬48度线以北的呼盟农业旗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旗群众奋力抗洪抢险，死守向阳峪水库和那吉镇防洪大堤，保住了近在咫尺的北方工业重镇齐齐哈尔市，而全旗34万人口中25万人遭受洪灾。消息传来，在京的原阿荣旗北京知青千方百计伸出援助之手。

8月26日，我们以公司名义给阿荣旗寄去伍万元救灾款，并设法调动招商局在京单位捐献救灾物资支援阿荣旗，我与单位职工一起到火车站装车。时任阿荣旗委副书记的谭宏宇拉着知青代表的手说，这份来自老知青的情谊令阿荣旗干部、群众深受感动。

2002年6月下旬，我应纪志国夫妇之邀，又一次飞往呼伦贝尔。夏天的草原辽阔美丽，草原上绿草如茵，野花

五彩缤纷随风摇曳。莫尔格勒河、海拉尔河、伊敏河、根河在平坦的草原上萦绕回转，流入中苏界河额尔古纳河。草原的天空多是蓝天白云，难怪人们称赞蒙古高原为"蓝色的蒙古高原。"我与纪志国和他的女儿纪雁等一行人驱车从海拉尔回阿荣旗，途中穿越大兴安岭。初夏的大兴安岭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森林里，落叶松高大挺拔，樟子松郁郁葱葱，白桦树秀丽淡雅。满山遍野的花草，更是色彩鲜艳夺目。山中的云雾飘忽不定，松涛声让人赏心悦目，这里是飞禽走兽的乐园。由于在修路，我们的车经历了六、七个小时的颠簸方驶入阿荣旗境内。

在阿荣旗我们一行受到旗委书记谭宏宇等旗委、旗政府领导的热情接待。次日他们专程陪我回插队的图布新兴旺大队探望。在谈及阿荣旗城镇建设时，主人介绍了规划蓝图，其中除修路、建房、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外，准备在旗中心地带建一处王杰广场，既是做为家乡人民对解放军英雄王杰的纪念，又成为青少年教育基地，也做为旗府所在地人民文化休闲的场所。旗委书记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为阿荣旗王杰广场题词。我嘱咐他们按正常组织程序报请此事。

我带着这个任务回到北京，在正常组织程序顺利进行下，在我的海军朋友宋燕燕、田军的帮助下，2002年7月16日下午三时，迟浩田副主席在中央军委八一大楼接见了阿荣旗旗委书记谭宏宇、旗人大主任张洪珠和旗武装部政委，海军政治部《海军文艺》主编宋燕燕和我随同前往。

迟副主席对这几位来自边疆双拥城市的负责人十分热情，这位山东籍的上将笑着问谭宏宇，英雄王杰是我们山东人，与阿荣旗有什么关系呢？谭宏宇便将王杰烈士与阿荣旗的关系向迟副主席报告。并说多年来阿荣旗人民以做为英雄王杰的第二故乡而感到骄傲，呼盟和阿荣旗多年都是双拥模范市县，迟副主席听后很开心。

谭宏宇将那一本呼伦贝尔盟风光摄影集送给了迟浩田。从来都拒收礼物的迟副主席，却对这本讲述北方绿色净土的画册很有兴趣，他一边认真的翻阅，还不时提问。那天的接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超出了预定时间。直到迟副主席的大校秘书小声报告他还有外军客人会见，迟洁田才高兴站起来，将一幅他已经写好的大幅题词交到旗委书记的手里。迟副主席为阿荣旗王杰广场题词是："弘扬王杰革命精神，军民共建祖国边疆。迟洁田、二〇〇二年七月"。分手时老将军亲自将我们一行送到办公室外电梯门口，微笑着目送我们离去。

如今有独特魅力和文化氛围的阿荣旗王杰广场，已成为人们缅怀英雄和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汉白玉大型雕塑王杰像基座上铭刻着迟副主席酣畅刚劲的题词，它也凝聚着一位共和国的上将、一名老军人对边疆人民的一片深情。

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勤劳、淳朴的呼盟人民，黑土地上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金色的麦浪，分布在田野山间的村落，那里留下了我青春的汗水和今天由衷的祝福。

【梦随风万里】：

重返阿荣旗

2008年秋，恰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日子，我和刘晓明、郑鹤、纪雁等人结伴重返当年下乡的内蒙古呼伦贝尔阿荣旗。

金秋九月的阿荣旗，蓝天白云、枫叶丹丹、花团锦簇，漫山遍野大豆高粱都到了收割的季节。原阿荣旗旗委书记谭宏宇、阿荣旗副旗长梁文秋、原阿荣旗委组织部长林景章等人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三十多年故地重游，最让我们惊叹的是，阿荣旗首府那吉镇的变化。1968年9月7日，我们一千五百多北京知青，从北京火车站出发，抵达扎兰屯火车站后，换乘几十辆大卡车，长途颠簸进入阿荣旗，受到旗政府组织的群众和学生队伍夹道欢迎。我们这些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城里学生，除激动地向人群招手致谢外，更关心我们将要落户之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阿荣旗位于内蒙最东部的呼伦贝尔，背靠被浩瀚原始森林覆盖的大兴安岭，前面连接富饶美丽的黑龙江松嫩平原。从扎兰屯到阿荣旗沿途丘陵起伏，山上的红松、柞树林和白桦树郁郁葱葱、千姿百态、层林尽染。阿伦河从那吉镇旁静静流过。1.3万平方公里的阿荣旗只有十几万人口。那吉镇完全没有县城的样子，两条南北贯通的土路，大片低矮的茅草房，房前堆满柴草和木头桩子，房前房后是各家栅栏围挡着的菜园子。那吉镇内像样点的砖瓦房，大多是政府机构和公营单位。

当晚，我们住进了那吉镇的大车店。马车是阿荣旗主要的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东北的马车很是气派，两个胶皮车轮的松木马车，通常驾辕的马前面还有三匹拉套的马，黑土地的马高大健壮、龙腾虎跃。赶车的老板甩着大鞭杆上挂着红穗的长鞭，更是威风八面，那年头车老板在农村也算高级技工，比现在开汽车的还牛。大车店是马车夫、马车和马们落脚住宿的地方。

阿荣旗大车店是有两个足球场大，黑土加石头筑成的围墙，二十多间草屋一溜排开。院子里是一排排架在木桩

上的马槽，马大都膘肥体壮，望着那些白马、黄马、黑马、枣红马很是新奇。它们时而嘶鸣、踏蹄、嘻斗、或津津有味吃着草料。大车店里南北两溜大炕，足有百十米长，中间是一排装马料用的大缸。空气里弥漫着马粪、豆饼和老乡们抽的关东烟、取暖烧炕松木油子的味道。真是到了林海雪原，少剑波，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东北大屯子。街上老乡带狗皮帽子，穿黑袄的人居多。所以当年我们在阿荣旗，穿一身蓝是知青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十多年后，我们熟悉的那个关东大屯不见了，阿荣旗那吉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宽敞的街道四通八达，街边的绿化、道旁的路灯都展现着边陲小镇的北国风格。现代化的居民住宅、风格各异的建筑交相辉映。气势宏大的王杰广场，成为那吉镇居民休闲、晨练的场所。人们的着装与大都市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从熟悉的东北乡音，还能辨出这是那块留下我们青春的黑土地。最让人感动的是当年在图布新公社工作过的老同志闻讯赶来，争相前来探望，他们中大都年过七旬，有的身体还不好，但相见时亲人般热情，让我们热泪盈眶。那吉镇东山新建的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松柏常青，抗日联军的英雄们曾在，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在白山黑水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侵略、捍卫民族和国家生存，这也展现阿荣旗黑土地人文历史厚重。

晚饭后，谭宏宇书记兴致勃勃，带我们驱车绕城一周观赏。霓虹灯闪烁，景观灯五光十色，夜市人群川流不息。我记忆中那个满街跑猪，房屋破旧低矮的县城，在几代人努力下，已建成环境优美、民族风情浓郁的现代化小城。我们这些知青们对第二故乡的变化，真是感慨良多。

第二天一早，在旗领导陪同下，我们急不可待返回下乡的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现在已改为六合镇）。高等级黑色路面的国家级公路，取代了当年坑洼不平的乡村土路，一百多华里的路程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梦牵魂绕的兴旺屯，村口已经聚满了热情的乡亲。虽然历经几十年的日月风霜和人世沧桑，但熟悉的面容和声音，还是彼此很快就又相认。感人的场面让很多人不禁落泪。

刘晓明在阿荣旗下乡五年中，多是在小学教书。如今那些学生娃娃，都成了四十开外的大男大女了，刘老师的称呼声不绝于耳，她细细端详他们中的每一位，搜索着留在她脑海里孩子们童年容貌和记忆。

更让刘晓明感动的是那些大嫂、大姐们，青年点女生夏日曾在农家炕头歇晌，她们揣来香瓜、沙果给她们解渴。冬天在她们家的暖炕上，扒着炭火烤着土豆，嗑着瓜子，唠着家常。她们曾给了我们这些远在异乡的知青，带来过多少家人一样的温暖和关照。

我在人群中寻找着五婶一家人，五叔王国丰在辽宁建平县乡下教书，1957年蒙冤成了右派，一家人避难投亲来到了北大荒。她家三个孩子都相继是刘晓明的学生，王伯、王雁、王红，这么多年过去了，刘晓明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五婶家在青年点房子的前面，冬天多数知青返城，她家总惦记着知青点未回家的知青。五婶家有好吃的总揣给留守的知青。我一打听，她们一家，在文革后五叔落实政策后，已举家搬回辽宁了，没见到她们，我很失落。

村里的人见我们几个回来，前呼后拥像过年一样陪伴我们在村里转。兴旺屯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马架子（一种北大荒独有的简易窝棚）、泥草屋基本消失了，大都变成水泥勾缝石墙瓦房。土地分给了个人，家家户户大都用小四轮拖拉机取代了牛、马。图布新原来是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重灾区，老乡死于克山病的人很多，这是一种严重的地方性心脏病，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能幸免于难。现在由于食物结构和气候的变化，这种病在这个地区基本消失了，新一代的人都健健康康。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多数人家生活殷实。农活也没有生产队大锅饭时那么累了，剩余劳力许多人走南闯北到外面打工。当然懒人或缺少劳动力的贫困户也还有，但由于北大荒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温饱早已经不是问题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很多庄稼人懂得读书重要，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们出去上学，这个小小的山村，有二十几个孩子在外读中专，读大学，有的已经学有所成。在旗委欢迎我们的宴会上，旗委常委韩忠民致辞时深情的说，尊师重教、崇尚文化和科学是当年北京知青留给阿荣旗的宝贵财富。许多学有所成的人，包括县乡干部都感念，当年北京知青教书育人的往事。

当年我们知青点在村后八间红瓦房，房前有两排高高的杨树，树叶繁茂，睹物思人，如今这八间房已分隔成几家农户。在这里依稀记得知青伙伴们英姿勃发的身影和难忘的蹉跎岁月，我曾填写过一首《百字令》，记述这一场景。

"北国呼盟，长相忆，插队故地重游。红瓦八间石屋，虎虎生气曾住，檐下铁锄，炕上苇席，九年风雨未染愁。晨鸡催晓，伏垄耕耘何求?如今景色依旧，燕子归来，那堪岁月流。莫道人生无憾事，只是无心回首。炊烟茅草，黄花碧树，悠闲牧马牛，念艰辛，记否同舟战友。"我们回到刘晓明当年教书的学校，由于农村出生率降低和提高教学质量，各村学校都合并到县、乡两级，这所大队学校只剩一个老师和两个学生。这位老师恰是她教过的学生，刘晓明只记得他小名叫泉子，站在我们面前的泉子已是高高的带着憨笑的大男子汉了。如果说有缺憾的话，村前村后当年满山茂密迷人的树林消失了，生态环境倒退，人进林退的悲剧还在发展，阿荣旗森林面积在不断萎缩，农村基础设施依旧落后，靠天吃饭的状态堪忧。

我们还和旗、镇村干部去为下乡时的兴旺大队书记邱真扫墓。邱真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在文革那个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他尽其所能关照我们这些知青。在他担任大队书记期间，当年我们这个近二十人的青年点中，先后有七人当过队干部，四人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上世纪末去世后，我曾代表知青点知青为他修过墓，立过碑，墓碑落款写道：兴旺大队北京知青敬立。

我们这些北京知青三十多年后重回阿荣旗，受到阿荣旗旗委、旗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我们还参观了现代化的阿荣旗水泥厂和乳制品厂，参观了阿荣旗朝鲜族风情的度假村，他们还陪我们到大兴安岭深山老林一游。旗里有关领导自豪的告诉我们，阿荣旗已成为黑龙江齐齐哈尔和大庆等重工业城市，人们休闲度假的后花园。阿荣旗还是个农业旗，工业不发达，随着公路、铁路的开通，阿荣旗一定会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遥远的知青岁月已成为历史，但是东北黑土地，美丽的呼伦贝尔，我们的第二故乡阿荣旗，却永远在我们心中有抹不掉的特殊位置。因为我们的青春献给了黑土地，献给了阿荣旗。在离开时，我们也将最美好的祝福，留给了阿荣旗和阿荣旗人民。

百字令·重回阿荣旗http://hxzq05.d68.zgsj.net/Essay/6048.xml?id=6048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重返黑土地

1982年8月，团中央青工部安排干部分几路到全国各地去做工作调研，我被安排到黑龙江出差，我又回到阔别五年的黑土地。

在哈尔滨接待我的是黑龙江团省委青工部长迟春田、哈尔滨团市委青工部部长尹燕华、刘传江、孙伟杰等人。我们一起深入走访了哈尔滨三个大动力厂和伟建等几个大型军工企业。这些企业职工、家属加起来有上万人，厂区、生活区、学校、医院、商店、幼儿园、派出所一应俱全，俨然是一个小社会的样子，企业团组织机构、干部配备得很全，工作也各有特色。

他们还热情地陪我参观了松花江中太阳岛上的青少年基地。郑绪岚一首“太阳岛之歌”，把北国江城哈尔滨唱红了中国。夏日的松花江碧波荡漾，防洪纪念碑巍然矗立，太阳岛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我们十年前到哈尔滨的那一段往事，我们曾在哈尔滨北面齐齐哈尔附近的阿荣旗插队。1973年的冬天，我们六个男生结伴，从齐齐哈尔扒火车，途经哈尔滨，去看望远在黑龙江宝清县八五三农场插队的同学。宝清县八五三农场，那时已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那里是电影《北大荒人》里所说的雁窝岛的所在地。北大荒人那段有名的顺口溜：“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就是从这个电影传播出去的。那时中苏两国为了黑龙江的珍宝岛等岛屿的归属剑拔弩张，形势十分紧张。我们从齐齐哈尔车站溜上火车，几次躲过查票人员的检查，在一个寒冷的下午火车抵达哈尔滨站。冬天的哈尔滨到处都是冰雪覆盖，我们几个人无目标地在道里大街上闲转，被哈尔滨那些俄式建筑所吸引。当晚我们又从哈尔滨三棵树车站，登上途经牡丹江开往东方红的火车，我们在虎林县下车，然后搭兵团的卡车去宝清县。那次我们几个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林海雪原的宝清。

十年之后，我又来到了哈尔滨，不过已不是扒车来的北京知青，而是因公出差到这里。黑龙江团省委青工部、哈尔滨团市委青工部的同志们热情接待了我，他们为我完成调研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迟春田、尹燕华、刘传江、孙伟杰他们现在都已离开了共青团，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而我们都还保持着共青团为我们留下的亲密朋友的关系。

在哈尔滨工作一周后，我又奔赴此行出差的第二站大庆油田。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海峰知道我要去大庆出

差，她特意给大庆团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多多关照我。到大庆萨尔图后我被安排在大庆东风院招待所，在这之后的一周中，在大庆团市委青工部长陪同下，走访了大庆油田四分厂，大庆设计院和大庆石化等单位。大庆生机勃勃的油田，严明的工作纪律，科学化的管理，以及热情的大庆人都使我大开眼界。

石油工人招待客人的方式多少年后想起来还有些心有余悸，在采油分场我这个曾插队黑土地九年的北大荒人，也有些招架不住他们酒桌上的热情。北大荒人以他们特有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方式待客，加上团中央李海峰、李冰都出自大庆油田，他们说我是同志加亲戚，他们的劝酒方式让我无法拒绝，那天昏昏沉沉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如何回到招待所。

我出差的第三个目的地是齐齐哈尔，对这座北方重工业城市我实在是太熟悉了。自1968年从北京到呼盟插队，到1977年告别阿荣旗返京，在九年当中，我们多次乘68次、67次往返于北京、齐齐哈尔之间。那时在北京是夜间发车，到齐齐哈尔是晚上十一点多，经常是在北京过了春节，冬天回到齐齐哈尔。穷知青哪住得起旅馆，就在十分简陋的齐齐哈尔车站候车室的木条椅上熬一晚上，清晨天不亮就赶往市中心长途汽车站，排队买票。上午，从齐齐哈尔市搭乘长途汽车回阿荣旗。冬天的齐齐哈尔零下二、三十度，脚上穿的鞋都冻成硬块，寒风刺骨，那一次次苦熬的夜晚至今历历在目。

齐齐哈尔团市委牛书记亲自接待了我，我们一起到齐齐哈尔和平厂、一机床厂、齐齐哈尔车辆厂等企业了解团的工作，同企业团干部开了几个座谈会，基本上完成了来时部门交待的工作任务。我向团市委同志谈了想顺道回去看看我曾经插队的阿荣旗，他们都支持我回去看看。阿荣旗距离齐齐哈尔市有二百多里，我乘汽车跨过熟悉的嫩江大桥，经甘南县，三个小时后回到我下乡九年的阿荣旗。

当时阿荣旗的旗委组织部长林景章，曾做为旗工作队干部在我的大队下乡，老林人很好，我们很熟。老林见到我十分高兴，张罗着旗委、旗政府的领导和旗团委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于第二天从旗里乘车返回我下乡的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乡亲们听说我回来了，小小的山村热闹得像过年一样，大队书记邱真更是激动地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放下。在大队部屋里炕上、地下都围满了人，他们挨个问我原来青年点里北京知青们回城后每个人的情况，叫他们名字时还叫着当年他们插队时的外号，我一一回答着他们，大家真是开心极了。

那时经济体制改革已影响到农村，关于联产承包等问题，老实厚道的北大荒人又高兴又担心，他们实在是被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怕了，但他们也认为生产队硬捆在一起的经营方式没有出路。我尽我所能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回生产队的第一个夜晚，大家高兴得唠个没完，乡亲们很晚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仔细的看着这座熟悉的村庄。五年过去了村里变化不大，只是多了一些瓦房，少了一些草房。当年我在这里担任生产队长带他们盖的水泥结构大瓦房的队部，已分给几户人家住。我费了很大力气带着大伙垒起的足有足球场大的石头场院，那几天正赶上生产队散伙，按一家一户把石头分给个人，他们正在拆围墙、分石头，看着那分田分地正忙的情景，真有点说不出的滋味。但是哪种组织形式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应该选择哪种形式，这一点是没有疑议的。中国的农民太善良，也太苦了，跟他们一样当过九年农民

的我对这一点感触太深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农村制定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使农民继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后，又一次真正获得了土地，在土地上行使他们当家做主的权利，我很为他们高兴。

我沿着村西头的土路朝村后山坡上走去，在那一片熟悉的高高的杨树林后面，那一排一溜摆开的八间瓦房，曾是我们的青年点。如今人去房空，“王榭堂前双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那里已分给了几家农户。今非昔比，院子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敞亮，篱笆墙将院子分隔成几处。青年点房后小贝子山的树林已基本被人砍光，那片郁郁葱葱又有点神秘的树林已不复存在。

在村头，我见到一群当年妇女队长领着在地里干活的小姑娘，那时她们大都十六、七岁，她们见着我问长问短，竟然还管我叫：“林队长”。她们现在已大都是孩子的妈妈，有的还有了二、三个孩子，但从她们过早经历生活磨难的脸上，还能记起往日青春的光彩。

大队书记邱真对我们这些曾在这里下乡的北京知青有知遇之恩。当年他精心照顾我们，五年多不见，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他依然很关心国家的事情。他再三嘱咐我回北京带个话，让在兴旺插队的北京知青们有空回来看看。哪知道我们这次重逢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他在山上劳动时心脏病发作再也没有醒过来。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像我们兄长一样的大队书记，在也曾是北京知青，现任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纪志国等人帮助下，我们在兴旺插队的北京知青为他在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碑上写着：“兴旺大队党支部书记邱真之墓，原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北京知青敬立”。

我永远忘不了黑龙江，忘不了那块永远留住我们青春的黑土地。

《林小仲杂感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四十年前在一条叫做“罗沙”的风景秀丽的山沟里，绵延十几公里的土路两旁，散落地建设了代号为“01”“02”“03”“04”“05”的一串工厂。一批年轻学生从广州各个不同的角落，打着背包风一样的来到这里组建了“广东省拖拉机学校”，我们五十三名学生编入了一个共同的集体--“三连一排”。那是一个很抓狂很抓狂的年代，来得快也去得快，十个月后，我们又象沙子一样的撒向了海南兵团、四会农场、远洋轮船、海上炸礁工地，撒在了纺织机旁和铁道线上，散落在各个角落。在今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同学们又汇合起来，重返罗沙。

虽然前途未卜，但是这里风景不错，人也显得比较帅气了。

五人小团伙。

归来人。

小河边上，角度基本和旧照一样。

寻找我们的教室。

终于找到了！

在外面来一张。

到教室里再来一张。

合影中，当年的“三反分子”打出V字手势。

饭堂彻底垮掉了。

四连一排的教室也完蛋了！

“你们来的那年我生下第一个儿子”，“奥，你儿子四十岁了。”

学校革委会办公室。

在这间办公室里我偷回了自己的下乡报名表，逃避了去海南的命运。

毛主席还象当年那样微笑着。

几个女生特意邀请我参观她们的宿舍。

我非常感慨地大喊一声“四十年了，才第一次有机会踏进女生宿舍！”

几个女生一起说“活该叫你不早来！”

恩怨忘去，留下真情从头说。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中的山寨

金秋十月，我又回到已经阔别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我的第二故乡，天柱县白市乡改内村，那时叫白市公社改内大队。

二十五年前，我作为下乡知青，在这儿插队落户，过了整整八年。下乡的第二年以后，一同来的五个人陆陆续续地走了四个，只留下我孤零零地呆在这里，饱尝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个中滋味。生活的艰辛倒也罢了，最让人沮丧的是对前途的绝望。一九七三年首次招考工农兵大学生，辽宁省那个著名的“白卷先生”，因为交出了一张可以“名垂青史”的白卷而“考”上了大学；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因为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名落孙山。不仅如此，以后的招工招生，甚至连招民工修铁路都没了我的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得以顶替年迈退休的母亲回城。

八年了，别提它了。

过去，我总认为这八年的知青生涯是不堪回首的。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所有的幻想、梦想、理想，在这八年里全都被无情地埋葬了。我曾经狠狠地咀咒过这八年。回城后，梦中去得最多的地方，偏偏是这个偏僻的小山寨，偏偏是又回到这八年的时光。真是梦魂萦绕，挥之不去。

于是我知道，我是得回去看看了。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沉重地喘息着，距离改内村是越来越近了。

记忆中的改内，是一个离公路五华里、离公社十五华里的偏僻山寨，寨头有一大排粗大的松树，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山上流下来，贯穿寨子门前的小坝子，这可是全大队一百多号人的母亲河，滋润着一百多亩良田好土。那时的分配是“人七劳三”，一年的口粮也就是两百来斤谷子，一大堆红苕，还有玉米、小米什么的。乡亲们一年四季的主食是稀饭、红苕，只有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来了贵客，主妇才舍得煮上一鼎罐干饭，惹得早已按耐不住的小孩直流口水。那时的改内，吃水全靠路坎下的一口井，井口紧挨着一户人家的猪圈，遇上下雨天，路上的牛粪全冲进井里去，那水还得澄清了喝。邻队就产煤，但没有人家买得起，因此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大堆干柴，好在山上也多的是

树木。不过后来的几年，由于年年都要割大量木叶沤在田里作肥料，加上队里唯一的副业就是出售原木，乱砍滥伐的结果就是山上的树木日渐稀疏，原来苍翠欲滴的青山变得满目苍夷，打柴也得走上十来里山路了。我一个人，能下锅煮的东西不多，也就懒得到远处去打柴，每天拾些松毛什么的来凑合，让乡亲们见笑了。那时，多数年轻人都能拥有的家用电器，正象赵本山调侃的一样，只有手电筒。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每天清晨，几千年前就有了的石碓，发出悠悠的舂米声，成了我的起床号；而每天深夜，主妇们在一盏小小的油灯下不知疲倦地砍着猪草，菜刀在木板上的磕碰声，成了我的催眠曲。我将它们当作我苦行僧似的山中修行的晨钟暮鼓。

公路终于到了尽头，汽车陷入泥凼中不能自拔，只得弃车步行上山。

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只是人，不知还是不是那些人。二十五年过去了，人世早已沧桑，我当年的房东大哥腰痛的毛病好了没有；还有邻家的小兄弟，那时在白市中学读书，聪明好学，还能画得一手好画，只是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完全无用武之地，不知他现在可好。

走近小山寨，迎面走来一个中年人，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家住寨头的，不过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可能也瞧着我面熟，就用山里人特有的豪爽同我打招呼：“你要走哪家”？

我说出了我的名字。

我回来了的消息转眼就传遍了小山寨。

一个满头银发但身体还挺硬朗的老人闻声而出，急切地问我：“你还认识我吗？”“认识认识，你是培林，生产队的记分员，没记错吧”。“哎呀，是呀是呀”。

在喧闹的人群中，我终于发现了房东的小儿子，那时还是个拖着鼻涕刚上小学的小不点。很惭愧，我只记得他的小名叫猫崽，只好说：“猫崽，你爹还好吧”？“我爹过世都快两年了，”他说。

这一瞬间，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我回来得的确太晚了。

猫崽拨开人群，不由分说将我拉起就走，说：“你过去住在我家，今天也应该住在我家才是。我妈上我姐家去了，我马上给她打个电话让她回来”。“打电话？改内有电话了？”“有了”，猫崽骄傲地说：“城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了，不信你到我家里再看”。

走进寨子，最显眼的是那些个锅形的卫星电视天线，看来猫崽说的不假。我急切地寻找过去住的那个位于村头的小木楼，但它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小楼。人是物非，不免有些惆怅和失望。

与乡亲们围坐在久违了的火塘上，我一一打听还能记住名字的人，谁知大部分竟已不在人世了，心里徒增了几多物是人非的感慨。猫崽告诉我，邻家那个小兄弟，叫光泉，七九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在深圳工作，在他的鼓动下，全村有10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其中多数在深圳。猫崽的女儿也在深圳打工，“今年春节女儿就要回来了”，猫崽笑得一脸灿烂地说。

对我非常关心的吃饭问题，大伙七嘴八舌说，现在种一年田够吃两年，红苕也都用来喂猪，很少有人吃。我很

奇怪，现在全村的人口是过去的两倍，而田土并没有增加，怎么还能吃饱饭？猫崽说：“我们现在种杂稻，产量可高了。今年我那五挑田（不到一亩）就打了近一千斤谷子。就我和孩子她妈，怎么也吃不了，还不算别的田块”。“你们还割木叶吗？”大伙同声说：“不割了不割了，我们种田都用化肥和农家肥，这也是为了保护环境。不信你看这山上的树木，哪象当初你在的时候，连柴都没处打，天天烧松毛”。“现在你们烧什么？”“烧煤。这也是为了保护环境”。

村民们居然随口就说出保护环境，看来这地方这几年来的进步还真不小。

光泉的兄弟在村头开了个诊所，他自豪地说：“附近几个村寨的乡亲生病都来找我看。我是全村第一个种杂稻、第一个用打米机、第一个装电话和卫星电视天线的，前些年村里安装自来水，也是我第一个响应。明年我还要搞沼气，连煤都不用买了，也是全村第一。现在我们最缺的是路，要致富先修路”，他象大首长作报告似地说。这话出自一个身居偏僻山寨的中年人之口，才真正让我吃惊了。我试探地问：“现在谁当村长？”“再兴”。“你呢？”“我只是个科技带头人”，光泉的兄弟说。

正聊得起劲，猫崽的母亲我过去的房东大嫂回来了。二十多年不见，她显得苍老了许多，身材好象也矮小了几分，但行动起来仍然是风风火火的。大嫂一见面就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地摇，说：“你来看我来了，我真高兴。可惜你大哥死了，他可是经常念到你的，说你最造孽，大家都走了，就留下你一个，连饭也吃不饱。”她撩起衣襟，擦去泪花，“我一想起过去就忍不住流泪，你别见笑”。其实我心里也酸楚得很，说：“大嫂你别难过，过去大家都吃不饱，不是我一个人挨饿。但你家有好吃的从来没忘记我，是吗”。“那倒是，你造孽嘛。现在好多了，你想吃稀饭还吃不上了，大嫂没有时间给你熬”，她爽朗地笑了。

夜色降临了，大嫂端上菜，有猪肉、鸡、豆腐、刚从土里摘的蔬菜，自然少不了醇香的米酒。大嫂说，这些菜我们这里也不稀奇了，只要有时间上街买就是。

那一晚，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与乡亲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不知道究竟喝了多少酒，但却没有醉。

夜深了，送走了乡亲们，在大嫂家的老屋里，我终于沉沉地睡去。朦胧中，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直到清晨，大嫂家饲料粉碎机的轰鸣声将我吵醒，我才明白，昨晚上没听见的是砍猪草的声音。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回延安

离开延安那年我18岁，已经插队近两年。要去的地方是西安——由于我意外地成为最早被招工的知青之一，进了当年令人羡慕的“公检法”。

说是当“公安”，其实不过穿一身警服。我被分配到医院，干的是救死扶伤的营生，服务对象有警察，也有囚犯。铁打的监狱，犯人流水般一批批新生，而我这“刑期”一判就是20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落实知青政策的末班车才送我回到魂牵梦萦的北京。

这一年我已经40岁。

动身前最惦记的就是回一趟延安。结果办户口、给孩子转学、买车票、订集装箱、打包行李，恨不能再生出两只手，哪还有重游故地的闲暇？走的那天细雨蒙蒙，送行的多是我在异乡结下的挚友。隔着朦胧的车窗，彼此感受着缱绻的离别，看不出脸上流的是雨还是泪。

客居西北24年，回北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无情地抛弃了我。首先是没有工作，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只可供我养家糊口的饭碗；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把职位提供给我这个既无像样文凭，又无专业技能的“大龄青年”（幸而联合国卫生组织根据人类期望寿命，把“青年”的界限划定在45周岁以下）。其次，我觉得观念和习惯都已和北京人相去甚远：不会过马路，不会逛超市，甚至连公交车都不会乘——某一站下车，居然纳闷为什么找不到对面的返程站——毫无单行线的概念，最要命的是口音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打个车师傅都要问：“师傅您是北京人吗？”

苦苦奔波寻觅了8个月，才被现在单位的老板招至麾下。他以入木三分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样从小就在外面闯荡的人，肯定特能吃苦！”于是我就幸福地有了一个吃苦的地方。活儿很简单，能充分发挥我光说不练的特长——搞健康宣教。机会来之不易，我对它格外珍惜。8年过去了，老板换了3位，我这长工依旧当的兢兢业业。到了快知天命的年纪，WHO再也无能为力出个什么政策仍让我们充当“青年”，但是“知青”的身份却使我们永远与“青年”结缘，哪怕60岁、80岁、100岁！

人老了容易怀旧。转眼就到了想不怀旧都不能的年纪。所有的旧情旧事中，最让我怀恋的就是延安。回北京这几年，没少和当年同窑洞住的“炕友”联络，多次商定无论无何回去一趟，却因各忙各的，凑在一起着实不易，事情一拖再拖，就到了2000年春末夏初。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趟公差。我因参加央视一个健康节目的撰稿、宣传，奉命陪几家媒体的老记访问延安。其实当时并不想接这趟苦差，带着任务来去匆匆，根本不是我渴望的那种从容不迫寻根般的回访。架不住导演和制片撺掇，到底接了这趟活儿，顺道重返阔别30年的故园。

出发在5月的一个艳阳天。巴士载着我们在首都机场停机坪绕来绕去才找到将要搭乘的国产“运8”。和旁边体格健硕、神气活现的波音767、空中客车相比，“运8”就像老母鸡翅膀下一只底气不足的雏鸡。狭小的机舱只有48个座位，我们一干人马就占了近一半，光电视台就有两个摄制组，加上人民、光明、北青和晚报的记者，足有20多口。

“运8”飞起来动静极大，两个发动机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在强烈的气流中颠簸的飞机就像被疾风抛上抛下的风筝，搞得乘客格外紧张，不时有小姐女士发出惊恐的尖叫，连我这样久经考验的老出门客也不安起来，心想这飞机要是出点麻烦，中国新闻战线可就损失惨重了。

经过3小时飞行，我们终于到达黄土高原上空。透过密封不严的机窗，我不但看见了满目的浓黄，还嗅到了干燥的黄土味。就在心跳加快的当口，空姐娇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延安机场因沙尘暴关闭，飞机将改降咸阳机场。”猛跳的心，就像紧急刹车的发动机，一下子被卡在了喉头，一路上酝酿成熟的感情也无有了用武之地。

当掉头南飞的“运8”小心翼翼地降落在咸阳机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接着便为以后的行程发生了争执：有的主张放弃“运8”乘夜班火车赴延安，有的主张在咸阳住一夜仍乘“运8”。巧的是文字记者们个个惜命要坐火车，摄像记者则多是亡命徒坚持乘飞机，惟有央视大腕美工L先生同文字记者一样鼠胆，我当然也属于惜命的。最后的结果是扛摄象机的大胜耍笔杆子的，我们只得毅然决定将身家性命交给“运8”，我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位大腕美工，竟也是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

咸阳一宿无话。

第二天早上阳光灿烂。在清劲的西北晨风中，我们鱼贯登机。昨天的紧张心情随着沙尘暴的平息而烟消云散，心情变得和阳光一样灿烂起来。经过几十分钟愉快的飞行，再次俯瞰脚下的一片黄土，只见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梯田层层，绿云掩映，机上别人尚可，大腕L已两眼发直，口中念道：“悲壮，悲壮！”我的心也再一次开始狂跳。

延安机场位于市郊一片平川上。走下旋梯，情不自已，感情再次迸发，两行清泪水到渠成。有位好事的同行者透露了我的来历，引起主人的好奇。木然地随大家上车，两眼已不够用，农田、市场、教堂、街道疾速掠过眼前，宝塔山也终于闯入视线。

由于耽搁了半天，日程被安排得很紧。午饭后先到凤凰山将进行直播的工作现场勘察，接着参观枣园、杨家岭和四八烈士陵园。记者们大部分没来过延安，印象最深的是枣园。春光下园中草地翠绿土窑苍黄，一对父子正为游人表演歌舞，父亲40多岁，儿子20出头，都是典型的陕北汉子：高鼻梁，深眼窝，宽肩膀，高身材，父亲看起来比

儿子还帅，要是在老谋子的片子里饰个角色，肯定能一炮走红。他们唱一曲信天游，舞一段安塞腰鼓，尽情投入，旁若无人。一行人看呆了，鼓掌叫好喊“再来一个”。看我们真心喜欢，这父子俩也来了精神，一直到我们上车，还追在车后面载歌载舞，送出好远。我问陪同：“点一次歌舞要多少钱？”陪同回答：“给也演，不给也演。他俩老子是下岗工人，儿子是无业青年，天天来这里，挣多少算多少，还说给个工作都不换，他们爱的就是这号！”我听了心中一动，又觉有泪水想往出涌。

晚上当地政府为我们接风。席间我早已心不在焉，对昨天耽误的时间耿耿于怀——本来打算请老记们跟我回村吃婆姨们做的陕北饭，因还要去富县和志丹，这个节目只得被腰斩了。善解人意的司机小M问我：“你是不是特别想去村里？”我说“当然！”小M推开碗碟，一脸的见义勇为：“那咱走，我送你去！”

我插队的石窑村距延安25华里。山路似乎还是原来的山路，川道却已变得认不出来了，途经当年公社所在地河庄坪，昔日千倾田川已经变成长庆油田的一个福利区，一条整齐的街道，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猛一看竟以为是在北京。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作为标志的延河业已改道，好容易才找到看上去面目皆非的村口。

正是晚饭后，一群像是吃饱喝足的后生蹲在村头的树下抽烟闲聊（陕北少年多沾烟草），见了生人，脸上堆着好奇。我走上去挨个问：“你大（爸）是谁？你妈是谁？”听他们报出熟悉的名字，赶紧说：“快叫他们，就说北京来人了！”后生们鸟兽散的当口，我已在一个戴红领巾的女孩引导下，找到当年的会计杜修明家。

远远看见杜修明婆姨颤巍巍地在窑洞门口簸粮食，她居然没怎么变，只是老了许多。我上前叫了一声大嫂，那婆姨楞了一下，盯着我象看外星人。我忙自报家门，说：“怎么不认识了？”她辨认半晌，才一把拉住我，眼里便流下泪来，头一句话就说：“你咋老成这号了！”杜修明寻声出来，脸上表情惊愕，慌得把我往窑里让，一家子闺女、媳妇、孙子、外孙子，围了半屋子。大嫂二话不说，从衣柜里捧出一个衣衫褴褛、胳膊用铁丝栓着，鞋只剩一只，脸脏兮兮的塑料娃娃，说：“你看，这还是你给我们女子买的！”那一瞬间我吃惊之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杜家女子小时候极漂亮，我很喜欢她。我工作不久，一次杜修明来西安，一个月只有18块津贴的我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娃娃托他带给女儿，一转眼就是30多年了。将一个被没有玩具的孩子时刻惦记着的娃娃保存到现在，那得要怎样的上心啊！现在杜家女儿也有了一个漂亮女儿，我真该再买一个娃娃带来，要最时尚的那种，送给她的女儿！

忙着春种的男人们陆续收工，当年的玩伴来娃、喜明、大莲和娃儿等闻讯匆匆赶来。彼此相认，大家十分激动。30年前的小兄弟小姐妹，如今都当了爷爷奶奶，个个孙男弟女绕膝，最关心我“有孙子了没有”。我说：“惭愧，哪有你们人丁兴旺！”当年只顾响应晚婚计划生育的号召，仅有小女一个还在念书，平时在单位以为自己还年轻，哪里想过已到该抱孙子的年龄了呢？一一问起惦记着的老乡，闻知有的过得还好，有的年龄不算大竟然已经故去！来娃说老村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大部分人搬到了几里外的新村，所以不知道我来的消息。因怕耽误M太多时间，赶着回城，没来得及去新村见更多的乡亲，是我这次回村最大的遗憾。

第二天从富县回延安，来娃竟在宾馆门口等我，要请我吃饭。他说庄稼已经种上了，他比别人动手早，否则大

家就都来了。“节气不等人，你咋不多生些日子？”来娃真心地挽留。我说公务在身，以后一定再来。来娃告诉我，现在粮食吃不完，手上也有了活钱，家用电器基本置办齐了，还安了电话，“请你在延安最好的饭店吃饭都吃得起！”他得意地说。“算了，吃什么也不如请我吃‘肉夹馍’！”我回答。来娃还说，他和喜明、娃儿商量了，等什么时候闲了，相跟上逛趟北京，“看你们去！”那口气，再不是当年那个填不饱肚子、因营养不良不肯长个儿的大嘴后生。

几天工夫，走马延安、富县和志丹三地，汽车在绕着山峦沟壑的盘山公路上奔驰，那山，那水，那人，无不令人心动，也感慨多多。当地百姓依然贫困，但日子还是比从前好过了。

说句题外话，今年5月我们单位一个访问团到延安，接待单位（恰好去年接待过我们）还向他们讲起“某老知青”去年来延安寻访的故事——不小心在当地留下一段佳话，也是我与延安不解的缘分。

回北京后给来娃打过一次电话，他儿子接的。我说：“告诉你大，照片洗出来就给他寄。”用傻瓜机拍的照片谈不上任何“艺术”，只证明了我的到此一游。把它们拿给同事和朋友看，说起回延安的感受，不管人家爱不爱听，话就有点打不住。特别是跟早我两年回过村的炕友聊起来，更是没完没了，一说起就觉得留下了无数遗憾：遗憾没有来得及去“新村”见到更多的老乡；遗憾没有参观远近文明雕有佛像的“石窑”（我们村以它而得名）；遗憾没有再爬我们当年劳动必经的“大高坡”… …絮絮叨叨的像祥林嫂。30年难以割舍的知青情结，就这样又被重重地勾起来，我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种情结对于我的刻骨铭心。

有遗憾就会有向往，有向往就会有行动。延安我一定还要再回去，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再过几年！

写于2001-07-0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洞庭之春草长莺飞

这次沅江市组织原下放知青回访，原因是96年沅江市遭水灾，不但地处湖区的十个大“垸子”溃了九个，而且连市区都泡在水里达四十余天。原下放沅江县的近万名长沙知青，闻讯组织了捐款捐物的赈灾活动，迅速将价值二百多万元的钱物送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而其他方面的捐助，包括从中央到省里政府的，才一百余万元。于是沅江市一直觉得欠了知青一个大人情。98年我们下放三十周年之际，市里就想组织知青回访活动，也算还了这个人情。可没想到那年洪水又来得很早，且有超过96年之势。市里全力防汛，无暇顾及，以致拖了下来。今年是新世纪第一年，沅江市方面决心将知青回访活动搞起来，由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大家联合办公，抽调了很多人员，组织接待，从地方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将市内各宾馆饭店包下来，派车、船接送，共邀请了近六百名原长沙下放沅江县的知青，回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五一那天，我们的车队抵达沅江市，大家全体下车，列队步行进城。沿途一公里，不但有小学生组成的鼓号队，还有无数市民自发聚集到一起来迎接。看到这种情景，很多知青的眼泪都流了下来……

进城的知青队伍中，有身居高位的党政官员，有湖南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也有下岗工人、退休人员。但大家都并肩前进，除了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之外，腰还像当年下乡时一样，挺得笔直！

知青还组织了一支演出队，以年过半百之身，为沅江人民连演三场，场场爆满。节目中有歌有舞，可惜虫二已没了当年的威风，不敢上台献丑了（当年我可是宣传队的台柱子喔）。我有幸主持了一场“文艺恳谈会”，邀请了广州的教授兼作家郭小 东先生（《中国知青部落》的作者）和湖南本省的作家何立伟、何顿，与沅江市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了一次，不过是胡侃了一通。另外还有经贸、教育等专场演讲会。市里还派了车船，送知青们游览了南洞庭湖，然后各自下到原插队地点。

虫二照了一些照片，因不是数码相机，得等冲洗出来后，再贴上来请众网友、插友欣赏。请大家注意我的后续报道，我打算写几个这次见到的人物。暂时到此，虫二匆草。

2001-5-5

知青之家在水一方

五月二日，“重逢在沅江”活动组委会，组织前一天到达的六百余名回访知青，前往位于市区外十余公里处的胭脂湖风景区，其实不是一般意义的旅游，而主要是因为那里建立了一个“知青之家”，这一天正是开园仪式，迎接它真正的主人们。

我们分别上了七、八条机动游览船，迅速地驶上了清澈如镜的湖面。湖风扑面，有人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洞庭鱼米乡》。我所在的是第一条船，回首望去，后面数舸争流，船头旗帜飘扬，倒也有点浩浩荡荡的感觉呢！因还未到汛期，裹挟泥沙的上游河水还没注入洞庭湖，湖水显得碧绿如玉，被我们的船头犁开，飞溅起洁白的浪花。突然，隐约有鼓点声传来，放眼望去，船头一左一右，各有一条龙舟在奋力争先。我不禁感到诧异，明明离端午还早着呢，怎么就划起龙舟来了？我们游览船上的舵手忙解释，这龙舟一方面是为端午赛事练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恰是为今日知青来访助兴。船上的知青们向龙舟桨手们欢呼起来，那一红一黄两队桨手更加起劲，将龙舟划得如同在水面上飞。我们的机动船，竟然赶不过他们。眼见得湖岸渐近，一连串的铳炮声冲天而起，远远已可清晰地看到巨大的气球、彩带、彩门和密密麻麻的村民们。

在知青之家门外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园仪式，知青们列队走了进去。迎面是两座泥墙草顶的茅屋，不少人一见到这就热泪盈眶了。想当年，我们一万多长沙知识青年，就是在八百里洞庭的各个洲垸中，居住在这样的茅屋里，短则一、二年，长的有逾十年之久的。很多茅屋到后来墙颓

顶漏，还有“为秋风所破”者，竟在蚊帐上面蒙上塑料布遮风挡雨，蜷缩在屋角栖身的。不过到近前细看，却发现这其实已经是被大大美化了的：以前我们知青点的茅屋，墙壁都是芦苇杆缠上稻草，夹缠而成，外面再敷以泥巴，为防裂缝，再以牛屎敷上二遍、三遍，以致刚住进去时，一股牛

屎臭充塞鼻腔。而眼前这“家”墙却是用楠竹编成的，外面虽然还是敷的泥巴牛屎，但坚固程度已远非过去可比。那时湖区的小偷行窃，随手作案工具只携一把“禾镰”，即刃口有锯齿的镰刀，只要将人家的芦苇墙壁用禾镰挖上一个洞，就可以畅通无阻了。可这种竹编的墙壁，那禾镰显然是奈不何的。想想这种“改良”也有道理，既是作为纪念馆性质的所在，自然不能太过简陋，为的是能多经些时日，不然随时要修缮，也是笔不小的费用吧？但我觉得最不可原谅的疏漏是——大门边怎么竟没有狗洞？！那本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啊！那时我们的茅屋如果是这个样子，我的爱犬列夫从哪里出入？！唉，想必现在乡下养狗都不是当年那样普遍了吧？不然怎么把这设施都遗忘了呢？

知青之家周围被桔园环绕着，这也远比我们当年所处的环境优越。要是那时有这么多桔子树，我们还不得吃晕了？此时正当桔花盛开，浓香四溢（缺月对此应该是有深刻印象的）。当年下放在沅江县不同区的知青，分区属各派代表，种下纪念性的松柏树，又在附近吃了农家饭，有特色的是“蒿子粑粑”、“渣辣椒”等。

从沅江市到胭脂湖知青之家，途径正在修建的沅水大桥，那桥是通往洞庭湖中最大的岛屿赤山岛的，从赤山岛上另有桥梁通往茅草街，从那里直通南县。等这条道路开通，沅江市就又有了一条与外界沟通的通衢大道了。那对于沅江明天的发展，一定是会起巨大作用的。原来下放在此地长达六年之久，却从没有感受到过这种美感，是艰苦的劳作遮蔽了我们发现美的慧眼？还是今日的沅江经装扮才显露出我们不曾见识过的娇媚？“知青之家”虽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陋室，但沅江市把一万多下放知青铭记在心，以致为我们建纪念馆的情意，却深深地感动了我……

2001-5-6

–

虫二有个“替死鬼”

话说此次虫二随数百知青战友故地重游，重返沅江相聚，在第一天的联谊大会上，猛然见了一个人，当时双方不禁都愣了一会儿。然后四手相握，久久没有松开。旁边有知内情的同学抚掌大笑，

说，虫二啊，这不是你的替死鬼吗？怪不得你们俩这么亲热呢！

此话怎讲？说来话长。当年我在沅江县黄茅洲区插队落户，为了逃避水田里艰苦的劳作，每年都到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充当演员，常常能混上一、二个月，轻松自由，好吃好喝，还每天照记十分工。一来二去，我被县文工团（后来改叫县花鼓剧团了）看中，要调我去吃国家粮，当文艺战士。可惜虫二上辈子不争气，有个政审问题老通不过，县剧团年年到公社知青办来看我的档案，回回下不了决心让我登上这无产阶级占领的舞台。一拖就拖到了公元1972年年底，我得到了县里的内线消息，县剧团终于下定决心，要在这年的全县文艺汇演之后，把我调进剧团了。

虫二那段日子乐得走路都发飘，区宣传队排了一套节目，几乎个个里面都有我的角色。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小话剧，名字叫《南瓜生蛋》，是歌颂军民鱼水情的。贫农老大妈要送鸡蛋给附近驻军战士改善伙食，解放军纪律严明，死活不收。老大妈想出一个办法，送了一个自己种的大南瓜，部队炊事员认为值不了多少钱，就收下并付了钱。没想到南瓜切开时，里面是被掏空的，装着满满一南瓜鸡蛋。班长去还钱给老大妈，她却死也不认帐了……虫二就演那解放军班长啊！

可就在节目排成，准备到期去县城汇演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信。信是我妈写来的，她得了癌症，被五七干校送到广州开刀去了。虫二从小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见了这信自然什么也不顾了，坚决要去广州，或许还能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宣传队的负责人为了汇演时争名次，不答应我走，可我已经横了心，别说是他的阻拦，就是进县剧团吃国家粮的前程都已不放在眼里，当天就上了回长沙的

客船。后来我妈大难不死，虫二陪着她回到长沙，又多耽误了好几年，终于抓住机会吃上了现在这碗饭。这些事我在《我的母亲》中都已经细说过，这里就不用重复了吧？

回头说说我走后，我们黄茅洲文艺宣传队可抓了瞎！汇演已经迫在眉睫，虫二这厮经不起考验，在关键时刻竟然把受无产阶级专政的老娘看得比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还重要，这不是简直要让声名赫赫的黄宣队（黄茅洲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交白卷吗？得说由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组成的宣传队员们思想觉悟就是高，关键时刻顶得住、不退缩。缺了虫二这块料，你以为还就不做槽子糕啦？队长紧急指定了我的一位同学D“全程”顶替，硬是把我那一大堆角色都给兼了起来。

这儿得好好介绍一下D这位同学：他在校时，与我虽说不是一个班的，但却非常熟悉。原因是我

俩都是校田径队的，我跑短跑，他搞投掷，天天下了课就一块儿在操场上混。D膂力过人，手榴弹一甩就是70多米，铅球更是无人能敌。我们几个搞田赛项目和跳远跳高的同学，跟他比过胳膊粗细，人家那二头肌比咱俩还大！要是掰起手腕来，我们几个个个是他手下败将。可D却又是个腼腆内向的人，见了谁都是一付笑脸，你不主动找他搭碴，他绝不会先跟你说话的。下乡好几年了，虫二已经在黄茅洲和沅江县“扬名立腕”多时了，谁也没想到D竟然也会来参加文艺宣传队。想必那年他也是太急于来吃几天轻松饭，竟不顾自己从未上过台，悍然跟着我们这帮“戏子师傅”干起了抛头露面的勾当。

D在虫二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一定也承受过一段令人痛苦的思想压力。让一个只有站在台边上跑跑龙套经验的配角，突然担负起挑大梁唱主角的重任，这对于谁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虫二初次站到舞台中央时，也曾口干舌燥发不出声来。可那时候肯定已容不得D退缩，汇演就是政治任务，虫二逃了，你还能再逃？得了，林副主席不是说了吗：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啦！D硬着头皮真把那一大堆角色顶了下来！要不怎么说哀兵必胜呢？他准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据说，《南瓜生蛋》里那解放军班长，他演得既朴实又动情，比虫二那花里胡哨的几下子，更具有工农兵的气质呢！

县花鼓剧团竟真因为那生蛋的南瓜，将D招收为演员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包括虫二和D本人。在我辗转回城，又经历了好几年工厂生活时，我时时会重新梦想又回到了沅江那个舞台上。那年代身穿灰色大衣的“文艺战士”颇有些高人一等的感觉，虫二当然不能免俗。而D一旦真的将表演作为了职业，他的性格弱点也立刻暴露无遗了。他好像再也没有演过主角，也没在县剧团待太长的时间，几年之后就离开那里，被调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当了中学的老师。他这才得到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在那小镇上教书一直教到了今天。

D告诉我们，他妻子是当地人，生了两个孩子，还算听话。我看着他的脸，还是那么平静而又腼腆，我并看不出他有什么心理上的不平衡。我想，如果是我处于他现在的境地，我能如他一样泰然处之吗？我不敢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随风万里】：

我的草原恋

2012年夏，我们和几位女生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是我当知青时留下青春的地方。火车驶过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跨过宽阔嫩江的江桥，很快就进入呼伦贝尔境内。

呼伦贝尔地处中国东北部，东与黑龙江省相邻，西北和西南分别与俄罗斯和蒙古国交界，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它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发祥地。浩瀚森林覆盖着大兴安岭，由北向南，纵贯中部，成为呼伦贝尔东西部天然分界。东侧是黑土平原-嫩松平原，西侧是世界著名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拥有3000多河流，500多个湖泊，兴安岭群山耸立，逶迤南去。扎兰屯、勃克图、牙克石、海拉尔、满洲里，多么熟悉和亲切的地名，那里都曾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火车沿着大兴安岭山麓奔驰，车窗外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红松、樟子松、白桦树、柞树郁郁葱葱，偶尔还能看到熟悉的村庄和农田。

扎兰屯是呼伦贝尔的一个县级市，有内蒙古小杭州的美誉。1968年9月，我们一千多北京知青在扎兰屯火车站下车，换乘五十多辆卡车，去与扎兰屯相邻的阿荣旗下乡。1977年，我爸爸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在他为我四处奔走下，北京语言大学为我开出一张特困证明。1977年7月，我告别了下乡九年的呼伦贝尔，在扎兰屯火车站登上返回北京的火车。

当年并没有觉得扎兰屯如何美丽，或许经过这里时，大都是冰天雪地的冬季，归心似箭的我们，哪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当时觉得扎兰屯镇里建筑比屯子里好不到哪去，只是规模大，人也多。我认识的一些阿荣旗北京知青，他们1975年招工到这里，被安排到扎兰屯纸浆厂等企业。我们大队有一个女知青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五年，事后她告诉我，二十五年中，苦多乐少。扎兰屯地广人稀，森林茂密，河流清澈，是远近闻名的度假避暑区。我想起曾在扎兰屯生活工作过的韩冷老师，我与韩老师很熟悉。韩冷是著名的诗人和词作家，他的那首《草原恋》，沁人心肺，充满对草原生活深刻的感触，意境深远，且有哲理。加上曲作者张立中先生为之配上悠扬的蒙古长调，珠联璧合，将我们带到梦幻般的内蒙古草原，《草原恋》写道：

草原那，草原啊，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呀，马背哟，我生命的摇篮。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哺育，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

催眠。那朝霞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那白云似的绒毛为我抵挡了多少风寒。无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无论我离开你多远，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

牧场哪，牧场啊,我智慧的源泉，马蹬啊,马蹬哟,人生的起点。你用闪光的格言把我教诲，你用凶猛的风暴把我锤炼。那流沙般的岁月,给了我牧人的勤劳，那荆棘似的征程赋予我骑手的勇敢。不论我走到哪里,总看得见你在举目遥望。不论我离开你多远,也忘不了你美好的心愿。

这首歌也唱出我对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理解和眷恋。歌唱家德德玛用她那浑厚悠扬的女中音，将《草原恋》演唱的如神如画，充满浓郁的草原气息，能让人领略体味马背民族的坚韧与豪迈。

我们乘火车抵达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海拉尔河的重要支流伊敏河从城市中间穿过，海拉尔现更名呼伦贝尔市，它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座新建的城市。呼伦贝尔大草原展现给我们草肥水美、天高地广的风光。在海拉尔郊外的陈巴尔虎旗，登上著名的敖包山，望着蓝天白云下的大草原，牛群、马群、羊群在绿色的草原上游动。清澈的河水九曲十八弯在草原上静静的流淌，我不禁想起曾在这里拍过的那部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一对蒙古族青年男女对唱《敖包相会》，歌中唱到：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

莫尔格勒河畔，是呼伦贝尔最乡土本色的草原，它是中外驰名的天然牧场。成吉思汗曾在这里秣马厉兵，与各部落争雄。在金顶大帐里，主人告诉我们，全帐景点布局，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帐的缩影和再现。好客的主人为我们一行，在这里设宴洗尘，手扒肉、整羊席、马奶酒、醇香的奶茶，在这风景浓郁的蒙古包中，我们感受着成吉思汗子孙们的好客、豪放、热情。蒙古族的敬酒仪式，动人的呼伦贝尔敬酒歌：

举起了欢乐的美酒，放开了动情的歌喉。杯中盛满深深的爱，美酒醉心头。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朝着奔放心中走。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天南地北总是朋友。举起了欢乐的美酒，敞开了胸怀喝个够。杯中盛满深深地爱，喝一杯喜心头。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草原的深情心中留。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我们友谊天长地久。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我们友谊天长地久。

悠扬的马头琴再次响起，那是草原上的天籁之音，时而犹如万马奔腾，时而犹如百灵鸟在歌唱。蒙古族的歌舞令人终身难忘，姑娘们柔美的身段，小伙子刚毅的舞姿，多彩圣洁的蒙古袍，与蓝天白云和大草原相互衬映，美不胜收。蒙古族用敬酒的方式向客人表示敬意，一般连敬三巡。我们接过酒后，用右手中指蘸酒少许，依次向天向地向人间弹三下，表示敬天、敬地、敬神灵。主人的三巡酒，我依次喝干，以示诚意。漂亮健硕的蒙古族姑娘还向我们敬献哈达，这是蒙古族待客最高礼节。

席间从北京同来的朋友即席唱了几首草原歌曲，献给热情的主人和在座的蒙古族朋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嘎达梅林》、《草原牧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主人们见到当年下乡内蒙古的北京知青，将这些草原歌曲唱的这么纯正、悠扬，他们为之动容，一再举杯道贺。

我们还去了位于额尔古纳的原始森林公园，大兴安岭山势雄浑，原始森林茂密，我们在这里一览林海茫茫松涛阵阵的壮丽风光。除了大片红松等针叶林外，还有白桦树，柞树等其它树木，金秋时节，五彩斑斓，蔚为壮观。这里还可以领略遥远的额尔古纳河风光，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的支流，上游是发源于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海拉尔河，经克鲁伦河流入呼伦湖后，通过达兰鄂罗木河流入额尔古纳河，蒙古帝国及北元时期是中国内陆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成为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参观了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满洲里紧邻俄罗斯，它是我国重要的边境城市。市内有很多俄式建筑，并有许多出售的俄国商品的商店和俄式小酒吧，这里完全木质的俄式建筑更吸引人们的目光。

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碧波荡漾，水天一色的呼伦湖，被人们誉为草原明珠，这是一座2600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呼伦湖中生产数十种鱼类，湖畔沼泽区是重要的水禽生息地，这里是天鹅、丹顶鹤等鸟类的天堂。湖畔的草原则是中国自然条件最优越的牧区，著名的三河马就产与此。

位于呼伦贝尔市的北山地下军事工程遗址，是日本关东军为进攻苏联，而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最大一处军事工事。我们走进这座大型地堡地下工程，它依山而建，内部设施一应俱全，军事后勤环环相扣，工程之大，令人感叹。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仅用一个星期就粉碎了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年苏军一路大军就是由呼伦贝尔向东北推进，在苏军海拉尔战役陈列馆中，我们看到为夺取这一日军军事要塞，曾有多位苏军士兵用年轻的胸膛扑向日军地堡枪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壮烈牺牲。但遗憾的是，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不仅不肯归还沙皇俄国强占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他们还作为积极推手，以大国沙文主义损人利已的手段，将国土面积26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从此，成吉思汗的草原被分割，与呼伦贝尔有久远历史的山河天各一方。从大清王朝康乾盛世开始，为人熟悉的硕大桑叶形中国版图，在上世纪中叶，被改变成现在这样一唱雄鸡天下白。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在额尔古纳河畔，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蒙古族逐渐形成许多民族和部落。距今八百五十多年前，公元1162年，成吉思汗诞生在呼伦贝尔这片中国北方广袤的大草原上。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少年时因其父遭塔塔尔族杀害，身为长子的铁木真，携母亲和弟妹远走不峏罕山区，逃避塔塔尔族追捕长达数年，自此形成他刚毅忍辱性格。成年后，铁木真之妻被抢，而他落荒而逃至同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结盟兄弟扎木合处借兵报仇。1203年虎踞呼伦贝尔的王汗将铁木真收为义子，导致王汗之子桑昆跟铁木真的仇恨，札木合鼓动桑昆联合其它部落夹击铁木真。这是他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仗，他的军队只剩下4600余人。他逃到

贝尔湖以东才避过一劫。贝尔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南部边缘，是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吞吐湖，与呼伦湖为姊妹湖，现在是中蒙两国共有的湖泊，面积609平方公里，乌尔逊河水从北面将其同呼伦湖连接在一起。铁木真当年秋天率军突袭王汗驻地，三天消灭克烈部。铁木真以上的故事都发生在额尔古纳河沿岸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尔后，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的众部族。1206年，铁木真在现蒙古国境内的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成吉思汗即位于此。1211年，成吉思汗的军队三次入侵西夏，逼西夏向蒙古求和，然后进攻金国，在野狐岭会战大破四十万金军。1219年成吉思汗统帅蒙古主力西征，先后消灭西辽、花剌子模及许多国家。1227年，在蒙古军围困西夏首都时，成吉思汗病逝于宁夏南部六盘山，一代天骄终年66岁。

成吉思汗从呼伦贝尔开始，成为第一个统治全蒙古的人。成吉思汗在呼伦湖东迎娶美丽的孛儿帖，成就了那段金戈铁马中一段英雄美人佳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善待部属，麾下人才济济。用战争征服天下的他，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妻妾无数，只有六人具有皇后地位，她们是孛儿帖、也速干、也遂、忽兰、古儿别速、合答安。大皇后孛儿帖生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地位最为尊贵。成吉思汗去世后，这个黄金家族也发生了为了争夺皇权骨肉相残的悲剧。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了以元大都（北京）为首都的蒙元帝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横跨欧亚，总面积达3400万平方公里的蒙元帝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忽必烈是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之子。我们漫步在成吉思汗的草原上，回想着这位历史上的英雄，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文革的浩劫中，曾经有数以万计的北京、天津、上海、海拉尔知青下乡呼伦贝尔。我在阿荣旗的九年知青岁月中，曾有五年出民工，足迹遍布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静静流淌的额尔古纳河畔，辽阔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都曾有过我们青春的身影。这片让人魂牵梦萦的大草原，留下我们那代知青人心中永远的草原恋。

克明是著名的词作家和电视主持人，他也是我们老三届的同龄人，我和克明是好朋友。克明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曾下乡黑龙江农场，后转到呼伦贝尔。克明是蒙古族人，他在文学艺术上出类拔萃，身上带有成吉思汗子孙的淳朴、潇洒、豪放，他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词作者，在这首歌里克明写道：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茫茫草原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

我的心爱在高山，高山深处是金色的兴安，巍巍兴安云海间，矫健的雄鹰俯瞰着草原。

呼伦贝尔大草原，云朵朵飘在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恋。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在河湾，额尔古纳河穿过那大草原，草原母亲我爱你，深深的河水深深的祝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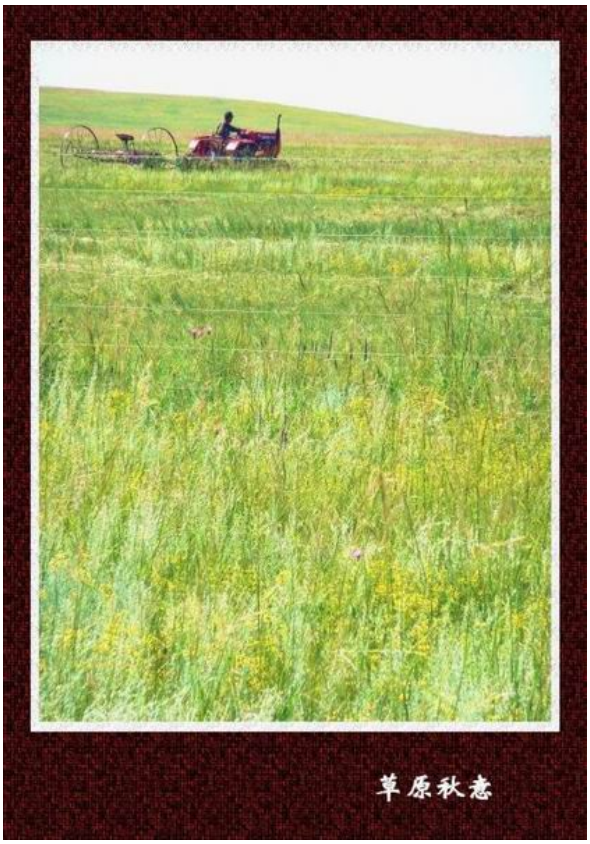
呼伦贝尔大草原，云朵朵飘在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心爱我的思恋。呼伦贝尔大草原，云朵朵飘在飘在我

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恋，我的心爱，我的思念。

九天后列车缓缓驶进北京，我们在内蒙古的马背上，悟出人生的真谛，心中有呼伦贝尔抹不去的绿色回忆。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阿荣旗北京知青纪念石

林小仲按：2018年是我们告别北京赴东北阿荣旗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2018年1月2日，我们420多位北京知青联署提议在阿荣旗建北京知青纪念石，记录我们的青春足迹和历史。建议很快获得阿荣旗旗委栾天猛书记、阿荣旗人民政府靳艺民旗长和旗人大孙桂华主任、旗政协韩广文主席等领导的回复和热情支持，他们说："向你们致敬，知青是阿荣旗的亲人"。1月15日，旗委、旗政府安排旗委常委、旗统战部部长赵秀军落实协调此事。2018年1月19日至2月5日，我们在当年下乡阿荣旗北京知青中为建纪念石筹款，18天中收到458人次，共计十三万六千多元，目前已全额转至阿荣旗北京知青纪念石专款帐户。相信在春暖花开之季，铭刻："北京知青、情系阿荣旗、1968一一2018"的纪念石将?立在阿荣旗那吉镇幸福广场，欢迎返乡的北京知青们。纪念石将告诉世人和历史：北京知青与阿荣旗人民那段难忘的历史情缘，将我们的祝福送给阿荣旗，送给美丽的呼伦贝尔。

关于修建北京知青赴阿荣旗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石的建议中共阿荣旗旗委栾天猛书记阿荣旗人民政府靳艺民旗长阿荣旗人大孙桂华主任阿荣旗政协韩广文主席1968年9月7日，北京市的一千多名中学生到阿荣旗插队落户,加之后来分批去的，累计共有1400多名北京知青曾上山下乡阿荣旗，我们被分配到复兴、三道沟、音河、红旗、图布新、格尼、长安、太平庄、六合等九个公社的100多个村屯。

这是北京知青与阿荣旗人民同命运、共奋斗的一段难忘历史。在当年特定社会环境下，我们告别北京，告别父母、告别亲人，踏上阿荣旗这片黑土地，开荒种地、修路建房、教书育人、治病扶困。广阔的阿荣大地留下北京知青辛勤劳作的身影，美丽的呼伦贝尔留下我们青春奋斗的足迹。

北京知青为阿荣旗架起了农村与都市文化对接的桥梁，阿荣旗成为北京知青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我们与阿荣旗各族人民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情谊。这种魂牵梦绕感情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我们经历暴风骤雨的年代，阿荣旗的干部和乡亲们给予了我们遮风避雨亲人般的关爱。知青返城后，每当阿荣旗有困难和需求时，北京知青也责无旁贷、鼎力相助，这样的感人事迹数不胜数。

2010年12月，阿荣旗政协在郭英主席领导下，编辑了纪念知青下乡阿荣旗的大型回忆录文集《知青记忆》，收集80多篇文章，全书50余万字。2011年6月上旬，北京知青代表致电阿荣旗旗委、旗政府对此表示由衷感

谢。2011年6月21日，阿荣旗旗委、旗政府复电北京知青，高度评价北京知青对阿荣旗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2018年是北京知青下乡阿荣旗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文革”中全国一千七百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2018年，会有许多北京知青回访阿荣旗，鉴于中央八项规定和不给地方政府增添麻烦的初衷，我们认为，这些回访活动不需要统一组织和接待，采取分散自由行方式为宜。回访阿荣旗的北京知青，更多的是看望曾经下乡插队的村屯和老乡。但是为了纪念阿荣旗历史上这一重要史实，我们建议旗委、旗政府、旗人大、旗政协在那吉镇选一处风景优美、人文荟萃、交通便利之处安放北京知青纪念石。纪念石采用阿荣旗本地产原石，本着纯朴、天然、节简、大气的主题构想，不用做任何雕饰，在原石正面刻上两行字：“北京知青赴阿荣旗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1968——2018）”，原石背面刻一行字：“情系呼伦贝尔”，构想效果图附后。双方分工设想：请阿荣旗旗委、旗政府需协助几件事：一、原则批准这一方案。二、提供纪念石摆放的选址位置。三、安排相关部门与我们联系，共同协调落实此事。我方负责几件事：一、知青纪念石设计。二、委托施工单位。三、在知青中筹集所需费用。我们还拟请原阿荣旗旗委书记谭宏宇、原阿荣旗人大主任张洪珠、原阿荣旗政协主席郭英做我们的顾问，他们与北京知青熟悉、且德高望众富有经验。按照这个原则分工，我们共同完成这样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纪念北京知青赴阿荣旗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也记录彰显在动乱年代阿荣旗对北京知青献出的大爱，用纪念石为阿荣旗留下一段珍贵的历史足迹。阿荣旗现在还有许多人都曾是当年北京知青的学生，阿荣旗许多干部群众也记得曾与他们同甘共苦的北京知青，纪念石必将延续这种友情。类似的知青纪念方式在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在黑龙江、吉林、山西、陕西、新疆、云南等有知青上山下乡的地方都有许多先例。形式多样，有知青纪念馆，也有知青雕塑，知青纪念墙。新巴尔虎右旗还建了知青博物馆和知青广场。当年我们编辑大型内蒙古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回忆录《草原启示录》时，布赫副委员长欣然题词：＂草原上的人民永远记住这一代青年＂。

为了不给阿荣旗增添太多麻烦，我们仅希望旗委、旗政府批准在那吉镇的一处公园建北京知青纪念石，希望它成为阿荣旗一处新的历史景观，成为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民族精神记忆。选址确定最终请阿荣旗领导决定，建议落成时间选在北京知青下乡阿荣旗50周年的2018年9月7日之前，我们认为2018年7月前建成为宜，其它一切形式从简。以下是我们这一活动发起后，二十多天中就征集有四百多位曾赴阿荣旗下乡北京知青连署名单，希望旗领导能促成我们的心愿。

上述意见妥否，请审定回复为盼。

顺致敬意！

原阿荣旗北京知青：

1林小仲、2黄弦生、3傅中、4高惠萍、5肖庆平、6王明明、7何杰、8许惠英、9刘晓明、10万良维、11冯杰、12许杰、13李春亮、14仵扣德、15申寅生、16徐春礼、17侯竹英、18辛传东、19李兆华、20彭向东、21何思明、22常亮、23张元正、24徐大年、25刘天亮、26王凯、27李金芳、28田素媛、29刘苹、30魏荣全、31李兵、32苏五一、33段孝良、34张燕快、35张燕赶、36张燕追、37杨福海、38金羽高、39王瑞琨、40刘德林、41王占祥、42吉国栋、43何立民、44孙中一、45于金贵、46梁永路、47吕玉香、48宋耀华、49张红、50关泓、51杨勇、52赵习芳、53王久昌、54纪志英、55许彬、56邹日成、57莫国秀、58禾淑萍、59李宙红、60李玉英、61胡令宜、62谢华国、63纪博平、64纪经建、65孟敏、66李宝玲、67王秀平、68杜金萍、69刘志伟、70陈华、71刘瑞燕、72杨丹、73汪涛、74吕学政、75康晓荣、76申庆茹、77白小平、78胡伟国、79杨燕、80介智襄、81汪燕、82何布、83史强、84陈志梅、85常虹、86陈铁生、87张毅、88刘忠国、89王立义、90李丽华、91王京黎、92高廷兰、93姜永石、94林汉诚、95刘炳煦、96孙贵玺、97陈明棣、98梁丽英、99郭朝月、100张会兰、101洪国敏、102唐仁明、103赵贻斌、104李玉环、105刘建华（格尼）、106佟毅坚、107李森、108苏建华、109何崇光、110李亚洲、111张文亮、112赵建民、113李兰香、114安福兰、115潘志仿、116王树谦、117梁连志、118胡玉敏、119刘跟东、120李新民、121王瑗、122王扬、123魏斌燕、124赵大军、125万宝霞、126韩大行、127佟小环、128齐玉敏、129关秋茂、130张延年、131关秋茹、132林爱梅、133王晓云、134张信广、135沈大林、136鲁方南、137陈建华、138马安群、139白静中、140邢连兴、141李京京、142孔庆英、143刘同安、144盘心美、145王欣、146桂冬阳、147孙蔷、148林铁栓、149何策、150魏宝兰、151郑敏、152商俊雨、153杨志平、154周新华、155关天涧、156赵连富、157王华民、158史续平、159高元刚、160鲁耘、161王兵、162姚恕、163杨重瑛、164田文鸾、165李勇、166王凤岐、167刘翠平、168李增喜、169朱维东、170张国平、171龙文昌、172杨寅（三道沟）、173凌融、174赵洁、175甘瑞田、176崔长顺、177王银东、178梁大虎、179徐文元、180王煜品、181郑鹤、182胡明君、183张满和、184蒋慧秀、185袁啸松、186李淼、187赵家耕、188赵家田、189石慧敏、190张忠信、191于克俭、192郭晓黎、193陈树凯、194闫国魁、195张中年、196王革、197蔡琳、198吕忆军、199张淑敏、200陈中原、201郭晓丹、202罗江燕、203李玲、204郑雁、205刘健、206杜式伟、207郑春英、208马玉文、209刘岩、210史继先、211云春英、212许晓华、213王敏、214游建宁、215秦杰、216孙景明、217袁本春、218李润平、219陈华铣、220赵艳文、221刘同福、222周辉、223关继东、224李漪连、225陈寿榕、226侯承军、227高岩、228冯丽兰、229赵忠诚、230方志红、231刘金声、232张宛玲、233张垣、234陈晓湘、235郭海燕、236刘洪恩、237许路、238安晓明、239陈仲建、240李鸿谷、241何湘峰、242操缨、243白士儒、244宋敏、245李骁、246傅强、247魏瑞青、248魏瑞兰、249胡永明、250杜伟功、251赵辉、252付军、253李武、254杨巾玄、255陈国安、256袁玉芹、257鲁祖佳、258尹莉莉、259张重、260张继达、261陈庆志、262孙仲鲁、263马维发、264梁和平、265曹瑞林、266邹惠、267于晋生、268候国琳、269戴浙生、270于泉泓、271何眉、272杨寅（长安）、273言兆平、274卢世琪、275常健、276张绍喆、277付岩、278邓秋芳、279樊凯军、280翁立强、281徐翠

云、282吉国强、283何音、284鲍婉婉、285李秋生、286吴征、287雷修明、288段孝纨、289鲍忠波、290艾平、291仁增白姆、292陈丹辉、293张建申、294闫乃彭、295宋志强、296闫晓霞、297王宝仁、298崔大山、299付玉林、300孟昭虎、301赵玉芬、302李德山、303金晓茹、304白林红、305李齐雨、306陈幽泓、307秦光里、308史延文、309林宽、310胡克、311王维礼、312付一工、313宁力行、314宁健行、315陶次宇、316裴泽平、317许长明、318彦孝先、319邓良城、320赵秀玲、321凌华、322郭凤茹、323施家立、324陈沂秋、325宁凌、326祝德骥、327陈家全、328彦孝儒、329王燕成、330王晓明、331张曙生、332邹小滨、333孙京雄、334王桓、335殷岐鸣、336叶树振、337刘建华、338金瑞华、339鲍溥野、340崔小平、341赵中平、342吕小平、343孙澍、344祝玉萍、345吴湘湘、346吴安东、347黄培新、348董爱民、349陈家璧、350陈景昱、351商玉华、352白荔、353高永云、354廖中平、355徐宇、356汤晋平、357刘丽华、358方勤学、359冯大明、360姜怡、361冯京生、362王锡寅、363董玉荣、364严鲁晋、365陈勤勤、366梁立、367戴定一、368王德勇、369黄建霏、370赵兵、371弓炜、372车世凯、373黄安平、374陈金铭、375杨莉、376李国平、377姜衡宇、378国金锁、379赵桂平、380朱玉斌、381伊军、382付东起、383李占群、384周伊、385赵凤兰、386凌淑珍、387谢冰民、388唐光夏、389张炳义、390李志刚、391顾维东、392王玉玲、393陈韶山、394刘淑琴、395张连斌、396江筱萍、397付天鹤、398刘杏妹、399孙香娟、400欧金玉、401贾佩英、402齐宝喜、403陆铁生、404刘志、405张育来，406号张冀平。407张利平，408金振江，409张清绵，410唐兆玉、411唐兆娟,412孙利平,413赵连杰，414朱渝英，415白岩凌,416黄正兰，417高贵祥,418陈寿棠、419马德俊，420郭桂玲421冯荣华，422张玉怀，423罗文前、424刘伟英，

2018年1月2日于北京

筹划联系人：林小仲、北京知青1968年9月至1977年7月下乡阿荣旗图布新公社，1976年3月在阿荣旗入党。返回北京后，曾在国企、团中央青工部、央企供职，现任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地址：北京朝阳区向军南里二巷甲5号雨霖大厦邮:100020

2018年建阿荣旗北京知青纪念石募捐名单

1 林小仲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2 肖庆平 图布新公社兴旺四队

3 王明明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4 翁立强 长安公社珍珠队

5 白岩凌 格尼公社西六合队

6 刘德林 图布新公社德发一队

7 刘天亮 长安公社全胜队

8 鲍婉婉 长安公社日光队

9 胡伟国 长安公社新胜前进队

10 邹日成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11 郭海燕 长安公社日光队

12 金万成 太平庄公社农场十四队海拉尔知青

13 于金贵 音河公社五六良种场

14 梁永路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15 侯竹英 图布新公社兴旺五队

16 高　岩 长安公社和平队

17 王　凯 长安公社全胜队

18 高惠萍 长安公社和平队

19 魏瑞清 长安公社永胜队

20 魏瑞兰 长安公社永胜队

21 胡永明 长安公社日合三队

22 辛传东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23 常　亮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24 陈铁生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25 张　重 长安公社和平队

26 徐大年 长安公社中兴队

27 徐翠云 长安公社中兴队

28 仁增白姆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9 申庆茹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30 李玉英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31 李宙红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32 张继达 长安公社珍珠队

33 孙仲鲁 长安公社胜利队

34 梁　立 格尼公社西亚镇大队

35 戴定一 格尼公社西亚镇大队

36 张元正 长安公社东升队

37 王立义 三道沟公社富山永胜队

38 李丽华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一队

39 王瑞琨 图布新东公社山屯六队

40 关继东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41 朱渝英 长安公社日合三队

42 尹莉莉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43 王德勇 格尼公社西亚镇大队

44 黄建霏 格尼公社西亚镇大队

45 李玉环 图布新公社振丰九队

46 黄弦生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47 郑　鹤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48 赵建民 音河公社六大户队

49 张绍喆 长安公社中兴队

50 刘晓明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51 张　红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52 于泉泓 长安公社中兴队

53 杨　寅 长安公社中兴队

54 赵习芳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55 彭向东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56 何思明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57 陈寿榕 长安公社前进队

58 陈寿棠 长安公社前进队

59 吴　征 图布新公社振丰五队

60 陈守利 图布新公社振丰五队

61 李漪涟 长安公社和平队

62 何湘峰 长安公社永胜队

63 朱维东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64 戴浙生 长安公社中兴队

65 禾淑萍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二队

66 莫国秀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二队

67 胡令宜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六队

68 常　虹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69 李春亮 400 图布新公社振丰五队

70 蒋慧秀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三队

71 赵艳文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三队

72 杨福海 格尼公社联盟五队

73 张燕快 格尼公社联盟五队

74 张燕追 格尼公社联盟五队

75 张燕赶 格尼公社联盟五队

76 付　岩 长安公社日新队

77 何　眉 长安公社中兴队

78 于晋生 长安公社中兴队

79 史　强 长安公社中兴队

80 李　淼 六合公社永泉队

81 李亚洲 格尼公社腰福合队

82 王宝仁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83 陈明棣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84 孙贵玺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85 杨巾玄 长安公社和平队

86 李　武 长安公社和平队

87 吴国荣 厦门

88 刘　苹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89 许　路 长安公社日合三队

90 介智襄 长安公社前进队

91 陈幽泓 长安公社胜利队

92 郑　雁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93 车世凯 格尼公社西亚镇二队

94 黄安平 格尼公社西亚镇一队

95 陈国安 长安公社永胜队

96 卢世琪 长安公社中兴队

97 姜永石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98 陈丹辉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99 杨　勇 长安公社双胜队

100 汪　燕 三道沟公社立新五五队

101 张　伟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102 张国平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103 于克俭 三道沟公社联盟队

104 杨　燕 长安公社前进队

105 陈志梅 图布新公社建国二队

106 龙保华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107 李　骁 长安公社和平队

108 傅　强 长安公社和平队

109 付　军 长安公社和平队

110 万宝霞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一队

111 杨　寅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112 王　兵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113 何　杰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14 张淑敏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15 郭晓丹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16 罗江燕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17 李　玲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18 李兆华 音河公社富吉大队长发屯队

119 刘杏妹 长安公社全胜队

120 仵扣德 图布新公社振丰四队

121 高廷兰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122 梁大虎 图布新公社兴旺四队

123 何立民 复兴公社东兴三队

124 吉国栋 复兴公社东兴三队

125 王久昌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126 杨重瑛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127 姚　恕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128 安福兰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129 徐春礼 图布新公社振丰九队

130 付玉林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131 关秋茹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六队

132 关秋茂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六队

133 赵凤兰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134 田文鸾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135 王　瑗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136 李兰香 图布新公社建国二队

137 秦　杰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旗队

138 赵贵平 三道沟公社解放队

139 李占群 长安公社双胜队

140 于恩秀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41 吴湘湘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142 邓秋方 长安公社和平队

143 袁玉芹 长安公社和平队

144 秦光里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145 许　杰 太平庄公社共合队

146 邹　蕙 长安公社中兴队

147 胡明君 图布新公社振丰五队

148 宋志强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149 聂十一 音河公社富吉大队长发屯队

150 樊凯军 长安公社日合三队

151 王　革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52 罗文前 长安公社日合三队

153 王占祥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154 唐光夏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155 张炳义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156 李兴德 格尼公社西六合队

157 万良维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158 冯　洁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159 陈建华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160 陈庆志 长安公社永胜队

161 张大光 长安公社珍珠队

162 张忠信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63 马维发 长安公社胜利队

164 邢连兴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165 杜守鹏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166 林爱梅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167 傅　中 图布新公社兴旺四队

168 张育来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169 刘洪恩 长安公社全胜队

170 李秋生 音河公社董家沟队

171 关　泓 音河公社和平队

172 安晓明 长安公社珍珠队

173 曹瑞林 长安公社胜利队

174 许晓华 三道沟公社核心队

175 郭朝月 音河公社五星队

176 杜式伟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177 刘　岩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178 纪执英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179 何　音 长安公社双胜队

180 蔡　琳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81 郭晓黎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82 吕忆军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83 陈中元 三道沟公社前进联盟队

184 许　彬 太平庄公社共合队

185 王　扬 长安公社永胜队

186 谢冰民 格尼公社东六合队

187 李京京 图布新公社兴旺四队

188 操　缨 长安公社德胜队

189 鲁祖佳 长安公社德胜队

190 康晓荣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191 白小平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192 白林红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193 周新华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194 关天涧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195 金羽高 图布新公社兴旺四队

196 白静中 图布新公社兴旺四队

197 马安群 图布新公社兴旺四队

198 宁　静 加拿大多伦多

199 王树谦 音河公社富吉大队长发屯队

200 何崇光 复兴公社东兴三队

201 佟毅坚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二队

202 沈大林 图布新公社兴旺五队

203 刘翠萍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204 费建本 长安公社日光队

205 宋　敏 长安公社胜利队

206 嵇　光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07 嵇　明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08 王喜元 格尼公社西福合队

209 闫乃彭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10 崔大山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11 段孝纨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12 段孝良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13 麦　莹 格尼公社腰福合队

214 李　兵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15 赵国烽 长安公社珍珠队

216 孙利平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217 周　辉 长安公社前进队

218 马德俊 长安公社前进队

219 郑春英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220 周　伊 图布新公社振丰五队

221 陆铁生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222 王凤岐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223 刘跟东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224 赵连富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225 刘建华 格尼公社腰福合队

226 孔庆英 格尼公社腰福合队

227 胡玉敏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228 梁连志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229 史茂林 向阳峪公社中胜队

230 刘同安 格尼公社腰福合队

231 杨志平 格尼公社联盟五队

232 唐兆玉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二队

233 唐兆娟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二队

234 张　毅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235 王晓云 图布新公社兴旺五队

236 鲁　耘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237 李新民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238 张文亮 三道沟公社解放北星队

239 张满和 图布新公社振丰五队

240 凌　华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241 凌　融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242 赵　洁 三道沟公社新发队

243 赵育芬 三道沟公社东风队

244 侯国琳 长安公社双胜队

245 言兆平 长安公社中兴队

246 纪志国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247 王华民 图布新公社振丰九队

248 吕学政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249 崔长顺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250 汤晋平 图布新公社建国四队

251 李齐雨 图布新公社建国四队

252 刘丽华 图布新公社建国四队

253 冯大明 图布新公社建国四队

254 姜　怡 图布新公社建国四队

255 方勤学 图布新公社建国四队

256 冯京生 图布新公社建国四队

257 史续平 格尼公社六家子二队

258 金小如 图布新公社建国二队

259 魏斌燕 图布新公社建国二队

260 齐宝喜 太平庄公社共合队

261 严鲁晋 图布新公社兴旺五队

262 郑　敏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263 马映霞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264 孙　蔷 图布新公社振丰九队

265 桂东阳 图布新公社振丰九队

266 高贵祥 复兴公社东兴三队

267 黄正兰 复兴公社东兴三队

268 冯荣华 复兴公社东兴三队

269 苏五一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70 雷修明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71 张玉怀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272 盘心美 格尼公社日尔本德队

273 王　欣 格尼公社日尔本德队

274 张清绵 格尼公社日尔本德队

275 赵　兵 格尼公社西亚镇队

276 朱平之 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

277 刘　志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278 赵大军 图布新公社建国二队

279 王京黎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280 吉国强 长安公社中兴队

281 鲁方南 图布新公社兴旺五队

282 闫晓霞 长安公社中兴队

283 刘　健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284 甘瑞田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285 李金芳 长安公社和平队

286 李　勇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287 伊　军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一队

288 胡培础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旗队

289 温树荃 三道沟公社东风队

290 史继先 三道沟公社核心队

291 朱玉斌 三道沟公社解放队

292 潘志仿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一队

293 孟　敏 图布新公社德发三队

294 李宝玲 图布新公社德发三队

295 李鸿谷 长安公社永胜队

296 李增喜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297 张建申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298 何　布 格尼公社联盟四队

299 李天星 长安公社双胜队

300 方志红 长安公社日光队

301 高志云600 长安公社双胜队

302 董玉荣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一队

303 佟小环 音河公社富吉大队长发屯队

304 齐玉敏 音河公社富吉大队长发屯队

305 陈华铣 图布新公社振丰九队

306 魏荣全 图布新公社东山屯二队

307 李泰初 长安公社和平队

308 张信广 音河公社董家沟队

309 冯立兰 长安公社双胜队

310 高元刚 格尼公社六家子二队

311 肖　惠 长安公社日合二队

312 孙香娟 格尼公社东六合队

313 刘　义 格尼公社联盟二队

314 蒋幸云 格尼公社联盟二队

315 王玉玲 六合公社永泉队

316 付天鹤 长安公社全胜队

317 孙　澍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318 陈勤勤 格尼公社西亚镇队

319 徐　宇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320 商俊雨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一队

321 纪经建 图布新公社德发三队

322 纪博平 图布新公社德发三队

323 宋耀华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324 吕玉香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325 肖晓川 图布新公社兴旺四队

326 李保国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327 桂秋菊 图布新公社保国六队

328 王煜品 三道沟公社三合队

329 徐文元 三道沟公社三合队

330 陈沂秋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31 孙京雄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32 王　桓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33 张曙生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34 祝玉萍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335 云春英 三道沟公社核心队

336 陶次禹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337 李国平 格尼公社西亚镇队

338 王维礼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339 郭桂玲 三道沟公社解放红星二队

340 马玉文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341 鲍忠波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342 张利平 格尼公社联盟一队

343 金振江 格尼公社联盟一队

344 许长明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345 赵中平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346 吕小平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347 张冀平 格尼公社联盟二队

348 宋兆花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349 艾　平 格尼公社前福合队

350 孙景明 图布新公社建国二队

351 袁本春 图布新公社建国二队

352 顾维东 格尼公社腰福合队

353 苏建华 三道沟公社东胜队

354 梁和平 长安公社胜利队

355 陈仲建 长安公社东升队

356 那喜玲 三道沟公社

357 张婉玲 长安公社日光队

358 张　垣 长安公社日光队

359 刘金声 长安公社日光队

360 刘忠国 音河公社五星队

361 李润平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362 高永云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363 弓　伟 图布新公社振丰九队

364 刘黎黎 长安公社珍珠队

365 田素媛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366 李　森 太平庄公社共合队

367 赵秀玲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368 赵连杰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369 何昌玲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370 刘同福 格尼公社腰福合队

371 何昌宪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372 宁健行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373 祝德骥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74 宁　凌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75 许惠英 格尼公社腰福合队

376 董彩云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377 王秀萍 图布新公社德发三队

378 傅东起 三道沟公社三合队

379 王乃文 格尼公社东六合队

380 吴安东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381 陈晓湘 长安公社日光队

382 王晓明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83 左玉琴 三道沟公社三合队

384 刘淑琴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385 凌淑珍 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队

386 夏卯生 音河公社六大户队

387 王铭正 音河公社五星队

388 张连斌 格尼公社西福合队

389 游键宁 三道沟公社解放队

390 景　凯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91 邓良城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392 王燕成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93 陈小兵 三道沟公社解放队

394 邹小滨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395 林汉诚 太平庄公社共合队

396 江筱萍 格尼公社东六合队

397 姜衡宇 三道沟公社东风兴华队

398 刘　明 六合公社南永合队

399 张　印 六合公社太平桥队

400 赵　辉 长安公社全胜队

401 李志刚 音河公社五星队

402 龙文昌 三道沟公社八一队

403 王银东 音河公社富吉大队长发屯队

404 林铁栓 音河公社富吉大队长发屯队

405 李玉明 音河公社富吉大队长发屯队

406 刘建华 音河公社和平队

407 唐仁明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408 赵贻斌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409 李德山 三道沟公社东胜队

410 杜伟功 长安公社全胜队

411 肖小玲 格尼公社西六合队

412 袁啸松 格尼公社西福合队

413 白世儒 长安公社胜利队

414 申寅生 图布新公社保国一队

415 彦孝儒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416 彦孝先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417 董爱民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418 洪国敏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419 娄续良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420 陈　鹭 长安公社日合二队

421 周　剑 三道沟公社三合队

422 李光荣 三道沟公社三合队

423 陈家全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424 张会兰 音河公社五五队

425 杨颖（杨淑云）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426 郭春景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427 杨桂珍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428 梁正磊 太平庄公社三合队

429 陈金铭 格尼公社西亚镇队

430 严苏珍 图布新公社兴旺五队

431 孙中一 图布新公社振丰九队

432 何　策 音河公社五五队

433 朱紫玲 长安公社德胜队

434 张　明 长安公社中兴队

435 刘辅然 格尼公社联盟四队

436侯承军 长安公社日合一队

437 刘鹏辉 三道沟公社兴隆队

438 刘金华 格尼公社联盟五队

439 刘　红 格尼公社联盟五队

440 张林起 格尼公社联盟四队

441 301号高志云 长安公社双胜队

442 陈景昱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443 赵家耕 六合公社永泉队

444 石慧敏 六合公社永泉队

445 耿　端 格尼公社东六合队

446 施家立 音河公社五龙泉东队

447 徐学谦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448 刘长荣 三道沟公社解放北星队

449 赵玉凤 复兴公社东兴二队

450 郝舜民 太平庄公社新合队

451 廖中平 音河公社孟克店队

452 张群生 音河公社双合西队

453 张铁生 音河公社双合西队

454 张婉生 音河公社双合西队

455 林　宽 音河公社五龙泉西队

456 杨　莉 长安公社胜利队

457 陈家璧 红旗公社章塔尔队

458 未署名

2018年2月5日于北京

（统计审核公示：申寅生、侯竹英、仵扣德、李春亮、陈志梅、纪雁、孙馨）

2018年建阿荣旗北京知青纪念石募捐财务公示

本次捐款活动开始于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2月5日结束，共计18天。

一、收入情况：

捐款统计人数为458人次，每人300元，应收金额为137,400.00元；截止2018.02.05日实际到账人数为455人，实收金额：136,632.90元。其中1人多汇款100元，5人多汇1.5元（0.3元/人）,1人多汇0.6元，2人多汇2元（1元/人），1人多汇30.30元,1人少汇款1.50元。3人捐款未到账（注：微信转账、手机汇款，网银转账等未提供汇款图片的均无法从对账单中核对出来）

二、支出情况：

2018年1月23日汇款60,000.00元2018年2月5日汇款76,632.90元汇出款项总金额为136,632.90元实际收入：136,632.90元，实际支出：136,632.90元，收支平衡。

会计：纪雁出纳：孙馨

公示日期：2018年2月6日

【来自内蒙古阿荣旗的寄语】：

自从筹建阿荣旗北京知青纪念石之议题启动以来，知青长辈们的作为让我非常感动，心情激荡。当年千里奔赴阿荣洒下一腔热血，如今千里眺望故乡寄托念旧情肠。情可让天地振动，意可令冰化雪融。我和统战部责无旁地为知青们服好务。近日分别向栾天猛书记、靳艺民旗长，孙桂华主任，韩广文主席做了汇报,领导非常重视此事，指示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和配合好此项活动，一定要实现好知青们的心愿，一定要确保知青们满意。如果此时不是零下29度的严冬，马上就可实施建设。知青长辈们的真情，一定会早迎春风。待到春天到来之时，就是知青们如愿之日！！！。本帖发自：中共阿荣旗委常委、统战部长赵秀军、2018年1月24日

了结的还乡情结

早就有再回千阳梨树村（我插队的地方）看看的念头——我不知我为何不用“去”这个字，一直没有机会。4月6日，星期五，去宝鸡办一个很棘手的事，依然不顺利，很坏心情，怕殃及接下来的两个假日了。

百无聊赖，就动了到梨树村的念头。宝鸡离千阳县四十多公里，一小时汽车就可到。或许能忘记心中的不快。

说走就走，尽管已是下午五点钟了，到千阳再到梨树还有二十里，时间有些紧，但此时顾不得了。

在宝鸡火车站旁的长途汽车站里，很快就搭上了去千阳的车，七元五角的票。似乎比当年涨了七倍。

车出宝鸡，向北不多远，就上千阳岭，路比当年好多了，又开了一个隧道，缩短了路程（当然要收费了），很快就到了千阳县城。无暇进县城，找了一辆去柿沟的车，挤上就走，估计天黑可以到梨树。

县城到梨树的峪口——西沟口只有五公里，搭乘小面的只要三元。

在西沟口原先的供销社所在地，开了个小卖部，我匆忙买了两盒准备招待老乡的香烟，就开始进沟上山，想在天黑前赶到梨树，最后的这十里山路，要抓紧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今日西沟，叫西沟流域了，右面那路就是通往纸坊窑的大道，可以看到铁路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沿着小路就可到梨树村

天不灭我。上山没几步，碰上一个送客到纸坊窑（原大队所在地）的“摩的”，讲好十元，他把我送到梨树——我有些担心天黑到不了村里。

摩托车沿着一条土公路爬上塬，这条路就是当年我下乡那天（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走的路，路比当年宽了许多，有许多村民在修路，据说要铺成柏油路面了。

在塬上，又见远处大王殿那座小山，人生阅历多了，此时也觉得那山也小了许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大王殿

快到村里的时候，见崖畔有一个村民放羊，觉得像是当年村上的青年人何生泰，就冒喊了一声——“生泰”，也没下车，径直让车开到村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村里变化不大

在乘摩托车的时候，开摩托的小伙子问我，在梨树有朋友？我说村里人我都熟，我做过村里的会计呢。但一到村里，我觉得很茫然，望着熟悉的村庄，我不知为何有一种陌生感。见了几个人，似乎都彼此不认识。

我先不管这些，拿出相机将那些似曾相识的学习室、场房、涝池……先拍下来，一边向我曾住过的村东走去。

果然不出所料，原先住过的那排知青房已拆去了。在村东见到从塬边赶回来的生泰，他叫出了我的名字。“听人叫我的名字，不知是谁，我赶紧牵羊下来……”生泰老了很多，细看还能找到当年那个莽小伙的影子。他记忆比我好，当年的一件件往事被他不断提起，最后总加一句“合适么？”——即当地的验证的口语。

生泰在村里当了十年队长，村里的事，他随口就能道来。我问我原先住的房呢，他说早拆了。说着把我引到他家院子跟前的一个瓦房前：“就留下这些了。这屋的门窗还都是你们青年房子的门窗，合适么？只是原先的山墙改成背墙了。”果然原先一排五间的瓦房，就只剩下这些痕迹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最后的痕迹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右上角的山墙就是我原来住的房子的山墙，喜鹊不理睬我，它只对刷锅水有兴趣

我说，那我们才来村里的时候，住在崖（音捱）背上的窑洞还在么？他说还在，说完就带我爬坡上了崖背。

那几孔窑果然还在，尽管没有住人，但依然结实——那是穴居的先民的智慧。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左面的是男生住的，右面是女生住的

当年在这里的情景逐渐浮现：左面的那孔窑是我们的灶房，一开始女生也住在那里，因为不方便，加上烧柴灰大，她们搬到右面的那孔小窑。女生很会收拾，那孔小窑给我留下很温馨的记忆。晚上，山里很黑，女生的窑，窗子显得特别亮，灯光下她们帮我缝被子的情景犹如昨日。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她，当时是那样年轻。那时我脚上裂的口长期不能愈合，有个偏方说，头发焙成灰，和上猪油敷上很有效果，她就从辫梢上剪下一缕头发给我——后来她就成为我的发妻，不知是不是从这段姻缘起。

中间的那孔大窑是我们五个男生的宿舍，原是生产队的牛圈，刚住进去时，跳蚤很多，有一天我抱了很多麦草，铺在窑里，从窑门开始点燃，烧了一通后，跳蚤才似乎少了。

从崖背下来，回到村里，在场上见到正在铡草的“姐姐”——过去是很喜欢和我说话的一个青壮年，不知为何今天很冷漠。他铡草为了在西沟盖房和泥，他也准备搬下去了。村里还碰到一个当年自诩很有知识的农村知识青年，他见面的头一句话是“我是有六个孙子的爷爷了。”到他家坐了坐，无奈话不投机，很快告辞，又回到生泰家。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犁具依旧

吃过晚饭，生泰给我讲了村里这几年的变化。

随着这几年的退耕还林，村里可耕种的土地少了，每个人平均还有七亩多地，但是粮食的总产比过去高了。现在农活也比过去轻松多了。过去施农家肥，主要靠垫牲口圈起牲口圈，很吃力。现在主要靠化肥，他一年买化肥要四十多袋呢。但是粮食价低，卖不了几个钱。村里的年轻人在村里呆不住，多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生泰两个儿子。长子书没念几年，在戏校学了几年器乐，收益不好，只好在外地打工，做粗活。长媳在拉萨做饮食，“心大着呢”。老二两口子，在凤翔做工，留一个小女在生泰身边，缠得他很紧。

生泰说，现在村里就剩下些老人、妇女和娃伙，村里的户数比过去多了，总人数却比往年少了。想当年，知青五男四女，村上一大群小伙子，从山上下来走在川道上是多么风光。记得当年从川道的冉家沟给村里买了个直径两三米的大碾盘，没用任何车，硬是一群小伙子给滚上山了。可现在，哪有青年人呢。

当我用笔一一列出从村西到村东我熟悉的各家的人头时（我当过村里的一年不脱产的会计,花名册很熟的），生泰不是说迁下山了就是说“早老百年了”（当地方言即去世了）。寻旧半为鬼，无人话麻桑。

生泰当年就是个很直爽的小伙子，我比较喜欢他，我的两个故事里都有他的影子。他出身富农，一直吃不开。我下乡的时候，他父亲一个庄户人家在犁地时，对大队传达的形势报告苏修要侵略中国，不知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

说了什么，那个回乡知识青年将此事汇报个村上和大队，定性他父亲盼望苏修来了变天，开了他父亲的斗争会。他父亲一时想不开，一天夜里跑到村对面“阴半个”的饲养室上吊了。“当时，我劝过他，人就是关在监狱里，还不是活着吗。”生泰说起此事，恍然如昨日。

生泰为人公正，于是在村里被一再请出山，当了十年队长。“那时，一年队长的补贴才250元，忙着开会、学习、招待上面来的干部，误工不说，贴赔的柴火粮食也不说，一到收农业税费，才难过呢，得罪人，且两头受气。不像现在的村干部，补贴不少，手里掌管着退耕还林的钱。村民都求着他。”

当了几年队长的生泰对社会、农村的看法果不一般。他谈到，过去把牛羊赶在山上可以随便放牧，现在不行了，有《森林法》呢，捉住你就可依法办你呢——也说明法制的威力大于教育吧。

村里的非正常死亡也不少，长泰的堂弟长有，被农用车挤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死于土下也不少。黄土高原村民有从立崖挖土垫圈积肥的习惯。就在我离开梨树的这三十几年里，小伙子长青挖土时，一块土掉下来，砸中他的头部，死了。从军他爸挖土时一大块土下来把他埋了。我们插队时，一天，同大队的两个知青躺在窑里聊天，发现头上的窑顶掉土，二人觉不妙急忙向两旁闪滚，牛背大的土块落下，砸断了他们的床板（此事发生后加快了各地农村给知青盖房的步伐）。我妻子在乡下时，一天靠在崖根休息，突然发觉有土渣滑落，她急忙跑开，好大一块土紧接着滑落没砸到她。据在场的一个知青说，“她比兔子跑得都快。”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访旧半为鬼，桃花依旧开

才九点多，生泰就回去睡了，我和他的长子睡在一个屋里，和他简单聊了些。临睡前，他往炕里加了几把柴，一夜热炕睡得舒服极了。

半夜两点多，听见鸡叫头一遍；三点四十,鸡叫第二遍；四点四十,鸡叫第三遍，一夜睡不踏实，可能炕烧得太热了。

清晨，独自从从东庄转到村西，当年的地块名依稀还能道来：四亩溜溜、庄圪脑、路上、路下……，包产到户把田地分成块块，大面积的地块看不到了，但各个地块上的庄稼长得都不错，手拿相机到处乱拍几下，觉得此行“就到这里了”。

回到庄里，正是吃早饭的时间。长泰一大早到西沟口卖牛奶都回来了。长泰养了三头奶牛，每年能下一犊，卖掉可获五千元，奶牛一天挤三次奶，约五十斤，西沟口每天早上有收牛奶的，每斤收购价七角钱，每天收入三四十元，也很可观。生泰说，不用买饲料，就用老办法——青饲料加玉米就行。

吃早饭的时节，村里的土水塔开闸供水，各家各户都去担水，比过去用辘轳搅水省力多了。饮用水是用泵从沟底打上来的，水质好多了，过去吃井水，易患地方病呢。此时也是村民交流的时机，于是我见到长青、常有的未亡人，当年的媳妇虽然熬成婆了，可是还得担水，岁月无情地在她们脸上画上痕迹。还见到了从军他娘，没想到她还很精神，拉住我的手，问这问那，问我的妻子还好吧……。当年为给这个病病歪歪的女人治病，我们知识青年没少费神——就因为她是村里为数很少的贫农。从军当年是个没念几年书的“书娃娃”（当地对念书的小学生的称呼），现在他的孩子都念大学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村民担水时是见面的机会，左一是从军，左二是长青媳妇，右一是长有的媳妇（大队杨支书的女子）

原本想在村里再住一夜，但是突然发觉自己在这个村里成了陌生人，当年与村民之间无拘束的的欢笑没有了，与生泰等回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一声声“合适么？”已难倒退回往日的时光。

早饭后，看了会儿生泰挤牛奶，给他们全家照了几张合影，我就告辞了，生泰也没太多挽留。临走，生泰说，恐怕你再来就找不到梨树了，听说为了治理西沟流域，村子要整体搬迁下山呢。

我仍是像三十六年前我被招工出去时那样，从东庄出去，沿着半山的路，穿过当年生产队开挖的洞子，离开了我曾下乡三年的山村。

我不知我会不会再来这里了。Ade，我的逝去的青春，Ade，我的梨树。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

东庄的院落早荒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2008）

重返中条山 ..

我是1968年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后下乡到平陆县一个小山村的，今年已经四十年了。虽然我1971年9月离开了农村，但是一直在平陆县工作。当我1981年调回河北，离开中条山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在平陆县的13年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它已经永远镶嵌在我的心中。几十年来，我无时不刻地关注着中条山，怀念着中条山的纯朴乡情，想念着中条山的父老乡亲，挂念着中条山的发展变化。中条山的日子让我魂牵梦绕，让我难以割舍，让我终生难忘。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生病的时候，李大娘给我用两个鸡蛋活面，放那么多熟油和大蒜汁，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吃鸡蛋，而是攒起来到供销社代销点去换一点咸盐和煤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年春节我们没有回家，家家户户请我们吃饭，张大哥给我们做了火锅让我们尽情地吃，要知道，他们一年四季吃咸菜，过年才能吃上一次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割麦子时，一群学生娃前来帮我，还替我磨镰刀，而他们仅仅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与我同住一个炕给了我无数帮助的善良的巷娃和经常帮我蒸馍馍的和蔼可亲的杨大婶；我永远不会忘记，招工的大学生玉玺在我遇到打击时，为了安慰我，带我到他家里去散心，还资助了我20元钱，要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农村，而那时在村里干一年也见不到一文钱……我深深感到，无论在村里，还是在县城，每时每刻都有一副和善友好的面孔，一双携你同行的手和一颗火热滚烫的心在陪伴着我。

四十年眨眼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近六旬，我常常想，改革开放也已经30年了，中条山的面貌有了多大变化？那里的父老乡亲们生活可好？十月金秋，我满怀感恩之情踏上重返中条山的路程。我在平陆一共呆了5天，此

间，我先后来到自己插队的安沟村，岭北村，朋友插队的枣园村，爱人插队的盘南村和一个老朋友的家乡洪阳村和圣人涧村，拜访了一些村民和一位农民企业家；在县城访友两天，看望文化馆老馆长，宣传部退休的老干部和当年的县、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领导；我还乘车沿黄河向东的公路到米汤沟至曹川，走马观花地游览了美丽的中条山红叶和马泉沟挂满红灯一般的柿子林。

这次回乡之旅，面对四十年农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万般感慨，浮想联翩，千头万绪，略加梳理，写了下面的文字。全面与否，客观与否，总算表达一下我的心声吧。

有电用了 ..

我刚插队的时候，村里没有电，一到夜晚，村里一片漆黑，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灯，像稀稀拉拉的萤火虫。

村里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一根铁丝连接到每家每户的小喇叭在哇啦哇啦地叫，告示着村里还有生命的存在。广播一停，村里立刻陷入一片死寂，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狗咬。村民走夜路都是摸黑，村里穷得甚至找不出一只手电筒。

那时大队部有电，我们去磨面要排队，磨面的人多，一般要等上几个小时。有时突然停电，电磨停了，面磨了一半，就得等着，不知等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那时电磨房里有一张专门供等电人休息的床，赶上停电，我就躺在那睡觉。有一次睡着了做梦，梦见坐火车回家，咣当咣当，咣当咣当，一会列车员来了查票，就醒了，原来一个社员推我，来电了------那咣当咣当就是电磨磨面的声音。但是如果运气不好，等一天两天都有可能。

现在已经没有不通电的村子，电灯就不用说了，家家都是彩色电视机，有的还有VCD，DVD机，洗衣机等。生产用电也有了很大发展，比如铡草、粉碎、烘干都用上了电。

有粮吃了 ..

我们在村里时，因为土地集体耕种，社员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很低。村里虽然只有102口人，却有相当一部分是缺粮户。麦子说起来也不少，但是不禁吃，好像天天在啃玉米面馍，吃得人一天到晚吐酸水。

一到后半年，就闹粮慌，连玉米面都没有了，社员们经常跑到别的村借粮，其实别的村也一样紧张。这时村里就层层向上反映，申请救济。大约每年的10月份，公社就送来粮食分给社员，我们叫做吃“返还粮”。

记得那时社员去地里干活要带上一块馍馍，叫“贴补馍”，不管见了谁，总要把馍馍拿出来让一下，笑着说：“吃馍。”这显然是一种礼节，并不是真给你吃，也没有人当真。中条山农民认为，“让”，就是“有”，常“让”常“有”，可见粮食的金贵。

现在好了，土地分给了农民，又有了粮补，种粮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粮食吃不了。没有人吃玉米面馍了，都是白馍。

那时吃水要手摇辘轳，我们村的井有40多米深，好一阵才能摇上一担水来，如今自来水已经通到每家的厨房。乡亲们现在也知道城里人喜欢小杂粮，我到村里时，他们就把玉米糁糁、小米、杂豆、红薯等作为礼物送给我，这也反映了城乡之间观念上的差异在逐步缩小。

劳动强度减轻了
..

虽说当时已经有了“农业机械化”这个概念，可是现实中，中条山区的耕作方式仍然比较原始。村里的耕地播种收获无一不是手工劳动，特别是运输，更离不开身背肩扛扁担挑。

记得有一次，村里用结余的麦草到相邻的夏县某村换牛，大车把麦草拉到夏县那村对面的沟边，然后我们把草一担一担地担到沟那边。估计那沟至少有50米深，没有路，只有放羊人走的羊肠小道。一晌工要担三担草过去，一

担草百余斤，否则就不能记工。现在回忆起来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就算不背不扛空着手上下15-6层楼，估计有一趟就足以让人筋疲力尽。当我们完成任务时，也都倒在地上不想起来了。

那时候，家家户户最多的工具就是扁担、荠、镰刀和绳。这些物件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用，俗称“扁担炖肉”。如果上山打柴，首先要背着这些家什走上三十里山路，然后又三十里担着百十斤柴沿原路返回，一路的给养就是十多个玉米面窝窝头。

现在没有人烧柴了，首先是封山育林，又是退耕还林，据说我们村子东面的大山已经郁郁葱葱了，当年我们亲手种的马尾松全部长大。人们也再不上山打柴，全部改成烧煤。扁担还有，但已经不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每家都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可以一直开到地头。送肥料，拉种子，收水果，运粮食，走亲戚，逛庙会，去县城，一车在手，轻松搞定。基本上摆脱了奴役般的重体力劳动。

穿衣的变化 ..

我在村里时，农民们没有钱买“洋布”。他们在自留地种些棉花，加上队里分的，全部织成棉布。家家都有纺车和织布机，从纺纱、漂染到织布，全部手工。最后从被褥，到棉衣棉裤，单衣单裤，内衣裤头（裤衩）一直到袜子到鞋，全部自己缝制。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织毛衣。干活休息时，女人们个个在纳鞋底，而男人们却纷纷拿出毛线，挎在脖子上，左一针，右一针织起毛衣来，其娴熟程度令我们瞠目结舌。

我曾穿过一件父亲送给我的旧衣服，上面补丁摞补丁，有的是我自己缝的，最多时上面的补丁有六十六块。但农民却不，我偶然发现，我们村里的农民基本上不穿打补丁的衣服，特别是赶集走街，串亲戚，去县城，一定要穿得鲜鲜亮亮的，但都是用自己织的粗布缝制的衣服。

很长时间，我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中条山的农民虽然很穷，但是很讲究仪表，他们朴素地认为，人穷不能失去尊严，而穿上新衣服出门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这种理念可能过于简单化，但它反映了处于贫困境地的中条山农民不屈不挠的一种向上的心态。

如今，除了粗壮的身躯，脸上风吹日晒的沧桑，亲切的乡音，你能判断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中条山农民，但你已经无法从穿戴上来区分他们是城里人还是农民了；而如果站在你面前的是年轻小伙，青春少女或者少年儿童的话，不仅穿的青春靓丽，而且会说普通话，那就更难以分辩了。

从手摇电话到网络 ..

1969年初，我邂逅一个临猗插队的北京知青，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被疑似“流窜犯”带到公社配合调查。然而从平陆张店打到临猗的一个电话居然用了八个多小时。

那时的邮局只有邮政业务，电信业务是军管的，话务室设在公社里面。话务员守着一个插转台，主要为备战备荒服务。电话都是手摇式，电源是两节巨大的干电池，打本地电话还可以，但是如果打一个长途，就必须让话务员提供方便。即使那样也不知何时能通，电话机可以把你的手臂摇肿。虽然那一次是一场误会，事情的结局皆大欢喜，但在公社忍饥受冻那么长时间，使我深深感到了通信的落后。

随着人员的大规模流动，随着农副产品的商品化，随着IT产业的飞速发展，家庭电话已经成为农民的生活资料。手机也早已成为年轻人的必备，我那些朋友们就人手一个，打电话，发短信，瞬间就能联系上。随着竞争的剧烈，话费也在不断下调，偶尔在电话里也可以聊聊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的普及使闭塞的中条山地区与世界连在一起。在网上你不仅可以搜到运城网，还可以找到平陆网，平陆论坛。每天都有许多网友在QQ上聊天，交友，聚集在“百度平陆吧”里，讨论着平陆的前景。去年，一些张店的小朋友还推出了“平陆张店吧”，让我感到非常亲切。我不得不感慨：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

出行方便了 ..

我插队的张店公社就在209国道边，按说交通应该很方便。然而，那时我们如果去县城，去运城，简直如临大敌。且不说简陋的砂石路面，且不说从村里到公社要走上8里地，且不说当时还有解放牌大卡车当作客车营运，仅仅一个乘车难就足以让人头疼了。

尤其是过年回家，我们可以在凛冽的寒风中站几个小时不见车来。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来了一辆车，人多得你根本上不去，常常发生因为乘车，知青和司机打架的事件。那时倒让我们练就了步行的本领，我就曾经从岭北村步行到过夏县庙前镇、到过平陆县城，到过三门峡，我的朋友还从枣园村步行到过运城。

那时的司机万众瞩目，巴结的人排溜溜。我在县城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汽车站的老谷师傅是河南人，一脸官司，没见他笑过。有时他求我们给他写写画画，我们反而还得给他陪笑脸，为什么？因为我们出行就靠走他的后门，他成了我们出门的通行证。

呵呵，真的该庆幸，这一切永远成了历史，再不会重演了。如今209国道修得光光亮亮，从运城到平陆只需一个多小时。然而却没有多少车走，因为运三高速公路纵贯中条山，张店、平陆都有出口，10块钱，同样从运城到平陆，半个小时抵达。县里的出租车满街跑，起步价三块钱，营运客车比比皆是，几乎可以通到每个村庄。司乘人员不厌其烦地动员路人乘坐他的车，脸上笑得像绽开一朵花。

至于司机，是个小青年就能掏出个驾驶本来，没有人巴结，相反得去巴结别人找工作。有点本事的弄点钱，自己买辆二首车胡球开着，混进有车族。农民也不必低三下四了，家家都有摩托车，有的还有机动三轮车，生产生活两用，说去哪，抬起脚就走。

窑洞和房子，谁有优势？ ..

我们刚去时，没见过窑洞，看见人们住在洞里以为这个地方很原始。但时间长了，就觉得窑洞实在是这里最有优势的民居了。张店处在中条山西部中篦的山口，风大寒冷，日夜温差大，先民在这里把窑洞作为居住首选是有道理的。加之这里土质结构紧密，有着坚硬的料姜石层，只要选址正确，挖掘合理，后期处理得当，应该是非常好的住所。

窑洞缺点仅仅是光线暗，但是这很容易克服，而其他的优势是房子所不可匹敌的。比如，冬暖夏凉，可以节约能源；和大地是一体，可以抗震；而且造价低廉。所以，我对窑洞是情有独钟的。

我这次回去看了看我住的窑洞，乡亲们说，那些窑洞几乎没人住了，人们又从坡上下移了几百米，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房子最大的好处是方便，但相比窑洞成本却高许多，这对还不算富裕的中条山农民来讲不能算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县里在我们插队的村里建了一所很大的院落。里面的窑洞宽敞明亮，墙壁粉刷得雪白，前脸装饰得非常美观，院子里的卫生间修得像宾馆一样豪华。据说这是为了开发旅游修建的，我说，可惜的是，如果把卫生间修在卧室里就好了，那就成了标间，而现在只能算是普通间。通过这一点来看，观念上多少还有些距离。

人们有了钱就先盖房，仿佛住房子就是现代化的象征，这其实是对现代化的误解，只能算是表面现代化。呵呵，当然多种选择是时代的进步，这也是农民的自由，是现代农民新的追求，我只能提出自己的建议。

种地的自由 ..

中条山地广人稀，自古以来是逃荒避难的地方，只要舍得气力，山上的地有的是，随便开，没人管。所以，这里的河南人特别多，都是解放前逃难来的。这里虽然是山区，却是棉麦产区，山上以玉米为主，基本上家家自给自足。

像我所在的这个小山村，根本就没有地主，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简单，虽然解放后土改给农民定了成分，但谁也不知道那是啥意思，也没有人拿成分当回事。听村里老人说，大村有地主，但是大都识文断字，心眼好，不欺负人。

这里的人们从来就没挨过饿，一个大跃进吃食堂把人整炸了，个个饿得皮包骨头，人们提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又“农业学大寨”、又“以粮为纲”，也不允许自由耕种，除了种粮食棉花以外，再不知道还能种什么值钱的农产品。农民种什么，种多少亩地，都得听上头的，并且要层层上报，否则队里的干部就是犯错误。有一年，上头布置下任务，让种高粱，而且专门派人在海南岛育的种。结果，生产队种了也没分，都留下喂牲口了。还真的没吃过吃难吃，屙难屙的红高粱。

除了上辈子留下来的一些柿子树和自己房前屋后种植的少量果树以外，村里不生产可以做为商品出售的农副产品。每年队里分的柿子，社员们都是自己享用，最多串亲戚时当作礼物带去，从来没有人把它挑到集市上卖，也没有人买，太多了，不好运输。因此农民见不到钱。

那时没人敢想：把种粮食的土地栽成果树，再把果实拿去卖，卖来钱干别的，甚至买粮食。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变了，土地分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变了，也根本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模式，人们开始注意市场信息，让自己的产品更容易销售。他们开始大面积种果树、山楂树，最初的苹果曾大批量销往广东。现在还种烤烟。虽然收购价格还不

算高，但毕竟能够靠辛勤劳动换回活钱。

但是村里这种被动的生产销售的方式还很陈旧，很脆弱，比如去年的苹果卖到八毛钱，而今年不好，苹果大丰收，却被雹子打了，挑出好的来只能卖一毛六一斤。我看见村口有一辆汽车正在收购----而我们在路上同样的苹果最低要卖到一块五。所以我的感觉是：农民挣点钱太难了！

人口结构的变化 ..

时光荏苒，我记忆中的老人大都去世了，给我留下无尽的哀思。现在的老人就是我们那时的青壮年。

中条山因为地处山区，县里没有火葬场，农民还实行着土葬。我在那的时候，见过一次埋人。中条山的农民窑洞打得好，给过世的人打墓穴更是讲究。选好地方之后，他们就开始挖一个一米×两米多的坑，深度一般要挖三米以下，然后在侧面再打一个洞口，洞口里面再掏一个很大的空间，下面是一个非常平整的炕，把棺材放在炕上以后，用石块或砖把洞口砌死。

挖墓穴时，全村的年轻人都要参加，一是他们有力气，再就是让他们最后送老人们一程，警示他们不要忘本。墓穴打造得非常精致宽绰，乡亲们说：山里人活的窝囊，没享受过好日子，死了一定要舒舒展展，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

改革的春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一下子就直捣人们最传统最古老的习俗。村里的学生娃如果上了大学，几乎百分之百不回来。其他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混好了，回来的可能性也很小。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他们跟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都走了，村里如果死了人，就找不到下葬的人，必须跑到镇里甚至县里去雇人。

好在很多乡镇都出现了专业的殡葬队伍，从打墓穴、抬死人，一直到入土为安，全部可以讨价还价地协商----这也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威力，只要市场有需求，就一定有人去做。但是，面临老幼守村的局面，以后会怎么样呢？不可想象。

村民自治 ..

离开县里的头一天晚上，我走访了一个农民企业家老朋友刘玉生。他开着好几个消化农产品的加工厂，解决了全县山楂的销路。不仅如此，他还是研究农村工作的土专家，文章经常见诸山西农民报。他说村里最近聘请他回去做村支书，他也想回报一下乡亲，已经答应。他说：“现在有些企业家愿意回村里给乡亲们办点实事，像我这样不计报酬的人也不是我一个。县乡政府号召企业家回报乡里，我义不容辞。”现在村里的事县乡基本上不介入了。虽然分了地，温饱解决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农民手里钱很少，很多地方年人均收入还在1000多元，县里头上还顶着一只“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许多村民遇上疾病、孩子上大学等等大事情，经济上立刻显得捉襟见肘。

村民自治，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开始。但是自治不等于回到一盘散沙。我想，农村的事好比家务事，你不干，好像没有什么可干；但是你如果想干，你会发现有干不完的事。所以村干部干什么，怎么干，还需要认真研究。

比如我前面说的苹果丰收了，价格就一落千丈，可是大城市的超市里面苹果价格仍居高不下，那么我想，我们应该通过哪些渠道来推销中条山的农副产品呢？怎样发挥绿色通道的优势呢？我们能否再开发一些项目让中条山的父老乡亲进一步脱贫呢？这些都是要操心的，特别是县乡政府。

刘玉生是打算带领村民致富的，我对他寄予厚望。我也希望大家集思广益，都来建言献策，为我们的中条山走向富裕而努力。

保护中条山 ..

我县东山里有许多矿藏：煤、铁、石膏、大理石、铝矿石等等。但是这些矿大部分为“鸡窝矿”，开采成本过高，所以以前基本处在沉睡状态。东部山里还有原始森林，我插队的第一年曾经去那里扛过木头。我很想故地重游，但是大家说那里没有路，你的年纪也不比当年，还是沿公路转一圈看看。

于是我们开着一辆吉普车沿黄河边的盘山路蜿蜒而上。当车开到山里的时候，我不禁惊呆了，远处很多大山几乎被劈开，茂密的林木和植被荡然无存，露出了白色、黄色或灰色的砂石土层，好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夫人被残忍地开膛破腹，美丽的脸庞被迎面撕烂。车子开了几十公里，虽然在封矿期间，我仍多次看见停在路边的推土机、掘进机和吊车，多次看到被破相的惨不忍睹的大山，令人触目惊心。这些植被、森林、水源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保留下的生态遗产，如今却被毁于一旦，修复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说有的黑心矿主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但我仍要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发出呼吁，如果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那么中条山就是我们的父亲山。如果我们还深深爱着我们的父母，那么就把这饱含深情的爱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黄河和中条山！

我从娘子关进山西，途径许多城市到运城，一路走来，老实说，只有我们运城的空气最好。这里的蓝天，白云，绿树，青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我们一定要珍惜她，爱护她啊！

发生在40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页沉重的历史，虽然它已经被翻了过去，但是留在我心中的痛和爱是永恒的。对我来说，所谓知青情结就是农民情结，就是黄河情结，就是中条山情结。这些天，不论是在运城，还是在平陆；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朋友们对我的热情和真诚让我无以言表。这一份深情，这一份厚爱，将陪伴我的一生。我的心早已和运城，和平陆，和黄河，和中条山，和山村里的父老乡亲，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千里边陲巡演

——随云南知青艺术团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巡演日记

永远的故乡

［明传电报］

各县市（区）文体局：

三十多年前曾到德宏生活工作的昆明知青，一直深深眷恋着德宏的父老乡亲，为表达对第二故乡的思恋，回报当年德宏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知青并教会知青生产生活的本领，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情谊，……拟在“五一”国际旅游节期间赴德宏各县市（区）巡回汇报演出，为保证知青艺术团演出成功，根据州委指示，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演出时间安排（略）

二、 知青艺术团人员（略）

三、 各县市（区）负责落实的事项：

1、 根据演出时间安排，负责演出场地的安排布置，演出环境的氛围的营造，灯光音响的准备。

2、 组织群众观看，并根据各县市（区）情况，选择2 — 3个本地节目参与演出。

3、 知青艺术团的食宿由所到县市（区）负责，要做好接待工作。

各县市（区）要明确具体负责人并报州文体局，要将演出场地、音响、灯光和观众组织工作落实到位，知青艺术团将派出联络员提前与各县市（区）文体局联系有关事项，请作好接洽工作。

德宏州文体局

2002年4月22日

这是那片土地的呼唤！

这是来自养育了知青粗糙而鲜活的青春的那片土地的邀请。

三十多年过去，当时的迷惘、苦闷、困顿与辛劳在渐渐淡出，而那些磅礴大气而又俊美秀丽山河的印象、善良质朴的人民以及他们给予知青的亲情，却日益在记忆网膜上凸现。一种情愫，一种心愿，一种期盼在聚集累积，随岁月的流转而与日俱增。这，是思念，对故土的思念之情。

久违了，我的德宏。

——这就是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诞生的地方。

——就是被傣族称之为“孟巴娜西”即富庶安宁的地方；

——就是景颇族称之为“紫拉丽钻更雅”即四季常青鸟语花香的地方；

——就是被德昂族称之为“阿雅蕾胧”即神仙居住的地方；

——就是被傈僳族称之为“嘎奇那穆”即没有悲痛忧伤的地方……

德宏的傣族语义是：怒江下游以西的地方。她位于云南西部，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503.8公里，面积11526平方公里。德宏地处高黎贡山尾部主脉，属云南高原向下倾斜的第三级台阶，瑞丽江、大盈江流经全境，怒江为东面界河。德宏气候类型属南亚热带低纬度低海拔的季雨林型气候。德州辖潞西市、瑞丽市、畹町市、陇川县、盈江县和梁河县。德宏以傣族、景颇族为主体，有阿昌、德昂、傈僳等少数民族，总人口99.88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1.73%。

曾几何时，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撒落在这115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从狂躁喧嚣的城市“红海洋”毫无准备地被抛向充满原始静谧的山乡，虚幻的“崇高理想”与严酷的现实造成的巨大反差时，知青们几乎毫无例外地经历了惶惑与苦闷的精神磨难。然而，也正是如此，使知青逐渐从虚幻浮躁中走出，接受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善、美的最本质的人性的再教育。他们去耕种企盼、收获欢乐、走向成熟，去了解中国的农民融汇他们的情感，去认识生存的含义、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坚韧，去体会底层的人性和平民的亲情。脚，更坚实地立于厚重的土地；心，更紧密地贴向人民。而这一切，都是人民以其真实、诚实的生活，善良、淳朴的品格不动声色地对知青施以的影响。在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给了远行的年轻生命以亲情的看顾，以五谷杂粮山泉烈酒赐予知青成熟的热血与钙质，在那个扭曲的年代给予了知青以人生的矫正。使知青在以后的生活中以诚实、勤奋、坚韧而又宽容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真是需要沉淀的。人所经历的一切，不可能象擦去纸上的字迹一样，说抹去就抹去了那样简单，尤其是知青一代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履历；同理，对于知青们曾留下血汗与泪水的那片土地的记忆，也不会因为知青们的离去而消失殆尽不留痕迹。相反，随着流逝的岁月的冲刷与淘选，记忆的筛子里留下的是金子一般沉甸甸的真情，如故土之于流浪者，母亲之于游子。时光没能消磨了相互间的眺盼与思念，反与日俱增。回首三十余年光阴，蓦然发觉，其实这眺盼与思念，早在知青们挥别村寨前大青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自此萦绕一生。

昆明西昌路上的云南知青联谊会里，空气中溢满了兴奋与紧张，千里之外的德宏与知青联谊会双方的信息不断地在相互传递，即使在夜深人静的午夜，那些亮如白昼的房间里还闪现着这些中年人忙碌的身影。……节目创意、动作设计、总谱写作、音乐制作；舞队、歌队、乐队的分解排练及合成；服装、乐器、道具制作采买；联络协调、后勤保障等等，一切都是知青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排练场里只有一个信念：尽最大能力，以最好水平，回报第二故乡！

年届半百的人们忘我的兴奋忙碌令孩子们好笑，怎么就一下都成了老小孩？令许多人疑惑不解，一大把年纪了流汗受累不说还要请假还要贴钱。不解释，付之一笑，那笑是甜的。

确定方案，确定；节目，编创完毕；排练，全面铺开；用品，备齐；预演，审查通过；联络组，出发了；车辆，落实……

万事具备。

4月29日清晨6：30时，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停车场。云南知青艺术团演职人员一行50余人，代表着原在“外五县”插队的知青以及全云南省知青的心愿出发了。自4月29日——5月7日，云南知青艺术团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巡回演出将途径保山、芒市、畹町、瑞丽、陇川、盈江、梁河、腾冲、保山、昆明等县市，行程两千余公里。

滇缅路情结

4月29日：晴；昆明——保山。

据先遣组发回信息：因当地要求，演出增加一场，全团应于30日抵芒市，并于当晚演出。云南知青艺术团遂于29日晨6：30时启程，当日赶赴600公里外的保山，开始了为期9天的千里边陲巡回演出。

重返第二故乡的激动，预演的成功，使车厢内弥漫兴奋的因子，歌声笑声此起彼伏。不难想象，这群能歌善舞的人们，可以令气氛活跃到什么样的程度。

车过碧鸡关，一如往日，思绪就紧紧缠绕住了这条蜿蜒于滇西缅北直至印度利多的公路，以及她穿行其间的崇山峻岭峡谷江河，就那么固执，以至于满车欢声笑语没能完全转移我的注意力。在不多的几次滇西之行中，我无一例外的被同路人认为心不在焉，为什么？我没有一次能解释了这种疑惑。是这条以血肉白骨铺就的公路和那些被战火烧灼过的星罗棋布的战争遗迹？是雄劲磅礴而又神奇迤俪的自然风光和藏觅于其中的历史秘密民俗风情？还是因了成千上万年轻的生命曾撒落于那片土地而我又恰恰与他们有着相同的履历？我不能确定，或许皆而有之。大慨，这就是一种情结。

至此，320国道便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中印公路滇西段——滇缅公路了。

滇缅公路：东起云南昆明，西出边境重镇畹町与仰光公路相接，全长963公里。沿途皆高山大壑，地形险峻。

公路始筑于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底，来自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在抗日救国信念鼓舞下，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劈石凿岩，人挑肩扛，艰难备至，历时10月，在滇西，缅北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修筑了滇缅公路。其间因爆破，坠落，劳累，疾病而死的不计其数。1939年1月正式通车，到1941年底，在近两年时间内，运入中国的战略物资就达160173吨，日平均220吨。

1939年冬日军占南宁，断我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9月入侵越南切断滇越铁路，1941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苏联对华援助停止，同年12月香港沦陷，滇缅公路成了支撑中国抗战的唯一国际援华通道。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惊呼："……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的滇缅公路，我后方军民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然而不是"倘若"，却正是日军的战略意图：断绝中国几乎百分之百的战略、民用物资都依赖进口的获得抗战物资的通道，占领中国西南大后方以彻底征服旷日持久牵制了日本陆军半数以上兵力的中国；1942年1月，日军突破泰缅边境，缅战爆发。于是，与滇缅公路密切相关的一个专有名词诞生了——中国抗日远征军；围绕着这条公路的一场大血战展开了——滇缅抗战。

战云硝烟飘散已半个多世纪了。那慷慨激昂的大进军，惨绝人寰的大溃退，气势恢弘的大反攻，已凝固成一幅幅褪色的老照片。厉厉冲杀声，汩汩壮士血，滴滴英雄泪，累累白骨堆都已融入了滇西、缅北、印东南的高山、大河、丛林、沃土。1942年至1945年的整整三年中，以前后四十万中国远征军为主力的中、美、英、缅、印、泰军队，同凶恶的日本强盗在这一广阔的地域里，有过一场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大血战。

曾问过同行人，回答几乎等于不知道。我理解，在欢歌笑语中插入这沉重的话题，本身就是不合时宜或自私的，总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结而苛求于人吧，我无权破坏大家的好心情。可是，我真的希望人们了解这段悲壮而又辉煌的史实，记住那些壮烈于异国他乡的忠烈英魂。毕竟，那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第一次"异域作战，扬我大汉声威"并以完全的胜利而告终的壮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艰难阶段首开的胜利先声，是云南的骄傲和光荣！要知道，云南人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安宁过了，那曾是远征军新5军赴缅的集结处，是战死的200师师长戴安南遗骨换棺木的地方；楚雄过了，那里曾设有远征军后方医院和日军俘虏中转站；祥云过了，那里有陈纳得"飞虎队"的军用机场；大理过了，那里是远征军新6军踏上征程的出发地……车窗好似历史的屏幕，一个个中外抗日名将闪过：史迪威、陈纳德、卫立煌、孙立人、廖耀湘、杜聿明、郑洞国、李弥……汽车马达声中隐约传来他们的声音：孙立人如是说"……三个月前，我们被迫退出缅甸，如今，我要率领你们打回去，夺回与我们祖国生死尤关的滇缅公路。……我们需要一支钢铁般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是别人，就是你们——英勇的中国远征军。"背景是雄浑的《中国远征军军歌》："兄弟们向前走，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我们的肩头。日本强盗要奴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誓死奋斗。……"

车至下关，没停，一头钻进点苍山，进入滇西峡谷地带，在西洱河路段走上了弹石路面的老路，快修好的宽阔的大理至保山公路紧傍旁边，反衬得老路益发的沧桑。明知老路仅仅只有一小段，可我却期待着象以往滇西之行一

样在老路上一直走下去，再见那些即将被时光的尘埃淹没的历史遗迹。

越过澜沧江峡谷，行近滇缅公路重镇保山已是黄昏时分。暮色中，我搜寻着马王屯——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此时，一个条目蓦的闪现：保山“五·四”轰炸惨案。1942年5月4日，逢集，学生节。大批难侨、赶集的人们和开运动会的学生约10万余人拥满城街大小公共场所。中午时分，日机54架分两批飞临保山，投弹扫射，保山城除东北角，余均遭日机狂轰滥炸而化为废墟，当场遇难10134人，3267间房屋被毁，酿成保山有史以来最大惨案。全城尸山血海，阴风惨烈。此后，瘟疫蔓延滇西（据考，系日寇投放细菌弹所致），又夺去保山6万余人的生命。再过几天，就是“五.四”轰炸惨案60周年纪念日了，保山应有比如公祭之举，此前必有若干铺垫与准备。我暗自庆幸：无意中竟赶上了。

然而没有。没有什么纪念活动，哪怕一丁点。

夜的保山霓虹闪烁歌舞升平，街头自娱的人们歌舞着“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就是在滇缅抗战中同仇敌忾，倾其所有，配合军队内惩汉奸外御强敌，为民族解放做出卓越贡献，付出巨大牺牲的保山；这就是在那两年零八个月里，先后惨死平民9万余人，民工牺牲2.46万人，房屋被毁2.8万间，遭受日机轰炸520架次的保山；这就是“五.四”轰炸惨案大劫之后，依然咬紧牙关参军、支前、劳军，直至赢得最后胜利的保山。

是的，这就是“五.四”轰炸惨案60周年祭之际的保山。

我在《滇缅远征——滇缅抗日事记》中写过一段话：

“历史，这是一段悲壮辉煌、可歌可泣的历史，又是一段被不公平地淡漠了很久的历史。幸而，历史终归是历史，从巍巍高黎贡到莽莽野人山，从滚滚怒江澜沧江到滔滔伊洛瓦底，那些裸露着的星罗棋布的战争遗迹。沉没于荒草丛中的断碑残碣、依然繁忙的滇缅公路、滇西百姓和远征军的老战士心中都铭刻着这血写的记忆。这片地跨三国的土地上，永驻着十余万中国军人的忠魂啊，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君不见，山河间一股荡荡英雄气。”

不会忘记，真的吗？我在惊异人们健忘的同时怀疑着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一厢情愿。

在滇西当过知青的作家邓贤在《大国之魂》中有这样的文字：“我希望我的同龄人，除了知道一个白求恩，还应当知道更多的外国人；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还应当知道更多的被称做‘历史’的那种东西”。

我深以为然。

附资料：

中国远征军滇缅作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席卷东南亚，由泰国进入缅甸，对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构成严重威胁。1942年2月，10万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滇缅公路。

3月中旬，远征军第200师在同古与来犯日军展开血战。日军以飞机、大炮、坦克猛攻，并向200师阵地施放毒气。200师官兵以集束手榴弹、汽油瓶与日军坦克搏斗，战况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战至月底，200师联络与给养均被切断，被迫后撤。4月初，英军一部在仁安羌以北地区陷入日军包围。远征军新38师紧急驰援，击溃日军主力，毙敌1200余人，克复仁安羌，救出被围英军。4月底，日军突然袭取腊戍，并长驱直入，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与中国军队隔怒江对峙。远征军被截断退路，陷入极度困境。远征军的两个师撤往印度，部分撤回国内，主力则穿越荒无人烟的密林，辗转国境继而向印度退却。远征军在后撤途中，由于给养匮乏，传染病流行及野兽、蚊虫的侵袭，伤亡惨重。远征军首次入缅，虽英勇作战，但因盟军之间意见分歧，指挥不协调，终以惨败告终，10万中国远征军仅幸存4万人。

入缅作战失败，滇缅公路被截断，对华援助只能通过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其艰难可想而知。因此，盟国在缅甸败北后不久便着手制订反攻缅甸、打通中印缅公路的计划。美国在印度的兰姆珈和中国云南的昆明等地开设了训练基地，帮助装备并训练中国军队。

1943年，中国驻印军在美军配合下，穿过渺无人迹的野人山，向缅北反攻，同时修筑中印公路印缅段。驻印军经艰苦作战，于1944年3月肃清胡康河谷的日军，6月攻占孟拱河谷。5月中旬，中美混合突击队突袭缅北重镇密支那，占领密支那机场，援军空降后即开始攻城战斗。日军凭借坚固工事困守。双方激战两月余，8月初，盟军在优势空军和炮火支援下，终于占领密支那。11月，驻印军以陆空炮兵协同、逐点歼灭的战术，攻克战略要地八莫。

1944年5月，驻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也强渡怒江，沿滇缅公路向日军发起反攻。9月，远征军克腾冲，10月克松山，11月经血战克复龙陵、芒市，1945年1月克复畹町。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在芒友会师，胜利打通中印缅公路。

中国军队第二次入缅，浴血奋战，全歼日军2个师团，重创其2个师团。远征军为此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4万余。

穿行大峡谷

4月30日：晴间多云，保山——芒市

一

天微曦，边城尚在沉睡中，云南知青艺术团即登车启程，告别了古称永昌府的边关古城——保山。先遣组昨夜

发回消息，德宏州府潞西市（即芒市）在繁忙的国际旅游节开幕式准备的情况下，已作好今日对我团的演出和接待工作。也就是说，我团今日必须通过怒江大峡谷，并于当日下午抵达约200公里外的潞西市。

距离不远，若在平原地带不过是一个来小时的车程，可这里是滇藏地槽褶皱断裂带，著名的滇西纵谷区。巍峨磅礴，绵亘起伏的高黎贡山和怒山夹峙着奔腾不息的怒江，形成一条纵贯南北，长310公里，平均深度为2000余米的仅次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世界第二大峡谷——称为东方大峡谷的怒江峡谷。因其险峻陡峭，在滇缅公路的修筑过程中，这一段也是耗工费时死亡人数最多的，即使从现在的地图看，公路在怒江两岸短短的距离里竟有大大的六个弯。因此，不能简单的以公里小时来计算。没有幸侥，我们还是遇上了塞车。

车走新路，我不禁怅然，因不能再见那座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和松山战役纪念碑了。惠通桥顶住了日军为封锁滇缅路而进行的狂轰滥炸，担负了繁重的抗战物资的运输，1942年5月5日，中国远征军在一发千均之际断桥阻敌，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又从该桥强渡怒江开始大反攻。松山战役远征军血战90多天，阵亡6763人、伤者逾万，全歼松山3000守敌，夺取被日军称为“东方马其诺”、美报称为“东方直不罗托”的战略制高点。我曾站在海拔3000余米的松山大丫口主峰俯瞰山下，江若带，桥如丝，88公里长的保（山）龙（陵）公路在两岸山间绕来绕去，看对岸婆海山的距离似比山下的江、桥还近些，地形险要，可想当年战斗的惨烈。

如今，也不知江上那座钢索吊桥可安好，山顶的弹坑、堑壕、焦树和路边的墓与碑是否依然，还有那肃穆的血红色的峭壁……

二

下峡谷的路好长，同昨天穿越澜沧江大峡谷时一样，长时间的刹车致使车轮钢圈温度剧烈升高，冷却水浇上去即腾起团团蒸汽，透过汽车的轰鸣，仿佛都能听到“吱吱”的声响。江东的山植被很差，单调的铁锈红色令人昏昏欲睡。朦胧间，《富饶美丽的潞江坝》年代久远的歌声在车厢里响起，睁开双眼，大江扑入眼帘，我们已经到了峡谷底部，潞江坝到了。一车的老头老太太雀跃了起来，懂事的司机乐了，把车开进了加油站。

怎么能不激动呢？这一车当年的知青，谁没有读过《边疆晓歌》？而那部小说的原型正是至今仍留在这里的特殊的“少数民族”——“支边族”，作为他们的后来者的知青也在这里留下了“知青族”的青春的血汗甚至生命。在地方有关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知识青年和科技工作者怀着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和奉献精神，凭血肉之躯、用青春和血汗一寸一寸地征服着这片蛮荒之地，把毒瘴四起的潞江坝变成了富饶美丽的聚宝盆。”知青艺术团有许多人在插队时到过潞江坝，他们梦回的故乡就包括了潞江坝秀丽的倩影。

啊，这就是歌里唱的潞江坝了。

从青藏高原咆啸而来的野性大江到了这里，顿生柔情，舒缓地展开胸襟，悠悠划一个漂亮的弧，流过由怒江河谷的一组冲积扇和高黎贡山、怒山低海拔台地构成的坝区，不经意间荡出许多潇洒的石丛，秀丽的沙滩和美妙的小岛。雾将散尽，阳光妩媚，宽阔平缓的江面上有一条小渔船的剪影，江边的那个水下温泉冒着腾腾热气；江水如镜，倒映着两岸婀娜的凤尾竹和高大的木棉树，白色的沙滩反衬着翠绿的高黎贡山；阡陌纵横的坝子里，四季不败的花儿点缀其间，在微风拂煦中摇曳着的热带水果发出醉人的香味，就连路边不知名的行道树也是红肥绿瘦。蓝天、碧水、银滩、红花、绿树、青山……潞江坝典型的亚热带干热河谷的景色，在将尽未尽的薄雾轻纱里柔漫温情地展露着。美，真美啊！美得令人心尖发颤。

“富饶美丽的潞江坝，人人见了人人夸……”欢乐明快的歌声洋溢着热辣辣的情感。

三

行至怒江大桥的边防检查站，守桥士兵许是知道我们要来，没有停车检查，他向我们行礼后给了放行手势，我们向他致意，有人问候：孩子，辛苦！我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笑容灿烂在那张年轻黝黑的面庞上，一排雪白的牙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信，若不是军纪，他会亲切的回应这些阿姨伯伯们的问候，肯定会！车上响起了《想给边防军写封信》的歌声，这是我们这次带去的节目之一，留给可爱的小战士正合适。

过了怒江大桥就进山了。高黎贡山，地处喜马拉雅东部南延地段，是伊洛瓦底江和怒江（萨尔温江）的分水岭。南北走向的地势北高南低，最高点是北部海拔5128米的嘎啊戛普峰，最低处在西南部盈江县中缅边界河流交汇处，海拔210米。高黎贡山是国家级动植物保护区，世界A级生物保护区，有“自然博物馆”、“物种基因库”的美誉。

高黎贡山地势险峻，气候类型复杂，立体性气候显著，“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我曾乘军车从功果桥（另一二战名桥）翻越过高黎贡山，头一天着汗衫短裤汗如雨下，一路上山一路添衣，到了雨雪纷飞的山顶就裹上了战士的军大衣。第二天下山则经历了相反的过程。后有一同事出差带回一块泰山石，神情仿佛装回了座泰山，论及山之大小，我就说了一句话：“未去滇西莫谈山”。提起山，我真有曾经沧海之感。

被称作“天界”的高黎贡山，似利刃般直刺天穹。峰巅眺望，云海茫茫，山浪排空。历史深处，一条细若游丝的古道逶迤而来，穿越澜沧江大峡谷、怒江大峡谷，在马帮驮铃清脆的叮当声中横翻高黎贡山，而后蜿蜒西去，直抵西亚，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流域与中华连接，这就是被称为“蜀身毒道”的南方丝绸之路。在记录片《最后的马帮》里我们还能听到这鸣响了两千多年的驮铃清脆的叮当声。就在这里，上演了中国抗战史上唯一的一次战

略反攻——滇西大反攻的正剧，二十万穿草鞋和灰布单衣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前赴后继仰攻高黎贡，与日寇逐山头争夺，殊死搏斗，横扫怒江西岸。高黎贡山中的古道上，有成千上万支前的民夫骡马走过。攻克松山，克复腾冲，夺取高黎贡山这一天然屏障，为大反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至今在山谷、密林深处依然留有无数战争遗迹和座座坟茔以及驼峰航线上失事的飞机残骸。同车的曾在高黎贡山一侧插过队的知青闫金川告诉我，当年他带两个饭团一把柴刀翻过高黎贡山到潞江坝，在山上还见到日军士兵的坟墓，面对日寇墓，同行的乡亲都面露鄙夷……一切，都静静地躺在高黎贡山的深处，面对苍穹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滇西有段民谣："象达的姑娘龙陵的雨，芒市的谷子遮放的米，护撒的腰刀腾冲的玉"。翻过高黎贡山进入龙陵地界后，象达姑娘的美丽没有见识到，而龙陵那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雨却真让人匪夷所思大开眼界。豆大的雨点在一瞬间不由分说地砸下，其突然让我们吃惊，而在路边挑担的傣族姑娘仍不紧不慢地走着，蓦地，雨就停了。拉开沾满雨珠的玻璃，嗅着潮湿的空气，我的目光搜寻着据说就在路边的日军碉堡……

龙陵沦陷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各族人民不甘奴役，自发组织起来与敌人展开斗争。有朱嘉锡、常绍群等热血青年组成的龙潞抗日游击队；有闭境守土抗战的傣族土司第22代传人线光天；有为远征军送情报、营救远征军便衣队员的巾帼女杰赵押凤……，龙陵的敌后斗争可歌可泣。

这里是滇西大反攻腾（冲）——龙（陵）战场艰苦卓绝的拉锯战的旧战场。1944年6月至11月中日两军数万人马在松山——黄草坝——龙陵一线短短的距离里昼夜激战，反复搏杀，尸横遍野。在历时数月险象环生的拉锯战中，龙陵城三易其手。腾冲、松山相继告捷后，中国远征军合兵攻取龙陵，取得腾（冲）——龙（陵）战场的胜利。龙陵之战成为滇西大反攻由攻坚转为追击的标志。

有个知青朋友在龙陵任科技副县长时，应我的要求，寻访龙陵及周边遗址遗迹，以至于他自己也沉湎其中，他说："……龙陵及周边遍布着战争遗迹，可重要的并不在于这些遗迹的本身。遗迹总有一天会消失，而中国军人和边陲各族人民爱国御侮、不屈不挠、舍生取义的精神，及其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所反映出的凝聚力，让你看到的是一道无形的边关长城。这才是最重要和最令人感动的。"

两日旅程，我们连续穿越了澜沧江大峡谷、怒江大峡谷，纯净清新的环境，置换着体内沉积的污浊之物，在这遥远的边地，我仿佛也穿越了某种精神的高度……

走进"孟巴娜西"

4月30日：晴间多云，阵雨；芒市（潞西）。

顺高黎贡山一路西下，出了龙陵地界，山水风景与层峦叠嶂气势恢弘的滇西中部高原相比，就明确地显露出差异来。高山平坝，峡谷丘野，风格迥异。

横断山脉瓜分了滇西高原这块自东北向西南倾斜的切割山原，亚细亚西南的次大陆由此延伸到印度洋，华夏水系在滇西中部便已东西两分，眼下再也见不到东流之水了。这里是云南高原向下倾斜的第三级台阶，海拔纬度下降，高原特有的立体气候和南亚热带低纬度低海拔的季雨林型气候，使山上青松翠柏，冷风扑面；山下雨林茂密，热气升腾。夏无酷热，冬无严寒，雨量充沛，物种繁多。这里的山，少了嶙峋多了俊秀，亦不失高原的磅礴巍峨，高深幽远与玲珑典雅相照。这里的水，带着诗一般的韵味在青峰翠峦之间悠悠流淌积蓄，沿着峻岭陡谷依势而下，涌入贯通全境的瑞丽江和大盈江，串起了群山环抱的36个河谷盆地——“坝子”，悠然的江水波光粼粼迂回曲折于其中，两岸翠竹婆娑、树密花繁，平川沃野，阡陌交错。真是块“插下锄把也发芽”的宝地。山水物华，互为因果。在这里看山，当傍水而审其崔巍；观水，须倚山而度其深远。“山川真脉，余已得之”。在足迹遍及万水千山的徐霞客眼里，如此山水风土，其威武雄壮之气势，轻盈柔曼之情态，足领高原风骚！

这，就是“勐巴娜西”，传说中神奇、美丽、富庶、安宁的天堂。

走进德宏，热闹的车厢安静了许多，知青们的目光一投向窗外便被粘住了。我注意到了他们的眼神，却不知用什么语言形容它。是往事如烟的沧桑，是魂牵梦萦的思念，是久别重逢的欣喜，是梦想成真的激动，是对远去青春的追忆……唤一声德宏，眼中顿涌咸波万倾。

知青插队时，边疆还是比较落后的。在内地早已实现人民公社化了的时候，这里还是合作社，一个寨子便是一个社。乘了六、七天车才抵达目的地的知青们，先是在区里分到各合作社，又是在寨子的大青树下由各家各户带回家的，集体户少。德宏傣族地区为佛教地区，孩子自小便要剃度穿袈裟习经文，加上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的环境，这里民风敦厚温和，人民善良淳朴。他们对知青是以自己家的人来看待的，当然也是闹过知青“是毛主席给我们傣族送来的媳妇女婿”的笑话，但他们把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的情感，真切感人。确切地说，他们是替遥远的城里的父母们领养了这些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尽管当时他们的的日子也很艰难。正因为如此，德宏的知青们得以完全的进入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甘苦共尝，悲喜同心，人民给予了知青以亲情的看护、人生的矫正和人性的教育。这与“再教育”理论南辕北辙，其结果也是“再教育”理论的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

记得乐队的一个演奏员同我商量，说到明天演出目的地的途中，公路要路过他家，要求给五分钟回家看看。家？你家怎么会在……我立刻反应了过来，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我当时的情感。在德宏盈江县插队的知青、作家张蔓菱在她的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就是我当时情感的真实写照。感谢了，边疆的人民，在那个年代给了知青一个充满温情的家。所有的知青都会这样感谢你们。

芒市傣语称“勐焕”，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到此地刚好天亮，便给这个地方取名“勐焕”，意思是“黎明之城”。芒市1932年改称潞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与缅甸毗邻，国境线长68.23公里。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汉族33万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建设家园共御外敌，与邻国边民建立了深厚的胞波情谊，创造了3000年水一样纯净，山一样沉稳，森林一样神奇，钢刀一样坚韧，大地一样厚实的勐巴娜西文化；这里是中国较早通向世界的门户之一，是古南方丝绸之路、二战盟国援华抗日的大通道，也是中国远征军毫不留情追歼日寇的旧战场。如今又是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前沿。

在距芒市（即潞西市）几里路的一个寨子旁，车停了下来，德宏州1997年邀请知青返乡万人空巷鼓乐喧天的夹道出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天京、沪、渝、蓉和云南在德宏插队的知青近2000人，举着标语旗帜流着滚滚热泪步行进城的情景又历历在目。据说那样的热烈场面是芒市历史上没有的。提前一天到的联络组和我们在这里会合了，停车十分钟，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安排，我觉得人们都需要有点时间调整一下自己了。

全团1：30时抵芒市，午饭后各队自行排练。乐队一哥们当年从寨子里抽调到芒市县宣当演奏员，一干人就跟着迫不及待的他去怀旧了。“县宣”一词不知文革词典里是否收录，意为“××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当于现在的县文工团。当时各县的县宣聚了很多能歌善舞的知青，边疆的城小，一搞汇演，承担汇演的县城就一街都是南腔北调的知青，几乎成了各县知青间的聚会。当年的县宣驻地现已是文化馆，令人惊奇的是那哥们当年的宿舍居然无恙。门锁着，他趴在窗台上对这间十余平米的小屋足足看了十几分钟，然后表情复杂地和我们谈起与室友、现知青艺术团团员王泽之间的逸事，以及他们宿舍的那个被蚊子叮急了的景颇族演员怎么愤怒地挥舞景颇刀将蚊子砍杀于刀刃的趣事。无独有偶，不仅乐队，其他队也有忙里偷闲“回家”的，于是晚饭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就是：回去了吗？因路远不能回家的知青只能面带羡慕和怅然的表情听别人说了。

由于穿着统一印有“知青之恋”“故土情深”的字样的T恤衫，在街上，我们的回头率是很高的，人们多投以友好的微笑。返回宾馆的路上，一个四川自贡的小老板对着我们叫唤“我也是知青！”，我们的小号演奏员、一个西双版纳建设兵团的重庆知青与他攀谈起来，邀请他看演出，瞧他那激动样，他一定会来。

当晚演出的小礼堂也是当年县宣的排练演出场地，进门右边墙上第一块标语居然还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语录，只是重描了，连字体都没变。但别小看了这个小礼堂，在那已很陈旧的舞台上，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外国友人和大小明星都曾光临过。欢迎的横幅、市领导热情洋溢的致辞、热情的观众和特殊的氛围，一阵阵掌声和一束束鲜花使团员们激情涌动，演出很成功。幕间，不断有故人重逢时发出的压低了声音的惊叹；后台，因给房东带了东西而没时间送去的舞蹈演员刘意明，意外发现电视台摄影就是他家的孩子，了却了心愿。演出结束后，不断有人与我们打招呼，不断有人被约走……

芒市凉爽温柔的夜令人精神爽朗，傣家的米酒甘甜绵长，夜宵吃得很晚了。故土重返、往事重温的感觉真好。这群微醺的中年人竟似孩子般的在油棕掩映下的人行道上扭秧歌，手挽手正步于大街上喧哗而过。原谅他们吧，芒

市，原谅他们搅扰了你夜的宁静，要知道，他们是你远行回归而天明又将离你远去游子，就让他们象当年一样再忘情地放纵一次吧，也许，从今往后他们只能在心里和梦中倘徉于你的温软的土地了。

你这多情的土地

5月1日：晴；芒市——畹町。

“五·一”节是国际旅游节德宏分会场开幕的日子，德宏州组织了万人踩花山、庆祝游行和大型演出等系列活动。尽管4月13日至15日的傣历新年已过，但从表现边疆特色、民族风情的角度来说，今天依然举行泼水节，无论民间和官方对泼水节的理解如何不同，这都不失为必须的重头戏。昨晚，潞西市长在演出完与我们合影后，又为今天的活动匆匆离去，秘书说，今晚大概睡不成觉了。我在受感动的同时，尽力地想象着这次活动的盛大。

而这一次难逢的机会只能眼睁睁地错过了。演出日程标明：5月1日——畹町。9：00正，正是大批身着艳丽民族服装参加各项活动的人群向各活动地点汇聚的时候，我们登车了。

320国道上，与我们同向的公路右侧，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成群结队，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美的汇萃，仿佛一条流光溢彩的河，令人目不暇接赞叹不已。彩色的人流是去参加三台山“万人踩花山”传统活动的。“卜少”（姑娘）身着颜色鲜艳的短衣筒裙和头饰撑着花伞，在“卜冒”（小伙）的摩托车后座上尽情渲染着美丽；穿着整洁的素衣黑裤打着包头的“宰弄”、“毕朗”（大哥大嫂），在手扶拖拉机上流露出沉着稳重的满足……难以想象，色调搭配竟然可以这样夸张、强烈，而在青山绿水间，一切又都是那么和谐。爱美是人性使然，傣族似乎更甚，即使在“左”的年代里亦如此。张蔓菱编剧的电影《青春祭》里，所表现的女知青与傣族“卜少”们在美的观念上的差异，最终美击碎“左”的禁锢使爱美的人性复苏，表明这个民族人文精神里蕴涵的美的力量的强大。在傣族地区插队的知青对此无不有深刻的体会：在国人一统的蓝黑绿着装之时，傣族却张扬着五彩缤纷的艳丽，连上下工都要带两套衣服；在批判“黄歌”的日子里，傣族却公然的吹“瑟”弹“定”唱情歌；在谈恋爱象做贼的年代，“猎少”追求和享受爱情却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个崇尚美的民族，以不动声色的温良卫护着美，蔑视着一切貌似强大的丑恶并最终战胜之。在他们看来，美是荣耀的值得骄傲的，是应得到展示的。当我们给他们拍照时，他们都欣然直视，报以微笑，甚至情不自禁地以“噢——”的欢呼表达他们的高兴。当然有羞涩，但决不会回避。

三台山到了，新路被人流堵满，我们按交警的示意走上了沧桑的弹石老路。这是芒市坝子南面的尽头，三台山夹峙着公路并将它隐觅于密林，地势险要。同车的知青记起了插队三台山、人称“十八棵青松”的男知青，我的思路却一下被从喜庆祥和的场景拉到了烽火连天的战场。三台山战斗，是中国远征军光复芒市的最后一战，日军凭险死守，负隅顽抗。战斗时常呈胶着状态，阵地时常得而复失，中国将士前赴后继，奋力杀敌，气吞山河。潞西战役自1944年11月13日至12月11日，历时29天，在龙陵——遮放地域，大小战十余次，共歼日军1034人。中国军队伤

亡、失踪4945人，与日军伤亡比例为4.78：1。

短短一段路，思想情绪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震撼之余，我总感觉得到潞西之役也好，被称为“十八棵青松”的男知青也罢，作为一种过去的记忆，它总在告诉着我们一些什么。同一座山上，今天的喜庆祥和与过去了的一切，是否有着某种关联？后来的人们是不是用这种对美的展示对幸福的宣泄，给曾经用血汗浇灌过这方土地的人们以另一种形式的纪念？

这里的每一个村寨都有大青树，尤其是村口，当地人们对它的看重，近于镇村之宝。只要见到大青树，就有村寨人烟。这是乐队鼓手老黄告诉我的。老黄今天心情激动，因为我们就要从他曾插队的寨子路过，并将为他停车五分钟。昨晚在宿舍里，他和我谈了很多，几乎都是关于他“家”的。关于把糯米红糖的早餐放到他床头的慈祥的“咪巴”（大妈）、关于忠厚朴实的“宰龙”、关于工分、关于那头让他大吃苦头的老牛、关于那条长长的瑞丽江和江上吱呀作响的竹桥……平日言语不多的老黄，仿佛要把一辈子的话都在一个晚上讲完。

老黄的家是瑞丽江边一个叫芒允的小寨子，返城后他曾回来过。那次知道老黄要来，老咪巴逢人便说：“我家小黄要回家了”，大清早就守在村口公路旁的大青树下盯着过往的车辆。老黄回来无疑为老咪巴赢得了莫大的荣耀，全寨都没出工，家家拉着请吃饭，老咪巴只是摇头不允：“我家小黄在家吃”。折中的办法是挨家挨户坐坐，然后每家带饭菜在社长的院里全寨大宴。那次老黄是带了摄象机的，村人们见要“照相”，便都回去打扮，村巷里就撒满了彩色。晚上老黄把录象放给乡亲们看，现场不时响起“噢……”的惊叹和欢乐的笑声，录象连放了几遍，直到深夜。次日，老黄要离开了，清早开门却吃了一惊：除了送行的傣族乡亲，村路上还放着许多米口袋。遮放米过去是贡米，现在代表了乡亲们的心意。推却？无法开口，收下？那得装两拖拉机。后由社长从每家米袋里舀两竹筒，那也是两口袋了。上路的时间一拖再拖，离别的话说了又说，紧随老黄左右的老咪巴只是哭，老黄和许多人都泪眼婆娑。透过车窗泪帘，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大青树和大青树下送行的人群，人群中那个瘦小的身影和挥动着的手……定格，这个场景在老黄脑海里被深深地刻录了下来。

这回是一次突然的造访。离寨子越近，老黄的话越少，从他的呼吸和急切的眼神里可以看到他内心的不平静。车一停老黄便奔大青树而去，待他在村路上迎接我们时，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咪巴走了。心一紧，我脑海里浮现出大青树下那个瘦小的身影和挥动着的手。傣家小院里，乐晕了的毕朗拦都拦不住地切西瓜招呼同来的知青，我随老黄进屋参观，堂屋里，在那个原是佛龛，后来放过伟人象现在摆放主人家人照片的地方，我的眼眶热了：镜框显著的位置是老黄的照片。热闹间，宰龙回来了，老黄急急迎去，两个中年男人傣汉话不分喊叫着抱在一起拍打着彼此的后背，其情景令人动容。毕竟是要走的，我们为老黄全家拍照后，在貌似平静的道别中，我看到了他们眼中蓄满情感的晶莹的流质。老黄过来拉了我一把，说“快走，不然就……忍不住了”。说好不送的，远去的大青树下还是出现了人影……

欢迎知青艺术团的标语在亚热带太阳的照耀下醒目地横跨街道，国家级口岸畹町市到了。“畹町”傣语意

为“太阳当顶的地方”，是中国最小的市。市区人口仅五千余，全市面积95平方公里，国境线28.64公里，地处亚热带河谷地带，与缅甸相邻，有“袖珍城市”之称。

横跨畹町河连接中缅两国的九谷桥中间那条红线——国境线，就是滇缅路中国段终点。二战期间，这里为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和集散地，每天有成百上千辆车在这里往返，几十万中国远征军从这里入缅作战。1942年，日军也从这里过桥长驱直入进抵怒江，两年后，反攻的中国远征军经畹町黑山口最后一战，将日寇驱出国门，又从这里跨过国境，在缅甸芒友与从印度一路打回来的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胜利会师，彻底打通中缅印公路。1956年，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陪同缅甸总理吴巴瑞从九谷桥步行入境，到芒市参加两国边民联欢会……

小城真小，我们品尝了热情的主人准备的傣味大餐后，一个小时就游览了市区。小城很静，午时，无风，溽热难当，路旁的油棕树叶一动不动，习惯于早伏晚出的人们尚在休息，街上行人稀少。据说当年街上的知青比当地人还多，我们今晚演出的、超过小城人口实际需要的大礼堂就与此有关。作为界河的畹町河宽不过四五米，在那个年代，成百上千的中国知青就是从这条河趟过去，成为缅共部队战斗力最强的生力军，畹町对面缅甸的九谷山头就是缅共拔点战斗的旧战场，在那次战斗中，国境线这边的人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知青骁勇善战的身影。往事如烟，那些年轻的人们宝贵的年华，就在对面的莽莽丛林中消失了……还是代价与意义的诘问。

畹町是跑到州里争取到了这场演出的。距离国境线不过几百米的大礼堂被塞得爆满，看演出的人占了这个城人口的五分之一强，气氛热烈。傣族、景颇族姑娘也表演了或婀娜多姿或热情奔放的节目，尤其是景颇姑娘的《酒歌》在歌舞之间，把自酿的酒一竹筒一竹筒敬给台上台下的每一个知青并当场喝下，连侧幕旁的乐队也没拉下，把气氛推到了高潮，那样的热情敦厚亲密无间令我们激动不已。恰好我们的节目也有这两个民族的舞蹈，乘着酒兴，演员们在后台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交流了起来。演出结束后，欢乐的人们余兴未尽，又带着象脚鼓、芒锣在我们住的宾馆大院里跳起了“嘎秧”（兄弟民族群众性的集体舞），忘情狂欢……

“对于不忘记朋友的人，我们要给他的是加倍的真诚”。有愧，我们做得实在是太少。

夜阑人静，凉爽的空气湿润新鲜，带着一股淡淡的缅桂花香，我与室友用望远镜让眼睛在缅甸九谷市尽情作着免费的“旅游”。异国的灯光下，还有人们在劳作，还有车辆在行驶。边地之夜，安详温馨，如同刚才喝下的那筒醇厚的酒，温软绵长。真静呀，静得仿佛隐约能听到甜畅的鼾声。

我突发联想，在这个曾被战火洗礼过的边境小城的酣睡中，当年的金戈铁马是否还会入梦来？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5月2日：晴；瑞丽。

龙江带着高黎贡山积雪的凛气一路西下，与激越地冲出崇山峻岭掠过芒市坝子的芒市河聚首。

当两条江河相互亲热地拍打喧哗着闯出北面山峦屏障的时，见到这玲珑俊俏瑞气升腾的碧绿的坝子，便一改往日不羁的性格，敛声屏气，缓缓的，静静的，让从大山里夹带而来的沙金沉淀于此，用温情的雾给小坝披上柔曼飘逸的轻纱，从东西两边轻轻托起这块青翠欲滴的翡翠。

于是，它便有了瑞丽江——“有沙金的江”的称呼，傣族又称之为“南卯”即雾气蒙蒙的河。这个翡翠般的坝子因江而得名：瑞丽，祥瑞秀丽，傣语叫“勐卯”（雾笼罩的坝子）。

想想吧，能让从滇西的峡谷峻岭中闯关夺隘奔腾呼啸的河江变得温情脉脉的地方，该会是怎样美丽的地方！

清晨，从瑞丽江升腾而起的雾铺满路面漫过坝子，江水的气息弥漫了空气，淡淡的白色给一切都抹上一层朦胧，大青树、竹篱笆、傣家竹楼都变得飘渺起来。

竹林隐约，小道幽静，有小卜少担水盈盈走过，亦真亦幻，恍若仙境。

江水荡漾，波光粼粼，白鹭翻飞，竹排往来。江畔山青水秀，竹茂林幽，风光秀丽。

山坡上耸立着挺拔刚劲的攀枝花，坝里到处是高大的仙人掌、碧绿的麻桑蒲、浓绿的柚子树、遮荫蔽日的大青树和婀娜多姿的凤尾竹以及成片的芭蕉林、橡胶林。一幢幢干栏式的傣家小竹楼点缀在凤尾竹林深处。

寨子里的竹楼都是用仙人掌或绿竹篱围隔开来，既独立成院又不相互隔绝。几乎每个寨子都有一座傣族人称为“奘房”的小型寺院。寨子四周流水潺潺，稻麦金黄，或秧苗青青，胶林遍野，风光如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寻找四十年前的足迹

四十年前，我们几个同学到云南盈江县插队，七十年代陆续抽调回城。大家早有回去看一看的愿望，可是路途遥远，工作繁忙，几位插友不是你有事，就是他没空，总也聚不到一起，就这样，一拖再拖，几十年就过去了。

今年，大家总算都退休了，于是就盘算起行程。除了到寨子里寻旧，也想饱览边疆的美丽风光。几个人原来都是企业职工，收入不高。既要精打细算，又要玩得舒服。我们提前在网上预订了飞机票，票价还不到四折，比起豪华大巴票贵不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之中还有两位同学没坐过飞机呢！ 我们下乡到同一个寨子，在一个锅里开伙的十个同学，除了一个女生一直没联系到（她不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一个男生在外地定居赶不过来，一个男生身体欠佳不能出行外，其余七个人全体出动。

出发前两天，昆明气温骤降，那天早上还下起了雨夹雪。还好，没有影响飞机起飞，到了高空，上面阳光灿烂，蓝天如洗，下面云海茫茫，直接天际，预示着我们的滇西之行一路顺利。

腾冲位于高黎贡山以西，69年下乡时，带队的老师在翻山的前夜就叮嘱我们：“明天要过贡山了，大家多穿点！” 带拖斗的大卡车慢慢哼着爬上了山顶，又风驰电掣地转过一个个弯道下了山。进腾冲时我曾感叹道：“怪不得叫腾冲，原来真是腾云驾雾冲下来的！”

腾冲机场建在城南十多公里外的一片高地上，但和高黎贡山比起来还是太矮了，飞机是从两山之间降下去的，从窗口往外看，感觉山峰离翅膀很近，多少有些惊险。看看表，只用了五十分钟，我们下乡时，可是整整走了五天呢！

在腾冲，我们游览了热海、和顺古镇和抗战纪念馆。本来还有好些景点可以去，但是思“乡”心切，只待了两天便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去盈江的客车。

腾冲到陇川的公路正在改造为二级路，很多地方在施工，给这段行程添加了不少麻烦。从梁河到盈江更是要从老弹石路绕行，路难走，却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怀旧的机会，四十年前，我们正是从这条路进盈江坝子的。

在弯弯曲曲的盘山老公路上转了半个多小时，我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盈江坝子。魂牵梦萦第二故乡啊，当年的知青又回来了！

坝子里的公路很平整，全是柏油路。路上汽车来来往往，不像四十年前，走半天路也见不到一辆汽车。那时候，全县十三万人，只有十来辆车，分属于农场和糖厂。后来云南汽车厂生产出“昆明”牌大卡车，才给县里分了几辆，成立了县汽车队。如今，县内交通方便多了，以前主要的交通工具—马车反而见不到了。

客车很快到达去县城的三岔路口，我们转乘面包车，到达了弄璋镇。

我们来到镇上的姜家，姜家大哥是以前我们在农村就认识的。他那时经常到我们寨子旁的江边钓鱼，我们上街时也常去他家里歇息，还见到过他精心培育的昙花开放。

遗憾的是，姜大哥前年因肺癌去世了。姜大嫂和女儿儿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布置好了客房，一定要留我们住下。盛情难却，我们也只有客随主便了。

吃过午饭，姜大嫂给我们找了辆车，送我们到三公里以外的冈相寨子。在柏油路上行驶了一段后，车子转下了一条乡村道路，这条路和它旁边的那条河都是四十年前那次泥石流后重新修建的。路旁一片片农田，一丛丛竹林掠过，多么熟悉的景色啊！

车到一片房子旁停了下来，我们一看，这哪有当年村寨的半点影子？以前竹墙草顶的农家，已经变成了砖墙瓦顶。寨子里非常热闹，空地上摆放了很多桌子，妇女们忙出忙进，小孩子围着桌子嬉闹。一打听，原来今天正办喜事呢！

终于见到一位以前熟识的大嫂，从她那里得知，老会计还健在！四十年前，就是老会计推着小车，到镇上把我们接到寨子里的。

我们马上去到他家，把正在午休的老会计从床上拉起来。老人家已经77岁了，精神还挺好，只是听他说，血压有点高。

我们热烈地聊着，女生们把带来的几大包小食品分成小袋送给各家。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寨子里的家庭已经从十四户增加到了四十四户！分到每家的礼物实在太少，真是不好意思。

听说我们回来的消息，以前熟识的老乡们纷纷赶过来。波买贵大爹拄着拐棍来了；当年的复员军人三保大哥来了，这位棒小伙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原来一起放牛的小弟弟们已经成长为中年汉子；而那个爱和我们开玩笑，清清秀秀的小卜少相栓，变得又黑又瘦，牙都掉光了…

老会计家的小院立刻变得热闹起来，我们谈到寨子里这些年来的变化，谈到原来熟悉的一些老乡家的情况，也

谈到知青们的工作、生活。

寨子里最大的好事是：家家都通了自来水！以前那口混浊的水井已经不存在了。想当年，我们收工后就要挑着水桶到井旁，用大竹瓢把黄色的水舀到桶里，回去要倒入水缸，澄清后才能用来煮饭。大嫂们要腌笋子都得到一里外的另一个寨子去挑水来用。现在好了，每个院子里都有了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山边的清泉水，可甜呢！

我们还遗憾地得知，以前和我们相处很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新会计，前几年因车祸去世了，好在见到了他的儿子相因。我们在时相因才学走路，现在女儿都在县城上高三了，希望她能成为寨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们又走访了几户人家，他们大都住上了高大的瓦房，屋里有了电视机，有的家庭还买了拖拉机和摩托车。但总的来说还不富裕，有的家庭因为各种原因比较贫穷。比如相栓，丈夫岩细（也是原来和我们一起劳动的小卜冒）因为吸毒进了戒毒所，儿子也不孝顺。前天她胃痛要钱看病，儿子只给了五块钱。我们一位女同学听说后，马上塞给她一百元。

婚宴开始了，乡亲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入席，席上可以看出边疆这些年的变化。首先是穿着，特别是妇女。以前不管老少，一律是黑布包头，只是形状有所不同。现在只有老奶奶才用黑布，中年妇女都用毛巾包，而年轻的小卜少则完全是汉族打扮，连新娘都穿汉族衣服，实在叫人遗憾。

其次是菜肴，以前傣族人不大会炒菜。平时上工就是用芭蕉叶子包个饭团，里面塞些酸菜之类。有点好菜就是一锅煮，什么酸笋煮鸡，煮鱼，牛扒乎，最高档的菜就是火烧猪，皮子烧焦了，里面还半生不熟的。现在宴席是的菜也像模像样了，八宝饭、炸鱼，当然，火烧猪还是少不了的，喝的也变成可乐了。

饭后时间还早，我们漫步到了江边。夕阳映照着宽阔的水面，江水缓缓向西流去，一群老鹳（鹭鸶）在对岸边叫边飞，一切还和四十年前没有区别。不由得想起我们当年在江边唱的歌：“我站在盈江边想家乡，滚滚的盈江水，奔流向何方。好久没有收到家中的来信，不知我的爹娘如今怎么样？”时过境迁，如今的心情是大不一样了。

江岸还是有变化的，前些年发大水，很多靠江的田地都被淹了，不少寨子也进了水。九十年代，政府安排修建了江堤，再也不怕洪水了。只是今年天干，江水大部分只齐膝深，卷卷裤脚就能涉过去。

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返回住处。

离开盈江的头天，我们又回到寨子和乡亲们告别。大家沿着当年经常步行的小路，穿过密密的竹林，路过另外几个寨子。见到了多次在梦中出现的小石桥，我们常常钓鱼洗衣的小河。以前的知青小院已经变成了住家，就连我们的自留地和小河那边的树林如今也盖了房子。

乡亲们刚刚做完佛事，看见我们，又亲切地围了过来，接着，就是聊不完的话题。

看看时候不早，我们因为和姜大嫂约好，便起身告别了。这下老乡们不干了，非要我们留下来吃饭。大爹大嫂拉着我们的手，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以前只在小说电视上看过这种情景，没想到今天身历其境。遗憾的是没有一位摄影师记录下当时的场面，我自己也被几个人围住，相机都掏不出来了… 最后他们见我们执意要走，就纷纷回家拿来大米，你一包，我一包，一会儿就装满了两大口袋，足有好几十公斤！相因又回去开来了拖拉机，波买贵大爹的孙子，现任会计一直把我们送到镇上。

姜大嫂一家对我们更是象亲人一样，女儿是专门调了休假，从芒市的单位上赶回来接待我们。儿媳要看管商店，进货送货，照顾还在上学的小孩，还早早跑去买菜，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特色菜。而当我们提出要付食宿费时，她们坚决不收，反而拿了水果给我们在路上吃。

姜大嫂又帮我们联系了车子，送我们到瑞丽、芒市旅游。

再见了！美丽的盈江。再见了！热情的乡亲们。我们还要再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千里寻梦——重返北大荒

自从离开了那一片黑土地，就再也没机会回去看它一眼。如梭的岁月，无情地在我们的脸上刻下皱纹，也带走了让人不敢正视的三十年。

纵然有千般理由，也难愧对逃离故土的尴尬。

不是么？那是一片被遗忘的荒野，是我们为之付出青春年华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忘掉它，不管这种牵挂是失落还是惨痛，那毕竟都是属于我们，属于献身北大荒的知青。

仿佛冥冥中总有个声音在召唤，让我三十年来总不得安宁。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我终将要再去那片黑土地，哪怕只是亲自去看上一眼。

终于有机会去牡丹江出差，离那梦系情怀的故土只剩下一步之遥。但这一步毕竟还是太难，虽说近在咫尺，仍然有四百公里的路程。我也不知道原来的土路是不是更加坎坷，是不是能让汽车通行。而且，我的日程安排太紧，不知道一天时间能不能返回来。

在前往牡丹江的火车上，看着那覆盖皑皑白雪的山峦，看着一个个闪过眼前永世难忘的那些小车站，冥冥中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强地在耳边呼唤：归来吧，黑土地的儿子！

我不能抗拒这个呼唤，我知道，这也许就是此生最后的机会。尽管我也知道这区区四百公里也许就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精诚所至，天地为之感动。我不敢期待的好运竟然能凑在一起。首先是今年牡丹江地区居然没有什么雪，公路状况极好。再者，春运的来临使车票难买，让我在牡丹江多了一天时间。这都使我的寻梦之行有了可能。

牡丹江街头的三个代表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梦想付诸行动。没有办法，只好拉下脸来求人，好在听说是要去看上山下乡的故地，什么事情都办得一帆风顺。

冬日的阳光刚刚照亮广袤的冻土，我们就踏上了旅程。开车的张师傅年长于我，还是牡丹江本地人，曾在兴凯湖修过公路，对那一带相当熟悉。当他得知我此行的目的，马上放下不苟言笑的面孔，我们立刻就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一路上，知青的往事就成了我们唠嗑的内容。

冬日的阳光刚刚照亮广袤的冻土

同行的还有我两位年轻的同事。从某个角度讲，他们或许可以属于愤青，有些事情和咱们的看法大相径庭,比如911之类的。从另一角度讲，他们又是精英，年富力强，学识渊博，一丝不苟地为国家大计耕耘。尽管我们在工作中合作的很好，有的事情平常不说也罢。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真正的另类，和别人特别是下一代之间有着深深的沟壑，因为我们毕竟曾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在犹豫让不让他们随行，我真怕坏了兴致。反过来想，既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何必要求别人会有我们同样的经历？！我们这些经历了那些沧桑岁月的人为什么要惧怕别人来窥视我们心中仅存的神圣，惧怕别人对此嗤之以鼻？

清晨的阳光洒在冰冷的土地上，荒凉的公路上车马稀少。出了牡丹江，沿着G301迤逦东行，不久就融入了北大荒的原野。三十年依旧，还是安睡在白雪下的田地、树林、山峦。偶或，几头牛、一群羊在雪原上游荡，提醒人们这里还藏着生机。

通往绥芬河的G301，现在是宽阔的水泥路

毕竟生活不会凝固。公路已不似原先那般狭窄斑剥，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巨大的路标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据说这得益于绥芬河和挡壁镇两个边境口岸的开通，给这个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地方带来了商贸的繁荣。

过了穆棱，我们折向东北方向，公路明显地较绥芬河主路窄了不少，不过也倒是重修过的，并不难走。大约十点钟，我们穿过了煤炭重镇鸡西。比起三十年前，鸡西已经脱胎换骨，新盖的楼房栉比鳞次，全然找不出旧日痕迹，只有大桥下穆棱河肮脏的冰面，才让人记起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煤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萧条，那些点缀辉煌的楼宇拼死强作欢颜。

出了鸡西不远，路边山坡上有个很大的工地，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旁边还有大片的建筑没完工，脚手架林立。施工似乎并没有受严冬的影响。走近看时，完工的房子上赫然挂着大雄宝殿的匾额，整个依山而建的工程是座规模不小的庙宇。印象里，鸡西并没有什么名刹……

过了鸡西，老张就把车交给我，坐到右边去卷旱烟抽。一阵辛辣的关东烟味立时充满车厢，呛的两个年轻人直咳嗽。他们不知道，当年我们也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抽着这关东烟熬过漫漫的冬夜。

越向东行，路边的地块越大，一片片苞米的残茎在白雪的映衬下泛着金光，让人回忆起当年冒雪秋收的情景，玉米的清香、躯体的汗臭、凛冽的寒风、瑟缩的农工……刹那间从早被淹灭的脑海深处涌了出来。

苞米残茎在白雪的映衬下泛着金光，让我想起当年冒雪秋收的情景

离故土越近，回忆就越像压抑不住的泉水。不知道当年所在的连队现在还有没有？当年朝夕相处的老乡如今还有谁留在那里？……

连珠山，曾经是我们的师部。原来的大粮库还在路边，远远望去，规模好像更大，还有了一些新的设备。

翻过前边的小岗，密山就在眼前。

进入密山前路旁不远的山坡上，也有一个未完工的庙，大雄宝殿和鸡西的那个同样的形式，差不多的规模。公路边还戳着一个崭新的牌子：法弘寺。

进入密山前有一个未完工的寺庙：法弘寺

这就是了，原来是新修的东西。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想的，佛爷能普渡众生，大概也能普渡下岗失业的吧。

密山，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模样。原来坑洼不平的泥泞小街变成了水泥大路，街两边破败不堪的干打垒房子早换成了新的楼房，转运站那座日本人修的塌了一半的小楼，连影子也不见了。

在密山我们大约停留了一个小时，既是为了吃午饭，也是为了打听一下兵团的情况。饭店的服务员都是十几岁

的女孩子，别看都是本地人，居然毫无例外地一问三不知，连饭店那位三十多岁的女老板也是两眼迷茫。后来想了想我就笑了，人家那岁数，兵团溃散的时候，她们还没出世呢，你能指望她们关心那时候的事情？

吃完饭走到街上，对面原来就是个长途汽车站，问路问长途车司机是最可靠的了。说来也巧，紧靠大门的车窗上用斗大的字写着：密山——855农场，问了问那位司机，一切就都明白了。路还是以前的路，而且知道了那地方又从兵团的番号变回农场的编号。

从火车站前边绕过去，以前那个车马拥挤不堪的道口变成了穿过铁路的地道。爬上地道的冰冻的坡，是很宽很宽的水泥公路。

怕回来油不够，我们开进了路边一个中石油加油站。加油的伙计是个年近半百的汉子，一件油渍的棉袄，一顶狗皮帽子，脸被北大荒的风吹得红扑扑的。我又证实了一下去农场的路，那老伙计满脸好奇地看着我说：

“你从哪疙瘩来的？”

“北京。”

“知青吗？”

“对啊。”

“我一猜就是，要不跑这块来干啥。”

“你也不像本地银，听你说话就不正。”

“可不，我是杭州的知青。”

“……”

加油短短的几分钟，竟然成了两个素昧平生的知青的巧遇。这伙计当年在这里结了婚，不得不留了下来。尽管文革后回城的政策有了变化，可以举家回迁，毕竟因年龄、技能、工作机会等一系列原因，最终放弃了南国大城市，留在了北大荒这片黑土地上。相对而言，能在加油站有个稳定的工作，他在这里已经是幸运的了。据他说，那些仍流散在农场的知青，因为农场效益日渐低下，不少生活没什么着落了。

过了加油站不远是个收费站，水泥大路也就到此为止。收费不算多：2元，看来别的没学来，收钱的把戏大凡谁都不用人教就会。

再往前，就是我以前走过无数次的土路。看来入冬前曾经修过，还算平整，车子大约能跑到六七十。路两边的白杨我离开时是没有的，看那高度大约只有七八年。半途中也曾遇到过几个路标，指明这路是通向七台河的，至于

那些大大小小的叉路口，反倒什么都没有。我只好凭着记忆摸索着走，有几次也不得不停下问路，那些屯子好像发展得不错，不仅规模大了，房子也都是新的，路边不时有几个修车铺和饭馆，一点儿都找不出过去的样子。

以前走过无数次的土路，路边的白杨是我离开时没有的

我当初所在的855，严格说起来算不上真正的北大荒，它处在完达山山里和山脚下，比起三江平原上无边无际的黑土地，我们这里是小巫见大巫。就算这样，从南方来的同行愤青，仍然对广袤的原野惊叹不已，不时啊呀哇呀地大呼小叫。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心烦，告诉他：你要想真正了解北大荒的辽阔，最好去割一天麦子！说得他一脸茫然，最后还是在旁边抽着大烟炮偷偷乐的张师傅告诉他：累死你。此后就再也听不见咋呼了。

从密山到团部路口，远没有记忆中那般遥远，不过半个多小时，看看里程表也就三十多公里。可脑子里一直想着那时候早起晚归甚至还要在团部住一夜的情景。

855场部路口多了一个加油站，几间汽车修理厂，只有路还是原来老样子。最醒目的是一块巨大牌子，写了农场介绍之类的官样文章。倒是每个牌子上都画了地图，这对我来说倒是挺有用，于是停下车来踏过挺深的积雪，凑到牌子前边细看。好像原来的地方都还在，只是不再叫连改叫队了。

正在这时候，十几米开外的一个人突然开口说话：“要上哪去？”

我这才注意到了这个站在寒风中的人，一件破得看不出布料的短棉袄，一条黑布破棉裤，一双和三十年前我也穿过的棉胶鞋，还有一顶在北大荒派不上什么用场的那种文革时期的长毛绒帽子。手揣在袖子里，黑红的脸膛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像是要铭记着什么的石碑。如果他站在北京街头，保证不用几分钟就会被当做盲流或乞丐收容走。这时候我才隐约想起来，就在我刚停车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位置盯着我们看，真不知道这哥们儿在这里干什么呢。

“六连。”虽然刚看完地图，我还是脱口说出了兵团时期的番号。

“六连往那条路，这边是到团部的。”

“我知道，还是翻过豁牙子山，从七连旁边过去吗？”

“没错，还是原来的路……嘿嘿，是知青吧，从哪儿来的？”

“北京。”

“我也是，张家口的。”

“……”又轮到我没话了。

不用问，这又是一位在当地结婚安家没有返城的。比起加油站的伙计，这位肯定境遇极差，就看他那身打扮和颓败的气色就一清二楚。对他我能说什么？安慰、关怀、感慨？……一切一切都是多余的，我只能道了声谢就落荒而逃，带着一种无可名状的震撼和悲哀。

和张师傅商量了一下，我们舍弃了团部，改道去我度过大部分下乡生活的六连。尽管去那里还有将近二十公里的山路，那毕竟是我多少年来的梦里情怀，它无时无刻地在缠绕着我，如果此行不能看它一眼，也许就是永生的遗憾。在这点上，张师傅对我真是非常宽容。

去六连的路，依旧是老样子。从团部前行不远，就是我难以忘怀的豁牙子山，尽管山下雪不多，多半是裸露的枯黄，山上却覆盖着厚厚的白雪，林间的一座座孤坟，都默默地向我这个归来的游子倾吐着心中的块垒。

远眺豁牙子山，白雪覆盖着林间的一座座孤坟

我无颜面对这些不幸的同伴。我曾亲自把他们抬到这白雪皑皑的荒野，亲自把他们掩埋在这片寂默的净土。最终，我无奈地抛弃他们，逃离了这片我们为之付出过的黑土地。如今，我回来了，我要为他们悲泣，为他们祈祷，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我永远记着那个独眼的劳改犯，那个死在不公世道下的普通人。如今，他也在这荒凉的豁牙子山上，嘲笑着我这个碌碌无为的渺小人物，仿佛不无讽刺地说，兄弟，我的路早就走完了，你还折

腾什么呢？

荒凉的豁牙子山，你埋葬着多少冤魂？也许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他们无声无息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之路，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归宿。如今再没有人打扰，没有人牵挂，也没有人怜悯，只有孑然而立的落叶松，悄悄地伴在他们身边。（点击阅读本次征文:《生死两茫茫》作者：老熊）

过了豁牙子山，公路一路攀升，路面全都被冰雪覆盖。寂静的山间公路上，依然难得看见人迹，林木和白雪，是这里永恒的主题。我细心地驾驶着汽车，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中。

冰雪覆盖的山间公路上，依然难见人迹

这冰雪的山路，是我的心路历程。多少次我踏着它的脊梁，走向外边的世界；多少次我踏着它的脊梁，颓唐地回到令人绝望的山间；多少次我颠簸在它的怀抱里，把濒死的弟兄送到团部医院；多少次我茫然地沿着它，把永别的人送到豁牙子山那片冰冷的荒原。

冰雪山路，有着我的心路历程……

茂密的橡树林依旧，砸碎我脚骨的采石坑依旧，荒唐的防范苏修的战壕依旧。默默无语，在这山间寒冷的土路上，只剩下游子的心。

蓦然间，一片房舍跳入我的眼帘。记忆中遥远而冰封的路，竟然只用了二十分钟就走完了。想想也可乐，那时候我们别说汽车，就连搭个拖拉机也不是容易的事儿，有时可能是马车，偶尔是牛车。这二十多公里的路，我们不

得不花上一天的时间。

这就是我的六连么？左边是我曾经住过的羊号（圈），只剩下依稀可以辨认的废墟。右边的一号地，却已经耕耘的整整齐齐。往日的场院，多了一排房舍，却又坍塌败落，现出几分悲凉。

公路南边那时候的建筑只剩下了——厕所

下得坡来，原来路左边密密麻麻的土坯房，都不见了踪迹。路右边竟然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

一切是那么熟悉，我径直把车开到了知青食堂门前。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仿佛是来到了鬼域，没有生气，没有人烟，一切都凝固在冰冷的寒风中。

过去的食堂现在是中共855农场党支部

食堂这一大排房子，好像已经被隔成了许多间，每个门上都挂着锁，告诉我这里没有人欢迎你。中间的门上挂着两块牌子，表明这房子现在是中共855农场党支部，好像是说这里还没有完全荒废。

不远的坡上，原来独眼死于非命的地方，是一座新盖的小屋，烟囱里冒出冉冉的轻烟。走过去一看，才知道这是小卖部。推开厚厚的门帘，屋里的三个人木呆呆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等我表明了身份，又问了许多那个时代的旧人之后，那三个人才讷讷地告诉我，他们都是后来才迁到这里的，不认识我说的那些人。

汽车前方的房子是新的小卖部，原来独眼管的菜窖就在哪里

是啊，物是人非，这就是岁月留给我的一切。毕竟我让三十年的光阴从手指间溜过，谁能说这不是上帝对我的嘲笑？没有必要再和这些后生们说那些惨淡的往事，只有自己去寻找记忆中的一切。

食堂的后面，是我们原来居住的知青宿舍。除了我们亲手砌的红砖墙，已经认不出原来的模样。窗户在寒风中摇曳，空荡荡的大门被钉上几块木板，原来女知青住的那一侧屋顶已经坍塌，俨然是座鬼屋。再后边原来整整齐齐的家属屋，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废墟上是高高的茅草。

我们自己砌的知青宿舍红砖墙还在……

原来整齐的家属屋留下的是高高的茅草

大门左侧第二间是我住过的地方

这是我奉献过最美好青春年华的六连？

宁静，死一般的宁静，心不由自主地缩紧。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奉献过最美好青春年华的六连？

它曾经让我们梦想，它曾经让我们激动，它曾经让我们贡献出一切——我们给它装上电话，我们给它装上电灯，我们千方百计地要让它走出闭塞的群山——它是我们生命的歌，它是我们岁月的歌。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是失败者，我们付出的一切仍然没让它逃脱荒废，不知道这是命运使然，还是我们的罪过？

六连，完达山间的小村落。你最终被这世界忘记。哪怕你曾经存在，哪怕你曾经繁荣，哪怕你曾经是我们知青岁月的歌。

面对渺无生气的荒村我无语，默默地给我记忆中残存的废墟拍照。那食堂，那宿舍，公路边的大柞树……一切一切，都将永远成为被时光湮没的记忆。

当年的农机具只剩下这点家当，本来想过去看看，那只大黄狗好像不乐意

忽然，不远处拌子垛后边闪出来个中年人，招呼我说：“是知青吗？”

一个中年人招呼我说：“是知青吗？”

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简单自我介绍之后，那汉子说，你走的时候我还没来六连，不过你应该认识我的老丈人，他是老金发呀。可不是么，他住的房子就是金发原来的家。

“金发呢？”我惴惴不安的问他。

“老了，这里下山不方便，搬到团部去住了。”

总算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汉子不由分说地把我拉进他的家，他老婆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我离开六连的时候，她还是上初中的小丫头，如今差不多已经成了老太太。

当年上初中的小丫头一下子就认出了我

还是那间房子，除了更破旧，和三十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两只水曲柳的箱子，可能还是老金发当年打造的。一张旧木床替代了火炕，除此之外，屋子里再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俱。不用说，这夫妻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说起当年的人，才知道果然多半已经作古，剩下的人也都远走他乡。自从兵团改回农场，农场又把地卖掉，原来工资菲薄的农工根本无力购买一寸土地，只能替外来的“地主”打工。汉子说，他一年的收入大约是两千元，老婆“退休”了，一分钱也没有。我怀疑是我听错了，又追问了一句——确实是一年两千元！我们同来的几个人一时都没了话。

一只毛茸茸的小灰狗，拼命地摇着尾巴在我脚边转，不知道从前那只会抓野兔的“赛利”，是不是它的祖先。伸出手去，小狗就用热呼呼的舌头使劲地舔。

你能不承认这世间有命运？同样是人，不一样的活着。同样是狗，这小家伙只有饥饿、看家、做皮帽子的下场。

当年的初中生，是惟一还认得我的一家人，背后的破房子是我的宿舍

要连夜赶回牡丹江，我只能向他们告别，尽管还有很多说不完的话。

他们拿出了一个塑料袋硬塞给我：

“山里没啥东西，带上吧！”

推辞是没有用的，尽管我知道这可能是除了那点微薄的工资之外仅有的收入。

山里人送的木耳、榛蘑和毛嗑

只有再报答吧……

再见了，我的六连。再见了，六连淳朴的人们!

转到了公路上，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暮霭中的六连，知青宿舍倒塌了的屋顶分外刺眼。

完达山夕阳

豁牙子山，我们埋S人的地方

永生难忘的小山村消失在柞树林后

夕阳终于沉入完达山平缓的山峦，转过一个山脚，那永生难忘的小山村消失在茂密的柞树林后边。刹那间，我的心突然变得空荡荡的，仿佛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别了，我的黑土地。别了，我的第二故乡。

后记

在返回牡丹江的路上，我们一直都默默无言。愤青最先打破了沉默，说简直不敢相信这里居然三十年还是原来的房子。我说："错了，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子，是比原来还破的房子。"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时地说起这个话题，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最后，在宾馆门前老张问我：你有什么收获？我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彻底明白了我们以前的努力没有一丝一毫的用途，它像知青的青春年华一样白白地耗费在不该耗费的地方……

（2003-02-23于北京）

（华夏知青网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5周年征文选）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知青回村

一　进村

三十多年了，心里总有一件放不下的事。就是想回到当年插队的村子，再去看看那曾经熟悉的山和水。在那些破窑洞里，老柳树下，小溪流边，黄土地上、、、、、、，哪儿没留下过我们年轻时的印迹。喜悦与痛苦，激情与彷徨，醒悟与迷茫，甚至饥饿，疲劳，幻想，初恋。套用一句时髦的词儿，那块土地承载着我们太多的回忆。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当年的革命诗歌中的这一句话可真真是喊到我们的心里了，因为我们插队就在延安地区。这些年回农村的梦做了不知道多少回，也挺奇怪的，每一次的梦中总重复着同一个情节：终于回到村里，却忘记带相机了。每次从梦中生生地急醒之后都暗自庆幸那只是一场梦。所以，当我们这次真正要动身回农村时，行囊中首要的就是放进两部相机和足够的胶卷。

车子从山西一进入陕西，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好象在外多年的游子回到了老家的那种感觉。人就是怪，明明是初春，山上还光秃秃的，却觉得景致很美，风和日丽。

离村子还有几里路时，抑制不住的激动就在心中鼓噪起来。我们村是从延安进入延长县后的第一个村子，从延安流过来的延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河水冲击出的一小片川地使我们村成为山区少有的拥有上百亩平地的村子。

公路就顺着河边走，当车子拐过一道石崖，一眼看见我们村的土地时，我不由自主地大喊一声：“到了！”我们这伙人中，有做了职业写东西的，她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书中这样描写我们村：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

现在的杨家湾怎么着也该长大了吧，像个丰乳肥臀的少妇袒胸露肚地睡在自家的土炕上。

村口当年的土路现在变成水泥的了，直直地通进村子。正好有一个人推着辆自行车往村里走，我正在兴奋中呢，冲着他就问：“你是谁？”那人一楞，随后用陕北人特有的带有一点憨憨的幽默说：“我是我。”定格，一个陕北农民瞪着一个傻笑的北京人。

二　年轻真好

村委会就建在一进村最显眼的地方，一排气派的石窑。

三十多年前这儿可没有石窑，只有几间依离歪斜的破土房，是我们队的饲养室，里面养着宝贝似的五条毛驴。那五个家伙是全队最重要的公共财产，除了它们，队里好象也就没有什么了。当然，还有饲养它们的饲养室。在全队人和队长的眼里，那五个家伙的地位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重活累活一概不让它们干，这五位大爷每天最多只出半天的工，干的活也不过是到社员家里拉拉磨推推碾子而已。我们当牛当马的在地里挣得快吐血时，它们却养尊处优地晒着太阳，漫步在饲养室前的空场，时不时的还翻倒在地打个滚,扬起一团团尘土。

冬天，太阳好的日子，饲养室前除了五条悠闲的驴子，沿着墙根还坐着一溜老头儿，一边聊着村家大事一边敞开破棉袄抓着里面的虱子。据说魏晋时期的文人就爱一边畅谈国事和诗文一边抓着虱子。从这点上看，咱们陕北老乡还真有点魏晋遗风呢。

如今饲养室早就拆了，替代它的是村委会门前的一片小空场地，魏晋遗风当然已经消失殆尽。但是，有闲的村民还是爱在这里聚聚，下下棋，聊聊天。

我们进村时正有六、七个村民围在一起下棋。还没等我看清楚呢，黑娃婆姨就已经喊着我的名字，从人群中向我扑将而来。黑娃是我们当年的房东，我们的灶房就安置在他家的一孔闲窑里。那时他们夫妻年龄比我们大几岁，膝下有一双还都是碎娃娃的儿女。

那一小群人里淅沥哗啦站起好几个，延门儿、猴娃、随娃婆姨、懒人、、、、、，我们离开农村整整三十一年了，他们居然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名字。

黑娃家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村里像他这样还住在老窑里的人不是很多了，像他住那么破的窑的就更没多少了。黑娃夫妻都有病，不能下地干活了，生活就靠开个小卖部卖点香烟瓜子的蝇头小利，而这样的小卖部在这三百多人的村子里竟然开了十几家！黑娃婆姨脸肿得膀膀的，还忘不了当年我给他的孩子买过一把玩具手枪，其实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有这么回事了。她说：“那个时候，谁家的孩子能玩上那种玩具呀！”陕北农民就这样实成，你做过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就能记你一辈子的好。后来还有农民说我给他寄过全国通用粮票，我也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年轻时的黑娃是个爱说爱笑的人，陕北人的话：儿话多（指爱说笑话的人）。可现在的黑娃被生活挤压的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人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看着黑娃家的光景，我真是哭的心都有。

黑娃婆姨给我们打开那间当年我们知青做灶房的窑洞，咯吱吱的开门声都跟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扑面而来的潮气似乎还带着那个时候我们烧火做饭的煤烟味，窑顶上被烟熏的黑黑的灰尘依在，就只差十二个年轻的身影。

年轻时我们有多荒唐，在这里我们曾经打过“分灶战役”。

说起来话还真有点远。那时候，不知道是上面的远见还是阴谋，分配到各个生产队的知青都是按男女平均的数目编的组。我们队有12名知青，6男6女。男生来自北京的一所男中，女生则来自一所女中。女生都是17岁，而男生大些，都20岁了。我们这些少男少女到了一起，偏偏不领上面的情，没有按物理学中的异性相吸引的原理发生作用，反而互相排斥，农民的话，横竖尿不到一个壶里。

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男生们没有一点点优点，往坏里说简直就是十恶不赦。首先，他们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下地干活。有一次，连着好几天没见他们人影，队长派人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们，派去的人回来汇报说：那些耸（陕北的骂人语）全在炕上睡着呢，叫他们下地去干活，他们说他们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必须躺着以便节省体力。像话吗！其次，他们好吃懒做过了份，每天不去队里干活不说，连知青灶上的活都不干，做饭用的水全是我们女生挑来的。他们说不会做饭，可吃起饭来却个个赛过……哼、哼，那个…。最最不可饶恕的是他们竟然害死了一条驴！那天他们要去三十里地以外的一个小煤窑给知青灶买煤，用了一条驴拉车，临走前队长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别累着驴，可他们一出了村就不是他们了，赶着驴一路小跑。老乡赶驴车时遇到上坡路要帮着驴拉车的，他们可好，驴拉一车煤本来就够重了，他们还坐在上面！不仅不帮驴拉车，还拿棍子使劲抽驴屁股，那可怜的驴打小哪受过这苦哇，回到村里就因肺破裂而亡。听到这个噩耗，全队社员的肺差点破裂----气炸了。我们女生当然是站在贫下中农一边的，誓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作出决定：跟他们分灶。

男生当然不同意了，分了灶显然是他们吃亏。一没人给他们挑水做饭了，二他们吃不到女生的口粮了。为了尽快把男生赶出去，我们采取了严格的分餐制，每顿饭做好后，用秤分份，男女平均，绝不给他们多分一丝一毫，吃不饱活该，谁让他们做寄生虫呢。此外，还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静”字，矛头直指男生，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老是在高谈阔论，饭都堵不住嘴。

于是灶房里硝烟四起，每到吃饭的时候，女生与男生便恶语相向。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天来了一个外队的男生，他看到墙上那个“静”字，觉得男生受气了，竟然义愤填膺地一把扯下了那张写着“静”字的纸，然后昂首挺胸地从女生面前走出去。女生们一时没反映过来，都楞住了。我还算脑子转得快，来得及在他迈出门坎时冲着他的背影给了一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那男生数年后成了我的老公。说实话，那次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嘻、嘻。

闹腾了一个月后，男生终于受不了精神加肉体的“折磨”了。那天收工回来，远远地看见灶房的门歪在一边，走近一看，原来趁我们不在，他们撬开了灶房的门，把我们早就分好了给他们的东西搬走了。

一场“分灶战役”以我们的胜利告终。

多少年后，一群老头老太聚会，一位男士总结：那时候你们17岁，正是对异性开始感兴趣的时期，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啊呸，谬论！

黑娃家的窑据黑娃说，连他爷爷都记不得是上面哪辈人盖的了，按20年一代人计算，这窑少说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它里面的生活跟它的历史比算得上什么？再过三十年，我们都没有了，它还会立在那里。

无论它再破再烂，它是历史的见证。

年轻真好。

三、在那遥远的地方，有四条好汉

这是我同学出的那本书里的一章，整整10页，描写的是杨家湾村里的四兄弟，他们叫：大汉、二汉、三汉、四汉。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不能把她的整章搬上来，但是我可以节选一点。

……四兄弟都身材魁梧，高额头大眼睛，是杨家湾里的漂亮男人。杨家湾的男人好看，这是我们一进村就发现的事情。我老想，说不定他们的祖先都是些戍边的军户，更说不定他们的脉管里真的流着匈奴单于，蒙古王爷或者突厥公主、回鶻女郎甚至阿拉伯美人的血呢。

大汉是延长油矿的工人，……杨家湾的人谁能不上山受苦，而是到油矿上当工人，就是最体面的人物。大汉是村里唯一有这好命的一个。

但是我们到杨家湾的时候大汉却因为这好命而坐了牢。说是因为在矿上参加文革武斗打死了人。但是只要谈大汉，杨家湾人都会露出敬佩的神色……。

二汉有病，年轻轻也不知怎样就得了慢性肝炎。……每次见到他我都想起《水浒》中那些落草的受难英雄，比如病关索杨雄或者病大虫什么的。……

三汉是好看的四兄弟中最好看的一个。健壮挺拔，筋骨匀称。面孔稍显黎黑但肤色油亮。他一笑就露出虎牙，

由于他太爱笑，我很容易地发现他有一口在当地人中少见的，洁白整齐的牙齿。……

四汉比哥哥们还忠厚老实，是四兄弟中唯一没有成家的一个。……四汉不久结婚了，听说女方原来是他中学同学。……

四个魁伟男人站在村子里，不知怎样就聚起了一股雄浑之气，四周的山都矮小了许多似的。

瞧，溢美之词多吧，可见那四条汉子当年在村里是多么风光。

这次我们回村，肯定是想看看四条汉子的。

如今的四条汉子是什么样？

大汉从监狱出来以后，一直在外做生意，前些年好象做的还不错，赚了点钱。可听说后来赔了个底掉，现在住在西安，六十多岁了，身无分文却还在想着发财，无奈既无本钱又无本事，剩的就只有胡吹乱侃了。

二汉早就故去了。婆姨改嫁给一个工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奇怪的是她多少年就没离开杨家湾，而那工人退休后却回了湖南老家，现在两地分居。婆姨的窑里挂着二汉的大照片，而那工人的照片小小的，被挤在角落里。

三汉和四汉是我们见到的。老啦，三汉的头发快掉光了，皮肤更加黎黑，敢说比非洲某些不甚黑的人种还黑，那口洁白的牙齿也早就没了踪影。四汉的牙跟三汉有一拼，没剩几个了。就眼前这两个老汉的形象，说破大天也跟那本书里的描写联系不到一起呀。

见三汉是在他承包的大棚里。县里今年推广大棚种西瓜，杨家湾搞了三十多个大棚，动员村民出来承包，三汉承包了一个。承包户们对西瓜真可谓精心照料，我们在那儿的两天就亲眼看见他们从早到晚的在大棚里忙碌。西瓜长的也真不错，苗长得一人多高，碗大的西瓜挂在架上，说是再有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了。可是钻进三汉的棚，情景就有点不对劲了，跟前的西瓜苗又稀又小，一副萎靡不振的熊样。三汉不好意思地笑，说往里边有西瓜长出来了。我还真往里去了，可到了也没找到一个西瓜。三十多个大棚数随娃家的西瓜长的最好，我问随娃三汉的西瓜为什么没长好，随娃说：“他鸡粪上大了。”看来养西瓜跟养孩子一个道理，过分溺爱都是不行的。

村长对三汉的评价是：他接受新事物可快了，不论上面闹个啥新东西，他都是最快接受的，可就是一闹就半途而废，常是个没结果。

说起三汉接受新事物，那还真是。

一九六九年我们到村里时，这地方那叫一个闭塞，村里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根本无从知道。村里有的老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火车是什么样子？更没人见过。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时我们跟他

们吹牛：知道火车是怎么跑的吗？是竖着跑的！

当时三汉年轻力壮，是队里干活的好手。我们到村里后的第一年庄稼收成好，分红时三汉是得钱最多的，分到10元人民币！可别小看这10元钱，那时候的10元钱足以让全村人眼红。不信算算看，全村最壮的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10个工分值人民币8分钱，刨掉冬季农闲3个月，就算你以后出满工也就270天了，270天满打满算挣的工分乘以8，多少？21元6角。一年两次分红，21元6角再除以2，多少？10元零8角。所以，你必须是壮劳力，还必须出满工，才能挣到10元钱。而我们队能挣到一天10分的人充其量也就五、六个。你说那10元钱能不让人眼红吗？

就是那次分红后没几天，三汉失踪了，过了两天，三汉又回来了。接着，村里爆出一个特大新闻，三汉去看火车了！原来，三汉揣上10元人民币，跑到离村子五、六百里地以外一个有火车的地方，蹲在铁路边，直把火车看了个美。

三汉的壮举在村里镇倒了一帮年轻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二杆子！一年的钱去看一趟火车，咋是不想过日子了？

这就是三汉。

三汉跑去看火车的时候，四汉是个刚刚回到村里的初中毕业生，是村子里少有的“知识分子”。白白嫩嫩的书生跟上受苦人下地受苦，满肚子抱负没地方施展，苦闷和彷徨自不必说了。村里来了一群北京知青，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带来很多新鲜“物”和“事”。同样的年龄，却有着不同的生活境遇，对四汉的刺激使他更加苦闷。他曾经把这些苦闷透露给知青朋友，但是命里就这样定的，他只能在那块土地上受苦，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我们是去四汉家里看望他的，当年的书生已是一个地道的老农民。

四汉正在为儿子的学费发愁。但是能使他聊以自慰的正是他的孩子，大儿子在山东大学学习计算机，女儿在一所中专即将毕业，小儿子在延安上重点中学，成绩优异，是年级的前几名，今年高考，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四汉的抱负总算在他的儿女身上得到了实现。

我们从陕北回来以后，我在第一时间里把三汉和四汉的照片发给我同学，让她看看她心目中四条好汉现在的模样。她回信说：“杨家湾让人永远难忘。”咳，在那遥远的地方，曾经有四条好汉。

四、弄虚作假

杨家湾的那口水井是我在北京就想好了要去看的地方。

它是一口山泉井，深约一米多点，四四方方的每边也就不到二米，叫它井，实际看上去也就是个水槽。别看它不大，可全村人还有驴儿们吃的用的水就靠它呢。水井的边与地面平齐，里面的水面与井边平齐，从井里打水一点也不用费劲，驴儿们喝水也只需伸伸脖子即可。说来也奇了，就这井，数九寒天没见它冻过冰，烈日炎炎也没见它枯过竭，一年四季，井里的水总是满满的。那水如果仔细品品，清凉中还夹着一丝丝甘甜呢，绝对比城里超市卖的矿泉水好喝，杨家湾人天天喝的就是这水。

听说因为有这井才有的杨家湾。估计那时黄土高原还是遮天闭日的原始森林，也许已是黄进绿退现在这副模样？大概是一队戍边的官兵，也许是迁徙途中的几户人家？总之是杨家湾的先人，他们走乏了，口渴了。突然，在那荒无人烟的山脉中，传来潺潺水声，一眼甘泉显现眼前，量大水甜，实在是天下少见的好泉，择水而居嘛，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繁衍生息是人类本能，于是就有了一个村庄叫杨家湾。

还听说，抗战时期，杨家湾驻扎过八路军的一个野战医院，也是因为看中了这口井。野战医院医生护士伤员近千口人呢，连吃带用，还得洗绷带，离了水哪行。就这口井，最多时曾供过上千口人使用！

我们住在村委会，那儿有专门为接待县里镇里领导准备的席梦司，我们沾了官儿们的光，在杨家湾居然也睡上了软床。

天刚亮我们就起来了，拿上脸盆去井边洗漱！

真像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睡了一夜的村子正在醒过来，凉凉的空气爽爽的，这家的鸡刚叫完，那家的又叫。两只黑狗一前一后从村外跑回来，昨晚它们不定在哪里风流了一宿。

井的位置在杏树山和窑畔山之间的小溪旁，我们走后，这里经过改造了，山坡箍上了石帮，还给井建起了一个小石窑，原来它面向东，现在改成面向南了。这口井算得上是养育杨家湾世世代代的有功之臣了，从对它的改建也看得出杨家湾人对它的尊重。

开始一天的忙碌之前，男人们得先把自家的水缸装满。于是早晨的井边算是村里最繁忙的地方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挑水，还是杨家湾人没有摆脱的苦差事。

看着老乡担着水晃晃悠悠的样子，我突然想再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当年我们都没少担过水呀。我叫住一个老乡，让他放下担子我来试试。可是真令人失望，任我怎样挣巴，那两桶水就跟沾地上了似的，纹丝不动。我想给自己找个台阶，问：“这两桶水有一百多斤吧？”老乡伸出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小拇指特肯定地说：“六十斤。”

完了，我成大草包了。

我们带回北京的照片里有一张我担水的照片，那是用了我们耳闻目睹数十年，只有傻子才学不会的招，担着两

只空桶弄虚作假呗。

五、天下最大的倒霉蛋

有句话叫“铁肩担道义”，形容什么不用我说谁都明白。三十年前的杨家湾，人人可真的长着一付铁肩膀，生活物资、生产资料、生产成果，哪样不是靠着铁肩弄回来的，肩膀就是整个杨家湾的运输工具。

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到杨家湾后的第一课便是革自己那个肉肩的命。

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天上工的情形。

那是1969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吃完早饭，我们被带到一个羊圈，队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扁担和两只筐子，开始干活。活很简单，就是把羊粪担到地里。这便是我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

陕北高原在咧咧的寒风中暴露着它的贫瘠，在这块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上照样有人类繁衍生息，他们为了生存只有向贫瘠的土地刨食，以人类最低的生活标准艰难度日。我们的到来徒增了这块土地的负担，当我们这群幼稚青年溶入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群中，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把羊的排泄物从这儿挪到那儿，还傻呵呵以为那就是革命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其实不欢迎我们。

一天下来，我们个个肩膀红肿，疼痛难忍。

晚上，全体社员在饲养室集合给我们知青评工分。不大的饲养室里地上疙纠着一片人，煤油灯只能照亮前面几个人的面孔，后面的人全在黑影里。一闪一闪的火在黑暗中此起彼伏，那是他们在抽烟袋锅，刺鼻的劣质烟草味充满整个空间。

“这些娃干得还棒尖。”听到贫下中农的夸奖，我们心里美滋滋的。记得我在给妈妈的信里还说过呢：贫下中农夸我们干活拔尖。直到几个月后，我们能完全听懂陕北话后才明白，“棒尖”的意思不是“拔尖”而是“还差不多”。而且，他们叫我们“娃”也不是贫下中农对我们的亲切称呼，而是带有一种轻蔑，没长大的孩子才是娃娃呢！

前面几个女生都被评为5.5分，即干一天活可得5.5个工分。当评到我时气氛却不对头了，黑影里有人说：“就她个子大……”后面说的话当时我没听懂，现在想肯定是“就她最不能干。”黑影里又有人说：“叫她一个人坐一个位。”说这话的人肯定不是贫下中农！可是关键的时刻，往往一句话能定乾坤，就这么着，我被评为了女生中唯一的一个5分！

这纯粹是命运对我的捉弄。我们队的六个女生除了我的个子是一米六七，其他五个一律没超过一米六。是巧合也罢不是巧合也罢，事实是我跟她们站在一起就显我了，人高马大的。贫下中农一眼就先入为主的觉得我应该是最能干的，可干活时我并没有比别人出色，他们就觉得我不行。可他们也不想想，即使担同样的重量，我要克服的地球引力也比她们大好多呀，我已经使出了我最大的力气了。都说窦娥冤，人民要是都知道我，就没窦娥什么事了。

天哪！我成了天底下最最倒霉的倒霉蛋。

从此，我便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每天收工回来记工分的时候，我都觉得羞愧难当。虽然同学们什么都没说，我自己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表现，把工分拉上去，跟她们一样高。

我如何忍辱负重拼命努力受了多少苦就不多说了，总之一年以后评工分时，我的工分终于追上了别人。

为了这一天，我活活地争取了一年啊。

说句实话，到现在我也认为贫下中农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不起我的。不过这次回村，多次听到老乡们感叹：“你们那个时候在这里吃了苦了！”总算是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正确的评价。

我们的肩膀始终也没有练成铁的，至多能算上个木的。

我有一张当年担麦子的照片，于是这次回村，我特意去当年拍那张照片的公路边又拍了一张照片，目的是把两张照片对比，体会一下物是人非的感觉。

说起担麦子，记起当年一件事。那天收割的麦子没熟透，有的麦杆还发着青色。晚上收工时，我担着一担麦子走在人群的后面，青麦子比干麦子重多了，我越走越走不动，最后咬着牙也走不动身体里一丝一毫的力气也没有了。没到过那种境地的人是不会知道的，当人累到极致时，眼泪会像汗水一样往外流。当时我根本没想哭，可是眼泪却像汗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闹得我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汗水。

后来人都走光了，天也黑下来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守着那担麦子，望着黑漆漆的山沟。村里人都说那是野狼最多的一条山沟，我当时心想，就是狼出来把我吃了，我也走不动了。那种无助与绝望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

多少年后，我给女儿讲起这段经历，才八岁的女儿听完后问了一句：“那担麦子值多少钱？”这一句话一下子震撼到我的心灵深处！几十岁的人了才猛然醒悟，那担麦子连一元钱也值不到，它的价值与一个人的生命相比，谁轻谁重！可当时我就是宁可丢了性命，也根本没有把麦子丢下空手回家的想法，连一闪念都没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它是公共财产！

我们这一代人究竟具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被教育到如此愚昧究竟是谁的过错？而我还拘着这种观念引以为荣，时不常地拿着那段历史去教育孩子。

在一个八岁孩子面前，我心中的大厦的轰然倒下。

六、老柳树作证

记不清是67年还是68年了，但却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刚刚在南京的舅舅家玩了两周回到北京，天已经完全黑了，昏暗的路灯，熟悉的马路，我提着一只手提包兴冲冲走进大院的东门。突然，微弱的光线下一条墨黑的标语刺入我的眼帘“打倒大叛徒、历史反革命××！”爸爸的名字赫然在目。

这一天终于来了。

其实我早就预感到它了。

我的父亲是中国亿万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只不过他所处的时代便注定了他一生坎坷。父亲十来岁时即遇上中国遭受外族侵略，原本家境富裕的几个兄弟停学在家，凭着爱国的激情，在我爷爷的带领下，一家人全部追随了共产党，参加进八路军，那是一九三八年，父亲十六岁。从此一路紧随直到共产党取得政权，那时六兄弟除去已死二个，四个都在党。

解放后父亲投枪从文，成了一个以文字为职业的人，凭心而论父亲顶多也就算个三流作家，最辉煌的作品是五十年代出过一部谁都没看过的电影《怒海轻骑》。文革刚结束时社会上流行放映老电影，有一天电视里转播《怒海轻骑》，我们一家好兴奋，都端做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姐弟都想见识一下父亲的作品究竟什么样子。开演后十几分钟，我两个弟弟就借故溜了，我忍到二十多分钟时再也忍不住也脚底下抹油跑了，最后只剩下我妈一个忠实观众。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父亲写的是什么东西，只有印象：革命程式化。

但是我的父亲却是一个好爸爸。父亲因为职业的关系不用坐班，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在他的管理下长大的。而本应多照顾我们的母亲因为工作单位离家特远，每天必须早出晚归，基本上没怎么管过家事。父亲肚子里的故事从来没有枯竭过，换句话说我们是听着他的故事成长的。

每天晚饭后大家挤做一团听父亲讲故事是我们家的传统。然而那段时间父亲不给我们讲故事了，总是躲在他的屋里写着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从单位回来，低着头走进他的屋去。姥姥拉住我悄悄地说：“你爸爸一定挨打了，半边脸都是肿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亲可能出事了。后来又有一次，我去父亲单位的办公大楼，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在六层楼梯拐角处，我突然发现一份揭露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当时我都吓傻了，一个字也不敢看像个贼似的逃跑了。

不祥之云笼罩在我家。

几年后我才知道，其实那时父亲早已经挨斗了，每天都被造反派打，饱受折磨。可他回到家里却什么都不说，怕惊吓了我们，他自己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痛苦。

从南京回来的那天夜里，我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我不相信爸爸是叛徒，可神圣的党说他是叛徒，我怎能怀疑？那年我正好也是十六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十六岁失去了父亲。"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和父亲划清界限。父亲对我们说：你们要相信党组织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暗暗地想：你让我们相信党，那我就得相信你是叛徒了！

我开始跟父亲划清界限。不过我所做的所有划清界限的事也就是不听父亲的话在饭桌上故意使劲说话，因为父亲不许我们吃饭时讲话。现在想起来远不如现在很多处在青春逆反期的孩子们对父母的不尊重。而在那个年代这就算挺严重的事情了，公然地气长辈。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做了一件刺痛父亲心并且永远刺痛我自己的心的事情。

那是在父亲要被押去湖南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收拾自己简单的行李时发现缺少一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而恰巧我头一天刚刚为自己买了一只，父亲便与我商量能不能先把那只缸子让给他，然后我再去买一只。真不知道当时我是中了什么斜，死活就是不同意，不管妈妈、姥姥怎样劝，我就是不同意。那晚，我怕父亲偷偷拿走缸子，竟然抱着那只可恶的搪瓷缸子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来，父亲已经走了，姥姥告诉我，父亲走时过来看我，见我抱着缸子熟睡的样子，十分伤心。父亲出门时摇着头，流着泪。听了姥姥的诉说，我不仅不难受反而有点暗暗的得意。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成了一把刺在我心头的利箭，我得背负一生，并且永远流血。

父亲走后不算很久，我也下乡来到陕北。那时候我们家七口人被分做六处，父亲在湖南，母亲在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在陕北，妹妹在天津郊区，姥姥被舅舅接走，北京的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弟弟。

我刚到十七岁，又是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亲人，贫困的生活和远离亲人的痛苦使我开始想念父亲，但不能跟任何人说，只能偷偷地想。

夏天我终于接到了父亲给我来的第一封信。看到父亲那熟悉的笔迹我就想哭，可我不能，我躲在角落里看信，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流出来。整整一天我心中像压着一快大石头堵得难受。晚上收工后等到天黑，我一个人溜出村子跑向延河边。

我们村往延河去要路过一片柳树林子，这片林子就在河边的沙地上，白天干活时人们常在大柳树的树阴下休息。我从来没有在夜晚到过这里，黑暗中，静静的柳树在微风中发出沙沙地轻响。我手中捏着父亲的信，在一棵大柳树边坐下。当我确信周围没有任何人时，就开始放声大哭，边哭边喊："爸爸，我想你！"一年多来，憋在我心

底的感情，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喷发出来。那一刻，亲情的融岩把阶级斗争划清界限荡涤地丝毫不剩，人性回到了我的心中。

我向大柳树发誓：我是父亲的女儿，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此后的数年，我跟父亲的通信中不断的互相道歉。父亲几乎在每封信中都说：我对不起你们，是我连累了你们。而我给父亲的信中总是说：那不怪你！我不该不给你那只缸子。这样的对话我跟父亲一直说了很多很多年。

从那晚开始，我就再也划不清界限了。我拒绝在任何场合说划清界限的话，在调查表上毫不犹豫地写上父亲是革命干部，我还撕毁了已经写好的入团申请书，因为要想入团就必须跟父亲划清界限。以至于四年后和我同时招工进厂的50名知青中有49名共青团员，只有我一人不是。

这次回村，我和老公特意去延河边看望那片柳树林。三十多年过去，以前穿过林子的那条小路已经找不到了，在它的西边修起了一条大路。洪水过后的泥沙几乎掩埋到那些柳树的半腰，看上去好象它们经过三十年倒越长越矮了。

老公兴致勃勃地拍照留念，说：这片柳树林对咱们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年我俩在这里谈过恋爱，大柳树是我初恋的证人。

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些老柳树对我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在这里我恢复了人性

身后的那片柳树经过三十年倒好象越长越矮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返乡印象

从公元1968年12月18日下乡至今已有四十年了，回城后一直没有去看过，为什么要回去？当年回城时，有知青说过：拉尿也不对着那方拉，有什么值得去看的，那个地方，我对它有真感情吗？上山下乡，岂是一个“悔与不悔”那么轻松，在那里消失的6年青春乃至回城后漫长的一段岁月，不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噩梦，四十年过去，这种阴影和噩梦还一直驱除不散，无法摆脱，（直到此时，用手叉着的腰，还在隐隐着痛，这是下乡围堰开河留下的痕迹）。回乡，它不是游子归乡，也不是衣锦返乡，几十年没有去过的地方，还有什么牵挂吗？能叫“第二故乡”吗？整理自己的思路，只能是这样理解：就当是去还个愿吧，这是一个没有许过的愿，是类似6年流放生活的一种回望，这个愿不还，阴影和噩梦将会永远无法消弥，同时，也由于6个青春年头这种阴影和创伤，构成了自己的挥之不去的人生环节，它就象你的肌肤和心理结构，活生生地伴随着你，并一起成为了现在的你，返乡，从这个意义上，是去看望自己，重新触摸自己的灵魂。

身处粤地，在知青友人热情邀请下，时值金秋，踏上了返乡之路。

知青，到死也不会退出社会舞台，几十年来，不时的在变换着扮演的角色，不想告别那“宏大叙事”，返乡也一样，返乡的规模大得叫人吃惊，知青组织者为了这次返乡活动付出了近两个月的辛劳，他们在台前台后无偿地默默地所做的一切的确令人感动，在他们心里，始终还装着这些人，装着这些人心中深藏的愿望，装着这一代人曾经历过的欢乐、迷茫、痛苦……。

一溜看不到头的豪华大巴加上轿车，由警车在前开道，浩浩荡荡地从市府前坪出发，向沅江奔驰而去。

还是那片土地，十月秋意浓浓，此刻，这条公路飞驰的一队大巴中载了几百名心态完全不同于当年往返于城乡之路程的知青，他们谈笑风生，观赏着两边的景色，我的记忆在慢慢展开：那些年，我由长沙去沅江都是乘船，在记忆中坐车返沅江这是第二次，记得有一年，离这条宽畅公路不远，有一条平行的公路，第一次坐车是在与今天同一方向的一辆破旧的长途车里，一车被遣送返乡的知青中就有本人，一个个神情沮丧，委屈万分，车上还有两个女知青，一路哭哭啼啼，情状可怜，本来是回长沙过中秋国庆的，没想到逢国庆前常有的“清理整肃”行动，作为“倒流城市”的罪名受到了被遣返的待遇。被拘那晚，说是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岂知一去不回，家中的人到处询找，都说不知道，后来听说竟然被“收容遣送原籍”，事后虽为此事闹腾了一番，但结果又能如何？见怪不怪，那个时代知青有什么地位可言，屈辱啊，打断的牙齿只能往肚里吞。二十年后，一名叫孙志刚的湖北青年，以生命的代价，改写了这种毫无人性的收容遣返制度，社会总是在进步，但往往是以鲜血在改写。

沅江是第一站，两个小时就到了，敲锣打鼓，万人空巷，使人感到政府行为就是不同，欢迎亲人的热烈场景中，如花儿朵朵的学生，那样天真可爱，市民们都是一张纸热情洋溢的笑脸，迎接亲人回故乡，此时的感觉，似乎尊贵了许多，与当年在凄风苦雨中颓丧地站在沅江码头的感觉完全不同。晚间的几个节目，有时光倒流40年的感觉，“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热血沸腾意气风发之际的场面，真好像回到了当年。演出的参与者的美好动机、才华和努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我感觉有一种隐隐的困惑，这是在赞美上山下乡吗？这种困惑或许要更理性地来解释：世间一切事物需要载“道”而行，要表现，就要有客观的载体，否则，什么也表现不了，沉默在“无声的人群”中，我们能甘心沉默吗？能在台上诉说苦难吗？不能，那么，就赞美吧。只求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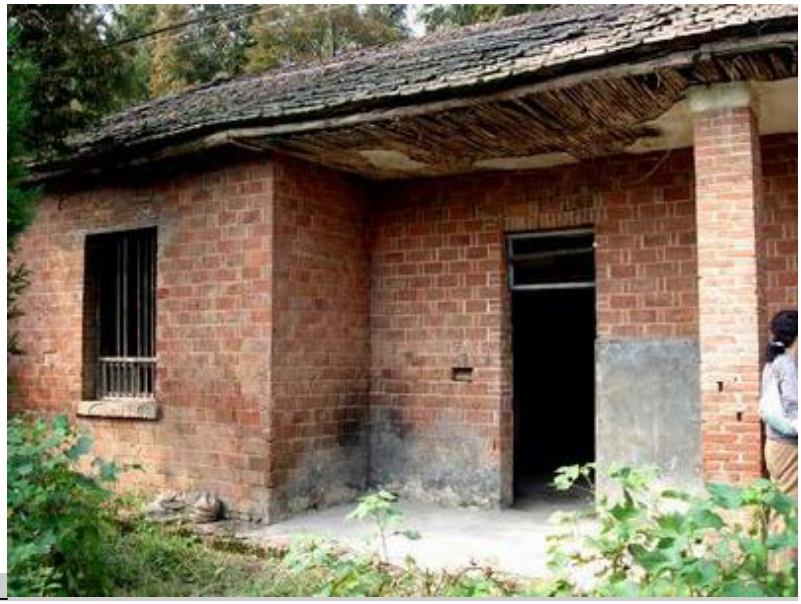
式，莫顾内容，说来也奇怪，这歌声，也同样能使人激动，因为它表现了我们的40年前，我们的青春时代。

第二天上午到草尾，刚进入草尾镇政府，在欢迎的队伍中，我见到了一个身材矮小、满头银发的老人，他是当年大同大队的老支书，见到这位老者时，一时语塞，说不出话，眼眶一热，竟不可自持，几十年没有回过沅江，多少次梦里回沅江，这是第一次而且是第一个见到（认出）那个时代的熟人，那种感情是无法形容的，我以为我早就是铁石心肠了，没想到也控制不住热泪直流，过后我想，它不是对某个特定的人而流泪，是那让人咀咒的整个时代的全部事件的情感浓缩在此时此刻，因触发而使人热泪盈眶。

草尾，哪怕时间久远，记忆中留下的仍如刀刻一般。物与人相随，伴着人一起存在，一起老去，草尾老街也和我们在一起变老，然而，很多的场面，虽然面目已非，还是要顽固的表现：昔日的街景依稀可辨，那不是邮局吗？那是我们牵系家人的地方，当时的一封家书往返要半个月，那是个充满着思念的时代，科技通讯的发展使现在的人几乎没有了那痛苦又甜蜜思念，没有了思念，好像没有了人的意义，干巴巴的；那不是书店吗？是我们浏览的场所，只有在这里可以闻到书的油墨香，好像走进长沙五一路的新华书店，一时间忘记自己是个知识青年；昔日的草尾饭店，是我们聚集之所，吃上一碗葱香手工米粉，可当今日之赴大餐。抚今忆昔，站在只留一堆杂草砂砾的草尾饭店旧址面前，对故地的感觉真乃应了那句：″花瓣泪飘落风中，虽有悲意也从容″，感概世事沧桑难料。

人们对于自我的行为都喜欢冠予某种意义，返乡的意义在哪里？我想得很简单，就是见见老朋友。很多知青故友，岁月的流逝给他们留下的苍老痕迹，当年众多知青倾慕的美姑娘风韵不再，当年英气勃勃帅男儿豪情渐消，正应了知青娃那句：“四十年前，我也英俊你也硬朗，四十年后，你也苍茫我也苍茫”，相見忽茫然，相拥泪涟涟。

终于到了，那梦魂牵挂的地方－－大同。



大同村保存了完好的知青点，这也许是中国南方保存得相当完整的一个知青点之一，与其它尚存的知青点不同

的是，它是村民自觉地保存下来来的，里面展出的资料也多为村民提供。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初下乡居住的房屋，当时住的，全都是茅草芦苇棚。自李庆林事情后，一些没招走的知青，由大队集中起来，帮我们重新盖了新的房子，在大队出工拿工分，日子慢慢感到没有那么苦。

墙上悬挂的资料，绝对不是复制品，是真品，我屏住呼吸，在同队知青的名字中我找到了自己名字，看到了那张盖了长沙市公安局的章的户口迁移证，停视良久。这些发黄的纸片，每一个模糊名字，都引起知青们的深情回忆，历历往事，又在眼前浮现，这是第二故乡吗？直到此时，我的内心又奔腾起来，看来，我的确是这里的人，几十年了，这里的人们还记得我，那是一份真真的情愫，那份情愫是属于离开故乡的人的，未离故乡的人是感觉不到的。

农民兄弟直截了当，他们发言的中心内容就是希望返乡知青有能力的多掏点钱出来，资助乡里的建设，知青中的绝大多数有能力去行善去“反哺”农村吗？每一个社会节奏的倒霉事都不缺席的他们也在等待着谁来“反哺”呢。

农村的变化是相当大的，普通农家的生活水平从厕所的变化可以观豹，以前蝇蛆翻滚的茅房，现在贴上了漂亮瓷砖，龙头一拧，水哗哗的，与城市居民的厕所差不多了，茅房，这是使当年初下乡的女知青最不习惯的地方。

询问几个老农后，得知几个曾经一起玩过帮过我的农民已经离开人世，不禁唏嘘万分，又十分震惊的了解到，大队知青中，已有三人离开了人世，他们的死亡虽与下乡无直接关系，但我想，不需太多的分析，知青过早的死亡，与下乡——这人生的重要一环是分不开的。

物非人亦非，过去，离我们越来越远，有人已经离去，我们还活着，我们常把知青的苦与累挂在嘴边，与农民兄弟比较，我们受的苦与累远远不及他们，而他们从来不叙说，（他们从未想到也没有能力叙说），从这点说，我们是在矫情，我们应该感到幸福，应该珍惜今时此刻，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是一种扭曲残

缺状态，除了苦与累还有各方的压力。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一代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真实情感，一旦被证明了理想是骗局，那会什么结果？从文革到上山下乡，从回城到改革开放，乃至到如今的和谐社会，我们受累于太多的人生经历和社会万象，再也纯粹不起来，幸福其实很简单，感到时它就在了，我们的精神结构已经不能够完美了，我们还会幸福吗？无论是工作或事业或爱情或婚姻，我们中的绝大部分所能获得的，都只能是有残缺或有遗憾的，在破损的精神磁盘上还能刻录出优美的幸福歌声吗？外表上张扬出来的幸福感，是虚荣的，更多的是矫情。

知青就是苦难，现在有人提倡淡薄苦难，一切应该向前看，这当然很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但我想，将过去一刀斩断，知青就不成其为知青，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悲情色彩就会失去审美价值，苦难，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在此相聚的唯一、本质原因，它是我们的精神源泉。

堤堰被推平了，眼前一片稻田，黄灿灿的，渠边一排排高大的杨树将广袤大片的稻田划成一格格的，多么美好的一副沅江景色，我想，四十年前与现在的田野景色并无二致，只是少了堤堰，为什么感觉就不一样呢？以前为什么不觉得这里是如此的美呢？要那样的急不可待逃离这里呢？

听，有人在吟诗了：

此刻，捧着青春的灵魂从沅江走过

任熟悉的风吹打我们袒露的胸膛

轻轻放手 让青春的灵魂也化为洞庭湖的风

在沅江的乡村荡漾　荡漾　不息地荡漾

再回勐龙

（一）

坦白地说，有回大勐龙看看的念头来自于我的梦境。说来奇怪，很多年了，只要梦见大勐龙那一定是“户口还未迁回来”。梦醒时分，余悸未消，虚汗淋淋。很多年做一个同样主题的梦总是有点不得其解。于是乎便动了那个回大勐龙看看的念头。现如今，似乎回去的条件都有了，如假期、盘缠，而且一家三口都有空。可总觉得真要下决心还欠点东风，可这个东风到底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

终于，我的东风来了，今年五月份的一天，一脸严肃的医生递给我一张脑CT的报告单：腔隙性脑梗塞。惊恐之余，在忍耐十二天的吊盐水后，毅然决然神勇地拔下针头，直奔大勐龙。脑袋中斑点状梗塞激活了蛰伏多年回去看看的念头，算什么呢？是祭扫青春，还是作人生的谢幕式？也许病人的任何念头都是不可理解的。

真是“千里江陵一日还，”那天在飞达景洪的波音737上，俯瞰白云下穿越崇山峻岭的谰沧江，脑中竟然蹦出贺敬之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小米儿香来延水甜……”诗句。还未出口既脸上一阵臊热：咳，我算什么球，当年可是逃也似的出来的。于是释然，率领着妻子女儿雄赳赳地出站，大声地与出租汽车司机讨价还价，进入西双版纳景洪市区的地界。

扑面的热浪，大团大团的绿色从眼前掠过，仅几分钟象是中了魔法一般，我本能地木然了，而且立即还原成二十八年前那个怀揣户口准迁证窃喜而又惊恐的傻小子。于是看着车窗外的眼神也变的怯生生的。景洪市一扫当年的冷落和陈旧，俨然一个气派不凡的热带城市。休眠了二十八年的云南话油然复苏：“我也不知道哪点是那点，你给我们拉到离车站最近的旅店。”

当晚，投宿在一个有空调和卫生设施的标准房。“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晚上那个傻小子在耳边絮絮不休：当年旅店可是十个、八个人的大房间，六角钱一个晚上，门也不关，灯也不关，人来人往象个车站。睡前必须把鞋子

放在枕头下，要不早上起来就不翼而飞了。

一大早，攒足了劲，走进车站准备费点力气，这是习惯思维，景洪汽车站必须费点周折才能上车的。

可惜，记忆中的人生鼎沸的场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般大中城市都类似的标准汽车站。售票处递出的是电脑打印的车票，候车室宽敞明亮，吊扇在高处摇摆着。一溜排的座椅整齐有序。进出门小卖部等设施一应俱全。感叹之余不免有点莫名的失落，好象此地本该是横七竖八的车子，驾驶室旁一定站着吊着烟卷不可一世的司机。车上车下必然是如同网中翻上翻下之鱼的乘客。可眼前是很方便的上了一辆中巴，唯一残留一点当年痕迹的是敞胸露肚的驾驶员，风采依旧。

真正踏上归途了，六十余里以后便是我的连队，我的青春地。汽车行进着，热浪翻滚着，脑袋里却似中了邪似的一片空白。

整条公路被彻底地挖开了，尘土飞扬，路面也大而无当的拓宽，高低不平。两旁的绿荫消失殆尽。颠簸达到了极限。那点努力酝酿出来的回故乡的感叹和情绪被搅的荡然无存。只是机械地紧紧地抓住扶手，不至于脑袋撞到天花板上。

当行进到暂时让人可以喘息的路面时，一个中年人前来搭讪。

“你们是浙江人还是上海人？”

“都不是，”我连连否认“我就是大勐龙人嘛。”

“不象，不象”他断然否定“我看你们是上海老知青，肯定是！”他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一起笑，算是达成了一致。于是健谈的原七分场黄姓老职工一路上给我们讲了很多：说这条路原先已修好，被好大喜功的新上任头头否决，于是决定再修，但是挖开后就没有钱了，搞了一半，现在谁也不管了。原来好好的路被跑勐宋的矿山车压坏了，地方、农场扯皮到现在。过去一个多小时的路，现在要四个小时。过几天雨季来了还要恼火。跑大勐龙的车纷纷转跑其他地方，苦了大猛龙这条线上的老百姓。

“我和你们知青是老朋友，当年你们知青造反到景洪时，我就开拖拉机送你们。”被他这么一说，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我赶紧问起农场现在情况，他的回答令我十分震惊。

“当官的什么都不管我们下面的，橡胶树分了，每人规定要交多少吨干胶，其它一律不管了。从管理到开割、运输什么都是你自己想办法。连队的房子都卖给个人了。看病、读书，什么什么个人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办法。我们日气了。前两年也有人学你们知青，上百个老职工去农场上访。没有几天，那个上访的头被农场收买了，大家什么都没有得到，散掉了。老职工没有文化，有的路都走不动了，有哪样办法。如果你们知青还在，农场绝对不会对我

们这样。”那张皱纹的脸突然地浮起了一丝自豪的笑容。“我们这些人又没有多少文化，家庭拖累又重，搞不成你们当年那种样子喽。”

说话间到农场场部的路面车子平稳起来。驾驶员也珍惜般的，让车子缓缓地行进。果然气派不凡。路两旁有几幢三层高的簇新的建筑。横侧里能看到一条笔直宽广的新路，两旁油棕树和造型别致的路灯护卫着。我忙问：“这里好象可以沙。”他容不得我的兴奋，突然愤怒起来：“狗屁！面子工程。你看那条新路咯有人走。”我一看果不其然。这条新路空无一人。“你反正要下到连队去的，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所有的新鲜感和积蓄起来的怀念之情被颠簸，被老黄的话搅了。近乡路更险代替了“近乡情更却。”到七分场老黄先下去了，指派了一个车上的熟人领我们到四分场下。

（二）

我们一行三人待烟尘消散后，还探头探脑的站在路边，无法认出当年的分场场部。看见一个大四合院的地方，便径直进去再说。

整个院里空无一人，远远只见一个瘫痪的老头，坐在椅子上歪着脖子朝我们张望。赶紧上前认出了，唏嘘不已。原来这老头便是当年机务连风风火火精明强干的李连长。我妻子曾是他的下属。问候感慨之后问起张三，张三死了。问起李四，李四死了。老李算是硕果仅存为数不多的那一代老工人。再后来便是送礼、拍照、录像、婉拒留饭。这个当年的机务队里已经见不到一辆车子，哪怕是拖拉机。机务队对面是场部，就是我当年到达农场的第一站。没有了篮球场，没有了喧闹。院子中间是些人种的和自然疯长的花草。拍照留影之后，刚想离开，一个看上去满年轻的老太太立即上来问候我妻子：“你是XXX吧，我看边上姑娘象你年轻时的样子，猜想就是你了。”又一阵寒喧，又一阵感慨、复有拍照、录像、婉拒留饭。我们继续出发，到了路口，方向全无。正无计时，两个中年的妇女前来搭讪，几句过后，其中一个黑而胖的妇女竟然是我队大老刘的女儿，当年可是一个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小学生。现今连队大老刘是唯一还在的老人，当年的副连长，负责种菜，曾经送给我老鼠药的。中年妇女一听我们去连队看望他父亲，立即放下碗筷，掏出手机调来一辆客货两用小车，把自己的摩托放在车后，几个人立即赶往连队。挺记挂的，路边寨子和勐龙河桥也看不真切，在车上只是一掠而过。未及感慨和回忆，车子便到了曼龙口。我忙嘱司机放慢速度，我要找出曼龙口那棵巨大空心的、数人怀抱的标记性大树，可惜没有了。大概为新开的公路作贡献了。平时晚上逛到这里，经常看到傣族龙在、龙英在树茼里喃喃互诉衷肠。又过几十米问司机可知道当年五个知青翻车的地段吗。司机说知道，然后缓缓的象定位现场的警察一样指着路边肯定地说；“对，就在这里。”定睛望去，一片狼籍，亡灵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只见三四棵数百年的大树相互挤压着倒在地上，鲜红的树根完全裸露着，

暴晒在骄阳底下。显然是推土机的杰作。我忘情地吼道："好好的树为哪样要搞掉，开宽公路可以在外侧田里借一点道。这些树没有500年是长不出来的。在上海这样搞要抓去坐牢的。"同车的两个农场的后代不解地望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他们显然已经说溜的话"山高皇帝远。"

当年从公路的黑心树树荫里，只要一拐进寨子，那立即成了一个清凉的世界。好几棵高大的榴莲树（傣家称米多罗）、酸角树支撑起一大片绿荫。老米涛和小龙崽在树下坐着，黑呼呼的傣家楼鳞次栉比的散落在四周。

现在什么都不见了，在车内我贪婪地无望地搜索着路两边，一切记忆中的静谧安祥都没有了，连傣家楼也变味了。其中一家不仅砌了不伦不类的三层楼，墙上还贴着小长条的白瓷砖。院子外装了一个巨大的移动式的铁门，让人觉得象个拖拉机站。搞不清是何种文化和经济杂交出来的怪物。

脚下的路不再是平整宽敞。路边永远流淌的淙淙溪水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杂乱的石块。两旁的杂草曼延到路中央，越往连队方向走，路越荒芜。是曾经百余人进出、机器轰鸣的连队道路吗？感觉是走在森林探险路上。

道路的一边曾经是一片灌木林，现在已经是傣家的橡胶树了。另一侧的鱼塘曾经是我们游泳嬉水的地方，不再碧波浩荡，萎萎秽秽缩成一长条河沟。

总算到了连队，我的妈呀！简直就是一个农村四合院。操场不见了，篮球架不见了，穿过连队的拖拉机路也没有了。怎么也找不到宿舍前那棵高大笔直的芒果树，对面山上那个巨大的能遮荫数亩地的大青树也不见了。我都无法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为当年的宿舍等屋定位。茫茫然彻底是一个外来客了。只见一些面目黝黑的中年妇女在门口坐着聊天，大老刘的女儿指着几个中年汉子问我："你可认得哪个是'憨包'？""憨包"是大老刘的儿子，并不憨。当年老刘从二连调来当到副连长时，挑担中其中一个箩筐里坐着浑身乌黑、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就是憨包。我当然无法辨认。最后一个唇上留着小胡子的中年汉子出列自报是我也。于是大老刘的后代们带着我们一行三人向住在山上的大老刘家走去。早上下过一场雨，上坡的路滑溜，其实也没有正式的路。城市小姐我的女儿嘟着小嘴艰难地跟着。我告诉他：当年我们每天都要这样走上走下，晚上回来还要扛一根柴。那地方真所谓我的人生第一课的地方。从砍坝、烧坝、挖地、挖梯田、定植、中耕全在这山上。那一晚有个激进分子从团里带来最新指示：十二点前拿下XX亩，逼得我们这些劳作了一天的人重又上山挑灯夜战。没有灯，火把也烧不着。是晚度过了我人生第一次篝火露营。前后背来回倒腾地烤。那晚根本干不了什么活。我牢骚一句："他妈的，又不是打仗，非要十二点钟拿下。"传出去，以后露营奋战一笔勾销，落后分子的帽子继续雷打不动。

大老刘大概要与阵地共存亡了，把家建立在山坡上。此地就是当年5个采石工人住的。重建的房子都有牌牌：景洪市大勐龙镇第X居民区X号。一师二团的番号演变成这，不知是嘲弄还是施舍。现在所有人的身份都变成了景洪市居民了。

刘居民家徒四壁，唯有墙上挂着的许多小方块的奖状诉说着他当年的荣耀。那张带着船形军帽青年军人和旁边漂亮的农村姑娘照片显示着他们曾有的辉煌。大老刘可是当年解放军云南某部59师的上士机枪手。机枪手颤颤巍巍从里屋走出来了，象是《愚公移山》画里的愚公，满头白发，长长的白胡子，手托着助听器，大声地感谢我们来看他。其实他早已记不起我是谁了，只是说XXX名字我听的耳熟。接下来又是送礼、拍照、录像、大声告别。我觉得这似乎太简单了些，提出要到林地抚摸一下我们当年定植的橡胶树，这可能是激情年代浪漫主义的残余在作祟。偏偏憨包扫了我的兴："这些树是新种的，你们种的那些早就砍丢了。"我总觉得这两天，每当我好容易积蓄起来的怀旧情感要抒发，都会突然云消雾散，嘎然而止。无奈之下，只能用另一种方法安慰自己：当年用砍刀、锄头、斧头砍去的千年大树，绿色植被，现在总算被郁郁葱葱的满山的橡胶树替代。绿色还在，不必老忏悔下去。

这点绿色成了憨包他们这个队的全部财产和生活。不敢再往下想了，如果当年初衷不变，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反下去，这点树也只能养活二三十号人。我们不离去，怕是每个军垦战士分到数十棵树，把它当古董卖也养不活自己。到底是来对了？还是走对了？到底是来错了？还是走错了？烈日下我痛苦地、艰难地思索着。

（三）

下一站由憨包当导游带我们步行到旁边的寨子，那著名的曼飞龙白塔看看。边走边回忆：那年，有一天，我站在窗前发呆，突然看到远处山上树丛中有一极有规则的人工建筑样的东西。我发现新大陆似的报告给陶连长。陶连长笑了："真是上海娃娃什么都不懂，二天我带你去看看，那是一个塔。"礼拜天陶连长提着砍刀，带着我和小赵从曼飞龙寨子上山，最后数百米一路劈荆斩棘上的山去。在山顶的平台上坐落着一个破败的群塔，灌木丛生。因为算"四旧"早没人敢朝拜了。转了一圈下来，问一个黑衣傣族老波涛，他说此塔有400年历史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当地政府简单地开发了这个塔，大概和开放泼水节同时的。我们那时也去爬上爬下，搂着塔身毫无敬意的拍照。

一路上憨包和我谈了些农场的情况，其内容大致与七分场的老黄差不多。归纳起来：现在当官的只管自己发财，下面的橡胶树每家分点，从管理开割运输买卖都要自己搞。有一次一件什么事侵害了他们的利益，憨包挺身而出征集签名与上面据理力争，才争取了一点权力。对我这个过客来说很难辩清一二，我只是想这些诚实的人们他们活得挺不容易，如果他们连安贫守法苟活的路子都没有的话，那是要出大事的。但愿历史不要重演。

古塔上没有一个游人，我们一行三人算是唯一的朝拜者。上去后即双手合十敬拜。再仔细观察，古文物保护、修缮的很好。中间的主塔高高耸起，群塔围成一圈紧紧相连。每个群塔都有一个龛洞，里面端坐着一尊小佛象，面朝四面八方，普济天下。进门口的铭牌上说明此塔有八百年历史，属小乘佛教。不知当年那老波涛孤陋寡闻，还是现在的修塔者夸大其词，年代整整相差四百年。另一侧稍低处，赫然新造了一个金碧辉煌的释迦牟尼像，足有十来

米高。看后不禁叹息：这一定出自当年决策者的愚顽匠心，现代东西怎能和古迹比肩相聚？但想到现如今各旅游区还生造古迹。毕竟释迦牟尼像的出现还不至于太牵强附会，如果再挪开百十米就好了。在山顶，极目放眼，心舒气匀，我曾经的连队隐隐掩在绿色中，象是被青山相拥着。对面四分场五分场一览无余。剪影般起伏的山峦纹丝不动，勐龙河闪着银色依旧蜿蜒。此时此景，出发前的那个青春祭奠的初衷霎时涌上心头。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我只能低声喃喃，无言以对。我能凭吊什么？能大言不惭地说："我奉献了青春？"能自欺欺人地说："青春无悔？"白塔之下只觉得自己渺小愚昧。

这里没有了当年万余知青浩浩荡荡的一点气息，想象不出曾有的红旗、横幅、高歌、标语、突击……。身后的白塔尚且凝固着数百年前数百名僧人的辛劳和智慧，而这退去的知青潮水似乎连贝壳都没留下。

算是自讨没趣吧，被自以为是的青春忽悠了一把。移步下山，一步一回头，勉强从释迦牟尼宽容的微笑里读懂了他的话。

"回去吧，好好地过日子！"

老朱夫妇回了湖南老家，他们的儿子小朱打来电话，已在大勐龙镇上等候我们。于是和耿直朴实的憨包告别，搭上去大勐龙的汽车。

到了大勐龙又摸不着头脑了。下来后复又上来问司机这个地方的碑（过去是大勐龙的标记）在什么地方。可我印象中的此地应该是丁字路口，现在已变成了十字路口了。过去去五分场二队方向的稻田上现筑有一条路，至使我方向全无。司机得知我是故地重游的知青欣然将车费退还给我，真是令人心花怒放。这是我到云南后惟有的荣誉褒奖。

小朱当年还是个高中生，现在已变成精干的中年汉子，骑着摩托，带着傣族妻子，立即引我们到傣家饭店摆酒接风。这个饭店就在过去大勐龙独此一家的食馆斜对面。大勐龙食馆那八分钱一碗的米干，三角钱一份的客饭，米干里汤水是盐巴和水，客饭永远是炒莲花白（卷心菜）和海带，是我们劳动之余步行五公里出来的唯一动力。

小朱感谢我当年对他功课的辅导和临走时送他的不少的文学书刊。说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兴趣有很大的帮助。我则感谢他父亲在我临上车那时，跑步到傣家讨了一坨糯米饭给我路上吃。我清楚地记得那糯米饭上粘着几个黑色的蚂蚁。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能记起连队很多人的名字，令我感动。席间，方知小朱的妻子也是我们那个寨子的人，忙问起熟人：

"摩雅岩角龙咯还在？"

“死了。”

“老保管咯在？”

“也死了。”

“那个上寨的当年被打成‘琵琶鬼’那一家咯还在？”

“不在了，好象一家都死了。”

心中五味杂阵。五十年代有一个电影《摩雅傣》，片中讲到一傣族女子被污“琵琶鬼”。遭寨子里的坏人迫害之事。想不到在七七年我所在的曼井勐寨子也发生类似事件。听到消息，事情未完全平息，我便去这家也被污为‘琵琶鬼’的人家访问。

此家座落在寨子的最偏僻处。房子不象一般傣家的是瓦片木楼，而是草排竹楼，极为寒酸。当我进去说明来意，那女主人几乎感动了要哭了。我大概是事发以后唯一的外来人，而且是汉人。所有的本寨人都不相往来了。只见竹楼的篾笆上欢跳着两个五、六岁的精赤的男孩。第一印象就觉得是两个老鼠。女主人是本寨人，若干年前嫁到景洪附近，后来死了男人，又重回寨子再招赘了一本分老实男人结婚。当年，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寨子里在短期内不期死了好几个人。人们将祸根定位此女人。于是召集数十人集体打上门来并砸了一些东西，没有伤人。目的要将祸根赶走。

女主人面目皎好，眼神里略带惶惑，脸色则有点儿病态黄。想不到能说一口比一般傣家女流利多的汉话。

“……过去我在景洪时也搞过民族工作队，向老百姓宣传不要迷信。想不到，我现在倒变成这种鬼了。我自己都不清楚。

……我打着赤脚翻过山拼命跑，连娃娃都不管了。我一口气跑到公社武装部，哭着求救。他们马上带着我下来才制止住。现在好象没事了。东西坏的不多。我汉子和娃娃吓坏了……。

这几天海干（劳动）碰着几个比让（大嫂）时他们小声对我说，没有办法只能跟着来。要不召龙（干部）不给记工分。我看好心人还是多，我知道。”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人死了，竹搂也没有了，名字都记不住。

小朱夫妇坚决留我们宿大勐龙，说是到了此地一切由他全包了。不知怎么，我和家人似乎没了住下来的兴致。除了被热日晒昏了，可能还有被面目全非的大勐龙现状恼的。你看，整个街上都是门面房，白色墙砖、卷帘门闪着眩目的光。杂乱喧闹，全无民族特色。纯粹一个乡镇小集市。其实也太难为他们了。我又有什么资格苛求别人按我

们的回忆来建设呢？想来也好笑。但去意已决。

能操一口汉傣语言，人脉极盛的小朱只好让我们走。他现即调集车子安排上车。周到之极。临行，唯一要求我能寄一本《勐龙记忆》给他。他把它看成了友谊和自己青春时代的一个象征。我欣然应允。

半夜里，一家三口每人捎带了半公斤左右的灰尘，筋疲力尽地回到了景洪的旅社。

（四）

第二天的早上，我们一行三人去看望陶连长。因事先通了电话，他已站在路边等候。远远看见我们时，已经互致军礼上前握手拥抱。这一别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当年的现役军人陶连长，现在已是司法机关正处级退休干部。威严的一身戍装吼声如雷的陶连长变成一个身着中式黑衣面目清癯的小老头。比印象中的陶连长整个的小了一号。言谈举止间不经意的双眸凝视，双手插腰的动作，依稀可辩当年的风采。

在他七八十平方的客厅里，我们干杯；我们诉说；我们相拥。诉不尽的别后思念，说不完的连队往事。陶连长英俊的儿子在一边打趣说："我爸每一次老战友来看他，都是高兴的不得了，看见叔叔你酒喝的最多了。"我赶紧纠正："我不是你爸爸的老战友，我是老部下。"陶连长则说："再干一杯，景谷的白酒。"

分别时，陶连长送出我们足有二里地，才分手驻足。走出100米回头远处陶连长依旧举手致意。

晚上老友的学生宴请我们一家。当年离开时小龙英们才十五六岁，现在已是社会中坚、儿女齐肩。在傣家楼里，上满了傣家菜。其味不敢恭维，只是那烤鱼色香味均属上乘。提起来好笑，当年在傣家竹楼混吃时，只见他们将最好的那部分精肉加上血水、盐巴反复地剁、切，直至成糊状便用香菜蘸起生吃。我此时再馋也只能吃点汤，不敢染指。

现在汉傣又聚在一起。人们似乎对满桌的菜兴趣不大。举起酒杯干，然后集体大喊："帅！帅！"以至于喊出花样来："帅帅，帅帅帅！"女士们一袭节日盛装，在桌前载歌载舞，完全是发自内心毫无造作之嫌。那个当广播员的汉子抑扬顿挫的放歌和当经理的女子祝酒歌，让气氛达到了高潮。他们敬酒时的谦恭，双手合十的优雅，可是阶级斗争年代看不到的。他们那些大学生的儿辈们惊鄂地看着前辈们雪藏的技能和"聊发少年狂"的激情，个个兴奋地鼓掌。

人们总是怀念青春，不管当时境遇如何。青春是个人的，是美好的。怀念的不是那个年代，而是落在那个年代的青春。

第三天，由当年大勐龙另一朋友，目前境遇不太好的小宋。特地从思茅赶来当导游。我们一行四人去了小勐仑

热带植物园。

一路上景色如画。路两旁绿树成荫。我们夫妇反复对女儿说：过去大勐龙的路况就是这样。象是得到了平反大勐龙的证据。果不其然，植物园里更胜一筹，简直是人间仙境。集大成的展示了西双版纳所有的美丽。从葫芦岛的吊桥看下去，江水奔腾。那个浑浊也显得亲切无比。拍照、神思，在植物园里流连忘返。多少弥补了大勐龙已消失了的那部分的缺憾。

可惜大的缺憾还在，此行似乎没能完全实现我“青春祭奠，人生谢幕式”的初衷。其原因亦不知。但愿难缠的梦离去。

哇！又看到了澜沧江

大老刘确实老了

白塔山上眺望我曾经的连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今儿个回家

——三十年后重回北大荒纪实

重返北大荒，去亲眼看一看今天的前进农场，去亲身会一会那里的父老乡亲，是每一个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梦想。今天，这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今儿个我们回家！回家！！回家！！！

以下我们记叙的，只是这次回访活动中的一些片段、若干个感情小浪花、几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不成篇章，只是用感情的线索串将起来，缀成一幅情感的写真集，以为纪念。“哭了一个小时”7月31日上午10时40分北京站。“北大荒知青专列”将从这里驶向北大荒。

北京站有一位老同志，今天正好又由他当班。他说：当年的北京知青一批批地走，都是他看着送走的。今天又是他指挥列车启程北上。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车站还是那个车站，人还是那些人，但“心情却完全不同。”叶继红（卫生队）的母亲来了，她的儿子来了，她妹妹的女儿也来了，这都是来为她送行的。因为当年叶继红从北京奔赴北大荒的时候，就是由她的母亲、妹妹（今天由她妹妹的女儿作代表）来送行的。三十年过去了，今天，为了再现当年的情景，她们又来送别了。时过景依旧，但心情却完全不一样。当年是哭着送去的，今天是乐呵呵地挥手道别，瞧！她母亲笑得多高兴啊。

在乐呵呵的送别人群中也有伤心掉泪的。原二连的甄少卿和原三连的王云都是来为60团的战友送行的。甄少卿想起了三十年前的那一幕，不禁泪眼模糊，伤感起来。王云受到感染，也把持不住。回到单位后，她关上办公室的门，不知为了什么，竟然痛哭了一个小时。

这一代人，难道不值得为自己流逝的岁月、坎坷的经历、多舛的命运一哭么！

“飞也要飞到北大荒”“和爸爸妈妈一起到那神秘的地方看看”成为许多北大荒知青子女的愿望。徐宏远（修理连）、冯文英（团直学校）夫妇的女儿徐丹为此放弃了去绍兴度假的计划，决意和父母一起参加“北大荒知青回

访团”。

7月29日徐丹一家终于拿到了知青专列的车票，这位三年级的女大学生小心翼翼地收好了车票，与父母一起准备行装。“当时我们的心情很激动，在北大荒生活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徐宏远回忆说。“临行前一天我不放心，又让女儿检查了车票，女儿说‘三张车票好好的，我把它们放在最保险的地方，绝对不会丢。’谁知忙中出错，31日出发时，那车票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翻箱倒柜，哪儿都找遍了，就是不见车票的影子，妻子怨我把这么重要的事儿托给孩子，女儿为自己的失职而痛心疾首，不得已，我们决定先去车站，到时再说。”当徐丹和父母匆匆赶到北京站，知青专列已经启程。怎么办？改签当晚17次特快他们手上又没有车票；与其他未能赶上专列的战友改乘汽车追赶又怕不保险，失望中徐丹既焦急又不甘心。一家人回家商量后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乘飞机直抵哈尔滨。可三人的机票费对于工薪阶层家庭来讲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徐丹激动起来，她说：“不管怎么样，就是飞也要飞到北大荒！这笔机票费就算我跟爸爸妈妈借的钱，等明年毕业后，我用两个月的工资还你们，而且还加利息！”女儿的情感深深打动了父母。他们终于买到了第二天上午8时飞往哈尔滨的机票。

8月1日上午10时左右，飞机准时在哈尔滨机场降落。哈尔滨战友徐维琴（原机关政治处）派来接站的小车已经等候在那里。车子飞快地驶向哈尔滨国际博览中心，徐丹和她的父母终于松了口气。这时，她低头一看：“天哪，那三张给全家带来激动、焦虑、失望、再燃希望和最终如释重负情绪的车票竟平平安安地睡在自己的衣兜里！”与徐丹相比，有“六棵北大荒的小苗苗”非常幸运地从北京乘坐知青专列，开始了探寻黑土地之行。他们是杨晓堂之子杨泉，戴琛之子戴天驰，柴永林之子柴国栋、柴国梁，张超女儿张苗苗，陈学明之子陈晨。8月1日抵达哈尔滨后，又有近五十名哈市知青带着七名子女汇入了回访团的行列。他们是王兆友、徐子兰之子王荣果，于学明、刘艳香之女于帆，刘艳云之女张楠，万尔佳之子滕业铭，刘启东之子刘沌，刘启滨、刘忠歧之子刘明，陈忠林之女陈蕾。

“六十团战友欢迎你”8月1日上午8时44分，哈尔滨火车站，人山人海。

六十团的知青们一出站口，突然，“六十团战友欢迎你”的标语牌映入眼帘。标语牌下，数十名六十团的哈市知青齐声呼唤着他们所认出的每一位战友。“看到了”、“是他（她）”，感情的闸门一下子被冲决开。人们相互对视、辨认、握手、紧紧拥抱，含泪问候着：“你好吗？”、“一路上辛苦了！”这些已不再年轻的人依然有着当年的顽皮：“你看我是谁？”一个当年的小伙子问道，“说！说！”众人“起哄”着：“说不出来就不是哥儿们！”、“认不出来就不放你走！”一时认不上来的战友只好傻傻地笑着，就是认出来了也会被重重地“揍”上一拳。

原来哈尔滨的知青们在头天的报纸上看到了回访团的名单，他们就连夜行动，分头联络，备齐了6辆车，来了七八十人接站。

在前往省国际博览中心的路上，车队所经之处都有交警维护秩序。车队通过时，交警们随即立正行注目礼。哈尔滨市民说："那规格只有人大代表才能享受到。"车队驶入省国际博览中心广场，红色充气拱形门上一幅"向为共和国负重的一代人致敬"的巨型标语令多少知青荡气回肠！

管局老局长孟吉昌也来了。他紧握知青们的手，瞩咐徐维琴（建三江驻哈办事处主任，原六十团机关干部）："小徐啊，下午你给前进打电话，给建三江打电话，告诉他们，老同志们回来了！功臣们回来了！一定要接待好。"接着，他又嘱咐刚下车的知青们："从前进回来，一定要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哪儿也别去，就到建三江（办事处），那儿就是你们的家！"数天后，探亲归来的知青们陆续汇集到了这个家。在徐维琴的主持下，京津沪哈的战友们还在这里召开了联欢会。闻讯赶来的哈市知青人数之多大大超出了办事处的接待能力。会上，大家对酒当歌，豪情不减当年。当年团政治处的陈志祥抹着眼泪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我不是知青，但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为了往日的情怀，让我们干杯！""干杯！""干杯！"……

"过年也没有这么热闹"8月2日，回访团一行86人乘坐的火车渐渐驶近了前进农场，越往前走，大家越有一种往家奔的感觉。"看，这是一连。""这是二连"……列车在向前飞驶，大家都趴在车窗前贪婪地看着熟悉而又久违的景色。

列车缓缓开进了前进车站。顿时站台上彩旗招展，人声鼎沸，现任场长宋连福、党委书记刘胜利、工会主席王永山等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都在站台上迎候。中、小学的鼓乐队鼓号齐鸣，站台内外一片锣鼓喧天。闻讯自发赶来的老职工都想看一看有没有自己认识的知青，一旦发现有自己熟悉的知青，恨不得马上就往家里拽。原本想下车再整队的回访团一下子就被人潮给冲散了。知青子女杨泉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车站上全是人，欢迎的场面我只是在电视中见过，如今这次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北大荒人的这份热情。"老职工们说，就是过年也没有这么热闹过。老知青们说："你们回来，我们真比过年过节还高兴！"一连上海知青于秀珠后来这样描述她回到一连时的情形："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回来，可连里就象过年那样放起鞭炮来。"场部的一些老职工说：这次欢迎的场面，是前进建团以来最大最隆重的一次。

知青回访团在场里的那几天，农场的中心工作围着知青转，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也离不开知青。知青们遇上熟悉不熟悉的老职工，往往会听到一句："你们吃苦了！"的问候。这时候，每一个回访团的成员都会觉得"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了，我是代表了许许多多的知青！""不要看电影，我们是专门来看知青的"8月2日晚，欢迎知青回访团的联欢会正在农场俱乐部楼上的多功能厅举行。情真意切的讲话、向场直中、小学校赠石英钟和书籍、向场医院捐赠最新版本的医药卫生书籍、热烈欢快的舞蹈、激扬高亢的现代京剧清唱不断把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这时场俱乐部主任匆匆走进会场悄悄向场领导报告：在俱乐部前的广场上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他们强烈要求"看看回家的知青"。人们这才注意到，联欢会的主角们，一会儿被叫出去一个，一会儿又被叫出去一个，然后就一去

不复返。面对未能与会的老职工及其子女们，场领导决定在楼下礼堂加放一场电影以示慰问。当决定传达下去，人们并未进礼堂看电影，他们说："我们不是来看电影的，而是专门来看知青的！"楼上正在联欢的知青凭窗望去，发现楼下竟聚集了近两千人。

"看看这些回家的孩子"成为老职工们的心愿。原加工连副连长张式勤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说："现在的事我什么都忘了，可那时候的事我差不多天天过电影。"是的，在开发三江平原最艰苦的日子里，广大知青与老职工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三九天啃着掉冰碴的馒头修水利……，老职工们不仅手把手地教会了知青农业生产技术，而且用自己无声的行动使知青们学会了应当怎样做一个正直、向上、勇于奉献的人。他们是知青走上社会的第一任老师；知青在他们眼中又是一群正在长大的孩子。此情此义不会随着岁月流失而被磨蚀。

远在北京的潘海迅（25连）无论如何要让好友戴琛给自己的老领导原干部股徐永清捎上一句问候；而老徐也不顾自己年迈，几次到宾馆看望回乡探亲的知青们——无论是他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在60团5连还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张礼银，因个性孤僻、整天闷声不响、只知干活，曾是连里一个被遗忘的人，人称"张傻子"。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当他听说知青返乡探亲的消息高兴极了，特意穿上一套压得平平整整的绿军装，又从小卖部买了最好的香烟、白酒和饮料，积极准备迎接知青的到来。见到5连的知青们，他竟叫得出所有知青的名字！只见这位昔日木讷寡言的老人面带久别重逢的喜悦一个劲儿说："我想你们，我想你们哪！"边说边把好烟好酒往知青们手中塞。那质朴、真诚与热情深深拨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弦。

"和爸爸妈妈一起到那神秘的地方看看""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给我讲北大荒的故事，讲兵团战友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杨泉日记摘录这次回访团中，有十多名北大荒人的后代。此中父母的用心良苦是不言而喻的——想让孩子们受受教育。

张超（28连）的女儿张苗苗是1979年3月在北大荒出生的，满月之后随父母回到北京，现已上班工作。这次回访，一直因为请不下假而无法预定车票。临行之前好不容易请下假来，但车票没有了。张苗苗说："我一定要去，那怕是站着也要去"。最后终于如愿成行。

回到前进农场，张苗苗就拉着父亲上了医院，非要找当年的产房，找当年接生的大夫。产房找到了，张苗苗趴在窗户上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我就是在这儿降临人世的！但是人已经不在了，当年接生她的周大夫已经故去！

张苗苗又跟着父亲到了28连，找到了当年她们的家！张超触景生情：房还是那幢房，炕还是那铺炕，菜窖还是那个菜窖，就连自己亲手搭的小厦屋和垒的鸡窝竟然还"挺立"在那里，更使他惊讶不已的是：就连当年小夫妻呕气，他在门上砍的一个窟窿还原封不动地露在那里！一晃二十年，故地重游，旧景旧物，张超感慨不已。

我们回来寻找什么？是追寻我们失去的青春？还是追寻我们过去的足迹？或许什么都不是——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

也许在孩子们的单纯心灵中，对北大荒又是另一种感受。

杨晓堂（机关政治处）的儿子杨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来到了五连，看望老职工。在农舍小道间，我感到了田间生活的快乐。小鸡跟着鸡妈妈散步，鸭子在水中嬉戏，大狗还不时地朝我们‘汪汪’几声，这种快乐我还是第一次感受。我们又来到了他们原来住的房子，屋顶是用草苫的，墙是用土坯和黄泥砌的，十分简陋，这种当时的房子也只剩下几间了。虽然我以前听说过爸爸妈妈的生活有多么艰苦，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的所见所闻使我真正体会到了父母当时创业的艰辛和困难。”“我们回来看你们来了”8月3日上午七时许，回访团代表全体回城知青前往“60连”扫墓，祭奠长眠在北大荒的知青战友和老职工。

扫墓队伍抬着花圈，缓缓走进墓地。挽联上写着：“长眠在黑土地上的战友永垂不朽！”知青们在坟头上摆上特地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白酒、可口可乐、方便面及水果等祭品。“知青战友们，老少爷儿们：我们回来看你们来了！”大家呼唤着战友。

柴永林（23连）把带来的白酒、可口可乐、雪碧洒在墓地周围，一边与久违的战友说话：“我们回来看你们来了，酒带得不多，是我们的一份心意，我们还带来了可口可乐、雪碧，当年你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哩！今天我们带来了，让你们大家都尝尝。别着急，一人一口，匀着喝。”大家向墓地三鞠躬，默立良久。墓地里一片肃静，唯有齐腰高的荒草与唏嘘之声。

我们今天还活着，你们却长眠于黑土地！

我们已经返回了自己的城市，你们却永远留在了第二故乡！

离开墓地的时候，天渐渐地阴了下来，后来竟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老天爷也为之动容。

“还会遇到这样的好人吗？”北京知青席燕京（5连）踏上重返北大荒的归途之前，接受了战友们一个个郑重的嘱托——“到了北大荒一定要去看看指导员，替我们问声好！”席燕京她们的第一任指导员名叫王立业，是58年十万转业官兵中的一员。他身穿褪了色的军装，头戴军帽腰扎皮带，一副标准军人的气质，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慈祥，给人以一种信任感的人。

为了让知青们安下心来，他和知青一起吃饭，一起下大地、盖房子，工余之时还找知青拉家常，问寒问暖；为了哄知青高兴，傍晚都要组织大家打篮球。指导员开会讲话诚恳、朴实，没有口号和高谈阔论，他讲的话大家都爱听。席燕京回忆道：“我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讲心理话，可以发脾气发牢骚，可以掉眼泪。每当我们想不

开的时候，常常上他那儿去找答案，每当我们从他家里出来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心里踏实，肚子也填饱了——因为他有个温柔善良的妻子，每次她都在谈完话后端上香喷喷的大饼和一盘炒土豆丝，不吃完是不让走的。连队给家属分东西，指导员的妻子总是拿最后一份，他们的住房挑的是西头把边最冷的一间。……”“记得那是我离开北大荒的前一天，指导员象个慈善的妈妈那样嘱咐我：‘到了新的地方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人生地不熟的要注意身体，你的性格也要改改，别太倔了。’他妻子又为我煎了油饼，炒了土豆丝。出门的时候，指导员又给我装了一书包的香瓜，还送我走出好远并一直目送着我。当我独自走出很远回头遥望时，他仍站在那里向我挥手。”席燕京问自己：“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会遇上指导员这样的好人吗？”二十多年过去了，当老指导员得知知青们又重返北大荒时，清晨4点多钟就来到知青住宿的宾馆门前默默地等候。见到知青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真想你们！”他的面容仍是那样的慈祥、和蔼，但是说话的声音比以前小了，耳朵也有些背了，头发全变白了。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的家依然是那样清贫、简洁，只是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这就是老职工对知青的感情。

最难得的最珍贵，最珍贵的最难得！

北大荒十年风风雨雨结下的深厚感情最难忘！

“请给我们一次表达感情的机会吧”当年60团团直学校的教师王东、陆荣、冯文英三人一下火车就被当年的学生们包围了。“那场面比我想象的还令人激动”，冯文英说。“真的”王东说，“那几天我都不敢多说话，生怕自己一张嘴就要哭出来。”“冯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胡老二呀！”冯文英认出了这位说话的小伙子——胡宝平。只听他回忆说：“那时我跟哥哥从二连到团部上中学，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常常因为想家而哭鼻子。每次我一哭，您就拿出从上海带来的大米给我煮粥喝，您没事时，还老带我到处转悠，哄我玩。”冯文英只记得自己当教师时为了教好孩子，整天围着他们转，至于为每个孩子做了些什么，她都记不清了。然而当年的学生们并没有忘记这一切。现任洪河农场党委书记的王甲林说：“当年的冯老师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干。有了老师的付出，才会有我的今天。”当年的老师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学生。返城后的王东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当她决定返乡探亲后，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为学校买了两个石英钟；为学生们准备了40套铅笔盒及文具、36个钥匙链、14斤糖果和满满一大包衣服鞋子。两位送站的战友气喘吁吁地抬着四个大包刚刚走下北京站的电梯，那个行李车就因不堪重负而散了架。

97年11月，王东的一个学生因早产在北京住了医院。出院时，王东为她东拼西凑地借了4000元。这次返乡探亲，她的学生们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凑了数千元送到王东手中。王东离开北大荒前，悄悄地把这些捐钱学生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委托专人退款。不料这些热心的学生又将钱寄到了北京，他们声明：“无论如何不许您再把这钱寄回来！请给我们一次表达感情的机会吧！”也许冯文英的话最能概括这些昔日老师们的感慨：“我不后悔在北大荒

当了十年老师；我也因此才在返城后依然选择当老师。”“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在学生身上实现自己对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与塑造。”“希望你们还能回来”返乡探亲的三天是短暂的，短暂的三天又是异常充实的。它浓缩了30年的风风雨雨和30年的爱、恨、怨、恋。它浓缩了新老两代北大荒人的省思感悟，亲情乡情。

知青们又要踏上返城之路了。那天一早人们就络绎不绝地来到前进宾馆话别，大家尽量表现得快乐、轻松，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临别前的依恋与忧伤。一袋袋面包、香肠；一包包刚出锅的烧鸡、烧鸭；一箱箱纯净水，一瓶瓶乐百氏鲜牛奶，一个个自产的西瓜、香瓜，一只只个大味美的鸭蛋、鹅蛋……它们默默地诉说着老职工们不尽的牵挂，它们静静地等待陪伴知青们踏上新的旅程。“那情景就像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一样。”杨晓堂回忆说。

前进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们。场领导来了，老职工来了，当年的学生们来了，依然扎根在北大荒的老知青们也来了。大家握手互道珍重，别情依依。留场的老知青们含着眼泪嘱咐道：“希望你们还能回来”，“希望还能再看到你们！”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上苍有灵也会为之落泪。果然，天渐渐地阴沉下来。

“快回去吧，就要下雨了，可别淋着了！”知青们在车上大声地喊着。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能走啊！”老职工们在疾风中回答。

人们劝慰着，凝视着，坚持着……

突然列车开动了，车下一位老职工追着启动的列车喊着：“知青们，谢谢你们，你们是功臣啊！”车上知青们泪眼模糊，内心一遍遍呼喊着：“北大荒，我们还会回来的！”车外大大的雨点急速地敲击着车厢；车内知青们对北大荒不尽的眷恋一阵阵撞击着他们的心房。

风雨中，地平线上矗立着那现代化的医院、学校、油脂厂快速向后退去，建于1972年现仍在服役的前进农场场部机关办公房在逐渐变小……

尾声在这篇报道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原28连上海知青江华潮、蔡浦荣打来的长途，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追加了以下的一段文字：江华潮、蔡浦荣回到阔别已久的连队后，总想着要给自己的连队留下点什么。思虑再三，他俩感到当年由于没有环保意识，亲手伐倒了许多树木，现在是弥补这过失的时候了。于是他俩看好了地块，交给队长500元钱，请生产队在明年开春时种上50棵树。

此事深深感动了连队的父老乡亲。生产队决定，队里再拿出一部分钱，明年栽它一片林子，名字吗，就把它叫作“知青林”吧。

让北大荒永远充满绿色！

让知青的情谊与北大荒的绿色永在！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别的事物都是离得愈近看得愈清楚，而历史往往是离得愈远看得愈清楚。

一位老职工说：知青在的时候，不一定能体会到知青的作用、价值。随着大批知青返城，一夜之间北大荒的天就象塌下来一样。顿时连队失去了生机，失去了往日的歌声笑语，死一样的寂静，整个农场几乎大面积的“瘫痪”，我们感到恐慌，心里没着没落。

而知青们也是如此。不管当年你在北大荒的处境如何，不管你对北大荒是爱，是怨，还是恨，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日月的流逝，我们会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在我们的心中涌动着的那股对北大荒的割舍不了的眷恋之情！

我们用席燕京的一段诗一样的语言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北大荒的月初是那么美丽壮观，北大荒的烟泡是那么气势磅礴，北大荒的桦木林是那样的洁白无瑕。

只要有真情在，北大荒永远是春天！”

本文根据冯文英、徐宏远、王东、席燕京、张超、王云、杨晓堂、叶继红、戴琛等人的口述和文字材料，由龚凯进、周大计整理而成。

2005年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旧地重游之一】：

千里走单骑

人说来也怪。当年，我们离开农场时，行色匆匆，义无反顾，就像脱离苦海。随着时光的流逝，时至今日，却时时想起版纳，想起农场，直至魂牵梦绕。

因此，心里早就想着再去云南旧地走一圈。尽管，每年我都有一定的时间，经济上也没有问题，却一直没能落实在行动上。今年夏天，我决定再去版纳。起先，我也想找一个同伴，我现在工作圈子中，好像很少有人愿意陪我这样走一圈；那么，就想在知青朋友中找，但是有些人没有时间，有些人没有意愿；妻子也在上班，一时也不能脱身。于是，学学外籍人士，来一次单人背包游。为了尽量找到知青时代的感觉，一路的交通工具除了飞机以外，还选择了火车和长途大巴。

这样，我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前后用了二十几天。在农场、景洪、思茅、普洱、墨江、昆明走了一大圈。这一路走下来，感慨万千，感触良多。

首先，这些年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惊人，过去那些偏僻的边陲小镇，如今都成了街道纵横，车流滚滚的城市。连总场、大猛龙都出现了初步城镇化的现象。

其次，商品经济威力无比，如水银泻地渗透到每个角落，人们急于改变现状，急于积累财富，人心浮躁，连最远的边疆、最原始的民族也在所难免。

还有，环境变化（优化较少）很大，在农场范围内很难再见原始热带雨林，山上多种了橡胶。亚热带雨季气候的农场，尽然地面水网退化严重，河流普遍变小，可见，水土流失的严重。

通过这次行走，我也尝到这种旅游形式的甜头。首先，有较大的自由度，喜欢一个地方，就可以作较长时间的停留。其次，可以静下心来，边走边想，边想边看。我这次就写下不少行走笔记，尽管字迹潦草，但只要我愿意，其中任何一个小章节，以后都能化成一篇文章。

美丽的橄榄坝。

景洪热带花卉园内不知名的果树

又见景洪

（1）

上午9点40分，长途大巴准时从昆明客运总站出发，在人流、车流中磨磨蹭蹭地爬行，出城颇费了些时辰。

离开城区以后，大巴上了高速，便一路风驰电掣。行至下午5点左右，终于看见在山脚下有一条滚滚流淌的大河，我心头不由为之一震，那就是让我魂牵梦绕的澜沧江了！望着江对岸那一大片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群，我心潮汹涌，难以自制。尽管面目全非，但我知道那一定是景洪。这次我千里迢迢前来见她，隔着车窗看着迎面而来的她，说来真不好意思，我竟然双眼视线模糊，我这是怎么了？都这么一把岁数了，还这么臭激动。

汽车驶过雄伟的澜沧江新桥，转了个弯,沿着江边向南，驶进了景洪客运南站。我急匆匆地出站，门口停着不少出租车和三轮摩的。

“景咏宾客去不去？”我急着向开着车门坐在驾驶室里的出租车司机询问，他们好像都爱理不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似乎对这挡生意都不感兴趣。不远处的三轮摩的，却很快地开过来，抢着招揽生意，我稍一迟疑，就很快地坐了上去。驾车的是个满口四川话的大姐，一看便知是个外来的打工者。

摩的一转弯就驶上一条笔直宽阔大道，抬头便望见路边的路牌—“猛泐大道”。一路树影婆娑，花团锦簇，一些路段完全可以与新加坡相媲美。因此，现在的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已完全没有必要过分地崇洋媚外。

（2）

景咏宾馆，它是我出发前在网上做功课找到的，就在州政府旁边，周围绿树成荫，环境不错。因为不是旅游旺季，主楼的标间才80元，设备齐全，按内地的标准看，起码也得有两星级。

我满身大汗地走进客房，急忙打开空调，拉上厚厚的窗帘，这时外面仍然是阳光灿然、赤日炎炎，房间内却凉风习习、舒适宜人。我翻身倒在床上，放肆地叉开手脚，竭力舒展着车旅劳累后的筋骨。只要愿意，我还完全可以从这张床倒腾到那张床，只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已经没了少年时的顽劣。应了古人的一句话“睡不过一张床”。

这时，我已经决定，在这里多待几天，好好地近距离多看看今天的景洪，顺便可以调整一下身体与心情，然后再去久别的农场。

这次独自来版纳，说是旅游吧?不全是，说是休闲吧？也不全是，全是为了怀旧吗？似乎也不是，又好像都兼而有之。脑际突然闪出两个字“采风”，不及细想，就觉得脸红，那“采风”可是专家们的事，于我等尚有距离。那么，就不去管它，且当作一次行走。

暑气逐渐消退，拉开窗帘，外面的阳光也不像刚才那么逼人了。体力也恢复了不少，于是就拿着相机，戴上墨镜。轻松出门。

宾馆门口的那条马路，叫作“宣慰大道”，顺着这条道走，不出200米，就可以看见那原来唯一的十字路口，只是旧貌换了新颜。原来百货商店的旧址上，仍然是百货商厦，只是规模和气势，与原来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新华书店已不复存在，变成了街心花园。那个不常开门的副食品商店也荡然无存，只有邮局尚在，也是经过重建，街面后退了不少，路面变宽。原来景洪旅馆的位置上，建了一座高高的带有钟楼的大厦，无论从规模或高度上看，都应该是今天版纳的标志性建筑。

沿着环形的街心，过了马路，我久久地站在原景洪旅馆门口的那个位置上。街上过往的行人也不会太注意此刻表情凝重的我，此时，我的心在流泪，心泪纵横……

三十几年前，我曾多次站在这个位置上，望着远处的青山，感觉前途渺茫，心情茫然。现在，我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悠悠的青山已被建筑物遮住，只见人来车往，红尘滚滚……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岁月流逝，沧海桑田。不仅人事销磨，连“旧时波”也变了模样。

（3）

夜幕下的景洪，灯火璀璨，霓虹跳动，俨然一个现代城市。这时，也是整个城市最热闹的时候。

我坐在城中心孔雀湖边的栏杆上，迎面吹来凉爽的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流动人口明显地占了很大比例。我心想：他们来自那里，他们在这里靠什么生存，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街心花园里，人们在欢歌劲舞。参与者众多，有各民族的本地人，有来自各地的打工者，以及少量的旅游者。有人在跳着时髦的交谊舞，也有人围成圈，在跳着古朴的锅庄。这里传来尖声尖气的云南山歌，那里响起诙谐的川味民歌，还有人弹起了三弦。欢歌笑语，此起彼伏，人们在尽情娱乐。人群里明显有流莺混迹其中，她们推销自己的积极程度令人瞠目。

沿着宣慰大道朝相反的方向走，不远就是新桥。桥上江风浩荡，吹得浑身凉爽。看桥下，沿着下游方向，有一条宽阔的江边大道，在路灯的照射下有熙熙攘攘的人流。

我从桥边的便道走下大桥，走上江边大道，这条路明显是新建的，路面开阔，靠江的一边有一些绿化，另一边是高高的防洪堤。一些外来的建筑工人，坐在江边，潇洒地喝着自带的啤酒，用家乡话悠闲地唠着家常。一些下了班的打工者，把衣服随意搭在肩上，三五成群的在散步，那状态有点像当年的我们。还有一些当地人在溜狗、闲逛。昏暗的绿化带边，竟然有人摆开小床，在招揽人前去按摩，一听口音，便知是外来谋生者。

走到这条道的尽头，再沿着长长的上坡道，爬上高高的防洪堤，顺着堤上的小道往回走，快到桥边时，又有一片绿化，其中有一些漂亮的亭台，亭上闪烁着漂亮的彩灯，一阵悠扬的乐声传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露天酒吧。一位东北籍的女歌手，歌声高亢亮丽，将一曲《青藏高原》唱得荡气回肠，水平绝对不逊于专业。承包的老板在客气地招揽，我要了一杯啤酒，转身入座，那酒的价格肯定比市场价高出不少。

从桥头回到城中心，已近11点，街心广场上仍然有很多人，想找地方宵夜，十字路口后面，有一条步行街，开着不少饮食店，仍然灯火辉煌，种类不少，有南方的、北方的、本地的、四川的，不少都是外来者开的。抬头一看，有一家沙县小吃，这时，我的胃口来一碗小吃正合适。进门，一位三十几岁的福建籍女老板精明强悍，还有两个十几岁的打工少女。过不久，我就和老板套起了近乎，才知道他们全家都在景洪好几年了，现在生意不好做，主要是房价太贵。这两个打工的少女，是山上爱伲族的。

那两个少女，无论从衣着、言谈举止看，都像当地的汉族，连我们这些老云南都看走了眼。还有，这里的傣族年轻人，基本都着汉装，说汉语的口音没有傣味。这次来版纳，看到的一个喜人的现象——民族和谐。

（4）

在老桥与新桥之间，贴近江边的地方，有一条修缮得非常精致漂亮的人行小道。它的一边是造型别致、充满民族风情的栏杆，其上还涂了一些耀眼的金色，让人感到金碧辉煌。另一边是缓缓向上的坡面，上面花草树木错落有致、郁郁葱葱。路面上还铺着色彩艳丽的地砖。我个人感觉这里几乎是景洪最美的地方。

我在景洪的这些天，几乎每天清晨，都会沿着这条江边小道，从新桥到老桥，快步走上一个多小时。那个感觉,怎是一个“爽”字了得。

桀骜不驯的澜沧江水，裹挟着从蛮荒带来的狂野，打着旋涡，在脚边汹涌而过。远处的青山，苍翠欲滴、逶迤起伏、层峦叠嶂。这里的人们，好像习惯晚睡晚起，现在，这里几乎没人。我一个人在小道上健步快走，一阵阵江风掠面而过，空气异常清新，让人心旷神怡，有点飘然欲仙。

那种满花草树木的斜坡上面，是一条宽阔的正在建设中的商业街，沿街建有不少色彩鲜艳的商业用房，大部分都是酒吧。靠近新桥的这头，更有成片的商用房正在建设，其中不少正在招租，广告上写着：“让你把摇钱树轻松地带回家”，世上竟有这等好事？从中也可看出当事者的心态。施工的围墙上美国赌城拉斯唯加斯的景色赫然其上，决策者的“宏伟”心愿也跃然其上了!跨过版纳大桥（新桥），走上高高的防洪堤。早上，这里很冷清，已没有了晚上的喧闹。堤外，大片的土地正在开发，远处，一座高层建筑已经结构封顶，楼顶写着：“西双十二城”，从规模上看，建成后完全可能是版纳的新标志。

正在施工的工地，一个接着一个，施工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打破了还没完全醒来的小城的宁静。工人们互相召唤的喊声，从远处传来，有点像川江里的船工号子。

这些建筑民工，为了改善他们以及家人的物质生活，什么样的苦和累，他们都能忍受。这种吃苦耐劳、积极入世的精神，世界上其他民族并不完全具备。这种精神，在现在的环境下，得以充分发挥。这正是，这些年我们社会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

从江边回宾馆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农贸市场。一个身着傣装的“老比朗”（老大妈）挑着担子在卖水果，我随口问了声价格，其实并不想买，说了声：“太贵了”就想离开。

“老板，现在，你第一个开张，再便宜点卖给你了。”一口流利的汉话，没有一点傣味，连口吻也是充分市场化的，出自这样年纪、这样衣着的傣族妇女之口，令我吃惊不小。那么，就只能买一点，带回宾馆。

（5）

这个季节到版纳，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尝遍这里的亚热带水果。这些天，我几乎尝遍了在市场上能看到的水果。如今，物流快捷，这里绝大多数的水果，在大城市里都能找到，但是，其内在的质量差别很大。

景洪的路边街头，有不少卖水果的小贩。一位大嫂穿着围裙、戴着手套、拿着水果刀，边削边在推销她的菠萝，浓郁的果香飘的很远。我在她的摊位上买了些价廉物美的菠萝后，她又极力推荐她的芒果。还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批，如再要吃，就得等明年了。

在买卖过程的交谈中，才知道，她也不是本地人，是附近景谷县的农民，在这里承包了一片土地，种了水果，现正在自产自销。又是一个外来谋生者。

说到外来者，在这里，不仅有国内，还有国外的。景洪街上就有不少开珠宝店的缅甸人，有些路段还一间连着一间。每当有外来旅游者从店门口经过，里面的经营者一律称他们为老板。店主热情地招呼“老板们”进来观赏，人们大都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并不进去。

这些店家看上去并没有生意，我估计这些店面的租金一定不会低，因为它们一般都处在较好的路段。那些皮肤黝黑、体态偏胖的缅甸人，好像并不着急，个个心安神定，不急不慢地看着过往的路人。

看来，他们是以少量的成交，来达到支付成本和实现利润的目标。这种经营方式市场上叫作“钓鱼”，其中的暴利显而易见。因此，旅游者在这种地方，最好管好你的钱包。

景洪的城区并不大，但公园可不少，光主城区就有：热带花卉园、西双版纳南药园、民族风情园、版纳乐园、

曼听公园等。而且个个面积不小，门票都在30元至40元之间，这样的票价，根据当地的实情，绝对属于高价。如按这个票价，当地人是不太会进去的。

当地的管理者将门票的销售对象，明显地锁定在外来旅游者身上。但效果欠佳，除少数团队以外，外来游客并不多。然而，经过口口相传，反面广告却做了不少，肯定会遏制当地旅游的人气。从中也可看出：尽管，有些人有急切的敛财心理；但是，目光却很短浅，手法也欠高明。

就整个版纳范围看，还有更高的门票价格，更急不可耐的心态，我这里也不一一赘述。

城区的这些公园，依我看，完全没有全去的必要。尽管，里面花木葱茏，经过人工修饰，更是错落有致，别有风情。但就整体看，整个西双版纳就是个绿色大花园。我认为光澜沧江边的环境，就绝不逊于这里的公园。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推荐热带花卉园，那里有一些奇花异草，很有版纳特色。

（6）

在这里，我已足足逗留了五天，该继续往前行走了。那天，我从江边晨练回来，就去买到大猛龙的车票，才知道去猛龙的车票是随到随买，不预售的。于是就去吃饭、休息、回宾馆打理简单的行李。直到中午11点半才买了12点的票，拿着行李上车，发现中巴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年轻的驾驶员，敞开衣衫，站在车旁，对我说道：“上车吧，等一下我还要去叫人。”我想农村地区的驾驶员，在路上顺便搭个把熟人，那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我也并不在意。

到了发车的时间，车上还是没有几个人，司机驾车驶离车站，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就让我困惑不已了。

中巴绕着车站，慢悠悠地游逛，并不急于驶向目的地。车门开着，售票员把身子探出车外，大声地招揽着生意。就这样一圈又一圈……

车上的乘客好像也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不久，竟然在车站出口不远处停了下来，管交通的警车出现，中巴只能匆忙启动，继续绕圈。

我发现在附近至少有四辆去大猛龙的车，在做着同样的事，同样在和警车作着迷藏，每辆车上大约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乘客。

我估计整个车程的三分之一时间，都是在绕圈。就这样，大量的人力物力被糟塌了。这种状态的出现，肯定是缺失了某些管理。这些车辆，都是个人承包的，司机说，“他们收了费后，这样的事是不会管的。”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都讲“竞争”，这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有时，我静心想想，这“竞争”两字，落实到我们每一人身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普通百姓，无非是经过自己的努力，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过上比别人更好的日子，只要不超出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这也无可厚非。

为官者，无非是想创造更好的政绩，使仕途更为宽敞，只要不使歪门邪道，这也可以理解，至少不是贪官污吏。

我在景洪所见所闻，既是今天景洪的缩影，其实，也是如今社会的缩影。

“竞争”掀动了一潭春水，使之波光粼粼、春光明媚；“竞争”激活了整个社会，使之五光十色、快速变化、生机无限。

但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在世俗功利面前，还得留有精神。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后的精神底线至少是要“爱国家、爱民族”，更为重要的是“爱别人”。

如果连这个也模糊了，那就会有大问题的。

从新桥上看下来的景洪城区

雄伟的版纳大桥（新桥）

橄榄坝街景

2009-10-05

东风掠影

（1）

中巴离开景洪，在嘎洒稍作停留，便驶入了景洪农场的地界。兵团建制时，这里叫作一师一团。景大公路在这里好像改了道，没有再去爬那高高的飞龙坡，却与曼飞龙水库擦身而过。路两边的山坡上，都是满目苍翠的橡胶园。一路上,不时有傣家的村寨、农场的单位从车窗边闪过，尽管，变化巨大，但整体轮廓还是有些依稀可辨。

车到东风时驶进了一个车站，同车的人告知：农场到了。我拿起行李，稳定了一下情绪，慢悠悠的出站。

车站不大，刚建不久，看上去还很新，有候车室、售票处、出口处，与内地农村汽车站无异。看着眼前的景象，我脑海中记忆程序里马上就显示出：当年，我们探亲外出时拿着行李，在公路边长时间、无奈地、望眼欲穿地等车的场景。

走出车站，我站在公路边。尽管，经过景洪这么多天的预热和调节，我的心情仍然有些激动。“离别三十年，今日回……”三十几年过去，此时我绝没有弹指一挥间的豪迈。“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眼前就是农场？就是我梦中的第二故乡？我真不知此时身处何方了！

公路上人来车往，路两边的田野和熟悉的山峦都被房屋遮住了，路边都是店铺，有卖手机的、修摩托车的等，有点杂乱，与内地农村小镇没有区别。

找到东风宾馆，这也是我预先了解好的。递上身份证，登记住宿，不用介绍。柜台里一个脸色白净的中年女子便问：“你是知青？”我点头称是。

她马上又问：“你是几营的？”“8营的。”我随口答道。

“我也是8营的”她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

于是，我报出一大串姓名，问她认识吗？

“我爸爸认识。”“你爸是谁？”“普光忠。”这不就是8营5连的队长吗？真没想到，到农场，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间接的熟人。宾馆的客房有两个价位，80元和50元。她对我说，这两者其实是差不多的。她带我到二楼的一间客房，50元一天，条件还不错。

在宾馆稍稍休息，又出来闲逛。宾馆的斜对面是休闲广场，它占地面积不小。据说，是农场职工个人承包的，经营的范围有客房、餐饮。里面有环境很好的客房，在绿树和红花的环绕中，我本想搬到这里来，但觉得过于偏僻，感觉上不如东风宾馆安全。这里还有一些亭台水榭，有一个不小的餐馆，几个水边的亭子就成了就餐的地方。

宾馆的旁边就是小康路，走到底就是景观大道。这两条路的交点上，有一座不小的雕塑，其主题好像是讲述农场发展的历史。这区域还有东风广场、农场博物馆，硬件建设得不错。景观大道非常宽阔，路两边建有一些楼房，但明显的是缺少人气，显得大而无当。

感觉上，景大公路、景观大道、小康路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框架，在景观大道上闲逛，看到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的楼房门前，感觉到非常脸熟，走近一看，就是9队的老职工扬家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却认不出我，等我说了我是谁以后，他才恍然大悟。忙着从家里拿出凳子，招乎我坐下，于是一阵唏嘘感慨。他已经退休，他儿子化了一笔钱在这里建了三上三下的一排楼房，如果以后这里有了人气，这房子可就值钱了。

晚餐后，我又到曼景湾寨子走了一圈，寨子里变化很大，有些傣楼经过改建，变成汉傣结合，有点不伦不类。但还是有一些傣家吊脚楼保存着。整个寨子里建得最好的房子是庙宇。

晚上，农场的天空上，晚霞变化无穷，绚丽无比。

夜幕降临后，宾馆周围有些小店，亮着粉红色的彩灯。外面有的东西，这里也都有了。

这时，总台里坐着的是一个较年轻的女服务员。我无事就和她闲聊，他们都是农场职工的子女，宾馆是个人承包的，她们在这里打工，每月才800元，这个工资在大城市肯定是无法生存的。农场的橡胶树都已承包，她们要想成为橡胶工人，还得看有没有机会。

（2）

一早从宾馆的床上醒来，拉开窗帘，天色已亮。外面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现在，这里的人们好像都习惯于晚睡晚起，与想像中的农耕生活相背。

今天，按计划，准备去一分场六队，那是40年前，我刚到农场时的第一个家。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大约就是当年的东风商店。

从六队到东风商店、小街大约有五公里路，这是我们当知青时就知道的。当年，我们时常会利用难得的假日，成群结伴地快步健走一个小时，赶到小街，挤到小食馆的售货口，从混乱的人堆里“抢”出几碗清水“米干”，然后就心满意足地大嚼起来。那几碗清水加盐巴煮出来的“米干”，（那东西，现在上海市场上也有，叫“河粉”）那年头，成了我们一早赶路去小街的主要目标。

我走出宾馆，在公路边探头张望，想找找有没有卖“米干”的地方，果然路边就有几家。挑了一家看上去干净一点的，在路旁的桌子边坐下，要了一碗，端上来一看，上面还有一些肉末和香菜，质量比当年好了不少。但是，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再也不可能心满意足了。心中猛然跳出一个哲学的大命题：“存在决定意识”。

这里离今天的目的地六队，最多也就是5公里的距离。当年，我们走这点路，真是太平常了。即使，今天走这

点路，对我来说，也真不在话下。为了寻找当年的感觉，我决定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徒步前往。

这样，我便甩开双手，悠哉游哉地沿着公路朝一分场迈步出发了。路两边造了不少的房屋，还有些正在建造，把两边迷人的田园风光和起伏的群山遮住了，少了当年那种恬静幽远的风情。

尽管环境变化不小，但一路上地标旧址都还依稀可辨。如：总场医院、农中、农中桥、一分场医院、一分场机务队、一分场场部，我都一一走过。不过，机务队里好像没有了拖拉机，分场部也比过去冷清了不少。

一分场部到六队的这节公路有些路段，两边的景色基本还保持着原样。路边的一些老树和零星的傣楼，能瞬间激活我脑海深处的记忆，使原本模糊的四十年前的映像顿时清晰起来。

通往六队的那条小路，这几年，我时常梦见。那是一条狭窄弯曲的土路，路两旁参差高低的树木，如亭亭的华盖遮蔽了天空，贴近路边还种了一些芭蕉树，时常硕果累累。旱季的早晨，晨雾缭绕，露水从树上滴在芭蕉叶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我们走在路上，透过薄薄晨雾，有时还能看到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在树丛中、在雾中追逐嬉戏、打情骂俏。那如诗如画的情景，即使在那筚路蓝缕的当年，也曾打动过我们稚嫩的心灵。

今天，我走在这条路上，亭亭如盖的树林不见了。路边零星地盖了些房子，只有那条小河仍然在路边汩汩流过。一边山坡上仍然是茂密的橡胶园，按年代算，那应该都是重新种过的。

远远地看见有一些屋舍，那一定是六队了，我的心头不免有些激动，情不自禁地举起了相机。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分开三十几年了，基本断了联系，不知还有没有熟人。走进连队，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不仅地面建筑是完全重建的，就连整体布局也已改变，这是我这次回农场，看到的改变最大的连队。

一些孩子在场地上玩耍，房屋的门口零零星星地坐了些人。他们看见我，都抬起头“笑问客从何处来”？我竭力报出些当年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老工人子女的姓名，得知“何振甫”还在。

在人们的指引下，跨进他家门，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只是，说我变化很大。开玩笑！三十几年了，还能变化不大？一阵唏嘘后，感叹人生如白驹过隙。

当年，他是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如今已经退休，退休工资能够维持本人的基本生活。他热情地拿出水果来招待。好像，他全家都在家，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其中一个是他的儿子。

在他的指点下，找到当年那栋草房的原址，那里已建有一排简陋的平房。阳光下，这里的一切真是太平常了，但这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些年，我时常梦中见到它。

何振甫说："前几年，某某也来过,来找住过的旧房子,房子拆了，他抱住那里的一棵树，激动地照了个相。"哦，原来这样！只要有相同的经历，人的情感是相差无几的。

队里还见到一个熟人，就是当年脾气耿直的景谷青年吴学林，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早已做了爷爷。

如今的农场连队，早已听不见出工的钟声。管理是比较松散的，各家都做着自家的农活，吃着自家的饭菜，看上去更象农村的村庄。

婉拒了他们的留饭，我顺着小路回到公路，搭上中巴，很快就回到宾馆,到休闲广场午餐，已经与老板娘混了个脸熟，再也不看那个所谓的菜单，直接就问。

"有什么好菜？""今天，刚买来新鲜的牛肝菌。"太好了，这真是难得的山珍！一盘鲜嫩美味的牛肝菌真是妙不可言。其中的美味真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了。

饭后，回宾馆打开空调，闷头睡觉。

晚餐，我仍然点了牛肝菌。

老板娘笑着说："中午吃了，晚上还吃？""还吃。"为了不辜负老板娘的热情，晚饭，我又加了个炒鸡蛋，那鸡蛋与上海的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一顿晚饭，心满意足，酒足饭饱。

哦！有点夸张，我没喝酒。

（3）

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灼人的酷热渐渐退去。黄昏时分，是农场最美的时光。人们纷纷出来溜达，新建的东风广场上，竟然也有不少人在跳着集体健身舞。

天色渐暗时，我返回宾馆，透过窗户看出去，整个天地呈现出一种神秘的深蓝色。满天飞舞着归巢的小鸟，就连电线上也停满了鸟儿。

入夜以后，不远处传来卡拉OK的歌声。尽管，歌声不敢恭维，但还是吸引我走出了房间。原来，宾馆二楼就开了一家KTV歌厅。宾馆的后院里，稀疏的树林中，还开了一个露天的茶吧，闪烁的彩灯下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轻的茶客。附近就有一家亮着粉色彩灯的洗头房正在营业。这样看来，农场尽管地处边远，但仍然与时代同步。

晚上睡得并不安稳，直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早上醒来，头还有一些晕乎乎的。按计划我还有两个必须

要去的地方：一个是八分场，另一个是大猛龙白塔。今天可根据具体情况二选其一。

刚在路边站定，迎面就来了一辆直达大猛龙的班车，那么，今天就去大猛龙了。

车过小街，不久就到了曼养寨，有几个乘客下车，驾驶员指着远处的一些房屋对我说："那就是原来的八分场"。景大公路在这里好像改了道，不再与八分场部擦身而过了。

再往前走，车窗外有曼龙叫、曼龙扣等路牌闪过，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熟悉的傣寨的名称。很快就到了猛龙镇，班车就停在一个有点杂乱的小车站门口。下得车来，朝四下里张望，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大猛龙。

当年，我们就知道大猛龙要比小街热闹些，这就意味着：在这里的小卖部里买到饼干、糖果等紧张商品的机会，要比小街大一些；在这里的饭馆里吃到相对丰富饭菜的机遇，比小街多一点。但猛龙离我们的住地较远，如果，走路去的话，单程就要3个小时，因此，我们去那里的机会比去小街要少得多。

但是，当时我们年轻，精力充沛，加上长期的劳动，锻炼得身手矫健。有时，我们会约上二、三个同伴，在公路边看到疾驶而过的拖拉机，狂奔着追赶一阵，只要双手搭上车帮，一只脚找到一个支点，然后就全身腾空而起，接着潇洒地翻身跃上车兜。至于，驾驶员和其他乘客的责备声，只能当作耳边风了。就这样风尘仆仆地赶到大猛龙，在那仅有的一条街上，流连忘返一阵，至于怎样回去，全然不作考虑，只能随遇而安。

当时的大猛龙，只有一条不到百米的街。那是一条缓缓的上坡道，街两边有两家小食馆，还有几家分别卖农具、食品、百货的小卖部，它的顶端还有一个公安派出所。再往上去，那小山包上有一排排较整齐的平房，这就是我们二团的团部了。

那年月，我曾到团部开过几次会。那时，我们白天在团部开会；晚上，就住在附近的寨子里。

以前，猛龙街是与公路垂直相交的，形成一个丁字形。现在，景大公路已经移到原来公路的下面，大猛龙有了个闹哄哄的十字街口。

车站门口的街上停满了拉客的农用车、摩托车，这里好像没有黑车的概念，载人拉客是得到大家认同的谋生手段。十字街口的那些店家，都拉开了卷帘门，正在热热闹闹的营业着。街口人来车往，有点杂乱，与内地偏僻山区小镇无异。

那条缓缓的上坡道还在，好像已经不是这里的商业中心，略显冷清，当年的轮廓仍然依稀可辨。派出所还在，只是移到了路的另一边，路的尽头成了镇政府的正门。团部的原址，成了当地的一个小学，从旁边寨子里的小路绕上去，能看到当年团部的老房子有些还保留着。

离开大猛龙时，我在街口，叫了一辆农用车，要它带我到曼飞龙寨子。车沿着老公路，开了不久，就到了寨子边，在那条上山的小路旁，我就下了车，然后沿着那条不宽小路往山上走。

小路在寨子里绕来绕去，这个寨子还保留着较好的傣家风情，傣家村民们在陆陆续续地出工或收工，有的还拿着我所熟悉的割胶工具。现在的傣族汉化不少，并且与汉人关系融洽，我一路不停地问路，所有的村民都会和善地指路。

快到山顶时，透过树丛，我远远地看见了白塔。走进一个小门，在山顶的一块的平地上，我终于看到了白塔的真身。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当时，只是偶尔听人说起她，并没有到过这座年代久远的白塔身旁。今天，我千里迢迢前来瞻仰她。抬头仰望，她通体洁白，线条丰满流畅，又有点像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

很长一段时间内，白塔周围只有我一个人，我围着白塔虔诚地绕圈，口中不禁念念有词，心中默默祈祷。

不久，有一个身着白衣的傣族老者上来，我请他为我照了两张相，并模仿带有傣味的汉话跟他说："我早早在这点了。"他马上明白我是知青，并表现出更加的和善。

从白塔边下来，走的是一长段台阶，原来这台阶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再走很短一段路，就是寨门，寨门口就是景大公路。

搭车回到宾馆，正好是午餐时间，又到休闲广场解决午饭。从鱼缸里捞了一条一斤左右的罗非鱼，红烧以后，装了一大盘，才十五元，真是价廉物美。

饭后，回宾馆的路上，我在农贸市场看到有人在出售新鲜的鸡枞，我用十几块钱就买了一大堆又嫩又新鲜的鸡枞，返身又到休闲广场，将其交给老板娘，给她一点加工费，要求晚上帮我烧成鸡枞汤，至于汤的美味，我想只要在版纳当过知青的，一定是非常了解的。

从上海出来已经有些天了，到版纳后的这些天，一般午后我都在宾馆休息，然后再读书、写字，直到晚餐时间才出门。真是劳逸结合，张驰有度，用时髦话来说，就是符合"可持续发展"。

（4）

昨晚睡得很好，一早醒来，便觉得神清气爽。今天，按计划，我要去八分场。那是我在版纳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尤其是在那大山深处"夹皮沟"里的十二连，更是我心中的青春圣地。尽管，它现在早已不存在了，但是，今天我还是想去旧地走走的。

从八营十二连到总场部，也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大约有七、八公里的路程。当年，我们如果要到总场、总

场医院办事或看病，时常会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从连队徒步走到这里。这一路上的山水、村寨、田野，对我们来说真是太熟悉了，近年来它还时常会和当年的人和事缠绕在一起，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脑海里显现。

因此，我总觉得这一路上的景物，也是我这次旧地重游的重要目标。只要时间和体力允许，沿着旧路重走一遍，也是我心中的夙愿。

从宾馆里出来，在路边随便吃了些早点，看时间还不到7点，我想反正时间还早，先徒步走着再说。于是，我就迈开大步，雄赳赳地出发了。

总场到小街之间相距约1公里多，在我的记忆中，猛龙坝在这一段相对较为开阔。公里两边辽阔的坝子上，傣家人的水稻长得绿油油的；远处是层峦叠嶂、连绵不断的山脉。云雾在山头缠绕变幻，云遮雾障，使巍峨的群山时隐时现，少数民族的村寨在远处的山脚下隐约可见，云雾蒸腾，炊烟袅袅，真是一幅美丽动人的风情画！直到今天，只要一闭上眼，那美丽的画面还能在我脑海里闪现。

今天，我走在这里，两边都已建起了房子，遮住了视线，动人的画面不见了。二分场路口，那棵印象深刻的大榕树，也已荡然无存。那里已经建起一些房屋，我心里不免有些失落。走了好长一段路，两边的房屋才稀稀拉拉的渐渐消失，但公路边不再是水稻田，变成了香蕉园，种上了大片的香蕉，我估计这也是经济效益使然。

快到小街时，公路两边才现一片碧绿的水稻田，视野一下就变得开阔起来，两边逶迤起伏的山峦依然如旧。在阳光的照射下，群山显出一片灿烂的金黄。

小街的老房子部分还在，但显然没有了当年的“繁华”；旁边的粮库还在，似乎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当年的小街可是这里的商业中心，短短的街面上人来人往。尤其是星期天，知青们一拨一拨地赶来，小食馆、邮局、小卖部里挤满了人群，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那时边上的粮库，农场来拉米的拖拉机也是络绎不绝的，记得当年，我也曾经与其他知青一起到这里来拉过米。我们咬着牙，将沉重的米袋扛在稚嫩肩上，两腿颤巍巍地走过跳板，将米袋艰难地搬上拖拉机。

面对今天如此冷落的小街，红楼梦里那句“留下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的话，悄然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不紧不慢地走着，边走边看，不到一个小时，就从东风宾馆到了八分场部，旁边的机务队里传出了人声。机务队边上的那条河流还在，只是成了一条小水沟，河上老公路桥还在，桥边上那几个熟悉的水泥墩仍然还在，只是，感觉上桥面比过去窄了许多。几十年前，我与年轻的知青同伴坐在桥边的水泥墩上，一边看着脚下滚滚流过的河水，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但是，今天滚滚的河水却不知到那里去了！

分场部那个上坡路不见了，站在公路边望进去，原来营部会议室的位置上，建起了二层高的办公楼。门面上赫

然挂着第三作业区的牌子，再也不叫八分场了。我在场地上走了几圈，至少，眼前没有人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来自何方。因为，今天我还要到里面十二连去，时间较紧，于是，我就沿着营部和曼掌寨子之间的那条小路往里走。

如今这条小路也变成水泥路了，走了不多久，就看到那条去工程连的岔路口。在微风的吹拂下，那波光粼粼的鱼塘仍然还在路边，从路口望进去，工程连的房子还在不远处的山脚下，整个场景与几十前的变化不大。再往前走，路边的山坡上，都已变成了成片的橡胶园。

这条路，当年，我们走得太多了，对于它，我们真的是太熟悉了！我们闭上眼睛，都能知道它的走向。

记得当年，有一次晚上，营部放电影，电影散场以后，夜像浸在墨里一般的黑。我伸出手来，真的看不见五指。我们一帮知青就这么凭着感觉，前后紧跟，互相簇拥着爬山涉水、翻山越岭从营部走回了十二连。现在想起来，真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当年真得是这样过来的。

曼蒙寨子边上的那口水井还在，感觉上好像移了位置，原来它是在山脚下的，现在移到了路边。小路绕过曼蒙寨，变成了土路，穿过一片水稻田，就看到了那条曼蒙河了，现在，河上面已建有一座可以过农用车的桥。当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河上可没有桥，我们进出连队都要脱了鞋，挽起裤腿蹚水过河的。有时雨季，连日大雨，河水猛涨，我们就会与外界断了来往。

过了曼蒙河，顺着路走完一段长长的上坡路，透过树丛，扭头便能看见山坳里八营四连的房子，这个连队我也待过两年，我沿着胶林里的小路下山，快到四连时，传出一阵狗吠声，附近几个中年人喝住了狗叫，当他们知道我曾是这里的知青时，都非常友善地请我下去看看。现在这个连队所有的职工，都是我们离开以后才来的，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连队的基本轮廓还在，我拿起相机，朝我曾住过的地方拍了几张照，在周围稍作停留，便返身走回山上那条直通十二连的小路。

1971年初，几十个知青加上二个退伍兵，到这里面深山沟组建十二连时，还没有这条路。那时这里都是原始热带雨林，我们是沿着山沟底下的小溪，踩着滑溜溜石头，背着粮食、铁锅、行李披荆斩棘地走进去的。

山腰上这条能开轮式拖拉机的小路，是以后才推出来的，这条路上，有着我们太多的故事。

雨季的时候，有时道路泥泞，拉米的拖拉机上不了曼蒙河边的那个坡，把米卸在了河边。大雨将临，连里所有的知青，男男女女的，有的拿着口袋，有的拿着裤子当口袋，急匆匆地赶到河边，装了米以后，冒雨快步赶回连队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那个时候，有时我一早独自到营部去开会，走在这条小路上，两边都是原始热带雨林，高高的望天树，从山沟里拔地而起，林中晨雾缥缈，不知名的鸟儿在林中不停地欢叫，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情景，真是充满诗情画意。

我还清楚的记得，连里有一个知青，有一天从外面回来，走在这条路上，不知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个缩成一团的穿山甲，抱回连队成了一顿美餐。

那时，我们年轻，有时晚上睡不着，就会约上二、三个同伴沿着这条路，从连队里走出来一段。那时四周漆黑一片，悄无人迹，远出传来不知名的野兽啼叫声。我们心头的感觉，也会像这漫无边际的黑夜一样，空落落的。

最悲惨的是，这条路上还留下过两个活生生年轻知青的生命，他们是为了排除哑炮而罹难的。

今天，我走在这条路上，那些陈年的故事，一幕幕地在眼前闪现。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尽头，这条山谷也到了尽头，出现了一块三面环山的小坝子。在这三面的山坡脚下，曾经分别建有三栋简陋的草房，就成了十二连的营房。上百个年轻人聚集在这亘古蛮荒、人迹罕至的山谷里，曾给这里带来过勃勃的生机。如今，这块坝子上荒草萋萋，一片荒凉，一阵山风吹过，只有坝子里的荒草在随风摇动。

眼前的这块杂草丛生的土地，我们曾在这里生活起居了好多年。那时，几乎每天早晨都在这里起床、集合、出操、出工；晚上在这里集合、开会、熄灯，人气旺盛。但现在却变成了如此的荒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站在路边，我放开嗓子吼了两声：“出工咯！出工咯！”，只有群山回应。幸好周围空无一人，不然一定会把我当成疯子的。

原路返回，我走进路旁的十一连，看到原来十二连的老同事、老连长夏开党，他现已退休，晚年生活幸福，妻子是我们离开以后来农场的景谷人。他热情地留我吃饭，席间我们谈起农场的当年与今天。

下午，搭送胶的车子返回，回到宾馆已过了下午3点。

（5）

按计划，今天应该离开农场返回景洪了，但我不想走得很仓促，反正，只要中午12点以前退房就行了。

昨天，我从总场部走到八营十二连，一路游逛，边走边看，单程就化了约三个小时。下午，返回宾馆，冲了一个热水澡，稍事休息后，不但没觉得累，反而感到浑身舒坦，晚上，也睡得特别安稳。

今天很早我就醒了，想利用上午时间，再到八分场其他连队去走走。

一大早，景大公路上，客运中巴来回穿梭，频率很高。我乘上其中一辆，很快就到了曼养寨。

曼养寨子的两边，曾经有过八分场的两个连队。一边是最早的八营二连，另一边是后来的八分场九队。这两个

连队，我都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今天，也很想去那里看看。

1970年初，我们从一分场调到八分场，刚开始时，就是为了参与组建新的八营二连。那时，所谓的二连，还是曼养寨子边，那条长满杂草的山谷里一块小小的坝子。那时，我们白天在那里砍坝、烧坝、清理造房子的地基，晚上，就睡在曼养寨子里。几个五十年代来边疆的老退伍兵，加上我们几个上海知青，还有一些刚到的昆明小学生知青。几十个人，分住在寨子里各家傣族老百姓的竹楼里。有时晚上，我们还召集起来在寨子里的忠字室里开连队大会，文革前，那里可是寨子里的和尚庙。

我们就这样住在寨子里，时间大约有三、四个月。无意间，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几乎零距离地观察到了傣家原生态的生活状态。那时，傣家淳朴的民风，就给我留下了非常美丽的印象。时至今日，偶尔想起，还会令我感动不已。在我心头就像一瓶陈年美酒，储存越久，更加醇香浓烈。

这么大的一个寨子，白天，人们外出劳动，从来不锁门，也没有上锁的概念，也没有听说那家丢失东西。

我也从未看到过傣家人大声责骂孩子，更没见过那家打孩子。他们邻里之间也好像从不吵架，也没见过他们的邻里纠纷。

那时，我和另一个上海知青住在靠近公路边的傣楼里，男主人叫岩洋，大概三十几岁，已婚，妻子很漂亮，还有一个十岁出头的女儿；男主人的弟弟叫岩蒙，还没有成家；再加上男主人的父母老波涛和老米涛；一家祖孙三代住在一起。

我们在有火塘的大房间里打了地铺。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我总能在睡眼朦胧中，看到女主人在火塘边为一家人准备一天吃的饭，空气中弥漫着特有而浓郁的糯米饭的香味，跳动的炉火映衬着女主人婀娜的身姿。女主人将蒸熟的糯米饭倒在专用的蔑席上，然后，不停的揉捏、分装。全家人起来后，不久就分头外出忙活，并不见他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早饭。

每到夜晚，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尽管“经考牟米桑经”（傣语：吃饭没有什么菜），却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饭，一家人的生活即忙碌有序，又安然淡定。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家人的生活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和谐与安静。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在生活中很少对话，即使有，也是轻轻的，全家聚在一起吃饭，也是安安静静的，从未见过他们大声地说话，但是，他们之间的配合却非常默契，各忙各的，安然有序。

我站在路边，想找岩洋的家，公路在这里好像有点改道，向路边的几家人打听，也讲不清楚，只好作罢。

原来的八营二连，我还在农场时就已经撤并，现在更是荒草一片。

在曼养寨子的小学校边，沿着一条小路翻过一个小山包，就能看见八分场九队的房子。从山上下来，走进连

队，周围山川依旧，只是山上的胶林更加茂密，远远地望去，一片墨绿，显得郁郁葱葱。

连队的房子应该都是重建的，但整体轮廓并未改变，只是，那个伙房不见了，可能现在农场已经不再需要它了，连队的场地上坐着几个中年妇女，她们也不认识我。我举起相机，对着以前住过的地方拍了几张以后，抬起头往四下里张望一番，便沿着原来出连队的老路走到了公路边，搭上了中巴，很快就回到宾馆，时间还很宽裕，还能在宾馆稍事休整。

退了房，走出宾馆，在公路边乘上到景洪的中巴，我望这车窗外渐渐远去的东风农场，心里默默念道:这留下我青春的地方，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这个就是闻名遐迩的知青纪念碑。

在景大公路边，靠近小街的地方，向二营、11营方向望去的景色，那高高的大山的地方就是原来的水工队，后来的11营。

当年，草房背后的那条小河，今天，仍然在汩汩流淌。

这个画面八分场的知青一定非常熟悉，这是曼猛寨边的水井，沿着上山的那条小路上去就是曼蒙寨子，向右边去就是5连，向左边去就可到4、11、12连。

八分场四队山上的橡胶园。

在八分场部附近，看对面的山脉。那面就是边境。

2009-11-01

更多图片欣赏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19918221_4_1.html

勐龙河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8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旧地重游之二】：

又见墨江

二、

墨江镇地处云南中南部，是哀牢山腹地的一个小县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有好多次曾从它身边走过，有时还会在那里住一晚，当时它的偏僻闭塞和极端穷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大巴沿着高速公路的下匝道，缓缓地驶入墨江休息区。时隔了三十多年，我再一次踏上了墨江的大地。抬头向四周贪婪地张望，极力地想捕捉当年的印象，四周除了连绵不断的大山依旧，很少再能找到当年的痕迹。只见墨江天文台球形的穹顶，在附近的山顶上高高地耸立着，给这绵绵的大山深处带来了强烈的现代化气息。

休息区占地面积很大，显得有些空旷。餐馆、商店的旁边还有不少当地人设摊做着买卖，走近一看，他们出售的商品除了点心、泡面、水果外，还有一些煮熟的鸡蛋和玉米。长长的一溜摊位，其上商品也能算琳琅满目，并且货源充足，再也没有当年物质极端匮乏的痕迹。从中也能看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身上的勤劳和入世精神，只要给他们安定与宽松的环境，要不了多少时间，他们一定能使自己的日子逐渐过得滋润起来。现在看来，过去的穷困，完全是因为长时间的人为折腾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国人一定得长记性，万不可好了伤疤忘了痛。

摊主们说，他们曾是这里的农民。这块休息区，原来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大田，在山区这可是一块不小的坝子。国家搞建设征了地，他们就失去了土地，国家给了他们一定的补偿，至于以后的生计，那就得自行解决了。

我问一个摊位的业主，“拿了多少钱？”“每亩一万多点，”他说，“大约拿到4~5万元钱。”我想，当时这些农民刚拿到这些补偿款时，一定会非常高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的变化，慢慢的这些钱就难以维持正常生活了。

饭馆里正在营业，进去一看，15元一份自助餐，第一感觉，物价真是便宜，但其实是错觉，说是自助餐，实际上就是可以有点自选的盒饭，能选的基本是极普通的蔬菜，而且质量较差。这样的饭菜，即使在今天的上海市场

上，售价决不会超过十元。在垄断经营的前提下，此时这里的物价，要高于大城市。其实，如今这也并不算太离谱。只是现在这里物质丰富，再也看不到当年的穷困，但是当年那憨厚的民风，好像正在逐渐地远去，我心中不免有点失落。

墨江天文台球形的穹顶，在附近的山顶上高高地耸立着，给这绵绵的大山深处带来了强烈的现代化气息。

二、

在版纳逗留了一段时间，从那里返回昆明时，我决定再次在墨江停留，吸引我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浓郁的怀旧情结，还有那现在已被逐渐炒热的北回归园。

中午时分，大巴到了墨江，一下高速公路马上就进了汽车站。我拿着简单的行李下车出站，车站边就有一个不小的旅馆——哈尼大酒店。我匆匆地办好住宿手续，标间80元一天，房间很大，设施很好也较新，这几乎是我在这一路上所住的最好的房间，只是不带早餐。

今天早上，我从宁洱乘车出发，到这里路程并不远，也没有消耗多少体力。在客房里稍作休整，我觉得精力还很充沛，就打算去游北回归园。

出了房间，下楼，我站在宾馆大门口。外面阳光灿烂，酷暑逼人，路上行人稀少，我想找人问路，也没有合适的对象。宾馆的底层开着一家脚摩房，看上去还算正规，里面坐着几个女服务员，我跨步走了进去，她们以为来了生意，热情地起身招呼。这时，我也想到向她们问路是不是合适？但还是忍不住用半生的云南话问了她们。

“磕(去)北回归园匝个走？”她们的热心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从这点磕（去）还是有一节路，嘎，你在门口叫张摩托带你磕啰，才两块钱，”其中一位女服务员热心地说，“叫他带你到小路口，还不消买票，你自己磕，就找不着哟。”这时，我突然感到，纯朴的民风好像还在！

于是，我就在宾馆门口叫了辆摩托，车主顺手塞给我一顶安全帽，我随手就将其扣在头上，乘势跨上摩托车后座，路上行人稀少，头上烈日似火，地下暑气蒸腾，车主将车开的飞快，我不免心里害怕，不停地叫他开得慢点。在一座山脚下的一些民居前，摩托车停了下来，车主指着房屋间一条上山的小路，告诉我从这里上去就是回归园。

沿着陡峭的小路上山，不多远，就看到一垛顺着山势高低起伏的围墙，其低的地方高度还不及我的腰际，墙上留着人们频繁翻越的痕迹，使这里几乎成了一条山间便道，我没有多想，跨过围墙进入园区。上帝知道，我确实不是蓄意为之。

整个北回归园就建在一座山上，园中有一条线从下而上贯穿整个园区，这就是神奇的北回归线——太阳转身的

地方。园里有一些标志性的建筑，还有极富哈尼风格的雕塑，回归线从中穿过，将其连成一串。远处的山头上，还建有器宇轩昂的墨江天文馆。园区占地面积不小，但游人不多，我想即使不卖票，当地人也不会经常来这里游玩。

从园里下来，在附近一家回民开的清真饭馆里吃饭，看厨房里有野生菌类，这当然是我的首选。在等着上菜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当地的男子在用餐，看到他们的餐桌有个菜很特别，我好奇地问他们：“这是什么菜？”“臭菜炒鸡蛋，”他们很认真地告诉我，“很好吃！不知你可吃得惯？”并且一再邀请我尝尝味道，我几次婉言谢绝，他们仍然相邀不止，其中一位竟然到边上拿来一双一次性筷子给我，这样，我就尝了一口，味道很特殊，口味浓重，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从这么一件小事就能看到，山里人的憨厚、纯真、热心，直到今天仍然与所谓的城里人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顿饭，让我领略了当地的真实物价。一份炒野生菌 8 元，一份苦瓜炒鸡蛋才 6 元，饭是免费的。物质的丰富，生活的改善，与三、四十年相比，已是沧海桑田了！

墨江北回归园大门，中间那条线就是神奇的北回归线，沿着楼梯折返而上，就能看见园内一些标志性建筑。

极富哈尼风格的雕塑。

台阶上透明的部分就是回归线，从雕塑中间穿过。北回归线从标志性建筑中间穿过，一直延伸到山头上的墨江天文馆。能看到回归线一直从山下上来。

三、

从回归园回来，我就在宾馆里睡觉，直到晚饭时才醒。饭后，天气逐渐凉爽，我出宾馆大门，沿着宽阔的回归大道，走到太阳广场。广场周边有一些非常现代化的建筑，中央还矗立着有关太阳图腾的雕塑，如今的墨江已把北回归线、太阳转身的地方当着营销自己的品牌，因此，墨江的街头路边都会有类似的装饰。

广场边有一条流过城区的小河，河边上有一条宽阔的人工种植的绿化带，其间还竖着一些雕塑作品，悠闲自在的人们徜徉在红花绿树丛中。绿化带的另一边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路的那边有不少繁华的商店。

太阳下山后，商店内外，门前、路边，人来人往，人气兴旺。这就是墨江所谓的“步行街”。不过它只是徒有虚名，路上不仅有自行车、机动车驶过，有时还会发现，一匹高头大马拉着板车堂而皇之地健步走过,发出音色清脆、节奏明快的声响。

突然，有一长列崭新的摩托车，排着整齐的纵队，一辆接着一辆慢慢地驶过步行街。领头的几辆还打着彩旗，原来是日产摩托在做广告。

这次来云南，发现这里的山区、农村，已经很少有自行车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摩托车。连版纳的傣族上山砍柴，都是借助于摩托，再也看不到肩挑牛拉了。从中你就能看到我国农村摩托车市场有多大。

我一路打探着找到了原来那个唯一的十字路口，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模样。向路人打听，这是不是原来的那个路口？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感觉上路面变窄了许多，询问路人，路面是否改建过，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原来旅馆的位置上，现在开着一家超市，店门口正坐着一位当地的老人。

我向他打听，“这里原来是不是一家旅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后，连声说道：“是，是！”顺着原来旅馆的位置向前走，路两边有些房子明显年代久远，破旧的木质门窗敞开着。房顶上那些饱经风霜的瓦片，尽管已经歪歪扭扭，但仍然顽强地排列着，瓦缝间枯萎的衰草，还在风中摇曳。我抬头看着它们，心想：曾记否？四十年前，有过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从你们身边走过，今天我又前来看你们，你们是否还能认识我？！

四十年前墨江的贫穷，即使在云南当地也是出类拔萃的。当年，这个唯一的十字路口也是不完整的，两条相交的土路形成了这个十字路。

其中一条土路的一边就是这个简陋的旅社，另一边，要走一段路，才有一个停车场，四十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这个旅馆过了一夜以后，第二天一早，就在这里排着队走向停车场，然后再上车出发，继续前行的。

当年，另一条土路的一边有这里唯一的一家两层楼的百货商店，隐约记得，其中除了有一些简陋的农具、本地的茶叶出售外，没有任何其他商品，商场里洋溢的气息，也像当年山民身上的气味。这条路的另一边，当年没有什

么像样的房屋，过往的客车倒是常常在这里停靠。说来还真有点不可思议，当年这里就有类似上海“黄牛”一样的人物，应该还是当地的农民，他们经常在这里从知青手里收购全国粮票，每斤五角钱，当年我们每月工资28元，还可用粮票从他们手上换来上海紧俏的布票。当年这里缺粮，从中可见一斑。

今天，我站在这个有点陌生的路口，在昏黄的街灯下，看着街上过往的行人，心里真切地感受到：岁月易逝，往事不堪回首！

四、

从昆明到版纳，长途大巴沿着元玉、元磨高速一路往南。快到墨江休息区时，高速公路右下方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廊桥，它黑白两色、古色古香，在红土地上格外显眼。我们当年在这条路上走过好多回，却从未见过它，但是，看上去它明显是有些年代的。当时，我就想如果回程时，能在墨江停留的话，我一定得找机会去看看它。

一大早，我睁开双眼，迷迷糊糊地竟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样的感觉真是很奇妙，有点可遇而不可求。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是孤身一人睡在墨江哈尼大酒店一间很大的标房里。空调开了一个整晚，此时房间里非常凉爽，盖着被子，还觉得舒适宜人。

今天，我就打算去看看上次在高速公路上邂逅的古廊桥，感觉上它离这里好像并不远。

走出宾馆大门，迎面就是一阵热浪，与宾馆房间里的温度形成很大的反差，墨江这个地方夏季非常炎热，这次对此更加深了体会。

沿着回归大道向前，走了不多远，在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再走哈尼大道，我沿着大路从高速公路下面穿过，眼前的视野一下变得开阔起来。

路边大片的土地正在平整，这是准备开工的工地。走了不多远，就看到远处有一个黑褐色的亭子，根据其所处的方位，我感觉它就是那个曾经远远得有过一面之交的廊桥了，可能由于视角不同，它的外貌与我上次看到的相去甚远。

向路人打探，路人果然随手指向那个黑褐色小亭子，我快步向前，一座古色古香的廊桥赫然显现在眼前，它位于两条河的交汇处，横跨涟漪河上，桥的两端门楼正面上方分别都写着“涟漪桥”三个金色大字。远看像小亭子的东西，其实是这座桥中间高高耸起的魁阁。

所谓的廊桥，还有一种叫法，就是风雨桥。整个桥面就像风雨长廊，能供过桥的人们避风遮雨。这种样式的古桥，我在浙江和福建交界的山区见到过不少，没想到，在遥远的西南边陲竟然也能见到它的身影。

据说，眼前的这座廊桥始建于清朝初年，曾两次毁于大水，清末光绪年间重修。它曾是以普洱为中心的茶马古道北段上的交通要道，８２年被列为墨江县重点文物，直到最近才被修葺一新。如此看来，它周围被平整一新的土地，也是想借它的效应而开发的。

桥的两端门楼正面上方分别都写着“涟漪桥”三个金色大字。

它黑白两色、古色古香，在红土地上格外显眼。

远看像小亭子的东西，其实是这座桥中间高高耸起的魁阁。

五、

如今，不少地方都不遗余力、想尽办法地要开发旅游，边远、贫困地区尤为迫切。因为有近在眼前的致富榜样以及财富效应摆在那里，所以这也就不足为奇。

现在的墨江也在极力推销它的旅游产品，它卯足了劲、极力吆喝的有两大拳头产品，其一是北回归线，太阳转身的地方，这是下了大本钱的，在城区内建了很壮观的回归园；其次就是双胞胎，不知是什么原因，据说这里的双胞胎特别多，有一年这里曾经举办过盛大的双胞节，邀请了国内外不少双胞胎来此聚会，这当然也是为了创造知名度。

双胞井位于墨江县城西部的河西村，近年来也被炒得火热，我们当知青的时候却从未听说过，当然，当年是“革命加战斗”的年代，即使有也决不会被渲染的。

其实双胞井离县城并不远，从我住的哈尼大酒店步行到那里只要半小时。但是，与回归园相比，那里的基础建设要差很多。

沿着哈尼大道往西，从一个简陋的闹哄哄的茶叶批发市场穿过，再走一段土路，（如果下雨，我估计这段路一

定会很泥泞。）就能看到一片普通的民居，从这片民居中穿过，就有一片开阔地，不远处翠绿色的小山脚下，有两口大井，这就是著名的双胞井了。

附近的这片民居就是河西村，现在也被称作双胞村。

河西村是一个哈尼族碧约人居住的村庄，据说，这里还保留着淳朴的民风和完好的哈尼族文化，更因为有神奇的双胞井而远近闻名。双胞井边有茂密茁壮的双胞树，井水一年四季都充盈清澈，甘洌可口。传说喝了双胞井的水会生双胞胎，更使双胞井名声远播。有求子心切的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口双胞井水。美好的愿望，让神奇的双胞井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双胞井边有茂密茁壮的双胞树，井水一年四季都充盈清澈，甘洌可口。

不远处翠绿色的小山脚下，有两口大井，这就是著名的双胞井了。

六、

云南这个地方有不少回民，现在他们中间有不少在云南各地经商，尤其是开餐馆做小本生意的特别多，这次，我在云南各地行走，就看到不少，如今，墨江镇上就有不少回民经营的小饭馆。

这些年社会快速转型，无容讳言，社会上有一些人，身心浮躁，急功近利。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什么事情都敢做，有的简直到了无所畏惧的地步。因此，如今人行在外，提防的神经还得时常紧绷，不然的话，被坑蒙拐骗的事情，还真得会出现。

回民开的饭馆，相对来说，信誉要好些。这可能由于他们的宗教背景，使他们心中还有敬畏的东西。

今天，我已经买好了午后返回昆明的车票。由于早餐吃得较晚，快到中午，仍然没有食欲，本不想吃午饭，但又顾虑途中会挨饿。

宾馆门口就有几家饭馆，其中还有一家是回民开的，这时没有顾客，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坐在桌边，埋头正在吃着一碗面条，看上去，那碗面条还挺不错。

“老板，给我来一碗像你手上一样的面条吧。”她听了我的招呼，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面碗，走进了厨房。不一会就端出一大碗面条，面条里有绿叶蔬菜和鸡蛋，色香味俱佳。云南多的是米线、米干，像这样的面条到也并

不多见，这样一大碗可口的面条，她居然只收了 4 元钱。

饭馆门口的路边，蹲坐着几个卖水果的小姑娘，面前摆着几个竹篮，篮里放着一些拳头大的芒果，看上去皮色很青，好像没有成熟。

她们这样的销售方式，不禁让我想起，早年我在回家探亲的路上，看到的那些大山里贫穷而纯朴的山民。

“小姑娘，你卖的芒果咯熟了”“熟了么，不信，你剥开瞧瞧嘛。”“信了么，不消了。”我顺便买了些芒果，带到宾馆，剥开一个，小姑娘果然没骗我，芒果真的是熟透了，金黄色的果肉，果汁四溢，真是口味香甜，果味浓郁。与大城市里卖的相比，质量上真是有天壤之别。

【旧地重游之一】：千里走单骑·又见景洪·东风掠影：

http://hxzq.net/Essay/6422.xml?id=6422

勐龙河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83

2011/4/24 15:23:3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旧地重游之三】：

又见思茅

一、

昆明在建地铁，火车站附近的主干道北京路正在开膛破肚。车辆拥挤，交通堵塞，一片灰蒙蒙、乱轰轰的景象，这是变化和发展前的阵痛，前些年上海也是这样。

火车站附近的昆明客运总站已经没了长途班车，发往各地的客车的始发站分别都移到了郊外。往思茅、版纳方向的客车都在昆明南部客运站始发，那里离火车站有二十几公里。

昨天上午，从上海始发的列车准点到达昆明，我轻车熟路地出了站，在铁路大厦开房住下，这里与车站出口处几乎近在咫尺，宾馆附楼的单人间面积很小，好在卫生和安全状况较佳，两年前我曾在这里住过好几天，对这里的状况还算有些了解，在车站复杂的环境里，这里相对比较安静。

车站广场前车流不息，人声喧嚣，放眼望去，有不少身着各式制服的人散落其间，仔细一看，其中大多都是各类协管，不远处的路边还停着蓝白相间的警车，车顶上警灯闪烁。来往的人群里就站着几个兜售发票的，一些违法的、肮脏的交易几乎是在半公开的状态下进行着，只要你好自为之，不去招惹他们，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今天一早，在客运总站里，我乘上71路公交转驳车，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直接到了南部客运站，8点30分，长途客车从这里准时出发驶向滇南。

豪华的“欧洲之星”客车，车身很高，旅客都坐在上层。我的座位在第一排，正好处在驾驶座的上方，三面环窗，视野辽阔，就像一个观景台。自当知青以来，在这条线路走过许多次，尽管那时人生坎坷，但每次还是会被车窗外壮美的景色所感动，能以今天这样的视角来看这一路景色的机会，似乎还不曾有过。

我掏出相机，将其挂在脖子上，打算随时捕捉眼前的美景，天公似乎并不作美，车刚出昆明不久，天上就飘起了雨，雨势渐大，车窗的玻璃上爬满了水珠，让我心头一阵惋惜，但没过多久，雨却渐渐地停了下来，太阳慢慢地从云层中探出了脑袋。阳光下，雨后的群山一片苍翠，正在我眼前奔涌而来，人还未到版纳，就让我感受了版纳的

雨季，算算时间，现在应该正是版纳雨季的尾巴。

下午2点后，客车驶下高速，慢慢地进入了思茅城区，我终于又一次看见曾经非常熟悉现在似乎有点陌生的思茅，它现在已掠人之美改称普洱。

山区的高速也不是笔直的。

又是一场大雨，山脚下江水浑浊。

二、

金孔雀大酒店就在普洱客运站的边上，这应该是这里比较好的宾馆，据说它是浙商的产业。我一下车就在这里登记住宿，几乎没走什么路，倒也十分方便，标间的房内也十分宽敞，只是价格偏高。

在宾馆安置好后，我正想舒展身子休息片刻，忽闻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声响，拉开厚厚的窗帘一看，一场大雨骤然而至，很大的雨点急速地击打在窗下不远处客运站候车处的屋顶上，铝合金制成的金属瓦楞上溅起了晶莹的水花，升腾起一片濛濛的水雾，发出阵阵富有节奏的既雄浑又轻快的声响，抬头看远处，竟然还有灿然的阳光，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没过多久雨停了，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远处的公路上传来隆隆的卡车声。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几十年前这里唯一的那条大道的南端，那时这里应该是一片广袤的稻田。那年月我们回家探亲时，一般都会在思茅停留，常常在这条大道另一端上的边城旅馆住宿，那夜深人静时，从城外的公路上也会传来同样的隆隆车声，我孤身一人躺在旅馆的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真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几十年了！

我住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走出房间，打开走廊上的玻璃门，里面豁然洞开，别有一番天地，中间绿树红花，四周一圈精致的木质小屋，俨然一座别致的屋顶花园。我跨步入内，里面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笑容满面对我说，“这里是会员制，不对外的”。事后我才知道，这里是专门为几十位在此投资的浙商服务的，他们有时晚上会到这里消遣和交流信息，几十个人就独享这样的场所，真是气派不小。

我这次来这里，除了旧地重游以外，还要见一个在此生活的知青老朋友，此前，她一再邀请我：如果再到云南一定要去她那里看看。第二天一早，他们夫妇两人就来宾馆找我，他们用车带着我很快来到梅子湖公园，这里原来叫红旗水库，离城区并不远，我们沿着陡峭的台阶爬上坝顶，看三面青山怀抱，中间一泓碧水，山光水色，景色秀美。水库边有一座山头，称为观景台，我们爬上山头，果然能俯瞰思茅全城，如今的思茅坝子再也见不到广袤的农田，成片的建筑物撑满了整个坝子，朋友的丈夫说一句地道的云南话，“现在整个坝子都给占完逑了！”

我想起了我房间边上的那个会员制场所，想起了那些浙商，据说他们都是做房地产的。其实，我至少也要算大半个浙江人，不仅父母都是浙江藉的，我的出生地也是在浙江省宁波市，在两岁时才随父母到上海。

当年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当知青，如今这些浙商也算爬山涉水到这里做投资，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和作为与当年的我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当年的我们是被动的，现在的他们却是主动的，就凭这一点他们是幸运的。

三面环山的红旗水库。

站在水库大坝上往下看。

三、

从红旗水库下来，我们走进了思茅城区，如今的思茅早已街道纵横，车流滚滚，与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状况基

本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方特色。

那条从北向南的大街还在，只是街道两边的房子基本都是重建的，有不少都成了很现代化的商店。街边有极少的老房子还在，我看见它们就像见了几十年前的老熟人，心情难以平静，那些早已流逝的陈年往事渐渐地呈现在眼前。

当年的思茅城区仅有这条长长的街道，它几乎囊括整个城区，把思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集中在这里。

当年，我们到思茅的机会并不多，每隔两年，我们一般都会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在往返的路途中，前后有两次会在这里停留。每当我们在版纳原始丛林里熬过那两年艰辛的日子，终于盼到了探亲假，途中来到这里，踏上这条长长的街道，在昏暗的街灯下散步，就会从它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久违的城市气息。

现在，我又走在这条街上，尽管它现在的繁华是它的过去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当年的那种感受却已杳无踪影了。

当年，这条街上几乎集中了这里的各类商店、旅社，记得还有邮局、车站、电影院和医院，一家挨着一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两家旅馆，江城旅馆和边城旅馆。它们都座落在大街的北端，分别处在街道的两边，我们每次路过这里，总要到这里来住宿，尤其是边城旅馆。

这里的车站留下了我少年时孤苦无援的忧伤，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独自回家探亲时，在这里的售票窗口前，忍受着饥寒，排了一个通宵的队，仍然一无所获，那种欲哭无泪的感受，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记得街上还有一家不小的电影院，它好像还有另一个称呼叫“红旗会堂”。我们途经思茅时，晚上一般总会到这里来看电影，那些内容乏味的影片成了我们路途上难得的消遣。

这里还有一条不起眼的老街，它即狭窄又弯曲，两边都是破旧的老房子，老街上还有一家饭馆，过了饭店再往前，老街便弯弯曲曲地逐渐消失在民居之间了。

今天，我走在这条大街上，过去的场景大多已经杳无踪迹，有些却还依稀可辨，只有“红旗会堂”还完整地保留着，只是时代的变化，它的社会功能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今天，它同样也散发着浓浓的商业味。

原先，我认为那条老街一定早已灰飞烟灭，没有想到，在朋友的引领下，穿过小巷，发现它有一部分至今仍然还蜷缩在思茅城区的一隅。

老街的老房子是那么的眼熟。“似曾相识燕归来”！

原来的思茅旅社，这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激发我的记忆，我想起来了！

四、

街边的绿地里有人在晨练，他们神情专注，目不斜视，非常投入；绿茵茵的草地上，有孩子在蹒跚学步；路旁

的小树上有人拉起了绳子，绳上挂满了鸟笼，笼内的鸟儿正在欢快动人地歌唱；有人带来的斗鸡在绿草如茵的地上器宇轩昂地迈着方步；两两三三的老年人坐在大树下的石凳上，摆开茶具，悠闲地喝着茶，晨光里，边城思茅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我们漫步在思茅街头，看路上行人步履悠悠，这里人们的生活节奏比大城市明显要慢了些。知青们熟悉的那条大街如今叫振兴大道，似乎仍然是这里的商业中心，好像还向南延伸了一些，街道两边商铺林立，鳞次栉比，店铺里的商品种类繁多、货源充足，店家里还时时传出各种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吆喝声，当年那种物质匮乏的窘境早已不复存在。

街上的路人身上衣着与国内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差异，偶尔，会看到一些妇女身上有少数民族的配饰，你才会想起这里是云南边地，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思茅老街附近有个很大的菜市场，这里也叫农贸市场，它占地不小，规模很大，里面人声鼎沸，市声喧嚣，各种农副产品琳琅满目，简直可以说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我想起了几十年前，我们在回家探亲的路上，客车停在这一带公路边的小饭馆前。有时会有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悄无声息地蹲在路边，面前摆着几个竹篮，里面放着些已经有点干瘪的不很新鲜的水果，有时篮里还会有一些用稻草捆住的鸡蛋。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如果你不去问，他们是不会开口叫卖的，我们从他们面前走过时，他们只会用有所期盼的眼神望着我们，这时还能看到，他们黝黑的脸膛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

现在市场里那些起劲吆喝着的摊主，我想其中一定会有当年那些农民的后代。

我们在市场里悠闲地穿行，我对一个摊位上正在出售着的，一大块一大块成饼状的蜂蛹感到好奇，朋友发现后，立刻执意买了些，打算用它来招待我。在农场时，我就知道这东西能吃，却从未真正地吃过。

朋友夫妇俩都已退休，谈不上富裕，但衣食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在思茅城里有房，房子还不小，有好几个房间，这次，他们几次邀我住到他们家里去，我不愿给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还是住在宾馆里潇洒些。

他们不仅城里有房，在城外的山上还租有一片山地，在那里盖了房子，种了一些蔬菜、茶叶、咖啡，还养了不少猪和鸡。儿子和媳妇经营着这一切，他们也时常在那里帮忙。

那天，他们带我去了山上，主人杀鸡待客，那可是正宗的散养鸡哦，现在城市里很难见到的。面对一桌丰盛的菜肴，加上主人那难以推却的盛情，我真想尽量多吃点，可惜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胃口，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在农场时能有这样吃的，那就好了。”我的一句戏言，引来一阵笑声，过后却一阵沉默，突然，朋友嘣出一句话：“那个该死的农场整得我们好苦！”

街边的古树。

古木参天。

五、

思茅城里有不少城市雕塑，尤其是振兴大道上。所有的城雕不管是写实的还是抽象的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

那就是：茶和茶马古道。

这些年，我走了一些国内的大小城市。尤其是近年来，无论南北，所有的大小城市都在想方设法地企图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它们竭尽全力、各尽所能、扬长避短，打造着自己的品牌，其中真实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振兴经济。这是无可厚非的，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个好事，比起以前整天搞“阶级斗争”要好的去了。不过任何事情都会有个度，过分了就会：过犹不及。

路边的土坡长着几棵参天的古树，土坡上垒着几块山石，一组雕塑散落其间，一队驮茶的马帮正在古道上歇息，神态逼真，栩栩如生。

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器宇轩昂地站在思茅大街的中央，他右手执扇，左手居然举着几片茶叶，诸葛亮这样的形象，我真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或许是我孤陋寡闻。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历史上诸葛亮应该来过这一带，推想起来，在征战途中，他与将士们应该也喝过不少这里的茶，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让他手拿茶叶在思茅大街上亮相，似乎有些牵强。

君不见，近年来，只要是名人，不管他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不少地方总是拼命地套近乎，尽力地往自己身上拉，有的还争得不亦乐乎，其中隐藏着的一定是浮躁的心态。

思茅周边盛产茶叶，附近还有一望无际的万亩茶园，它茶香四溢应该是不争得事实,称它为茶城实不为过。

前几年，社会上的热钱把普洱茶的价格炒上了天，不过近来，它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地上。在普洱茶价格坐上过山车的过程中，真正获利的不会是普通的茶农，他们或许还会由此受到伤害。

思茅，我们很年轻时就来过你的身旁，因此，我们盼望你更加繁荣，让如今你身边的人们生活更加幸福滋润。

思茅大街上诸葛亮的雕像。

马帮的塑像。

马帮的塑像，栩栩如生。

2011-11-29

更多相关图片欣赏请移步作者博客：

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dfd8d01011xtp.html

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dfd8d01011xtp.html

勐龙河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83

2011/8/28 11:33:56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旧地重游之四】：

边陲小城勐海

云南西双版纳州下辖三个县，它们分别是：景洪、勐腊、勐海。勐海镇是勐海县的县城。

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勐海，那还是在四十多年前。

那时，我们刚被上山下乡，千里迢迢来到版纳。当时这里还未被充分开发，闭塞、蛮荒、神秘的氛围笼罩着整个版纳，空气中洋溢着只有这里才有的特殊气息。山坡上到处是莽莽的原始热带雨林，坝子上水网密布，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傣家村寨在浓荫的遮蔽下星罗棋布般地散落在坝子里。

我们下乡的地方在景洪南部的大勐龙地区。当时，连接景洪和大勐龙的是一条狭窄的盘山公路，那时，我们偶尔还是有机会，乘着拖拉机在这条乡间公路上来回奔波。

记得那年，刚到农场不久，我经分场医院批准到景洪的西双版纳洲医院补牙。其实真正用来补牙的时间大约只有十多分钟，加上来回的车程，我却用了好几天的时间。那时，景洪与大勐龙之间是没有班车的，往来其间，我们只能搭便车，这就需要有等待的耐心。

那次从景洪返回的时候，我搭上了农场的拖拉机，那是辆丰收55型的轮式拖拉机，为了装货和载人的需要，后面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车兜。

拖拉机离开景洪城区，沿着那条乡间公路向西出发，一条奔流的大河在公路的左手边，与公路平行着，那就是流沙河，在拖拉机上，我们能看到河床里滚滚流动着的河水。

我们在车兜里席地而坐，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车兜上下左右剧烈的晃动着，发出“控隆、控隆……”声响，我们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车兜栏板，身体还是随着车子震动的频率不停地共震着，一会儿弹起来，一会儿重重地跌坐在车板上。路面上扬起一阵滚滚的黄尘，没多久，我们个个都灰头土脸，鼻孔上、嘴唇边还出现了一圈棕黄色的土垢。

前面出现了岔路，我们的拖拉机转了个90度的弯，拐上了岔道，朝流沙河大桥驶去。“朝那边直直去，就是勐海了”，我身边一个农场老职工指着逐渐远去的另一个岔路口说。隔着拖拉机后飞扬着的滚滚尘土，我回头望着那个逐渐钻进了浓密树荫里的路口，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勐海。

刚到农场时，我在红卫六队接受“再教育”，有一次，跟着一个副队长到曼甩后面的大山里去办事，进入山地后，山高林深，云雾缭绕，秀丽壮观的景色，让我兴趣盎然。那次，我们几乎爬了一整天的山，那时年青，体力尚可，尽管很累，我仍然咬紧牙关跟着队长不断地上山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渐渐地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放腿抬腿，云遮雾障的群峰仍然在眼前无穷无尽地排列着，我从心底不由得生出对大山的敬畏，不知大山的那边是怎样的仙境，这时队长却随口说了一句，“翻过这些大山，那面就是勐海了”。

有一年，我们参加会战，在水工队里挖那条引水沟，那里山高沟深，人迹罕至，劳动的时候，我们也听老职工说起过，翻过这些大山，前面就是勐海。

在版纳当了十年知青，真正到勐海却仅有一次。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八营十二连。当时连队物质非常匮乏，除了粮食以外，基本没有任何副食品。那年八一前夕，当时那也算我们的节日，营里组织部分连队司务长去勐海拉菜，所谓的菜也只是乳腐之类的咸菜，当时，我正好在营部，就自作主张地跟着我连的司务长去了勐海。

同样的丰收55拖拉机，载着我们在这条土路上颠簸，过了流沙河大桥以后，转头向西，又走了大约二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勐海。

几十年前，曾经与我有过一面之交的勐海，今天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已是十分模糊了，我只记得那里有狭窄的街道、古朴而陈旧的屋舍，街上有不少穿着黑色的衣服，背着背篓的山民，连空气中也洋溢着浓浓的山民气息。那天，我们的拖拉机装了东西，很快就离开了。回去的路上还挨了雨淋，回到连队的当晚，我就发了高烧。那年，我躺在床上，抱病过八一的情景，我倒记得十分清楚。

这次到云南，我在景洪又待了好几天，退休了，有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心情更加放松。有一天，我在景洪的大街非常悠闲地散步，无意间发现街上有不少开往勐海的班车，频率好像还不低，这让我又想起了勐海，于是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到那里去走走。

如今景洪到勐海的路况良好，路面平整宽阔，汽车疾驶而过，车后再也不见当年那种飞扬着的漫天尘土，只是记忆中的那条流沙河好像很少露脸，偶尔看到也没有当年那种激流滚滚的气势了。

车过嘎洒，两边就出现了高高的大山，公路穿隧过桥较为险要，过了山地后，路两边逐渐出现了坪坝，一路向

前，坝子逐渐开阔，快到勐海时，眼前就是一片非常辽阔的坝子了。

同样是西双版纳，这边的情景与我们农场那边还是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别，这里的山势好像相对较为高耸险峻；这里的环境保护、原始风貌的保留比勐龙那面做得好，山上还是有些没有被破坏的原始植被；这里的山上也有橡胶树，但数量和规模明显不能与我们那边相比；这里的优势明显是茶叶。普洱茶源的标牌在路边一晃而过，使人想起这里是普洱茶的重要源头，路两边、山坡上出现了成片的茶园，南糯山庄也在公路边闪过，这个招牌非常眼熟，在上海的茶庄里，也时常能看见。

如今勐海的街上，很难再见到那些背着沉重背篓的山民，街上的人们衣着大部分与内地差别不大，偶尔还是能看到身着民族服装的人从街上走过，这里毕竟地处边远。

街上店铺林立，那些食品店、烟杂点，一看便知是个人承包的，有些经营者也不是本地人。镇上有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各种素菜、水果、肉类琳琅满目，还有内地很难一见的山珍和野菜。看着眼前这些热闹的场景，我忽然感到：几十年前，我们乘着拖拉机，在泥泞不堪的公路上颠簸了一天，到这里来拉咸菜的情景仿佛还未走远。

路边有个衣着整洁的年轻女子在出售芭蕉，身边站着一个可爱的孩子，身后停着一辆崭新的轻型摩托。我对那些芭蕉产生了兴趣，它们明显是出自寨前、路边的绿色产品，那女子急于要把并不太多的芭蕉以较低的价格全部卖给我，言谈之间，知道她并不是专程来卖这些芭蕉的，只是带孩子到城里来玩，顺便带一些自家产的芭蕉来出售，令我吃惊的是：她竟然还是山上的傻尼族。她的衣着、肤色、言谈、举止已经完全汉化，与云南当地的汉族没有区别，只有她那高而挺直的鼻梁，似乎还有些傻尼族的痕迹。

“家住哪里？”我有些好奇的问。她随手指着路口说：“从那里去，有十多公里。”我想起当年那些穿着短裙，露出半个屁股，用肩膀和前额承载沉重的背篓，在大山里艰难跋涉的傻尼族，眼前的这个年轻的女子竟然是他们的后代。没有想到：短短的几十年，一个民族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在勐海大街上没有目的的乱走，发现街上有一些山地经营权招租的广告，只要肯出钱，几十、上百亩山地几十年的经营权就可以轻易到手。

“土地的所有权是国家的”所有主流渠道的声音都这么说。它的使用权属于谁？这可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这里这些山地的招租方是谁？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出租所产生的租金装在那家的钱袋里，有没有人可以分得一杯羹，那可是正宗的国有资产奥。这可能是我的杞人忧天，但愿如此。

2011-12-25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终于来到了村口。大青山的脚下。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向西100多里有个叫作毕克齐的小镇，从毕克齐再向南30多里有个偏远的村庄叫做南什轴。那是我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因为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我无法与村里的任何人打招呼，在2010年的9月2日我只能不期而至。如今从毕克齐下了长途汽车，除了黑车，这30里路就没有交通工具了。长途车到这里12块，接着上黑车要50块钱。年青的时候走这条路，大多都是步行，偶尔也搭车，马拉的大车，现在那种大车已经绝迹了。如果不是为了赶时间，还真想走回去。

这是我进村看到的第一块告示牌。后来和老乡在一起的话题多是忆起当年我们下乡时候的苦，现在农村的生活今非昔比，农民不但没有了毛时代繁重的赋税，种田政府还有奖励。这些天村里人都在填表，不久，和我年龄相当的这茬儿人，政府都会发给每月300元的养老退休金。因为村里的粮食、蔬菜、肉、蛋、奶、甚至油（胡麻油）和水果（西瓜、圣女果等）都是自产的，自给自足，所以他们说300元足够了。农村的合作医疗保险，这里也都有了。感谢胡锦涛，感谢温家宝，这样的话被他们挂嘴上。

不知村里人的具体情况，陆续听说过有人（赵计元的儿子赵在在）过世了，有人（来好、月明）随儿女迁到了城镇。我想先找到王明明再说，明明这几十年从村里的小学校老师做到校长，只要学校在，我想她就不会离开。进村时间已经是晌午了，不远处有个人从东村骑车过来，村口的一个小姑娘对我说：“那不是个明明？！”我大喊大叫迎了上去。

晌午的村庄，寂静的村庄。我的喊叫声惊动了路边开小卖部的计换，计换竟然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他艰难地从他的小卖部一点一点挪出来，原来，他患股骨头坏死，几乎残疾，已经多年不能干农活了。计换说他听到了我的声音，听到40年前、至少也是39年前的声音。是啊，我们1968年到这里插队，我是1971年离开这个村庄的。计换说：“小眼儿，你可多肉了！”就是“胖了”的意思。哈哈真不好意思，减肥总是不见成效。

接着就去明明家吃午饭。明明和她的老公赵英在有一儿一女，儿女都已成家并有了儿女，儿孙目前都在呼市，

留下王明明和赵英在老两口守着个偌大的院子。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奶牛。村里家家户户都养了奶牛，每天都有奶站的人带着挤奶的工具来收购牛奶，一公斤奶的收购价是两块五。这就是蒙牛和伊利牛奶的基地。

王明明家院里的猪、羊和鸡都对我的到来无所谓，只是这条黑狗不欢迎我，不停地叫，明明只好走过去告诉它，家里来了“惬人”（客人），不要叫。

说到王明明，其实很值得多写几笔。她是这个村庄的金凤凰，没有飞出去的金凤凰。一点都不夸张。1982年王明明从民办小学教师转正，成为公办小学教师。她一直是教育系统的劳模，从县级劳模到市级劳模，到省级劳模，最后当到了全国劳模。那年内蒙教育系统只有两个全国劳模。王明明说她的证书还是什么上写着，全国劳模享受省部级待遇。……生于1953年的特级教师王明明，去年拿100%的全薪退了休，加上劳模的特殊贡献津贴，王明明现在每月的退休金将近4000元。由于农村的年轻人都拖家带口去了城镇打工，小学校的生源锐减，村小学已经合并到乡里了，不存在了。村里目前只有一个学前班，其实就是幼儿园，明明退休后就在村里教学前班。

还值得一提的就是王明明的父亲王甲山。王甲山是国民党军队的高官，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跟随傅作义起义改变了王甲山后半生的命运，他一落千丈。先是从北京国家的水利部落到内蒙古水利厅，接着从内蒙古水利厅落到呼市水利局，最后从呼市水利局落到土默特左旗的永顺渠。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女都变成了农村户口落户在我插队的这个南什轴村。文革时，除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这顶大帽子他又被戴上了“内人党”的帽子，斗了又斗。最终，永顺渠主任王甲山的尸骨埋在了土默川，他临终的遗言要儿女们永远“不要伺候社会”，意思大概就是当光杆农民就行了。他生前把自己的三个女儿，秋生、明明和宝兰都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小儿子喜根，是在他去世后，由谭震林写了条子给他平反才在内蒙的水利系统安排了工作。傅作义起义，傅作义自己倒是高官厚禄，可把跟着他起义的老部下都害惨了。

当年的在村里相熟的一些好友，闻讯都到明明家的院里来了，我们10个来自北京的女知青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听，谁谁在哪里，谁谁怎么样？

后排（站立者）左起：明明的老公赵英在；那时总带着我劳动的韩英在；我；当年歌咏队的主力赵宝宝。前排（坐者）左起：宓泉；生生；韩板脸；计换。我们进村时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壮年是农业劳动的主力，当年村里有大五虎、小五虎的说法，二十出头的宓泉、生生、计换都在大五虎之列，不到二十岁的赵英在、赵在在和来好属于小五虎。他们说40年后的今天，村里农业劳动的主力仍旧是他们这帮五六十岁的老头。年青人，也就是他们的孩子都不愿意干农活，进城打工或者做别的营生去了。我问他们还能干得动吗？他们说，现在机械化的程度高了，一家二十多亩地不费什么事，收获时忙不过就雇人。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下子就聊到四点多钟，还要到毕克齐去赶长途汽车，计换派他的儿子用小车送我。明明的老公赵英在不愧是当了十八年的村长，他提醒我去小卖部那儿和其他人打一下招呼，因为没有时间一家一家串门了。这样我们一行人就从明明家来到了村里人经常聚集的小卖部前。当年熟悉的姑娘们都早已嫁出去了，只有二妙嫁在本村，只是她瘦得我都不敢认了。

那拿着拐棍的坐那的赵全全当年是一个精干瘦小的车把式，现在胖了。他问我：“小眼儿，你今年多大了？”

坐在赵全全旁边的瘦子问：“小眼儿，你看额（我）是个谁啦？”我脱口而出：“你是称心，你大（爸）是张存高。”当年村里来了军宣队，带着我们知青在村里开大会斗他爸，他还记得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女知青在斗争会上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

好几个人要我说出那个穿迷彩背心的是谁，我毫不迟疑地说：“挨计！”我记得这个年青、温和的贫协主席。

最让我心酸的是左边蹲着的侧脸的这个人。他叫福仁。他已经痴呆几年，我事先并不知道，走到他的跟前叫他：“福仁！福仁！”他呆呆看着我，这时周围的人说他脑子已经不“机密”(清楚)好几年了，不认得人，可他死死盯着我看了许久，突然说：“小眼儿？小眼儿！”接着两行清泪流了下来，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可惜这个场景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当年福仁家特别穷，因为穷而娶不起媳妇，他和村里别人的媳妇有了一个私生子，所以他家里就是一个病弱的老母亲、他，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这样三代三口人。访贫问苦，我经常跟着中陆去他家帮着干活。

回到呼市，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从来不失眠的我，失眠了。看看这第二天上午满脸的憔悴！其实过去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村庄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祖籍湖南，生于上海，长于北京，这个小村庄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小站，经过而已。但是在这个失眠的夜晚，我却突然意识到，虽然我是被迫来到了这个穷困而又偏远的村庄，虽然离开时我是那样急不可耐，虽然今后我也不大可能再来这里，但是，这个小村庄却是我人生精神的皈依处，我的精神的生命从这里开始，最后要还回到这里结束。这一切，正是那个痴呆了的福仁，他清澈的眼中流出的泪水告诉我的。

2010-09-05

田小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送给草原的祝福

内蒙广播电台六十周年大庆，采访一些北京知青，郝近大拉上我和金尧一同接受采访，听到道日娜、奥茹娜两位美女记者的蒙话倍感亲切。听是一回事，可真要一一用蒙话回答，就有些力不从心。看病的术语或跟牧民们拉个家长里短没问题，用蒙话说些大道理，尤其是些政治术语实在勉为其难——这样冠冕堂皇的汉话我都说不利落。

郝近大在草原生活的年头不算长，对牧民们却是一往情深，记者听说插队时他曾追求过牧民家的漂亮姑娘，顿时来了兴趣，穷追不舍。时过境迁，刚刚升格为爷爷的老兄含糊其辞，也没好意思多说。金尧写他蒙古哥哥的文章见了北京晚报，我也不只一次听他讲放马时哥哥嫂嫂照顾他的故事，可当着记者说起这些陈年往事，他的眼圈又红了。

北京有草原恋合唱团，牧马人合唱团，草原恋还建有专门的网站，上面那么多知青对草原深深的眷恋，对牧民的关怀，时刻感动着我。

马悲鸣不知是何方神圣，经常收到他的《周末文刊》邮件，他说，我在国内的博客文章，总被删，非常扫兴，海外最大的几个政论网站永久封了我的名。真是怪哉，言论不自由咱领教过，海外号称言论自由也封杀马悲鸣为哪般。我仔细拜读过马先生的文章，文采不错，要说问题好像这个人太实在——没办法，一看就是老牧民出身。政论文章不说，看了他写的草原风情系列让我不禁拍案叫绝，一看就是个在乌珠穆沁插过队的草原通。他人在天南地北，想必脱离草原也十分久远了，可在他笔下，草原上的风土人情，马牛羊骆驼狼，娓娓道来栩栩如生，让我一次次又回到了马踏青草的日子。

远离了曾经荒蛮落后的草原，我们却不约而同一往情深地怀念起那片土地，毋庸置言，谁也不想回到那个荒谬的年代，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过那样的日子。当年受了那么多罪（也不乏有人说没受罪，无怨无悔），一个个争先恐后逃之夭夭的知青们现在怎么了？其实最经典的答案还是马晓力的那句话：我不认为插队是什么好事，但在草原插队却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在草原生活过多年，受的罪自然比常人多，也许我能活着回北京就是一个奇迹。想想长眠在那里的许许多多年轻人，想想被荒废了青春的整整一代人，难道不该诅咒那个时代那个人吗？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草原上恶劣的环境，严寒和暴风雪，传染病，一年难吃上几次水果蔬菜，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夜晚点煤油灯，唯一的娱乐就是听半导体收音机。

在刮着白毛风走场的路上，我路过牧民敖气尔的家，深夜，额日登花额吉为我补皮得勒（皮蒙古袍），她先要把破损的没毛的烂皮子剪去，她剪着剪着发现，我的皮得勒前身竟需要剪去一大半。她没有犹豫，将自家整张的绵羊皮缝到上面，尽管皮得勒是黄色的，补丁是白色的，丑陋无比，我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又将就过了一冬。

在光棍老杨头的小土屋里，在冒烟咕咚的柴油灯下，整夜整夜地打扑克混日子，油烟把我的鼻子眼睛熏的黝黑，活像个小鬼，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难怪没有姑娘肯嫁给你。牌友、街坊、外来的蒙族人霍瘸子却夸奖我有诸葛亮的智慧。保管道克涛是草原上少有的文化人，有极高的威望，他人前人后夸奖我的医术高明，说我能把死人治活了。在插队的漫漫十一年中，我所有的幻想，所有的希望，都随着岁月付之东流，然而他们，草原上的人们，无论贫下牧民还是牧主富牧上层喇嘛，给我的鼓舞，使我燃起了生活的勇气——我原来不是废物。

90年回京前后听说不少知青已经开始回草原省亲了，这世道变化的忒快，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却因种种理由不愿意重返那条路——回家的路，回草原的路，它承载了我太多的痛苦。那些年，每一次回京探亲，都远不如今天的农民工，找不到进城的车，买不到汽车票，在人山人海拥挤的火车上要站一路，回去时归心似箭，回来时泪眼汪汪，告别年迈的父母，又一次远离幼小的孩子，每每让我们伤心欲绝。69年冬天我返回草原九死一生，冻得满脸都是伤疤，1982年秋天回家，儿子三岁，女儿五岁，妻子和孩子都是第一次看北京。十月底，归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雪，一双儿女险些冻死在半道，至今想起来后怕。

好友原上草J新发了篇图文并茂的文章，照片是网友“逍遥易南”今冬去锡盟草原拍的实景，其中一张照片与我住过的土房十分相似，1977年锡盟特大雪灾时我就住在这样的小土屋里，只不过那雪比今年要大的多，全靠飞机空投粮食。

消遥易南摄影

住在这样一间被大雪掩埋了的小土屋里，你还有什么心情奢谈吃肉好还是吃素好；吃绿豆好还是吃茄子好；民主好还是专制好。

我就是从那间土屋里走出来的，就是从漫天的大雪里滚爬出来的，如今却没有勇气再走草原路。今生也不会再有机会没白没夜地抢救危重病人、为婴儿剪断脐带，我知道，我的牧民朋友们，我的恩人们，我欠你们一个情，滴水之恩本应涌泉相报。我知道，治病不如防病，何况农村牧区缺医少药，得了大病动辄几万、几十万，许多人掏不起。

早就想为农牧民们做些什么，曾经设想联系几个知青，在报纸上设个专栏，发表些健康保健、投资理财、饲养牛羊、预防天灾，或者写些当年在草原的往事，与牧民农民的友谊等各方面的文章，知青里各行各业的专家有的是，咱心里有底。托付朋友联系过某报纸，想在上面发表些类似的文章，主任编辑直言不讳，问你能给多少赞助费？以前听说过稿费，现在才知道发表作品要版面费。领教了，媒体，党的喉舌们。

我对内蒙广播电台的记者说，想写些对牧民们有好处的养生方面的文章，不知可否有兴趣，后来她们回信说领导认为想法挺好，先要看看文章，但不能给稿费。我一连写了几篇传去，当然对什么稿费不稿费不屑一顾。我知道，几十年过去了，草原上寒冷如故，依旧很难吃上水果蔬菜，依旧缺医少药，山区、沙漠地区、偏僻地区，尤其是农区贫穷依旧。草原上通火车了，有高速路了，有大煤矿大发电厂了，财源滚滚，据说内蒙的GDP可以跟广东一比高下了，只不过千疮百孔的草原成了替罪羊。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牧民从中受益多少我不知道，环顾左右，找找我们认识的牧民老乡，健在的有多少？可以断定农牧民的寿命与城市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贫穷易生病，富裕了还有现代文明病，西乌知青兽医专家刘警政不久前驾鹤西去，东乌知青大才子邢奇又突然

离去，我们这群“有知识的青年人”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健康保健是个永远的话题。城市里什么养生堂、健康大讲堂、食全食美，中医西医，不乏江湖骗子，大行其道，农村牧区受巫婆神汉的骗也不少，老百姓需要的是最基本的健康卫生知识。

写作是什么？写作就是用生命码起一个个方块字。如果我的文章能给农牧民们带来些许好处，就是最大的成功。为此消耗一部分生命，我愿意。

我已写好的文章有：

1、不吃或少吃什么

2、吃什么

3、计划免疫最重要

4、怎样预防传染病

5、怎样预防和治疗绦虫、蛔虫病

6、怎样预防和治疗小儿佝偻病（小儿软骨病）

7、中老年人怎样补钙

8、怎样预防和治疗结核病

9、不抽烟，少喝酒，百岁不是梦

10、延年益寿的秘方

11、怎样预防和治疗高血压

12、孩子发烧了怎么办

内蒙广播电台初步答应春节后，每周五下午4点10分到5点的《服务直播间》节目里用蒙语播出。如有兴趣可在网上收看，查找顺序：http://www.nmrb.cn/找闪烁的“点播”，再点“蒙古语广播”，找《服务直播间》，按日期点着听就可以了。

衷心希望网友们能告诉我，牧民们有哪些需求，有哪些反映最好，时间长了，一怕黔驴技穷，二怕文不对题，人家蔬菜还吃不上，你偏要人家吃海参。我的电子邮箱：lm.1968.8.13@163.com但愿拙文能抛砖引玉，真诚希望各位专家、网友或通过我，或直接给电台投稿。我会尽量简单扼要通俗易懂地写好每一篇文章，欢迎朋友们多提宝贵

意见。无论如何这是我的一片心意，是兔年里送给草原人民的祝福。

给各位网友及草原人民拜年！祝牲畜好，身体好，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平安，万事如意！

2011-01-2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活过

（一）金宝屯纪行

2007年9月15日凌晨2点半钟，沈阳火车站候车室，这是我金宝屯之行的最后一次换乘。

挂在候车室半空中的电视机播放着阿杜略带忧伤的歌：“一条路有多少分岔口，走呀走就不能再回头。痛哭过因为执着，依依不舍那又如何.....”从1974年回江南，我还是第一次重返农场，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当年一起下乡到农场的朋友说，农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农场，当年的人也大多数已经走的走、调的调，有几位甚至已经不在人世，回去看什么？是啊，回去看什么呢？可是我还是执着的想回去看看。我就想去看一眼，看看那个地方，那块我们多少浙江知青为之付出青春岁月的土地。那心情大概有点像牛虻想看他的神父，就为了了却那种深深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连着心、连着肉的怀念。这么多年了，一生都快过去了，我怎么就无法忘记？看一眼，只要让我看一眼，我就走，从此我再也不想了。我一直这样想。

凌晨3点多钟，开车了。城市还在沉睡中，晨风裹挟着东北平原上秋日的寒意从车窗冲进来。对面的小姑娘很快倒在座椅上睡着了，发出了均匀的软软的鼾声。邻座壮实的东北大嫂，脱掉了鞋子，亮出了她的胖脚丫，从随身的塑料袋里捧出了大红枣和苞米花热情地让我吃。枣子很红，苞米花很香，可是我却没有一点食欲，轻轻谢绝了大嫂的好意，只顾沉浸在自己的往事中：

1969年6月5日早晨，家乡余姚出发时那一声撕心裂肺的火车长鸣、站台上滂沱大雨中动地的哭声，悬挂在车窗外的小妹脸上的泪水和雨水；几天后，也是这样迷惘的夜，也是这样使人有几分恐惧的黑暗，也是这样让人几分陌生几分激奋的东北平原上初夏的风；金宝屯火车站站台上昏暗的灯光、农场来接我们的拖拉机的嘈杂的轰鸣、辽河边上几十里隐约稀少的灯火.....。

多么漫长的岁月，多么短促的人生时光，似乎都浓缩了，象电影蒙太奇，在眼前徐徐重现。三十八年了，东北

平原的蓝天白云、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辽河边上彻骨的寒冷和满天的沙尘，成了我岁岁年年的梦幻。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这么想着，时间过得很快，车窗外晨曦慢慢降临了东北原野。以前沿途的土房几乎已经绝迹，红瓦砖房掩映在绿树林中，倒有几分象江南景色。铁道边的沥青马路取代了早年的土路，路边居然还有花团锦簇。过了四平站，早上7点多钟，火车已经停靠在平齐线上的郑家屯站。金宝屯是东北平（四平）齐（齐齐哈尔）线上的一个小站，出发前我查了时刻表，从沈阳开出的车下午才有到金宝屯站停靠的。在沈阳，我曾与打听来的几个农场老人和至今还在农场的知青打电话，可是却半天也没有联系上一位，我只好做好无处投奔的思想准备。为避免交通和住宿出现无法预料的问题，就必须在上午到达农场。郑家屯是金宝屯的后一站，按现在的一般交通情况估计，到金宝屯应该是方便的，所以我就买了到郑家屯的票。

将近仲秋的天气好极了，郑家屯沉浸在暖暖的阳光里。这是一个小县城，当年属双辽县，我们也来过几次。与当年相比当然已经面目全非，但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份久违了的亲切。在车上打听到郑家屯有去金宝屯的中巴，下车后果然很好找。

车上人不多，司机还在等人。乘客都是当地老乡，上去了我这么一个外地人，当然就比较惹眼。人们开始热情地打问，从什么地方来，到哪里去，去干啥，我一句一句应答着。我介绍自己说我是金宝屯胜利农场的浙江知青，离开农场三十多年了。有人问，你有亲属在这里吗？我说没有，我只是想回来看看。话没有说完，嗓子噎住了，一股说不清楚的情感突然在心里汹涌，是伤心？是悲切？是委屈？是感动？好像什么都不是，又好像什么都有一点。眼泪怎么也没能忍住，热热的流下来。我自己也不明白，当着这一车素不相识的东北老乡，自己的情绪竟会如此失控，以至于泣不成声。我已无法回答人们的问话，只得回过头去把脸对着窗外。身后原来满车的热闹，突然都静了下来，谁也不再吭声。等我平复了自己的情绪重新回过头去，为了自己方才的失态感到很不好意思，想向大家解释什么的时候，人们却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不再问我什么。车子上静静的，一直到开车。

清新的、亲切的东北原野上的风，从窗口迎面吹来，白云在蓝天下一团团一片片的舒卷，青纱帐轻轻摇曳着，路边笔直的林带一直通到天边。还没有到金宝屯站，司机突然大喊，原来碰到了金宝屯胜利农场的班车。于是，还没到金宝屯终点站的我就被“过驳”到了去金宝屯农场的车上。我终于踏上了几十年前那条去农场的路，踏上了金宝屯的土地。呵，这块留下我们一段年轻生命的土地呵！

这条路，当年我们来回走了多少次。那时没有公交，运气好时我们可以搭乘场部载货的大解放，有时候就搭乘马车。冬天，好心的车老板会扔给你一件老羊皮大衣。颠簸半天，中途要到庄户上给马饮水，到达金宝屯骨头都像是颠散了架。途中尘土飞扬，碰上风沙天，回去就成了一个土人儿。我至今记得车老板那身老羊皮大衣的膻味和饮马的小村庄里的辘辘。看见西辽河的水了！当年西辽河上没有桥，从农场去金宝屯，冬天结冰自然不消说，直接从

冰面过。水浅的时候，卡车或者马车来回都是直接从水上过河。现在，河上已经架起了一座简易桥梁，铺了沥青的路面在阳光下发着光亮。我坐在宽敞明净的中巴车里，感受着、欣喜着金宝屯的今天。交通的便捷是经济发达的直接标志，看来这些年金宝屯没有与外面的世界脱节。

不到10点钟，中巴车停靠在农场招待所门口。招待所门楣上赫然写着：胜利宾馆。

（二）四站纪行

阳光明媚，天特别蓝，招待所里静静的。

穿过小小的门厅，餐厅里有两个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我上前问了一下，她指给我经理办公室。经理姓李，是原农场副场长的儿子，副场长在文革期间自杀了。经理象他父亲，高高的个子，黝黑的脸。算起来我们在农场时他还是孩子，现在已是中年汉子了。夫妻两人承包经营着这个胜利宾馆，女服务员就是他的妻子。

听说我是浙江知青，经理马上热情地让着“先进屋，先进屋”，然后问我：“农场你还认识谁？”我报了几个前一天在沈阳没有联系上的朋友的名字，他当即非常肯定地说：“没问题，我去找。”说完立即吩咐服务员给我送水送茶，自己不见了人影。我简单环顾了一下宾馆的环境，宾馆大概有十来间房间，在走廊的南侧一字排开。我的房间在中间，门上没有号牌，按顺序应该是8号，是个套间。走廊北侧是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望出去是一个宽敞的大院。院子中央一个圆形花坛，各色鲜花在阳光下盛开，让人赏心悦目。突然花坛后座北朝南的一排红瓦砖房十分眼熟，仔细一看，竟然是原来的场部机关办公室！旅途的困顿疲劳瞬间无影无踪，我带上相机就从宾馆后门直奔场部大院。

因为是双休日，院子里很安静，正好让我独自流连。场部门楼高大的拱形门洞还在，楼却不见了踪影了。门洞里堆着砖石水泥等，三两小工在作业，看样子是要装修。一问才知道，门已经卖给个人。买主姓刘，搭话一聊，知道他打算在门洞里开一个小卖部。他的父亲是四站的刘少全，说起来我还有点印象，可惜已经去世。

门楼旁那个小广播室也在，只是被锁在了一扇破败的小木门里。当年我调场部的时候天津知青西克华在这里当广播员。她比我大两岁，个子不高，削肩。圆圆的白白净净的脸，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一笑两酒窝，十分清秀漂亮。当时政工组搞宣传的知青就我们俩，过年的时候，她回天津探亲，我就做代理广播员。1973年，她读书走了，我就正式兼了广播员。每天早中晚三次广播，放完开始曲，第一句话就是：“金宝屯胜利农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广播内容除了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歌曲，还有就是自己采写的一些场内新闻、好人好事等。为了发音标准，记得当时还常常一句两句跟着中央台学普通话。1974年10月11日，我上学临走的前夜，窗外是飘飞的大雪，我和阿南也就在这个广播室的小炕上，抱头痛哭，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想起往事，我鼻子又酸了。

环顾四周，场部大院比早年扩大了至少3倍，院子大概刚用新鲜的黄土铺垫，洁净平整。与原先场部行政办公室相连的，是新盖的大小款式都一样的一排红砖瓦房，门面和大门口装修一新。原先的业务这一摊都在这里办公。办公室门厅墙上是介绍农场概况的文字和图片。在那明净得几乎可以照出人影来的办公室水磨石地面的走廊里，我想起了早年办公室里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和冬天取暖的铁皮火炉。原先院子东头生产和后勤办公室那排房子还在，只是卖给个人做了店面，门面向外，朝院子的一面只留下了一排窗口。院子南首我们住过的那一排宿舍小屋已经不见了，绿草丛中只一个月洞门横向立在那里，像是在凭吊过去岁月。

我与那位小刘聊了几句，说到几位我认识的农场老人的去向。正说话间，一辆黑色桑塔纳悄无声息地驶进大院，下来几位壮实的东北汉子，小刘告诉我说其中一位是场长。听说我是浙江知青，当年在场部政工组工作，场长当即就热情相邀："浙江知青？走，上我办公室！"场长姓王，很年轻，从后旗调来农场当场长不到两年。他向我简要介绍了农场的近况。说起当年知青的事情，他非常热情感慨。他吩咐办公室接待，问我有什么要求，想去哪里看看，他可以给我派车派人。那份热情豪爽，让我一扫途中的孤独和忐忑，终于又找到了当年在农场生活时的感觉。

回到招待所，经理找来的几位农场老人已在：浙江慈溪知青徐如平、原场直机修队工人后来在农场工会主席位置上退休的王克诚、原场直团总支书记、场部后勤的大老张。虽说同是浙江知青，因为以前在不同的分场，所以徐如平我还是第一次认识。看到岁月在他脸上抹下的风霜，想到在大部分知青离开农场后，他还独自坚守数十年的艰辛，感动之余，心里不禁有点酸楚。年轻时的王克诚和大老张我们常在一起搞组织活动、打蓝球等，现在也都是两鬓白发的老人了。不用寒暄，最多的感慨就是岁月匆匆。

午餐桌上，话题自然离不了当年的生活和一些熟人，他们也向我介绍一些农场的变化。农场的老人很少了，早先比较熟悉的老袁计、刘家昌已经去世多年，吕常贵、卢尔昌、屈培生、周彬、周致和、刘桂英、陈凤歧两口子等等已经调通辽或者长春，生产组还有王锋等还在，但是一时没有找到。

农场现在的体制是属于后旗的国营农场。所谓国营，其实全部土地已经分田到户，职工（农工）以分得的少则十数亩、多则数十亩土地的农业收入为生。如果年景好，每亩地每年大概可以有300元收入。全场现有管理干部100多人，他们没有土地，只是行使农资、计划生育、环保等方面管理职能。每年旗里拨款400余万元给农场，作为干部工资以及办公开销，退休的干部有劳保。农场主食基本以大米取代了高粱米饭、苞米茬、小米面窝头等。跟早年相比，现在农场的交通很方便，农场每天有十几个班次的中巴，往返于农场和金宝屯之间。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饭后徐如平为我安排行程，开车直奔四站。场部去四站的大道一路柏油路面，宽阔平直，两旁的白杨树挺拔整齐，直通天边。马车和毛驴车几乎已经绝迹，人们的代步工具以摩托车居多，个别也有小车。以前场部去四站的大

道还有一段在，车辙也在。二十多里路，当年我多少次从这条路徒步来回，晴天满天尘沙，雨天遍地泥浆，现在这段路已基本废弃不用。

小车一直开到农场西南端最远的70号地，当年我们从四站宿舍出工，要近1个小时才走到这里。这块地原来东西走向，垄长1300多米，是全场垄长最长的一块地。就在这里，那年夏锄薅谷子，天气炎热干燥，一次中午收工，我从地里直起腰来，又热又渴，两眼一黑，晕倒在大田里，人们七手八脚将我用毛驴车拉回宿舍。德芳和阿南得到消息，中午的毒日头下，两个人一前一后，老远地跑来迎我。看到她俩泪眼婆娑的样子，我心里一热，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现在我们乘坐的小车就从70号地东面的大堤上开过来，70号地的走向从原来的东西走向改为了南北走向，分给各家或两垄或三五垄，我们看见好几起农工开着拖拉机到田间地头作业。拨开青纱帐，徐如平掰开几穗玉米棒，金黄的饱满的玉米穗预示着今年的好收成。四周的防风林带还是那样葱茏茂密。是啊，十年树木，从我们离去，好几个“十年”都过去了呢。

来到四站站区，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语录塔”。那高大笨拙的身姿依然如旧，只是上面的标语口号已经残缺不全。语录塔下有一拨农人在憩息聊天，满口的东北话听起来十分亲切。四站办公室院子和北面男生住过的瓦房大炕，以及东边的马号已经不复存在，在原办公室的西面另开辟出一个办公大院。座北一排红瓦青壁房子，院子规模虽没有场部院子大，但是格式布局与场部院子相差无几。因为是公休日，院子里没有人，办公室关门落锁。

为了我执意要去寻找当年住过的地方，绕过小路，几经曲折，徐如平把我带到南边一座土房前，他说这是全场仅存的一座土房了。土房前有一群大白鹅在悠闲地踱步，看见生人一只只舒长了脖项，扑打着双翅，欢快地叫着。一边的菜园子里瓜棚豆架，蔬菜葱茏，好一派田园风光！屋边还有一个手压井，这样的手压井是当年我们生活用水的唯一水源。刚压出来的水是清澈的，可是过不了5分钟，水就变成黄色。要想洗一件浅色的衣物不至于变色，必须把水放置几天或者烧开澄清后才可以用。冬天积冰不化，我们到井台边提水一跌一滑，有时候手套也会粘在铸铁的摇把上。现在农场开挖明渠，引入了东辽河的水，不仅用于农业浇灌，而且建起了自来水塔，全场用上了自来水。虽说不能象城市里那样保证24小时足量供水，但人们的日常吃水和生活用水基本不成问题。除了个别农工菜园子浇灌，可以说农场已经告别了用手压井的时代。住在土房里的是奚姓一家，土房里生长的孩子居然如此美丽可爱，尤其是那女孩，腼腆而不失聪慧，朴实而不流于土气。主人说，他们已经造了新房，很快就要搬出土房了。

最后，终于，我找到了当年我们11位浙江女知青曾经分住过的那一栋瓦房。这些朋友中有不少已经多年失去联系，不知她们如今可好？现在的瓦房主人不在，我只能在外面看看。园子里高大的苞米几乎挡住了窗户，紧挨着我们住过的三间瓦房，右边又新造了一排三间。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当年的痕迹，三扇窗户、三个烟囱，我想象着屋子里的走廊、灶台、火墙，应该还是老样子吧。这里我们只住了半年，后来说是为了更好接受再教育，让我们从瓦

房搬出，住进土房大炕。

离开四站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座“语录塔”，这件文革的遗物，据说这是全场仅存的一座语录塔了。它象一位古稀老人，静静地见证着金宝屯胜利农场文革和知青下乡这一段历史。

回场部后，我又去场部外围和二站的田间地头转了一圈，看见了高耸的水塔，看见了东辽河水在清澈见底的明渠里静静地流，看见了现已基本废弃的从前场部通四站的大道和那上面印满的车辙印。早年二站的果园曾经是我们心向往之的一块乐土，不仅因为那里的水果的香甜，更因为那里年轻生命般的绿，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庄户人家以经济利益为重，果树已经全数拔掉，满园的沙果、葡萄、西瓜早已无处可寻……

晚上，大老张为我找来了一位“熟悉的老人”，来者是原来场部食堂卖饭菜票的郭贵贵，岁月的风霜让昔日的同伴成了似曾相识的陌生人！但是很快我们就回到了当年情景中。临别，她问我：“以后还来么？”我说：“说实话，这种可能性很小了。”我和她眼圈都红了。

16日早晨，我告别农场。今生今世，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来，我从农场带回来一抔土。多少年魂牵梦绕的，就是这一抔土啊！

回来后很长时间，我无法平静下来，当我终于要开始写下这次农场纪行，又想到了阿杜的歌：“走啊走，就不能再回头，痛哭过因为执着，依依不舍那又如何……”

2007年10月

江南雨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4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回牧场记

(1)

这次回牧场一来会会当年的老哥们儿，二来写生和拍照。因此路线上选风景好的地方走。

第一日从京承高速走，车上GPS指引，在双滦区出口奔围场。第二日出围场县城走111国道到御道口进入木兰围场风景区，票价130元每人，然后再进乌兰布统景区，收60元每人。这条路也是去西乌旗最近的路，但是中间有人要买路钱，如果绕道多伦要多走160公里。要不是中间有人收高额买路钱，其实是地理上最近便的路线。第二日的终点是克什克腾旗的热水温泉。

2010年我和夫人曾来此洗浴，因此想先呆上两日泡温泉。进了一家24小时有温泉水的宾馆，标间240一天，但是打开澡盆龙头，发现放出来的水和以前看到的不一样，既没硫磺味，颜色也不是浅黄绿而是浅蓝色，才发觉可能上当。事后才知这里温泉水资源有限，有的宾馆就用人工勾兑的水替代天然矿泉水。因此，翌日一早我就马上动身，慢慢开车，中午到的西乌旗，住在王玉才家。

当天拜会德木其格，他已经中风不能行走坐在轮椅上。我送了一幅画《敖包东边》。

我很伤感，老人越来越少了，而且我们也在一天天老下去。记得09年我来时赶上初秋，和病床上的关布加布见上一面，冬天将至，估计难关不好过。不久，就传来噩耗。那年也匆匆和瘫在轮椅上的德木其格见了一面。这次出来，我总想，应该留一点纯粹私人之间的念想给老朋友们，当然最好是我的油画。因此平时有意画了一些草原题材的画。其实，老德原来就有为了纪念知青下乡搞个纪念物的想法，而且也向我说过。其实鄙人觉得未必很合时宜。人们心中的纪念碑比石头的更长久。历史上有多少权倾一时的人一死，气焰消散，石头的纪念物虽在，但成了后人调侃的对象。

(2)

关于德木其格的病这次在牧场听到这样的说法，不知确否：

他近年来和关布加布呕心沥血写作宝日格斯台地方志，据说最后出版事宜委托某位当官的，对方一口答应把事办好，结果等书出来后才发现大量被删剪，心情不好。

我到西乌旗的第二天（七月十一日）就有暴雨，旗里顿时满街是水。其实，我在七月八日过克旗时也遭遇暴雨。坐在车里冷得我马上把秋冬的夹克穿上，腿上套两条长裤。下面就是西乌暴雨的照片，地点在敖包山上。

（3）

下图：大雨袭过西乌旗（注意这张图建议下载按原尺寸观看，纵向400点，横向4000点以上）

这几年这里各种矿藏开采出来，各地开发商蜂拥而至，一下子富起来。

在旗里逗留两日就奔牧场去了，同车的还有我的“亲家”两口，以及干女儿和干外孙女。

近年来地方政府推行城市化政策，牧区不少牧民在旗里买房。我的“亲家”也买了房。问题是牧民进城后的生计问题。特别典型的是一些牧民草场被开采商收购，马上得到上百万的钱，不知该如何使用，往往一两年内就把这些钱挥霍过半。

除了生计问题外，我注意到了一些生活和生理问题。牧民结束游牧而定居，甚至进城住楼房，心血管疾病逐渐

严重。定居后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调整，另外动物脂肪摄入量依然很高。有人请我到茶馆喝奶茶，盛在汤锅的奶茶端上来，底下还有火在加热，上面一层乳酪和黄油，当时就把我吓住了，我本身高血压，而且血脂高，这些东西躲之不及。

从旗里回牧场这一路上，可见到处在施工修路，各种矿业设施散布，今昔之间差距很大令人感慨。

(4)

到牧场后，很快就上山拍了以下环拍。可见公路把牧场拦中腰切成两半。图片右边就是烈士陵园。

我进去看了雕像。此时正好有公路上干活的女工前来，问我这是不是战争年代的烈士纪念碑。我告诉她这是和平年代一次事故中殉职人员的纪念碑，之所以叫革命烈士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牺牲是一种革命的行为。

在我上山的时候，王成学闻讯赶来扑了空，于是晚饭后特别去他的小土房看望了他。老王七十七岁，还是很健康，有了一个林东的新老伴。他说从未登上过马鞍山，我于是就和他约好第二天去。

(5)

第二天（7月12日）早上我开车拉上王成学奔马鞍山。出苏木向东北，过毛盖图下的河道，完全干了。

继续往北走，过农队和老二连（台尔木），再向东北，进入老三连(白音温都尔分场的地界)，老远看到由霍林河经八连开往白音华煤矿的火车。这列火车60个车厢。据老乡说平时多为80节的，也有三个车头拉120节的。

到了花敖包，就看见铅矿了。

这里地面水完全消失了。据老乡说铅矿在这里水洗选矿，沉积下来的泥膏非常重，可以卖好价钱。这里因为污染威胁到畜牧业，牧民找到旗里交涉，据说结果是准备让在此地放牧的人们搬迁。

因为草场都被圈了起来，我们只能在各块有铁丝网的草场的缝隙间行车，因此老王到三连的恩合家问路。从这家的草场上，远远看到马鞍山。

(6)

马鞍山是东西乌的交界，山北坡属东乌旗。终于到了山下，赶快给老王头留影。

对王头来说，这山上石块多，挺不好爬。老爷子有一度想放弃，我跟他说如果不爬，就怕将来后悔。怕了就没遗憾了。

但是，对老人略显艰难。

山上虽然乱石堆积，但是，竟然有榆树顽强生长于阳坡。近年来干旱草原上杨树死得很多，但是榆树枯死的情况较轻，看来草原上的各种树木中榆树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最强。

阳坡上还有小群马，好奇的看着我们。

(7)

终于到了山顶，我自然要来个环拍。请大家把这类图片下载下来，放到原尺寸观看。

从马鞍山回来后，苏木这里已是黄昏。

老王头要留我吃饭，但我怕张杰家为我准备了，让人白忙活不好，先是谢绝了。但是，老王说今天给当年在牧场食堂当大师傅时的烙饼手艺在捡起来，这让我不由不留下。因为刚到牧场时我们才过青春期，火力壮肚子老饿，碰见食物整个一头狼。来到总场（苏木当时的称呼）就着老王头的羊肉汤吃他烙的油酥饼，似乎赛过天下最美的珍馐。现在看来是很粗糙的饭，当时提起来不由往肚子里咽口水。我把老王要烙油酥饼的事用短信告诉了嘎日迪，对方马上回信，说唤起了当年的记忆。其实，应该是唤起了当饿狼似的生理反应，虽然我等现在不说脑满肠肥，至少是血脂高到该限制饮食的地步了。

晚上由张杰指路拜访了老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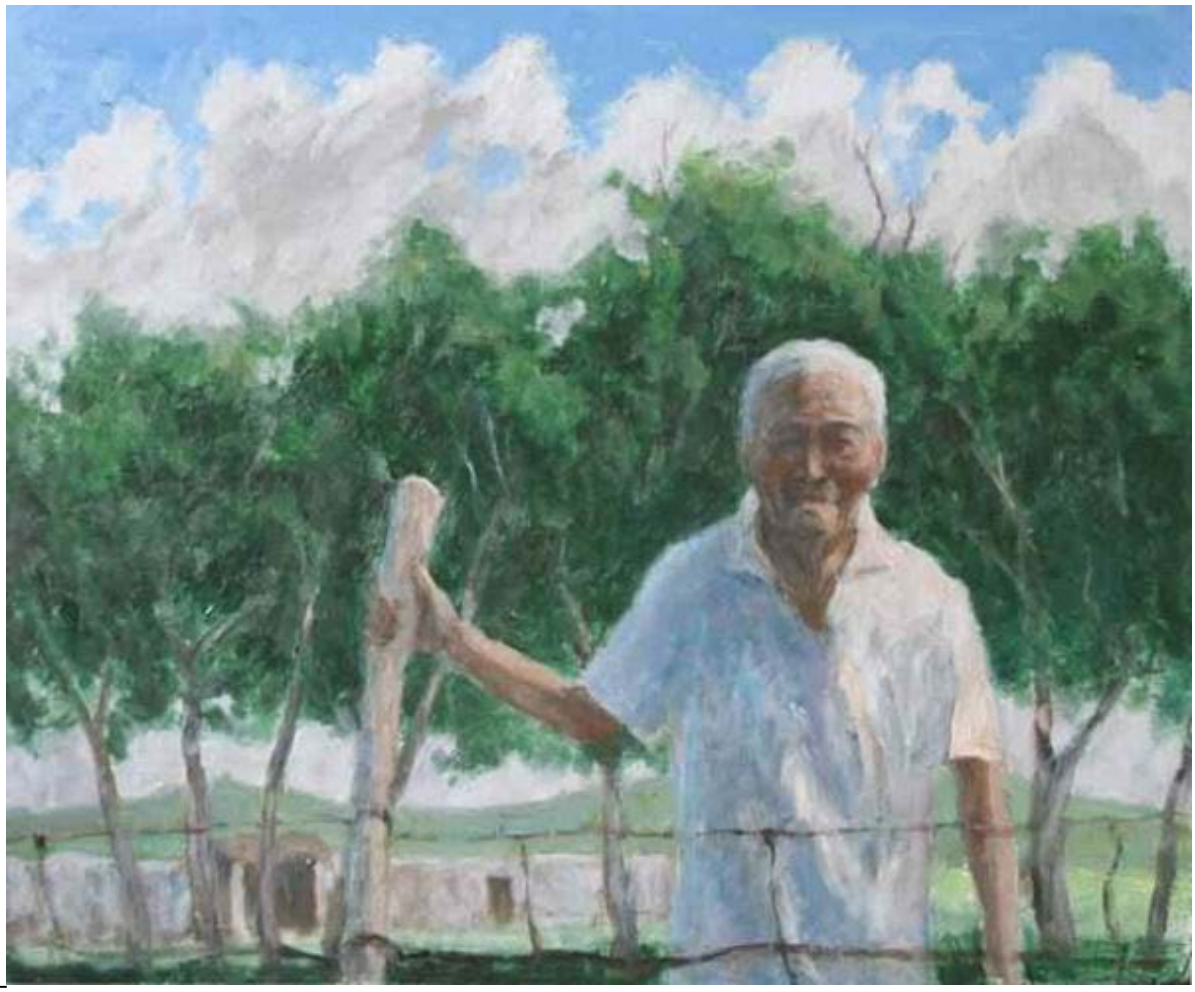
(8)

说到榆树，在这次多年的大旱中，才显出顽强的生命力。杨树固然长得快，一旦缺水就会枯萎。老王头现在快八十还很矍铄，颇有老榆树之概，而且他的土房前有一片榆树林。他说从64年起他和张文等人从山上采来成麻袋的

榆树种，挖坑种下，多少年屡次被牲畜践踏啃噬，残留下来十来棵，兵团时期叫驴参谋长还打过这林子的算盘，趁他不在时，砍去几棵。

从马鞍山下来，约好第二天去王头家写生。我没说清楚，结果老王头以为这画是给他的。后来我也将错就错，把那写生复制一张给了他。

给老王头和榆树林照相时他乐呵呵的，可是我写生时笔端却流露出另外的情绪，我也不想多解释，还是看画吧。这画叫做《家园：老王头和榆树林及土屋》。但是，复制的那张老王却是笑脸。



(9)

7月13日上午在老王家画写生，下午就去了松迪家。

松迪和扫格德儿兄弟二人，当年流落到坝后（指西乌珠穆沁，而坝前指南部接邻的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现在算是赤峰市辖区。和锡盟的西乌旗之间有海拔差距，由高低之间走动要穿过一些山脉，就叫坝。）

松迪从阿旗娶来媳妇色力格楞，当时夏天蒙古包墙是苇子帘，地上铺的是苇席，没有像样的毡子垫。松迪和扫格德儿兄弟二人除了穷以外还倍受歧视。扫格德儿后来在坝后娶了个强悍能干的寡妇，生计逐渐有了起色，但妻子

死后家道衰落，今年夏天，扫格德儿在潦倒中散手人世。

但是，松迪家从小两口已发展繁衍成二十来人的兴旺家族，我也这个过程的见证人。

女主人当年很漂亮，有些中亚人的轮廓。男主人是蛮小子，力大，可以和二岁牛较劲。

关于松迪家的过去就不说了，这在《知青通讯》中我撰文详述过，下面是当年这篇文字的题头。

(10)

[松迪家草场的环拍，对面是农队和乌日他沟，建议下载后按原尺寸观看]

10

乌兰哈达上的环拍，建议下载后按原尺寸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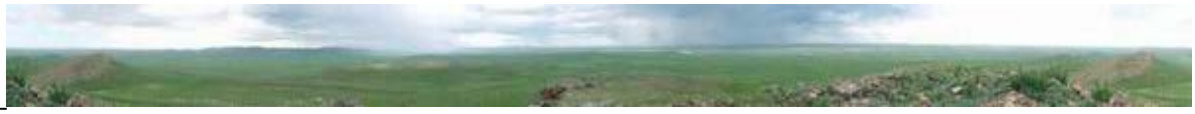
我见证了松迪家族走向兴旺，同时也看到一些人家迅速衰落。比如，最勤勉和精于计算的A和他的老伴X（甚至有人挖苦他们是铁公鸡），是当年最富裕的人家，主人过去后儿子涉及不良嗜好，挖空家底后就到处借钱敷衍度日，最后终因无力偿还，债主上门把牲畜和可拿的东西全瓜分了。只剩下承包的草场拿不走，租出去以维持生计，若原来创业的家长地下有知会惊愕气愤得跳起来！

牧区承包以后，不久就出现了贫富的分化。说也奇怪，当初的嘎查长D，在分配承包草场时，把自己的亲朋都分到宝日格斯台河边，可谓要水得水要草得草，而且离苏木近交通便利。但是，和他疏远的牧民被分到偏僻甚至缺水草场上。按道理说，起点上的差距应该有助于这个家族比较快的富起来，几年后，显示出其效果却不尽如D的如意算盘。偏僻地区的草质好，牧民打井解决了牲畜饮水问题，草场不处于交通要道上反而外来人畜干扰少。于是这些牧民的牲畜膘情好，所卖牛羊得利较大，外来人畜干扰少，放牧省心，减少被偷盗丢失的机会，现在甚至有人感谢当初嘎查长的“边缘化”做法。而D家族中A是败得最惨的，还有S家，主人死后情况艰难，草场上是别人的牲畜……。

不论条件好坏，其实最重要的是主人的勤勉会经营。松迪家族的女主人来自农区，比较懂得经营。牧业上的事情就不说了，奇怪的是她家种树，院墙里各种蔬菜，如黄瓜、豆角、芫荽，甚至还有近几年北京流行起来的苦苣。

我爬上她家西边的乌兰哈达，回回来我都要到山顶环拍。爬山时松迪的孙子告诉我，山上有母狐狸下了五个崽子，小东西见了人也不怕。我说千万别打扰它们，狐狸没害处（至少能够捕捉老鼠）。但是，松迪孙子告诉我，现在狐狸饿极了会攻击羔羊。

爬到山顶环顾四方，牛羊如同小米粒，远处公路也仅仅是一条白线，深感天地之大，我等渺小，草原不像青藏高原那般惊艳，却是弘大温润平和。



乌兰哈达上的环拍，建议下载后按原尺寸观看

但是，不久就起风了，阴云涌来，夹杂几个雨滴。在山顶，我怕锋面雨雷电伤人，赶快叫那青年人即刻下山。

(11)

在松迪家住了一天，准备告辞，继续拜访老哥们儿，可是主人挽留，特别是其女儿索依拉不干了，说数次来拜访没有一次到她家，她要夫君把牲畜交给别人看管马上开车来接我，无奈，我说不必用车来接了，何必打乱那边的活计呢！我自己开车过去，到她家逗留上一日.

这天开始（7月14日）。乌兰哈达以西地区下了阵雨，旱情得以缓解。

索依拉的夫君是巴道尔基的儿子，他们家正处于老三连的地盘上。兵团时期的砖房还在。

白音华到乌拉盖的一级公路就从他家东面穿过，道路质量很好，车辆飞驰如同在高速公路上。

老三连

索依拉和夫君

7月15日晨，我辞别主人，回到苏木休息一下。下午和张杰一起拜访恼勒布桑。

黄昏松迪女婿圈回羊群

牛儿也知回家

暮色笼罩过来

典型的乌珠穆沁羊

7月15日早晨，我向索依拉夫妇告辞后，驾车回到松迪住处，因为我车上有一些东西暂放在这里，要装车。

主人希望我多住几天，我说：以后可能还有机会，况且其他老哥们儿家总不能不去。我现在64岁，身体尚好，可以自己开车来，大约两年一次，70岁之前至少可来3次，70岁以后不好说了。不过，或许以后有什么机缘不得不来你这里住上几个月或半年，可不要嫌弃啊！

主人嘿嘿的笑，不知听没听清楚我的话。

我接着说：这地方是个避难场所。三年自然灾害，内地不少人活不下去逃到这里，成为“盲流”，内蒙其他牧区有“上海斯琴”那就是城市里生活艰难大人自身不保，生下孩子只有狠心丢弃，结果被成批送到牧区。我们这里的张家瑶、李中寻也是那时逃难来的。将来，说不定我们那里呆不下，我也来此地“盲流”一把。你没看见那些当官的，早早的把家属移民欧美，为的是避祸。咱老百姓没那个本事，逃到这里总是可以的。

主人还是嘿嘿的笑。

我走出主人的院子，上了车，两位老人送出来频频嘱托，我发动了车，缓缓开出他家草场，不敢回头。

到苏木后，在张杰家歇息了，下午三点一起驱车向南穿越公路，走大约20里到了布合朝鲁家族的地盘上，为的是见恼勒布桑。布合朝鲁和老伴近年都已过世。老头一生多子女，而且多为男孩。老大丹森阿勒花，据说过继给了放骆驼的莫合喇嘛，二儿子布道尔基，仅有一女奥尤，接下来是莫日根和土门，再下来是过继给恼勒玛的恼勒布桑，下面还有奥腾巴依尔。这家族出官员，几乎所有的男孩都有公职，只有恼勒布桑不是。

恼勒布桑幼年过继给人家当养老送终的儿子，而且后来他媳妇多病，因此无法抽身出来走仕途。说来奇怪，他的养母在时托我做他的蒙文老师。我一个汉人，来牧区学了个半吊子蒙古文，怎么可以做本地人的母语的老师呢？难道不荒唐吗？但是，各位看官，你想一想那时是文革的昏热之中，学校荒废，不学汉语学蒙文，是不是会招惹嫌疑？恼勒布桑养母聪明过人，让我这个汉人做老师可以避免很多闲话，于是我就当上冒牌的老师，说实话，这孩子有母语基础再学文字，其理解力和语感是我望尘莫及的。

我所以没有奔道尔基家去，是因为知道他在旗里当官，退休后住在旗里，未必见得着。于是开车直奔恼勒布桑家，不想人不在，去了盟里。转回来看见道尔基家有人，就过去了。

(13)

道尔基家非但有人，而且高朋满座。

从呼和浩特开车来的有赵国栋和容成刚，以及正在翻译容成刚《那年那月》的一位退休教师，也叫道尔基。还有苏木的书记。以及二连来自白旗的兵团战士格日乐和金花。

这家主人（道尔基）的两个弟弟，摩尔根和奥腾巴依尔都在。

主人杀了羯羊款待，我则因为高血压不敢多吃。

席间我才认识容成刚。他说起了写作《那年那月》的事，我说电子版已读到，而且书也得到了。

容说他知道北京知青中很多人认为那年烧死六十几人的大火是场事故，有别于他的书的提法。

我表示，经过这些年，对文革我们该有反思了，一些价值观念是否要有变化。比如“国家所有”的财产是否真的很神圣？（这种所有制形式问题上厉以宁做了手脚。按秦晖的说法这种所有制财产实际上是无主的财产，被代管人玩弄于股掌。）这些财产是从地主资本家夺过来，现在甚至是从被强拆者手中夺来，可一转手就可能低价转给新权贵。是否值得用生命来捍卫它吗？金训华就是为几根木材被河水卷走的值得吗？长期以来人的价值一直被忽视，在与“国家财产”相比就没有分量了，……。

言谈间涉及一些现实问题，东道主道尔基立刻表示别谈这种话题了。

我坐了将近一个钟头就告辞走了，张杰和我来到苏木，停了一会，我就独自驾车往乌日塔沟去了。准备到老哥们儿郝比斯哈图处住两天。

(14)

乌日塔沟中手机信号没有，因此，有两日我没有和外界联系，发送我的见闻。

09年秋来沟里，泉水早已断流，人高的苇子也是多年前的事了。郝比斯哈图家的机井要打下20开外才见水。这年山上的树木枯死，可见旱情多严重。

好在进得沟来（7月16日）雨水不断，而且雨量较大，后来听说14日以来艾拉山一带大雨，那是宝日格斯台河的源头，两天工夫毛盖图底下的河里就有水了。

毛盖图下河里来水了

这几年松迪和郝比斯哈图家都要买草保证牲畜过冬。好在牧民现已经采用棚圈了，棚顶用塑料膜覆盖，有利牛羊保持体温，同时也减少了草料的消耗。这地方虽是牧区，但是不向外面供应鲜牛奶，因此牛的品种是本地牛为主，杂以和英国肉用短角红牛的杂交后代。而泌乳量大的乳牛极少，特别是荷兰的黑花乳牛基本没有。原因是，这些牛不耐寒，松迪家买了几头黑花牛，结果发现冬天极易冻坏脚和乳头，必须放在棚里，给好词草外杂以高热值的料。因此，乳牛在此地经济价值不大。

不过，这几年马的价格回升，大概是内地玩马的风气起来，一匹三岁以上骑乘的骟马可卖到一万元，因此马群略有恢复。另外，羊肉价格上涨，一头中上羯羊至少一千元。

我特别往山上拍了劫后的树林，大树基本枯死，只剩下较矮的灌木了。

山上树木枯死，只剩下灌木

7月17日，道尔基夫妇和赵国栋、容成刚和那位也叫道尔基的教师、格日勒、金花一行来到乌日塔沟，无非叙叙旧留几个影。呆了两个钟头就奔苏木去了。

容成刚和赵国栋来访

既然来看老哥们儿，就带点实用的东西来，在北京选了一台家用的压面机，我给主人演示了压面条和饺子皮，于是主人决定晚上吃面条。

另外，我听说他们在旗里买了新房，于是就送我的油画一幅，给厅堂增加些点缀。

送主人的画《春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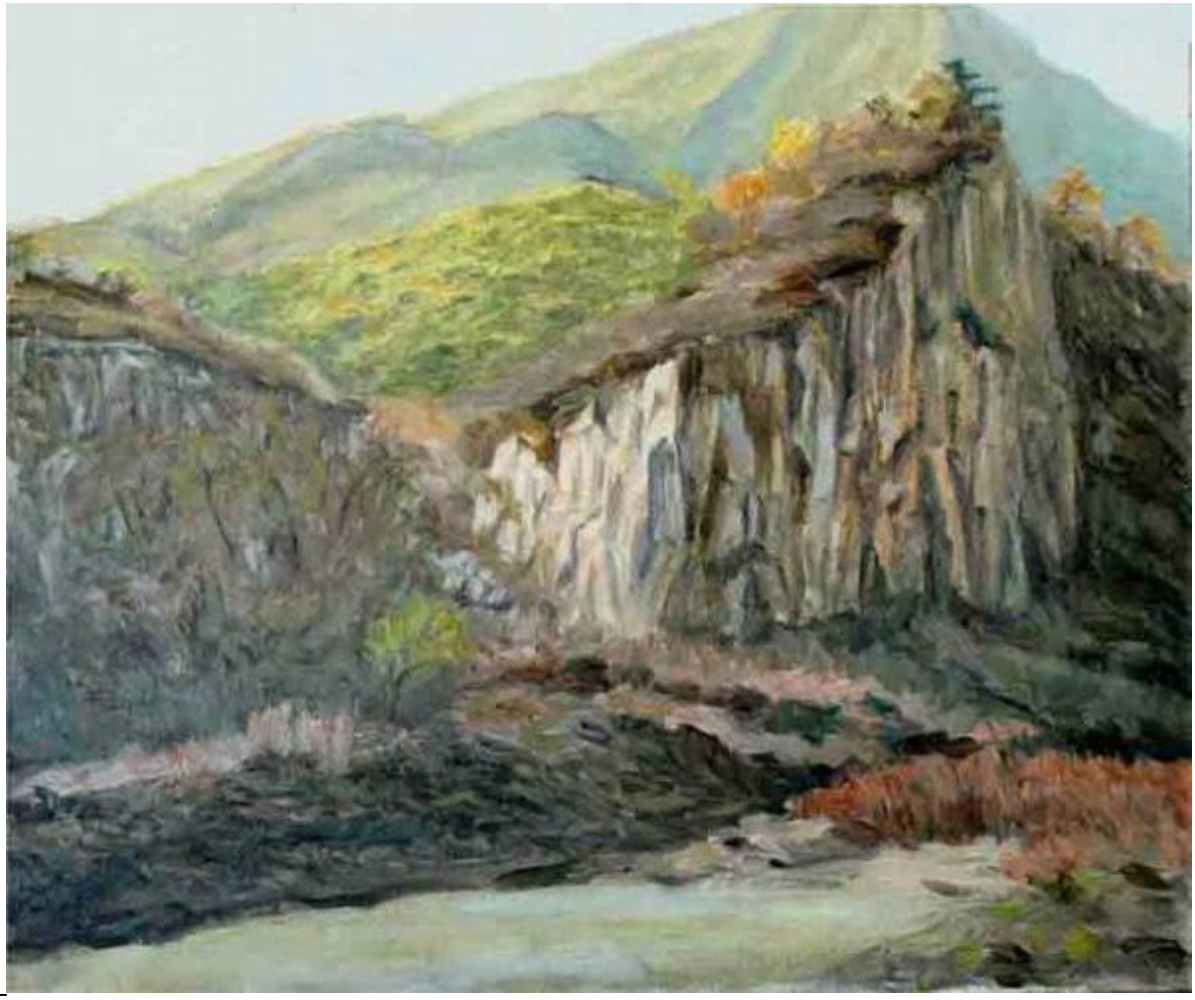
(15)

说到送画，这次凡是知道在旗里买房的朋友我都带去一张。王玉才儿子有残疾，因此以儿子名义得到经济适用房，我送了一幅《逆光中的荷塘》，是顺义汉石桥湿地的景色。

张杰我给了幅《秋——突兀的岩壁》，结果干闺女要去挂在她屋里。原因是，我写生的地点是小汤山牛蹄岭以北的一处岩壁。干女儿是林场职工，后来猪弄鸡搞减员增效，林场用区区3万元把工龄买断。就是这样便宜的买卖，林场竟然迟迟不付帐。找到地方各部门相互推诿，这皮球被踢了好几年，终于酿成职工们上访，有一天接到干女的电话说来京了。我赶快去见她，想接到家中陪她逛几天。见到她时，在一间狭窄不透风的廉价的地下旅店，里面挤了一群同伴。才知她们上访已经走到最后一步，……。

过几天，她打电话来说全被软禁在牛蹄岭。我那时不知牛蹄岭在何处。后来，有车了，常在山里转做风景写生，才无意中发现牛蹄岭，而且在一个山沟口立了个牌子，是什么公安局的监管处所。

这次一问，干女说正是此地，我这张风景是其北方不远的地方。好在上访有了结果，买断是非法的，这样每年有一点补贴。



(16)

7月17日。我要离开乌日塔沟了。

这几日郝比斯哈图也来亲戚，正要留影，于是用我的相机给他们照了一通。郝比斯哈图说今年10月要来北京，我说快来吧，现在我有精力陪你们玩，趁我们不算太老。

车子开出沟，看到农队下面有一片片的水洼，说明雨量十分充足，不过这水过几天就会渗下去，因为地下水缺口较大。

进入苏木就看见一些穿现役军人服装的人们，我以为有部队过此地，不一会，我看清楚了，不是现役军人，而是原来兵团战士回来玩的，今年是他们下乡40周年，大概为了回味当年，特定做了军服过把瘾而已。

苏木里的馆子里传出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时下的唱红气氛也被这些人带到这里。

据说是原来的郝副团长现在搞房地产很成功，出资数万支持这一活动，来的人以当时的基建连和工副连的兵团战士为主。那位副团长的先生出车祸，她因此没来成。

见到这些人，恍如回到了文革时期。

我跟这些人基本不认识，于是我就开车离开苏木，去见肖南沟的仁钦，不想人去了西乌旗，扑空。回苏木的路上，查看了一下宝日格斯台河水，拍了几张照片，还是回到张杰家歇息。

从公路上看宝日格斯台河

公路南边湿地又有水了

傍晚，原来二连的通讯员王X X来见我，晚上我和他以及张杰睡在一条大土炕上，聊起各自的情况。

这些年他夫人练功，搞得他麻烦缠身。单位让他停止上班，专门帮夫人转换思想，……。好在紧张时期已经过去。他现在家在河北离北京很近的地方，小地方的黑社会猖狂，老百姓受欺压敢怒不敢言。所以特别拥护重庆的唱红打黑，……。他特别仇恨美国，说中国的精英们要搞民主，他们得势中国就会回到军阀混战中老百姓就要受二遍苦，国家就会沦为美国的附庸，……。“三年自然灾害”死千万人是编造出来的谎言，……。

我虽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没有争论的兴趣。只是自说自话的回答了几句，反驳了几句，搞得他有些激动。看来话不投机。

(17)

7月18日早晨，张杰说邵X X来了，在他的饭馆喝茶，见一见吗？

我就跟他去了，见到当时二连的女副连长。穿了一身军装。我很奇怪王X X没有军装，一问才知只有基建连的才有。邵是从那个连队调到我们连的。

此外，还见到李凤娟，兵团解散后此人回到赤峰，但是严重风湿病一直折磨她。后来设法来到北京，身体逐渐好了。

她们准备今天下午奔西乌，明天一早不吃早饭起身，上午在林西停一下并吃饭，下午到赤峰，据说还有游玩的节目。看来挺紧凑。

这天的上午邵等人要去农队，即老二连那里看看。

最近类似的老知青返乡活动很多，这是重庆３００知青包车回云南的情景，红卫兵打扮，唱得是红歌，载欣载奔。我们都知道当年云南知青争取回城时，上万人请愿，写血书，下跪，卧轨，．．．．．难道都是过眼烟云了吗？

和他们合了个影我就回到自己住的房屋，因为我为老王头画的那画老王想要。于是我就又画了一张，把表情改得有些微笑，准备给他。

不一会我的干女婿来了，说是九月死了。九月是李锦荣的几个儿子之一，此外我还认识其中的腊月。九月的最明显特征是瞎了一只眼，说是其父打的。这父亲十分的暴戾，对几个儿子的进行打骂教育时下手挺狠。

九月查出有肺癌，这病搞得这家负债累累，最后还是扩散了，据说骨头上也有转移。兵团战士来，他挺兴奋，带着他们四处转悠，白天疲乏了，晚上睡下后，过了午夜，忽然肺部病灶破裂，吐了几口血，仅仅约20分钟就过去了。

我听说后赶快把这消息用手机发了出去，老孟和老嘎都回电代向家属慰问。

我到了他家，见到图有四壁的两间房。我向遗体鞠躬祈愿一路走好。

回头算来，我这次出来已十多天，在牧场呆了将近一个多礼拜。应该往回走了，并为自己计划一下以后的行程。

我一直对彦吉嘎以东的一座山充满好奇心，它叫宝力格汗，海拔一千七百多米，不算高，但是这山远看是平顶的，在群山里，如同跳动的海浪中浮现出一条鲸鱼的脊背，山上是湿地，而且有泉水。计划明天奔那里去。另外，就是我喜欢米日图坝壮观，说不定有好景色可画。此外，林东的召庙，也可以玩玩，特别是克什克腾旗的希拉木仑河，我来时在大雨中匆匆一瞥，觉得应该给那漫漶奔流的河道作一写生……。

于是就赶快收拾一下车子，张杰夫妇给我很多蕨菜，要我捎给各位知青，王成学给了我很多“毛毛谷”，一种林东特产，形似小米，据说煮粥非常粘，但又不是小黄米，也是要捎给各位知青的。

但是我也担心明天的天气，一旦阴雨，一切计划泡汤。

(18)

7月18日阴雨，我想等上一天再看，张杰也说多呆几天吧。

正好这天九月发丧，知道这家已经非常窘迫了，送去点钱表示一下，马上就退出了。

在雨的间歇，我驾车奔毛盖图下面，看看水情。

拍着照片，就见附近有一牧民走过来，近了一看，原来是好特拉。

为了看出水深特地拍了马车过石头河底的情况。

于是我随好特拉到了附近包桑杰的家，现在好特拉的牲口借用包桑杰的草场。包桑杰是原二连的牧业连长丹森的亲戚。下巴上有一大脂肪瘤，蒙语叫“包要”，故在原名“桑杰”上前缀“包要”，简称“包桑杰”。前几年已经过世。我和好特拉悉数六十岁以前的朋友，十之六七都已经走了，感慨系之。

现在牧民定居，生活安定一些，特别是进城后呆在单元楼里，造成动物脂肪摄入后消耗不掉，心血管疾病成为一大杀手。另外就是酗酒，也折寿。

我说现在逐渐有钱了，新一代人要走出去，有条件的应该到日本、外蒙、欧洲、美洲留学。同时把世界各地好的经验学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和生产。牧民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进，向荷兰、澳大利亚牧区人们的生活质量看齐。有钱没文化，说不上有福气，要想真正有福，生活方式要有变化。你看人家外蒙古，教育水平很高，青年一代留学欧美的很多。

好特拉说他女儿目前就给一位在外蒙投资的商人作翻译，另外，在二连浩特开办自己的办事处，办理进出口贸易事宜。

是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生活形态也要调整。

回来之后，听说九月已经埋于苏木东边山上。不一会，九月养子开车来叫我过去，说是要请各位吃酒。

这个养子是那苏乌力吉的儿子，过继给九月的。从轮廓和神态上看得出很像过世的那苏乌力吉。

一听喝酒我就头痛，况且是涉及红白事。我硬着头皮去了，看见老王头二两下肚，脸红扑扑的塞猴屁股，才听出是他让主人叫我来的。我这里哭笑不得，气不打一处来，也不管他比我大出十几岁，充着老家伙说：你小子想喝酒就来喝，干嘛拉我们这不喜欢喝到这里陪绑！

我不得不坐在酒桌边，右首隔着张杰还有那位左腮上长了一缕长毛的林东阴阳先生，那份恶心。这小子还拿糖，可能是主人家钱给少了还是吃喝不如意了，总之是一个游走乡间骗吃骗喝，再骗两个钱儿的家伙。我离开座位，用手机拍下来这场面。不过这些家伙真能吃，记得主人上了至少五六道菜。看着酒桌上的奇异作态，我没动筷子就饱了，找机会溜之乎也。

(19) 终篇

7月19日雨还是停不下来，游历周边的计划取消，只能回去了。

牧场到西乌旗新修的公路上也停了工，目前只是剩下一些收尾工程，公路上实际上能够跑车了，只是晴天时路面上有施工的，不让上。这路面是水泥基底的，为的是重载车能跑。

一路顺利，3个多小时，从容到旗里。准备明天继续赶路。

不知何时又能回来看看老哥们儿。每次回去故人日渐稀少，而且那里的自然界也要遭受炼狱之苦，被疯狂的开发，重金属的污染迹象开始浮现。

扪心自问，在那个“奴隶制”的时代有何值得留恋的东西吗？那体制剥夺了年轻人的正常发展机会，这些资源

全被大大小小的“皇帝”“诸侯”“土皇帝”把持，要想得到学习乃至发挥才能的机会，可能要作出违心的选择，有些人为此做出了更大的牺牲，乃至终身遗憾。

但是，在那个体制外，特别在那个边远的地方，还残存未被污染的人性和自然。这里即使人性中有狭隘自私乃至蒙昧的一面，好在尚没被谎言等等雕饰。而这里的自然环境有一种平和宽广的美，迥异于云贵川藏的那种惊艳，心灵的体验也是很不一样的。

我想这就是我为何十分留恋，总要隔一段时间去看看共同度过艰难时世的朋友们，爬到山顶做环拍的原因吧？

回到牧场，来到那日渐缩小的残存“净土”，心灵得到暂时的喘息和洗涤。那里今后会怎样？不得而知，走一步算一步吧!惟愿那条小河不要干涸，继续滋养它周遭的生灵。

写于2011月7月--8月

xfp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6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重返下鄉地

“三十六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過來人都知道，這是套用了老毛的“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當年心裡就嘀咕，誇張啊，彈指一揮間？！如今輪到我們自己，三十六年後第一次同組知青重返下鄉地，真有彈指一揮間的感覺！三十六年前一起下鄉的情景，恍如就在眼前。

在大家共同好友松的熱心協助下，我們同組的六位知青在三十六年後首次一起返回下鄉地。確切說，我是三十四年後重返，因我是在其他五位知青離開後兩年才有機會離開的。

我們下鄉的公社，如今已成為新開發區。那可真是天翻地覆舊貌變新顏的大改觀。而我們下鄉的生產隊，卻又正好在開發區的邊緣。當我們在松的引導下，沿著顛簸不平的的道路來到村口，才發現蜿蜒橫貫村里的道路幾乎毫無變化，還是那種沙礫路面，改變的是路邊多了不少新建的房屋，我們熟悉的舊老屋子，則隱藏在新房子後面。

最沒有改變的是我們曾辛苦勞動過的那一長峒的田地。剛插了秧，滿峒綠油油的秧苗，觸景生情，不由令人想起當年農忙雙搶的艱苦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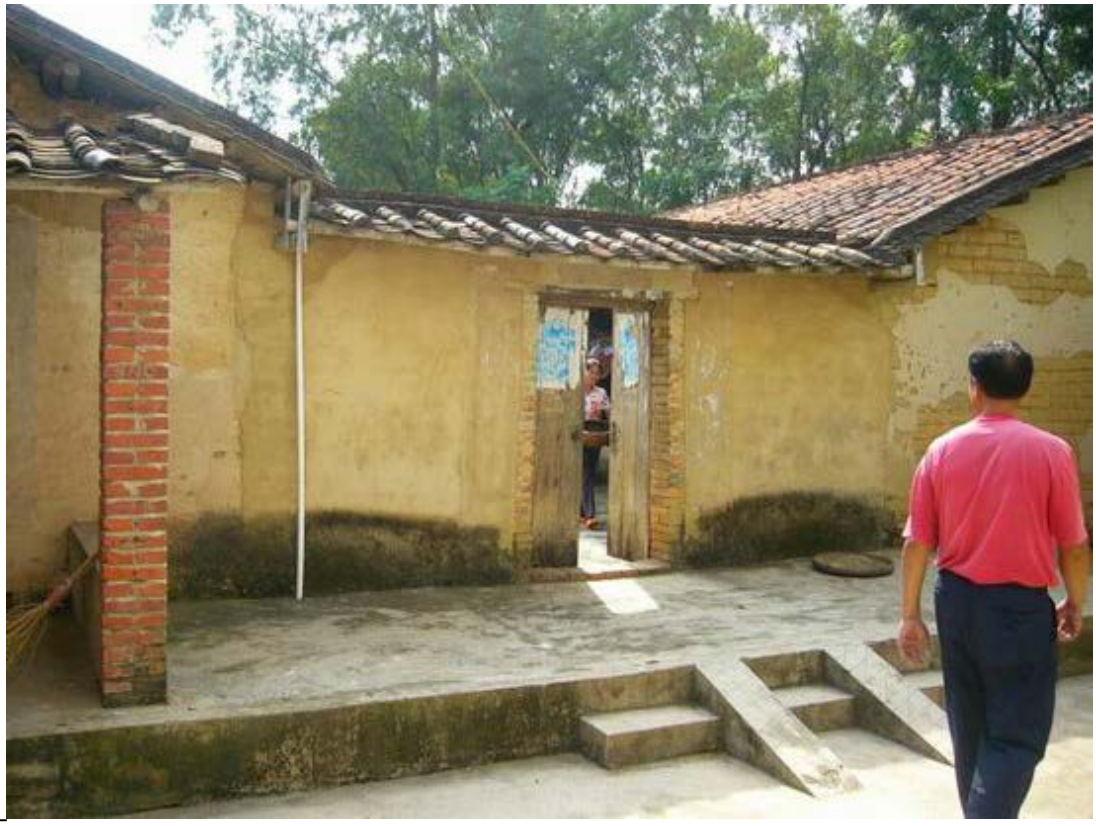
田峒那頭是鄰村，那裡也有一組知青，雞犬相聞，常有來往。

橫貫田峒這條機耕路還是當年的樣子。機耕路旁的池塘似乎也沒多大變化，只是感覺小了不少，恐怕是我們長大（老了）的心理錯覺。

當年下鄉第一天，我們三個男生就到這個池塘游泳，一條螞蟥叮在阿生大腿根，居然渾然不覺，到晚上睡覺時才發現，螞蟥已經吸飽滿了血，阿生驚恐中一掌拍下，螞蟥頓時爆裂，所吸之血四處飛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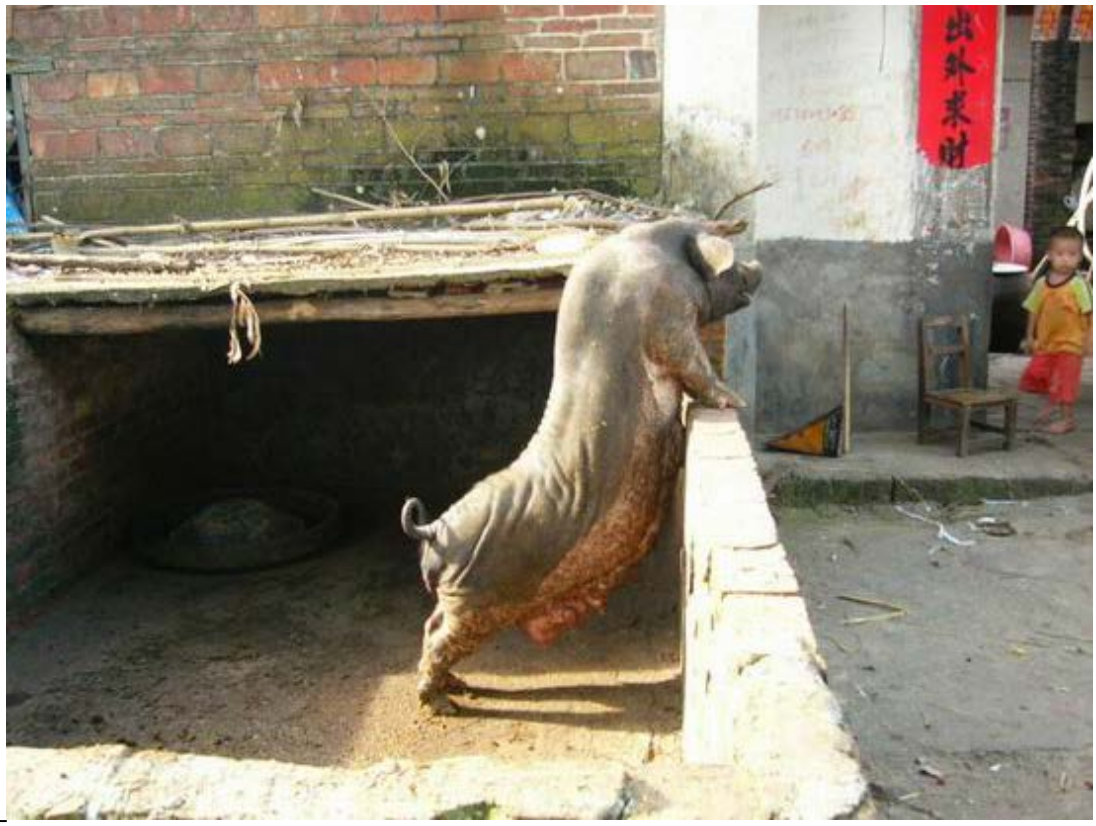
這就是我們下鄉第一晚住的房子，以前的門封住了，在後面另開個門，不知道裡面的牆壁是否還可以看到螞蟥爆裂飛濺的阿生血跡？

從池塘回望村裡，除了可見兩棟新建房屋，其餘都被鬱鬱蔥蔥的樹木所遮蔽了。大面積的綠化——這是變化較大的一點，原本後山只有疏疏拉拉的小松樹，坡面沒什麼植被，如今已長滿各種雜樹野草。



我們進村就直奔知青老這就是我們的知青家大門，還得以整體保留下來，被當年生產隊會計的侄子買下，主要是儲放雜物。院子天井還在（咋那麼小啦），上午阿毅、俏與松先行下去，托村民到附近墟集買了兩頭豬，就在這個天井宰豬分肉，待我與阿生及清、麗下到時，還有村民在這裡清理豬下水（內臟）。

這是我跟阿生住的房子，置放了大半屋子的瓶罐雜物。



四十多歲以上的村民幾乎都能叫得出我們的名字，尤其是年老者，拉著我們的手嘮個不停。年輕人與小孩則是好奇且善意地看著我們微笑。其實年輕人不多，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孩子，還有各種圈養野放的禽畜。一位年輕人自報是某某的兒子，我馬上叫出“阿青？”卻回答說是阿青的弟弟。哦，當年還是拖著鼻涕的小屁孩呢。年輕人當即撥電話，讓我跟阿青通話。阿青當年也就是十歲出頭的樣子吧，很調皮，常跟我們知青一起玩。現在已經外出到金城江作包工頭，電話裡熱情依舊，顯然已經知道我們返鄉的消息。

我們也能認得一些村里人，尤其是當年的隊幹，幾乎都能馬上叫出名字。這張合影照片中的村民，當年跟我們的關係都頗為密切。右邊矮胖的六叔當年是生產隊會計（見《村裡人速寫》），現在則是生產隊長，特別跟我們強調，仍然稱“生產隊”，不像別的地方稱“組”。我想，“隊長”肯定比“組長”好聽多了。六叔說他的叔叔就在桃園的復興鄉。我驚訝道，你還有海外關係呀！六叔有些尷尬：是啊，所以文革時一直不能入黨。右起第二人當年常跟知青泡在一起，跟我們說他當時是副隊長，所以要常常找我們。不過我們沒印象當年有副隊長，猜想大概是後來設置了這個職位。右起第三人是卅二叔，當時常年在大隊部為大隊幹部們掌廚，知青到大隊集中學習或者知青宣傳隊排練，也都是由他給我們做飯，對知青頗為照顧，深受知青們的愛戴。左起第二人是當年的隊長（見《村裡人速寫》），今年已經84歲了，似乎還是當年那個模樣與習性，尤其是將背心捲起到胸前的樣式，完全就是當年的版本。最左邊的叫阿拉（念lai第一聲），當年記分員最小的弟弟，是村裡少見的復退軍人，常用他認為是普通話的腔調跟知青交談，但我們覺得他還是在說客家話。

村裡人對我們的熱情令我們感激莫名。我們臨走時，以生產隊的名義給我們每人（包括松）一麻袋干花生與一箱子新鮮龍眼。裝車的地方原是生產隊禾塘（曬穀場），現已廢置。我們疑惑：那麼在哪裡曬穀子？村民笑了：在各家的屋頂天台啊！哦，是呀，都單幹了，那還用得著生產隊的曬穀場？

最讓我掛心的村民就是阿五一家了（見《我的房東七哥佬》）。剛進知青老屋，一位消瘦黝黑的農婦即上前握著我的手說“我就是五嫂”。一時間我還未能反應過來。在知青老屋跟在場的村民們熱鬧一陣後，俏提醒我該跟五嫂到阿五家探訪了。我才醒悟到五嫂就是阿五的妻子，當年她可是豐腴白皙的呀！阿五就是當年我的房東七哥佬的兒子，跟我關係甚深摯。阿五家從村口搬到田峒對面原來生產隊雞場附近的地方。

跟隨五嫂，穿越田峒、樹林，來到一個頗具規模的果樹園（主要是龍眼樹），看到一棟兩層樓房，這就是阿五的家了。阿五正在跟前述的副隊長一起往一輛三輪摩托車上裝花生與龍眼（就是後來給我們的）。一見面我們就很自然擁抱了，重感情的阿五眼眶已泛淚。七嬸穿著整齊等待在樓下（俏說七嬸上午就裝著整齊到知青老屋等我了），我趕緊上前緊握七嬸的手，眼睛亦已發熱。阿五的模樣還在，只是削瘦黝黑蒼老不少；七嬸反而看起來比以前精神甚至年輕了，大概是阿五與五嫂支撐了家庭，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或許更重要的是兒孫滿堂且孝順吧。七哥佬與七嬸只有一兒一女，兒子阿五生了五胎共三子三女（一對雙胞胎），女兒阿妹居然也是生了六個子女。眾多的子女又生了多少孫輩，搞不清楚了。阿五的子女都外出打工了，只有兩個孫子女在家。阿妹嫁得遠，未能及時回來，但我回台後，就收到以阿妹語氣發來的電郵（應是子孫輩代筆），述說家庭幸福子孫孝順。當時與七嬸阿五到二樓客廳就座敘舊，了解到三十多年來的巨大變化，真為他們高興。不過，大家似乎都有意無意避開了七哥佬的話題，或許有礙於久別重逢的歡愉氣氛，或者因有外人（副隊長）在場。我是很想問一下的，我也真應該問一下的，甚至應該到七哥佬的墳前上香致意。

日薄西山之際，在享用過生產隊的盛宴後，我們不得不再次“離鄉”了。三十多年才回第一次，慚愧啊！下一次什麼時候回來呢？還是期待著……

2011-08-28

老例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9

再回官渡感怀

此次再回官渡已有多日，回来后一直想写篇文章，但思绪一直很乱，也一直没找准切入点。因为官渡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子，而是浸泡过自己八年汗水和泪水的村子；官渡的村民也不是普通的村民，而是曾经关心和养育了我们八年的恩人。如果仅仅像写游记一样写得热热闹闹的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也不是我现在最想说的话，所以我就一直迟迟不能下笔。

后来看到了博友老铁的一篇文章，说现在回北大荒的知青过去大多是不得志的，而那些政治上红火过的人一般就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们是兵团，历次运动中都有许多整人与被人整的纠葛。于是我有了触动，也顿生出一些感慨。

我告诉老铁，我们刚刚重游了故地。四十年前，我们就是一批失意甚至落魄者，最惨的老彭还被公安员用手铐拷回过南京。尽管生活非常艰难，但我们几个知青却从未因生活上的小事或是有关个人前途的大事红过一次脸，伤过一次感情，哪怕是一次小小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结下了一种患难之交。

当时之所以失意，家庭出身问题是个要害问题。按文革时的政策，我们这些同学中有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的是游走于这个政策的边缘，所以大家的思想包袱都很大，就连被选到公社宣传队都会被看成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任。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很可笑，而在当时确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寻得一个世外桃源来躲避政治。就如同一位老革命受到残酷的批斗后，只求解甲归田，哪怕是在黄河边上的草房里了此一生也行。但他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也未能逃脱厄运。所以我在《我和我的官渡村的故事》一文中，对官渡人总是抱有感恩的心情，甚至用一种田园诗般的语言来描述那段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对此有人就很不理解，认为老知青们是不是太矫情了，是不是在为文革唱赞歌。其实这种误解恰恰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苦难，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品味出其中的滋味。他们可能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会跨掉，就不可能坚持并奋斗下去。

这次回官渡的体验是深刻的，也是对历史的一次追忆。只是物转星移，无论是目光所及还是心灵上的触动，都仿佛是在进行一次时空的穿越。只有站在那片广袤的田地里，闻着风中的稻谷清香时，一幕幕往事才会浮现在眼

前。

村里的变化太大了，几乎看不到一点旧时的痕迹。村们都住上了楼房，家中的陈设也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偶尔发现有几家的老宅子没有翻新，但村民们告诉我，他不是盖不起楼房，而是搬到城里住了。仅我们十队就有一大半的人家在外面买了房子，儿女也都在外地安了家，留在村里的大多数是老年人。

队里的老木匠有好几个儿女，从大船、二船、三船到小桅、小舵什么的，凡是跟船有关的名字都被他起光了。二船与我的年龄相当，也很聪明，对新事物反应很快，曾经帮我做过一个很大的三角架来装配望远镜，我说到哪里他就能做到哪里。但想不到后来还是那个当时正在吃奶的小舵最有出息，转眼就变成了上海的大企业家，还在村子里盖了一栋别墅留给父母住。据说最初安装的是一套中央空调设备，结果一开机就把全村弄得跳闸。于是小舵就对哥哥二船说，那你就把它砸了吧，当废铁卖掉。

在旁边的十一队，我还看到了一栋更大的别墅。我问他们，这算不算是村里的首户。他们说，肯定不算，还有更富的，资产至少都在千万以上。至于其余的小富户就更多了，就像小国子现在做的是铜的生意，在陪我们吃早饭的当儿电话就没断过，一直在抱怨这单生意做亏了，投了一百万竟没赚到什么钱。

当然，大多数农民还是靠打工和种田过日子，在家种田的也基本上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这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而留在家里的人日子只能是一般吧，因为当地的生活水准并不比城里人低。我们看过镇上的农贸市场，里面的菜价、肉价都与南京一模一样。村里人吃的菜除了自己种一些外，大部分是买的。每天都有流动的商贩送菜到村，价格自然又要贵了些，不紧着过不行。

有趣的是现在农村的专业分工很强，不仅种田有专业队伍，就连请客都有专门的厨师班子，锅碗瓢盆都一起带来，在院子里支起个帐篷就开张了。标准也不低，我们这次请了四桌，每桌五百块钱，还不含酒水。据说幸亏我们是节前来办的，如果到了国庆期间就难说了，因为生意实在是忙。我问村民为什么不自己烧，他们笑道，现在谁愿意烧啊。找他们来吃完了连碗都不用洗，多方便。这话一说，我立刻就想到了为什么现在城里钟点工价格上涨的原因。

村里的小学建得挺大的，也很有规模，但现在的问题反而是生源不足。问及原因，并不是因为有孩那个子辍学，而是因为不少孩子都送到外面读书，数量还相当的大。择校的风波已经波及到农村，这是我没想到的。但凡事都有来有往，现在官渡村也从外面来了个大学生村官，是个徐州师院毕业的一个女孩子，今年24岁。小姑娘对我们的到来很感兴趣，陪我们聊了半天。我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吃住都在镇政府，虽然比起城市的生活是苦了些，但我总觉得她们苦得还不够，还缺乏那种与农民朝夕相处、共经风雨的体验。所以我建议她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些细致扎实的社会调查工作。因为农村的生产关系相对简单，了解一个村民小组就能大致把握到当代农村的脉搏。农村的发展空间很大，她们今后施展才华的空间也很大，磨刀误不了砍柴的功夫。小姑娘问我做这些调查有什么具体

的用途。我说这就是你的资源，是你思考问题的基础，你掌握了就会受用一辈子，就如同我们当年插队一样。

在我们的眼里，这个小姑娘显然还只是个孩子，知青的故事对她来说也只是一个久远的传说。我开玩笑地说，你这次见到我们的感觉如何，终于见到活化石了吧。不过事后我们也议论过，其实我们当年插队时才多大啊，最大的才20岁出头。我只有17岁，比小姑娘现在的年龄还要小7岁。比她还要小7岁的我当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又是怎么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敖了八年的。一想到这些事情，往日的辛酸就不禁泛上心头。

大概是因为官渡这个地名比较好的缘故，官渡知青后来的发展都不错，都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就连当时受到错误打击的老彭也入了党，还当上了上市公司的企业老总，所以他这次专程从深圳赶过来酬谢各位乡亲。当然，我要感谢的是这几位老哥。他们都是老高中生，待人接物和言行举止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那篇回忆插队生涯的文章中就曾经说过，每到夜晚，我们就在煤油灯下各看各的书，各补各的课。劳累之余我们也会吹拉弹唱一番，但我们从来不打牌，更不会去偷鸡摸狗，所以村民们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

记得前不久我们公社的一些老知青聚会时，有位女同学说出了当年的一个小秘密。她说，当时全公社的女知青对你们官渡知青的印象都非常好，还偷偷地给你们打过分。但也有人说，打什么分啊，我看只要是官渡的知青今后都能嫁。这真是一个温馨感人的小秘密，但这个秘密涉及到当时的一个禁区，就是知青一旦结了婚就不能回城。所以我在《从山楂树之恋看人性的回归》一文中谈过，知青的爱情问题绝不是像歌曲中唱得那么浪漫，而是一个时刻在考验人的神经的现实问题，它的现实性会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知青们不是需要更多的浪漫爱情，而是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强，需要的是理智。

这次回访官渡的时间很短，原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回南京的，但村里人不答应，一定要留我们吃顿饭。第二天中午镇长、副镇长都赶来送行，村支书还认认真真地照着稿子念了一番感人的话语。不过那天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上车后就随手把相机放进了包里。再等我缓过神来，回头看见还有那么多的村民站在村口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挥手告别时，再想拿相机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我失去了一张本该能抓拍到的珍贵留影。

知青在当年战斗过的田地上留影（中间是老彭，左右是老欧和我）

十队的乡亲们都赶来和我们合影，他们大多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王同元当年是宣传队长，老彭是拉小提琴的，我是吹笛子的。

这就是我们曾经战斗过的田野，估计今年的亩产要达到1200斤。

这就是我当年开过的那种机船，现在还可以重操旧业啊。

够浪漫吧，把时尚的休闲椅都搬到了乡下，前面还有凉亭和亲水长廊。

十一队的别墅简直像个庄园，但还算不上是官渡的首富。

泾口知青再次相聚，中间那个白胡子老者挺吓人的，说明知青真老了。

一条走过青春的路

一条青春时走过的路，几十年萦绕在心中。

青春一去不返，青春的感觉永远留恋。

四十四年后重返关庄清平湾就为的是去再看看那条路。

我在1969年插队时不满18岁，离开陕北时已经28岁。在生产队4年，上美院后又回到陕北，前后十年，清平湾是我们年轻时走过的路，我们的青春留在了那曲曲绕绕的山沟里。

我们村离公社30里地，离县城100里地，平均每小时走十里，到公社三小时，到县城十几个小时（走长了，走累了，就保持不了平均速度了）。记得我第一次单独去公社是插队后的第一个春耕，抡老撅手上打了个里泡，外边看不出来，在里面肿，发炎，整整跳了三天脓，整整三夜没睡着觉，手掌肿得像馒头。第四天我一个人去公社卫生院，手上的炎症引起发烧，晕晕乎乎走过一村又一村，走了十里地才出了岔口，到公社已经是中午。卫生院的大夫

在我的“大馒头”上拉了一刀，憋足了的脓血直冲大夫的胸口喷去。出了脓的手上空出一个大洞，大夫在洞里塞满纱布，嘱咐说每天要把纱布拉出来，换药后再塞进去新的纱布。饭也没吃又往回返，走到岔口天色就晚了，疑神疑鬼，左盼右顾，脚下加速，神经绷得要爆，走最后一段山路四周已是漆黑一团了。

第一次去县城是和队长去开“三干会”，背上铺盖，挎包里装上干粮，早上8点出发，走出岔口，走到公社，直奔下川，沿着清平川的溪流，一会在左边沿着村子走，一会绕到右边挨着山边走，终于出了川道，上了公路还有一二十里地呢。到县城已是晚上8点钟了，两只脚面都从鞋帮里肿了出来。

晴天，阴天，夏日，寒冬，记不得都是为了什么事，记不得沿着清平川走了多少回。史铁生说得对，记忆不准确，留下的是印象，留下的是心情。那时候出门绝没有代步工具，全凭两条腿，一出村就要准备一整天走下去，直走得身体麻木，脚步机械，孤独，迷茫涌在心头。说来奇怪，以后长久地生活在繁闹、拥挤的大城市里，心中挥不去的、常常记起的却是那种孤独感。

我们的汽车开进清平湾，迎头路口上方扯着大红横幅，字没看清，喉头已哽住，一场盛大的回乡行开始了。但我知道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我想重新一个人孤独、迷惘地再走上一回，我要在记忆中搜寻，我要在路口坐下体味，我希望往事全来聚齐，但我预感更可能还是一盆“搅团”。

遇到了我们前楼河村的刘锦水，他当年可是村中小伙儿里的帅哥，我和高中同学段平生还有刘锦水都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刘锦水的哥嫂是我们八个女知青的房东，房东夫妇有一儿一女，女子长得俊，名叫俊英。后来张家河村的知青胡小明娶走了房东的女儿俊英。

——

那年冬天雪下的厚，其他知青都回京过年了，队里就剩下我和林达。从永坪过来个照相的，我们俩邀请俊英与我们一起照一片，在俊英家的院前，背后是女生的窑洞。左边就是俊英，右边是林达，我和林达都显得傻乎乎的，只有俊英坦然。多年后俊英随胡小明去了深圳，现在俊英一个人和孩子留在深圳生活。听刘锦水说我们的房东大婶已去世了，大叔去深圳跟俊英过了。

这是张有关清平湾的照片。左边是岔口大队的知青张五爱，右边是关家庄大队的知青姚建，不知我们三个怎么会一起去除地，之后在清平湾的溪水中洗苹果吃？张五爱后来去了澳大利亚，丈夫是一位洋人帅哥，有一对漂亮的混血儿女。姚建也曾是孙立哲医疗站的干将，现在德国柏林定居。对了，照相的是在文安驿公社插队与习大人同学的八一学校的吴伯梅。

左二是吴伯梅，现在是加拿大华侨。由于曹谷溪的推荐，我们一起被录用到了县文化馆，一个是文字创作员，一个是美工。遥想往昔一群当干部的北京知青在延川县城工作和生活，也曾经上演了一出出浪漫和苦涩的青春剧目。

当年我在清平湾的杨家坪中学代课语文、英语和图画，白树梅是我的学生。是巧合还是轮回？她高中毕业后也留在杨家坪学校教英语和图画。几年后白树梅考上西安美院，现在是延安师范的高级美术老师。十几天前，我接到白树梅的电话说她正在关庄排练秧歌等着迎接我们回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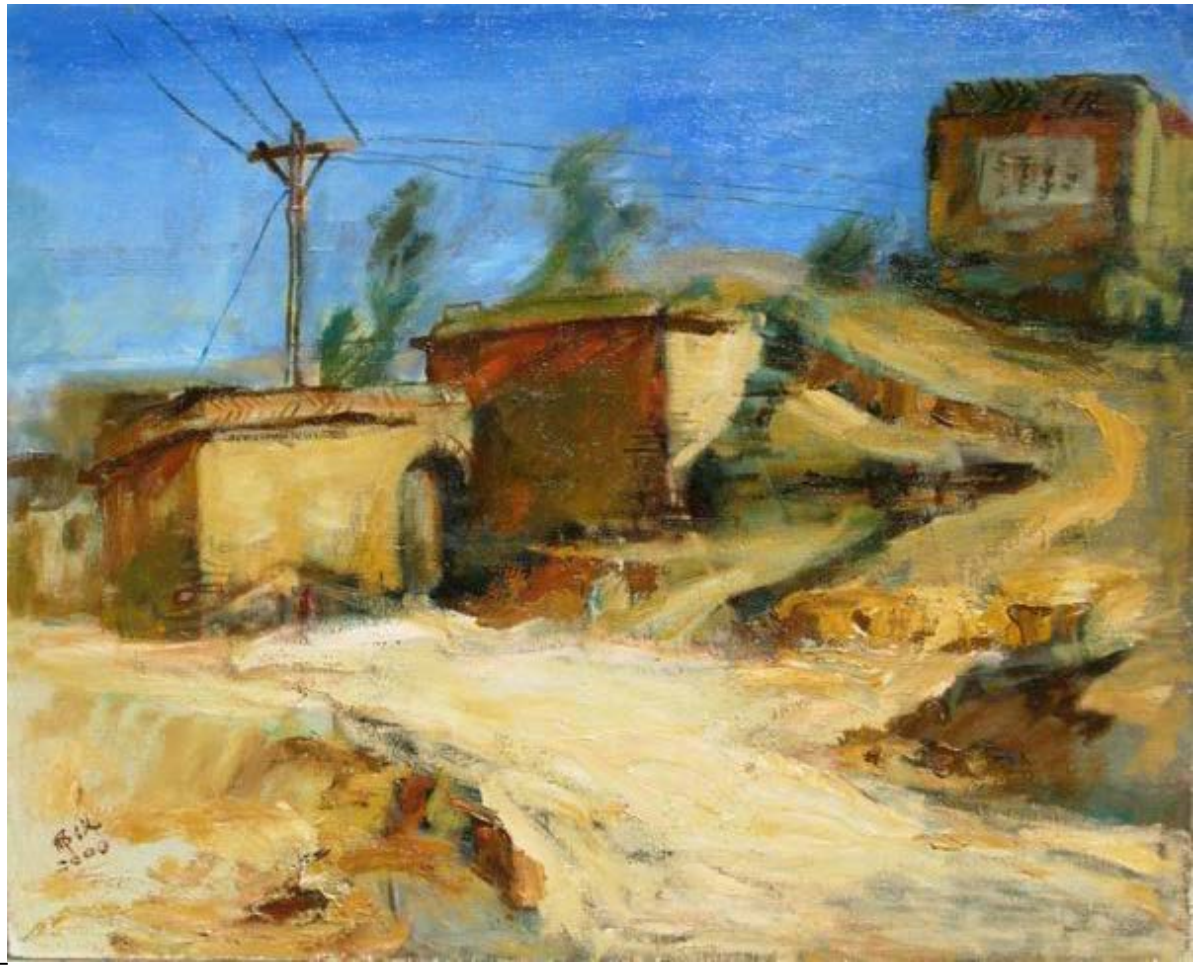
我们班的五个女同学，右起：张沪平、胡静、贾晓军（从加拿大回来），她们三都是关庄大队的，我是关庄公社前楼河大队的，左边的徐大民在山西插队，她已是第二次来延川关庄了，第一次是随李院长来取回史铁生画的箱子。最初我们班的五个女生（这有三位张沪平、胡静、贾晓军，另两位没回来）和孙立哲分在关庄大队，但因为孙立哲太淘，被女生“开除”后入赘十里地外史铁生们的关家庄大队。老黑“趁虚而入”，成为护花人。直到最近老黑还得意地跟我说，你们班这五个女生一个比一个漂亮。每天早上女生们还没起身，老黑已肩挑一担水恭立在窑前，终于赢得胡静的芳心。当年的房东女儿还记得无意中看到老黑给胡静的情书，最后一句是“拥抱你”，这女子

惊诧道：“应该是此致敬礼呀，写错啦！？”

我跟大家说：老耿（我先生）真够“傻冒”，还准备了一个节目练了半天，结果没来成。大家说那就变成女生小合唱吧，反正这个歌大家都会（是我们小学时候的歌）。

我身后这两孔废窑是在鸭巷大队插队的同学魏柯馨的故居，魏柯馨嫁给了他们村里的生产队长。1976年我从西安美院毕业回到延川，约上美院的同学老耿和小候来鸭巷看望魏柯馨，找到她教书的小学校，只见她正跟一群学生娃爬在地上玩羊拐，灰头土脸，一口当地话，要不是她戴着眼镜，真是连我也认她不出啦。魏柯馨把我们请到家里，就是这孔窑。我们三个上炕盘腿靠在铺盖上，逗弄着在炕上乱爬的小娃娃，魏柯馨的婆婆擀面，公公烧火，都是老实的庄稼人，没有什么话与客人搭讪。不一会儿天暗下来，魏柯馨的丈夫扛着犁踏进窑门，只见逆光中进来一

个红脸膛的壮实汉子，其乐融融的一家人。第二天魏柯馨把我们三人送出村，立在捱畔上望着我们走出好远。如今魏柯馨带着丈夫和孩子全家回到北京多年，两孔窑以及窑主人的人生故事都淹没在荒草中。



据曲光和熊朝晨考察，这两孔窑是孙立哲最早的医疗站。（注：孙立哲事迹见下面附文）

这幅油画我画的是当年关家庄的医疗站的入口，从这个小半圆门进去。同是只上了初二的学生，孙立哲竟然敢

给老乡开刀？我们为他这么“二杆子”背后谴责了他多时。当然现在我们以孙立哲为荣，他的赤脚医生经历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从岔口到鸭巷的路上，经指点我找到了杨家坪学校的地址，现在住着油井队，那个土土的乡村中学的痕迹已荡然了，人间世事变得太快，如果连记忆都靠不住，我们凭什么链接前面和未来？我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来寻这旧梦？既然早已在心中留下过印象。但这印象有了证实，我见到了曾一起在杨家坪学校教书，并且住在一个窑洞的杨彩芳。

我们四个都是当年靳之林老师（1976）在延安办美术学习班的同窗战友，曲光和冯大师事迹多多，自不用赘言。曹妍（右二），小名叫“调儿”，她是家中的第三个闺女，父母想要儿子了，给她取名的意思是“调整调整

吧”，结果在她下面就有了三个弟弟。七十年代的调儿，圆圆的脸，耳边各梳一个短刷子，穿着花棉袄和花棉裤，走路蹦蹦跳跳，十分可爱。中央美院的靳尚宜教授带两个学生到延安来写生，看中调儿做模特儿，后来靳先生的名画《陕北女孩》即是。

在美术学习班上，有一天调儿突发奇想，照自己兴趣画了一幅画，忽听见靳尚宜和靳之林两位教授大呼小叫，我赶忙凑过去看，只记得调儿的颜色大红大绿用的很纯。他们激动不已，一个说：“这是梵高的色彩呀！”一个说：“简直把色度提高了八度，天然的协调呀。”他们俩接着感叹，这女子们的色彩感觉就是好，天生的！靳之林先生说，民间艺术家应该是我们这些人的老师啊！调儿在一边不知所措，脸蛋涨的通红，连声说：“我是瞎画的。”

调儿是一个不甘于命运、聪颖好学的女孩子，除了学画画，她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孙立哲巡回医疗队学习班的一员。后来有一年，我还在延川文化馆时，调儿就抓住一个机会，离开陕北闯世界去了。四十年的变迁，多年后再见到调儿，借用孙立哲的话说要“立正”了，真正使我刮目相看：调儿成了一名民营企业家，一个管理着一百多名员工的女厂长。

让我们回过头再读一读靳尚宜教授的画：一个十几岁的陕北女孩，眼睛里满是直直的期待，懵懂的憧憬，坚定的目光显示着不服输的性格，她那少女的脸告诉了我们一切。调儿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离开丈夫后一人带着两个女儿，为生活所迫，学着做生意但又被人骗，要过春节了却身无分文。就这样屡败屡战，调儿不信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调儿的企业从去年起陷入困境，价值一千多万的产品囤积在库里，一百多工人等着发工资。虽如此但调儿还是

要做一件事：今春上在老黑家定下来，一群老知青计划在八月十五返乡回关庄。调儿打算拿出十万元来做这件事。调儿在电话中诚恳地对我说：“知青都六十多岁了，我想让大家回来了了心愿，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我总是把你们知青当作自己的亲人。”我担心地问她的企业状况？调儿语气轻松，说：“还好，东西先放着，我已经转产了，没问题。”为了这次团聚，调儿从西安，延安西面八方叫回来当年村里的朋友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练节目，她把厂子先放一边，自己全身心投入准备工作。调儿的弟弟宝宝（关庄大队书记），自己拿出五十万元新盖了戏台大院。

——

利用最后一天趁着大家都去壶口的时间，我在白树梅家找了颜料和画布，为调儿画了一幅速写。我在我的画布上重新审视着调儿：气质高雅、美丽端庄、知性干练，不变的是眼神中仍满怀着希望和憧憬。

这就是当年的陕北女孩，这就是我们当今的民营企业家，她们有气魄，识大体，利他和奉献，她们更看重人情味和人间之爱。在如今社会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浊气中，他们是清泉，是史铁生的清平湾，是我们来寻找的青春之路。

2012、10、7日

附文：

《孙立哲：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http://hxzq.net/Essay/7199.xml?id=7199

邢仪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5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内蒙

（一）

我从内蒙回来了。不过我们那里是农区，虽然也有大草原，也有马，但一般不骑。

感慨颇多，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天是天，云是云。

我又看到了天垂四野，天边是一带迷迷朦朦灰蓝色山脉的剪影，依希还有些渺渺的村树，天蓝得令人心旷神怡（比照片上拉萨的蓝天浅一些，柔和一些），蓝天上是大块成立体状的、雪白的、白得发亮的白云，这天，这云，是在北京多年没有看见的了。

三十年前，夏天铲地休息时，找一个干燥的垅沟躺下，仰面看到的就是这天，这云，同时心里自然而然地就会响起：

白云遮不住红太阳，狂风吹不散蓝天。

我们奔驰在草原上，心中把北京怀念。

啊哈嗬咿……

高山紧贴着蓝天，草原和北京紧相连。

这个歌的旋律，并不是在意这个词，根本就没有经过大脑，也许是这旋律与这种景色很配，于是歌就自己从心里流出来了。

广阔无边的蓝天上，成团成团巨大的白云，层层叠叠，一会儿象怒涛；一会儿象山脉；一会儿变成一只巨大的怪兽；一会儿又化为两只并虎视眈眈的对峙着；一会儿又成为一艘可怕的、横贯天空的怪模怪样的巡洋舰……。看到最后，我竟觉得这白云十分狰狞，不敢看了。

现在想想，那时在我整个生活中，也响着一支主旋律，虽然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这回是只在意它的词，而不在意它的旋律了。

如今又看到蓝天上巨大的幻化着的白云，觉得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在蓝天白云下照了一张像，可惜我的相机不够专业，照出来只是灰白色的一片。

晚上，又看到了满天繁星！明亮硕大的北斗挂在树梢，群星灿烂，“深蓝色的天空中，星星们在跳着圆舞”。天似乎很低，星星离得格外近，伸手就可摘到似的，而且每一颗星都水灵灵的亮，记起看过的一位朝鲜诗人（似乎是）的一句诗：天青星欲滴。当时想，要是真有机器猫该多好，我让它变出那个能把这星空吸进去的机器，吸进去，带回家来看。

在老乡家，我们指明要吃苞米碴子，老乡家也不吃了，要吃也要去买了。这里特有的大扁豆，又面又好吃，是从后面园子里摘的；菲菜，细细的，是从园子里割的；黄瓜，又短又粗，又脆又甜，是从园子里摘的；紫色的茄子，也是从园子里摘的；一碰就掉皮的土豆，这里的特产，又面又甜，是从园子里刚刨出来的；小鱼，虽然只有一揸长，也是从草甸子上的浅河沟里打的。

有时我常想，我前生肯定是农人，我喜欢土楼，木屋；喜欢篱笆，短墙；喜欢草叶上的露珠，篱笆上的牵牛花；喜欢墙上的小窗，屋后的绿树；喜欢树叶时时探进我的小窗。但绝不能是泥潭一样的院子，院里应是洁净的细砂。

唉，不说了，下次再说。

（二）

这次去内蒙，我们是一行四人，三女一男。那位男士十分细心，从查找车次到订票买票，他一人包办，我们就等着到时候在车站前聚齐。

如今车次多了，本着在路上尽量节省时间和避免夜间出发、到站的原则，经过筛选，他选定了从北京至齐齐哈尔的1301次，这车早9：52发车，次日晨7：05到齐市，接着8：28就有一趟2061次经过，开往讷（ne）河，早十一点左右就能到讷河。这么科学的安排，听着真让人高兴，美中不足是没有空调。

7月17日，按时到达，按时出发。候车室里人们大包小包，挤得水泄不通，这情形与三十年前没多大变化，体现了普通老百姓出门的艰辛。预报今天是三十五度的高温，此时已显出它的威力，车厢里热气蒸腾，我们是卧铺，两个中，两个下。上铺是一个小伙子，南开的大学生，因为天津买不到卧铺，他就到北京来买，到了天津又上来三、四个同学，分别在另外几个格里。他们全是海拉尔的，怎么全都齐刷刷考到了南开？和他们聊了几句，大致知道是交了一些钱。

中午，大家说睡一下。我要了中铺，咬牙躺下，后背象火烧一样，都不敢挨铺，只好尽量侧身躺着，全身热得如汤煮，真可怕！车过锦州，天才开始有了些凉意，晚上比较舒服了。

7月18日7：30到齐齐哈尔，晚点二十多分钟。原以为还要出站去买票，没想到站里就有个售票亭，八点钟正

常卖票，真是太方便了。想想三十年前的艰辛……唉，毕竟三十年了！在早晨清凉的空气中，我们愉快地在售票亭边等着。2061次正点进站，等着上车的人很多，也是大包小包的。我紧张地问：怎么办？咱们挤不挤？回答说：当然挤，要不然三、四个小时站着呀。我最怕挤车了，可此时已由不得我怕不怕了，已经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人群之中。我们每人也都提着两、三个包呢，这种感觉又象是三十年前了，没办法，只好拚命挤了。总算都有了座位，环顾四周，所有上来的人都有座。只是后来中途上来，坐一、两站的人有几个站着的，还是车次多了。

十一点左右到了讷河，当年这里只一间肮脏的破仓库似的候车室，如今一排高大漂亮的白色建筑，候车室宽敞明亮，最让人高兴的是到处都十分干净。一出站，居然像热点旅游城市那样围上来许多人招览生意，让我们坐车。抬眼看去，站前停满了“中面包”、“小面包”和小卧车，还有各种推车做生意的，热热闹闹的。

讷河与莫旗分属黑龙江与内蒙，以嫩江为界。从讷河到江边大约有六、七十里，过了江还要走二、三里地才到莫旗，从旗里到我们所在村又有二、三十里。以前，从讷河一下火车，我们就陷入了困境。那时，车站前是一条土路，两边有些杂树，十分荒凉，到江边的车一天只来回一趟，我们到时已没有车了。只好拦顺路到江边的卡车，拦不到就要在讷河镇里住一晚。江上没有桥，只有一条大渡船，等船上装满了人、牛车、马车、卡车、汽车……，就慢慢开过去。常常是到了江边大船刚走，那么就要坐在江边等上两个多小时它才过来。过了江，到旗里的那二、三里路，若是没有搭上便车，就自己扛着东西走。在旗里，若正好能碰上自己村的马车，那简直是万幸，其次，若是能找到周围村的马车，带一段，也算是幸运的了，但常常是哪儿的马车也碰不上，还是要靠自己的两条腿。所以那时候，北京到讷河的几千里地我们不发愁，而从讷河到村里的这一百多里路却被我们视为畏途。

没想到如今已经这么方便了，真是又惊又喜。这喜一方面是为行路不再难，另一方面，面对这种变化，就像是看到自己一个破破烂烂的家变好了一样，从心里感到高兴。就连对那些围上来兜览生意的人，都觉得很亲切，有话没话都要停下来说两句。不像在别的城市，看到围上来的人，只觉得像是四面围过来的墙，只想快快地躲开。这样的一种感情，是来这里之前，甚至是走出这个车站之前自己都不曾觉察到的。其实，这里留给我们的，只有困顿和磨难，但是随着这些苦难，我们的时间与生命也留在了这里。在那已经遥远了的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们与这里互相属于，互相见证，生命留在了这里（不管它是苦是甜），感情自然也就留在了这里。这样说，绝不是矫情和故做姿态。想想如今有些指斥我们这一代人的，什么“既然你们那么怀念插队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回到北京来？”之类的话，实在觉得他们的生命缺少过程，缺少磨难。当然人活着，谁也不愿意去追求苦难，但是没有经过磨难的生命，肯定是轻飘飘的。我想，被沉重的岁月之河打磨过以后，也许这些人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这里也没有忘记我们，出了站刚一开口说话，就有人问：你们是北京知识青年吧？在旗里买东西问价，刚一开口，那位大嫂就笑盈盈抬起脸问：你们是北京知识青年吧？问得我们又感动，又感慨，都三十年了，还“青年”呢！在村子里也是一样，那些儿孙后辈根本不认识我们，可只要一提我们的名字，他们马上喜笑颜开，说，“知道，知道，听我爸说过”，或是“听我妈说过”。村里人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脾气禀性，我们说过的话，我们做过的事，有些，是我们自己都忘记了的，可至今他们说起来还是如数家珍。看来，我们已经走入了他们的传

奇。

那位男同胞领着我们在车群中间转来转去，这些车中，有黑龙江牌照的只开到江边，不愿过江。过江一来一回要收过江费不说，过江后是内蒙地界，对他们处处会有不便。虽然他们一再保证，江那边有许多车等着，但我们当然还是不愿坐这种车；有中巴倒是内蒙的，可以直到旗里，但看了看坐得很挤，又热，肯定不舒服，也不想坐；人家追着我们问，那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我们三位女士也说不出想要什么样的，那位男同胞十分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们四人要一辆小车，直到旗里。这里把小车叫做“轿子”，我们一出站就有好多人问：要不要轿子？我想：轿子？两人抬着的？走七、八十里？这也太过份了吧。还四处张望半天呢。

最后，找到一个小伙子的车，可以直到旗里，我们问能不能直接开到村里，他说可以。这真是太好了。这里不按里程而是按人头收钱，可是似乎也考虑到里程，还很复杂。听他一个人念念有辞地在那里算了半天，最后说一共要73元。我们的代言人说：

“你也别73元了，就75元吧。”说完提着几个包走到车后。

那小伙子可能从没听过这么划价的，一时没反应过来，楞了一下，才赶忙说：行，行。于是跑到车后打开后箱盖，把我们的东西放进去。

一上路，我们就掉进了绿色的海，一望无际的绿色，直到天边。高高的头顶，碧蓝的天空发着蓝色的光，笼罩着我们。路两边是两排高高的白杨，我们的车伏俯在绿荫下，愉快地开着。

一开始路面还可以，很平稳。可是很快就颠簸得厉害，有好几次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底盘被硬物狠狠地刮擦着，我们都替他心疼，一再劝他开慢点儿，但他满不在乎。小伙子很建谈，告诉我们，他初中毕业，不愿上学了，就买了这辆二手车，已经两、三年了。再开一年就把它卖了，买辆新的。这是一辆很旧的桑塔纳，就冲他这么开，再开一年？那到时候还不散架了？我问，这么旧的车还能再卖？他说能。小伙子开车技术确实不错，有时路面完全不能走了，他就熟练地从旁边没有路的地方绕过去。过一个水渠，上面架着窄窄的圆木，对面的车一点一点小心亦亦地开过来，我们的车轻而易举地就过去了。从旗里到村里的路更不好走，可以看出完全没有人维护，一个一个大坑，有的坑里还有旁边田里浇地的积水，我们的车，忽地一下就从泥潭里冲了过去，溅了满窗的泥点。我不禁感叹，都说环境造就人，看来环境也造就物。这样的路况，这样的开法，在北京这车早完了，可现在我坐在车里，虽然对于车是个外行，但是听声音没什么毛病，看它在这样坑坑涯涯的路上跑得还很轻快，真是够“皮实”的，也真是一辆命苦的车哇！

你看哪，这匹可怜地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

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三）

嫩江水依然是那么有些野性地、浩荡地流着，江面上水气迷朦，江水浑浊，不像以前那么清澈了。对岸，一带青山迎江而立。这山并不高峻，只是舒缓地伸展着，远远望去，其中展开一片高高低低的楼房，俨然一个现代化都市。这是莫旗？我们大吃一惊，前些年，也听说莫旗大变样了，可再也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气象。

当年，整个莫旗没有一栋楼房，唯一高大的，就是象一间厂房一样的电影院。只有一条正式的街道。旗里所有的行政机关，邮局、商店，小饭馆，医院……，总之，组成一个市镇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这条街上。记得有一回我们起了个大早，要赶到旗里办事。走二十多里赶到时，正是旗里各机关单位刚刚上班，早请示，在跳“忠”字舞。人们站满了整整一个街筒子，手举红宝书，随着高音喇叭里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转圈、跳跃。我们穿行其中，头上是一片舞动着的手臂的森林，脚下还要时时小心不要被他们伸腿转圈时踢着。于是我们在旁边找了一个台阶先坐下，与四乡早来的农民一起，看着他们跳完。感觉上整个莫旗都在我们面前随着那进行曲的节奏，严肃认真地跳跃着，留下了一个十分强烈怪异的印象。

如今，这里高楼林立，房屋成群，已经成了一个足可以使我们迷失在其中的现代化市镇。原来一条街的小镇，连影子都没了，我们完全失去了记忆的坐标。通体蓝色玻璃、漂亮气派的商业大厦，有希腊式大圆柱的高大庄严的博物馆，这些肯定是旗里的象征和骄傲；但看到那些蓬蓬勃勃簇拥着的各种小摊小店，卖日用杂物，卖水果、蔬菜，美容、美发、纹眉纹眼线，小饭馆，成衣店，音象店，电器维修店，等等，我心里更高兴。不过，长途汽车站里的“收费厕所”，两个木板坑，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脏得要命，照样收费三毛------别管内容怎样，一律形式上找齐-------这点，可真是全国统一啊。

车近村了，以前，远远地看见的是一片房屋，如今，先看见的是一片树木，房屋似乎都萎顿在树木之中了------屋旧了，人老了，树木长高了------这就是离别三十年之后，我们回到村里的第一个印象。

两排房屋中间一条土路，从东到西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依次排开，这就是我们的村子。虽然房屋挨着房屋，从表面上根本无法区分，但四个队从行政到生产都是互相独立、完全分开的。我们是一队，最穷。当年刚一来时，我们就知道这点了。我们问，为什么咱们队最穷呢？队长回答得很干脆：那是，咱们队要不穷，也不能要你们。队长的回答，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不过很快我们就听说，队长愿意要我们，是因为随着我们每个人，有一笔安家费（大概是每人250元，一个很可笑的数字）拨下来。但知道了后，我们仍不明白，安家费是给我们用的，与队里有什么关系呢？

三十年的时间，旗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之下，我们的小村似乎被扔到了时间之外。我们的一队依然最穷，房屋大多低矮破旧，房沿只到我下巴，似乎很快就会坍塌，又复归为一滩泥土。以前绝不是这样的，也许三十年间，它们陷下去一截？窗台的木纹纵横交错，那深深的纹路里积着三十年前的尘土。相比之下，那三个队的气象就不一样，虽然也是泥墙草顶，但是泥墙平整，院落干净，房顶上的苫房草铺得平整利落，给人一种勤奋、自持、自满自得的感觉。

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也许我们队的人信奉的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的原则？最先让我们注意到的是每家都有了彩电。其次，不管走进哪家，院子里总有手扶拖拉机、或打谷机、脱粒机之类的机械。三十年前，村里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玩，总有活儿在等着他们。从抱孩子（那时似乎每家的孩子，只要长到会走路，抱得动东西了，下面就总有一个更小的孩子在等着他们抱），到抱柴禾，挖猪菜，剁猪食，喂猪，然后，再大一些就是跟着大人到队里挣工分。那时上学的孩子不多，即使有上学的，回家来仍然要干活儿。如今，傍晚的村路两边，坐着许多孩子，从四、五岁的，到半大的姑娘、小子，闲聊，玩耍，一派悠闲景象。

村里从八几年开始分了地，按当时的人口，每人九亩，直到现在，无论人口增减，都不再动。地里大多种的是土豆、黄豆、水稻，几乎没有种玉米的了。当年满眼都是青纱帐（这是一个多么著名的词啊），现在已经看不见了。谁不知道大米好吃呢，可是大米产量低，当时不让种。为了能给各家分一点大米过年吃，队里偷偷在远远的草甸子上种了很少的一片地。开春，稻田里还有冰棱，就由队里的青壮年，一人怀里揣一个酒壶，用兜子装一兜稻种，走进田里，喝一口酒，撒一把稻种，喝一口酒，撒一把稻种。当时队里没钱，那酒，是用酒精兑的，为了好喝一点，队长问我们要了些白糖，放进酒里，唉，那个年月啊！当时我们说，这酒不能喝，对身体不好。他们说，没事，全靠它顶着呢，要不水太凉，人扛不住。我们说，稻子不能这么种，要插秧。可没人理我们。如今，小何家在南大岗种了大片的水稻，我们问，水稻怎么种的？他带着些歉意说，就像你们说的，插秧。我们问，南大岗子地势高，哪儿的水？他抬手指指四周说，那不，你们挖的水渠。这里是嫩江河套，有许多小支流，只要挖了渠，就能把水引进来。当年公社组织水利大汇战，村里以我们为主去挖渠。那时，白天一律要在队里干农活，晚上才去挖，挑灯夜战。我们白天黑夜连轴转，腰疼得直不起来，肩膀磨被了，人累晕了。但是，现在听他这一说，我们还真有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得意与欣慰。

小何的一个女儿，当年与外队的一个北京知青结了婚，去了北京，听说现在在前门一带卖服装。若是在南方，一村有这么一个人，就可以一个连一个，把人带出去一大串。可这里，人们对这事很淡漠，也很隔膜，说起她，似乎就像说一个去了外星球的人一样。

建军比我们小个一、二岁，如今已经有六、七个孩子了，几个儿子高高大大，他全笼在家里。在他家吃饭时，我们热心地劝他：让孩子到北京闯闯去。一开始，他不说话，后来他说，行，你们要能帮上忙，我想让他到北京去干个保安什么的。听他这一说，我们一下子顿住了，倒不是不愿帮忙，而是他的话使我们猛然醒悟：他完全不在状态，他，以及这里所有的人，离“到北京闯闯”这种状态，还差得太远。这里毕竟不是南方。再说，北京缺保安吗？“到北京闯闯”，这话我们说得多轻易啊，可能因为这一路我们走得太顺了，再加上饭桌上几杯啤酒，我们这话也就顺着出来了。可对于他们，难道就是打张车票上车这么简单的事？就算是当上了保安，难道这么高大壮实的小伙子，到北京当个保安就算是达到目的了？这么一想，我们也有些糊涂了。

其实，这里有大片绿色的土地，相对来说还是地多人少。因此，这里的人，没一个到城里去打工的。人们似乎更眷恋土地，村子里也有很多人出去打工，但他们的眼睛都看着北方，他们都往更北边走，去给人家开荒种地。

这里蓝天绿野，空气清澄，完全可以握紧“绿色环保”这张王牌。这里有一种啤酒，是“巴特罕”牌的，与北京的“燕京”不相上下，甚至口感更好。这些，都是巨大的财富，守着这一切，难道还要到城里去打工吗？可如果仅仅是“守着”，它们是永远也无法变成财富的。那么，从“这一切”到“财富”之间，到底有没有路，这路有多长，到底能不能走通？这问题，是连我们这些热心的出谋划策的人也回答不出的了。

（四）

建军是一个很能交际、按这里的话，就是很能蹦达的人。我们走的那年调到了大队，后来又回来当了队长。听说他当队长期间把村（也就是一队）里祸害的够呛，把人心都搅散了。村里很多人家都走了，当然有的是迁往北边更富裕的加格达奇或林场等地，有的纯粹就是在村里待不下去了。

不过建军“主政”期间也干了一件大事，他领着村里人把这条路修好了。原来这条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别说马车走不了，就连人走都拔不出腿。如今铺了砂石，再也不怕了。但也正因为修了路，就贪了污，97年的时候被抓起来判了刑。听说如今还是“保外就医”呢。我们村里的李家，原来是大队干部，听说后来到别的大队当大队长，为人霸道，贪污，被村里老百姓告到旗里，判了刑，保外就医期间，他又打击报复，于是又被抓起来，刑期延长。听了这些，我们有些新奇的感觉：其一，原来这里这么明镜高悬、毫发不爽的？其二，这里的“抓起来”、“判刑”听他们说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与我们头脑中那种“惩罚”、“罪犯”的沉重概念相去甚远。在这里，这似乎只是官府的一种调济，是对老百姓的一种平衡。

比如建军，依旧是爱说爱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兄弟姐妹七、八个，他老大，兄弟们大多在村里成了亲，如今这队里，基本就是他们家族姻亲。我们的车一进村，首先看见的就是他家的几个儿子，村里唯一的一个小卖部，也是他家开的。我们当然也一下就落入了他家的包围之中，他随手就在脚边抓一只鸡杀了。听他说话很有意思，说起一个得脑膜炎去世的人，他说：那时得这病，干脆就是等死，哪象现在呀，得了这病，轻松加愉快，没事儿。听得我们大笑，得脑膜炎还轻松加愉快？他很正经的说，那是，现在有药呀，还怕啥？

吃完饭，建军说，走，去看看你们的房子。这真是我们最想看的。我们的房子，当时是用最好的木头搭的架子，尤其那根大梁，是一整根粗粗的松木。我们走后，很多人想买我们的房子，最后是大队的一个干部买走了。扒了土坯，换成了红砖。如今当然是面目全非了。建军指着房前园子周围浅浅的一道沟说，这不，这是你们挖的。又指着园角一株七扭八歪的榆树说，这是你们当年种的，在这儿照张像吧。这时，我们真是感谢建军。

当年我们不会编篱笆，于是就在园子周围挖了一道沟，也挖不深，就浅浅的。老乡家都在这宝贵的一点地方种菜，我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十八棵小松树苗，郑重其事地栽进园里，象征我们十八个人象十八棵青松，扎根在这里。可是松树很快就死了，后来也不知谁弄来一棵榆树，种在了园角。

这里的冬天，天亮得很晚，黑得很早。那时一到冬天，队里就做粉条，土豆粉的，很好吃。干活儿的人中午

就可以在队里吃粉条，算是一顿饭。我们不干活儿，也去吃，队里也不管，其实也没什么活儿，就是搓苞米。有一天天实在太冷，我们觉得我们刚起来，队里就敲钟吃饭了。吃完粉条，我们不想干活儿，又回来昏昏欲睡地躺在炕上。小敏出去上厕所，一出门，她忽然惊叫起来：

“快来看呀，两个太阳！”

我们全跑出去，果然，房屋两边，离地一竿多高的天上，一边一个，又红又圆、一模一样的圆球。这一下我们可炸窝了。

“怎么两个太阳？太奇怪了！”

“不对，东边是太阳，西边是月亮。”

“不对呀，咱们都吃完中饭了，怎么太阳还在东边？”

“对呀，那太阳应该是在西边呀，那东边这是什么？”

“东边是月亮呀！”

“谁说的！现在才几点呀，再说月亮怎么会跑到东边去了？”

“月亮怎么不在东边呀，月亮是从东边升起来的。”

“谁说月亮是从东边升起来的？月亮是从西边升起来的。”

这一下我们全糊涂了：月亮到底是从哪边升起来的？

想想吧，我们都是高中生或初中生，我们有知识，我们都学过地理，可是此时，我们却在为月亮是从哪边升起来的争论不休。

那个冬天的下午，我们象一群原始人，我们心中甚至也体会到了原始人对天象的那种恐惧和崇拜，也感觉到了“蒙昧”像一个巨大的怪兽，在旁边窥视着我们。从此，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使我害怕。

这次我们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在嫩江边照一张像。那时，嫩江在我们的生活中太重要了。夏天它泛滥了，我们无法过江；初冬，它要封江了，我们不能过江；开春，它要开江了，我们不能过江。它时时限制着我们的行动，它是一道天堑，横梗在我们与世界中间。可是如今江上已搭了浮桥，我们的车就是从这桥上轻快地开过的，几年以后，就会有一座大坝出现在江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兴奋，忘了照像，回去时赶火车，来不及照相，唉，等以后吧，几年后，大坝修好，我们还会来的。

2001-08-04

呼伦河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2

在以上工业2连打火队伍的牺牲者中，党员有马玉兰、刘文、郑秀荣（追认），团员有王立荣、史丽露、潘纹宣、薛克平、傅强（追认）。为信仰“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是她（他）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并身体力行的口号。

采访“11.7”打火中负伤的副指导员王玉彩

作者：朱维毅　选自【生命中的兵团】

大火能改变人的容貌，却不能贬损人的价值。当年的副指导员王玉彩（左）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红在边疆”的字样，如今的残疾人王玉彩（右）退休后一直在为社区的卫生和治安忙碌。人如其名，王玉彩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的人生折射出玉石般的光彩。

通过孙淑婉的介绍，我见到了曾在“11·7”打火中负伤的原35团工业2连的副指导员王玉彩。拿孙淑婉的老照片和现在的形象对比，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人。但王玉彩在老照片中留下的那个丰满俊俏的知青副指导员的形象，和我眼前这个脸上布满伤痕，身体瘦弱，头发灰白的老者很难重叠为一个人。但在和她的交谈中，我又能依稀看到这位当年知青干部的风采。她待人诚恳，头脑清晰，语言流畅，在我参加过的两次“11·7”死者家属的聚会活动中，她的讲话有板有眼，很有一点儿当年组织连队学习时的劲头。而她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讲到“11·7”事件的时代背景时，她会说“当年我们满怀革命理想，响应国家的上山下乡号召，奔赴边疆履行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

她出生于1948年12月，下乡前是北京八宝山中学的66届初中生，是个“老初三”。她说：“我是1968年6月13日从北京出发下乡的，和孙淑婉坐的是同一趟专列，但当时我们彼此还不认识。在1970年11月7日打火被烧之前，我一直没有回北京探过家，再回家时我已经是面目全非了。1976年10月5日，我和淑婉又乘坐同一列火车告别了北大荒，团参谋长董云龙送我们到虎林车站，后勤处的于协理员和政治处的张干事陪我们回到北京。那场大火让我和淑婉的战友关系又增加了一层含义，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工业2连所在地是和平农场的老场部，我们是团里的加工厂，管磨面、磨油、烧酒，还做酱油、饼干什么的。我们和团部机关的人都属于二线人员，打火的知识本来就少。

“着火那天，我们正在开排以上干部会议，连部文书马玉兰跑进来说，团里来电话说1连跑荒了，要我们连组织一个男兵排去扑火。那是她最后一次传达上级指示，她在当晚就牺牲了。

“一听说要打火，知青们都想去，男男女女都往车上爬，直到把那辆车塞得满满的。我是副指导员、党员、团支部书记，知青有行动我当然得上。走的时候我戴上了帽子，所以后来没有把头发烧光。当时我奶奶已病危，如果家里给我拍个电报，我肯定会回北京和奶奶告别，那样就不会被烧了。但我父母知道我在兵团是连队干部，他们为我的工作着想，没告诉我关于奶奶的事。我在 11 月 7 日被烧伤，奶奶在 11 月 13 日去世。

“我这人容易饿，走之前拿上了一块发糕，在去火场的路上，我还把发糕分给大家吃。那时的人遇到危险抢着上，不图名不图利的。去火场有 40 多里路，大家一路上不停地唱歌。

“到火场后，团里来的指挥员没有让女的上，但男生刚一动，女生也跟着上了，当时讲‘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团部机关的几个女生一带头，其他人都冲向火场。我拦也不好拦，就跟着上去了。远远地我就看见有小鸟在大火上飞，飞着飞着就掉到了火里，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先到的人开始烧火道，但点火的地点离大火太近了，火道的火刚点起来，大火就到了，两股火合为一处，产生的气浪形成了强大的风势，好几米高的火头向我们扑过来。我一看情况不好，大喊一声：‘不要撤，迎着火跑出去！’这时火就到了，我被大火吞没了，我想冲过大火，但是被塔头墩绊倒了，就这样被烧到了。等大火过去以后，我看见了焦鲁艺、孙淑婉和任艳梅。她们和我一样，都没有顺着火的走向跑，而是让大火从身上烧了过去。

“我的脸和手都烧坏了，两片手皮滑落下来，像手套一样挂着。我记得是3连的两个男知青背着我走的，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但腿和脚没有烧伤，我觉得自己还能走路，直说不用他们背。到现在我还从心里感谢这两个兄弟，就是不知道他们是谁。到团部医院时我还有知觉，能听见声音，就是看不见人，但以后就昏迷了，别人怎么把我送到佳木斯224医院的，我都不知道。两天两夜之后，我在别人给我剃头时醒了过来，我拒绝剪掉我的头发，对方说，必须要剪，不然容易感染。

“在住院期间，有现役干部和我们聊天，肯定我们的表现，说不打火，就怕烧到连队、

森林和国界。兵团的颜文斌副司令员到病房慰问，还告诉我们说，周恩来总理下令要全力抢救，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听说为这件事还搞了三次全国电话会诊。

“我父母接到35团的通知后，在北京给兵团打了一夜的长途电话，怎么也叫不通。他们和其他家长先后赶到兵团。兵团先安排他们看了刘英俊烈士墓，又做了一番工作，然后才带他们来看我。

“我看到父亲的头发都白了，可在我两年前离开北京时他还是一头黑发啊。两位老人一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我也想哭，但强忍住了眼泪，因为我的面部被烧坏了，眼泪流出来会造成创伤感染。现在的人不讲思想觉悟了，可那时像我父亲这样的老钢铁工人真是有觉悟，他心里清清楚楚的：女儿这一辈子给毁了，但他没有向兵团发一句怨言。

“我接受的治疗方式是最痛苦的。每次换药揭纱布，创口都要被撕开，疼得钻心啊。我只能反复背诵毛主席语录，用这种方法忍受疼痛，总之不能让自己喊出来。

“224医院烧伤科医生根据我们被烧伤的程度和创面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对牛淑凤采取的是切夹法，把坏死的皮肉都切除掉，植上新皮。对我采取的是脱夹法。每天把我的双手泡在盐水里，用剪子将烧焦的皮肉剪下来，因为血痂很坚硬，每换一次药要换几把剪子和镊子。在我疼得呼吸变得急促时，医生会停下来让我透一下气。因为每四小时要打一次青霉素，最后臀部已经没有了插针的地方。大家过了休克感染关以后是植皮，从大腿和小腿上取皮，分别植到手上和脸上。

“在治疗期间，医院一直不给我镜子照，我只能在护士和我面对面时，从她双眼的瞳孔里看看自己的样子，这种观察只能看到一个大概，我觉得自己的样子还行。等到我伤愈后才第一次拿起镜子，当时我的心都碎了。一个女孩子的容貌被毁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面对未来的生活啊？但我没有了其他选择，生活的道路我还要往下走。

“我住了两个多月医院。北大荒的医院只能救命，对功能的恢复和整形都无能为力。出院不久我回家探亲了，在北京到处求医。告别家乡近三年了，走的时候青春焕发，回

来时已经是满脸满手的伤痕，头发也开始脱落。认识我的人都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烧成这个样子？同时我也察觉别人和我的距离在拉大。我再也谈不上爱美了，每天不愿意出门。在必须求医时，我把帽子和口罩全部戴上，就连大夏天也是这样。1970年10月我在北大医院接受了整形手术，面部的样子稍好了一些，但左手的小手指留下了终身残疾。兵团对我挺好的，我在北京看病期间，那边照开工资，每月还给我寄来 60 斤全国粮票，又给我报销医疗费。

“1972年3月，我重返北大荒，还干我的副指导员工作。后来知青逐渐开始返城了，1973年团部派人到北京，和市劳动局、石景山劳动局、知青办、伤残人员及家属协商办理我们返城的事。1975年，35团和石景山区政府共同把我的情况定为三级残疾。1976年10月我按照病退的情况回到了北京。

“‘11·7’之前我哪里会想到自己这一生会和残疾人连在一起啊。我的生活因为那场大火彻底改变了，周边异样的眼光伴随了我40多年，从当姑娘的岁数一直到现在。有一次我在我姐姐住的筒子楼的楼道里帮她做饭，一个小女孩上楼来看见了我，吓得扑向了她的母亲，当时我的心里那个难受啊，以后就尽量不出门了。

“我是首钢工人的子女，返城后，首钢招收了我，让我看仓库，这样可以少接触别人。慢慢地，别的知青战友陆续成家了，但是我不能。有一些好心人想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拒绝了，我就够不幸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会在一个承受着异样眼光的家庭里长大，我不忍心。在我31岁的时候，我父亲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他在3年前做了左肺的全切术，身体也不健全。我们相互之间有同情和理解，决定走到一起。（我们）在1979年结了婚。他对我很好，出门走路时只要看到别人对我指指点点，他都和人家不干。但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他所在的那家集体企业倒闭了。以他的身体条件再找工作不容易，为了家庭生计，他开始自谋职业，摆地摊卖过西瓜，后来又到山西去给人放羊，1996年大年初三，他因为一场重感冒病故了。他走后，我独自把孩子抚养成人。

“‘11·7’大火之后的日子，我不是过过来的，是熬过来的。我们伤者虽然不幸，但我们毕竟看到了社会的发展，知道冰箱是什么样的，空调是什么样的。而那些死去的战友呢？她们的人生之梦永远停在了‘11·7’。和埋在北大荒的这些战友相比，我知足了。

“北大荒和知青战友都没有忘记我，社会上也常有一些好心人在听说了我们的事情后伸出援手帮助我们。去年过春节时，我们几个在北京的伤残战友坐在一起专门商量了一次，大家都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去了，不能再给战友和好心的人添麻烦了，我们决定：此后不再接受任何捐赠。真的，我现在生活好多了，孩子长大了已经自己挣钱，我现在想吃鱼就能买。

“40多年来，生活上的一切挫折和艰辛我都能克服，我不怕苦。从兵团回来的人有几个怕苦的？让我难以忍受的，是社会和我的距离。当我自己残疾之后，我才知道一个残疾人多么不容易，多么需要常人的理解。对我们来说，还多了一层对我们付出的理解。说到‘11·7’打火的出发点，我不能说自己境界有多高，但肯定是好的，我们的付出不能说就是值得的，但是可贵的。无论那次扑火的理由和组织多么不合理，我们是命令的执行者，想的是大局，为的是国家。

“我在兵团当连队干部的时候，左右自己行为的基本意识就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先，否则你凭什么当干部？有什么资格管别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种付出确实不值得，但我为自己的人格骄傲，那就是为整体、为公益、为他人，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抛除一己之利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如果人们一直能以这样的态度做事待人，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不会变得像今天这样糟糕。

“所以，我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的态度。退休之后，我一直在社区做义工，有时搞搞卫生，有时做安全巡视员，我觉得这是我的价值底线，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回报。儿子是我独自拉扯大的，作为残疾人的孩子，他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当然也就理解母亲是怎

么想的。他从来没觉得我做义工有什么不好，相反，他为有一个坚强的母亲感到荣耀。但是他说，如果他遇到‘11·7’大火这样的情况，他不会像我那样做了，他会首先保护好自己。”

11.7大火受伤者王玉彩、仝幼华参加《生命中的兵团》新书发布会

文章来源：《生命中的兵团》 作者：朱维毅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二十三年草原人

晓鸣

按：本文作者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现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学生。文革前，师大女附中是北京最重要的“贵族学校”，是“皇亲国戚”公主们的聚集地。本文作者5岁就开始学钢琴。本文转载于原内蒙古北京知青马悲鸣先生编辑的《周末文刊》2016年第36期。

1968年8月，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从最基本的骑马放羊开始，学会了牧民的所有劳动技能。在大队生活了八年後，入读锡盟卫校，两年後回到牧区，从乡卫生院医生、卫生院院长到旗计生委主任，又待了十几年。因为我在牧区嫁了一个蒙古族牧民，插队二十三年後，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举家返回北京。

当初插队时，我是自告奋勇去的：经历了两年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经厌倦了无休无止的运动，既然上学无望，就去保卫边疆吧。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经历了五六天火车-汽车-大车（四匹马拉的）和牛车的一路颠簸，我们六个同年级的女孩，来到×旗×公社×大队，在蒙古包开始了“新生活”。

我们的大队是纯牧区，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共约13个浩特（属于生产小组，每个浩特放牧一群牛、一群羊，有2-5户不等的人家，羊倌和牛倌是主要劳动力，由家庭的男人承担，女人们负责轮流下夜，就是看住羊群不至于跑散。如果天气晴朗，羊儿会静卧一夜相安无事，刮风下雨就很辛苦。同时还要防止狼来偷袭，早上还要守住不让羊群过早启程。）每个浩特都有相对固定的春夏秋冬牧场，冬营盘设在背风的芨芨草滩里，夏营盘会在高坡上。那是真正的游牧，逐水草而居！冬春两季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长一些，夏秋季十天半月就会搬家。只有在冬天，才会用冻羊粪砖搭起羊圈，在夜里圈住羊群。其余三季全部是散放。

放羊是牧区最辛苦和磨人的劳动，工作时间长，风雨无阻，需要紧盯羊群以免走失；放牛是最轻松的活计，只要按时给牛群饮水，它们熟悉了自己的地盘，基本不会走失，当然这种好活基本轮不到知青和外来人员。那时大队有三群马，每群马都由两个马倌（大马倌和小马倌）负责放牧。还有一群骆驼和一群种羊。由于干这些活计需要一定技巧和经验，基本是由德高望重的中年人垄断（小马倌则是“跟包”，负责套马、饮马等体力活）。平时牧区的劳动还有春天接羔、夏天剪羊毛、秋季配种等季节性劳动。

牧羊女，原师大女附中学生李革平。
（摄于1969年）

文明与本能

冬天的草原，气温会低至零下四十度，白毛风刮起来，大地一片白茫茫，咫尺不见人，牛羊会顺风一路小跑，瞬间不见踪影。有经验的牧人，会早早选择背风的地方圈住牛羊，而我们新牧民们就只好跟着牛羊一起顺风而下了。

遇上天旱的年份，草长得不好，还要到几百里外的地方去走奥特尔（借住别人的草场过冬渡过难关，主要是牛群，因为牛儿只能用舌头卷草吃，草被积雪盖住後，它不会像马和羊一样用蹄子刨草吃。我到草原的第一年冬天就去了。）那地方多是夏季的无水草场，只有冬天下了雪才能够进驻，往往方圆百十里无人烟，由于没有过冬的储备，相比留在冬营盘过冬格外艰难。

很快，我们就融入了牧区的生活，我们师大女附中几个初中的小女生分别成为所在浩特的羊倌：草原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度，牵着骆驼跟随羊群在野外一整天，严寒和饥饿都不算什么，刮白毛风雪时要顶住羊群不让它们顺风逃窜实在是个考验。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几个会在芨芨草滩的背风处相聚，除了忧国忧民，还会脱下内衣找虱子！（分别住在牧民家实在不太方便）。我们的羊群也很给面子，从来不往一起掺和（羊群要是掺了群，分开它们就是浩大的工程，得一只一只的拽出来）。

最难的其实是春天，青草刚刚露头，羊群追逐青草跑得漫山遍野，骑乘的马经过一个冬天，早就跑不动了，这儿那儿还不时有一两只刚下羔的带羔母羊怎么赶也赶不动。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呢。刚开始没有经验，我们总是把羊毛还没有干的小羊直接捡起来装在接羔袋里驮回去，结果它们串了味道，羊妈妈都不要了（应该是把它和母羊一道留在原地晚上再跟群赶回去）。（谢小庆注：在狼群出没的草原上，将羊羔母子留在自己视野之外的草原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每天在羊群里追逐丢弃小羊的母羊，让我们个个都成了短跑健将。

夏天的劳动多是集体活动，剪羊毛、洗羊和给羊群打针，我们从最开始不会用剪子，磨破自己的手、总是剪破羊皮很快就成为所在浩特的标兵。跟着牧民训生个子马，为了多几匹乘骑可以替换。这是最具冒险的活动，因为小马的性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尥蹶子、站起来摔人等等。牧区妇女从来不干，骑术差一些、胆小一些的男牧民也不敢。几年下来我先後训过七匹马，我们之中最瘦弱的小玲也不甘示弱，身手矫健的老邓和老蒋就更不在话下了。（谢小庆注：女附中的学生就是不一样。在我们大队，女知青驯“生颗子马”的事情鲜有闻。）

重返草原的知青张娜依，英姿不减当年。

秋天草原的技术活是打草和给羊群配种，我们当年就都成了主力。 第一年，牧民们怕我们这些知青熬不过冬天的寒冷，入冬前把我们分配到牧民家中插包。三年之後在我们的争取下，我们才又有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自己入住冬营盘的第一夜，我们全都冻得一夜辗转无眠，第二天一致决定，两个人睡一个被窝！

知青到了草原，直接挤占了牧民们的生产岗位（我们大队十三个浩特，总共才有三十几个整劳力的岗位，知青一下子去了23人，大部分人始终也没完全学会必要的生产技能。冬天分吃羊，每个单身汉5只羊，知青们可一点都不含糊，有人冬天杀完冬羊就直接回北京了。（谢小庆注：于是，留在草原过冬的知青就可以专挑羊身上最好部位的肉吃。）

有些知青延续着在北京的斗志，参与挖肃“内人党”（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扩大化，编造出内人党在解放後继续有组织活动并企图篡党夺权的故事，直接导致大批蒙古族干部和牧民受到迫害）的斗争，大队很多牧民都成了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在冬天劳动（打井修水利，在干旱的草原根本就是无效劳动），这斗争持续了近两年，最後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才逐渐停止。（谢小庆注：这与在草原插队的周总理侄女周秉建上报真情有关。周秉建后来嫁给了蒙古族帅哥，成为蒙古族媳妇。）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们，根本就是没人要的孤儿，是草原用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所有的知青，原谅了他们的无理和无知，把他们当作是孩子细心呵护。想一想我们其实给草原带来了多少困扰！最後都义无反顾地离她而去，但时至今日，草原依然像怀念远行的儿女一样思念着我们。

我们因为直接住到牧民家中，对老乡多了一份了解，蒙古族牧民也给了我们更多一分的信任。大队很早就让我们北京知青参与了大队的管理，我当了大队的出纳，後来又当了赤脚医生。在冬去春来日夜兼程的奔波中，我置身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与牧民耳濡目染的接触中，体会了蒙古民族的善良和浪漫，让我爱上了草原的牧人。

後来，我赶上了最後一拨工农兵上学的机会，得以到锡盟卫生学校去上学（我上学那年，盟长的女儿上了北京医学院，旗长的女儿上了内蒙古医学院）。再後来，我又返回旗里继续当我的乡村医生和计划生育专干，直到北京的大门向我们这些弃儿打开的那一天。（马悲鸣注：不平随处都在。）

为什么北京知青会爱上草原牧民？其实我也常常问自己。作为知名女校的学生，没少受各种文艺作品的荼毒，一直向往浪漫的爱情，也相信真正的爱情不受物质、地位和时空的阻隔。我们那代人虽说生活上晚熟，但随着

时间的流逝，三四年後也都情窦初开。负责安置的知青办早有打算，将插队的男女生按比例分配到大队（我们大队分配了男女生各十一个），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结伴。但与牧民相比，知青男生们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显得笨拙，特别是表达爱慕时也躲躲闪闪让人很费思量，自然难入我们的法眼。

在草原我也算比较活跃，少不了有牧民小伙子来提亲，但过于直白也和我向往的浪漫相去甚远，自然是逐一回绝，为了减少干扰，还曾放言不到25岁不谈婚论嫁。

和一般牧民青年不太一样，我的那个他每次来串门都客气的敲门；也总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奇的出现：帮忙追一匹脱缰的骑马，奔跑着在羊群中套丢弃羔子的母羊，我骑过一匹特别厉害的生个子马，刚开始几天他总来帮我给马上马绊子，遇到路远天寒的出诊，他总能找到理由像条小狗默默相随。几年下来，牧民的质朴和他默默的付出最终打动了我。我们开始一起憧憬未来：他计划去当兵，我也想去上学。

可是，女儿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当时，东北兵团已经因为女知青受辱抓了一批人，我既不想放弃我的孩子，也不愿给他增加压力，只能选择尽快结婚。（谢小庆注：如果不及时结婚，“浪漫爱情故事”就可能演变为“迫害女知青”的刑事案件。实际上，在内蒙牧区也抓了一批蒙古族牧民。）当时和我一起在大队的同包们都理解和支持我，他们说早就觉得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远在北京的父母很难接受，当时回北京探亲的同包们也劝我要慎重：她们已经预感到春天即将来临，我们终会离开草原。

我和他在冰天雪地里往公社跑了三趟才领到结婚证，在春天里举办了当时最盛大的蒙古族婚礼，来参加婚礼好几个北京男知青都喝醉了，据说在我婚礼的前夜，他们彻夜不眠，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她会嫁给一个牧民？！

婚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差异立显：我行事节奏快，生活中心排位是工作、集体、国家；他生性散漫，生活重心是游牧、狩猎和伙伴。我们常常为了是否早点去饮羊、剪羊毛或换营盘（离开住了很多天的草场，搬家到水草相对丰盛的草地，让羊群可以少赶路，多吃草）发生争执。婚後一年半，孩子尚在襁褓中，我送他去就读锡盟牧业学院，希望现代教育能够改变他，事实证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後来我们都成为国家干部，曾在苏木（乡）旗（县）工作多年，虽然都算事业有成，但他的本性最终还是迫使我做了回京的决定。

到北京後，都市快速的生活节奏让我立时就如鱼得水，可是我家那位自由散漫的牧羊人却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更让他无所适从。後来，我选择了放他回草原，承诺他等我退休後，跟他一起去放羊。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多年之後，我反思维系我们婚姻的基础是：共同对生活的热爱和相似的价值观（都不太看重物质，总是以他人为先），我也扪心自问：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是否会有别的选择？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对于和知青结合的蒙古族青年，虽然有娶（嫁）了一个北京知青的荣耀，但巨大的文化和习俗差距，会加大双方磨合的难度，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坚守下来的，终会有许多无法告人的酸楚。婚姻中弱势的那一方，总会生活在恐惧哪一天会失去对方的阴影中。

虽然我和爱人生活了很多年，养育了一双儿女，我也对他呵护备至，人前人後给予了他应有的尊严；但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的看，我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反而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曾不止一次，我劝他为了自己选择放弃，但每一次，他都选择相随。

我们的一双儿女，继承了蒙古族自由散漫的性格，没有似我在学业中的强势，双双在应试教育中败下阵来；但他们又都继承了父亲善良有爱心、具有超强的动手能力和富有创意的优点，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总能不输人後。

我常想：骨子里的东西，真的是无法更改啊。如果不是插队，我的孩子们很可能会是另一种人生吧。

曾经，在走场地的冬夜，守着昏暗的羊油灯和四处漏风的蒙古包，听长风在天空怒号，合着远处此起彼伏的狼嚎，我不止一次的问：“为什么？！”

我们这些人，默诵着“相信未来”的诗句，度过了人生的低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了上山下乡保卫边疆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留给了国家和民族太多的伤痕。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生不逢时，在成长的岁月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我们的生活、婚姻、後代，无一不受影响。插队知青因为缺乏竞争的

技能，很多人晚境凄凉，成了社会的最底层。从我个人来讲，我又是相对幸运的，牧区生活让我有了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故事，蒙古民族的宽容教会了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

二十三年的知青的经历，塑造了我不同寻常的人生；我们这代人正渐渐老去，如果老天能够假以时日，我们都该留下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为让文化大革命永不重来，为让知青经历成为历史。

【附注】：挖肃“内人党”从67年开始，69年结束，与我们下乡的起始时间并不一致。特别是越往基层後滞越厉害，我们初下乡时还没有一片喊打，可是旗里和锡盟直到69年秋天混乱局面都没有得到控制，我和老蒋八月份回北京，路上走了十几天，交通全面瘫痪了，那印象实在是刻骨铭心，大夏天差点冻死在路上，半夜去投宿牧民家，把他们吓得够呛，以为又来抓内人党。

视频中弹钢琴者为本文作者晓鸣。谢小庆2014年11月14日拍摄于北京：

谢小庆跋：本文作者的叙述是非常节制的。我知道，她的真实故事具有更强的“戏剧性”，更精彩，更感人。作为曾在草原生活的知青，我完全理解作者的节制。实际上，真实的生活往往远比艺术作品的渲染更精彩。当我们讲述草原故事时，为了让听者感到真实，常常需要刻意淡化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对于那些生活在“商业文化”中的人，关于草原“快乐文化”完全真实的讲述，反而会显得不真实。

****

本文来自公众号“文明与本能”

文明，带来进步，带来更好的生活，也带来对自由的压抑，带来对天性和本能的束缚。科技进步为自由的文明提供了可能。我们仍需思考：构建怎样的文明可在维系共存生活的同时使人获得最大的自由？在追求文明的同时如何追求身心的舒展？如何避免对本能的不必要压抑？怎样成为文明社会中的自由人？让我们共同探讨吧。请长按或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英雄赞歌——金训华，五十年祭

沈晓冰 · 2019-08-25 ·

金训华，上海市吴淞二中六八届高中生。他长得挺拔矫健、黝黑的脸庞、浓眉细眼，穿一身泛黄的旧军装、戴顶军帽、背着军用书包，这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标配”。他不大爱说话，但一张口眉眼必先笑意盈盈。给人的印象，踏实淳朴厚道，少有那个年代造反派头头的霸道蛮横、颐指气使的作派。

是个和风熙熙阳光明媚的春日，我们十几位原在逊克县双河大队插队的知青在控江路一家小饭店聚餐。金世英(金训华的妹妹)带来一篮鲜花，说是答谢大家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到报社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因为有人借金训华之名招摇撞骗。看着大伙的笑脸，望着这篮生意盎然的鲜花，毫无征兆地悲从心来，泪水汩汩而下，我想起了长眠在黑土地上的金训华…….。

1969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三月初，前苏联军队入侵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的珍宝岛，并向纵深地区炮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边境战火硝烟弥漫战争一触即发。上海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乡办”)组织了一支上海红卫兵赴黑龙江学习考察访问团，一位姓朱的工宣队员任队长、时任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的金训华是分队长，我是队员之一。可我至今没明白，既不是红代会成员也不是学校造反派头头的我，怎么会被选拔到访问团来?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出发之前，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棉军装一顶棉帽一件绿色的军大衣。这套行头在春意盎然的上海显得臃肿厚实，可到了冰封雪飘的黑龙江仍然不抵严寒。

黑龙江地广人稀、辽阔壮美，他展开博大的胸怀欢迎我们。省地县都用最高规格来接待我们这帮“小八腊子”(沪语：小毛孩)。哈尔滨入住的是北方大

厦，黑河是黑河宾馆，省地县的一把手都亲自出面，他们强调的一点：边疆需要你们来屯垦戍边、保家卫国!你们就是不带帽徽领章的隐形战士，一旦苏修入侵，你们要冲到前线与解放军并肩作战。

黑河军分区政委、地区革委会主任彭绍先还把小分队成员 带到了黑龙江边，手指对岸说，对面六十万平方公里，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先都是咱中国的。1858、1860年沙俄政府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的《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1900年又血洗海兰泡和江东64屯，强行放火烧毁民房、屠杀不肯过江的原住民。江面上飘浮着断臂少腿的死尸拥塞了水面，二十多天后，还不断地有浮尸出现，江水成了血水。七千原住民的生命，不管妇孺老壮统统死在沙俄骑兵的屠刀下。

这两起惨案发生在1900年7月16日、17日并称“庚子俄难”。沙俄占领海兰泡以后将其更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

只在历史书上漫不经心读到的近代史，在彭政委的叙说下变成了血淋淋的实景。我们内心充斥着悲愤、震撼、怒火中烧，有种“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血气在胸中激荡升腾…….。

金训华，上海市吴淞二中六八届高中生。他长得挺拔矫健、黝黑的脸庞、浓眉细眼，穿一身泛黄的旧军装、戴顶军帽、背着军用书包，这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标配”。他不大爱说话，但一张口眉眼必先笑意盈盈。给人的印象，踏实淳朴厚道，少有那个年代造反派头头的霸道蛮横、颐指气使的作派。

到了公社又是一番景象，各个大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拖拉机、马车、甚至马爬犁生拉硬拽地来抢上海学生娃。我和金训华还有小徐、小胖(外号)被双河大队的副大队长姜同海大叔、妇女主任张淑兰十分热情地拉到了他的马车上。

除了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少数民族定居点，这儿还有当地人称为“二毛子”、“三毛子”的中俄混血儿，其余大部分是山东，河北闯关东的后代，或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流落到东北的“盲流”。他们朴实、仗义、实在，住房无法在冰天雪地下新盖，社员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知青的到来，各家存放在地窖里的白菜土豆萝卜，烧火的柞子、粗细粮食都拿出一部分，还让有闲房的老乡腾出住房打扫干净。

5月29日，当金训华带领34名上海知青来到双河，他与11名男青年就住在王善忠老人腾出的新盖正屋，而王大爷一家却住进偏房。使得金训华非常感动，他说：“老乡待我们像自家孩子一样”。黑龙江的富饶、乡亲的淳朴，各级领导的重视，使金训华和小分队成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育。

当时，上海的家长和学生更愿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去，哪儿旱涝保收每月领工资属于国家农场职工建制。而插队落户干一天有工分不干没有一分钱，还是农民身份。我有几位好同学当时准备一起走，可她们的父母不同意，最终都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返沪时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下金训华召集我们开了个小会，他先讲边疆形势的需要、农民的热情、黑龙江的富饶。他说：黑龙江需要我们，我们不光自己带头来，尽量动员自己的弟弟妹妹一起来，表明我们宣讲的绝非是虚妄。他还让我们每人伸出右手叠在一起喊“加油”。回沪后我们经常聚集在外滩上海市总工会五楼(中学红代会总部)学习文件、汇总各区报名情况、统计人数，排练节目，准备在两夜三天的长途旅行中鼓舞士气、调节气氛。

两个月的时间倏忽而过，我们宣讲动员的效果还不错，已经发送了共1300多人的两趟专列赴黑河地区插队落户。其中还有放弃已分配到工矿、兵团、农场、市郊的名额而转赴黑龙江。如双河大队的王桂生，这位高干子弟已分到上海船厂坚决弃工务农。

5月25日是上海解放2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们小分队成员将随第三批的专列奔赴北疆了。为不影响客货运输，南下北上的知青专列当时都在彭浦火车站(货运车站)发车。送别的场面总是难舍难分，何况又是去3000公里以外的国境线上。站台内外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歌声此起彼伏，泪水与汗水，欢笑与哀伤，亲人与朋友执手相望泪眼婆娑。

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金训华找到我，他是这趟专列的带队人，我是副职。当然还有市“乡办”的干部以及接收地区的干部。他告诉我，就咱俩成了“傻狍子”，我带上妹妹，你已经把你弟弟先行送走了。他们谁也没带弟妹，我听了一愣，只好嘀咕：他们可能没有弟妹吧?或者去其他省了?他一言不发转身走了。三天两夜的火车上，我问他你爸妈是怎么同意的?他说，我爸妈从前都很苦，很小的岁数就从老家慈溪到上海讨生活。在外国人开的厂子里做童工。妹妹16岁，比我妈当年做童工的年龄还大一点，妈妈无奈地说跟你一道去吧，我也

放心点，就是路太远了。要能留在上海市郊农场我也不让她去。我说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不可能留在近的地方。金爸金妈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明白事理，无条件不含乎地拥戴党和国家的号召。几句话这么一说他们就同意了。他问我："你把才15岁的弟弟带走，你爸妈乍同意的?"弟弟鲁明15周岁还不到，是家中长子。爸妈原本根本不同意，爸爸是南下干部，仅仅因为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国民党三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文革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三番五次被抄家，经常关进牛棚。弟弟有一次随大流外出大串联掉下道轨，差点没被进站的列车轧死。我在迁自己户口时，人小鬼大地自作主张把弟弟户口一并迁走了。爸妈很无奈。但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也打不得骂不得，只好给我们姐弟俩匆忙中又多准备一份行装。

漫长的旅程文艺小分队发挥了作用，各个车厢表演节目，金训华很喜欢指挥大家唱两首歌：一首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许多人不熟，教歌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第二首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他喜欢指挥大家唱两声部轮唱。车厢里歌声嘹亮、快板声声冲淡了大家离别的愁绪和对未来的恐惧与臆想。

六月中旬的一天，金训华来到奇克镇公社四新大队找我，同宿舍的上海知青沈慧敏在县粮库干活收工早，还用自己的茶缸给小金倒了一杯水。看到他，我又惊又喜问："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吗"?他说双河大队想组建文艺小分队，来县里买点乐器，还故作谦虚，"外行来请内行帮忙呢"。天色已晚，领他在食堂吃过饭，就安排在男生宿舍休息了。

次日，我陪他在县百货商店和供销社转了两圈，也没见什么像样的乐器。头一次领教偏远的边疆与繁华的上海在物资供应上的巨大差距。总要买几样吧，小金挑了两把二胡、一架凤凰琴、锣鼓和钹也没有快板，我说回去找木匠做两副吧。这些东西并不轻，捆绑好后又买上饼干，赶紧坐班车回双河。

在车上，他笑着说："我可真羡慕你们，电灯电话再有楼上楼下，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吧?我们天天晚上点煤油灯，开会、学习、看书时间长一点鼻孔熏得黢黑"，说完还不忘打趣，"怪不得不愿到双河来，看来是早侦查好了"。

双河大队位于逊别拉河与沾河的汇合口故名"双河"。进村须乘摆渡船，渡船是用厚实的木板钉成，不光载行人还能载卡车。两岸用圆木做成支架上有钢缆相连。北岸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所属军马场，双河是去往南山的必经之路，所以船工是军马场派来的，听说还是全国劳模，但也有上下班时间。

晚饭后小金让我早点休息，他说他还有好多事要去处理：有知青和军马场的职工打群架;还有两位五保户要去看看，后来我得知他说的这两位五保户一位叫马春亮，妻子智障还有俩孩子，家境十分困难;还有一位叫张淑德的孤寡老太太，单独居住。他说，他第一次和王桂生上马家，呛得他差点没吐出来，屋里乱成一团，严冬时节的东北民居会闭门关窗一点气也不透。屋里屎尿味、酸臭味和着烟熏火燎，那个智障老婆随地大小便。他们几个花了好几天功夫才给打扫出来。他说今晚我还要去张大娘那儿和她唠唠嗑。我惊讶于他的语言改口之快，说不上三句便冒出一句东北“土话”，感情，他真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第二天一早他给我送来早饭：一个馒头三个白水煮蛋，我吃了一口说“你是不是打翻糖罐子了?这么甜”。知青食堂不养鸡，这三个鸡蛋还不知他从哪儿淘换来的。他笑着说“吃吧，午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上呢”。过了渡口，他要把我送到孙嘉公路道口，拦截开往奇克镇的客车或是货车。

六月的黑龙江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碧空飘过云影，阳光下的双河波光粼粼。这条小道有三里多路，走不多远我突然被西边的一片花儿吸引住了：只见各种姿态缤纷多彩的野花开得那样姿肆烂漫，晶莹剔透;草绿得油晃晃的，参差不齐，每一株植物都挺拔着身子在阳光下起舞。我三步并两步地扑向草甸子，抚摸着她们摇曳多姿粉彩鲜活的脸庞。动手嘛溜地采摘金针菜的花骨朵，一会儿我的军用书包就鼓起来了。小金问“你要那么多金针菜干嘛?”我回“水焯一下，食堂就可以做一大锅金针木耳蛋花汤”。他说“还挺会过日子的”。我回“当然!知青点就是个大家庭嘛”。他说“走吧，再晚就赶不上车了。”

我直起腰才看见他手里一大捧鲜花，他用草梗把她们拢在一起。“每样我都採了一朵，你们城里没有”。说着他递给了我。捧着这一大束鲜花，背着鼓鼓囊囊一书包的金针菜，我回到了奇克镇。

八月中旬，黑龙江全省暴雨成灾，双河两岸山洪直泻一片汪洋，大片的农田被淹没，大树连根拔起，靠河岸的农舍被大水冲到河里。正是小麦秀穗时节，半熟的麦子开始收割。8月14日金训华在煤油灯下写了他一生最后一页日记：今天在广播里听到了我国外交部的照会，我心都气炸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七亿中国军民严阵以待坚决打击侵略者!

8月15日金训华不顾肠胃炎发作，带领一队基干民兵在修筑防洪堤坝。下午4时许，生产队长姜延滨跑来对民兵连长贾树林报告：“堆放在河边150根输电电杆被洪水泡上了，有被冲走的危险”。金训华立即向贾连长请命带上三位民兵

跑步来到堆放电杆的地方，这时的河水，以每秒七八米的流速汹涌而来，渡船的支架被洪水冲倒，钢缆小部分浸在水中。有三根电杆已被洪水冲进水里。金训华十分焦急边跑边脱掉上衣、退下长裤，回头高喊“跟我下，马上捞”，就跳进河里。岸上有老乡劝阻：“水流太急，下去危险”!他回了句：“没关系，我水性好”!随后而来的宦根成、陈健也跟着跳进水中。一个巨浪打来把游在最前面的小金打入漩涡，他从水里出来继续游。连长带着人也赶到岸边一看这阵势，赶快派人去找船。对着三人大喊:“快上来,太危险”!然而，他们依然是向着电杆的方向游去。在金训华眼中，这哪是普通木头，这是架往三线一行行一排排输电通讯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备物质。贾连长划着小船把后跳进河的两位知青救起，可是前方已到处不见金训华的踪影。

当人们得知小金落水的消息，纷纷放下手中农活，奔跑到渡口盼望着奇迹的出现。此时又发生出人意料的一幕：陈卫彪，这个重情重义又好打抱不平，经常“惹事”的知青，一直把他所敬佩的金训华当大哥，他在木工房听到小金落水的消息，一路狂奔到渡口甩掉上衣就跃进水中。危机时刻，双河村村民吴良山、姚俊杰随即操桨撑起一只小船顺水而下，两人把已精疲力尽却不肯上船的陈卫彪救上船后，这只像树叶般的小船在汹涌的波涛中顺流而下十多公里。两位老乡所面临的险境丝毫不比在水中的陈卫彪要小。

金训华在洪水中失踪的消息，逊河公社立刻上报了县革委委会。当天晚上县革委会、县武装部，要求双河下游所有沿河村屯组织人员在相关河段进行搜救。第二天一早，县人武部副部长孙平便带领工作人员装运了县里唯一的一支燃油快艇在大水稍退后来到双河，实地指挥搜救工作。

可是一直到12天以后的8月27日，在逊别拉河离入江口不远的车陆公社西双河大队被人发现。这是位上岁数的村民，一早去河边清网，模模糊糊依稀看见河边灌木丛中似有人形，老人已知上游有知青落水，费了好大劲用鱼网把遗体围住，急忙跑回村报告。

头一天晚上暴雨倾盆电闪雷鸣。人们议论说，亏了这场雷雨震上来，否则遗体冲入黑龙江就很难找到了。

8月27日10点左右，一辆军用吉普载上县革委、知青办的负责同志、我和双河大队知青与小金同宿舍的王桂生风驰电掣般地开往车陆公社西双河大队，让我们去辨认遗体。苇席掀开的一刹那，我惊呆了：长这么大，从未看到过死去的人，金训华的遗体惨不忍睹，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脸部肿得比篮球还大、

五官分辨不清。我双手捂脸一下跪坐在河滩上，锥心地刺痛泪水盈流。王桂生从身高、从已经退至脚踝的那条蓝色平角裤确认是金训华。而且12天以来，沿河两岸村镇没有其他落水者。

8月25日，逊克县革委会核心小组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准，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在离英雄牺牲地不远的双河岸边一片向阳的山坡上，为金训华修建烈士陵园，并树立纪念碑。

在发现遗体的前一天(8月26日)逊克县革委会、人武部在奇克镇召开了追悼大会。

《黑龙江日报》的资深记者宋显忠正下放到县革委会任办公室主任，接到任务后当晚赶到了双河大队，广泛采访大队干部老乡知青，特别是阅读了金训华日记后，凭借他的职业敏感，这些平凡事迹不断地组合，最终形成一条清晰的烈士成长轨迹。特别是那句“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豪言壮语，不仅包含了烈士生前常说的口头语，也是烈士精神最实在最准确的写照。初稿后，经集体修改充实，10月26日在《黑龙江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联合发表了这篇长篇通讯。同时，黑龙江省和上海市同时追认为烈士，发出向金训华烈士学习的号召。同年12月《红旗》杂志刊登了金训华生前的日记摘抄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标题为《革命青年的榜样》。

金妈妈来到逊克后，始终默默无语，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没有在众人面前掉一滴眼泪。回到住处在自己的房间却泪流不止，独自坐到天明。

金训华牺牲后我被县“知青办”抽调到双河大队帮助整理烈士遗物、日记，在贫下中农和知青中采访收集他生前事迹，处理大批来信，筹建金训华烈士展览馆。1970年1月、10月两次参加地区组织的回访团与金训华妹妹金世英及十几位知青代表回上海汇报，并多场报告金训华烈士事迹。

省内各大军分区、兵团、农场以及市县都邀请宣讲团去作报告。县“知青办”主任姜学增以宣传金训华事迹和双河知青工作需要为由，要求我调往双河被我拒绝了。1970年10月第二次回上海之前，县革委会主任矫承峰政委亲自找我谈话，要求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服从组织安排，坚持要我去双河，并说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无奈之下，只好要求把弟弟鲁明一起调去，就这样从沪返逊后，我和弟弟的户口迁到了双河，再一次没有征求弟弟的意见。

5月22日一一再过三天就是50年前我们奔赴黑龙江的日子。独自一人来到龙华烈士纪念馆，北方告诉我：这儿有一展台，是金训华的专栏。

金训华的生命之舟，永远停摆在20岁最美的生命花季。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的短暂而壮丽的一生，成为那个时代的楷模。

那捧带着朝露的鲜花呀，始终盛开在无比壮阔、激情、美丽的青春岁月！

小金子一一多么朴实无华而又贴切的称呼!可惜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过上的好日子，他都未来得及品鉴与经历。如果他活着……

他也会儿孙绕膝尽享天伦吧?

他的另一半会是我吗?是也不是;

但无论是谁，他都会有一个幸福的家。他是那样的正派淳朴、善解人意;

他会当领导吗?会也不会;

但无论处于何等职级，他会是个很好的“官员”，他善于学习，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看得重于一切，体恤民情又是那样的心手合一，想到的一定会付之行动。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都会成为本行业的佼佼者，因为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既不媚上也不鄙下，既不贪功冒进又不谨小慎微，随时准备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

一个民族的复兴往往是以年轻人从崇拜金钱和权势到转而崇拜民族英雄为开端的。倘若中华民族没有岳飞，没有文天祥，没有戚继光，没有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雷锋，没有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仁人志士，那么这个民族便没有脊梁，中国人永远都是那个在西方列强蹂躏下站不起来的奴才与“看客”。

“时势造就英雄”， 金训华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涌现出来的青年英雄，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屹立于中华民族英雄之群像中。

50年的风霜雨雪，竖立在双河村的金训华墓，已经破败不堪，墓碑上的碑文一字不清。2019年6月，王延兴(金训华老房东王善忠之子)打电话给我说金训华的墓再不修就不行了。他找过乡里的民政助理，往县里跑了多次，还给省民政厅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反映烈士墓的问题，但是他们都爱莫能助。只有走个人捐资的方式。原在双河插队的松江知青，现在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的张丽华毫不犹豫地同意出资。

修缮金训华陵墓的总费用是22,020，按惯例，是应该在墓志铭后注上捐资人姓名的，但丽华不同意，我们只好尊重了她的意愿。

墓碑全部要重新用大理石雕刻，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而承包修缮工作的老板说，“我只要挣出工人的工资，其他我一分钱不赚”。半个世纪过去了，看看当地的老乡、看看当地的村民他们依然对烈士念念不忘、依然对烈士充满崇敬钦佩之心!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几千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便是如此出世入世的。确实如你言：人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生命才更有价值。你的无私捐资，才使金训华陵墓得以焕然一新;王延兴的仗义奔走监督实施，体现了双河乡亲对金训华的始终不变的情怀;我只不过尽了一位战友应尽的义务。我为我们做成此事十分地欣慰：对得起长眠于此的烈士了!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看法，只要我们对苍天、对众人、对良心无愧无悔足矣!

(作者沈晓冰，上海赴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知青，金训华烈士的战友。本文由《知青问题研究》摘编自沈晓冰2019年8月的“美篇”。来源：《知青问题研究》)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陈鸿仪：金训华的"牺牲"实质上是一场事故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经考试成为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人 生 如 戏（下）

金训华之死

我所插队落户的逊克县，就是曾在全国名噪一时的知青英雄金训华插队的县，我后来被借调到县知青办的一大任务就是整理和宣传金训华事迹。事隔近五十年，还是常常为这样一个年青而充满革命热情的生命的逝去而感到可惜，因为金训华的“牺牲”究其实质是场事故，因为政治需要而被包装成英雄。

那年他所在的大队搞副业，在兴安岭的森林里伐了些松木，打算卖给县里当电线杆用。松木堆在河边准备外运时，不巧天降大雨，河水上涨，有几根松木被冲入河中。到大队还不到三个月，对地形水势全不熟悉的金训华带着几个知青下了水，想把作为集体财产的木头捞上来。但因为水流太急，一下水他穿的短裤就被冲掉到膝盖那里，等于是绑住了他的双腿；河的两岸原来拉有一条铁链，为摆渡所用，这时水涨得淹没了铁链，挣扎的金训华被冲到铁链边，头部撞上铁链，连撞带淹，就这样把他19岁的生命留在了北大荒。

金训华死后，怎么处理这样一个才下乡三个月就死了人的事故就成了大问题。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正直高潮，要继续动员更多知青下乡。加上金下乡前是上海市红代会成员，于是在张春桥示意下，金被树立为抢救“战备电杆”而牺牲的知青英雄。原本对他的死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大队/公社/县则因为出了这样一个英雄而受到很多关注和得到不少利益。只是金训华自己，却永远不再能享受他那早晨八九点钟太阳般的青春。

说完金训华后细细回想，发现在我认识或知道的知青中竟然有很多人有着和他类似的遭际，却没有他那样死后的哀荣。因为这些年轻的被永远改变了的生命，我无法认同所谓上山下乡“青春无悔”的说法。没有人可以如此轻松地代表那些生命被完全改变了的人表态“悔”或者“不悔”！

冬天到，演剧啦！

黑龙江的秋天可真短。好象那汗流浃背铲三遍地还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小兴安岭成了“五花山”，青翠金黄艳红夹杂，热闹而又灿烂。大田里一天一变样，这里的小麦黄了，那边的大豆摇铃了，玉米顶花谢完，棒子须枯焦了……大队干部们天天盯着，庄稼黄一片赶紧收一片，独怕一场雨雪毁了辛苦一年的收成。地里的庄稼收了，拉到场上了，我们就该日夜连轴转地打场扬场了。有时场还没打完，心急的雪花就飘飘荡荡地下来了。

冬天来了，猫冬啦！队里开始冬季工时，每天两顿饭，中午不再歇晌。黑龙江的冬天日短，下午四点天就黑下来了。五点吃完晚饭，一个长长的无聊的冬夜就开始了。到底是年轻人，后来几年粮食没那么紧了，肚子没那么饿了，再让我们在炕上猫上十几个小时，太难了！得找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干！

最开始，大队团支部组织办起了了夜校。夜校分两部分，一个是贫下中农夜校。由知青给老乡念报纸和毛选。另一个是知青夜校，由高中生教初中生学数学。那套《自学丛书》里的《代数》就是我们的课本，隔天上两小时的课，另一天做作业。很多68、69届初中生直到这时才知道除了正数还有负数，还有负负得正这一说；才知道了什么是方程和怎么解方程。

大家热情高涨，知青宿舍新出现好多用各种玻璃瓶子做成的小油灯。在每一盏直冒黑烟的油灯下是看书做习题的知青。连几个平时调皮捣蛋得紧的男知青都在抓耳挠腮地做习题。可惜好景不长，知青夜校办了不到一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

公社传言我们大队知青全是大学迷，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工作组干预下，知青夜校夭折（好在这个起点给了不少知青动力和能力，以后坚持自学，所以1977年到1979年之间我们大队知青考上大学和中专的人数最多，1977年县里预考几门课的第一名都是我们大队的）。继续运行的贫下中农夜校用不了几个知青，大多数人又没事干了。于是有了后来的“演剧”热。

知青刚下乡时过年过节也表演节目，但多数是唱歌，跳舞，快板，三句半，吹笛子等等很革命但又有点文绉绉的节目。虽然有的节目也有老乡中的年轻人共同参与，但观众们感到不满足，提出要看“剧”，这就开启了我们队表演必有“剧”的传统。而且因“演剧”还发生过不少趣事。

“演剧”是从演样板戏开始的。观众们不满足于听唱段，而是要看带妆演的选场。于是“红灯记”成了我们的

保留节目。队里有个知青叫章郎，因为母亲是京剧演员，他打小在戏院的排练厅和后台混，混成了京剧迷。说是红灯记的戏和电影他前后看过十二遍，里面的每句台词，每个动作都记得滚瓜烂熟。于是他成了不折不扣的导演（而且确实有才）。

问题是章郎自个儿个子矮小，长相有点猥琐，既演不了英雄李玉和，也难胜任演鸠山。他退而求其次，想演王连举，可大家认为他个子太矮，演王连举也不行。把他气得直嚷“连叛徒都不让我演啊！”大伙说，要不你演磨刀人吧！他嫌磨刀人戏份少，不愿演。结果很多人在戏里都能挤上一脚，反倒是导演上不了台。

我对唱戏是彻底门外，所以从未尝试。但我是后台总管。服装，化妆，道具，后台调度一手总抓。记得演红灯记服装是个大问题。问题不是在李玉和或者李奶奶身上。两个穷老百姓的衣服，知青和老乡中找找就有了。缺的是铁梅那件红褂子和鸠山的那件和服。老乡家闺女有穿花褂子的，也有红花的，但一是破旧，二是对襟而非大襟，无法做戏装用。队里也没闲钱买服装。

后来不知是谁想到队里有面游行时用的大红旗，拿来让队里手巧的大嫂一量，说是正好够裁一件大襟褂子。这让几个大队干部好一阵为难，最后点头同意把这面旗帜变成了铁梅的红褂子。鸠山的和服更难些，因为除了电影上见过，谁也不知道和服该是怎样的。我从一个男知青那里借来一件灰色的中式棉袄罩衫，又从赤脚医生那里要来几大块纱布，在冲淡的墨汁里染成和罩衫差不多的灰色，在罩衫下接了一段，成了半长衫；又把袖子下面拆开再帡大。

如此胡弄成了大家都认可的“和服”。（讨厌的是那个男生就两件罩衫，每次演完戏我都得把衣服给他改回来还给他。下次要用了，再借来照样复制。反正他那衣服让我来来回回改了有十来次。）

演鸠山的是个有点像“老夫子”的知青，戴上眼镜穿上“和服”活脱脱一个“死啦死啦”的小日本。老夫子原是我们中学学生话剧团团长，也是个有经验的老演员了。可是在某次演出中却出了个不该出的洋相：鸠山正拿酒瓶要给李玉和倒酒，不知为啥那天的酒瓶塞塞得有点太紧，鸠山连拔几次没拔出来。急得一头汗，回头对在幕后的我说：“怎么搞得，拔不出！”

我连连给他打手势让他别拔塞了，假装倒一下就是了。不知他被什么昏了头，就是一个不领会，又连着问了两次“怎么搞的？”本来台上也没电灯，靠几盏马灯照亮，你倒没倒出酒谁看得真啊，让他这么一耽误台下观众反倒看出问题来了。直到台下有了笑声，老夫子才突然醒了过来，赶紧装着倒上了酒，和李玉和唇枪舌剑起来。

后来又演过“龙江颂”选场。演江水英的是我们隔壁宿舍的玲。玲是个爱美的女知青，有个在地质部门工作的父亲，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她父亲也很宠她，所以她是我们朋友中第一个用上无形眼镜的人。玲唱得好，也会演，尤其擅长用眼神。上台演江水英不能带眼镜，可不带她又看不清，就用上了无形眼镜。唱着唱着一个眼神，左

眼的镜片竟然不告而别，悄无声息地脱落不见了！

玲很有戏德，仅仅是楞了一下，就坚持着把戏演完了。演完了这段戏，后台大乱。玲急急忙忙在台上寻找，想要找到那片掉落的镜片。别人想帮她找，她又怕人多踩坏了镜片。那么黑的地方，哪里去找还不如小指甲盖大的一片透明的薄片呀？好不容易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把下面的戏演完，玲就哭了出来。

玲的男朋友建是我们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戏完到后台一看玲在哭，问明原委立马转身趴在台上又仔细搜寻了一番，还是没找到。他怕镜片顺着台板缝隙掉到台下去了，又拿来大手电，钻到才半人高的戏台下，几乎是匍匐着一寸一寸照看了台下的地面。可是台下一片泥地夹着草根，当然也是找不到的。建只好安慰哭哭唧唧的玲说，我明天再来找，真找不到的话，我再给你买一片。

听说那时的无形眼镜一片就得二百来块钱，够我们挣一年工分的了。第二天再找，当然还是没找到。以后建是不是真的给玲另买了一片也不得而知，但“玲一个眼神，建一年工分”倒是流传下来，成了大家调侃他俩的桥段。

观众的胃口是惯大的。演了一阵样板戏，大家又觉得看厌了。因为县里每天两小时的有线广播，除了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就是那几个样板戏。耳朵都听出茧来了。于是演话剧“年轻的一代”。林育生念他爸的狱中遗书，不但念哭了自己，还念哭了台下一帮观众。只是不久就听说此戏已被批判为大毒草，就没敢再演第二遍。再以后，就自己写剧本了。独幕剧，对口剧，快板剧，还有木偶剧（人演木偶，比现在街舞里那一类早多了）…… 每年过年演出，没有自己编演的“剧”那是不过瘾的。

那年我把一个戏曲短剧改成了快板剧。戏里有个落后的“二嫂”，把自家的鹅放到生产队的地里吃庄稼，后来让小学生姐弟“小青”和“虎子”教育了一场。我演“二嫂”，但“小青”和“虎子”无法在知青或队里的青年里找，就想到了我的学生们。可一圈问下来，只有四年级的珍子一个主动请缨。那帮平时胆大包天的男孩们，这时都磨叽起来，你推我让，谁都不肯出头。

考虑到太小的可能记不下词，大的比珍子高，又不像姐弟，就盯上了也是四年级的国全。国全长得英俊，眉目如画，但个子不高，演珍子的“弟弟”正好。经我反复动员，国全总算点了头。珍子演戏很有天份，毫不怯场。没排几次就已演得很好。国全词也记得挺快，可还是抹不开。但凡排练时有人在旁边看，他就脸红卡壳。就这么排着，练着，转眼到了演出那天。珍子眼睛比较小，化妆一画眼线，眼睛大了不少，人也变得漂亮。她自己瞅着镜子直乐。可国全在旁边紧张得都有点发抖。我拍拍他的肩膀，“上场！” 于是开演。

开始还算顺利，可当虎子说到“我把鹅嘴来支上”时（虎子恼恨二嫂放鹅吃庄稼，摘来柳枝支鹅嘴，让它们无法再吃），忘词了！国全连说三遍“我把鹅嘴来支上”，硬是想不起下一句词。我在后台急得汗都出来了。这时只见珍子接了一句：你都支了几只鹅啦？国全勐一激灵，记起来了！顺顺当当接了下去：我把鹅嘴全支上，看它怎么

再吃苗！戏演完了。估计除了我们仨，台下看戏的都没发现这个小插曲。可经这么一磨练，国全不怕了。后来演得越来越好。

其实演剧，真正上台的人也不算多，但其他不演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全都起劲，积极参与。每天傍晚那顿饭后，总有人提前赶到排练的大队会议室升好炉子，把屋子烧得暖暖的，然后就看着我们排练直到结束。看的人有知青也有老乡，看着看着就有人跃跃欲试，参与进来。所以后来参加演出的人越来越多，知青老乡都有。

那里面有个知青，长着一双贼溜溜的小眼睛，脸上还有一大块红色胎记，就得了个“红疤”的外号。红疤原本是个大坏事不干，小偷小摸不断的家伙。但他有个特点，就是学什么都很快，动作也很“挂架”。他每天在排练的地方蹭戏看，还不时点评几句。有次忘了排什么戏，里面演反面角色的人始终到不了位，红疤看急了，竟然走上来给他比划开了。

大家一看，天！这不就活脱脱一个坏蛋的样子吗？于是红疤顶替那人成了正式演员，而且一演即不可收拾，成了我们演剧时反面人物的专业户。不管是地富还是坏分子，落后分子，只要他一上台，微微猫着腰，贼溜溜的小眼睛四下一转，台下就是一片笑声。他自己也演上了瘾，碰到编的剧本里没有他能演的角色，他还会来央求给他加写个角色。原本因为这家伙偷我们宿舍种的菜和瓜，我们和他吵过架，这时倒是成了不错的Buddy了。

我们队演剧基本集中在过年那几天，一连得演三次。其实三次演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大家就是喜欢看。第一次演，只对本大队社员知青。后两次，就有社员或知青邀来其他队的亲友观看。后来演得出了名，就有其他大队来邀去他们那儿演。邀请的大队会在中午派马车来接，到地儿就开演，演完正好晚饭时分，邀请大队会好吃好喝招待一顿。东北人实诚，大肉包子，发糕，二米饭，手擀面管够。有时还有酒。

再后来，别的队来请，人家派车接演员，自己队也会派几挂大车拉着还想看剧的社员一起去。当然招待的那一顿跟去看戏的是捞不着吃的。不过老乡们亲戚连亲戚的，自有吃饭的地方。所以每到这时就得热闹一整天。

最热闹的是演“支鹅”的那一年。县里搞文艺汇演，听说我们大队剧好，特意邀请我们队到县里演一场。那天早上县里派来接我们的大客车开到了队里，几乎是全屯老少出动。其中有很多人还从未乘过这种跑长途的“大轿子车”，所以连带看新鲜了。家里有孩子参加演出的，像珍子和国全，父母亲戚都骄傲得不得了，说做梦也没想到乡下孩子能上县城舞台演剧啊！客车开动，车下一片挥动的手，就像我们是要开上前线为屯子增光的军队一样。

冬天到，演剧啦！那年轻时的声音至今还在梦里回荡……

动物忆趣

与住在城里相比，在农村插队落户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能见到和接触到很多动物。农村人和动物的关系很直接了当。一种是帮手，是伙伴，甚至是家里的成员，如牛，马，狗；另一种则是肉食和收入的来源，如猪，羊，鸡，

鹅。至于“宠物”这一概念，那是不存在的。

先说马。马是黑龙江生产队里很重要的财富。虽然没有牛有劲，但马能跑，矫健，不像老实巴交又有点犟脾气的老牛，干什么都慢吞吞的。春夏拉大车，拉各种中小型农机具，秋天拉收割机，冬天拉爬犁，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是干农活和运输的主要畜力。所以老乡们把马看得比牛重，马吃得也要比牛好得多。

刚下乡时的知青，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向往着“骑马挎枪守边疆”的浪漫。不久，确实有不少人当上武装民兵挎上了枪。但骑马却没那么容易。我们队马倒是没少养，但除了一些已经“使”出来（就是习惯了役使）的马以外，大多数还是生个子马，套车骑乘都不行。队里怕知青骑马摔坏，所以一般都不让知青骑。马极其聪明，虽然对主人忠心耿耿，但也会欺负生人。

不管是谁，第一次骑某匹马时，都会被下马威。也就是说那马会跑，跳，尥蹶子，千方百计想把背上的人摔下来。如果第一次摔不下你，以后再去骑，它就会乖乖的了。如果第一次被摔了呢？那好吧，下次你就等着更大的“马威”吧！骑上马，如果只是踱四方步般慢走，当然不够劲，得跑才有劲。可马小跑是很颠的。刚学骑马的人怕摔下来，一般会把马夹得很紧，就这么颠上半小时，准保会把大腿和臀部给磨破，疼痛难忍。

真能骑马的人是半站在马蹬上，随着马跑而颠动，尤其是马“lou”（大跑）起来时，随马跑一耸一耸的，很爽。但大跑就容易摔，所以不少老乡教学骑马的知青用“后蹬”，即把脚后跟而不是前脚掌踩在蹬里，这样万一摔下来就不会因为拖蹬而出危险。

我们队最早骑上马的是当代销店员的继红，因为她经常要来往于大队和公社之间办货结账什么的，十几里地走路太慢，所以队里容许她骑马。可是过了不多久，继红就不再骑马了。别人问原因，她打死不说，后来因为我也骑马，她才悄悄告诉我说是摔怕了。

说是有一天她骑马上公社回来，半道上撒马快奔，正恣着呢，不知那匹馋嘴的马看到路边什么好吃的，突然“刹马”低头去够吃的。可是马停人不停，咱们的“老板娘”就着惯性顺着马脖子像坐滑梯似的，唰一下滑落到马头前的地上。还没等她回过神来，那正尝美食的马见有东西突然从天而降，吓得一跳，一脚踩在继红腰上。如果不是穿着棉衣棉裤，带着马蹄铁的这一脚足够让继红皮破血出的。

还好那马总算看清摔在头前的不是妖怪是继红，所以没有跑走，而是等着继红好不容易忍痛爬上马背，慢慢捱回队里。继红的腰伤过了很久才好。从此她再要去公社，宁愿赶着慢慢吞吞的老牛车来回，再不肯碰一下马。

我骑马不像继红那样名正言顺，而是有点走后门的性质。因为当小学老师，又和学生们玩得好，有些学生后来给队里当马倌，知道我爱骑马，就常常私下把马给我骑。我的平衡很好，骑哪匹马都没摔过，所以也没给他们添过

麻烦。有次下完雨，田里没法干活，大家都歇着。我想起前些天从老乡家买到一斤黑木耳，就想上公社邮局给家里寄去。出屯走了不一会儿，碰到放马的小马倌。他看我走着上公社，就说你骑我的马去吧。

那是匹小母马，名叫“小弹簧”。据说是腰软，跑起来上下弹动，骑着很舒服。我骑着小弹簧到了公社，就把马拴在邮局外的树上，自己进去办事。统共不到半小时的光景，等我出来，小弹簧竟然无影无踪！我到处找也没找见，不由急得满头大汗：我走着回去事小，要是马真不见了，我就得负大责了！

我回进邮局给队里摇电话，队里只有一台电话，安在继红的代销店，我告诉她我骑到公社的马不见了，央她赶紧到马圈和小马倌说一下，问问他该怎么办。代销店在屯西头，马圈在屯东头，继红紧赶慢赶来回走了二里多地，回来告诉我的消息让我哭笑不得：小马倌说，小弹簧早就回到马圈了，正美滋滋地吃草呢！

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在心里嘲笑自己：不是说老马识途吗？怎么一遇事就把这给忘了？还急出一头汗！后来认识了公社所在大队的知青，才揭开了小弹簧失踪之谜。原来那天县知青办组织的金训华事迹宣传队来我们公社演出，那几个知青演员下午没事在公社附近闲逛。见我骑马来公社，很是羡慕，趁我进了邮局就也想过下骑马的瘾，所以偷偷解开马缰绳牵走了马。

第一个上马的就是那个“金训华”。只是他人才上马还没坐稳，就让小弹簧一个蹶子给甩了下来，小弹簧转身冲出重围一熘烟地绝尘而去，追都追不上。就这样，“金训华”还没在我们公社演出怎么抢救集体财产战备电杆，就先把集体财产“小弹簧”给整丢了！他们怕我向他们要马，就一哄而散，也没人敢来告诉我马跑了。结果害得我不但是四条腿来公社，两条腿回屯子，还白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找马，回到屯里连晚饭都误了。

不过丢了小弹簧的这次的经验，在后来一次“历险”时倒是派了大用场。那时为了备战，沿黑龙江各个大队都要在小兴安岭的深处建备用的三线营地，我们屯也派了不少人去。有次不知上面来人调查什么事，需要我们队一个社员提供证词。正好那人被派到山里的营地去了，上面就要我们队派人到山里找到那个人写下证词带回来，俗称“打证言”。因为要书面证言，当然只能派会写的知青去了。而且按规定，“打证言”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在场，大队就派了我和那个“老夫子”去。

三线营地离大队大约三十里地，去那里没有可以通马车的大路，只能骑马走小道。我和老夫子都没去过那里，不认识路。去时队里给我们派了个上那里干活的小青年一起走，所以一路顺利。一个小插曲是老夫子过去没怎么骑过马，一路跟着我们策马奔驰，所以特别兴奋。跑着跑着碰到一个弯道，我和那个小青年都很顺熘地转了过去。大概是想赶上我们，只听得跑在后面的老夫子高叫了声“嘚儿，驾！”然后传来林子里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回头一看，人马都没影了。只好停马等着。

过一会儿，见他一手牵着马，一手拿着皮帽，艰难地从雪里拔着腿，打林子里走出来。原来是他不会用缰绳控

制马，“嘚儿，驾”以后马没沿着路转弯，而是带着他直直“驾”进了路旁的林子里。冻硬的树枝不但挑落了他的皮帽，还在他脸上画出好几道血痕。好在林子密，也没冲多远马就过不去了，他才能下马牵着回到小路上。

打完证言，那个小青年要留在营地干活，不能再陪我们回队。我们想着反正沿来路回去，肯定迷不了路，就和老乡们道别踏上了归途。傍晚的天有晚霞，还很亮堂，我们一路聊一路走，不知不觉间天就暗了。要说暗，倒也不是伸手不见五指那样的漆黑。天上有窄窄的一小勾月亮，还有稀稀的几点星光，所以天是灰蒙蒙的，地上的雪也是灰蒙蒙的。

一开始是在林子里走，因为两边有树林，反而知道哪里是路，沿着走就是了。等到走出树林，我们就傻眼了。眼前是混混沌沌一片雪原，完全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收割后的大田，哪里又是草滩。某位名人说，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到我们这儿是正好相反，地上本来有小路，没人走也就不成其为路了。极尽目力远望，既看不到灯光也看不到房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打马往哪个方向走。更要命的是好像起了点雾，看远看近都有点朦胧起来。远处还有忽高忽低的野狼嗥叫。

我俩不由都心慌起来。迷了路在野外过夜是可以冻死人的，而真要碰上饥饿的野狼，也是可以被狼撕碎吃掉的。怎么办？我强自镇定对老夫子说：反正老马识途，我们今天就由着这两匹马走吧，看它们能不能把我们带回家。看来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我们俩就都松了缰绳，不再催马，也不再说话。就这样信马由缰默默地在雪原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吧，突然看见了远处有隐隐的灯光。不等我们催动，两匹马自己就加快了步伐，打着响鼻跑了起来。再看，到屯子了。其实那时不过晚上八点来钟！

要说和马关系最好的就数队里的马老板，他们每人都有自己使惯的两三匹马，宝贝得只怕比自己家里的孩子更甚。孩子可以随便打骂，马是不肯随便抽一鞭子的。要是别人使了他的马而没有善待，那是可以引发一场骂娘干仗的。

遭水灾那年，队里一个马老板赶着马车去县里拉什么东西，回程时在离我们大队不远的一条江汊边被突涨的江水阻住了。平时这江汊水还不到膝盖，水流缓慢，这时却水已过腰，水流很急，还打着漩涡。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过江汊回不了屯，这马老板就冒险赶着两匹马下了水。本来马会游泳，就是一人深的水对马来说也根本不是问题，但这次它们是拉着重载的车！因为水深看不清水底，马车走到半途就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马老板赶紧从车上下来扑到车后拼命推车，一面吆喝赶马，想把车拉出来。车载太重，水流太急，使劲的辕马立足不稳倒了下去，辕马一倒又拉倒了套马。听老乡说不管水多深，马都可以踩水浮在水面，只要耳朵不进水就淹不死。可是倒下的两匹马，因为被套在车上，无论如何都站不起来，头就被水淹了。马老板这时弃车不顾，拼了命地要解开马身上的绳套，但车重，绳套浸水难解，两匹漂亮的枣红马就这么淹死了。

那个马老板连家也不回，就坐在江汊边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着“唉呀我的妈呀！唉呀我的马呀！”直到有路过的村人看到回村报了信，队里才派人派车去把车上的东西拉了回来，还有两匹死马和那个哭得声音都哑了的马老板。本来死了两匹好马，大家都挺心痛的，但听了回屯报信的人学说的“妈呀马呀”，在场的人又不禁失笑，这个“典故”不久就传遍了全队。

再以后有人和那马老板开玩笑，说别的都成，唯独不能学他的“妈呀马呀”。一学他就发急，要干仗。拉回死马后，队里给各家分了两匹马的肉。我们都吃了。唯独马老板不许家人要马肉。吃了后才知道所谓马肉酸的传言不是指马肉味道酸，而是吃了马肉很多人犯胃酸。

说完马再说狗。不言而喻，狗是农村人家的重要一员。不知为啥，我们屯好像养猫的人家不多，但不管家里多穷多富，一条狗总是要养的。也没有什么名贵好狗，就是土生土长的土狗。黑白青花黄，各种杂色。名字也土土的，黑子，旺子，虎子，花花。狗最大的好处是不嫌家贫，看家护院忠心耿耿。哪怕屋里院里就没有一件值得小偷下手的东西，它也一样看得紧紧的。

刚下乡时，队里要几个知青跟老乡学做饭，我自告奋勇当了一阵知青食堂的火头军。一起做火头军的几个男知青住在大队保管员老朱家，他们来食堂时老朱家养的那条大黑狗黑子有时会跟着他们来。黑子是条强壮的土狗，胸宽腰细，站着头超过我的腰。浑身黑毛亮闪闪的，就胸口有巴掌大一小片白毛。它那时大约两岁，是刚长成的帅小伙，精力充沛，力气也大。他的小主人，老朱十一二岁的大儿子华子常把它套在小爬犁上，它能毫不费力地拉上一袋二百来斤的小麦加坐在上面的华子嗖嗖地跑，到磨房去磨面。

队里还有它的几个同胞兄弟，也是一样的高大威勐。而黑子就是它们的头。刚下乡，知青吃不惯带霉味的苞米面大饼子和没有油水的冻土豆汤，常有剩下扔掉的。那时食堂也没养猪，所以黑子来了，我就会把人家扔掉的食物给它吃。一来二去，黑子就成了我的buddy。

每天晚上别人吃完晚饭回宿舍休息了，我们火头军还要在食堂把第二天早饭要用的面和好，发上，不忙到九点来钟回不了宿舍。食堂在屯东头，我住的宿舍在屯西头，中间差不多有一里地。走着不远，但吓人的是一路要走过很多人家，每过一家，那家的狗就会大叫着冲出来，好像我是要进他们家偷抢的强盗似的。我不好意思和那几个男同胞说，只好每天提心吊胆地走完这一里地，独怕哪天有条狗真的冲出来把我咬得皮开肉绽的。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走这条路时多了个卫士——黑子。它每晚等到我下班就陪我回家。一路上只要哪家的狗敢叫，它立马冲上去张口就咬，直把对方咬得出不了声才罢休。不久之后，每当黑子陪着我走过，就再也听不到有哪家的狗敢出声的。再后来，有时并没有黑子陪着我，也没有沿路这些人家的狗对我叫了，就好像屯里的狗首领不是黑子而是我似的。

黑子的能耐可不单是当我的“卫士”，它是队里很有威信的“黑狗警长”。每当队里大田披绿，青苗欣欣向荣时，也是很多人家存粮告紧之时。人都吃不饱，家里养的猪就更没喂的了。于是就有人家悄悄打开猪圈的门，把猪放出去，到大田吃青苗。这是糟蹋集体庄稼的很严重的事，所以队里有规定，凡是放猪吃青苗被抓到的，秋后要罚口粮。定规矩时，大家当然都同意，因为毁了庄稼全队社员都受影响。但私下放猪出圈的还是大有人在。原因就在“被抓到”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明明看到有猪在田里，可你追得上吗？就算追上又怎么知道那是谁家的猪呢？可这些问题到了黑子这里竟然迎刃而解。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老朱就带着黑子到大田巡视。只要见到田里有猪，不用老朱招唿，黑子就会飞速扑过去，一口叨住猪的耳朵不放，使劲把猪拖到田边来，让老朱在猪耳朵上做上标记。这一招对中小猪百试不爽。有时遇到大猪，体重足有黑子两倍，个子也比黑子要高，叨耳朵就没那么容易了。几经挣扎猪逃脱了狗口，飞奔而去。这也没关系，黑子会撵着一路狂奔的猪回到自己家，然后它就守在那家人家的院门口，等着老朱来处理。奇怪的是，从来没听到过这样挨抓的猪的主人提出抗议或辩解的，也就是说这位“黑狗警长”的权威是得到充分承认的。

因为黑子，我还做过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有次我们一帮知青被分配去收了苞米的地里刨苞米茬。正在田边等开工时，老朱带着黑子也来这块地了。一看见我这个有些日子没见到的buddy，黑子一边欢叫一边直向我冲过来。跑到了我身边就撒着欢地跳，想要舔我的脸。我一面躲闪一面逗着它玩时，眼睛余光看到我们宿舍的一个女知青阿澄一直在往我身后躲，大概是怕狗。

我想黑子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我偏要让你看看它有多可爱。于是我就引着黑子专门往她那边靠。她越往远处躲，我越引着黑子往她那里跑。阿澄跑着躲着，不小心在一个苞米茬上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裤子被坚硬的苞米茬刮开个大口子。她又羞又急就哭了起来。我见她哭了，一下愣住了。黑子也不解地停了下来。那时我心里感到了惭愧，突然懂得了即便是开玩笑恶作剧也得有个限度，如果让别人受到羞辱或者伤害的话，尽管心里并无恶意，也不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那以后，我再没有和人开过过分的有可能伤害别人的玩笑。

中国有句老话叫狗改不了吃屎，把狗说得好像是有肉不吃就爱吃屎一样。这真是对狗的极大诬蔑，就像说当年的农民不爱吃大米白面，光爱吃烂土豆霉苞米一样。狗不吃草，养狗的人家也没余粮喂狗，年景好时还能吃几口主人吃剩下的苞米煳煳什么的，缺粮的年份连这都吃不上，只有人屎还带点粮食味，你不让它吃屎让它饿死呀？黑子也吃屎（所以我不让它舔我的脸），但被老朱训练得很好，就是别人给的东西除非主人点了头，那是绝对不碰的。饿死也不碰。（它开始时来食堂也不吃我喂的东西，要带它来的住它家的男知青们点头后才吃。）那老乡们吃狗肉吗？答案是“也吃”。有知青把老乡给的煮熟的狗肉带到食堂吃，说很香。但是不像杀了猪，杀猪人家要唿朋唤友喝酒热闹一下的，吃狗肉是悄没声地进行的。我想也是实在缺粮尤其是缺肉所致。到我离开大队回上海上大学时，黑子快十岁了，胸腹和尾巴毛都变成了灰白色，说是眼睛看不清了，也跑不动了，经常看到它趴在老朱家院子里晒太阳。听说老朱家一直把黑子养到老死，埋在了自家房后的菜园里了。

说完了撵猪的狗，就说说猪吧。在人们的印象中，猪就是吃饱了躺在圈里哼哼的又肥又懒的笨家伙。其实在我们那时这个印象是大错特错的。除了不爱干净，老喜欢躺在混着屎尿的烂泥里打滚外，猪其实又矫健又聪明。因为猪是农家主要的肉食来源，售卖后又能得到一些现金贴补家用，所以老乡家对养猪还是很上心的。不管怎么缺粮，除了冬季，一天一顿涮锅水加点土豆皮，麦麸子煳的野菜基本是保证的。但除此之外，能提供额外饲料让猪上膘的人家就很少了。到了冬天，如果有当年没长到可以宰杀出售的分量的猪的话，那就惨了。养猪人家不再提供饲料，白天就把猪放到收割后积雪的大田，让它们自己从雪下去刨吃的维持生命。到了夜里怕觅食的野狼把猪吃了，才唤回家里的猪圈过夜。所以我们那时看到的猪大多瘦精精的，跑起来飞快，有时连黑子这样的壮狗都撵不上。

说猪聪明，也不是说聪明到能在逃避“黑狗警长”的追捕时故意跑到别人家去嫁祸于人，而是说它们能凭着本能趋利避祸。记得有次早上去食堂吃早饭，只见食堂喂的三头猪围着厨房的门拼命嚎叫，人说“像要杀了它们似的”。其实呢，是那天当值的火头军睡过了头，没有准时起床给它们开饭。于是它们自己撞开猪圈的门从圈里跑了出来，围门抗议。还好有它们的抗议吵醒了那个当值的火头军，赶紧起来张罗我们的早饭，否则我们都得饿着肚子出工了。我们就听得那个火头军在那里骂骂咧咧，说，叫！我让你们叫，人还没喂完呢，能轮到你们？！看看，猪们和我们都几乎同等待遇了！

最好玩的是有次过节知青食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有一些不爱出工的知青等在食堂外，说是帮忙，实际是想看看能不能得点油水，像火头军嫌麻烦不想要的猪大肠什么的。那天在杀猪的案板旁就围了五六个知青，都是男的。（女的看到尺把长的刀子捅进猪脖子直插心脏，然后鲜血喷涌而出的景象还是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围观的少。）两个负责杀猪的知青烧好了滚水，备好了接血吹气退毛的工具，就上圈里把准备杀掉的那头猪掀翻，拿绳子绑上四蹄，用根棍子抬了起来。那头猪从被掀翻在地时就感知大事不妙，开始凄厉地嚎叫起来，惹得另外两头还没到死期的猪也跟着鬼哭狼嚎。

等来到案板前，抬猪的刚把猪放下，那头猪不知怎么竟然挣开捆着四蹄的绳子一个翻身掉到了案板下。还没等杀猪人和围观的知青反应过来，那猪翻身爬起，一头撞向人群，撞开个口子就唰的一下冲了出去。这下可是热闹了。只见一只猪拼了命地嚎叫着在前面狂跑，一群七八个知青闹哄哄地跟在后面勐追，从村东头的食堂追到村西头的代销店，又转身再往东跑，正巧我带着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学生都顾不上听我说什么，纷纷跑去看热闹了。我只看见一熘狼烟，从操场边穿过，然后看到有个追赶的知青往前一扑，像是拽住了猪尾巴，听到一阵“抓住了！抓住了！”的欢唿声。再接下去就见那个抓住猪尾巴的知青忽地摔了个嘴啃泥，然后“官兵捉强盗”的一帮子又随着狂叫的该死的猪跑远了。

结果呢，那猪冲出重围，跑到屯外的野地去了，再怎么也追不上了。食堂也只好取消了杀戮的计划。直到几天后，大约是抵御不住饥饿，那头猪又自己回到了猪圈，宣告它的反抗失败。这次再把它抬上杀猪案板时，接受了教

训的人们把它捆得结结实实的。

马，牛，猪，狗都聪明，那什么动物笨呢？老乡们说，羊笨。我们大队养着一群绵羊，主要为了过年过节可以杀了分点羊肉包饺子（大葱羊肉饺子好吃得没话说）。羊是很将就很好养的家畜，不用喂什么精饲料，春夏放到江边的草滩上，冬天也只要喂点干草就行。而且羊老实胆小，爱挤堆不爱乱跑，所以队里就派了个已经干不动重活的老头放着那群羊。那时我们大队有两个牲口圈，干活的牛马在屯子里有个圈，便于饲养员夜里喂饲料。不干活的牲口都圈在江边草滩的大圈里，便于白天放牧。

那年黑龙江涨大水，快把草滩上的大圈给淹没了，队里要把那里的牲口转移回队里来。牛呀马呀猪呀都会游泳，所以都是自己浮水回来，马倌牛倌带着几只狗看着水中的牲口群不让跑散，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轮到羊群就完蛋了！羊不会游泳，队里只能派了船去接运。可是那些只“熊”羊们，见到水吓得抖抖索索的，咩咩乱叫着挤成一团，怎么赶都没法让它们趟过一点点水流上船。结果只好苦了去接羊的人，还得一只只抱上船去，忙了整整一天才好不容易把羊们弄回队里。

养羊还有一项用处，就是卖羊毛。每当春夏之交，羊生出新毛之时，前一年的旧毛就该剪去卖钱了。每当这个时节，就会有一两天的时间队里集中妇女和半大孩子在场上剪羊毛，有时也会有男知青加入。队里会派几个强壮的男劳力专门到羊圈抓羊（羊比猪好抓得多，也不晓得跑，反正一抓一个准），抓住了就绑上四蹄，拎到场上围坐的剪毛人面前。有两三个人一起剪一只羊的，也有单独一人剪一只羊的。因为场上集中了这么多人，热闹非凡。尤其是老娘们，叽叽喳喳的，说东家道西家，荤段子黄笑话满天飞，还特爱逗好脸红的男知青玩。说实在的，我的很多生物生理知识就是这样得来的。

这时节的羊毛分两层，上面是去年的旧毛，下面是刚萌生出来的新毛，两层之间有极薄的一个过渡层。剪羊毛就得贴着羊细嫩的皮肤，沿着这个过渡层细心地剪开，这样剪下的不是散乱的碎毛，而是连成片的毛板。女孩们心灵手巧，很快剪完一只，解开捆着四蹄的绳子，拍拍羊头，羊儿挣扎几下站起身来，抖擞下身子，咩咩叫着自己跑回圈里去了。老娘们心不在羊，男知青有手笨的，再加上老娘们的骚扰，一不小心就会剪破羊的皮肉。每当这时，羊的皮肉会突地收缩，索索颤抖，伴随着细声细气但又像抗议的咩声。

等剪完了，站起来的光羊身上挂着长长短短的伤痕，有的还在流血，说遍体鳞伤有些夸大，但也有点儿惨兮兮的。等到全部剪完，再到羊圈边一看，一圈的羊，全是只有头上和四条小细腿上有毛的光身子，滑稽透顶！这样剪下的毛每斤只能卖很少的钱。因为羊是散放的，羊毛很脏，夹杂着羊粪草秸，不能用于纺毛线织呢绒，只能用来擀毡。好在我们那儿天冷，毡鞋垫，毡袜，毡靴总是有人买的。

我们大队还有一群梅花鹿，那是养着割鹿茸卖钱的。鹿关在单独的圈里，在屯子西头，有时出工走过会看一

眼，但总的来说和我们关系不大，除非哪天有鹿撞死了，我们就能每人分几两鹿肉打牙祭了。鹿怎么会撞死呢？据说鹿的脾气大，急躁。什么事不顺心了，比如发情时没有交配对象，就往鹿圈的板障子上撞。因为鹿能跑能跳，又爱撞，所以鹿圈的板障子又高又厚又密。但就是这样也挡不住往死里撞的鹿。有个别的撞开板障子跑掉了，也有的撞不开反倒把自己给撞死了。

每年割鹿茸是个大事。据说茸的质量根据割的时间差一天就可能差一大等级，所以快到割茸季节了，队里会早早派人先把割茸道给打理出来。所谓割茸道是一个陷坑，连着一条窄道。窄道两边都有障子，窄到只能让一只鹿前进而不能转身。陷坑的深度超过鹿腿的长度，上面架着网，网眼可以穿过鹿腿。到割茸时，鹿顺序被引导到窄道头上，再被窄道两边的人赶着往前跑，一跑跑到陷坑上，四腿陷入网中不能着地，再挣扎也完全使不上劲，于是只能任人宰割，被锯去头上的茸角。

据说雄鹿心爱它的茸角胜过生命，所以割茸季节时有听说鹿自撞身死的。不过那时只知道有鹿肉吃是好事，倒没有人会“小资”到感叹鹿宁死而不愿受辱的刚硬。有知青向队里买鹿茸的，因为听说大补。很贵，纸样的几薄片就要好几元。没买过。听老乡说鹿茸极热，一般人的体质不一定消受得了，有人服用后流鼻血的。还说鹿肉也热，不过每人就分那么几两，就是热，能热到哪里去呢？

被老乡说“傻”的动物还有不少，像熊，兔，狍子，都在此类。说兔子和狍子“傻”的理由，是说它们爱走老路。原路来原路去，不做变化。人摸到这个规律后就可以在它们走的道上放置套子或夹子，轻易将它们擒来做了口中吃食。但也有人不同意。象阳就认为走老道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智慧。因为毕竟老道已经走过一次或多次而没有出问题，另换其他没走过的道却很可能有危险。只不过是人更狡猾，利用了它们的智慧而给它们设下了圈套。

我们屯有个善辨动物走道的老乡，冬天常常到林子里下套子，家里也就间不间地有点兔肉吃，偶尔还有狍子肉。队里有个姓楼的知青，外号漏斗。这小子农活不好好学，歪脑筋却很会动。他见那老乡常常能套到兔子啥的，就也整治了几个套子，可是又不知道该在哪里下套子。这小子贼得很，几次悄悄跟着那老乡出去，想偷偷学着下套子。可光看又看不出个名堂，这小子就想了个绝招：他看好那老乡在哪里下的套子，就在那套子的一前一后下上他自己的两个套子。这一招还真管用。漏斗竟然也套到了兔子！他鬼精鬼精的，怕那老乡发现，所以每天清晨赶在那老乡出去遛套子前先出去把自己的套子收回来。

过了一阵子，那老乡发现自己套到的兔子少了，正百思不得其解呢，听说漏斗套到好几次兔子了，就生了疑心。但自己的套子仍在，没被动过，也不能就诬赖漏斗偷他套到的东西。那也是个聪明人，就悄没声地在天不亮时到下套的林子里守着，结果把赶去收自个儿套子的漏斗抓个正着。

这事闹到大队部，大家当然都知道是漏斗的不是，但你也不能说这个林子只能那个老乡下套子，不许漏斗下吧？所以也只是把漏斗批评了一顿，告诉他以后下套子不许靠近那老乡的套子，也就算过去了。只是那老乡气不

过，老揪着漏斗呛呛。再说离了那老乡找的“道”，漏斗凭自己也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后来他也就收手不干了。

老乡管熊叫“黑瞎子”，说熊傻是因为熊贪心却得不到实惠。说是每年快到秋收时最怕黑瞎子祸害苞米田。那时刚灌满浆的青苞米甜丝丝的，好吃，但不顶饥，非得等黄熟老硬以后才出粮。这时要是招来了黑瞎子就惨了，一大片苞米田一夜就能给你祸害个精光。一是黑瞎子进了田里撒欢打滚，大片还没黄熟的苞米就折断了，结的苞米棒子也就断了继续成熟的机会。二是黑瞎子爱掰苞米棒子，吃了还不够，还要往家带。可是这蠢家伙掰一个往胳肢窝下一夹，接着再掰下一个，掰一个夹一个，前面夹着的那个就掉了。结果忙乎一整夜，苞米棒子掰了一地，最后只带走一个。第二天让老乡看着满地狼藉的半生不熟的青棒子，那可真是欲哭无泪啊。

我们刚下乡那年，听老乡说大队建在屯外小兴安岭山脚下的蜂场遭了熊了。说黑瞎子连着几夜到蜂场偷吃蜂蜜，连蜂巢都给嚼着吃了。老乡说，黑瞎子头上的毛又长又厚，它把头伸进蜂箱吃蜜前还会用爪子把头上的毛捋下来挡着眼睛，这样就不怕蜂蜇了。大队决定派武装民兵带着枪到蜂场值夜，说看到黑瞎子就拿枪打。

除了在动物园从没见过野外活熊的知青可兴奋了，悄悄议论要是打到了熊，每人能分多少熊肉，那被列为山珍海味之首的熊掌又该怎么做。结果武装民兵守了几夜，那黑瞎子却不见踪影。反而传来消息说山坡另一面的青苞米田遭了祸害。大队就调那几个武装民兵到苞米田埋伏。得，那黑瞎子不来啃苞米又回到蜂场偷蜜吃去了！等人再回蜂场，它又去了别的地方。谁说黑瞎子傻？都聪明得和人捉起迷藏来了，简直成精了一样！

领导和武装民兵都火了，说，不守了，拿手榴弹炸死算了。于是把武装民兵撤回，在蜂箱上拴了两个手榴弹。有人说是当夜听到手榴弹炸响，我很怀疑，离着好几里地呢，再夜深人静也听不着那么远吧？第二天去蜂场检查，手榴弹确实炸了一个，可是没见着炸死的熊，连熊的血迹或者熊毛都没见着！不过那以后，蜂场的蜜再没遭熊偷吃过。只是我们也就没有了尝尝那个山珍之首的福分。熊肉后来倒是吃过，不过纤维粗粗啦啦像嚼木头渣子，一点也不好吃。

其实我们大队靠着江边，离着小兴安岭还有段距离，所以和熊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我们县有一些公社是在小兴安岭深处，那里山高林密，和熊打交道的机会就多了。有个叫松树沟的公社，有次某个大队的知青进林子砍柴时捡到只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小熊崽子，也不知道是自己走丢的，还是让它娘遗弃的。知青们看着好玩就带回了队里，养在了食堂里。

反正知青人多，这个给口小米粥，那个掰块窝窝头，那小熊崽子就跟狗似的在食堂长了起来，一年时间站起来就和人一般高了。这时那熊孩子就开始惹麻烦了。倒也不是它存心要惹事，只是它就像淘气的孩子，不知不觉就闯了祸了。比如，它好好地像狗那样四肢着地在桌子下面找吃的，不知想到哪出突然站了起来。好，桌子翻了个个儿，一桌子的碗啊盘啊稀里哗啦全砸地下了，可它毫不知错地又得悠悠地放下前爪到别的桌下找食去了。也有时哪

个知青好好在路上走着，突然背后让人勐拍了一下，生疼，待回头想要生气骂几句，一看，是那熊孩子！笑也不是骂它也听不懂。

公社的带队干部知道这事后，到那队里和知青说该把熊孩子送回林子里去。说这熊孩子越长越大，力气也越来越大，它又不知道轻重，哪天备不住一掌下去打出个人命就麻烦了。打死知青固然不行，打死老乡也得负责不是吗？知青们掂量掂量轻重，知道带队干部说得不错，就忍痛同意把熊孩子送回林子去。他们连赶带打好不容易把熊孩子撵进林子，可还没等你走呢，那熊孩子早就跟上来了，熟门熟路往队里走，走得比你还快。

赶了几次不成，有人拿了鞭炮来吓唬那熊孩子。这次把它吓得逃进林子不露面了。刚想松口气呢，那小子却又在屯子里晃上了……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也许知青大回城后没人喂它，它也只能回林子自力更生去了；又或者继续在屯里晃悠，哪天让人剥了熊皮做褥子了吧？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北大荒，好地方，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铁锅里。等我们到那里时，前两件是见不到了，可野鸡飞进酸菜缸却是我亲身经历的事。那年冬天我被借调到县知青办办上山下乡小报，住在知青办，在县直机关食堂搭伙。大多数在县机关工作的人都在县城有家，在食堂搭伙的多是单身汉或者像我这样借调在那里的人，所以在食堂吃饭的人不多，尤其是晚饭时。

说是县直机关食堂，伙食真的不咋样。除了吃细粮比较多之外，午饭晚饭都只有一个菜，厨房做什么我们吃什么，没得选的。吃晚饭的人少，也就十几个人吧。菜呢，基本是老三样轮着来：熬白菜，熬萝卜，土豆黄豆汤。午饭人多些，菜也稍好些，因为县领导有时会来吃饭。不过也就是白菜豆腐，酸菜粉条什么的，有时有点荤腥，会来个土豆炒肉片，或者木耳炒鸡蛋。

那天晚上在食堂吃饭的大约有十一二个人，馒头土豆汤。正吃着呢，从厚棉门帘下不知怎么钻进只野鸡来。那只野鸡从清冷干爽的屋外一头钻进被笼屉的蒸汽和屋里的人气弄得暖湿浑浊的所在，一下失去了方向感，突然飞起来朝着还透着些亮光的窗户撞去。它这一飞，就有人叫了起来：飞龙！飞龙！（我们那儿的老乡管野鸡叫飞龙。我也不知道是所有野鸡都叫飞龙，还是只有某一特定品种的野鸡才叫飞龙。而飞龙是仅次于熊掌的山珍之一。）

随着这个叫声，屋里就像开了锅，吃饭的人都站了起来。有摘下头上皮帽扑打的，有扬着手唿叫的。不记得坐在我旁边的是谁，反正是个一眼看到关键的聪明人，他一把拉起我就站到了门边。我俩一人一边抓紧了棉门帘，生怕有人这时掀起门帘走进来，放走了自投罗网的山珍。被人这么一赶，原本就晕头转向的飞龙就在餐厅里乱飞乱窜起来，整个餐厅鸡飞人跳，闹成一团。

餐厅里的闹声引来了厨房做饭的大师傅。他随手抄起盖在餐厅一个大缸上的盖帘（一种用粗苇子制成的圆形器具，用于盖缸盖锅碗瓢盆的）挥舞起来。噗拉一声，不知是他的盖帘打到了飞龙，还是那只飞龙慌不择路，它竟然

直直地掉进了缸里！那是食堂的酸菜缸，酸菜已经吃掉不少，所以上面是尺把深的腌菜水。那号称飞龙的家伙在又酸又咸的腌菜水里扑腾，拍着翅膀飞不起来，把腌菜水溅得围捕它的人一头一脸。

还是那个大师傅眼明手快，他一下又把那盖帘盖到了那口大缸之上，这样那飞龙就成了缸中之“龙”，再没法逃走了。他让那只飞龙又在缸里折腾了一阵子，听听扑腾的音响小了，才慢慢揭开盖帘的一边，旁边的人几双手一起伸进缸里，拎出了那只战利品。那是只很漂亮的野鸡，麻红色毛，带着白色斑纹，还有尺把长黑白夹杂的尾羽。只是连惊带吓，又在腌菜水里浸得时间长了些，成了真正的“落汤鸡”，有点蔫头搭脑的。

抓住了飞龙是好事，可接着又成了麻烦事。因为飞龙是当时在场的十几个人齐心协力一起抓住的，所以理该由这十几个人享受。但食堂的人说不能单独为我们做。也就是说只能是做了全食堂搭伙的人大家吃。这十几个人当然不同意啦，这又不是食堂买到的食品，是我们抓到的，就该是我们个人的啦，凭什么大家吃？争论不下后只好互相妥协，就是说定飞龙不在午饭时做，而是在晚饭时做。这样虽然不能只限于我们当时在场的人吃，但至少比午饭时人要少。

可是，食堂要在晚饭时做飞龙的消息传得飞快，到第二天晚饭时，等着吃饭的人比平时吃午饭的人还要多。大约是那个大师傅看着人多，往烧着土豆飞龙的锅里多添了两舀子水吧，打到我们碗里的就成了间着几块飞龙肉的土豆汤了！一只一斤多点的飞龙烧了一大锅的汤，还能吃出什么“山珍”味呢？反正我是觉得还不如在老乡家吃的蘑菇炖小鸡好吃。

最后说下鹅。当时老乡家养鸡受限制，所养母鸡数不得超过家庭人口数，而且养的母鸡数由代销店登记在册，得按数交售鸡蛋。老乡家也不愿多养不下蛋的公鸡，除了留一只“踏蛋”的外，其他的刚长成“童子鸡”就杀了炖蘑菇了。虽然我们屯靠着黑龙江，但没见有老乡家养鸭子的，恐怕也是缺饲料的缘故。不过屯里养鹅的人家倒是不少。可能是因为养鹅不受限制，鹅蛋个大，却没有交售任务，加之鹅能吃草，不依赖粮食饲料，所以经济效益比较高吧。我们那里养的鹅个头都很大，长成了得有十几斤重。鹅爱干净，浑身白羽，只有翅膀的硬羽是浅灰色的。

鹅是我最不喜欢的动物，原因是因为鹅欺负人，尤其是好欺负老弱稚童。听老乡们说，牛那么大的个子，可从它们眼睛看出来，比它们小的人类却像天神般伟岸，所以牛对人恭敬顺从；可是鹅那么大点个子，从它们的眼睛看出来，人却非常之渺小，因而轻易就想攻击。

有时人好好在屯子里走着呢，不知怎么惹得旁边闲逛的鹅不满意了，一群鹅拍打着翅膀，伸长脖颈，低着脑袋，咣咣叫着追着你跑。看到过有十来岁的小孩被鹅追咬跌倒了吓哭的。我的室友小河就曾被哪家的鹅追着在腿上狠狠咬了一口，把棉裤都咬破了。要不是我们下乡时发的棉裤又大又厚，那一口不咬出血，也得在她腿上留下条十天半月退不掉的紫印子，吓得她以后见着鹅就绕道走。因为鹅凶恶，所以也能像狗那样给老乡家看家护院，不让外人随便进院子。

那年春节，我们宿舍八个女知青没人回上海探亲，都留在队里过年。食堂给大家分了白面和肉馅，让各宿舍自己包饺子吃。我们几个凑了点钱，想再添点过年的吃食。小敏向一家老乡买了只十四斤重的鹅，花了五元钱。买了鹅，知道鹅凶，自己不敢抓，就央求那家十三四岁的小子海子抱着鹅送我们宿舍来。路上小敏问海子会不会杀鹅，因为我们宿舍的人从未见别人家杀过鹅，都不知道咋杀。那小子满口牛皮，说那容易，一会儿我给你们杀了得了！小敏高兴得连声感谢。

那时队里用知青安置费给我们盖的宿舍是一套两间的土坯墙草顶屋。里屋一铺大炕，是睡觉的地方。外屋靠里屋的墙边砌着一个灶头，上面有大铁锅。因为我们吃食堂，灶头很少做饭，主要是烧水兼烧炕用。灶边是口储水的大缸。另一边的墙旁放着我们各自的农具，铁锹锄头镰刀斧子什么的。外屋和里屋之间有道薄板门隔开。待小敏和海子带着鹅回到我们宿舍，听说有海子帮我们杀鹅，大家都挺高兴。就按着海子的吩咐，在铁锅里烧上了腿毛的滚水，备下了接鹅血的盆，还从屋外搬了噼柴的砧子进屋。一切齐备，我们都饶有兴趣地围着海子，想看他怎样杀鹅。

海子让小敏和另一个室友帮忙，抓住鹅的翅膀连带压住鹅的身子，他左手抓着鹅头，把鹅脖子放到砧子上，右手拿起我们噼柴的斧子照着鹅脖子就是一斧子。手起斧落，鹅头和鹅脖子分离，那鹅突然发疯一样拍着翅膀挣扎起来，小敏和另一个室友说什么也按不住了。她们刚一松手，那只没了头的鹅奋力一挣站起身子，就在屋里疯跑起来，没了头的脖子还扭动着往外喷着血。那个刚才还牛皮哄哄的海子吓得脸色唰白，扔了斧子转身逃到门外，还反手给我们关上门，把我们和那只疯跑的没头鹅一起关在了屋里。

我们几个同样吓得不轻。一面躲着这只发了疯的没头鹅，一面纷纷逃进了里屋，关上了那扇薄门，还在门后顶着，生怕那只鹅撞进里屋来。那只可怜的没头鹅，因为没了脑袋眼睛看路，在外屋东奔西撞，一会儿踢翻了接血盆，一会儿撞倒了铁锹锄头，外屋一片稀里哗啦的响声。过了差不多十几分钟，我们悄悄把门打开一条缝，七八个脑袋凑在门缝边，偷偷看着那只把血弄得到处都是的鹅跑得慢了下来，最后怦然一声倒在了地上。

后来那只鹅煮了整整一大锅。我们请隔壁宿舍的女知青一起吃鹅肉，吃着吃着就有我们宿舍的人忍不住笑起来，笑得没法吃东西。这个好不容易憋住不笑了，另外一个又笑上了。如此再三。别宿舍的人问，我们又都绝口不说，把人家弄得莫名其妙。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可怕也最好笑的事之一。而且为了这个缘故，我有很多年不吃鹅肉，直到近两年品尝到“深井烧鹅”为止。

不知为啥，我们那儿没有农村常见的毛驴，直到1975年公社建立水利营，才见到我们公社唯一的一头毛驴。那头毛驴是一个老乡回山东探亲时带回黑龙江的。因为我们那里的畜力车和农机具都是按照牛和马的尺寸打造的，没法使驴，也不能单为一头驴特意打造一套车啊什么的，所以那头驴自打来了黑龙江就一直闲着在草地吃草晒太阳。

水利营按照各大队人口摊派劳力。有驴那个大队的头很精明，和公社讨价还价后说定一头驴顶两个劳力，于是这头养精蓄锐的黑驴就到了水利工地。只是水利工地全是原始的人力推独轮车，那驴别说推两辆独轮车了，一辆也推不了哇。公社干部觉得上了当，就想把驴退回那个大队换劳力，但让水利营管后勤的老乡拦下了。

一个水利营三个连，三四百壮劳力天天要吃饭，按照规定各队要给自己队派的劳力提供口粮，可是副食却没法解决。公社让各个队送，也只能送些个土豆萝卜什么的。水利营的解决办法一是从哪里弄来一条船，到黑龙江主航道打鱼；二是开了个豆腐房，让各队送大豆来做豆腐。这样三个连可以轮流吃上豆腐。只是人多吃得多，一天得磨很多豆子。用老乡家自用的手拐的小磨当然不行，而大磨得人推着走。推磨这事不好做，很多人推着走几圈就晕得站不住了。这时那头灵秀的小毛驴就大显身手了，蒙上眼睛，它拉着磨走半天都不带歇的。而且那毛驴也乖巧，天不亮就自己跑到豆腐房门口，早早地等着“上班”了。待磨完当天的豆子，喂它点儿豆腐渣，它就开开心心上草地吃草玩儿去了。可真是比两个劳力都顶用。

再要说动物，就是“进口物品”了。在我们极端饥饿的那年，真是不管什么能吃的只要搞得到都吃了。比如夜里掏屋檐下麻雀窝里的麻雀；到黑龙江江汊子里钓鱼；捡江里的河蚌等等。麻雀好掏，夜里拿手电一照晃了眼，呆呆地等你伸手抓来。没有渔具，拿大头针弯个钩，拿根线系上，上面拴一段玉米秆里剥出来的白芯做漂子，在钩上挂上蚯蚓，扔到水里，嘴里念叨着“鱼儿鱼儿快上钩，没有大的小的也将就”，看漂子一动赶紧甩上来（大头针做的鱼钩没有倒刺，慢了鱼就跑掉了），三四寸长的小鱼有时一钩挂俩。只是麻雀小鱼都小得可怜，折腾半天还不够塞牙缝的。大的是河蚌。黑龙江里有蚌，挺容易摸。因为老乡不吃那东西，摸上来一个至少有大海碗那么大。把壳砸开，挖出里面的肉烧着吃。只是蚌肉又老又腥，放多少辣椒大葱都去不了那股腥味，后来不那么饿了也就再没人吃了。

说了那么多动物，没说牛，因为牛没有有趣的故事。一头牛打出生，到老迈，就是默默地辛勤劳作的一生。牛没有马的速度，但有马所没有的耐性和韧劲。拉犁拉耙拉重载的车，没见过牛撒气不干的，最多“哞”地一声表示下不满。干活的马吃豆饼，吃扬场中扬下的次等的粮食，夏天还有青黑豆（撒播的大豆结荚时连枝叶带豆荚一起割下喂马用），一样干活的牛最多喂点麦麸子。等到老了，干不动了，还要向人们贡献一张皮和一身肉。老乡们把马看得贵重，但对牛是疼惜。也许他们从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bdhzqgs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北京知青与陕北乡亲的乡愁

作者：何翔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公众号:zqwtyj

【编者按：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陕北乡亲写的文章，他以亲见、亲历，发自肺腑地记述了当年北京知青给他及同伴，给当地老百姓和陕北农村带来变化的点点滴滴。这仅是上千万知青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奉献青春、作出贡献的一个小小缩影。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北京知青”，在我一生中都深深地镌刻在心里，因为我现在所学的知识，就是从北京知青的到来所启始的！我的文化启蒙老师，就是北京知青，他们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他们让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他们引导我们如何做人，犹如古代教育孩子的三字经中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后天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才有了好与坏的区别。正因如此，我在写《康家沟记事》村史时，其中有一篇专门写北京知青。最近我看到了《北京知青在志丹》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章，是我们村的北京知青所写的在向阳沟插队的往事，和对这里父老乡亲们深深的情结。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对这片乡土的眷恋，还深深地刻在心里，这是人性的真情流露，令我感慨万千！因此，我今天激情提笔，写写我记忆中的北京知青。

童年的事情大多忘记了，如果能记住某些事或某些人的话，可能一生都忘不了。1969年初的冬天，当时我七岁了，也到了记事的年龄，忽然有一天听父母亲说今天前沟要迎接北京学生，我当时也不懂北京学生是干什么的，就和一群娃娃跑到前沟看热闹。到了前沟一看，沟口路边搭起彩门，两边插着绿色的柏树枝子，中间挂着条幅，也不记得写的什么字，路两边放着锣鼓。当时欢迎的人很多，有些人是从山岭上来的，他们拉着很多毛驴，说来接北京学生。等了一段时间后一列车队来了，大人们开始敲锣打鼓，一会儿从车上下来一群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他们穿着新式衣服，有的戴着当时叫火车头棉帽的，有围着方块或长条围巾的，他们手中拿着语录本高喊着口号，当地的大人们也喊起口号，整个沟口沸腾了，场面十分热闹壮观。到了下午，各个大队按照县上和公社的分配，一批批的把这些学生娃接走了。我还记得很滑稽的事，有些知青把面包（当时我们也不懂是面包）伸向毛驴嘴边让毛驴吃，说：“你可不要咬我！”有的爬上毛驴背却骑不稳，一歪就摔下来了，很搞笑。真是热闹难忘的一天。

我们大队一共分了34名知青，分别到一队、二队和四队，三队因山岭队没分配，我们一队分来了11名知青。他们住在前面的红门窑里，刚来时他们先到各家户吃饭。我们一群娃娃们很好奇，可就是不敢进他们窑洞里看，经常在外面听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等好听的歌。这些歌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我还记得很清楚，至今萦绕耳边。

1970年春天，我们大队办起了小学校，由北京知青担任教师。从此，我们这些山村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突变，这个变化是我们人生的起点，这个转变是北京知青给我们这代人带来的文明福音。陕北，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正像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当年在《西行漫记》里写的一样："人类在这里生存真是个奇迹！"我的父辈们都是从榆林过来的拓荒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干旱，榆林紧靠毛乌素沙漠边缘，靠天吃饭的人们颗粒无收，由于饥饿根本无法度过灾年，只好背井离乡从榆林来到了志丹。现在向阳沟的住户95%以上都是从榆林来的，由于贫困与饥饿，没有一个上学的，方圆百十里地几乎没有几个识字的，逢年过节不会写对联，老乡就在粗碗边抹上些油，扣在红纸上印上几个油圈圈，可见当时的贫困落后。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哪里还有钱供孩子们上学呀？这就是陕北过去这个不毛之地，人民生活的悲哀。

1970年新春送吉祥，孟春的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很漂亮的，梳着羊角辫子的北京女知青，她的名字叫张德慧，对人很和气，让人一见就有一种亲和感，她来到我家是要接我上学的。她和我的父母谈了很久，父母亲终于同意我上学了。当时我十分高兴，晚上激动得很长时间睡不着，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用一块很旧的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第二天，太阳刚刚冒花，我就早早地背着这个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了，从此，迈开了走向知识殿堂的第一步。上学后，我们没有书，没有笔和纸，张老师叫我们每个娃娃用木条做个沙盘，在沙盘上教我们写字，还教我们唱歌，讲外面的世界，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张老师的歌唱得十分动听，记得有一次双河文艺汇演，晚上我们都去看了，参加演出者大多都是北京知青，张老师在台上唱得十分动听，最后还做了一个舞蹈动作，引起了全场掌声，那个完美的动作让张老师好比天边飞来的一位仙女，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1984年我遇到康家沟木材检查站的一个职工，他是北京知青，过去在顺宁插队，我和他谈起张老师，他说他认识，并说张老师父亲是京剧演员（其实张老师父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精通国粹，喜好京剧）。我说：怪不得张老师的歌唱得那么好，"门里出来带三分"，从小熏陶，言传身教，原来如此啊！这是题外话。

上学后，又有两位女知青来教我们，杨昭和高文香，她们共同教我们认字、绘画、唱歌，杨老师给我们画天安门、宝塔山，给我们讲故事，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叫《消息树》。我们天天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看着画中的天安门，心里盼望着快快长大，飞出大山，到北京看天安门看大世界。然而看北京看天安门，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个梦，无法实现，直到2005年，在小建等知青的帮助下，我们才圆了这个梦。

通过逐步接触，庄里的知青我们都认识了，而且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起叫得出。一队知青分别是：张小建、胡国成、李华、李芳、张德慧、杜晶国、杨昭、高文香、马爱明、徐岩平、许淑琴，并且逐渐认

识了二队的知青，有张涤尘、陶家平、方元平、郑刚、袁桂芝、许昕、许卫、孟宪敏、张春英、何军、胡向东、王英媛。那时播出什么重大新闻最高指示，北京知青晚上就敲锣打鼓一道沟地走上一遍，喊着口号庆祝，我们这些娃娃们便跟在后面喊口号，直到结束为止。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跟着二队的郑刚他们一直跑到二队的碾道。这些北京知青就是宣传队，就像播种机，他们把文化知识和现代文明，像久旱的甘露，洒入黄土地，滋润我心田，我们的识文解字、汉语拼音、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等，都是他们教会的，我在上二三年级学写信的时候，用汉语拼音能写一封信的内容。进入社会后才知道，汉语拼音学好了，对汉字的理解是何等重要。

知识青年，这响亮的名字，产生于特定时代，他们在懵懵未开的年华，从繁华的首都来到我们陕北的穷山沟，从一个个奶油娃娃渐渐地磨砺成了一个个有文化能吃苦的农民，他们从身体和生活上，进行了一次次脱胎换骨的人生蜕变！从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到黑灯瞎火的小山村，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状态，到离别父母，样样都要自己动手的社会底层，这样撕心裂肺的痛，他们都没有倒下，队里的知青每一个都是好样的！他们拜农民为师，学背柴、做饭、推磨、滚碾子、耕地、锄地、打场、放牛、放羊、喂猪……，各种家务活和农活都学着干，他们都很吃苦，而且又虚心好学，渐渐地学会了独立生活，能够干各种农活，认清了五谷，还认识了很多草本植物。几十年过去了，还能叫出好多庄稼的名目，真是不简单。他们把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融入到实践中，教会了乡亲们很多新的知识。记得当年大队基建队搞了一项水利工程，有十几名知青参加，从二队后沟到辛庄湾修了一条长达八里多的水利灌渠，使前川三个生产队的百亩川地得到灌溉，亩产大大提高。记得当年在向阳沟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科技实验站”，有四五名知青参加，每年冬天实验站人员便到海南搞植物育种，春天回来后，再在大队实验站种植，通过试验推广玉米高粱谷子杂交技术，使粮食亩产翻倍增加。知青们在打坝修田时也是样样走在前。更难忘的是1971年夏天，有天晚上发洪水，槐树庄滩坝被洪水冲开了，张德荣、张小建（基建队正副队长）带头，十几名知青和社员跳进激流，用人墙堵住决口，奋战整整一夜，最终堵住了决堤，保住了近百亩农田。还有1974年冬，一队在山上打麦子，柴油机燃着麦桔，小建扑向火堆，不顾身上的衣服燃起了火苗，带领乡亲们积极灭火，保住了场上近千斤麦子！知青们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真是写不尽道不完！

1974年前后，很多知青都招工返城了，队里只剩小建一人坚守，以后又有10名知青从北京先后自愿来到了村里，都分到了我们一队，他们是：谷志杰、陈晨光、王珊、孙承蕊、蒋健、李晓呜、宋亦农、张凡、薛丹华、林英。这批知青来后我们也十几岁了，和他们打交道的时间更多了。我上初中后一直很爱看书，而这些新知青有很多书，他们刚来，不会做家务，我就经常帮他们做，但前提是要借书看。给我看书最多的是薛丹华，她经常辅导我学习，我也常常帮她烧火噼柴推磨，女孩子天性温柔，她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并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几十年了，再没有见到她，真是十分思念！我的文化水平，就是在她的辅导和帮助下提高的，而且几十年来喜欢阅读的习惯一直没有变。由于受北京知青的文化影响，加上自己的好学，村里人需要写个什么都来找我，虽然现在有很多回村来的学生，但乡亲们都认为我写的比较实际，大家信任我，证明是对我的认可，全大队很多人现在都叫我“老秀才”，

这都是张德慧、杨昭、高文香、薛丹华、张凡、李晓鸣、陈晨光等多位教师所赐。只可惜心中常思念的两个人——张德慧和薛丹华再没有见，2005年到北京也没有找见。

由于我们村北京知青有这种连续性，成为北京支持的重点。北京先后给队里送来了拖拉机和扬场机、水泵、电线电缆、铡草机、打玉米机等，按当时的经济价值计算，要达到好几万元。我们一队真是让其他几个队羡慕死了。每到星期天或放假，小建就派一个知青领一群学生娃参加队里劳动，夏季割草沤肥，给玉米地追化肥、拾麦穗等。我记得领我们最多的是薛丹华、张凡，记得有一年晨光有病，到了冬天，知青住的窑洞没有火炕，小建就给我父亲说让晨光到我家和我哥俩住在一起，晨光和我们住了一个冬天，每天给我们讲很多故事，讲相声演员侯宝林、马季，教我们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总之，知青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改变着自己，影响着群众和我们十几岁的学生娃娃，我们也爱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讲故事，讲天下事，讲北京上海广州，讲美国苏联，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讲台湾等等。正因为如此，在我的心里从小就与北京知青结了不解之缘，直至现在，凡有知青回村，我就是再忙，也要跑前跑后的陪同他们，认真地做好接待工作。

北京知青一直忘不了陕北故乡情，忘不了向阳沟的山山水水与父老乡亲。时光流逝，四十多年过去了，知青们对向阳沟的乡情却越来越浓，越来越深，很多知青走后，大都陆续回村看望过这里的乡亲们。张小建走后，几次回村探亲，张凡、李晓鸣、冯学军、谷志杰也都回村看望乡亲们，蒋建万里之遥从美国归来，专门扛着大摄像机回村看望乡亲们。特别是2004年10月2日，对向阳沟人来说是件大喜事，张小建等20位当年在向阳沟插队的知青回村了。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老乡们敲锣打鼓，几个队乡亲都来了，知青们和乡亲们的手紧握在一起，有的拥抱着一起流下了眼泪，大家相诉着多年的相思之情，当时的场景，令很多县乡的领导干部都十分震惊和感动。中午聚餐时，有的老乡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有的老乡介绍家乡的变化，知青们纷纷发言，寄情向阳沟的下一代，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建设好新农村。由于时间关系，下午他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张小建和我约定，来年一定要带着乡亲们到北京。2005年农历七月十五，我带着几个队的乡亲们共10人到北京，知青们听说村里来人了，都抽时间来与我们一起话家常、吃饭，让我们很感动。直至现在去过北京的老乡还很想再去北京，他们都说北京好，北京有咱们想念的人！

向阳沟，是40多位北京知青视为故乡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乡愁，乡愁是一代人的记忆，那里有眼泪有欢乐，有美好的回忆，有无限的情思，无论谁走多远，对故乡都有一种深刻的思念和眷恋，人们的根和梦都在乡愁里，浓浓的乡愁时刻萦绕着远离故乡的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愈发强烈！浓浓的乡愁，刻骨铭心，割舍不掉，是人们挥之不去的精神食粮和童话生活。北京知青虽然走了，但他们的魂魄还在这里，他们的乡愁还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就是“知青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延续！岁月虽然一页页无情翻过，但北京知青与乡亲们的情思是永远割舍不断的！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向往，就在向阳沟！

今年农历八月十三，丙申年中秋前夕，张小建、李华、冯学军一行再返向阳沟。作为“先遣队”，为2019年插队50周年回乡纪念活动打前站，他们再次踏上昔日青春的土地，喜看第二故乡的新变化，送来北京知青刘丹华创意的“幼儿趣味故事盒”，要为培育老区人民的后代，传播文明科学知识，再播种子，普洒甘露，为向阳沟山村，陕北父老乡亲们送上金色中秋的一份深情厚礼！

古人云：“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祝愿北京知青和陕北人民的乡情，血脉相融，共同化作继承延安精神，建设新延安的“中国梦”宏图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文作者何翔（满成），2016年9月13日写于向阳沟，来源于《北京知青在志丹》公众号。）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告别延安

作者：姚锐

来源：微信公众号 30号院

原来老陈的心里不仅装着伟大领袖的语录文章，也装着社会的冷暖寒凉，在关键的节点上，闪烁出人性的光辉。

来源：微信公众号“私人史”

″你要走，我们也不拦着。″

1970年冬天，我告别延安去部队当兵。我的主要行李还是那只涂着棕色油漆的大木头箱子。那个时代，一般老百姓都是用这种笨重的木箱装行李，特点是防护性较好，缺点则是沉重。

记得两年前来延安插队那天，到公社接我们的乡亲们，只有一个排子车，拉不下我们9个知青的行李，几只大木箱是乡亲们背在背上，走一程歇一程地背了二十里地到村里，让我吃惊不已。

从村里到延安的汽车站有五十里地，先要走十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公路，即使在公路上能搭上车，也不会把你送到指定地点，所以，带着这只百十来斤的木箱，一头一尾还得用排子车。

队长让我们的邻居胡旭生拉车送我。胡旭生原本是个石匠，虽然身材看上去并不魁梧，但被称为是村里力气最大的人。他的力气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我和比他力气小的队长较量过。有一天利用打场的空间，我和队长比试摔跤。我那年刚16岁，只是个没有发育好的少年。没两下，我就被队长压在身下。无论怎么挣扎，我感觉队长都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身上，压着我的时候，他还哈哈大笑地和旁人拉话，没有介意我的拼命反抗。

我们知青刚到队里的时候，是住在两孔危窑里面，但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过了一阵子，队里让五个女生搬到了较高处的一孔窑洞，我们几个男生则搬到了在山坡中部的胡旭生那里。我们搬出之后，那两孔危窑还真是塌了。幸亏搬得及时，要不然，我们就可能及早地“光荣”了。

胡旭生家有三孔窑洞，但是这个石匠的家，却没有一孔窑洞是石面的。在陕北，判断一个家庭是否富裕，可以

考察一下他家的窑洞。

最好的窑洞，是在窑洞外面箍一幅石头面，再安装上木质的大圆窗，就是毛主席在杨家岭演讲照片中他身后的那种。再就是没有石面，只有木质的圆窗。最差的是只有一个木门，门上有一个糊着窗户纸的小方窗。

当地农民追求幸福生活，也是要不断改善自己的住宅条件。记得有一阵儿我们暂住在王老汉脑畔（上面），出门得路过他家。那年春天，他请了一个面相猥琐的木匠给他的土窑做圆窗。在当时村里有人出去要饭的时节，他还能拿出钱来改善住宅，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人家。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比较早，脚步声惊醒了一个睡在他家窑洞前的人。那人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露水，我才看清是王老汉自己，他笑了一下，就去摆弄他的烟袋锅子了。原来他在窑外露宿，是腾出地方让打圆窗的木匠和他婆姨住在了窑里面。

胡旭生不是没有能力追求好日子的人。从衣着上看，他不像个当地农民。他头上没有像大家一样扎一块白羊肚毛巾，而是戴了一顶褪色的黄帽子，由于摘帽带帽的缘故，常用手捏的那半个帽檐耷拉着。

他身上的那件有羊绒翻领的外套，也不同于一般百姓，但挂满灰土，像是件民国时期的富人遗物。他有一张标准的脸盘，他的婆姨也是全村二十多户人家中最漂亮的女人，一张巴掌大的瓜子脸，像个影星，只是笑起来比她们还好看。如果除去一身因为带孩子而留在衣服上的斑斑点点，再洗洗脸收拾收拾，还是挺上镜的。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这一对看起来半城半乡的夫妇不能施展自己的手艺和能力谋求私利，只能在黄土地上跟着集体刨食吃。如果不是钱紧，他们也不会拿出一孔窑洞换取我们的知青安家费。

我们几个虽然住在他家，却并不在他家吃饭。那时，我们知青各带口粮分到各家入伙，但都是在他的上家和下家，说是他家伙食较差，娃又多，不方便我们搭伙。作为邻居，他婆姨在细小的事上都对我们关照，见面就笑，但是她从来没有给我们送过什么他家的吃食，猜想是实在是拿不出来像样的东西。

我当小拦牛的时候，大拦牛的告诉我，有人想给她送粮食。那是有几天胡旭生上城里没在家，有人背着半袋白面上门找他婆姨寻欢。结果被她举着菜刀追杀出二里地。说二里地有点演绎的成分，真追出二里地，那还不是自投罗网？她也就是追到自家的街畔而已。

可以想像的是，她举着菜刀，怒目圆睁，那风拂短发的样子，像刘胡兰，或是像手握大刀的穆桂英。

我们俩一路奔波五十里，胡旭生拉车在前，我跟在后面，终于到了延安汽车站。胡旭生常上城里，在汽车站有熟人，所以也没有让我买车票，而是帮我搭上了一辆开往铜川的大货车。亏得他力气大，帮我把大木箱搞上了车，又看我在大木箱子上坐稳，他才跳下货车，向我挥手告别。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我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汽车发动机响了，我坐在车尾，见一股黑烟腾起，渐渐模糊了眼前的延安城。这时，在烟雾中我看见一个人跑来，头上是胡旭生的那顶黄帽子。近前一看，就是他。他叫着我的名字，用一种略带着商量的口气说，给哦一块钱吧，回磕路上买几个馍吃。

我浑身一激灵，是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那时候乡亲们没有钱，即使有，出门也很少带钱。要不就是自带干粮，要不就是沿路讨口吃的。那天走的急，大清早起来，也没有准备干粮，一路奔波五十里地到延安，他又上上下下忙活一通，还得拉着排子车再走五十里回去。往返拉车步行一百里，这劳务，这乡情，还有这省下的车票钱都是我的亏欠啊！我赶忙摸出一块钱，递给胡旭生。他接过钱，摆摆手，憨憨地一笑。这时，大货车也启动了，他在车后越来越远，一个拐弯就看不见了。

事后想起来，我总想给自己两个耳光。在饭馆里一碗汤面三毛钱的时代，怎么就给了他一块钱啊？是我当时钱紧，还是少不更事？！

说起走得急，也是事出有因。我接到家里要我去湖北当兵的信以后，觉得应该告诉主管领导，就去公社找了管我们知青的北京干部老陈。老陈是从北京市抽调到延安专门管理北京知青的干部。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大会上，领读毛主席着作是他的一绝。领读时，他不看书本，而是全篇背诵，并用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断扫视会场台下的我们。当时，一个人的上进，不是看你是硕士还是博士，得看你能参加到哪一级的“积代会”。后代漫不经心地听我们侃这段历史时，会冒出一句：鸡和你们有什么关系？“积代会”的全称是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那也是个华山论剑的场所，不但要看你做的怎样，还要看你对毛着掌握的多少。能够大量地背诵毛主席着作，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学养深厚的表现。在我心中，老陈这个马列大叔，绝对是“伟光正”的代表。

有一次，老陈到我们村巡查，中午在知青灶上吃饭。蒸锅里的杂粮馍馍是主食，还有半锅没有油水的熬菜。那会儿，由于长时间吃素，偶一吃肉就闹肚子，所以我们也就成了素食者。鸡蛋是乡亲们舍不得吃的东西，政策允许养的几只鸡下了蛋要去集市上卖钱，再买些灯油和布匹之类的生活用品。所以，我们也没有把鸡蛋作为日常食品，平时不备着鸡蛋。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是谁发财谁狗熊，谁受穷谁英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上，就成了这些简单的食物。老陈一路采了些野菜，吃饭的时候问谁有黄酱。一女生拿出一包压箱底的干黄酱，掰下一块用水稀释后给了老陈。他把野菜洗洗，沾着酱，就着馍馍有滋有味地吃起来。我看他吃的香，也去拿野菜蘸酱，别人也如此，老陈连忙说，你看你看……，像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捂住茴香豆，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一瞬间，马列大叔也像是一个普通的插友。

老陈在公社办公室听完了我要当兵的讲述，正襟危坐地回答我，没有组织的统一安排，不会批准我私自去当兵。我没有照镜子，但是我确信我当时是一脸极度失望的表情。老陈可能也相信，我这个循规蹈矩的年轻人，一定会放弃当兵的想法。因为此前有一次我请假回京探家，公社没有批准，我也就没有回去。其实在那个通讯靠吼的年

代，你回家再回来，也没有人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辞而别的人多了。

当我转身要离开时，老陈忽然偏开半个身子，像是话剧舞台上的两面人，偏离他原有的角色，轻声对我说，你要走，我们也不拦着。话音虽轻，却像重锤敲响了我这榆木疙瘩。让我顿觉云开日出，霞光万丈。原来老陈的心里不仅装着伟大领袖的语录文章，也装着社会的冷暖寒凉，在关键的节点上，闪烁出人性的光辉。

当天我回到村里后，赶紧收拾东西，一是新兵已经开始集训，二是也怕夜长梦多，所以第二天天没亮，就和胡旭生夜奔了延安城。

社会底层在那个混乱年代的一种清醒

在文革这场大灾难中，学校停课，学生失学，毛主席说实践出真知，号召青年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学习，学工、学农、学军。整个社会以大老粗为荣，以知识越多为越反动。文革中，部队干部组织子女入伍学军，也是出于一种自保。只是比起学工学农，尤其是比上山下乡，至少有吃穿上的优势，因此引发社会上不公的议论，史称走后门当兵。

说起吃穿，那会儿已经没有时装和时装概念，无论男女，最美的服装就是军装。若找个畅吃畅饮的地方，也就是部队。在新兵连，虽然菜就是盐水煮萝卜，但是大米饭敞开吃。新兵的成分主要是各地农民，从吃相上看，也都是饥民。新兵连的粮食吃空了，由老连队的余粮支援，直到把你吃成个吃饭不积极的人。

但是，从人生的旅途来看，这后门兵的吃穿优势，就能转化为人生的优势吗？

改革开放之后，恢复高考，我被北外分院录取。带着新生的喜悦，我去拜访本院熟悉的蒋老师和韩老师。蒋老师不巧外出，与韩老师叙旧之后，韩老师又就如何学好外语，给了一些鼓励和谆谆教导。而这蒋韩二位老师，却都是一起在延安李渠公社插队的同年级的北京八中同学。

我离别延安之时，这二位还在地里抡镢头掏地，多抡了两年之后，被外语学院录取，学成之后留校当了教师。而我早吃了两年饱饭，却丢了辈分，与他们的关系，从同学变成了师生。

我走后不久，开始招工，陆陆续续，大部分知青都去了西北的厂矿，到第三、四年，剩下的知青也大都被招进了大学，再剩下的基本都是有些特殊情况的人了。

延安的插队经历在人生几十年的旅途中，虽然时间不长，却刻骨铭心般难忘，像是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大家人虽已告别延安，但是心却告别不了。微信上有延安的插友群，还群中套群，种类不同，但凡有人在群里说一声，延安某苹果网站滞销，插友们便一哄而上，还唿朋唤友拽上单位，非得买他个库底朝天。延安的红薯丰收了，有人弄来一车，借个由头，来个薯聚，聚会中的陈年老话题，还是那告别不了的延安。

“薯聚”那次，坐在我旁边的是同年级的女生X同学。聊起来，原来她就是我们学校同学中最后离开延安的人，在那呆了五年。她讲述了在那次大学招生中如何落选，以及此后的孤独生活等等。回忆往事，滔滔不绝，其中的凄惨悲凉，令人同情。再往深聊，又一打听，这个“苦大仇深”的同学，现在侨居加拿大，经常坐着头等舱、公务舱往来中加之间，在科技交流方面事业有成，竟是个凭自己奋斗而坐拥亿万财富的成功人士。

看来，冥冥之中，只要你努力，上天自有补偿和安排。

2005年，北京与延安通了火车。同学数人以王庄的同学为主，一起乘火车来探望这个难以告别的延安。但是一行之中，女同学Z却是来做最后告别的。她已经到了癌症后期，在与疾病的博斗中，也要来满足一下那心中依依难舍的情怀。

我被告知，行程已经安排好，当地有人接待。果然，一下火车，三辆日本越野吉普车先把我们一行迎到了一所星级宾馆，Z同学在那里安排了两桌丰盛的酒席招待大家。有同学告诉我，带着三辆车来迎接我们的，是Z同学当年的“暗恋者”。

“暗恋者”是一位她们庄的陕北大汉，他总是面含微笑，略带矜持，却又言语不多。倒是一位活泼有趣的庄里大妈，在酒过三巡之后，唱起了信天游，把我们带回了那遥远的年代。

她们的王庄在我们这条沟的把口，守着延河，也靠着公路，比起我们沟里的村子，算是比较富裕的地方。除了这八个同班的女生，和她们分配在一起的，有三个高中男生，再就是几个本村的回乡知识青年，“暗恋者”就是回乡知识青年之中的一位。

那时候，听我们村里的乡亲讲过，前面王庄的北京女子在河里光着耍水哩。一打听，原来是她们姐妹几个到延河里游泳。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这是她们在北京读过多少遍的神圣诗句，穿上泳衣，到村旁心仪已久的延河里打几个滚，扑腾扑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是，在保守的乡亲们看来，大姑娘家家的，应该捂得严实点儿。怎么这“白格森森的大腿”不只是在信天游的歌词里，还竟然袒露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村里的小路开始忙碌起来，奔腾的脚步，飞起的黄土，等到她们从水里探出头，乡亲们已经围拢在岸边。延河对面的马路上，行人和车辆也停止了往来，竟然一时造成了交通堵塞。人们都聚拢过来，聚精会神地欣赏她们这出新编八女投江。

当然，生活不会总是这么浪漫。看她们日后的记载，八个女孩的体重加起来也就是一头牛的重量，但是两头牛

拉的大铁犁，让她们八个去拉。从砖窑里往外背砖，几块砖怎么就这么沉呢？放秤上称称，有100斤，自己再往秤上站站，才80多斤。

是落难的公主遇上了憨实的农夫，还是……。“暗恋者”的暗恋，是个人的情感秘密，旁人无以知晓。但是，我们是种地的，知道土里的种子到了春天，是一定要发芽的。把青春的少男少女像种子一样洒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让他们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怎么不会滋生出情感的枝芽和花朵？

那时候，我在山上当小拦羊的，听信天游的酸曲听多了，也开始掺和村里青年的男女话题。

村里有个青年叫郭大志。他有一天告诉我，他的志向就是要娶前面乎家坡的一个姑娘。姑娘叫聊儿，他说，长得可美了，如果能够X个一挂，就是死了也值了。他那带着坚定的坏笑，激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有一天利用赶集，绕道乎家坡，来到了聊儿家的街畔底下。抬头一看，正巧，一个小姑娘正在柴垛那拿柴禾。一套破旧的褪色蓝棉服上，生着一个稚雅的小脸庞，雪白粉嫩，异常夺目。像是在荒僻的草坡上突然跳入眼里的山丹丹花，让人为之一震。意识到我们看她，她眼光一动，脸色更加红润，抱起柴禾含羞而去。

这让我想到，为什么古代的皇帝要在全国遍寻佳丽，这山沟里也确实藏着金凤凰啊。如果在这沟里再多呆些年，一个处于青春期的男生，没有理由不响应党的号召，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娶个想象中的村花或沟花什么的。

那一阵儿，郭大志有了明显的衣着变化，不仅穿上了件新棉袄，还不知哪找来个围脖，围上之后，像个电影上的五四青年，担起粪来，有股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味道。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批知识分子被迫害的岁月，一个青年农民在追求心上人之时，摆出的最美造型，竟然还是知识分子。村里学校的马老师也依然受到全村的尊重。

这也是社会底层在那个混乱年代的一种清醒吧。

以后郭大志被招到武汉当了个炊事兵，从贫苦的乡村进了大城市的部队厨房，好像老鼠跳进了米缸。我在湖北当兵时去武汉看了他一次，已是油腻小哥的大志，应该是爱上了大米，再没有提起聊儿。

在延安，那里有令人难以告别的苦难和青春。

话说回来，我们一行在酒店用过欢聚大餐，住宿宾馆，第二天一早去延河边照相。左手是延河，背后是宝塔山。这是当年差不多每一个知青都留过影的地方。

照相的高潮是给“暗恋者”和Z同学来张合影。在大家的起哄声中，“暗恋者”不再矜持，尽管有妻子在旁督军，也咧开嘴，发出兴奋的笑声。Z同学本就长得标致，半个肩膀轻倚在“暗恋者”身上，焕发出带着几分羞涩的

灿烂笑容。有情人终成照片，也算是了了大家的一个心愿。

照相之后，我们各回各村，我回到了阔别了三十多年的小村新庄科。

村容村貌乍看没啥大变化，还是那二十来户人家，只是未来的计划有点惊人。改革开放以来，退耕还林，政府给村民发粮食，除了林间经济，就是精耕细作村里的那点坝地。往村里的后沟走走，原来荒僻的山顶上竟然看到有汽车行驶，是公路修到了这里，这里发现了石油。

后沟的路旁，有几个抽取石油的磕头机一上一下的在工作，为此，乡亲们能够得到一些补贴。重要的是，乡亲们再也不需要进山打柴，开始使用天然气做饭取暖。

说起打柴，那可是最重的体力活之一。想想，在那个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商品交换的年代，一家人全年的做饭取暖，都要靠男当家的在冬闲时打来。家家户户门前有一个长方的高大柴垛，是陕北农户的标志。打柴的地点很远，被称作梢林，那些可用作柴禾的灌木都长在那些不宜耕种的山坡上。钻进林子，首先是寻找那些干枯的枝杈，一是不破坏植被，再就是抱起来，背起来都重量轻。第一次打柴，我先瞄上了一个枯枝，但是怎么揪拽攀折都弄不下来，想抡斧子砍，又被身后的灌木枝杈挡着，无法使力，憋困之中只能拿斧子剁。等弄出两根干柴，力气没了一半。

乡亲们把打好的柴在坡地上整成一个扁方形，贴背好背，而且一般都高出头半米左右。而我的柴捆再怎么整，也圆咕隆咚，再加上干少湿多，像个石碾子，套上背绳，不使大劲站不起来。我前面的同伴梅兄憋住气，先向后一仰，再一收腹起身，不料柴垛冲过头顶，把他带向前方。而他脚下又是坡地，往下一迈步，就来了个前滚翻。百八十斤的柴垛带着他的头冲向冬天坚硬的耕地，我想这下完了。但是等到他滚了一圈，一看，还好，头颅尚存，未戳进胸腔，是柴垛先着地，有一个缓冲救了他。背上的湿柴再也不敢卸下，我们只能沿着河沟走，累了找个高台把柴捆架上歇歇，到了家门口，卸下柴捆，已是精疲力竭，气血全无。后来，我们知青分到各家吃饭，一个原因也是免了打柴之苦。

现在有了气，有了电，在欢迎聚餐上，乡亲们和我一起嚼着油馍馍，计划着等村前的公路修好后，在旁边建个大楼，楼下商铺出租或经营，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连冬暖夏凉的窑洞也不想住了，要告别穴居时代。

而这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实现这个计划的所需资金竟然是两仟万。这让我这个本想做些私人捐助的“小款”，顿感囊中羞涩，不好出手。过去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乡亲们，改革开放以来，似乎变得有点财大气粗。

看看众乡亲，怎么少了胡旭生？他们告诉我他一家搬到了延安城里。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与以往相比是掉了个个儿。以前是城里向乡下转移，知青下乡插队，是青年劳动力的转移，“五七干校”则是成年人的家庭转移。农业以粮为纲，搞得连花生米都成了送礼佳品，但是粮食还总不够吃，

依然年年有人在外要饭。

改革开放以后，是反过来，鼓励城市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改变，保护私有产权，激发了生产积极性。记得有个作家还在人民日报写了篇散文，描绘了他吃上了油炸花生米的幸福。乡亲们不再愁吃，多余的劳动人口就向城镇转移。城镇及工业的发展也需要用人，所以队长和胡旭生也就进了延安城。

下午还正在村里串门，王庄那边打来电话，让我们赶过去吃晚饭，说是专门宰了一只羊欢迎大家。

说来也巧，出村时，在村口竟然遇见了胡旭生。他听说我回来，特地从延安赶回来见我，若不是在村口相遇，还就失之交臂了。

在村里每到一家，我都掏出些钱给孩子们个红包，所以跟胡旭生见面没说几句，我就赶忙掏兜，把还剩下的几百块拿出来，往他手里塞。尤其是想到离开延安时他送我，只给了他一块钱的往事，只恨现在手上现金不多。谁知他手劲还是那么大，一把推开我，长长地哎——了一声，笑着说，你小看人嘞！他告诉我，他在延安开了两个饭馆，还有些什么买卖。这个当年得不到施展才能，还差一点穷的丢了老婆的石匠，现在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已经是个小资本家了。

告别了胡旭生去王庄，路过乎家坡，想起了当年那个窃视流眄，国色天香的姑娘，她怎么样了？后来问村里的知青高大姐，她给我一张这姑娘现在的照片，说她后来嫁到了城里。不看还好，一看照片让我非常失望。没有了青春时期的目光，竟找不到一点国色天香的影子。

当我赶到王庄的时候，一个石板房的屋子里，坐满了人，一口大锅里炖煮着羊肉，雾气和香气弥漫在空中。主食是荞麦做成的疙坨，蒸熟后，再浇上锅里的滚烫羊汤，放上香葱和辣子，令人胃口大开。

由于荞麦面做的疙坨颗粒比白面粗，更有利于吸收汤汁，也许因此被认为是最佳搭配，才也有了这句着名的信天游唱词：

荞麦疙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我和身旁的同学在讨论和捉摸着疙坨是哪两个字，没有在意“暗恋者”与Z同学有哪些互动和交流。但是大家一边吃着，一边都在念叨和玩味着这两句唱词，有意无意都彰显了晚餐的主题。

人间的真爱本就可贵，在人生谢幕之际就更加令人珍惜。“暗恋者”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在他貌似略带呆傻的外表下，却似乎藏着些执着的算计。多情自古伤离别，他也许感觉到，这是他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暗恋”的人，来向他做最后的告别，他也要用一锅滚烫的羊汤，来表明他生死相跟的火热心肠。

情谊虽然是感人的，但是也让人摆脱不了心底的忧虑。

在那个口号漫天，红旗遍地的时代，与我同年级的一个女同学，在插队时也最终嫁给了一个当地农民，生了两个孩子。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她开始了回归北京的长征，虽然她工作能力优秀，虽然她甚至不惜离婚，但也只是调到了距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就不得不停止了疲惫的脚步，于前两年撒手人寰。

从一个偏远乡村的村民，到成为首都北京市的市民，在当今，这也许是一个普通人，几代，或许是永远也走不完的距离。

我最后一次见到Z同学，是在一次关于延安的北京同学聚会上。是因为有人在北京的酒仙桥修建了一个延安知青博物馆和陕北风味餐厅，大家闻讯相约而来。那次，她的脸色更加灰暗，离她去世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她还是来了，活动中，她坐在后排，言语不多。

我猜想，和我们一样，在延安，那里有令人难以告别的苦难和青春。

2021年5月15日2021年6月5日修改

作者：姚锐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私人史”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张健:难以忘怀的记忆 （上）

做人的标准有很多，但首先必须要懂得感恩。

2013年6月3日，我和夫人专程从天津去唿伦贝尔草原给姐姐扫墓。回来后，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草原，沉浸在草原之行的亲情、友情、民族情的多重情感交融中。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情感如潮涌般激荡着我的心……

21日晚，我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辗转反侧……天色已渐渐发亮，实在睡不着，我索性起床，打开窗户，发现已经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小雨已把路面打湿。

我点燃一支烟，悠然地品着。飘渺中的烟雾在我的眼前幻化，而后好像被一只小手抻着，牵引着我的情感与思绪。往事如烟，烟云渺渺中，三十八年间来往于草原的所有，梦幻般地一一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1976年，我向部队领导提出要求复员的申请，并提出复员后不回天津家乡，要去唿伦贝尔草

原“接过姐姐的牧羊鞭”。申请得到领导的批准后，我于当年的3月份，来到了姐姐曾下乡的地方--唿伦贝尔草原新巴尔虎右旗额尔敦乌拉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队（姐姐牺牲后被命名为张勇队），成为一名草原牧羊人。

在牧区三年的牧羊人生活中，我历尽了千辛万苦。经过岁月的

流逝，这些艰难困苦，已在我的脑海中淡忘得几近模糊，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

鲜花和掌声过后，欢送与迎接我的人们都已散去。于是，我既投入了牧区的真实生活--下包放羊。由起初那种热烈的场面，一下子转换到牧区落寞的牧民生活，反差太大，我一时还稍有些不适应。因为第一次走进蒙古包，我所面临的是语言不通、生活方式不同、生产知识不懂。在茫茫草原上牧羊的寂寞、孤独、无助，与部队那种大家庭式的生活方式完全相悖。没有了喧嚣，也没有了热闹的场面，一下子沉进了另一个世界。这让我一个过惯了大城市及大型集体生活的人，怎么能习惯呢？好在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是我自己要求来牧区的。以前通过学习姐姐的事迹及1971年参加纪念姐姐牺牲一周年的活动时，我曾来过牧区，也曾亲身体验过牧区的生活，对牧区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但现实的生活与简单的体验是有区别的。刚到蒙古包放下行李，还未待落座，我已经有一种恶心要呕吐的感觉。赶紧冲出蒙古包，到外边唿吸一下新鲜空气，因为包里的膻味太重啦。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那时的城市生活所需全凭供应，汉民不供应牛羊肉,所以我是不吃羊肉的，就因为那种膻味我受不了。我也不适应牛奶的味道，我吃不惯手扒肉，喝不惯奶茶，几天下来饿得我两眼冒金星。放羊时只好拔草地上的野葱、野韭菜吃，吃的我满嘴冒绿沫。当包里的老牧民了解了我的情况时，就为我做烙饼、焖面条吃。此情此景使我倍感温暖，也深深地感到我的意志比不上姐姐。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会失败，更会给姐姐丢脸。我一直在想：接过姐姐的牧羊鞭，不能只是形式，而是需要切实的行动。

经过近一个月的磨练，我基本闯过了牧区的生活关。

语言是相互沟通的必要形式，掌握不了语言就如同哑巴。融入牧区生活、参加牧区生产交流及感情的联络、沟通都需要语言表

达，可蒙语与汉语实不相通的，想要我去融入牧民中间，语言就是最大的障碍。

刚到蒙古包时，我只会说一句“塔赛努”（您好），其他的什么也不会说。人家说什么我完全不懂，我说什么人家也不懂。只有相互以打手式的方式来交流，感觉太难啦。好在当时的西旗知青、牧区敖特尔小学（马背小学）的老师高娃走包教学，来到我们包时，看到这种情况后，主动留在包里陪我十多天。她做我的蒙语老师，教我学习简单的生活用语，为此我备受教益，至今我仍称她为“我的老师”。

在牧区，只要知青们相见就会相互交流学蒙语的感受，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我基本能用简单的蒙语与牧民交流啦。

学蒙语，就是要敢说。说错了，人家笑话我也不怕，只要有这种精神才能尽快的学会蒙语。

掌握了简单的蒙语会话后，在生活及生产上能做些简单的交流了，我再也不感到孤独了。

自回津到现在，已有三十五年啦，远离了牧区，没有了语言环境。当年所学到的蒙语，至今

已遗忘得差不多啦。但说来也怪，每次回草原时，一见到牧民们，我好像就有了灵感。一下子就能想起好多的蒙语词汇，还能简单地说上几句，也能稍稍的听懂一些，可一回到天津就又都忘啦。这就是感情，情由所致呀。

每次回草原看望当年的牧民时，我们相互间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拥抱、亲吻、流泪，相互诉说着离别的思念。有了这种感情怎能不使人感动，在这情感的驱动下，怎能不使人的灵感突然间迸发

呢？

蒙古族人民，自古就养成了善良、淳朴、宽容、豁达及好客的习俗，但也有嫉恶如仇的一面。当他们认为你好，那你就总是好，一旦认为你不好时，再怎么说都不行。如果与他们交往，你若不拿出真心、真感情对待，那你怎么能成为他们的朋友呢？更谈不上那种近似于亲人的感情了。就是因为有了这种质朴的情感，使我们之间有了一种近似亲人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地思念他们，有一种离不开的感觉。所以我现在每隔一两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每次回去都有一些老人不在了，这使我感到非常的遗憾。如果不经常回去看望他们，一旦有一天老人们都故去的时候，我将留下终生的遗憾。这是我的想法，也是老人们给我提出的“要求”。

请放心吧，亲人们！我会经常回去看望你们的。

语言关、生活关，经过艰苦的磨练，就算是闯过啦。

最难的还是生产关，在勇闯生产关的过程中，不但在我的思想中留下很深的烙印，在我的身体上也留下了终生抹不去的痕迹。

要想当好羊倌，首先要学会骑马。在城市中是很少见到马的，见到的也是那种马拉大车。那种马总是慢慢悠悠、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草原上的马与其皆然相反，在草原上驰骋的骏马总带有一种烈性，不熟悉马的性格的人，是驾驭不了马的。在学骑马的过程中，我曾摔断过两根肋骨，也曾从马上摔下来，但脚却套在马镫里，被马拖着跑，至今胳膊上还留着很深很大的疤痕。

在冬季里迷路，赶上暴风雪，打马飞奔着寻找蒙古包。当马蹄陷进鼠洞，一个闪失，我差点从马上掉下来，顿时吓出一身的冷汗。我心里明白：如果从马背上掉下来，就有被冻死的危险。

吓得我再也不敢打马飞奔了，只好放松缰绳，信马由缰地任凭

它去哪。最后我真就体验到了老马识途的本领--半夜把我带到了蒙古包。这件事在我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艰苦的牧区生活，锻炼了我的毅力，也磨练了我的意志。虽然在草原的经历只有短短的三年，但这三年的经历，足够我受益一辈子。

我热爱草原，我更感恩草原。正是经过草原的磨练，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在遇到任何艰难困苦时，我都能轻松的走过来。

这只是我简单地叙述了在草原闯三关的经历。但是在草原的三年里，最使我难忘的，就是感情这一关。

在草原，我与那里的牧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他们的呵护帮助下，我学会了蒙语，学会了骑马，学会了放羊。1978年我由羊倌升为牛倌，又多掌握了一门生产知识。

最让我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些善良、淳朴的牧民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至今我仍然坚信这一点："做人的标准有很多，但必须要懂得感恩。"

嘎拉森大姐是我姐姐到草原后，住的第一家蒙古包的主人。她家的孩子较多，生活中很累，那时姐姐放羊回来后就帮助她照顾孩子，做家务，她与姐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71年，我随母亲到草原参加姐姐牺牲一周年纪念活动时，曾与嘎拉森大姐照了一张相片，她至今仍保留着。我每次回去看她时，她都拿出来让我看，并对我说："小弟，这是咱们1971年的合影，我一直珍藏着，每当想你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看。你可千万别忘了大姐呀，要经常回来看看我呀。"多么温馨的话语，多么淳朴的情感，多么亲切的大姐呀。

记得当年在草原时，嘎拉森大姐家就在我们队部附近，她的爱人恩克.莫勒根，一位达斡尔族汉子，非常可亲可敬的“好老头”（这是知青对他的昵称）。知青们经常去他家吃饭，“老头”就到克尔伦河去给大家打鱼，头天下午赶着小马车去克尔伦河，转天上午赶回来给大家炖鱼、焖米饭，把知青都叫去痛痛快快的美餐了一顿。

民柱尔，当年的生产队长，一个典型的蒙古族汉子。黝黑的脸庞，大大的眼睛，不苟言笑，初见给人一种威慑感。但内心善良、细腻。每次我回草原他都要亲自杀羊，煮手把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醉不散。每次临走时，他都亲切地对我说：“兄弟，你要经常回来呦。”

真情一句，感天动地。这真情，让我魂牵梦绕，让我深藏于心。面对情同手足的兄长，我怎敢违约呢？

我姐姐的老同学、一起下乡的战友周萍大姐，曾对我讲述过，她每次回草原，都是“痛痛快快地喝上三碗酒，吃上三斤肉，然后坐在草地上豪放地哭上三碗眼泪。”（周萍大姐的原话）这种方式既有怀念战友的情感，又有思念草原的情怀。

不是要把自己灌醉，而是这盛情实在难却呀！（未完待续）

（作者为知青的好榜样张勇烈士的弟弟）

（来源：新巴尔虎右旗天津知青联谊会主办《克尔伦通讯》总第345期）

张勇简介

张勇，女，天津市四十二中毕业生，1969年4月25日到新巴尔虎右旗额尔敦乌拉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队下乡。1970年6月3日，她因抢救生产队落水羊只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19岁。

1970年6月，天津女知识青年张勇为抢救集体财产，不幸落水，英勇牺牲。10月9日，中共唿盟革委会核心小组、唿盟革委会作出《关于学习张勇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号召在全盟范围内立即掀起一个向张勇同志学习的高潮。

10月，《唿伦贝尔报》以3个版的篇幅发表长篇通讯报道张勇事迹，同时配发社论，进一步号召群众学习张勇先进事迹，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经过《唿伦贝尔报》、《黑

龙江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报道，张勇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她成为全国上山下乡知青的典型和榜样！

1971年2月，《黑龙江日报》第一版全文刊登黑龙江省革委会作出的《关于学习张勇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并多版面发表长篇通讯报道张勇事迹。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张健:难以忘怀的记忆（中）

第一次回草原

我第一次回草原，已是回津后的第十七个年头。自回津后，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草原，想念着亲人，想念着曾经朝夕相处的牧民们。由于诸多原因，那时我没有能力重回草原，只能把这万千的思念记录在我的梦境之中。这十七年里，我不知多少回在梦中重回草原，策马扬鞭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牧羊在蓝天白云下；去走访每一户牧民家；坐在姐姐的墓前与姐姐诉说着手足之情。

梦是美好的，在梦中我又回到了草原，延续着我对草原的思念。可梦也是无情的，当梦醒来时，心里总有一种无名的惆怅，一种难于言表的失落。

1995年，母亲离世前的嘱托，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千万不要在我没了以后而忘了你的姐姐，要常回去看看她呀。”听了母亲的临终嘱托，我感到内疚，感到惭愧。我撕心裂肺地哭着告诉妈妈：“放心吧！我会的。”

在母亲走后的第七期（35天后），我与三姐及侄子在天津市河西区劳动局李局长、赵科长的陪同下，来到了草原。到姐姐墓前的日子，正是全家人为母亲过七期的日子。家人在家乡为母亲祭拜，我们在草原祭奠姐姐。那种心情，真是太难受啦。在姐姐墓前，我想起了小时候与姐姐在一起的情景；也想起了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的艰辛日子……思念母亲、怀念姐姐，悲痛、伤感，忧伤，交织在一起，心如刀搅……我在难以自恃中，伤心欲绝，几近昏厥。

扫墓过后，我们来到民柱尔家，他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蒙族式的酒宴。一杯啤酒喝下去，我就已醉得不省人事。连与牧民们述说感情的能力也没有了，悲痛的心情使我醉晕。因我心脏不好，回到旗里宾馆后，三姐怕我出事，给我服了速效救心丸。那刺鼻的药味使我惊醒，悲伤痛苦的心情，让我痛哭了一个晚上。

当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阿镇，乘坐的汽车行驶在西旗到满洲里的路上时，一只只的草原雄鹰一直在追逐着我们的汽车。此时此刻，我感觉到这草原雄鹰就是姐姐的化身，她舍不得我们离开她，一直在追逐着我们，希望我们常来看她。

第二次回草原

第二次回草原是相隔了七年之后的2002年。那时在西旗阿镇，建起了全国惟一的思歌腾（知青）广场和知青文化长廊，我与许多当年的老知青受邀，来参加剪彩仪式。这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新右旗政府做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开拓性的大胆创举。

在西旗，我们看到了旗委、旗政府及各级领导，为建立知青广场和知青文化长廊而殚精竭虑，我们为此深受感动。文化长廊展出了知青当年下乡牧区的许多老物件有：蒙古袍、皮帽子、木箱、旅行包、被子、衣服、水壶；还有老照片、下乡通知书等布置得井井有条，将知青在草原上艰苦奋斗的历史情景一一再现。由此，我们深深地感悟到：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几十年来没有忘记当年的知青。他们通过这种形式，将知青在草原上艰苦奋斗的经历，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仅仅是为了一次怀念，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抹不去的历史记忆。

第三次回草原

第三次回草原是2007年，正当内蒙古自治区建区六十周年之际。自治区电视台的编导们来到天津，采访曾经在内蒙古草原下乡的知青，要在建区六十周年庆典时，对广大知青为建设内蒙古的功绩续上一笔。我参加了知青的受访座谈会，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城市快报》的记者张晨女士，在采访时问我：“有多长时间没有回草原了？”我说：“已经有五年啦，由于诸多原因我现在没有能力经常回去。”

她向我做了承诺：“我们会帮助你圆了重回草原的梦想。”

2007年4月，在《城市快报》的记者高丽红、张晨、蓝飞的陪同下，我与爱人及外甥女再次踏上回草原的路。一路上我向记者们描述了这些年每次回草原时的天象变化，我告诉他们：“在广阔的大草原这片神奇的净土上，是极有灵性的。姐姐已完全融入了这片净土之中。姐姐也是有灵性的，她已与草原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灵性，这些年我们每次回草原都能体现出来，只要是一到满洲里，天象就会发生变化，不是下雨就是下雪。”他们不信。待我们到了西旗，天气即刻发生了变化，阴云密布，寒风唿啸，坐在宾馆的房间里，就可听见外面寒风的唿啸声。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起身准备去墓地扫墓时，出门一看，外面下起了雪，那雪粒打在脸上有如刀割般的疼痛。这还能去扫墓吗？大家怀疑着，当我们准备乘车去墓地时，雪停了。待我们即将到墓地时，天已放晴，展现出蓝天白云的景象。在我们扫墓完毕，乘车离开时，又是阴云密布。

第四次回草原

第四次回草原是2008年，参加知青下乡四十周年活动，曾在西旗下乡的50多位知青同车前往。邢燕子大姐、侯隽大姐也受邀一起前往。《城市快报》的记者高丽红也与我们一起回草原，我与她玩笑地说："你等着瞧吧，待我们快到满洲里时还会下雨的。"她根本不信，并对我说："你所说的，那不过是正常的天气变化，没有这么神的事。"当列车快到满洲里时，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我问高丽红："我说的怎么样？这回你信了吧。"她回答说："真神啦！如果这样，咱们下车后怎么办？"结果当列车即将停靠在满洲里车站时，大雨已经停了，并在天空上出现了一轮红日，将天空映照的通红。西旗接站的人员，对我们说："你们太幸运啦！大雨刚刚停下，你们就到站啦。"

第五次回草原

第五次回草原时是2010年的6月份，由内蒙古《北方新报》的首席记者张泊寒陪同一起去的。这次是我和爱人及儿子一起去的，以前我每次对儿子讲起草原的事及他老姑及我的经历，他根本不信。这次带他来，就是为了让他体验一下我所说的草原以及草原人民的美丽与淳朴，再有我的年龄渐渐地大了，带他来就是想让他继续替我延续这份情感。

此次回草原的事，让唿伦贝尔市办公厅《唿伦贝尔要览》编辑部徐占江主任得知后，十分重视，并向市委领导作了汇报。市委领导也非常重视，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到所到旗市，指示各地要

以最高的规格全程热情接待我们。正是如此，我们所到之处，受到了各级领导及牧民的热情接待。

这次回草原给姐姐扫墓，天象又像以前一样发生了变化：早晨起床时，天气还是晴空万里，白云飘扬。待我们乘车去墓地的路上，又时有阴云密布，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待我们到达墓地时，已经云开雾散。当我们祭奠完毕，乌云又笼罩了天空。在姐姐墓前，我哭诉着对姐姐说："姐姐，你听见了吗？小弟今天带着你的小侄子来为你扫墓，这次带他来就是要让他亲身体验一下草原人民的热情，今后就由他来延续这段情感。"待我起身时，瞬间鼻腔就流出了

血，整个手绢都染成红色。

这是见到亲人的现象，民间都有这样的说法：当故去的人见到亲人时，都有此种现象发生。

第六次回草原

第六次回草原是2012年的8月份，我去参加由《嗯伦贝尔要览》编辑部、天津新右旗知青联谊会与新巴尔虎右旗委宣传部联合编辑出版的《知识青年的榜样--张勇》一书的首发式。

此行有《嗯伦贝尔要览》编辑部的徐占江主任，《嗯伦贝尔日报》的林曙光主任、《满洲里日报》的张贵山主任，与我和爱人一同前往。

在海拉尔乘车去西旗的路上，时断时续的下起了雨，这就是草原特有的天象--云彩雨。

到西旗后，下午我们参观新巴尔虎右旗博物馆，出发时天气格外晴朗，蓝天白云分外美丽。在馆内参观时，忽然听到隆隆的响声，我说："这是不是打雷的声音。"讲解员说："不是打雷，这是我们馆内的中央空调的声音。"我说："不对，中央空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声音呢？"抬头望着博物馆那蒙古包式的透明天窗，说话间外面已是大雨瓢泼，雷声隆隆。

参观完，我们在馆内等了一会，雨渐渐小了一些。我们准备乘车离开时，天空已经放晴，在阳光的反射下东方出现了一道彩虹。随行的林曙光主任说："张哥，这是姐姐知道你来了，为你哭泣，这道彩虹是姐姐送给你的哈达。"虽是说笑，但我坚信。

顷刻间，在那道彩虹的上方又出现了一道彩虹，两道彩虹闪现在天空，简直太美啦！林曙光主任又说："这道彩虹是送给嫂子的。"

我不迷信，但我相信，在美丽的草原上有着天人合一的灵性。

第七次回草原

第七次回草原就是2013年的6月份即姐姐牺牲43周年的忌日之时，我与爱人再次来到草原。

当我们在《满洲里日报》张贵山主任的陪同下，从满洲里市乘车到西旗时，一路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当进入西旗地界时，天气已变得阴云密布了，傍晚天空淅淅沥沥的下起了细雨，唉！真神了！

这连续七次回草原，每次都是这样，难道是巧合吗？

不是的，这就是灵性，这就是亲人的感悟。只有在这神奇的草原，才能出现这种神奇的景象。相隔几千里的亲人们的相互思念，感动着上苍，老天爷也被我们的亲情所感动。

我爱草原这块神奇的土地，我爱草原上淳朴、善良的人们，我也深爱着我那已经逝去四十三年的姐姐，我会在

有生之年常回草原看望他们。常回家看看，是我的念想！

因为草原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张健　2013年6月22日 草于津

（作者为知青的好榜样张勇烈士的弟弟）

（来源：新巴尔虎右旗天津知青联谊会主办《克尔伦通讯》总第346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张健:难以忘怀的记忆-补续（下）

我的姐姐张勇，是在1969年4月25日积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来到唿伦贝尔大草原的。

记得家人们一起为她送行的那天：知识青年们上车后，都抢着坐在列车的窗口与家人们道别。与家人离别的场景是那样的悲怆，我们送行的家人却唯独找不到她。当列车缓缓开动的时刻，终于在窗口看到了姐姐，我哭着追赶着列车，频频地与姐姐招手。列车渐行渐远……这是我与姐姐的最后一面，这一瞬间从此刻在了我的脑海，为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1970年6月3日，也就是姐姐到草原十三个月后的一天，她为了抢救生产队落水的羊只，光荣牺牲。

中共新巴尔虎右旗委，根据姐姐生前的多次申请和她的英雄事迹，追认她为中共党员。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当时唿伦贝尔隶属黑龙江管辖）做出决定，授予她“革命烈士”称号。

1971年，我随母亲到唿伦贝尔草原，参加当地纪念张勇烈士牺牲一周年的活动。我在那里住了近一个月，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课。那些日子，我亲眼看到姐姐生前生活过的地方，无论是汉族还是蒙族，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人们都怀念张勇。当时在姐姐墓前，人群络绎不绝。知青战友们步行几十里，赶来参加纪念活动，有的甚至特地骑马，从百里以外连夜赶来。特别是我们每到一地，人们只要听说我们是张勇的亲属，都异常热情，围住我们问长问短。记得有多次，我遇到几位当地牧民，当他们知道我是张勇的弟弟时，便一把拉住我的手，眼泪“簌簌”地直往下掉。每逢这种情景，我心里总在想：为什么牧民们这样怀念我姐姐，对她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

在草原的一个月里，牧民们含着眼泪告诉我许多姐姐生前的动人故事，回答了一直萦绕于我心头的疑问：

有位女牧民得了肺结核病，姐姐知道后，马上把自己铺的褥子和毡子给病人送去。发现病人的丈夫不在家，就邀了一位知青战友一同搬进蒙古包，担负起他们的家务劳动，精心侍候病人。病人的痰血溅到身上，她不顾传染不怕脏，却千方百计地防止病菌传染给病人的孩子。这位牧民拉着姐姐的手，激动地说：“你比我的亲人还要亲哪！”

牧民达日玛老额吉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冬天快到了，草原的冬天是很冷的。姐姐想到这位牧民老大娘一个人生活，需要照顾，就拿着自己准备做棉衣的十四尺布和五斤棉花，来到了老人家的蒙古包。姐姐说："额吉（妈妈），这布和棉花，留给您做衣服吧。"老额吉说："姑娘啊，我有政府的关怀，啥也不缺。你离妈妈这么远，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姐姐说："您就是我的妈妈，还是您留下吧。"老人推辞不过，只好留下。当姐姐离开的时候，老人看到姐姐自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热泪止不住流下来。老人家对我说："你姐姐从内地到边疆，过头一个冬天，她不想着自己冷不冷，却想着我暖不暖。"老人泣不成声地说："你姐姐留下的哪是布，是对牧民的一片心哪！"老人把布叠得整整齐齐，一直珍藏到现在，每天都放在枕头底下。老人说："我看到这块布就像看到了我的姑娘张勇，你姐姐和我们牧民真是心贴心哪！"

牧民们还告诉我：姐姐在草原住过许多蒙古包。每住过的蒙古包里的老老少少，都非常喜欢她；她住到哪里，就把哪里当成自己的家；拉水、做饭、挤牛奶、捡牛粪，什么活都干；哪一个牧民有困难，她都热情帮助；有人患了胃病，他就给家里写信，从天津买药，亲自送上门；有人鞋破了，她不远十几里，把自己的鞋送去；有的知青和她一样，把脸冻坏了，她宁可自己的脸淌着冻伤的黄水，把冻疮膏送给别人用。

我姐姐心里装着牧民，牧民心里也装着姐姐张勇。有一次，她病倒在一个老牧民家里。老额吉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喂药喂水。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姑娘，看你病成这个样子，离家这么远，不想回天津，不想妈妈吗？"我姐姐怎么回答呢？她说："额吉，我不回天津，也不想家，草原就是我的家，牧民们就是我的额吉、阿爸！"老人家听了，激动得亲吻着姐姐的额头，说："我的姑娘，你真是我们牧民的好姑娘啊！"

我姐姐到草原后，没有回过一趟家。记得一年后，妈妈非常想念她，就让我写信给她，希望她能回来看看。她在给妈妈的回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离开您虽然想念，但我离开牧民们更为不安，我在草原上生活非常幸福，离开草原一天都觉得不习惯。……从一个知识青年，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牧民，这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呀！……放心吧！妈妈，让女儿在草原上锻炼成长吧。以后飞回家探望您的，将不是一个软弱的姑娘，而是草原上的雄鹰！"

这一桩桩、一件件姐姐和牧民们心连心的动人故事，通过牧民们的介绍和自己的回忆，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

姐姐留下了许多篇宝贵的日记，通过看姐姐的日记，和同牧民们座谈，姐姐在草原上，努力向牧民们学习，自觉找差距的事迹，对我印象很深：

姐姐第一次出去放羊，让羊在蒙古包附近吃草，羊倒是吃的很饱。可是，到晚上回来，老羊倌一面端水给她喝，一面对她说："羊可不能在这么近的地方吃草呀!"她想：对呀！读了几年书，连普通的常识也不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是要放的远一点。第二天放羊，她一边让羊吃草，一边赶，一直赶到达赉湖边。羊吃的很好，但是由于摸不准时间，还是按头一天的时间往回赶，这下晚了。离家还有五六里地，看不见蒙古包。这时候，天刮起了大风，羊也卧下了。姐姐使劲地喊，快快地赶，但羊也走不了多远。正着急的时候，老羊倌快马加鞭赶来接姐姐

了。待老羊倌熟练地把羊赶进了圈，天下起了雨，已经晚上快10点钟了。姐姐不顾一天的劳累，顾不得喝水、吃饭，请老羊倌谈谈放牧的经验。老羊倌鼓励姐姐说："头三脚难踢呀！你羊放的不错嘛。"老羊倌告诉她："羊是放在地上，但要经常抬头看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慢慢地一边让它吃草，一边往回赶。要是晚了，不能急。要是赶的急了，把羊赶得唿唿喘，回来羊也卧不好，羊吃的一天草就白吃啦。"这些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姐姐听了觉得特别解渴。由于姐姐的努力学习，很快学到了牧羊的本领。

冬天，是放羊最艰苦的季节。刮起暴风雪，伸出的套马杆看不见杆头，姐姐主动接受了放牧1600只"二岁子"羊的任务。有人对她说："'二岁子'羊刚离开母羊不久，乱跑乱闯，老羊倌都觉得不好放，你可要留神呀！"有一天，姐姐把"二岁子"羊赶到牧场，突然刮起大风雪，羊调过头来就顺着风跑了起来，姐姐飞身上马，顶风冒雪，撵出几十里，终于把羊截住，赶到一条沟里。风雪还在唿啸，她已经汗流浃背。就这样，长长的一个冬天过去了，姐姐把羊放得膘肥体壮，一只也没丢。而她自己却瘦了，脸上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水泡，淌着黄水。老牧民心疼地劝她上点药，歇几天，她说："不碍事，有骨头不愁长肉。对我来说，冻掉的是娇气。"后来，冻疮好了，姐姐脸上留下两块明显的伤疤。牧民们都赞扬她：羊放的好！

有一天，一个牧民抓来一只羊，掀起羊尾巴，姐姐看到上面长满了蛆，烂哄哄的，肉上"血刺唿啦"地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蛆。突然，那羊一甩尾巴，姐姐身不由己地向后退了一步。当时，她对这件事没有在意。过了几天，她看到这位牧民手上有血，便不解地寻问。牧民告诉她：是给羊挑蛆弄的。姐姐马上联想到：那天自己见到生蛆的羊后退的情景。她的心被深深触动。她想到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从此以后，姐姐不怕脏和累，自觉与牧民们看齐，主动给生蛆的羊挑蛆、洗伤、上药。

给羊洗药水澡是牧区最脏最累的活，她挽起裤脚，光着脚

丫，坚持在浴槽旁，有时羊一挣扎，连人带羊一起掉进浴槽，弄得满身泥水，让药水一泡，伤口钻心地疼。她却乐滋滋地说："咱就是要滚一身泥巴，弄一手黑，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在草原住的近一个月里，姐姐的英雄事迹鼓舞着我，草原牧民深厚的情义感染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临离开草原的时候，贝尔公社的副主任阿木拉老额吉，怀着真挚的情谊，把一套蒙古族服装送给了我。老额吉一边给我穿好蒙古服，一边说："孩子，让额吉瞧瞧。你多么像你姐姐，多像我们蒙族孩子。希望你同你姐姐一样，做草原的雄鹰，边疆的骏马。"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也流着眼泪，激动得半晌只说了一句话："我绝不辜负牧民们的希望。"

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老额吉的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就是从那天起，我开始有了一个念头：长大要来草原，接

姐姐的班，做一个草原新牧民。（全文完）　　张健 2013年6月25日草于津

作者为知青的好榜样张勇烈士的弟弟）

（来源：新巴尔虎右旗天津知青联谊会主办《克尔伦通讯》总第347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的公主你在哪里

作者：陈丽梅 来源公众号“30号院 ”

来源：北京丰盛中学《丰盛千千树》

作者：陈丽梅

时间飞逝，又到了清明时节春暖花开的日子。每到这时，我都会打开那扇记忆的大门，里面有我曾经教过的那些孩子们，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尤其是我心爱的公主。

1969年，正是我去陕西延安插队的第二年，我被社员们推选为本村的民办小学教师。这个只有40几户人家的小小村落，开办了这个小小的学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共才21名学生。在一个不到18平米的窑洞里，摆上几个条凳就是学校了。我则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老师兼校长。

孩子们没有出过大山，非常爱听我给他们讲故事。由于我活泼的天性，和他们在一起就是个孩子王。春天我们挖野菜；夏天我们去坝上游泳；秋天我们一起收获果实；冬天我带着他们去砍柴……在那些日子里，我都记不清给他们讲了多少故事，从安徒生童话到普希金的诗歌，从古代传说到当代文明……孩子们围着我听啊，问啊……故事讲多了，孩子们的心也开始飞翔了，他们总是想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

1971年作者（后排左一）在生产队当民办教师与学生合影

我们学校的四年级，是由两个11岁的女孩儿组成的。一个叫格子，一个叫聪儿。你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两个多么

美丽的女孩儿啊！格子长着弯弯的眉毛，两只丹凤眼微微上翘，小小的鼻子精巧无比，红红的嘴唇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绽放。而聪儿的美丽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她的容貌是英国公主式的美丽，典雅而高贵。我第一次见聪儿，就被她特有的西方美所打动。我怎么也不明白，在陕北这个穷山僻壤的地方怎么能出落成一个这么美丽精巧的女子？亚麻色的两条粗辫儿一反一正地垂过肩头，白皙的脸上略有一丝红润，褐色的眉毛、睫毛、眼睛，都像艺术家精心安排过的，鼻子直细端正，嘴巴稍大，脸庞轮廓分明。每到给四年级讲课时，我就会兴奋，因为我的格子和聪儿是那么聪明，听课是那么专注。我总是被她们认真的稚气打动，觉得这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两位公主。有时，我又很为她们忧伤，不知道在这个穷困、落后、封闭的小山村生长的这两个女孩子，将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一年过去了，春天来了，我决定带着两个小公主进一趟延安城。我，一个20岁的北京知青，带着两个花一样的小姑娘，迎着扑面的春风，伴着飞翔的小鸟，采摘着路旁的野花，穿过嫩绿的麦田，翻过青青的山岗，趟过延河，跳着、笑着、追逐着、讲着、唱着、期待着，向延安城走去。不知不觉已经走过30多里路，到了河庄坪公社。我们坐上公共汽车，在汽车飞驰的那一刻，格子和聪儿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惊奇和喜悦，她们成了村里最早坐过汽车的人。在城里，我给她们买了学习用品、红头绳、三毛钱一尺的花布每人五尺，可以做一件简单的小袄了。两位公主真是太高兴了，她们告诉我这是她们最快乐的一天。

又一年过去了，春天又来了。村子里在办喜事儿，我的公主格子出嫁了。你一定不会相信，我的格子——一个12岁的女孩坐着毛驴嫁了人，你也体会不了我那无奈、无助和压抑的心情……

之后，格子就渐渐退出了我的视线。五年级只有聪儿一个学生，我和聪儿都感觉格子走了，似乎带走了我们的“三人世界”，我和聪儿都少言寡语了。

1972年冬，我被招工。在离开小山村的前夕，正是格子生产后的几天，我去看望她并与她告别。格子静静地躺在炕上，美丽清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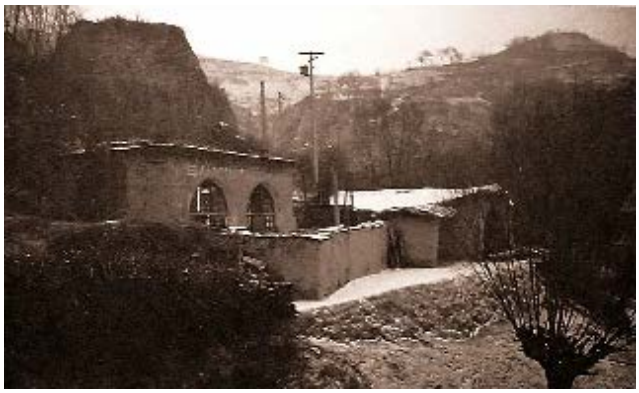
“老师，我很累，我起不来。”格子轻声弱气地说。

我握住她那冰凉的小手，摇了摇，什么都说不出来……下决心把我走的消息告诉她，我俩都默默地流泪，没有一句话。那一刻，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中，放不下、抹不去。

我走了，在陕南兵工厂当了十几年的干部，后来又考上大学，回北京，当教师，我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新着……然而，离开小山村，离开格子和聪儿的那一幕场景总会浮现出来，成为我紧张忙碌的生活中一剂苦涩清新的良药，提示我不要过于奢华、贪婪。

格子，聪儿，我心爱的公主，你们还好吗？

2002年秋，我回了一趟小山村。沉重急切的心情主宰着我，仿佛暗示我一切并不很妙。



2002年秋，作者回了一趟小山村，这是临近村头的第一户窑洞。

临近村头的第一户窑洞正是我们知青住过的窑洞，在硷垛的柴垛上，坐着一位身穿黑袄，头包花巾的妇人。

“你是谁？”那妇人问。

“我是30年前在这儿插队的北京知青陈丽梅。”

话音未落，妇人便张开两臂呜咽起来：“老师，我是格子呀！你还认识我吗？”格子？我的公主！如今竟这般孤独地坐在柴垛上？

“格子，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你好吗？”我迎上去，抓住她的小手。手，还是那么冰凉。

“老师，我生完那孩子就再也没站起来呀！老师，我想你呀。”

格子的话像重重的大石头坠着我沉入深渊，半天倒不过气来。

一个男人走过来，一只手抓起格子，一只手抓起格子臀下的褥子，把我引进黑黑的窑洞——他们的家。这个家

除了炕、灶、两个小板凳及脏烂的被褥，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我不知怎么度过了那个难耐的夜晚……

第二天，我走访了各户人家，想见见我的那些“曾经”的学生。可惜的是，只见了两个人，其余都出门打工了。问起聪儿，村民告诉我：“聪儿17岁就嫁给了一个只会打她的外乡人，聪儿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离家出走，一去不返。”

……

2005年作者（右一）回村时与村民留影

2005年冬，我又来到小山村，打算与格子及乡亲们合影，算是留个念想。

不料，我的公主——格子已离开人世。

格子12岁结婚，13岁生娃，大出血后瘫痪，直到45岁去世。这就是我的小公主的命运啊！

聪儿，我的另一位公主，则仍无一丝音信。

……

40多年过去了，时代、岁月、观念、价值，在各色“发展”潮流的涌动下，千变万化。各种各样的诱惑，名目繁多的时髦，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人们都找不到“北”了。当然，也仍有不少理智、冷静、清醒、坚守道德的人，没有被堕落和愚昧吞噬……

聪儿，我的公主，你在哪里？

（为了保护本人的隐私，文章中引用的人名非真实姓名）

初 恋 祭

作者：邢仪

1968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到延安插队落户，我在那里生活、劳动，奋斗了前后整整十年，陕北是我人生之路的第一段旅途。我留恋那块黄土地，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它，也把我纯洁的少女初恋留在了那里。

插队生活的第三年，同队的知青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参了军，有的去了父母所在的干校，有的被抽调去了县里的文艺宣传队，我也被借调到清平湾中学教书。

清平湾中学与我们村相隔一座山，十里路，设在离关庄公社三十多里的川道上。这是个只有初中部的简陋的学校，四面依山，一个操场，几间教室，靠山嵴箍着一熘石窑，是教师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学校的教师有公办和民办之分，公办教师吃国库粮，民办教师每月要从自己窑里背粮来入伙。我因为是临时借来帮忙的，属于后者，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往返二十里山路回村里去取粮食。说到需要在学校住宿的教师呢，主要是离家太远，还有像我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每天下午放学后，住家近的教师就都回去了，学生则不论离家十里、二十里，翻山还是走川，一律不在学校住。因为一来学校没有学生宿舍，二来像他们那样的半大孩子窑里还有许多活等着他们放学回去干呢。

喧闹纷乱的校园一下子静下来，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空，我们这所学校被山的巨大阴影笼罩住。坐在窑洞里的书桌前，遥望对面山嵴上光与影的分界线，眼见那阴影部分在上升，光亮部分在变小，由淡黄色到橘黄，由橘黄色到橘红到只剩下玫瑰色的一小块山顶。我相信毛主席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必要。但是一年年过去了，以后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随着同学们以不同的方式一个个离开陕北，这种忧虑经常困扰着我。

窑门外响起脚步声，是他来光顾我的小窑找我聊天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观看一次县级篮球比赛上，人们大声地为一位高个英俊的青年叫好，只见他弹跳惊人，投篮几乎百发百中，在场地上十分活跃。只要他上场，比分便直线上升，这个小伙子篮球打得真棒！原来他就在杨家坪学校任教。

他是绥德人，是属于被我们学美术的所赞叹的那类形象好的陕北后生，生得宽肩窄股，修长挺拔，鼻直口方，

浓眉亮眼。

他比我大四岁，正当二十五六岁的年龄，是原高中66届本地回乡青年。在杨家坪学校，他是骨干教师，担任初三毕业班的数学课教学，还兼任两个年级的体育课，学生们都喜欢他，崇拜他，无论他走到哪里，周围总是簇拥着一群男学生。他是公派的教师，家离学校有好几十里地，所以平时住在学校。那时候的陕北农村既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每到晚上他常常拉二胡消磨时光。

看得出来，在这个寂寞的山村学校，对于我的到来，他十分欣喜，文化大革命大串连时，他曾步行到过北京，还在天安门前留过影。他惊讶北京与陕北的天壤之别，他羡慕，向往，念念不忘那个遥远的群山外面的精彩世界。所以，我和我曾生活过的那个城市的一切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我们刚到农村时与房东女子（左一）合影，中间邢仪、右一林达

我们坐在小窑里有说不完的话题，论古今，谈天地，我本生性腼腆，不善言辞，但此时在他面前却滔滔不绝，我高兴有人与我一起排遣这些个孤寂、难捱的黄昏，我还有一种讲给对方听他所没有的经历时的小小的优越感。但回想那时的我绝对纯真，善良。

当时我第一次接触陕北青年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为他们叫屈，他们天性优秀，不乏智慧，只因出生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使他们只能祖祖辈辈黄土里扒食，缺吃少穿，穷困不堪。为什么同是一个时代，一片国土，一个社会，命运会如此不公平地亏待他们？我在他们面前感到理亏，我不应该拥有的比他们多那么多，我愿尽我的所有给予他们，将我的与他们分享。

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借给他我的书，我们一起议论“牛虻”的命运，感叹“青年近卫军”的英勇，我给他看我的读书笔记，送给他一腔的热忱和友谊。

不是有意的选择，我们就这样相遇了，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段感情经历确实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各自以后

的人生道路。

他变得愈发青春和生气勃勃，篮球场上更多地活跃着他矫健的身影，校园里学生们中更多地听到他的高声笑语，他欢快又悠扬的二胡声，驱散了我黄昏时分的愁思。逢到我不用回村取粮食的星期天，他也留下来，我们和其他青年教师相约着去水库游泳。等到下一个星期天，我背着口粮回到学校时，他也正从窑里回来了，并且随着季节和时令，他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山里的特产：桃、杏、小瓜、大枣和红薯。

我很年轻也很傻，毫无顾忌地享受着我们的友谊。我很快活，却不知道由于我的出现搅扰了他的平静。他开始向往，憧憬，开始睡不安稳，开始跃跃欲试。就在一次我们相伴夜行十几里去外村看一部老掉牙的电影回来的路上，他说“小心脚下”的同时抓住了我的手，立时一股热流灌进了我的全身。直至今日，我仍能鲜明地记得他那滚烫和颤抖的手，一种真情的烈火由他而起，也点燃了我，那是无法拒绝，身不由己的。我不能说这是我不希望的。总之，我没有抽回自己的手，随之，我的手也在滚烫地颤抖，也许这就是一颗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对爱的初试？我们就这样手握着手一路走回学校。

好像我知道他已经结婚是在这之后，他不能不告诉我，他显得很痛苦。我不能想像这样年轻活泼的一个人，竟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吃惊的同时又十分矛盾。先是感到一种失落的揪心，好似一脚踏进无底的枯井，心被悬在半空，无着无落，继而又有一种摆脱绊羁后的轻松。我不否认在我二十一年的生命中，这是第一次与异性产生的友谊与恋情，但我从未想到过结婚，因为我无论在感情上掀起怎样的狂澜，心底总存一丝理念：不能在这里安家。我很清楚，如果不是他已经结婚，我们的感情发展下去也是没有出路的，这样反倒令我释然。

现在我知道我很“坏”，我不如我的同学，我就有这样的女同学，她们与当地青年结了婚，几十年同甘共苦，相亲相守，有些至今生活在陕北。她们勇于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只是为了一个爱人，也是为了自己的真情，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以至整整的一生。从这点上说，他们是富有的，浪漫的，是无愧的，而人生在世，什么是可宝贵的呢？不就是那么一点点真情么！

我真的不值得他爱。他向我表示他准备离婚，我说绝对不行。我说绝对不行的同时，拆了自己的毛衣给他织成毛袜。我想补偿什么，可我知道我什么也不能补偿。他变得消沉下来，他望着我时的眼神里有无尽的哀怨。他痛心疾首，他怨恨陕北农村的早婚，他开始一根一根地吸烟，他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他常常失眠，傍晚空寂的校园里长久地回荡着他的二胡声，如泣如诉。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相处一年产生的如醉如痴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情悲剧式地结束了。

一天，他路过学校里另一位男教师的窑门口，听到里面在议论我与他如何如何关系好，他冲进去噼头给了那位教师一顿老拳。那位教师状告到公社，公社书记亲自下来处理，一时间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事后他对我说，我在他

心中之神圣，使他不能允许别人对我有半点微词，他很后悔年轻气盛不顾后果……当然我更明白他这是在借机发泄，他想发泄，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啊！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县里录用了一批知青当干部。上面来文调我去县文化馆报到，当了县里的干部是否会影响今后的前途，在当时，已顾不得更多考虑，反正清平湾中学不适宜我再呆下去了。我们告别得匆匆忙忙，他还回了我的书，送给了我一个硬皮笔记本，笔记本的开头有他写给我的一首诗。他的诗写得不太高明，但很朴实，很真挚。我发现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些水迹，突然明白这是他的泪痕。我受不了堂堂七尺男儿的眼泪，更受不了这泪痕对我的刺激，神使鬼差我竟将那首诗从笔记本上扯下来撕碎了，我无法解释我的行为，也许是不喜欢他的软弱？也许是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邢仪在翻麦垛?

上天安排，我们的缘分并未就此了结。到县文化馆的第二年，我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在美院里还被选为团委副书记，当上了学生里最大的“官”。毕业时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诚心地表示要留我在学校工作，还说学校打算重新分配一名毕业生到延川县文化馆替我。可没过几天，我的班主任悄悄告诉我，他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延川县搞我的外调，原因是一位同来自延川的同学向学校反映了我曾在杨家坪学校的什么事云云。外调不了了之，我留校的事也没被再提起。

上学三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延川县文化馆。这时县里的知青已走的差不多了，而正当别人纷纷远走高飞时，我却又往回托运自己的箱子。这时，我开始对他产生了怨气。

他知道我又回到延川后，一个星期天到文化馆来看我。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脚步有些迟疑。我看到他又像以前那样出现在我的窑门前。几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瘦了，两颊塌陷了，他的眼神疲惫而空洞，他的衣

服不再是干净而平整的了，穿着一身皱巴破旧，灰不溜丢的蓝裤褂，他身上原来那种最吸引我的青春和朝气几乎荡然无存。但此刻他的脸上却兴奋地放着光，我让进他，我们再次相对了，彼此却显得很生疏和客气，这时，我心里什么滋味都有，惊诧、痛惜、酸楚、凄怨，于是我犯下了一个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我不管不顾地讲了我没被留在美院的原因。

我永远都要诅咒我自己的狠毒与自私，千不该万不该在他满怀重逢的喜悦来看我的时候，兜头给了他一盆冷水，将自己的不幸全推给他要他承担。

他立刻像被霜打了似的，整个人都瘫软下去，脸色霎时变得土黄，蜡人一样呆坐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他追求美好、高尚的精神生活，他有什么错？他虽然贫困、单调但却平静的生活被这短暂的无望的痛苦的爱情所搅扰，从此他吃不香，睡不安，他吞食了这颗苦果。他太善良了，他可以默默地忍受命运给予他的痛苦，他只想给人爱，却从不想害人。他忠厚、纯洁的心地因自责而深深地受了伤，他伤的是元气，将终生难以治愈。

在这场悲剧式样的爱情中，我只是暂时受挫，但我当时却只替自己着想，一味强调自己的落难。我们无言地僵坐，眼光相互回避着对方，空气在我们中间凝固了，时间变得非常难熬。

他缓缓地站起来，默默地将书包里的水果、罐头和当地产的粗大饼干块堆放到我的书桌上，然后捏着空空的书包走出去了，没有再回过头来。

我追出去，但没有想叫住他，从他垂下去的头和紧缩的双肩我看出他正在啜泣，他的心在啜泣，他的心在滴血。

这就是他最后留给我的背影。以后我又在延川县呆了四年，再没有见到过他，听说他有了四个孩子，调到一处很偏僻的农村学校教书，不愿与过去的老朋友见面。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但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是那样的鲜活，我忘不掉他，也摆脱不掉对他的歉疚。

在那块黄土高原上，我曾与一位黄土地的儿子相遇，并给了他一个少女的初恋，也搅扰了他一生的平静。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不管朋友们会如何谴责我，说我是个狠心的人，我绝不辩解。

谨以此文向他表达我永远的祝福与怀念。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邢仪，北京知青。北京清华附中初67届毕业生，1969年到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1973年在西安美术学院上学，后来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员。退休前为北京“中国体育博物馆”展览设计、副研究馆员。

载《知青》杂志第22期　　第53-55页

来源：公众号“南加知青”

http://hxzq.hk171.80data.net/showcorpus.asp?id=154　邢仪文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上海知青重回第二故乡，站在村头他哭了

来源：搜狐山水情深

作者：草根作家

2021年4月5日上午十点多，一辆白色越野车来到了东北边陲的向阳沟村村头，车在村口的那两棵大柳树旁边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五个人，三男两女。他们站在村头环顾四周，一位头发花白的男士走到路边那两棵大柳树近前，抚摸着那两棵柳树，泪水喷涌，失声痛哭。

失声痛哭的这个人叫杨永发，上海知青，曾在向阳沟二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年多，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才离开了向阳沟二队。这次陪同杨永发重返第二故乡的有他的老伴、儿子、儿媳和孙子，他们经过了两天两夜的长途奔波，行程两千五百公里，从上海驾车来到了向阳沟。

在村口站了好久，平复了一下情绪，杨永发才和他儿子一起缓步往村里走去，他儿媳驾车拉着他老伴和孙子紧跟在后面。

通往村里的水泥路宽阔平坦，路上遇到了几个村民，但都是生面孔，杨永发一个也不认识，村里人看着杨永发父子，也是一脸的茫然，也没有人认识杨永发。

来到村里的食杂店，食杂店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正站在门口晒太阳。杨永发走进食杂店，，买了一盒烟，

笑着问店老板："你好，请问一下，你知道上海知青在这插队落户的事情吗？""那位店老板笑着说："听说过，我家还住过上海知青呢，那时我才三四岁，只是记不太清了。"

杨永发又问："村里人有谁知道上海知青来插队落户的事情？村头那两棵柳树你知道是谁栽的吗？""我三叔原来是小队长，他知道知青来插队落户的事情，你去问我三叔吧。村头的大柳树我听我三叔说过，那是上海知青栽的，都四十多年了。只是我们村里现在没多少人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老人也都进城帮儿女看孩子去了。"食杂店老板很热情，她说完，走出食杂店，指着不远处的一座院落，告诉杨永发她三叔家就住在胡同东头的第二家，

原来，食杂店的老板就是老队长孙明东大哥家的女儿，她叫孙灵芝，都五十五岁了。杨永发虽然知道孙队长有个侄女叫灵芝，但他对孙灵芝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杨永发和孙灵芝挥挥手，径直去了孙明东家。

走进孙明东家宽敞整洁的大院子，杨永发一眼就认出了坐在门口马扎上晒太阳的老队长，他快步来到老队长面前，仔细打量了一下老队长，眼泪再一次喷涌而出。

看看站在自己面前的杨永发，孙明东老队长突然拄着拐棍站起来，用手揉了揉眼睛，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是永发吗？我看着眼熟。""老队长，我是杨永发……"杨永发紧紧抱住老队长，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待杨永发和孙明东的情绪都平定下来，孙明东的老伴把大家都让进屋里，为大家倒水。看着杨永发一大家子人都来了，孙明东笑着说："永发，当初我阻止你和大萍谈恋爱，你还生我的气，现在知道是咋回事了吧，不然啊，不光是苦了你一个人，大萍也会跟着受伤害，也就不会有你们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了。""是啊老队长，还是你看得长远，当时我们年轻，做事欠考虑。"说到大萍，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杨永发眼前。

1969年3月28日，杨永发和十四名上海知青一起来到了向阳沟二队插队落户，当初二队的队长就是孙明东。孙队长当时三十岁，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人。杨永发他们一行十五人，九名男知青，六名女知青。因为当时队里没有可供知青们一起居住的地方，孙队长就把杨永发他们十五名上海知青分成五个小组，三人一组，临时借住在社员们家中。杨永发、林明德，李寅生三名男知青为一组，他们三人借住在社员王凤生家。

王凤生家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共五口人，他家有三间正房两间西厢房，大儿子已结婚单过，二儿子王洪昌当年十八岁，和杨永发他们住在西厢房里。王玉萍（小名叫大萍）是王凤生家的小女儿，当年十六岁，个头挺高。因为从小娇生惯养，说话嗲声嗲气的，但她长得特漂亮。

杨永发他们住到王凤生家的第二天，孙队长就把杨永发他们三人的口粮送了过来，还为知青们送来了半盆酸菜、几个萝卜和几斤土豆，油盐酱醋和锅碗瓢盆等一应生活用品也是孙队长操心为知青们置办的。王凤生一家人也很热情，王凤生的媳妇也给知青们送来了咸菜和萝卜，大萍主动帮知青们烧炕，教知青们做饭，还帮着知青们刷洗碗筷。对于孙队长和王凤生一家人的热情帮助和关爱，杨永发他们非常感动。

一晃就是两年，1971年冬季，林明德应征入伍，他成了第一个离开向阳沟的上海知青。据说林明德的姑父在部队工作，林明德是被点名入伍的。经过两年多的相互接触，大萍（王玉萍）渐渐喜欢上了杨永发，她经常抢着替杨永发洗衣服，还把家里的鸡蛋和好吃的东西送给杨永发吃。杨永发也从心里喜欢漂亮的王玉萍，他还把自己心爱的那个口琴送给了王玉萍。

1973年秋后，大队为知青们建好了住房，三个生产小队的四十名上海都搬到了向阳沟大队的知青点（新建的一排房子，共九间，三间房供一个集体户居住）居住，每个生产小队的知青为一个知青集体户，杨永发担任二队知青集体户的户长。

杨永发他们搬到集体户后，王玉萍隔三差五就找借口到知青点来，她来知青集体户就是来找杨永发的。时间久了，村里也就传出了闲话，说啥的都有，反正没有好听的话。

听到这个消息，王凤生非常生气，他跑到知青点，找到杨永发当面质问："我问你，你和我家大萍到底是咋回事？你小子以后再敢瞎胡来，看我不把你的腿打折。""大、大爷，我、我没和玉萍胡来呀，我、我一直拿她当小妹，我俩也没闹过矛盾呀。"被王凤生训斥了一顿，杨永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说话也不顺溜了。

"当什么小妹？你没听别人说什么了吗？人家说你勾引我家大萍，还有更难听的，你对大萍要是有意就摆到明面上来，别让别人说三道四的。"王凤生的语气虽然缓和了一些，但声音还是很大，引得众人都来围观。

就在这时，孙队长赶来了，他听明白了是咋回事，就笑着说："凤生叔，你别听别人瞎说，人家永发是啥人你还不清楚吗？还有大萍妹子，以后你尽量让她少来知青点，免得惹闲话。"

被孙队长说了一顿，王凤生气唿唿地回家去了。杨永发心里很委屈，也很尴尬，幸亏孙队长及时赶到为他解了围，围观的人也都散去了。

看杨永发流泪了，孙队长把杨永发叫到一边，安慰了他几句，然后又问他：“永发，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你考虑过吗？以后要是有机会离开向阳沟，你会扎根农村一辈子吗？你和大萍的事，不是我泼冷水，我就怕有那一天，你会离开向阳沟的。再说了，就凤生叔那样的脾气，大萍从小娇生惯养，你可想好了。”“队长，我是真心喜欢玉萍，不是胡来。”杨永发说话的声音很小，孙队长的话他让他意识到了这些现实问题，更何况他的父母坚决反对他找农村对象。

之后的日子里，王玉萍还是总找借口和杨永发在一起，杨永发心里也是放不下大萍，但他心里很纠结，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份感情到底有没有结果。

1974年春天，收工回家时，杨永发在村东的河边拔了两棵手指粗的柳树苗，他想拿回去栽到知青点的院子里。到了村头，王玉萍指着路边的一片空地说：“永发哥，你把这两棵树苗栽到这吧，保证能长成大树。”王玉萍说完，用铁锨挖了两个坑，杨永发就把那两棵柳树苗栽到了村口的路边。当晚，他挑着两桶水来浇树苗，却发现王玉萍也来浇水了。

当年秋天，杨永发被推荐上了大学。当初他不肯去，孙队长却说：“永发，不是我心狠非要拆散你和大萍，你俩就算能成，以后也不一定能过得好。你看你们来插队的上海知青，已经有好多人离开了向阳沟，你这次不走，以后早晚也得走。趁着还没跟大萍怎么的，还是早点走吧，别等到以后伤害了大萍，你也痛苦。”

在孙队长和大家的劝说下，杨永发离开了向阳沟，迈进了大学的校门。离开那天，王玉萍把杨永发送到了村口，她指着他俩栽下的那两棵柳树说：“永发哥，我知道你走后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以后看到这两棵树，我就当看到了你。等以后你再回向阳沟，这两棵柳树兴许就长成大树了。”王玉萍说完，把杨永发送她的口琴还给了杨永发，哭着跑了回去。

含泪离开了向阳沟，杨永发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了。大学毕业后，杨永发回到了上海，在政府部门任职，后来找了一位大学毕业的上海姑娘，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以后的生活中，杨永发也多次做过假设，假设当时和王玉萍生活在一起，结果会怎样？生活习惯、文化差异、亲友的反对等等，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他虽然深感对不住王玉萍，可这样的结局总比把王玉萍扔在半路上要好很多。再想想老队长当年阻止自己和王玉萍恋爱的事情，杨永发心里总算明白了老队长的一片苦心。

在向阳沟待了大半天，看望了村里建在的几位老人，给老队长留下了一万块钱，杨永发一家人离开了向阳沟。他们已经计划好了，要去省城看望一下王玉萍。王玉萍的老伴去世后，她就去了省城的闺女家，已经在省城生活好几年了。

离开老队长家时，杨永发给了老队长一个承诺：三年后他还会回来看望老队长的。老队长虽然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他说一定要等到那一天。

车辆行驶到村口时，杨永发示意他儿子停车，他下车来到那两棵大柳树旁边，眼泪又一次模糊了双眼，他说看到那两棵大柳树，就想起了他在向阳沟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就想起了善良的乡亲们还有王玉萍。那段苦涩的青春岁月，杨永发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